

张闻天选集

(1900-1976)

张闻天选集



张天

目 录

帝国主义与中国资本主义(一九三一年六月十五日)	1
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一九三二年十月三十一日)	7
论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一九三二年十一月)	14
五一节与《劳动法》执行的检阅 (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九日).....	21
关于苏维埃政府的《宣言》与反机会主义的斗争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30
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 议(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七日).....	37
关于张国焘的错误(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二日).....	60
关门主义是目前党内主要危险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一日).....	62
改变对富农的策略(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六日).....	66
报告	66
结论	69
目前形势下党的策略(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71
党的策略路线	71
党内主要危险是关门主义	74

为扩大与巩固共产党而斗争	76
给张国焘的电报(一九三六年一月十三日).....	80
共产国际“七大”与我党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 (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日).....	82
一 世界战争的危險与争取和平的斗争	82
二 国内形势与统一战线	84
三 准备大规模抗日战争与东征	88
四 党内问题	89
共产党是统一战线的核心(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日).....	90
必须使共产党、苏维埃与红军成为统一战 线坚强的核心	90
必须使统一战线成为准备与组织大规模的 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的主要关键	92
给刘少奇同志的信(一九三六年八月九日)	95
欢迎北上抗日的二、四方面军 (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五日)	101
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 共和国的决议(一九三六年九月十七日)	105
关于白区工作中的一些问题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八日)	113
论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	113
领导群众斗争的几个原则	124
国民党三中全会后的形势与我党任务 (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三日)	135

中国共产党苏区代表会议的任务 (一九三七年五月二日)	144
平津失守后的形势与党的任务 (一九三七年八月九日)	150
继续抗战与国共关系(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156
一 目前形势	156
二 国共两党关系问题	157
三 我们的任务	158
论青年的修养(一九三八年四月十二日)	161
一 要有坚定的高尚的理想	162
二 要为实现自己的理想奋斗到底	165
三 要学习实现理想的办法	171
四 要同群众在一起去实现自己的理想	177
读了《张国焘敬告国人书》之后 (一九三八年六月七日)	186
论待人接物问题(一九三八年七月二十六日)	202
要有伟大的胸怀与气魄	203
要有“循循善诱”与“诲人不倦”的精神	209
对人要有很好的态度	214
要适当的对付坏人	218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开幕词 (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九日)	223
组织工作要中国化(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五日)	225
在民族自卫战最前线的岗位上——中共十八周年纪念 (一九三九年六月三十日)	227

支持长期抗战的几个问题	
(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三日)	236
投降妥协的危险性问题	236
武汉、广州失守后的形势变化	237
当前党的任务	238
关于三民主义问题	239
文化政策	241
党的工作问题	242
略谈党与非党员群众的关系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七日)	244
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内容与性质	
(一九四一年一月五日)	252
提倡朴素与切实的工作作风	
(一九四一年五月十六日)	255
更多的关心群众的切身问题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日)	260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左”倾危险	
(一九四一年八月十日)	264
发展文化运动(一九四一年九月十日)	288
正确处理文化人与文化团体的问题	
(一九四一年十月十日)	290
提高干部学习的质量——纪念五五学习节	
(一九四一年四月七日)	294
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日)	299

一 宣传鼓动工作的任务与范围	299
二 我党宣传鼓动工作的特点	300
三 宣传与鼓动的相互关系	301
四 宣传鼓动工作的基本原则	302
五 宣传鼓动工作的方法	303
六 党内教育工作	305
七 群众鼓动工作	306
八 文化运动	308
九 报纸、刊物、通讯社及出版工作	309
十 宣传鼓动工作与组织工作的关系	309
十一 宣传鼓动工作干部的培养	310
十二 宣传鼓动工作的统一领导和组织系统	311
缺乏实际工作经验要补课(一九四一年九月)	313
出发归来记(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七日)	316
出发经过	316
打破教条的囚笼	317
从实际出发	318
调查研究是从实际出发的中心一环	322
在实际中和在群众中审查工作	325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调查研究	328
着重典型	331
分析与综合	334
调查方法点滴	337
坚持下去	340
关于公营工厂的几个问题(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日) ...	342
公营工厂的任务	342

建设公营工厂的基本原则——经济核算	344
公营工厂管理的一元化	346
关于处理满拓地、开拓地的意见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八日)	349
城市清算运动中应注意事项	
(一九四六年七月四日)	351
分地办法要有利于团结大多数农民	
(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四日)	354
对土地问题的意见(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日)	356
发展工商业的若干政策问题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七日)	358
关于私资与公资	358
贸易政策	359
物价政策	360
工业政策	361
工资政策	362
税收政策	362
合作社的建立	363
加强领导	363
论群众工作中的诸问题(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二日)	365
消灭封建法西斯集团	365
把解决土地问题同生产与战争结合起来	368
在平分土地运动中保护城市工商业	
(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六日)	370
从土地斗争转入生产斗争(一九四八年二月)	373

新形势的估计	373
发展生产、勤劳致富	376
加强思想领导	381
城市的地位和城市工作中的阶级路线	
（一九四八年八月三十一日）	384
一 关于过去城市工作的估计	384
二 关于城市地位的新认识	389
三 我们在城市中的阶级路线	390
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	
（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五日）	396
一 东北经济	396
二 国营经济	396
三 合作社经济	399
四 国家资本主义经济	406
五 私人资本主义经济	408
六 小商品经济	411
七 东北经济建设中的阶级路线	415
大量提拔与培养新干部(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九日)	418
关于发展农村供销合作社问题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425
关于农村供销合作社赢利分红等问题的意见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四日）	435
关于农村工作的三个问题(一九四九年五月).....	447
正确认识和对待土改后农村经济中的新趋向	447
发展劳动互助要反对强迫命令和放任自流	449
农村党员要为合作化方向奋斗	453

关于东北私人资本主义的报告	
(一九四九年七月十九日)	455
努力提高业务水平(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三日)	465
加强调查研究	465
加强学习	468
加强对业务的领导	469
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472
关于执行我国和平外交政策中的一些问题	
(一九五六年三月)	474
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一日)	480
一 大跃进的成绩	480
二 缺点	481
三 缺点的后果	482
四 对缺点的估计	490
五 产生缺点的原因	491
六 主观主义和片面性	491
七 政治和经济	492
八 三种所有制的关系	496
九 民主和集中	498
十 缺点讲透很必要	501
十一 光明前途问题	502
十二 关于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	504
十三 成绩和缺点的关系	506
关于按劳分配提纲(一九六一年八月)	507
当前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阶级矛盾	
(一九六一年八月)	515

社会主义经济若干理论问题(一九六一年八月).....	518
一 关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	518
二 关于人与物的关系	522
三 关于平衡与不平衡	522
四 关于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	524
五 关于资产阶级法权	525
六 关于党的领导和一长制	526
七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矛盾和统一	527
八 关于所谓两条道路的斗争.....	528
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要点(一九六一年九月).....	530
一 共性和差别(个性)	530
二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534
三 社会主义的扩大再生产	542
四 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	547
关于集市贸易等问题的一些意见	
(一九六二年七月十日)	554
不能把阶级斗争扩大化(一九六四年二月).....	564
“一分为二”的说法有缺点(一九六四年二月五日)	566
人民群众是主人(一九七一年十一月).....	567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	
(一九七三年九月二十日)	578
衡量党的路线政策的最高尺度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八日)	593
党内斗争要正确进行(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八日)	595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内的公私关系 (一九七四年五月十九日)	607
注 释.....	613

帝国主义与中国资本主义^{*}

(一九三一年六月十五日)

虽是任曙^[1]君在他的大作^[2]中间,不断地说人家是机械论者,而他是辩证法大家,然而要在世界上找到一位比任君再机械的机械论者,恐怕很难了吧。固然在他的对手方面有不少机械论者,然而在这方面,他的确比他们要更加高明。

照任君的逻辑,帝国主义把商品输入了中国,所以帝国主义帮助了中国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假使谁以为帝国主义不但不帮助而且阻碍着中国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那他就是否认中国有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样一来,任君就会到《中国年鉴》一类书上抄下很多的表,表示出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以至中国工厂数目的增加,洋洋得意地来证明他的对手所犯的“资产阶级意识”^[3]的错误!于

* 这里《中国经济之性质问题的研究——评任曙君的《中国经济研究》》一文的节录。全文共七节,约四万字,最初刊载于《读书杂志》第一卷第四、五期合刊,神州国光社一九三二年四月出版,署名刘梦云。收入本书的是第三节,原题《帝国主义的侵略,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封建剥削的加紧》,现题是本书编者另拟的。

是他同阿Q一样,又得到胜利了!

帝国主义侵略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目的,是为了要投资,是为了要推销商品,是为了要取得原料的供给。要达到这些目的,它必须利用政治的、军事的与经济的力量,夺取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经济命脉与政治权力。在中国,各帝国主义利用政治的与经济的借款以及中国军事失败后的赔款,垄断了中国的经济命脉,取得了它们的势力范围,使各地的地主军阀,以至资本家,变成了它们手中的工具^[4]。为了垄断与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它们在经济上必须设立它们的银行、工厂、交通工具、商业机关。它们就依靠这些东西(非经济的方法,我们这里不说)推销它们的商品,搜刮中国的原料,奴役中国的工农群众。这些东西的设立,无疑的,在中国造成了些资本主义的关系,并且大大扩张了商品经济的领域。但正是因为帝国主义的目的,是在把中国变成帝国主义经济的附庸,变成它的原料出产地,它的商品市场,它的投资的所在,所以它不但不能帮助中国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而且阻碍中国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它不但不消灭乡村中间的封建式的剥削,而且加重了这种剥削。

这种议论对于任曙君当然是“荒谬绝伦”的。一方面说,帝国主义在中国造成了些资本主义的关系,扩大了商品经济的领域,另一方面,它又在阻碍中国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加重着乡村中封建式的剥削。这对于任君当然是天下之大矛盾,百思千思而不得其解的!

为什么？这是因为任君对于帝国主义在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作用，没有丝毫的辩证法的了解。

帝国主义为了要加紧对于中国经济的统治与对于中国民众的剥削，不能不相当造成资本主义的关系。我们前面已经说过，各帝国主义不能不建立它们的银行、工厂、交通工具与商业机关，但它们这样做，并不是为了要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而是为了要更其能控制中国的经济，更其能使中国的经济变成它们的附庸。

我们只要一看帝国主义的银行在中国的作用，我们就可明白这一点。这些银行的“营业”，不是在帮助中国工业的发展，而是在举行各种各样政治的、军事的以及名义上是实业的借款，借款利息之高，条件之苛刻，是人所共知的。它们更利用中国金银比价的时时变动（其实变动的操纵者还是它们），做卖出买进的投机事业，一举手之劳，可以有数百万以至千万的收入。它们可以发行大批的纸币吸收现金，再拿现金去投机，去放款。它们更利用它们所有的特权与帝国主义的政治军事力量，吸收中国官僚军阀的低利、无利以至赔利的存款现金。一切对外贸易，也完全在它们的掌握之中。它们更经过中国的钱庄、当铺，以及各种各样的经纪人（地主、商业资本家、高利贷者），用很高的利息贷款给小商人以至贫苦的工农群众，用很低的代价去收买农民的农产品。它们就是这样控制中国经济的命脉，剥削中国的民众。它们对于某一资本家的帮助与否，就会决定这一资本家的生死。照例，它们只

是对于它们本国的资本家给予帮助与支持。只是因为各帝国主义者背后有这样雄厚势力的后台老板,他们才能在竞争中取得胜利。没有这种银行做后台老板的中国资本家,自然只有失败之一途。

这些银行,尤其是汇丰银行,在中国营业的利息^[5]往往高至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七十。这样高的利息,在帝国主义国家内部是不会有。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证明,财政资本在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作用,是寄生的、高利贷资本的作用。它只是破坏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生产力,而不能发展生产力。

不错,帝国主义在中国除了银行之外,还有工厂,还有交通工具与商业机关。但是工厂的建设,大部分限制于纺织工业、烟草工业等轻工业部门。铁路的建筑,自一九一一年革命以后,差不多已经完全停顿。现在交通方面发展得比较快的,是汽车、轮船、电话、无线电以及航空等等。这些东西的发展,对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是绝对必要的。有了比较便利的交通,帝国主义者才能把他们的商品运入中国内地,才能把内地的原料运到外国。一切这些东西的设置,只是为了要更其控制中国的经济,使中国走向殖民地的道路。(军事的目的,我们这里不说。)

帝国主义所以在中国创造最小限度的资本主义的企业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并不是为了要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使中国变成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而是为了要使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变成它的附庸。为了这一点,它不但不愿

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而且尽量地阻碍中国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这一点,我想除了任曙君之外,谁也不会有什么异议吧。当然,单看到对外贸易的任曙君,决不可能看到帝国主义如何阻碍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6]。却正相反,在任曙君看来,正是帝国主义帮助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任曙君的所以变为帝国主义辩护士者盖以此。

其次,帝国主义这种殖民地政策,当然使商品经济在中国农村中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帝国主义国家商品(不但是工业品,而且也包含农产品)输入中国的农村,中国农产品以及原料输出外国,自然会使中国农民出卖自己的农产品而购买帝国主义国家的商品。但是这种发展,只是加剧了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对于广大农民群众的剥削,造成大批的破产失业与空前的大饥荒。正因为生产力的不发展,所以数千百万破产失业的农民找不到生活,不能不成千成万地饿死,数千百里的沃野变成了一片荒凉的沙漠。正因为生产力的不发展,所以他们不能不去当兵,当匪,当人家的牛马。同时,正因为帝国主义高压之下,生产力不能发展,所以中国的有些民族资本家不能不改弦易辙,把他们的资本投到土地中去,对农民实行封建式的剥削。就是农民分化过程中所产生出来的富农阶层,因为他们的剩余资本没有发展的余地,所以也乐于购买土地,变成半地主与小地主。

虽是一切这些,在任曙君的脑筋中是“荒谬绝伦”,然而事实告诉我们的确是如此。关于中国农村中地主,商

人、高利贷者对中国农民的剥削,只要稍为知道一点政治经济常识的人,就可以知道,那不是资本主义的剥削,而是封建式的剥削,因为这里对立的不是在土地上投下资本取得平均利润的资本家与得到工资的工人,而是将土地出租给农民、从农民那里收到地租的地主与农民。这种地租不论是生产品的或是金钱的,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地租含有完全不同的意义。至于这里的商业资本与高利贷的作用,同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商业资本与借贷资本也是性质上不相同的。

帝国主义利用它在中国经济上的指挥地位,就是这样经过中国的地主、商人、高利贷者,推销它的商品,搜刮农民的财富。帝国主义只是因为乡村中有它的同盟者,所以它不但能够统治通商口岸,而且也能统治中国的乡村。所以在乡村中间,帝国主义维持着封建的剥削,也就是经过这种剥削,奴役着广大的中国劳苦民众。

至于帝国主义者怎样拥护中国的军阀,这些军阀怎样“非资本主义地”(就是说封建式地)剥削着中国的民众,这是人所共见的事,我想这里用不到加以说明了吧。

一切这些在任曙君看来,都不免是怪诞离奇的,然而现实常常比任君头脑所想的要更其复杂些,那有什么办法呢?!

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

(一九三二年十月三十一日)

中国左翼文艺运动,所以一直到今天没有发展的原因,是由于我们在文化运动中一些做领导工作同志的右倾消极与“左”倾空谈。

不论在介绍世界无产阶级的文艺、尤其是苏联无产阶级的文艺上,不论在无产阶级的文艺批评上,不论在开展群众的革命文艺运动上,更不必说在无产阶级文艺的创作上,我们都很少成绩。我们一些做领导工作的同志一天到晚讲着文艺的大众化,然而我们还没有看到在这一方面的真正努力。通俗的白话小报、工农通讯、壁报、报告文学等等的大众文艺运动简直还没有开始。许多工作讨论了,决定了,然而对于自己决定的执行,却表示出非常迟缓与不充分,甚至消极怠工。

无疑的,右倾机会主义在文艺运动中同样是目前的主要危险^[7]。

但是,使左翼文艺运动始终停留在狭窄的秘密范围

^{*} 本文最初刊载于中共中央机关报《斗争》第三十期(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三日出版),署名歌特。

内的最大的障碍物,却是“左”的关门主义。换句话说,在左翼文艺运动中,我们同样的看到了以“左”倾空谈掩盖了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的现象。

试翻阅最近一些文艺杂志上关于文艺性质与文学大众化等问题的讨论,我们立刻可以看到在我们的同志中间所存在着的非常严重的“左”的关门主义。这种关门主义不克服,我们决没有法子使左翼文艺运动变为广大的群众运动。

这种关门主义,第一,表现在对“第三种人”与“第三种文学”的否认。我们的几个领导同志,认为文学只能是资产阶级的或是无产阶级的,一切不是无产阶级的文学,一定是资产阶级的文学,其中不能有中间,即所谓第三种文学。

这当然是非常错误的极左的观点。因为在中国社会中除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文学之外,显然还存在着其他阶级的文学,可以不是无产阶级的,而同时又是反对地主资产阶级的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文学。这种文学不但存在着,而且是中国目前革命文学中最占优势的一种(甚至那些自称无产阶级文学家的文学作品,实际上也还是属于这类文学的范围)。排斥这种文学,骂倒这些文学家,说他们是资产阶级的走狗,这实际上就是抛弃文艺界的革命的统一战线,使幼稚到万分的无产阶级文学处于孤立,削弱了同真正拥护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文学做坚决斗争的力量。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应该抛弃我们无产阶级的立场,同革命的小资产阶级文学混淆起来。却正相反,我们的任务是在正确的估计那些小资产阶级文学作家的革命方面,给以鼓励与赞扬,使小资产阶级文学中的革命性发展起来,同时指出这种文学中所存在着的一切弱点,使他们在我们的具体指示之下(决不是谩骂!)走向革命的斗争。

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文学家,不是我们的敌人,而是我们的同盟者。我们对于他们的任务,不是排斥,不是谩骂,而是忍耐的解释、说服与争取。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无产阶级对于小资产阶级的领导,实现广泛的革命的统一战线。

这种“左”的关门主义,第二,表现在文艺只是某一阶级“煽动的工具”、“政治的留声机”的理论。照这种“理论”看来,凡不愿做无产阶级煽动家的文学家,就只能去做资产阶级的走狗。这种观点,显然把文学的范围大大的缩小了,显然大大的束缚了文学家的“自由”。

在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文学家中间,有不少的文学家固然不愿意做无产阶级的“煽动工具”或“政治的留声机”,但是他们同时也不愿意做资产阶级的“煽动工具”或“政治的留声机”,他们愿意“真实的”“自由的”创造一些“艺术的作品”。对于这类文学家,我们的任务不简单在指出在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反动文化政策之下,不能有文艺的创造的自由,指出在有阶级的社会中间文艺决没有超

阶级的自由,而且还要去领导这些革命小资产阶级的文学家,为了争取自由而进行反帝国主义与反国民党的斗争。只有这样,才能使小资产阶级的文学家了解到我们所指示的道路的正确,而走到我们的道路上来。

此外,在“煽动的工具”、“政治的留声机”中固然有文艺的作品,然而决不是一切宣传鼓动的作品都是文艺的作品。在有阶级的社会中间,文艺作品都有阶级性,但决不是每一文艺作品都是这一阶级利益的宣传鼓动的作品。甚至许多文艺作品的价值,并不是因为它们为某一阶级利益的宣传鼓动,而只是因为它们描写了某一时代的真实的社会现象。托尔斯泰的作品的伟大处,并不在托尔斯泰宣传了代表统治阶级的无抵抗主义,而正是在他正确的描写了当时俄国的农民。许多揭破现实社会的矛盾、描写小资产阶级的没落的作品,可以不是无产阶级的作品,但可以有价值的文艺作品。

无产阶级文艺批评家的任务,正是在以马克思主义的武器,去批评所有的文艺作品,正确的指出这些作品的阶级性与它们的艺术价值(或无价值),而不是把一切这些作品因为它们不是无产阶级的作品,就一概抛到垃圾堆里,去痛骂这些作品的作家为资产阶级的走狗。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批评家不是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者,拿所谓超阶级的观点去批评艺术(如胡秋原^[8]),但同时他也不是疯狂的宗教的信徒。

我们在左翼文坛上所需要的,就是这类的批评家,真

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批评家 只有依靠这类批评家 ,我们才能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在革命文艺界中的领导作用。

最后 ,必须说到关于文艺大众化的问题。文艺应该大众化 ,左翼文艺家为了要实现宣传鼓动的目的 ,应该采取各种通俗的大众艺术的形式 ,通俗的白话文 ,写出能为大家所了解的文艺作品 ,这完全是正确的。然而因此认为只有这种作品才是文艺作品 ,只有利用这种“有头有脑”的说部、唱本、连环图画之类的形式才能创造出无产阶级的文艺的观点 ,无疑的是错误的。我认为无论如何 ,现代文艺的各种形式比较中国旧艺术的形式是进步的。无产阶级的文艺当然应该利用这种新的形式。

至于说这种形式 ,工人看不懂 ,那就是“有头有脑”的《红楼梦》与《水浒传》等 ,工人何尝看得懂。所以我们的任务不是在抛弃现代艺术的形式与技巧 ,而是提高工人的教育程度 ,使工人们懂得这些艺术品。

然而在现社会下对于工人这种教育是非常有限的。所以以为在现社会之下可以把工人的教育怎样普及或提高 ,使他们能够赏鉴艺术的作品 ,这当然完全是社会民主党的幻想。所以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第一步的任务是在领导工人阶级的经济政治的斗争 ,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 ,建立民众的政权。只有那时 ,我们才能实行普及教育 ,教育广大的工农群众 ,使他们能够赏鉴高尔基或绥拉菲莫维支以及托尔斯泰等的作品。

所以左翼作家在目前集中力量于阶级斗争的宣传鼓动的工作,利用一切通俗的文艺形式号召工农阶级起来斗争,是完全应该的。因为用革命的手段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民众自己的政权,是他们目前的中心任务。但这绝不是说,只有这种宣传鼓动的通俗作品,才是无产阶级的文艺。而且事实上这种作品的大多数却并不是文艺作品。这当然不是左翼作家的耻辱。

我们对于不能象我们一样做的文艺家,应该给他们以“自由”,因为事实上我们也没有法子强迫他们象我们一样的去做。我们的任务是在教育他们,领导他们,把他们团集在我们的周围,而不是把他们从我们这里推开去。

对于革命的文学家,就是不是无产阶级的文学家,我们都应该爱护。马克思对于海涅、列宁对于高尔基那种亲爱的态度,应该给我们很好的榜样。

在目前中国这种文化落后的国家中,就是产生中国的高尔基,他的作品也没有法子为大多数工人所阅读。然而我们决不说,因此中国现在不要高尔基。中国现在不但需要高尔基、绥拉菲莫维支,而且需要那些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文学家。这些人的作品,在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中都有极大的革命的作用。

*

*

*

要使中国目前的左翼文艺运动变为广大的群众运动,坚决的打击这种“左”倾空谈与关门主义,是绝对必要的。只有广泛的革命的统一战线,才能使我们的活动,从

狭窄的、秘密的，走向广泛的、半公开与公开的方面去。在文艺界中革命统一战线的执行，比在工人运动中，要求我们更多的细心，忍耐，解释，甚至“谦恭”与“礼貌”。因为这里，我们工作的对象不是工人，而是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之群，而且是小资产阶级中最敏感之群。

然而我们必须重复的说：这并不是说，我们应该变成文艺上的自由主义者，投降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如象在许多情形之下，那些叫喊“马克思主义”的“左”的文艺家常常所做的那样，而是应该领导革命的文艺家走到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上。这里所需要的，正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论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

争取广大的工农群众到我们的领导之下,是同我们的群众的宣传鼓动的工作不能分开的。关于这一点,我们的党一直到现在还没有给以充分的注意。大家都还以为宣传鼓动工作决没有象组织工作那样重要。然而事实上,没有群众的宣传鼓动工作,就不能有群众的组织与群众的行动。

我们还没有很好的把宣传鼓动工作的转变提到全党的前面,还没有充分了解到,宣传鼓动工作的转变,是转变我们党的群众工作,是使我们党深入到群众中去的最主要条件之一。

象目前我们所做的宣传鼓动工作,当然完全不能令人满意。

首先,关于宣传鼓动工作的形式方面。我们所采取的宣传鼓动的形式大都不外是传单与标语,所以每一次我们检查某一运动节中我们所做的宣传鼓动工作时,我们

^{*} 本文最初刊载于中共中央机关报《斗争》第三十一期(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十八日出版),署名歌特。

总是说我们发了多少传单,多少标语。这差不多是我们宣传鼓动工作的全部。当然,在上海党的各区委下面,我们现在也出版了各种小报,在个别的工厂内,我们还有工厂壁报。然而这些工作还不过是在开始。

可见我们所采取的宣传鼓动的形式,大都是限制于死的文字的。由于中国一般文化程度的落后,中国工人识字的百分数是非常低的。因此,这种宣传鼓动的方式,也就不能变为群众的,而常常是限制于少数人的。

我们的党以及群众团体还没有能够打破宣传鼓动工作中的这一传统的藩篱,而尽量的去采取与创造新的宣传鼓动的方式。关于宣传鼓动队的组织与作用,我们是早已提出了,然而并没有引起所有我们党的组织,尤其是党的宣传部的注意。利用图画,利用唱歌,利用戏剧等许多群众的宣传鼓动方法,向广大的群众进行宣传鼓动的工作,我们还没有有系统的开始。图画、唱歌以及戏剧等的宣传鼓动的方式,事实上已经证明更为群众所欢迎,更能吸引广大群众,然而我们并没有把这些方法充分的应用。

在我们的左翼文艺家中间,有着不少图画家、音乐家与戏剧家,然而我们并没有充分的去利用他们,使他们的天才能够与群众的斗争密切的联系起来。蓝衫团⁽⁹⁾的戏剧虽是已经证明是最适合于广大工人群众需要的东西,每次的上演可以吸引几百几千工人参加,然而我们却让其自生自灭,没有给以充分的领导与帮助。

在左翼文艺家中间现在固然正在热烈的讨论着如何

使文艺大众化的问题,主张用通俗的白话文著作、连环图画、报告文学、说部与唱本之类的东西。然而这还不过是在讨论罢了,真正大众文艺的著作,我们还没有看见。

就是讲到我们所发的传单的文字吧,也大都是不通俗的,缺乏煽动性与群众性的。我们的宣传员,实际上也不过是照例的写传单,至于传单如何写法才能动人,那是很少为他们所注意的。他们也没有真正到群众中去学习群众日常所用的白话,用这种白话来写他们的传单。

旧的宣传鼓动工作的传统与习惯,是深深压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在这里需要极大的斗争与创造性来转变我们的工作。

只有利用一切这些活泼的、群众的宣传鼓动工作的形式,我们才能把我们的政治影响传达到工厂中、农村中、学校中、兵营中的广大的群众中去,我们才能用更多的方法来动员群众。

其次,在宣传鼓动的内容方面,我们往往是死板的、千篇一律的、笼统武断的。我们在这一方面缺乏具体性、时间性,缺乏忍耐的解释与具体的证明的工作。

我们同志在这一方面的特点,就是“党八股”(又名“十八套”^[10])。无论什么问题来的时候,我们就有那么一套话来应付,从拥护苏联、拥护苏维埃与红军起,一直到加紧两条战线的斗争止。我们不管群众是否接受我们的主张,我们却必须把所有的“十八套”完全吐露出来,方才痛快。象这样的宣传鼓动,当然没有法子动员广大的群

众到我们的领导之下。

要能动员广大的群众到我们的领导之下,我们首先必须提出群众在某一具体问题上的迫切要求,抓住这些具体要求来动员群众参加斗争。因此这里所需要的是带有时间性的、具体性的、适合于群众目前斗争的要求的宣传鼓动,而不是“党八股”。谁想在这种情形之下背诵“党八股”,谁就没有法子争取到广大的群众,而且这种背诵只会使群众离开我们。只有带有时间性、具体性的、适合于群众目前斗争的要求的宣传鼓动,才能把最大多数的群众,不管他们的政治倾向如何的不同,团结在统一的战线之下。

在某一工厂所发生的罢工斗争,如若是为了每天增加一分的工资的斗争,那我们的宣传鼓动必须从这里开始,我们要动员一切我们的力量,为了这一要求的实现,进行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我们在这里的第一步的中心任务,是动员最大多数的工人群众参加斗争。然后我们在斗争中逐渐提出为工人群众在斗争中所切身了解的口号,逐渐把这一为了一分工资的斗争提到更高的阶段。如若在这里我们一开始就是那么一套,那比较落后的大多数工人,就会退出斗争,以至下层的统一战线遭到分裂。

这种“党八股”式的宣传鼓动,实际上是由于脱离了群众,由于不知道宣传鼓动的对象是什么。这样的宣传鼓动,自然只能是死板的、千篇一律的了。这样的宣传鼓动,自然会变成学院式的、没有生命的、缺乏群众性与煽动性

的了。

同时,这种“党八股”式的宣传鼓动常常是笼统武断的。对一切反革命派别或是黄色工会的把戏,我们只是说这是“反革命派别的欺骗”,我们笼统的提出“打倒一切反革命派别”、“打倒黄色工会”等这类口号。我们总是觉得,我们所了解的,群众也是了解的,所以只要“打倒”或是说一句“这是欺骗”,就什么都完了。

其实,问题就没有这么简单。许多在我们(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所没有问题的地方,在群众中就会发生问题。比如黄色工会的调解仲裁,我们知道这是欺骗,然而在工人群众中会发生相当的幻想,甚至在某一企业或工厂中,大多数工人会认真相信这种欺骗。因此笼统的说“这是欺骗”或是高喊“打倒”,不但不能使群众相信我们的正确,而且会使群众对于我们发生反感。这里需要我们忍耐的解释与具体的证明工作。我们必须根据一切事实,在群众的面前揭破黄色工会出卖工人的行为,使群众在他们自身的经验中,了解到黄色工会的欺骗,而起来反对黄色工会。

这种忍耐的解释与具体的证明的工作,就是在我们党内也是同样需要的。笼统的一百零一次的背诵“右倾是主要危险,但是不要忘记‘左’倾”这一套党八股,并不能丝毫帮助我们去同“左”右倾机会主义做斗争。这里必须经常不断的同党内发生每一具体的“左”右倾机会主义的倾向做斗争,细心的解释这些倾向的机会主义的内容何

在 ,这样才能真正的打击机会主义与教育同志。

不论是“国民党是帝国主义的清道夫” ,或是“只有苏维埃政权能够统治中国”这类简单的真理 ,都同样的需要许多事实的证明与细心的解释。而我们党八股的宣传鼓动工作却完全不注意这些事。

此外 ,党八股式的宣传鼓动只能是秘密的与狭窄的 ,它决不想法子去利用公开可能与争取公开。我们党八股的宣传家无论到那里 ,从不想用另外一种方式 ,用许多具体的事实来说出我们所要说的话。他们必须把他们的“十八套”完全拿出来 ,方才痛快。因为不如此 ,不足以表示他们的革命。一种公开的刊物如不许我们投稿则已 ,假使我们能够投稿 ,那我们就非把“十八套”完全拿出不成 ,非使这一公开刊物不能继续出版不成。因为在他们脑筋中 ,只有秘密的东西 ,才是革命的东西。

事实上 ,虽是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白色恐怖非常严重 ,但是如若我们能够彻底的转变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 ,那就可看到我们还有许多公开可能没有利用 ,还有许多地方能够争取公开。比如反日反帝的报纸、拥护东北义勇军的报纸的公开 ,都不是完全不可能的。反对国联报告书^[11]的演讲队 ,蓝衫团等等还可公开的去进行工作。总之 ,只要我们能够活泼的利用每一具体的事变 ,利用公开的可能去开展群众的宣传鼓动工作 ,我们的活动范围 ,一定可以十倍的百倍的扩大。

最后 ,略为说一下宣传鼓动工作与组织工作的联系

的问题。关于这一问题,我们虽是无数次的重复的说过,然而实际上,我们的宣传工作是与组织工作脱离的。宣传部的任务似乎只是写写传单标语,组织群众,那似乎是组织部的事。在这种宣传鼓动工作同组织工作分离的情形之下,决没有法子使我们的组织变成群众的组织,也没有法子使我们群众的宣传鼓动变为组织群众的主要武器。

必须使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同时就是组织群众的工作。在反对李顿报告书的宣传鼓动队的周围,必须组织起反对李顿报告书的委员会。每一张传单,每一张报纸,每一队蓝衫团,必须是群众的组织者。同时一切我们的组织,不论是上反^[12]、工会、东北义勇军后援会等等,要使它们变为广大群众的组织,那就必须用很大力量去进行它们的宣传鼓动工作。

更狭义些说,就是宣传工作的本身,也就是组织工作的一种。不论是宣传鼓动队,不论公开的或是秘密的报纸,都需要有计划的与具体的组织工作。如何去组织宣传鼓动队,如何召集它们的会议,如何扩大它们的组织等等,没有组织工作,是没有法子前进一步的。创办一种报纸,而不去解决如何组织编辑委员会,如何募集捐款,如何组织通讯网与发行网,如何发展与教育通讯员等等问题,这种报纸决没有法子变为群众的报纸。

革命形势的发展,广大群众的左倾化,需要我们重新审查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更进一步的为了这一工作的转变而斗争。

五一节与《劳动法》^[13] 执行的检阅*

(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九日)

自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14]颁布《劳动法》以来，差不多快要一年半了。在这一年半内，由于《劳动法》的部分的执行，工人的生活是部分的改善了，工人的积极性是大大的提高了。然而这一年半的经验同时告诉我们，这一为了大都市大生产所订立的《劳动法》，在经济上比较落后的苏维埃区域内，是不能完全机械执行的。一年半的经验，要求我们的党与苏维埃政府用十分审慎的态度来解决我们在执行《劳动法》中所遇到的各种困难问题，使《劳动法》的执行更能够适合于我们目前的环境与需要。

第一，我们必须说，《劳动法》的执行，决不能与整个苏维埃政权的利益相抵触。巩固苏维埃政权，这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目前的最高原则。而巩固苏维埃政权，首先就是巩固工农的联合。机械的执行《劳动法》，无疑会

* 本文最初刊载于中共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第十期（一九三三年五月一日出版），署名洛甫。

影响到农民群众，使他们发生不满情绪。

举些实际的例子吧。在赣东北的横峰县乡下有个雇农，名叫陈克思，十六岁，由工会青工部领导，同雇主订立了劳动合同。在劳动合同上规定，实行每日工作六小时，不担四十斤以上的担子，工钱从八元增到十六元。而他的“老板”却是贫农。另外有个十五岁的牧童，名叫吴树德，每日工作四小时，工资由四元增到十元，挑担子不得超过三十斤，而“老板”又是贫农。还有一个牧童过去没有工资，现在拿十五元。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见赣东北少共^[15]省委组织部出版的《团的建设》第十三期）

同志们试想，一个贫农雇用一个每日作工四小时的牧童，那他每天至少还须雇用两个以至三个牧童来养他的牛，如若这样，他必须每年花三十余元大洋。这当然是贫农所不能负担的。结果农民不再雇用牧童，而使牧童失业。这样，不但农民不满意，就是牧童也会怀疑我们的领导。

在许多苏区，现在都是这样的情形。农民对于工人工资的加倍增加与工作时间的减少，是不满意的。这种不满意，就值得我们党与苏维埃政府严重注意。我们不能简单的以“这是落后的农民意识”一句话，把实际的情形掩盖起来。应该看到，在苏区农村中，目前雇用辅助劳动力的，大多数是中农，而这些中农，不是我们的敌人，却是我们的同盟者。我们的党与政府在这种情形

之下，应该用一切方法改良工人的生活，而这种改良，应是农民也认为必要，而且也认为可以实行的。

就因为这一原因，所以国际雇农工会^[16]在《关于中国雇农工会的决议》上提出把苏维埃《劳动法》“加以必须的修改，以便适合于农业的特点（农业与工业是不同的）”，并且提议“雇农工会必须会同苏维埃机关提出公布雇农劳动法的问题”（见《工运指南》一百八十五页）。这里，修改的原则显然是要使我们的《劳动法》更能适合于乡村，使我们在执行《劳动法》中巩固工农的联合。

对于沿门卖工的师傅，情形也是如此。这些人大多数都是劳动者，虽是他们剥削他们的学徒。这些人也不是我们的敌人，而是我们自己的人。然而我们现在把《劳动法》同样的搬到这里来。我手头有许多全总^[17]执行局送来的劳动合同。这些千篇一律的合同许多是师傅同学徒订的。我现在抄一个在下面吧。“成年工人八小时，青工六小时，童工四小时，若多做时间，工资加倍。星期日不做工，工资照给，若要做时，须经过劳动部及工会同意，工资加倍。工人吃烟、穿草鞋、剃头等都要师傅负担，不得克扣工资。工人有病要师傅诊治，药费、工资应由师傅发给。工人去当红军，应要师傅发三个月平均工资。工人参加机关工作，要师傅发给一个月平均工资。无故不得开除工人，若要开除工人须经过劳动部及工会同意，发给三个月平均工资”等等。工资则一般的每月从四十毛到九十毛。

试问在这些条件之下，这种沿门卖工的师傅，还有愿意再带学徒的吗？当然没有。这里师傅会不满意，学徒也会失业，而熟练工人会没有后代。这种《劳动法》的机械执行，对于苏维埃政权与工人阶级本身都是有害处没有好处的。我们的党与政府应该用一切力量，立刻改善学徒的生活，消灭师傅对于学徒的封建式的剥削，但同时必须要使师傅带学徒是有利的而不是贴本的。这种利益，实际上等于学徒学习技术的学费。而且这样的师傅，我们并不能把他排斥于工会之外。这里，显然的，苏维埃政府必须订立关于学徒的新的补充劳动法令。

其次，《劳动法》的执行决不能使我们苏区的经济衰落。发展我们苏区的经济是目前为中心任务。我们的党与政府，要在事实上证明给千千万万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下面的以至苏区内的群众看：我们不但能够破坏旧的，而且能够创造新的；在苏维埃统治之下不但生产力不低落，而且迅速的发展；工人群众不是贪吃懒做的“共产”，而是新社会的创造者。

然而我们在执行《劳动法》中，却表现了我们的党与政府对于这一基本问题的许多不了解与漠不关心的态度。这里，我手头有许多商人老板给工会的请求书，从这些请求书中也可以部分看出，机械的执行《劳动法》的结果，必然是工商业的凋零。

这里举一个汀州市的例子。恩格斯路恒丰荣烟店共有资本毛洋四千角，曾由工会介绍二个半工人去做工。其

中刨烟工人李振光，从头年十一月八日起至次年四月二十日止每月工资大洋二十元，又年关双薪二十元，年关鞋袜大洋五元，特别要求大洋三元等等，老板共计付洋一千四百五十八毛。然而尤其奇怪的是，这个工人并没有在店内做过一天工。这个工人大约是在苏维埃政府或其他地方做事或开会去了。因为依照《劳动法》第五十二条，“工人去参加苏维埃选举，出席苏维埃大会，参加职工大会或会议，担任工厂委员会的工作，被法庭叫去作当证人、鉴定人或陪审员等，在执行工作期间，无论时间之久暂，都不得克扣工资。”

在小的城市中间，对于小的企业主，不管他现在所处的情形，而想机械的执行《劳动法》上的每一条文，甚至还要添加许多花样（如工人是少先队队员，则老板必须发雨衣、梭标、制服、套鞋等等，过年除旧历年关双薪外，还有过年费，等等），那结果老板当然因为不能负担而关闭他的企业。这种现象，更因为党、政府与工会实行向资本家强迫介绍失业工人的完全错误办法的施行，在目前更为严重了。当然一些老板、商人关门逃跑，是因为他们想破坏苏维埃的经济，然而我们这种政策的结果，正给了他们以关门的口实，而且确有不少企业是因为营业的不能维持而倒闭的。

要发展苏维埃的经济，在目前不尽量利用私人资本是不可能的。私人资本主义的部分的发展，对于我们并不是可怕的。这种发展，可以增加我们苏区内的生产，流

通我们的商品,而这对于苏维埃政权现在是极端重要的。但是要使私人资本家投资到生产中或商业中来,那必须使他们有利可图,而不是亏本。世界上没有这样的资本家,他的投资是为了亏本。

在这里,我们必须估计到,在目前苏维埃区域内,我们还没有大的资本主义的企业。我们所有的大多数是小的,至多是中等的企业。我们想在这里把《劳动法》上的每一条文执行起来,当然是不可能的。比如一个铺子内有两个青工的店员,如执行工作六小时,那这个铺子从早上八点钟开门,到下午两点钟就得关门,不然他还得用两个店员。如若一个青工在苏维埃或工会中工作,那他名义上用两个青工,实际上只有一个青工。再如若一个青工进店不久,即当红军去了,那老板就得付他三个月工资。如若一个工人进来不到三天,他就自请辞职,那老板又须付他半个月工资。这样下去,当然不久这店铺就不能不关门。

所以在小的企业中间,《劳动法》的有些条文是不能机械执行的。在有些企业内,应该尽量改善工人的生活与待遇,增加工资,但工作时间却不能完全依照《劳动法》执行。如木船工人、造纸工人,这里要实行八小时、六小时、四小时的规定就极端困难,虽是在劳动合同上是那样的规定着。我们完全不能同意木船青工因为要实行他的六小时工作,所以船撑到半路上就停下来了。这里需要我们执行《劳动法》时不是官僚式的下命令,而是能够具体的

估计到企业的大小,企业的特点与实际情形,有伸缩性。而且有些条文(如关于三个月、半个月的津贴,可以自由的以开会或疾病等名义不上工等)必须立刻修改。工人也不能有意破坏或不执行他们自己所订立的劳动合同。在工人自愿的原则之下,在增加额外工资的条件之下,在私人企业内增加工作时间是可以容许的。

最后,在劳动合作社内,《劳动法》的执行更不能不有变通的办法。然而我们过去党与工会的领导者都同样的把《劳动法》完全搬到这里来,结果合作社同样的因为赚不到钱而倒闭了。这样,合作社不能发展,发展合作社的口号变成空喊。甚至有这样滑稽的事情:在工人自己的合作社里,大多数的工人同工人自己选举出来的管理员订立劳动合同,照样的实行《劳动法》。因此,群众觉得,与其加入合作社贴本,还不如摆些小摊子的好。

工人们在自己的生产合作社内,可以延长他们的工作时间,可以尽量提高他们的生产力,这样使合作社的生产增加,商品的成本便宜,生意兴隆,赚钱多,结果工人的生活也可有更多的改良。就是生产与消费合作社雇用工人时,我们在执行《劳动法》时也应该采取一些不同的具体办法。

在国家企业内,《劳动法》上有些条文的机械执行,同样的会损害国家企业的发展。这里在工人自愿的原则之下,可以相当的延长工作时间与减低工资。经济核算制度同样的适用于国家企业之内。必须用一切方法提高国家

企业的生产力,使生产合理化。在国家企业内的劳动纪律,应该是模范的。在这里,工人们必须表现共产主义者对于劳动的态度。

总之,一年半来在为《劳动法》的斗争中,使我们得到了不少的经验,使我们更能够根据实际情形修改与补充我们的《劳动法》,使《劳动法》更能顺利的执行。在乡村中农业工人应该有农业工人专门的《劳动法》,对于沿门卖工者的学徒,应该有单独的学徒保护法令。《劳动法》本身也应该有很多的修改^[18]。这种新的劳动补充法令的订立与旧的《劳动法》的修改,不但不会引起工人的不满意,而且更能够引起工人对于党、工会与苏维埃政府的信仰。

《劳动法》的修改与订立不但是为了工农联合的巩固,为了发展苏维埃经济,而且也是为了工人阶级本身生活的改善。只有苏维埃经济的发展,才能使工人生活得到更大的改善,才能使工人免于失业,才能在生产中容纳更多的工人。在目前用“把资本吃完了再说”的政策,结果必然使苏维埃经济凋零,使工人失业,使工人的生活恶化。这种政策实际上是代表一部分落后工人的小资产阶级的意识,代表一部分工人眼前的狭窄的工团主义的利益,而牺牲了或损害了整个工人阶级的利益!

当然,就是我们有了更完善的《劳动法》之后,我们的党与工会还是需要更活泼的来实现我们的《劳动法》。我们的集体合同与劳动合同,必须更能适合于雇主的对象

与雇主所处的经济情形。譬如在目前对于获利很高的酒菜馆,可以提出较高的要求,而对于无利可图的洋货业,则不能不提出较低的要求。一切这些,只有党与工会的正确的具体领导,才能做到。只有这样,才能适当的正确的去执行《劳动法》,才能不是条文上的,而是实际上的改善工人的生活,把工人阶级的积极性与忠诚提到最高限度!同时苏维埃政府应该给各级劳动部以执行《劳动法》的训令,告诉他们,如何在不同情形之下,对不同的对象,变通《劳动法》的执行。

必须最坚决的打击那些反对改良工人生活、反对实现《劳动法》上的一些基本条文、以为工人阶级在目前应该牺牲自己的基本利益以巩固苏维埃政权的右倾机会主义者,但同时必须同那些不顾任何情形企图完全机械的执行《劳动法》的“左”的倾向做斗争。这种“左”的倾向正是在给右倾机会主义者造成《劳动法》不适用于苏维埃区域内的理由与证据。“左”右倾机会主义者在这里同样是互相帮助的,因此要顺利的开展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必须同时清除这种“左”的障碍物。

关于苏维埃政府的《宣言》^[19] 与反机会主义的斗争^{*}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苏维埃中央政府^[14]在今年正月内曾经公开宣言,愿意在三个条件之下,同任何进攻苏区的武装队伍订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作战的战斗协定。这三个条件就是:(一)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二)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的自由);(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及领土的完整。

自这一《宣言》发表之后,在苏维埃政府关于许多重要政治事变的宣言^[20]中曾经一再提出这一主张。最近,

* 一九三三年初,我党发布了愿在三个条件下同国民党军队联合抗日的宣言。同年十一月,国民党十九路军爱国将领蔡廷锴等人发动了抗日反蒋的“福建事变”。张闻天同志当时对于国民党营垒内部这种变动的认识还没有完全脱离“左”倾窠臼。但是,他主张认真实行上述宣言,主张积极联合十九路军并在军事上采取配合行动,反对党内某些人在这一问题上的关门主义倾向。本文即为此而作,最初刊载于中共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第三十六期(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出版),署名洛甫。

在苏维埃政府《为中日直接交涉告全国民众书》^[21]中，又重复提出了这一主张。

苏维埃政府这一提议当然不是偶然的儿戏，而是深思熟虑的政治行动。这一行动是在揭破国民党对于苏维埃政府的造谣与污蔑（说苏维埃与红军在后方捣乱，所以不能使国民党军阀出兵抗日，不能不使国民党集中他们的力量来进攻苏区与红军），最清楚的在全中国民众之前表示出只有苏维埃政府是始终一贯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军阀进攻苏维埃与红军不是因为苏维埃与红军不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而正是因为苏维埃与红军是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民众政权与民众武装。因此这一行动的主要目的是在争取全中国广大的群众在苏维埃政权的影响之下，为独立自由的苏维埃中国而斗争。尤其是对于进攻苏区的国民党军队的士兵群众与下级军官，这一宣言有着极大的影响。他们同意我们的提议，愿意同我们一同去打日本帝国主义，他们反对压迫他们、残杀他们的兄弟姊妹的国民党军阀，他们骂他们的上级军官为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这种情形在国民党军队中是非常普遍的。

在另一方面，这一宣言也是对于所有国民党军阀们说的。在全国的民族危机前面，我们不但要号召工农民众武装起来参加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与一切帝国主义，而且也号召一切在反动营垒中真正爱国的分子同我们一起为中国民族的生存而战。所以我们苏维埃政府向所

有国民党军阀提议,只要谁真能接受我们所提出的三个条件,即使我们同他们有着怎样不同的与相反的政治立场,即使我们在其他问题上没有任何妥协的可能,我们为了挽救中国民族的危亡,是愿意同他们订立作战的战斗协定,去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一切帝国主义的。

我们这种提议完全不是我们的示弱,而是表示只有苏维埃政府是真正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

但是对于宣言的这一方面,正是我们的一部分同志所不了解的。他们说,我们的宣言只是对群众说的,只是对士兵说的,或者至多是对下级军官说的。至于上级军官,那决不会接受我们的条件,我们也不会去同他们谈什么条件,同他们订立什么作战的战斗协定。宣言上的提议,那不过是用来揭破国民党的造谣污蔑而已,难道我们苏维埃真想同反革命的国民党军阀订约不成!

无疑的,整个国民党,不论是南京或是广东,都是投降帝国主义的^[22]。广东国民党政府^[23]的空喊“抗日”,不过表明它是另一帝国主义,即英帝国主义的走狗。但是这并不能否认个别的国民党军阀有接受我们宣言的可能。由于全国的民族危机,由于他的士兵群众的革命化与群众反帝斗争的高涨,由于苏维埃与红军影响的扩大,由于他自己所处的政治的与财政经济的困境,以及帝国主义与军阀内部矛盾的紧张化等许多特殊的条件,这种可能的产生是不足为奇的。我们的任务不是否认这种可能,而是利用这种可能,来争取群众,来取得群众的同盟者,

来为苏维埃政权谋利益。

在国民党这块招牌根本破产,在蒋介石以全力造成他自己法西斯系统的独裁,在帝国主义与军阀内部矛盾更进一步加紧,以及全国的政治经济的危机的情形之下,在国民党内部必然会发生新的分裂与瓦解。一部分国民党军阀,由于他们切身的经验,知道红军的力量是不可欺侮的伟大的群众的力量。屡次的对于红军的进攻不但得不到丝毫利益,反而兵败将亡,劳财伤命。在他们中比较开明的分子,自然不能不重新考虑一下他们过去对于我们所采取的敌对政策了。同时其中一部分军阀为要保存他们自己的反动统治,为要用新的方法来欺骗群众,可以提出另外一种迷人的“左”的反革命政纲,并且可以最后抛弃国民党的招牌,而采用一些“动人的”新的名称,开始在相当限度内容许民众的言论、集会、结社等自由,并主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这类军阀常常不怕接受我们的条件,而且积极表示愿意接受我们的条件,好在群众前面表示他们的左倾,以争取群众在他们的领导之下。

对这种国民党军阀,我们是不怕同他们订立反日反蒋的作战的战斗协定的。我们的任务在这里不是关起大门来表示自己无产阶级的纯洁,而是经过这种协定来更进一步的开展民族革命战争,吸收更广大的群众参加革命斗争,并且夺取在这一斗争中的领导作用。

当然,这是一种妥协,也许是非常短促的妥协,但是我们并不拒绝这种妥协。从这种妥协,我们可以得到

有利于苏维埃政权的東西。从这种妥协，我们还可以争取广大群众与扩大我们的政治影响与我们的组织。这种妥协当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所容许的。列宁说：“要战胜更强大的敌人，只有尽最大的力量，同时必须极仔细、极留心、极谨慎、极巧妙地一方面利用敌人之间的一切‘裂痕’，哪怕是最小的‘裂痕’，利用各国资产阶级之间以及各个国家内资产阶级各集团或各派别之间的一切利益对立，另一方面要利用一切机会，哪怕是极小的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尽管这些同盟者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靠不住的、有条件的。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是丝毫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丝毫不懂得一般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谁要是没有在实践中，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和在相当复杂的各种政治情况中，证明他确实会运用这个真理，谁就还没有学会帮助革命阶级去进行斗争，使全体劳动人类摆脱剥削者的压榨而获得解放。以上所说的一切，对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前和以后的时期，都是一样适用的。”^[24]

自命清高、否认一切这种妥协的可能的“左”倾幼稚病者，往往把这种谈判当做儿戏，或简单的“玩把戏”，这除了表示出他们对于“现代科学社会主义”一窍不通以外，没有别的。对于这些人，正象列宁所说的，除了“进行长期的训练、教育和启发，让他们取得政治经验和生活经验以外，就没有别的办法来帮助他们”^[25]。

但是在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了对于这一问题的极端

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有些同志一听到这种消息就往往以为,某一军阀愿意同我们妥协,那就表示这个军阀倾向革命,表示这个军阀愿意向我们苏维埃政府投诚,相信这个军阀是我们的好朋友,认为我们应该立刻停止对于他的一切斗争,甚至说还要在政治方面向他让步。

这种机会主义观点是最危险的。这是从陈独秀机会主义时代一直流传下来的老机会主义。我们丝毫不能忘记,同我们谈判的、妥协的,不是别人,而是国民党军阀。这些军阀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会表示左倾,甚至会同我们暂时的订立协定。然而形势的变化,会使这些军阀立刻抛弃他们的面具,露出他们原来凶恶的真相,撕破过去他们所亲手签订的一切协定。对于这些屠杀民众的刽子手,丝毫的幻想也用不到的。在这里,我们的任务不是去幻想他们会变成革命者,而是利用一切条约上的可能去开展在他们统治区域内的群众斗争。在最广泛的反日反帝反蒋的下层统一战线的基础上,最无情的揭破一切他们的动摇、不彻底与欺骗,来争取群众在我们的领导之下。我们必须坚信,只有在我们党的领导之下,革命才能发展,才能胜利。那些反革命的“左”的欺骗宣传不但不能推动革命前进,而且会障碍革命的开展。这并不是说,我们不可以个别的进行上层的统一战线,但“必须牢记着下层统一战线,是我们活动的基础。任何的上层统一战线都只有在我们能够抓紧巩固的下层统一战线和上层处于下层革命情绪的威胁下的时候,才可能和有用。”(中央给

满洲省委信)^[26]

在我们苏区,则应该利用这种妥协,来流通我们的商品,来集中更多的力量去对付主要的敌人。我们要尽量利用这一妥协的时间,即使是十分短促的,加速度的去准备与巩固我们自己的力量,预备新的决裂与新的战争。对于同我们妥协的军阀的每一新花样,每一对于群众的欺骗与压迫,我们应毫不放松的给以揭破。任何的协定不能束缚我们党对于协定对方的严格的批评的完全自由!

当然,我们苏维埃政府的外交人员,在同这些军阀谈判中应该学习如何灵活的运用我们的基本原则,去取得外交上的胜利。如何能够在外交的礼貌与辞令中不失去我们自己的基本立场,而抓住每一个有利于我们的空隙与机会,来进行我们自己的工作。

苏维埃与红军的新的胜利,国民党的进一步的崩溃,将使这类“外交事业”更加繁忙与复杂,但是我们的基本立场是不变的。我们要坚决反对“左”的关门主义者,这种关门主义者不知道如何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与动摇,来取得我们自己的利益。同时我们也必须最坚决的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者,他们企图在群众中造成对于阶级敌人的幻想,解除我们自己的武装。任何的协定不能使我们失去头脑,使我们的工作松懈下来。相反的,我们应该利用这一短促的时间,更努力的工作,去粉碎敌人的五次“围剿”,去争取苏维埃革命的新胜利。

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 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七日^[27])

听了××^[28]同志关于五次“围剿”总结的报告及××同志的副报告之后,政治局扩大会认为××同志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

一、党中央关于敌人五次“围剿”的决议^[29]中,曾经清楚的指出五次“围剿”是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反动对于苏维埃革命运动的更加残酷的进攻,但同时指出了在这一剧烈的阶级决战中,帝国主义、国民党内部的弱点与革命形势的新的紧张化,这造成了国内阶级力量的对比有新的有利于我们的变动,得出了“在五次‘围剿’中间我们有着比以前更加充分的取得决战胜利的一切条件”的正

* 这是为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起草的决议。张闻天同志在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前后毅然摒弃“左”倾错误,转到毛泽东同志代表的正确路线一边,同当时中央的一部分同志一起协助毛泽东同志促成了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在毛泽东同志帮助下,他在会上作了批判“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并受会议委托,在会议讨论的基础上,特别是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意见,起草了这个决议。

确结论(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四日中央决议)。而××同志在他的报告中过分估计了客观的困难,把五次“围剿”不能在中央苏区粉碎的原因归之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同时对于目前的革命形势却又估计不足,这必然会得出客观上五次“围剿”根本不能粉碎的机会主义的结论。

二、党中央根据于自己的正确估计,定出了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具体任务。一年半反对“围剿”的困苦斗争,证明了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无疑义的是正确的^[30]。特别中央苏区的党在中央直接领导之下,在动员广大工农群众参加革命战争方面,得到了空前的成绩。扩大红军运动成为群众的热潮。动员工农积极分子武装上前线,达到了十万人以上,使红军大大的扩大了。模范赤少队^[31]开始成为红军的现成后备军,赤少队的群众武装组织有了极大的发展。党在“一切为了前线上的胜利”口号下,解决了前方红军财政上的粮食上的与一切其他物质上的需要。苏区内部阶级斗争的深入,苏维埃的经济建设以及苏维埃政府与群众关系的彻底的改善,更大大的发扬了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热情与积极性。一切这些造成了彻底粉碎五次“围剿”的有利条件,而××同志在他的报告中,对于这些顺利的条件,显然是估计不足的。这种估计不足,也必然得出在主观上我们没有法子粉碎“围剿”的结论。

三、应该指出我们工作中还有许多严重的弱点:党对

于白区广大工农群众反帝反国民党与日常斗争的领导依然没有显著的进步,游击战争的发展与瓦解白军士兵工作依然薄弱,各苏区红军在统一战略意志之下的相互呼应与配合还是不够,这些弱点无疑的要影响到反对五次“围剿”的行动,成为五次“围剿”不能粉碎的重要原因。但决不应该以为这些弱点的存在,乃是不能粉碎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而××同志在报告与结论中却夸张这些工作的弱点,对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基本上是错误的估计,却又不认识与不承认,这就使我们没有法子了解我们红军主力不能离开中央苏区与我们不能在中央苏区粉碎“围剿”的主要原因究竟在那里。这就掩盖了我们在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上的错误路线所产生的恶果。红军的英勇善战,模范的后方工作,广大群众的拥护,如果我们不能在军事领导上运用正确的战略战术,则战争的决定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五次“围剿”不能在中央苏区粉碎的主要原因正在这里。

四、国民党蒋介石以及他的帝国主义的军事顾问等,经过历次“围剿”失败之后,知道用“长驱直入”的战略战术同我们在苏区内作战,是极端不利的。因此五次“围剿”中,采用了持久战与堡垒主义^[32]的战略战术,企图逐渐消耗我们的有生力量与物质资财,紧缩我们的苏区,最后寻求我主力决战,以达到消灭我们的目的。

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的战略路线应该是决战防御(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战中,

有把握的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然而在反对五次“围剿”战争中,却以单纯防御路线(或专守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33]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这就使敌人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达到了他的目的。使我们的主力红军受到部分损失,并离开了中央苏区根据地。应该指出,这一路线,同我们红军取得胜利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是完全相反的。

五、在目前中国国内战争的阶段上,在我们还没有大的城市工人的暴动、白军士兵的哗变的配合,在我们红军数量上还是非常不够,在我们的苏区还只是中国的一小部分,在我们还没有飞机大炮等特种兵器,在我们还处于内线作战的环境,当着敌人向我们进攻与举行“围剿”时,我们的战略路线,当然是决战防御,即是我们的防御不是单纯的防御,而是为了寻求决战的防御,为了转入反攻与进攻的防御。单纯防御可以相当削弱敌人力量,可以在某一时期内保持土地,但最终的粉碎敌人“围剿”以保卫苏区是不可能的,最后胜利的前途是没有的。只有从防御转入反攻(战役的与战略的)以至进攻,取得决战的胜利,大量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我们才能粉碎“围剿”,保卫苏区,并发展苏维埃革命运动。

在这一战略路线之下,当我们还没有发现和造成敌人的弱点时,我们对于进攻的敌人不应该即刻与之进行

无胜利把握的决战,我们应该以次要的力量(如游击队、群众武装、独立营团、部分主力红军等)在各方面迷惑或引诱敌人,在次要方面,主要的以运动防御钳制敌人,而主力则退至适当距离或转移到敌人侧翼后方,隐蔽集结,以寻求有利时机,突击敌人。在内线作战下,当敌人以绝对的优势兵力向我们前进时,红军的退却与隐蔽,足以疲劳敌人,消耗敌人,迷惑敌人,使敌人骄矜懈怠,发生过失与暴露弱点,这就创造了转入反攻取得决战胜利的条件。要最审慎的分析与判断敌情,以便适时的恰当的部署战斗。不要由于敌人向我们挑衅与佯攻,而不必要的调动我们的力量与投入战斗,使我们疲于奔命,失去在一定方向取得决战胜利的机会。为了求得胜利,当敌人按照其计划前进时,我们在突击方向,用不着去阻止他,应该待他进至适当距离,然后包围消灭之(即诱敌深入)。为了求得胜利,即使暂时放弃一部分苏区的土地,甚至主力暂时离开苏区根据地,都是在所不辞的,因为我们知道,只要我们能够消灭敌人,粉碎敌人的“围剿”,我们不但能够恢复放弃的土地,而且还能够扩大苏维埃领土。一切这些,都为着使红军能够经常主动的有利的去战胜敌人的进攻与“围剿”,而避免一切被动的与不利的结果。

然而在五次战争中,对于这些原则却通通是违反的。共产国际^[34]去年二月来电说得很对:“我们觉得似乎在目前这一时期,中区^[35]军事指挥所采用的计划和步骤,差不多可以说常常是由敌人逼迫而产生的,敌人向我们

挑拨,使我们常常不必要的改组我们的力量。因此我们的力量由于继续不断的变动,就不能积极的参加作战。我们觉得应该在那些我们已经获得了某些胜利的地方击败敌人,不要企图在全部战线上同时击败敌人”。单纯防御路线的领导者,对于共产国际的这种指示是无法了解的,所以不但去年二月以前如此,直至主力红军退出苏区仍是如此。甘心情愿把自己处于被动地位的单纯防御路线,并不是也不能企图在全部战线同时击败敌人,而是企图在全部战线同时阻止敌人。×××同志过去提出过的“全线出击”的口号,在五次战争中则变为全线抵御,而在战略上则二者都是错误的。“不放弃苏区寸土”的口号,在政治上是正确的,而机械的运用到军事上尤其在战略上,则是完全的错误,而适足成为单纯防御路线的掩盖物。

六、为了求得决战的胜利,在决战方面,集中优势兵力是绝对必要的。在目前敌我力量的对比上,敌人的兵力是绝对优势,他们常常拿多于我们数倍以至十数倍的兵力向我们进攻。然而这对于我们不是可怕的。由于敌人是处于外线,战略上采取包围与分进合击的方针,这就造成了我们各个击破敌人的机会,使我们在战略的内线作战下,能够收到战役的外线作战(局部的内线)的利益,即是以我军的一部钳制敌人的一路或数路,而集中最大力量包围敌之一路而消灭之,用这种办法去各个击破敌人,粉碎敌人的“围剿”。在战略的内线作战情况之下,只有集中优势兵力寻求战役的外线作战取得胜利,才能使红军

经常握住主动权,敌人则迫使他陷入被动地位,而最后打破他的整个计划。

但是过去单纯防御路线的领导者,为了抵御各方面敌人的前进,差不多经常分散(主要是一、三军团的分散)兵力。这种分兵主义的结果,就使我们经常处于被动地位,就使我们的兵力处处薄弱,而便于对敌人各个击破。五次战争中,许多次的战役(如洵口战役^[36],团村战役^[37],建宁战役^[38],温坊战役^[39]等)都由于我们主力不集中而未能得到伟大的胜利。对于单纯防御路线的领导者,红军的中心任务,是阻止敌人的前进与企图以“短促突击”消灭部分的敌人,而不是争取主动权,不是争取决战的胜利。其结果就是红军消灭敌人的数量极少,而苏区也终于受敌人蹂躏。

七、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是我们工农红军的特长。共产国际在敌人五次“围剿”开始时(前年十月来电)即向我们指出:“我们的行动不应该采取阵地战的方式,而应该在敌人的两翼采取运动战”。去年二月来电又重复的说:“很明显的,根据过去的经验,我们的队伍在运动战中已经获得了许多伟大的胜利,但不能在强攻敌人的堡垒地带的作战中获得胜利”。国际这些指示是完全正确的。在五次“围剿”敌人堡垒主义下,我们虽不能象在一、二、三、四次战争中当敌人“长驱直入”时取得大规模运动战的机会,然而运动战的可能依然存在,事实上已经多次的证明了(洵口、团村、将军殿^[40]、建宁、湖坊、温坊各役,

特别是十九路军事变^[41]时)。然而五次战争中,由于对堡垒主义的恐惧所产生的单纯防御路线与华夫^[42]同志的“短促突击”理论,却使我们从运动战转变到阵地战,而这种阵地战的方式仅对于敌人有利,而对于现时工农红军是极端不利的。

强攻敌人的堡垒,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是应该拒绝的。只有在堡垒不坚固或孤立的情况下,在为了打击敌人增援部队或为了调动敌人的情形下,才容许攻击敌人的堡垒。五次战争中常常轻易的强攻堡垒,其没有任何效果,是不足为怪的,因为这是把战争当儿戏。

对于五次战争中运动战的可能估计不足,因而把敌人五次“围剿”与过去一、二、三、四次“围剿”绝然的分开,因而绝然否认过去运动战的经验,绝然否认诱敌进来给以消灭的战法,并且不得不在实际上拒绝共产国际的正确指示,这在单纯防御与短促突击的领导者是自然的道理。

八、由于对敌人堡垒主义的估计过高与对运动战的可能估计不足,便产生了胜利只能起始于战术上的理论,以为只有战术上的胜利,才能转变为战役上的胜利,然后由战役上的胜利才能引起战略上有利于我们的变化(华夫同志的文章及××、××两同志给林彪彭德怀两同志的信),以为“在堡垒主义下,只能有许多小的胜利,而不能有痛快淋漓的胜利”(见××同志政治局发言及××同志红星报的文章),以为只有分兵抵御与短促突击才能对

付堡垒主义。所有这些革命战争中机会主义战略战术的理论与实际,在五次战争中是完全破产了。

我们不否认堡垒主义造成了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新的困难(而他们最初却以“左”的空谈轻视堡垒主义,见××同志红星报文章),不否认而且应准备红军的技术条件(飞机大炮),特别是堡垒内的工农士兵暴动,以战胜将来敌人更坚固的堡垒。但就在现时条件下,堡垒主义也是能够粉碎的。堡垒主义疲劳了敌人的兵力并分散了兵力,养成了敌人对于堡垒的依赖性,使他们脱离了堡垒即失去其胜利的信心,同时敌人无法不脱离堡垒向我们前进,又无法在全国范围内遍筑足以限制红军行动的堡垒。一切这些,造成了使我们能够克服堡垒主义的顺利条件。因此我们红军粉碎堡垒主义的方法,依然是依靠于运动战,依靠在堡垒线前后左右发展游击战争以配合红军的行动,以及依靠深入的白军士兵运动。所谓运动战粉碎堡垒主义,在堡垒线内即是待敌人前进时大量消灭敌人的部队;在堡垒线外,即是在红军转到广大无堡垒地带活动时,迫使敌人不得不离开堡垒来和我们做运动战。只要我们灵活的、艺术的、出奇制胜的运用运动战的战略战术原则,我们就一定能够粉碎敌人的堡垒主义。而且只有正确的战略方针,才能正确的领导战役,并正确的运用战术,以粉碎堡垒主义与粉碎“围剿”。单纯防御与“短促突击”,胜利主要不依靠于战略战役的正确领导,而仅仅依靠于战术,实际上只是对于堡垒主义的投降,到底不能粉碎堡

垒主义。

九、在持久战与速决战问题上,单纯防御路线的领导者的了解也是错误的。必须明白中国国内战争不是一个短时期的战争,而是长期的持久的战争,苏维埃革命,就在不断的粉碎敌人的“围剿”中发展与巩固起来的。因此在有利的条件之下,我们完全应该从防御转入反攻与进攻,消灭敌人,粉碎“围剿”(如一、二、三、四次战争及五次战争广昌战役^[43]以前)。在不利的条件下,我们可以暂时的退却,以保持我们的有生力量,在另一有利的条件下转入反攻与进攻(如五次战争广昌战役以后)。这是第一个基本原则。但同时必须了解另一个原则,即为了进行长期的持久战,对于每一次“围剿”与每一个战役,必须极力争取战局的速决。因为在现时敌我力量的对比上,对于一次“围剿”与一个战役采取持久战的方针,对于我们是极端不利的。当着敌人以持久战来对付我们的时候(如五次“围剿”),我们必须运用正确的战略方针,打破敌人这种计划,在我们可能支持的时间之内取得决定的胜利,以粉碎敌人的“围剿”。拿我们的人力财力及军火补充的数量同国民党所有的去比较(即所谓同敌人拚消耗,见××同志红星报的文章),这种持久战的了解是根本错误的。在这些方面现时我们正处在绝对的劣势,这种数目字的比较只能证明相反的结论,即持久战对我们是没有胜利前途的。

正因为要进行长期国内战争的持久战,同时对每一

“围剿”与每一战役却要进行速决战，所以我们特别要谨慎的决定我们的战略战役计划。五次战争中单纯防御战略是根本错误的，在这种错误战略之下进行的许多拚命主义的战斗（如丁毛山^[44]、三溪圩^[45]、平寮^[46]、广昌等战役）同样是错误的，红军一定要避免那种没有胜利把握的战斗。即使作战的决定在当时是正确的，但当形势变化不利于我们时，我们即应拒绝这种战斗。玩弄暴动是极大的罪恶，玩弄战斗同样是罪恶。

正因为要进行战争的持久战与战役的速决战，所以我们一定要给予红军以必须的休养兵力与教育训练的时间，这是争取战争胜利的必要条件。以为五次战争中没有休息训练的可能的说法是不对的，那只是单纯防御短促突击主义者必然的结论。以为红军行动积极化，便是使他经常的不停止的打仗而不应注重休息训练，也是不对的，须知没有必要的休息训练，就不能好好的打胜仗。红军的编制，一定要适合现时国内战争的环境。主力还未充实就去建立许多新的师团单位是不对的。应该于充实主力之后，再去建立新单位。拿全无教育训练又无战斗经验的新兵师团去单独作战是不对的，应该使新兵师团中有老兵骨干，并尽可能在初期使他们在老的兵团指挥之下，训练出战斗经验来。那种不必要的笨重的与上重下轻的组织与装备是不对的，应该是尽可能的轻装，必须充实连队与加强师以下的领导。

正因为要进行战争的持久战与战役的速决战，必须

反对那种把保持有生力量与保卫苏区互相对立起来的理论。为了进行胜利的战斗,红军的英勇牺牲是完全必要的,这是阶级武装的特质,是革命战争胜利的基础,这种牺牲换得了胜利,这种牺牲是有代价的。但这不能适用于无代价的拚命主义的战斗,须知只有保持有生力量,我们才能真正的保卫苏区。没有坚强的红军,苏区即无法保存。有了坚强的红军,即使苏区暂时遭到部分的损失,也终究能够恢复,并且新的苏区也只有依靠红军才能创造起来。

在战争持久战的原则之下,要反对当敌人的“围剿”被我们用反攻战斗粉碎了之后可能发生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由于疲劳情绪与过高估计敌人力量所产生的保守主义。这种保守主义使我们懈怠消极,使我们停顿不动,使我们不能由反攻转入进攻,消灭更多敌人,发展更大苏区,扩大红军力量,使我们不能在敌人新的“围剿”到来之前取得粉碎新的“围剿”的充分条件。另一种是由于对自己胜利过分估计与对敌人力量估计不足所产生的冒险主义。这种冒险主义使我们的进攻得不到胜利(如无把握的及在当时无必要的进攻中心城市等),甚至于使反攻中已经得到的胜利归于减削或抛弃,使红军有生力量过分牺牲,使扩大红军、扩大苏区、争取战略地区的发展与巩固的任务放弃不顾,这同样使我们不能在敌人新的“围剿”到来之前取得继续粉碎它的充分条件。因此,反对这两种错误倾向,是党在战略的进攻问题上即在敌人两个“围

剿”之间的严重任务。

在战役速决战的原则下,要反对根源于恐慌情绪的仓猝应战,或对战略上初战的不慎重,或企图先发制敌,一战不胜就认为没有办法,或借口速决战而不作充分准备,即对于敌人的“围剿”不作必要的与尽可能支持的时间内的一切准备,等等机会主义的倾向。速决战是要求具备一切必要条件(战略的优胜,战役领导的正确,运动战,不失时机,集中兵力等等)去消灭敌人部队,只有消灭了敌人的部队才能使战局速决,才能使敌人的进攻与“围剿”归于粉碎。

十、利用反革命内部的每一冲突,从积极方面扩大他们内部的裂痕,使我们利于转入反攻与进攻,是我们粉碎敌人“围剿”的重要战略之一。福建十九路军事变是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重要关键,党中央当时采取了利用国民党内部这一矛盾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同十九路军订立了停战协定,来推动十九路军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然而当时××同志等却在“左”的空谈之下,在战略上采取了相反的方针,根本不了解在政治上军事上同时利用十九路军事变是粉碎五次“围剿”的重要关键之一。相反的以为红军继续在东线行动,打击进攻十九路军的蒋介石部队的侧后方,是等于帮助了十九路军,因此把红军主力西调劳而无功的去攻击永丰地域的堡垒。失去了这一宝贵的机会,根本不了解十九路军人民政府当时的存在对于我们是有利益的。在军事上突击蒋介石的侧后

方以直接配合十九路军的行动,这正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为了粉碎五次“围剿”。这并不是因为十九路军是革命的军队,相反的这不过是反革命内部的一个派别,这个派别企图用更多的欺骗与武断宣传甚至社会主义之类的名词来维持整个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47],只有我们在实际行动中表现给在十九路军欺骗下的工农士兵群众看,我们帮助任何派别反日反蒋的斗争,我们才能更容易揭破十九路军军阀的欺骗,在共同反日反蒋的战争中,争取他们到我们方面来。只有我们军事上采取与十九路军直接配合的方针,才能使我们在当时这一重要关键上不失去消灭蒋介石主力的机会,这种有利条件,是过去历次战争中所没有的。然而在我们军事上没有去利用,这对于单纯防御路线的领导者原是不足为怪的,因为他们的目的,原来不过为了抵御敌人的前进,至于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与冲突使自己转入反攻与进攻,在他们看来是冒险的行动。

十一、在战略转变与实行突围的问题上,同样是犯了原则上的错误。首先应该说的:当我们看到在中央苏区继续在内线作战取得决定的胜利已经极少可能以至最后完全没有可能时(一九三四年五月至七月间,即广昌战役以后),我们应毫不迟疑的转变我们的战略方针,实行战略上的退却,以保持我们的主力红军的有生力量,在广大无堡垒地区,寻求有利时机,转入反攻,粉碎“围剿”,创造新苏区,以保卫老苏区。国际六月二十五日来电曾经这样的

指出：“动员新的武装力量，这在中区并未枯竭，红军各部队的抵抗力及后方环境等，亦未足使我们惊慌失措。甚至说到对苏区主力红军退出的事情，这唯一的只是为了保存活的力量，以免遭受敌人可能的打击。在讨论国际十三次全会^[48]和五中全会^[49]的决议案时，关于斗争的前途及目前国际的情形以及红军灵活的策略，首先是趋于保存活的力量及在新的条件下来巩固和扩大自己，以待机进行广大的进攻，以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50]。在这个重要关节上，我们的战略方针显然也是错误的。在《五、六、七三个月战略计划》上，根本没有提出这一问题。在《八、九、十三个月战略计划》上虽是提出了这一问题，而且开始了退出苏区的直接准备，然而新计划的基本原则依然同当时应取的战略方针相反，“用一切力量继续捍卫中区来求得战役上大的胜利”；“发展游击战争，加强辅助方向的活动，来求得战略上情况的变更”，这些依然是新计划基本原则的第一节第二条。关于有生力量的保持问题，完全忽视。而这正是决定退出苏区的战略方针的基础。这一战役时机上的错误，再加上阵地战的发扬，给了红军以很大的损害。这种一方面预备突围，一方面又“用一切力量继续捍卫中区”的矛盾态度，正是单纯防御路线的领导者到了转变关头必然的惊慌失措的表现。

其次，更加重要的，就是我们突围的行动，在华夫同志等的心目中，基本上不是坚决的与战斗的，而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正因为如此，所以这

种巨大的转变不但没有依照国际指示,在干部中与红色指战员中进行解释的工作。而且甚至在政治局的会议上也没有提出讨论。把数百万人的群众行动的政治目标,认为不是重要的问题。在主力红军方面,从苏区转移到白区去,从阵地战场转移到运动战场去,不给以必要的休养兵力与整顿训练,而只是仓猝的出动。关于为什么退出中央苏区、当前任务怎样、到何处去等基本的任务与方向问题,始终秘而不宣。因此在军事上,特别在政治上,不能提高红军战士的热情与积极性,这不能不是严重的错误。庞大的军委纵队⁽⁵¹⁾及各军团后方部的组织,使行军作战受到极大的困难,使所有的战斗部队,都成了掩护队,使行动迟缓,失去到达原定地区的先机。这是根本忘记了红军的战略转变将遇到敌人严重的反对,忘记了红军在长途运动中,将要同所有追堵截击的敌人作许多艰苦的决斗,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所有这些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的错误,特别战略方针不放在争取于必要与有利时机同敌人决战的原则上,就使得自己差不多经常处于被动地位,经常遭受敌人打击,而不能有力的打击敌人。就使得三个月的突围战役,差不多处处成为掩护战,而没有主动的放手的攻击战。就使得口头上虽经常说主战,而实际上除掩护战而外,却经常是避战。就使得红军士气不能发扬,过分疲劳,得不到片刻的休息,因而减员到空前的程度。就使得“反攻”的正确口号在实际上变成了××同志等的避战主义的掩盖物,而不准备于必要与有利时机争

取真正反攻的胜利。就使得以红军战略转变,迫使敌人转变其进攻中央苏区的整个计划,以保卫中央苏区,以粉碎五次“围剿”,以建立湖南的根据地,乃至高度保持红军有生力量的基本任务,都不能完成。所有这些,都是基本的战略方针采取了避战主义的必然结果。这种战略避战主义是从一种错误观点出发,即是说红军一定要达到了指定地区(湘西),放下了行李,然后才能举行反攻消灭敌人,否则是不可能的。对追击敌人(如周、薛两纵队^[52]),就在他们分离时与疲惫时也是不敢作战的。而这种错误观点的来源,则在于不明了当前的环境是不允许我们这样简单地轻巧地径情直遂地干的,在于对追击敌人的力量的过分估计。殊不知这种简单的轻巧的与径直的干法,在短距离的环境,不严重的与小部队的行动,或者是可能的,而在数千里的五次“围剿”环境中的主力红军的巨大战略的转移则是不可能的。对不必要的与敌人无隙可乘的那种战斗,是应避免的,而对于必要的与敌人有隙可乘的战斗,则是不应该避免的。此次突围行动,没有完成自己的任务,其主要原因正在这里。这一原则上的错误,一直发展到突围战役的最后阶段,当红军到了湘黔边境,在当时不利于我的情况下,却还是机械的要向二、六军团地区推进,而不知按照已经变化的情况来改变自己的行动与方针。红军到了乌江地域,又不知按照新的情况的变化,提出在川黔边转入反攻消灭蒋介石追击部队的任务,而只是看见消灭小部黔敌以及消灭所谓土匪的任务。虽

则最后两次错误都因政治局大多数同志的坚决反对而纠正了,而在华夫同志等则适足表现其战略问题上一贯的机会主义的倾向。

单纯防御路线发展的前途:或者是不顾一切的拚命主义,或者是逃跑主义,此外决不能有别的东西。

十二、政治局扩大会认为一切事实证明我们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一切企图拿党的正确路线来为军事领导上的错误路线做辩护(如××同志的报告、华夫同志的发言)是劳而无功的。

政治局扩大会更认为这种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一种具体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他的来源是由于对敌人的力量估计不足,是由于对客观的困难特别是持久战堡垒主义的困难有了过分的估计,是由于对自己主观的力量特别是苏区与红军的力量估计不足,是由于对于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不了解。因此政治局扩大会认为反对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的斗争,是反对党内具体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这种斗争在全党内应该开展与深入下去。一切把这一斗争转变为无原则的个人纠纷的企图,必须受到严厉的打击。

十三、此外政治局扩大会认为××同志特别是华夫同志的领导方式是极端的恶劣,军委的一切工作为华夫同志个人所包办,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惩办主义有了极大的发展,自我批评丝毫没有,对军事上一切不同

意见不但完全忽视,而且采取各种压制的方法,下层指挥员的机断专行与创造性是被抹煞了。在转变战略战术的名义之下,把过去革命战斗中许多宝贵的经验与教训完全抛弃,并目之为“游击主义”,虽是军委内部大多数同志曾经不止一次提出了正确的意见,而且曾经发生过许多剧烈的争论,然而这对于华夫同志与××同志是徒然的。一切这些,造成了军委内部极不正常的现象。

同时政治局更认为过去书记处与政治局自己对于军委的领导是非常不够的。书记处与政治局最大部分的注意力是集中于扩大红军与保障红军的物质供给方面,因此在这些方面,得到了空前伟大的成绩,然而对于战略战术方面则极少注意,而把这一责任放在极少数的同志身上,首先是××同志与华夫同志。我们没有清楚的了解,战争的指挥问题,关系于战争胜负的全局。战争指挥的错误,可以使最好的后方工作的成绩化为乌有。政治局对于这一问题上所犯的错误是自己应该承认的,书记处的所有同志,在这方面应该负更多的责任,因为有些重要的决定或战略计划是经过书记处批准的。

然而政治局扩大会特别指出××同志在这方面的严重错误,他代表中央领导军委工作,他对于华夫同志在作战指挥上所犯的路线上的错误以及军委内部不正常的现象,不但没有及时的去纠正,而且积极的拥护了助长了这种错误的发展。政治局扩大会认为××同志在这方面应负主要的责任,而××同志在他的结论中对于绝大多数

同志的批评与自己的错误是没有承认的。必须指出,这种错误对于××同志不是整个政治路线的错误,而是部分的严重的政治错误。^[53]但这一错误如果坚持下去,发展下去,则必然走到整个政治路线的错误。

政治局扩大会认为为了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创造新苏区,必须彻底纠正过去军事领导上所犯的错误,并改善军委领导方式。

十四、最后,政治局扩大会认为:虽是由于我们过去军事上的错误领导使我们没有能够在中央苏区内粉碎五次“围剿”,使我们主力红军不能不退出苏区并遭受到部分的损失,然而我们英勇的红军主力依然存在着,我们有着优良的群众条件,我们有着党的正确领导,我们有着物质上地形上的比较良好的地区,我们有着全国广大群众的拥护,与红四方面军和二、六军团的胜利的配合,再加上正确的作战指挥,我们相信,这些困难,在我们全体同志与红色指战员努力之下,是可以克服的。同时,敌人方面的困难是大大的增加了,我们活动地区远远的离开了南京政府反革命的根据地,蒋介石几年经营的堡垒地带的依靠是没有了,军阀内部的矛盾与不统一有了进一步的增加,我们主要的敌人蒋介石的主力在五次“围剿”中是削弱了,尤其是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与国民党的卖国政策,全国国民经济的空前崩溃,使全国民众更清楚的看到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而更加同情与拥护苏维埃革命运动以至直接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这些都是我们粉碎

敌人新的围攻,创造新的苏区根据地,发扬全国苏维埃运动的有利条件。

必须指出,目前的环境在党与红军面前提出了严重任务。这就是因为帝国主义与反革命国民党军阀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放松我们。我们现在是在敌人新的围攻的前面,中央红军现在是在云贵川地区,这里没有现成的苏区而要我们重新去创造,我们的胜利要在自己艰苦奋战中取得,新苏区的创造,不是不经过血战可以成功的。当前的中心问题,是怎样战胜川、滇、黔、蒋这些敌人的军队。为了战胜这些敌人,红军的行动,必须有高度的机动性,革命战争的基本原则是确定了,完成作战任务则必须灵活的使用这些原则。红军运动战的特长,在五次战争中是被长期的阵地战相当的减弱了,而在目前正要求红军各级指挥员具有高度的运动战战术。因此从阵地战战术(短促突击)到运动战战术的坚决的迅速的转变,是严重的工作。对战斗员尤其是新战士,则须进行必要的技术教育。在政治上,一切须适应目前运动战的需要,以保证每一个战斗任务的完成。红军更要从作战中休养与整理自己,并大量的扩大自己。严肃自己的纪律,红军对广大劳苦工农群众的联系,必须更加密切与打成一片。极大的加强对地方居民的工作,红军应该是苏维埃的宣传者与组织者。目前的环境要求党与红军的领导者用一切努力,具体的确实的解决这些基本的问题。

白区党的工作,必须建立与加强。对白区群众斗争的

领导方式,必须有彻底的转变。瓦解白军工作必须真正开始。广泛的发展游击战争,是党目前最中心任务之一。在中央苏区、湘赣、湘鄂赣苏区与闽浙赣苏区,党必须坚持对游击战争的领导,转变过去的工作方式,来适合于新的环境。最后,同二、六军团及四方面军必须取得更密切的关系并加强对于他们的领导,以求得全国红军的一致行动与互相配合。

政治局扩大会相信放在我们前面的这些严重的任务,我们是能够完成的。完成这些任务是以后革命战争的新的胜利的保证。新的革命战争的胜利,将使我们中央红军在云贵川三省广大地区中创造出新的苏区根据地,将使我们恢复老苏区,将使全国各地的红军与苏区打成联系的一片,并将使全国工农群众的斗争转变到胜利的大革命。

政治局扩大会相信,中国苏维埃革命有着他雄厚的历史泉源,他是不能消灭的,他是不能被敌人战胜的。中央苏区、湘鄂赣苏区、湘赣苏区与闽浙赣苏区的变为游击区,不过是整个苏维埃革命运动中部分的挫折。这种挫折丝毫也不足以使我们对于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前进表示张皇失措,实际上帝国主义国民党就是想暂时停止苏维埃革命运动的发展也是不可能的。二、六军团与四方面军的胜利,中央红军在云贵川三省内的活跃,以及全国工农群众的革命斗争,证明整个中国苏维埃革命正在前进中。

政治局扩大会指出过去党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对于我党的整个路线说来不过是部分的错误。这种错误也不足以使我们悲观失望。党勇敢的揭发了这种错误,从错误中教育了自己,学习了如何更好的领导革命战争到彻底的胜利。党在揭发了这种错误之后,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

政治局扩大会号召全党同志,以布尔什维克的坚定性,反对一切张皇失措与悲观失望的右倾机会主义,首先反对单纯防御路线。政治局扩大会更号召全党同志象一个人一样团结在中央的周围,为党中央的总路线奋斗到底,胜利必然是我们的。

关于张国焘的错误^{*}

(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二日)

对这一事件,应当广为解释。

一、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中央的路线,一条是右倾的军阀主义——张国焘主义。从退出通南巴^[54]起,已经形成了反对中央的路线。对敌人是惧怕的。在红军建设上,不要党的领导。红军变成个人统治的军队。对干部的培养,是要拥护他个人。无论在哪一方面,都充分表现了军阀主义倾向,这是很明显的。

这个问题,应使干部了解。而且要了解其前途必然是组织第二党。但有没有其他可能呢?我们还有总司令^[55]、五军、三十二军^[56]在那里,还有广大好的干部。

^{*} 这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言的简要记录,收入本书时稍有删节,标题是本书编者拟的。一九三五年九月,张国焘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途中拒不执行中央北上的方针,在右路军通过草地后,他率领左路军南返,擅自右路军并要挟党中央南下。党中央决定迅速脱离危险区域,率领右路军中的第一、三军团北上,在到达甘肃的俄界(即高吉,今属迭部县)后召开了这次会议,听取毛泽东同志《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并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

经过我们的工作 ,还是有争取他的可能的。我们应尽量争取后一种可能。

二、对张国焘的错误路线 ,中央为什么不马上开展斗争 因为过去中央站在布尔什维克的路线上 ,如同一方面军一样看待他 ,后来知道他的错误 ,才用许多办法来争取他。用了许多方式 ,派代表 ,谈判 ,让步等 ,但终于分裂了。中央争取他的这些步骤是失败了 ,但中央是采取了许多正确的办法的。就是现在 ,只要还有一线可能 ,我们还要争取他。到最后 ,做组织结论是必要的 ,但这只是在完全没有可能争取的时候。

三、我们目前战略方针是改变了 ,因为一、四方面军分开 ,我们的力量削弱了 ,所以我们的战略方针不能不有变更。

四、应该通过对许多问题的解释 ,使我们的干部更加团结 ,坚信我们是唯一正确的。一些同志觉得我们更加团结了 ,这是很对的。

五、目前队伍的编制要缩小 ,德怀^[57]同志的提议 ,我是同意的。同时要注意干部的保存。现在要指定一些同志负责改编队伍 ,到麻牙^[58]即行改编。

关门主义是目前党内主要危险^{*}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一日)

教育我们的同志 ,灵活的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 ,是我们党目前最中心的任务。为了完成这一任务 ,我们必须同党内“左”的关门主义(或“左”的消极主义)开展最坚决的斗争。在目前政治形势之下 ,关门主义成了我们党内最主要的危险。

关门主义者往往以背诵共产主义的真理或党的基本口号为满足。不论在何种具体环境下 ,关门主义者就是只有那一套法宝。一切合乎他那一套的 ,就是好的 ;一切不合乎他那一套的 ,就是要不得的。因此 ,他的活动范围就非常狭窄 ,同时他的活动方式也只能限于抽象的共产主义真理或党的基本口号的宣传鼓动。这种倾向的结果 ,必然是完全脱离群众。

^{*} 这是《拥护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的抗日宣言》一文的节录 ,标题是本书编者另拟的。原文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抗日救国宣言》的发表而作 ,最初刊载于中共西北中央局机关报《斗争》第七十六期(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五日出版) ,署名洛甫。

党曾经同意与赞助民族武装自卫会所提出的基本纲领^[59]，目的是通过这些纲领团结最广大的中国人民在民族武装自卫会的周围，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然而这些纲领一到了关门主义者手里，就变成死气沉沉的教条，变成了只是宣传鼓动的资料。对于过去苏维埃中央政府^[14]与军委^[51]所提出的三个条件^[60]也是如此。这种关门主义倾向，如不克服，就根本无法去取得对于千千万万广大群众的领导权。

列宁同志说：

“国际工人运动中觉悟的先锋队，即各国共产党、共产主义集团和派别的当前任务就是要善于把广大的（现在大半还是沉睡、消沉、因循守旧而没有醒悟的）群众引导到这种新立场上来，确切一点说，就是不仅要善于领导自己的党，也要善于在这些群众接近和转到新立场的过程中领导他们。如果说从前没有完全地在思想上和政治上战胜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就不能解决第一个历史任务（把觉悟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吸引到苏维埃政权和工人阶级专政方面来），那末，现在不肃清左倾学理主义，不完全克服和摆脱左倾学理主义的错误，也就不能解决已经提到日程上来的第二个任务，即善于引导群众采取能够保证先锋队在革命中得到胜利的新立场。”^[61]

群众的觉悟程度是如此的不整齐，群众斗争的方式与方法是如此之复杂，发动斗争的要求是如此的不相同，只有我们的同志抛开一切教条与法宝，而投身到群众中

去,领导他们的斗争,同他们的领袖进行一定条件的联合与妥协,活泼的运用下层的以至上层的统一战线,依照群众自己的政治经验,把斗争提到更高的阶段,我们才能团结最广大的群众在我们的周围,取得我们的领导权。

比如这样的一个例子。由于群众觉悟程度的低落与改良主义者的领导,当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平津时,群众要求向国民党政府请愿。我们是不是站在旁观者的地位去讥笑群众的愚蠢与落后,表示自己的清高呢?不是的。却正相反,我们应该积极的参加这一请愿运动,使群众以他们自己的皮肉去了解请愿的无用,消除他们对于国民党政府的幻想,懂得共产党所说的关于国民党政府是日本帝国主义走狗的话的正确,并且把这一请愿变为直接的群众示威与群众的革命行动。

再比如,群众一开始并不赞成我们没收日本帝国主义财产作为对日作战经费的宣传,而要求抵制日货。我们是不是站在旁观者的地位,说这一口号不是共产党的口号而拒绝参加呢?不是的。却正相反,我们应该积极的领导这种运动,吸引最广大的群众到运动中来。由这种运动转变到检查日货、没收日货是再容易不过的。这样,抵制日货变成了实现我们没收日本帝国主义财产的口号的最好桥梁。

不论斗争开始时群众抗日反蒋的要求是怎样的平凡,不论斗争开始时的领导者是怎样一个反革命的坏蛋,我们的同志都应该积极的去领导群众,在一定条件下同

领导者联合,真正为这一平凡的要求的实现而斗争。只有在斗争中才能表示我们是民族利益的真正代表者,真正肯为了民族利益而奋斗到底,才能取得群众的信任,揭破反革命分子的一切欺骗与叛变的行为,这样把斗争提到更高的阶段。

一切这些例子都是在说明:想把群众的行动限制在我们的教条之内,处处符合于我们的法宝,这实是一种最可笑的儿童的幼稚思想,这种思想除了使自己同群众脱离之外,不会有别的结果。

“左”的关门主义者实际上表示出他们对于自己的力量是不相信的,他们不但惧怕群众,而且惧怕反革命分子。他们怕一到群众中去,就会同流合污,失去了自己共产主义的清高与纯洁。他们怕一同反革命分子接触,立刻会受他欺骗与愚弄,而遭受惨败。他们把反革命分子描写得三头六臂,神通广大,绝对不应该同他讲一句话,更不该同他妥协以争取对群众的领导权。只有在自己同志的范围内,只有同少数先进分子关在一个小房子里,再背诵其共产主义的万灵咒语,关门主义者方觉得有恃而无恐。所以这种关门主义,实质上是同右倾机会主义没有分别的。

改变对富农的策略^{*}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六日)

报 告

四中全会^[62]后,中央坚决执行了共产国际关于富农问题的指示^[63]。国际认为:(一)在革命失败以后,富农分子站在豪绅地主方面反对革命;(二)在革命遭受失败时,要在乡村中建立革命根据地、扩大革命影响,就必须坚决反对富农及一切剥削者,否则是不可能的;(三)党要同富农争夺对于广大贫农、中农的领导。从这些论点出发,国际指示,在反对地主豪绅的斗争中要加紧反对富农^[64]。中央及各苏区在农村阶级问题上的决定,都是坚决的,执行了国际这一指示的。

现在的情况与以前不同了。第一,现在是革命时期,

^{*} 这是在陕西安定县(今子长县)瓦窑堡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所作的报告和结论,标题是本书编者拟的。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党中央立即着手解决遵义会议没有来得及解决的党的政治策略问题,系统地纠正这方面的“左”倾错误。改变对富农的策略,就是首先采取的重大步骤之一。在张闻天同志作这个报告的同一天,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

特别是民族危机加深的时期,广大阶层都参加了革命斗争。第二,现在我们党不仅在农村中有了基础,有了广大苏区及红军,而且在全国和国际上都有极大影响。党已成为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者与组织者。第三,国民党统治使人民做亡国奴,灾民难民流离失所,工人失业,农民失地,黎民百姓饥寒交迫,在死亡线上挣扎。与此相反,在苏维埃下面,则消灭帝国主义势力,组织民族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土地分了,农民生活得到改良。这就使群众看到,只有苏维埃好,苏维埃不仅是代表工农的,而且是代表全国民众的。

在这种情形下,富农所采取的态度与以前不同了。以前,在革命失败后,富农参加地主豪绅方面反对革命。现在,在白区内,富农参加反对地主豪绅、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站到革命方面来,对革命采取同情或中立态度,甚至参加革命斗争。富农的参加对我们是有好处的,不是可怕的。现在我们要在全国范围内争取广大群众到革命方面来,反对我们的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蒋介石^[65]。因此富农态度的变更,我们是欢迎的。我们现在如采取加紧反对富农的策略,把他们推到地主豪绅方面去,显然是不适宜的。我们在农村要集中力量反对地主豪绅。

过去苏区工作的经验表明,加紧反对富农,变成了消灭富农,以致动摇中农,影响到农村中不安定,以及中农对生产不发生兴趣。这样,不但把富农推到坚决反对苏维

埃的道路上,而且影响到中农。在白区,加紧反对富农也不易为群众清楚了解,群众觉得在苏区有钱就危险。现在我们改变策略,使群众觉得不仅政治上可以自由,而且可以大大的发展生产,使生活更加好起来。我们必须了解,在目前革命阶段上,资本主义的发展对我们不是可怕的,而是有利的。

总之,我们认为,在目前情形下,要改变我们对富农的策略。策略不是死的,而是活的。情况不同了,仍然采取旧的策略,就是错误的。所以现在要改变。

现在,在白区,在反对地主豪绅的斗争中,一般可以联合富农,造成统一战线。在斗争深入时,分配土地、消灭豪绅地主势力时,则要求得富农善意的中立,使他们不做地主豪绅的应声虫,以孤立地主豪绅势力。

在苏区,只取消富农的封建剥削,如出租土地的剥削方式就要取消。他们自己雇用劳动力耕种的土地,就不应该没收。高利贷,百分之五十利息之类的中世纪式剥削,应该取消。以前出租耕牛给农民的那种剥削,也应取消。耕牛除了为耕种自己土地所需之外还有多余,而又为广大群众需要,就应该捐助给农民。骡子也应如此。在某一区域中,如雇农贫农、特别是中农愿意,也可以平分土地,这时富农也应平均分得土地,不能特别分给坏田地^[66]。除此之外,富农的钱及用具,不管有没有,都是不能动的。现在有许多地方弄得很厉害,不但使富农站在地主豪绅一边,而且影响到中农。富农不能参加苏维埃政权,但可

以参加群众团体,如互济会^[67],反日会。这种政策,可以取得富农善意的中立,使他们看到,可以过得下去,可以发展生产。但若已分配过了,就不要反过来,只好让他们吃一些亏了。

参加革命很久的富农可以取得苏维埃公民的资格。对知识分子则要吸收他们在苏维埃政权下做工作。

在改变对富农的策略过程中,要加强无产阶级在农村中的组织,如贫农团、雇农工会,以巩固我们力量。我们不是在富农面前表示恐慌,而是吸收工农到苏维埃来,保障党对苏维埃的领导。这样,对富农政策的改变,就可以使苏维埃更加巩固,使我们取得对民族战争的领导。

结 论

现在要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集中力量反对主要敌人,在广泛的统一战线中争取党的领导。在富农问题上,鉴于目前革命特别是民族革命的发展,又鉴于过去的经验,即在加紧反对富农中的丰富经验,所以要改变策略,为的是集中力量,反对主要敌人。这个策略,在现在的情况下,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及其苛捐杂税的斗争情况下,就是团结全体农民反对主要敌人,组织整个农民战线。

在苏区,对于富农的“左”的办法要纠正。这不是假的政策。政府过左的行政办法要纠正,党、工会也是一样。过

左的要求,我们都是反对的。我们站在整个革命利益及阶级利益的立场上,政策是一贯的,不论在哪一方面都是这样。在参加政权问题上还是不变,累进税及劳动法还是要执行。但是我们保障他们营业、生产的安全,使他们能赚钱。

现在主要的是要组织我们的力量:党、贫农及雇农。在工人中,要纠正过分的要求。问题不是靠要求提得高,而是要组织力量及进行教育。要求提得过高,会影响到整个革命利益。过去汀州工资很高^[68],但对工人并不怎样好。要懂得应该提甚么样的口号、要求,才能实行党的政策。工会在这方面要有坚定的立场。要使工人了解,实行这个方针,商人可以做生意,富农可以赚钱,这对工人组织自己的工会、生活的改良及文化教育的提高都有好处。要提高工人阶级的觉悟。对于工人阶级的部分利益妨碍工人阶级整体利益的现象,需要斗争。简单的行政办法,不能巩固工人组织及提高工人觉悟。

总之,对于策略的转变,各方面都要坚决贯彻执行。要在党内进行广泛的教育,使我们的同志懂得,目前无论如何都要转变策略。

几个具体问题明确一下。第一、富农自己经营的土地不动,出租的土地没收。第二、出租的牛羊可以分。第三、土地是否平均分配由中农决定。第四、合作社可以让富农投资,但不能让他们参加政权。

目前形势下党的策略^{*}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党的策略路线

目前的形势告诉我们,日本帝国主义并吞中国的行动,震动了全中国与全世界。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各阶级,阶层,政党以及武装势力,重新改变了与正在改变着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民族革命战线与民族反革命战线是在重新改组中。因此,党的策略路线,是在于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65]。不论什么人,什么派别,什么武装队伍,什么阶级,只要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蒋介石的,都应该联合起来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在中国的统治,取得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

* 这是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的第二、五、六节,标题是本书编者另拟的。决议共六节,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陕西安定县(今子长县)瓦窑堡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瓦窑堡会议)通过。

保持中国的独立与领土的完整。只有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层的与上层的),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与其走狗蒋介石。

当然,不同的个人,不同的团体,不同的社会阶级与阶层,不同的武装队伍,他们参加反日的民族革命,各有他们不同的动机与立场。有的是为了保持他们原有的地位,有的是为了要争取运动的领导权使运动不至超出他们所容许的范围之外,有的真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正因为他们的动机与立场各有不同,有的在斗争开始时就要动摇叛变的,有的会在中途消极或退出战线的,有的愿意奋斗到底的。但是,我们的任务,是在不但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的基本力量,而且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是在使全国人民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不使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不参加到反日的战线上去。这就是党的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只有按照这种路线,我们才能动员全国人民的力量去对付全国人民的公敌: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蒋介石。

中国工人阶级与农民,依然是中国革命的基本动力。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革命的知识分子,是民族革命中最可靠的同盟者。工农小资产阶级的坚固联盟,是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奸卖国贼的基本力量。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与军阀,不管他们怎样不同意土地革命与苏维埃制度^[69],在他们对于反日反汉奸卖国贼的斗争采取同情,

或善意中立,或直接参加之时,对于反日战线的开展都是有利的。因为这就使他们离开了总的反革命力量,而扩大了总的革命力量。为达到此目的,党应该采取各种适当的方法与方式,争取这些力量到反日战线中来。不但如此,即在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中间,也不是完全统一的,由于中国过去是许多帝国主义互相竞争的结果,产生了各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互相竞争的卖国贼集团,他们中间的矛盾与冲突,党亦应使用许多的办法使某些反革命力量暂时处于不积极的反对反日战线的地位。对于日本帝国主义以外的其他帝国主义的策略也是如此。

党在发动、团集与组织全中国人民的力量以反对全中国人民的公敌时,应该坚决不动摇的同反日统一战线内部一切动摇、妥协、投降与叛变的倾向做斗争。一切破坏中国人民反日运动者,都是汉奸卖国贼,应该群起而攻之。共产党应该以自己彻底的正确的反日反汉奸卖国贼的言论与行动去取得自己在反日战线中的领导权。也只有共产党领导之下,反日运动才能得到彻底的胜利。对反日战争中的广大民众,应该满足他们基本利益的要求(农民的土地要求,工人、士兵、贫民、知识分子等改良生活待遇的要求),只有满足了他们的要求,才能动员更广大的群众走进反日的阵地上去,才能使反日运动得到持久性,才能使运动走到彻底的胜利。也只有如此,才能取得党在反日战争中的领导权。

党内主要危险是关门主义

要战胜中国人民的公敌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共产党员必须深入到群众中去,参加与领导一切群众的、民族的与阶级的斗争。这里,主要的关键是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广泛的统一战线,一方面是在集中最大的力量去对付最重要的敌人,另一方面,是在使广大的群众根据于他们自己的政治经验,了解党的主张的正确,争取他们到党的旗帜之下。

必须更深刻的了解革命领导权的问题。共产党要在中国革命中取得领导权,单靠党的宣传鼓动是不能够的,必须使它的一切党员在实际行动中,在每日的斗争中,表现出他们是群众的领导者。只知道如何在下层群众中间进行工作(这是主要的)是不够的,必须知道如何同别党、别派、和下层群众有关系的上层领袖,进行谈判、协商、妥协、让步,以期争取其中可能继续合作的分子,以期在群众前面最后的揭穿那些动摇欺骗与叛变分子的面目,而以群众的力量把他们驱逐出去。党的领导权的取得,单靠在工人阶级中的活动是不够的(这是要紧的),共产党员必须在农村中、兵士中、贫民中、小资产阶级与知识分子中,以至一切革命同盟者中,进行自己的活动,为这些群众的切身利益而斗争,使他们相信共产党不但是工人阶级的利益的代表者,而且也是中国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

的代表者,是全民族利益的代表者。只要有群众的地方,不论那里的领导者是怎样的反动,共产党员应该参加到里面去进行革命的工作。只有当共产党员表现出他们是无坚不破的、最活泼有生气的中国革命的先锋队,而不是空谈抽象的共产主义原则的“圣洁的教徒”,共产党才能取得中国革命的领导权。

为了更大胆的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以争取党的领导权,党必须同党内“左”的关门主义倾向做坚决的斗争。在目前形势下,关门主义是党内的主要危险。关门主义的来源,第一,是由于对目前新的政治形势的不了解,因此,就不了解变更自己的策略以适合于新的形势的必要。第二,是由于不会把党的基本口号与基本政纲同目前的行动口号与行动政纲,在实际行动中联系起来。第三,基本是由于不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活泼的运用到中国的特殊的具体环境中去,而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变成死的教条。这种关门主义倾向,实质上表现出惧怕敌人、惧怕群众与对于自己力量的不相信,因此,就惧怕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的策略。这种关门主义的倾向,实质上是同右倾机会主义相同的。因为关门主义继续的结果,必然是使党脱离群众,使党放弃争取中国革命的领导权的任务。因此,党必须坚决反对“左”的关门主义,大胆的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深入到千千万万的群众中去,不怕可能发生的某种错误,从斗争中去学习领导群众的艺术。

虽然,党在反对“左”的关门主义的斗争中,丝毫也不

要放松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右倾机会主义压抑群众的切身利益的斗争,牺牲农民夺取土地、工人兵士贫民改良待遇的要求去适合民族资产阶级与富农的利益,对同盟者惧怕使用言论批评的武器,惧怕率领群众逼迫同盟者走上革命的更高阶段。右倾机会主义接受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分子,以及乡村富农的政治影响,而把自己变成他们的尾巴。一九二七年时期的陈独秀主义,在新的大革命中,在部分的党部与党员中的复活,是可能的。毫无疑问,党应该向着这种右倾机会主义,作坚决的斗争。但在目前说来,“左”的关门主义,是党的主要危险。目前的反对右倾正是为得要顺利的克服“左”倾,彻底的击破关门主义,使广泛的统一战线的策略正确的大胆的运用到一切工作中去,使党不落在群众斗争的后面,使群众从争取日常的切身利益出发,提高到反对中国人民的公敌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卖国贼的民族革命战争的位置。

为扩大与巩固共产党而斗争

为了完成中国共产党在伟大历史时期所负担的神圣任务,必须在组织上去扩大与巩固党。在新的大革命中,共产党需要数十万至数百万能战斗的党员,才能率领中国革命进入彻底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因此一切愿

意为着共产党的主张而奋斗的人,不问他们的阶级出身如何,都可以加入共产党。一切在民族革命与土地革命中的英勇战士,都应该吸收入党,担负党在各方面的工作。由于中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与殖民地,农民分子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常常在党内占大多数。但这丝毫也不减弱中国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的地位。事实证明,这样成份的党,是能够完成世界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国际所给予的光荣任务的,是能够艰苦奋斗百折不回的,在各国共产党中,除联邦共产党^[70]外,中国共产党站在光荣的先进的地位。

必须同党内发展组织中的关门主义倾向做斗争。能否为党所提出的主张而坚决奋斗,是党吸收新党员的主要标准。社会成份是应该注意到的,但不是主要的标准。应该使党变为一个共产主义的熔炉,把许多愿意为共产党主张而奋斗的新党员,锻炼成为有最高阶级觉悟的布尔什维克的战士。党内两条战线的斗争与共产主义的教育,就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方法。党在思想上的布尔什维克的一致,是党的坚强的无产阶级领导之具体表现。不从积极的革命斗争需要出发,而从恐惧观念出发的组织问题上的关门主义,必须彻底的击破。民族革命与土地革命的伟大战斗,已经涌出和正在涌出无数的积极分子与群众领袖,党的组织应以热烈欢迎的态度向他们开门。党不惧怕某些投机分子的侵入,党用布尔什维克的政治路线与铁的纪律,去保证党的组织的巩固。党不惧怕非无产阶级

出身的党员政治水平的不一致,党用共产主义教育,去保证提高他们到先锋队地位。

必须大数量的培养干部。党要有成千成万的新干部,一批又一批的送到各方面的战线上去。不是把领导才能每条都教好了,才给干部以工作,而是放这些干部到斗争中去,使他们从斗争中去学习。不是以如同使用机械一样的态度去使用干部与党员,而是爱护他们,信任他们,分配他们以适当工作,充分发挥他们的天才与自动性。不是以官僚主义的态度去对付干部与党员,而是以对于任务的解释说服,对于工作的具体指示,把党的领导机关同他们之间活泼有生气的联系起来。对于干部与党员在思想上与工作上的错误,不是轻易的给以打击,加上机会主义帽子,以及轻易的处罚他们,而是给以耐心的一次又一次的说服教育。思想上与工作上的错误,是免不了的,错误是可以改正的。列宁主义的学习精神与从斗争中求锻炼,是改正错误的最好方法。党内斗争的火力,应该向着那些坚持错误观点,不愿学习锻炼,不受指导教育的同志。一定限度的组织上的结论,也仅仅对于那些错误严重与无法说服的同志才是必要的。但一切必要的党内斗争与组织结论,仍然是带着对于本人与全党的教育性质。只有对于那些有一贯错误路线的机会主义者,党才不应该因为他们一时表现改正而轻易给他们以重要的工作。

伟大斗争时期,党的干部坚固的团结于党的领导机

关的周围,是有决定意义的。党要团结全党领导最广大群众走上民族革命与土地革命的战争,没有很多的与很好的干部作枢纽,是不能成功的。正确的组织路线与干部政策,是完成这个任务的前提。

中国共产党中央号召全党及其干部为坚决执行党的策略路线而斗争。把统一战线运用到全国去,把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71]建立起来,把苏维埃人民共和国^[72]变成全民族的国家,把红军变成全民族的武装队伍,把党变成伟大的群众党,把土地革命与民族革命结合起来,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结合起来,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万岁!中国的自由独立与统一万岁!苏维埃新中国万岁!

给张国焘的电报^{*}

(一九三六年一月十三日)

国焘同志：

电悉。

一、S同志消息，绝对不可轻信。

二、此等外间情报，一般是不可靠的。如徐海东同志事，纯系敌人造谣，即是一证。因此不应将S同志消息通知二、六军团，以免引起内部纠纷。

三、我们间的政治原则上争论，可待将来作最后的解决，但别立中央^[73]妨碍统一，徒为敌人所快，决非革命之利。此间对兄错误，未作任何组织结论^[74]，诚以兄是党与中国革命领导者之一，党应以慎重态度出之。但对兄之政治上错误，不能缄默，不日有电致兄，根本用意是望兄改正，使四方面军进入正轨。兄之临时中央，望自动取

* 张国焘在红军长征途中进行反党分裂活动并公然另立“中央”后，党中央同他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严肃地指出其错误，同时对他耐心劝导，以尽量挽救他本人，特别是使红四方面军广大干部战士团结在党中央领导下。张闻天同志为此多次以个人名义或同中央其他同志联名给张国焘去电，这是其中的一份。

消。否则长此下去,不但全党不以为然,即国际^[34]亦必不以为然,尚祈三思为幸。

四、兄处情况如何,甚为系念,请时电告。

闻 天

一月十三日

共产国际“七大”^[75]与我党 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

(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日)

共产国际“七大”决议^[76]中特别重要的,一是集中力量反战反法西斯,二是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反战的统一战线,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殖民地的人民统一战线。决议中关于欧洲的问题讲得多些,我们应该使之民族化,使之适合于我们的具体环境。从这些决议看,中央以前的决议^[77]基本上是同这些决议相符合的。

一 世界大战争的危险与 争取和平的斗争

“七大”关于战争决议,是去年八月通过的。八月到现在,发生了什么新的变化呢?首先,日本继续侵占华北,并且废弃海军协定^[78],开始了重新瓜分世界的斗争,破裂了由华盛顿条约^[79]建立起来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平

* 这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收入本书时略有删节,标题是本书编者拟的。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山西隰县大麦郊镇附近的上益干村(今属交口县)举行,主要讨论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和红军的战略方向问题。

衡。其次,意大利去年十月初开始了侵略阿比西尼亚^[80]的战争。这也是重新瓜分世界的战争,它使欧洲发生了变化。第三、德国公开废除凡尔赛条约^[81]的有关条款,进军莱茵非武装区^[82]。这三个国家公开破坏平衡,是主要的挑衅者。三国之中,德、日酝酿签订军事协定^[83],意、德则开始接近。

由于日、意、德三国的上述行动,使帝国主义内部发生了很大的变动。英国从前与德国签订了海军协定^[84],意阿战争以后,它同法国开始接近。法国则通过了法苏协定^[85]。美国重新宣布了中立法^[86],英美开始接近。

总之,一方面,德、日、意接近,另一方面,英、法、美、苏接近。这种形势表示,帝国主义战争的危险增加了,其一触即发之势时刻威胁着人类。世界革命运动(工人运动,殖民地人民运动)的发展,和平运动的发展,使帝国主义发动大战较为困难,但同时也使帝国主义急于在战争中求出路。

正因如此,争取和平的斗争更加重要了。全世界的群众,不但工农,而且小资产阶级分子,都反对战争。和平的口号可以团结最广大的群众为反战而斗争。资产阶级的许多派别攻击我们不要和平,现在我们正可以揭破他们,从而争取最广大的群众。

另一方面,我们也不是和平主义者。我们是进攻苏联和侵略殖民地的战争的反对者。要为世界和平斗争,就要反对侵略者。

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拥护世界和平，反对进攻苏联，反对日本侵占中国。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尤其是中心。我们要以民族革命战争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维护世界和平，而坚决反对日本的“和平”和蒋介石的“和平”，因为这是侵略者与卖国贼的和平。

我们现在主张国内和平，联合对日。这种国内和平是必要的。同这一口号相联系的，是联俄联共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这是群众的口号。在中国劳苦群众面前，这个问题是十分明白的。日本的所谓三大原则^[87]之三，就是中日“满”联合反对赤化，即反对中国红军与苏联。蒋介石想在日本同中国红军、苏联之间“渔翁得利”，是办不到的，只能是或者联日，或者联俄联共。在中国，甚至一些反革命分子都想找出路来联俄联共抗日。有些人可以去幻想中间道路，但中间道路是没有的。

我们提出这一口号，是否挑衅，使日苏打起来呢？当然不是。不能因为拥护苏联而连这个口号也不提。我们要继续团结全国力量，联俄联共来反对日本。李德的意见^[88]，依照我们的分析，全是无稽之谈。

总之，我们的和平政策是战斗的，动员的，是以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

二 国内形势与统一战线

现在的情况证明，中央决议是正确的。

日本在继续进攻。东京事变^[89]进一步完成了法西斯的统治,日本政府采取更积极的侵略政策。

南京政府仍在继续出卖,它承认了广田三原则^[90]。冀察政务委员会^[91]成为第二傀儡,德王^[92]、卓什海^[93]正在活动“独立”。

全国反日运动,特别是学生反日的壮烈运动,到处在酝酿。

反革命内部即南京政府内部和一些军阀也在与我们接洽谈判。

现在有许多派别在抗日口号下表现活跃。它们大致可以分为:(一)地主买办集团,但处于另一帝国主义影响之下者(如广东^[94]);(二)分裂出来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正在发挥其民族改良主义;(三)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学生。这些派别要与我们接近,有些积极,有些动摇。但地主买办集团坚决反共(如广东),资产阶级有的主张联俄联共,有的不主张。这种分化很明显。

红军东征^[95]获得胜利,苏维埃影响正在扩大。

以上事实证明,爆发民族革命战争的局面正在形成,尤其在华北。那里成为所有矛盾集中的地方,是首先燃发民族革命战争的地区。

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准备开展大规模的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目前的关键,是建立统一战线——抗日的人民统一战线^[96]。现在证明,这种统一战线对我们是完全有利的。

我们的方针是：

(一)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时,应与群众切身利益联系起来。国际决议说,不应当只是号召群众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而是要告诉群众,今天应做些什么。我们要根据不同的环境,提出群众迫切的要求,并使这些要求与抗日联系起来。如只喊抗日,不联系切身利益,就不能吸引工农小资产阶级群众。

(二)必要而且可能与各种政治派别进行上层统一战线,首先注意那些有群众的、有实力的、抗日的派别。订立协定时也应考虑今天所需要的是什么,先订部分的、地方性的协定。这些协定可以是公开的或秘密的,但一定要着眼于争取广大群众。

(三)不论统一战线是上层的,下层的,或上下同时进行的,统一战线的协定如能公开,就一定都要在群众中进行广泛的讨论。即使是秘密的,将来也要公布的。我们不订立那种不讲原则的“拉拢”的协定。

(四)订立协定后,我们忠实遵守这种协定,以取得同盟者尤其是其群众的信任。只有如此,才能对于违反协定的领袖进行批评以至斗争,并迫使玩弄左倾言辞的空谈者不得不表示态度。

(五)不放弃对同盟者的立场进行严肃的批评,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是唯一正确的主张。

(六)对最反动的法西斯分子进行最坚决的斗争,而不是迁就,如对蒋^[97],这样可以使动摇者倾向我们。

(七)成立统一战线的组织与机关,使其愈民主愈好。吸收左倾分子,发挥其积极性,排斥不好的分子。

(八)在各种问题上实行统一战线,不限于抗日。利用每个小的要求(如工资、抗捐、民主自由的要求),利用每个事变,在各种阶层以至各种反动阶层中进行统一战线工作。没有死板的公式。

(九)不要进行没有胜利把握的斗争,学习从防御到进攻的各种斗争策略,学习巩固力量,以及必要的有组织的退却。掌握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的联系。

(十)朝统一战线的政权(抗日联军、国防政府^[71])的方向发展。

国际决议提出,要力求建立“无产阶级统一战线或反法西斯的人民战线的政府”,这种政府还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府,但采取坚决措施反对法西斯主义和反动势力。可以说,这是某种“第三种政府”。这种政府的产生,国际决议指出需要三个条件。

在中国,有两点不同。一是革命的发展不平衡,二是已经有了苏维埃,所以有可能在某些地区中首先建立这种政府。条件也是三个^[98]。这三个条件现在还没有得到。因此,国防政府、抗日联军现在还未产生。它们要从斗争中得来。消极与等待是不能使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自动来到的。

三 准备大规模抗日战争与东征

苏维埃与红军要在实际行动中充分表示它们是抗日的先锋队。

(一)发展的方向,应该对着日本前进的方向。我们向华北发展,不仅因为它是矛盾的集中点,而且因为这是直接指向日本侵略军。

(二)以组织抗日斗争、抗日团体为中心任务。

(三)争取红军对日直接作战,直接对抗。这不是大规模的民族革命战争,而是准备这一战争的重要一步。

党的东征决定充分体现了这个方针。东征的目的是要在这一行动中进入山西,发动抗日,争取对日作战。这个方针,是使苏维埃和红军发挥抗日先锋队的作用。

现在应该特别注意于扩大红军、游击队和抗日根据地。扩大与巩固,现在应该特别着重于扩大,这是必要的。运动愈是大胆,就愈能巩固。如在狭小地区中与敌人作战,则巩固也困难。军事上政治上都是如此。政治方面出现了新形势,是利于发展的形势,所以政治方面的要求也是如此。只喊巩固,什么行动都害怕,局促于一个地区,这是保守观点,结果并不能巩固。中央苏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土地革命^[69]与抗日斗争联系起来的方式应随环境而异。这种联系也不是公式,是要根据环境而采取的。在

统一战线已建立的地方,要实行国防政府十大政纲^[99]。我们要细心的了解当地情况与群众需要。

政权是抗日政府,这正确不正确?是正确的。应该告诉群众,中心任务是抗日。

四 党内问题

为了彻底执行建立广泛的人民战线,要反对“左”的关门主义倾向。

不分析反革命派别中的各个人,视同一律,就不能有统一战线。

不用策略而只是背诵教义,就不能有统一战线。

国际决议说,“在广泛地应用统一战线策略时,右倾危险将会增长起来”。这对我党来说也是正确的。右倾主要表现在对形势估计不足,消沉的不积极的不满意的各种情绪都产生了。这与“左”倾实际上是互相联系着的。

我们要在两条战线的斗争中求得党内布尔什维克的一致。

共产党是统一战线的核心^{*}

(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日)

必须使共产党、苏维埃与 红军成为统一战线坚强的核心

共产党、苏维埃与红军,首先应该拿自己的彻底的抗日反汉奸卖国贼的主张与积极的坚决的行动,以创立抗日的人民统一战线^[96]。共产党、苏维埃与红军要在行动中、在斗争中推动、创造与扩大抗日人民统一战线。我们是抗日的人民统一战线的火车头与推动机。我们反对一切消极与等待的倾向。我们自信,没有共产党、苏维埃与红军,坚强的统一战线的创立是不可能的。

共产党、苏维埃与红军应该最忠实的遵守统一战线的协定的每一条文,而且应该为这些条文的实现而最积极的奋斗。我们应该及时的揭露个别人员或组织对于共

* 这是《关于抗日的人民统一战线的几个问题》一文的第四、五两节,标题是本书编者另拟的。全文共六节,最初刊载于中共西北中央局机关报《斗争》第九十七期(一九三六年四月三十日出版),署名洛甫。

同行动的消极怠工与破坏协定的行为的错误，不疲倦的为着统一的行动而斗争。共产党、苏维埃与红军应该是实行统一战线的模范。

共产党、苏维埃与红军在统一战线中决不抛弃自己的立场。我们对于一切改良主义的思想决不放弃严肃的确实的批评。我们以最诚恳的同志的态度，以最具体的实际的材料，向自己的同盟者指出，只有共产党的主张是最彻底的最革命的主张，以诱导他们同我们更进一步的合作。但我们认为，只有在行动中，在合作的过程中，我们更能影响与诱导同盟者走上正确的道路。

共产党、苏维埃与红军在统一战线中应该对于自己的同盟者有最清楚的了解与恰当的估计。我们应该知道，谁是民族革命中的朋友，谁是半途要退出的同路人与谁是一天两天的暂时的同盟者。换句话说，我们应该知道，谁是民族革命中的左派，谁是中派，谁是右派。我们的方针应该是同左派结成坚固的同盟，联合中派，而孤立右派。我们同左派的联盟愈是牢固，我们才愈是能够使中派倾向于同我们联合，愈是能够孤立右派。同时，只有当我们向右派的斗争愈是坚决，愈是能够揭破他们的每次的动摇、欺骗、出卖与叛变的事实，我们才愈是能够使中派脱离右派，使左派同我们结成牢固的同盟。在这里，我们共产党员的坚定的、不动摇的、明确的、布尔什维克的立场，对于统一战线策略的能否彻底实现有着决定的作用。

共产党、苏维埃与红军,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实行统一战线的基本任务,是为了发动与争取最广大的群众到彻底的抗日反卖国贼的旗帜之下。最广大的群众是我们最根本的依靠,是我们力量的泉源。因此,不论是上层的或是下层的统一战线的协定,我们必须力求公开,力求能够在群众中进行广泛的讨论、宣传与解释,以取得最大多数群众的拥护。即使暂时是秘密的协定,我们也必须准备必要时的公开。凡是破坏协定的行动,我们应该向着群众申诉,使群众知道谁是破坏协定的负责者,谁是真正为协定而奋斗的人,使群众反对破坏者而拥护我们。一切统一战线的组织,如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71]、或是各党各派的人民阵线^[100],都应该在群众中进行公开的选举,并吸收群众中大批积极的、勇敢的与坚决的分子参加领导工作。

最后,共产党必须在统一战线的行动中,猛烈扩大自己的核心的组织,灵活的把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联系起来。

必须使统一战线成为准备与 组织大规模的抗日的民族 革命战争的主要关键

一切抗日反汉奸卖国贼的统一战线,都应该向着一个目标前进,即是准备与组织大规模的抗日的民族革命

战争,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奸卖国贼,取得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

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共产党员首先应该在思想上实际上证明中国的有力抗日,揭破各种各样中国无力抗日的亡国奴的理论。有这样众多的人口,有这样广大的土地的中国,再加上誓死奋斗的勇气与决心,那抗日战争是必然会胜利的。

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共产党员在开展统一战线的斗争中应该把斗争提高到武装人民的阶段,提高到人民的武装自卫队伍的组织的阶段。没有这些人民的武装队伍,抗日战争是不能有力的开展并使之得到胜利的。

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共产党员应该把争取白军的官兵到抗日战线上来,当做在目前形势下比职工运动还要来得重要的任务。没有几百万白军官兵的参加,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将发生极大的困难。这就要使上层的统一战线与下层的统一战线同时并进与互相配合。只有当对方成为抗日友军或可能成为抗日友军时,我们才能不使下层统一战线走到反对那些压迫与阻止抗日运动的军阀的起义。

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共产党员应该推动一切抗日反汉奸卖国贼的斗争,走向抗日的人民政权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建立。没有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大规模的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展开是不可能的。

估计到中国革命形势的存在,苏维埃与红军的胜利,

以及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产生的主要条件是:(一)某些地区的地主资产阶级的政权已严重地瘫痪,因而无力阻止这种政权的建立;(二)最广大的群众已经奋起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奸卖国贼,但还未进至争取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三)一部分愿意抗日的当权者与广大群众公开要求同共产党、苏维埃与红军联合一致,抗日讨蒋^[97]。

显然的,这些条件正在迅速的成熟着。抗日反汉奸卖国贼的统一战线愈是扩大、愈是坚强有力,则这些条件的成熟愈是迅速,而国防政府、抗日联军的产生也必愈快。

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共产党领导下的苏维埃与红军应该以争取迅速对日直接作战,作为自己的当前的任务。只有苏维埃与红军在实际行动中表现他们是抗日的先锋队的时候,他们才能成为整个中国人民在解放斗争中的团结的中心。

最后,共产党员在准备与组织大规模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中,应该学习如何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与保卫中国的防御性口号下组织进攻,在进攻中知道如何巩固自己的阵地,如何组成源源不绝的后备军走上前进阵地,如何使先锋队与后续队密切的联系起来,而且同可能发生的保守主义或冒险主义做斗争。抗日战争不是几天几个月就能决定胜负的,这是一个持久战。在这中间,我们应该运用一切作战的方式,以对付顽强的敌人,以取得最后的胜利。

给刘少奇^[101]同志的信^{*}

(一九三六年八月九日)

× ×^[102]兄：

一、你七月十九日来信收到。

二、对于法西斯派^[103]的斗争,的确是一个极重要的问题,因为它在各方面、各党派中是最有力的敌人。因此,用一切方法瓦解它,争取在它影响下的一部分优秀分子到抗日战线上来,是一个极重要的工作。我们党要善于经过各种社会团体在某些抗日问题上公开向他们提议实行统一战线,如果他们赞成,则公开经过某种组织形式来进行工作。一切问题的决定要经过最民主的方式,使每一个法西斯分子看到他们的领导者所做的事,监督他们的领导者,使他们也参加到运动中来。这种统一战线不希望一下就是全市的,开始应该是局部的与地方的。我们过去忽视对于他们的思想斗争,现在应该转变。应该有系统的、坚持的揭破法西斯派的一切欺骗宣传,并利用他们的每一允诺(我们认为可以利用的),在求得兑

* 这封信收入本书时,对第七部分略有删节。

现中开展反对他们的斗争。我们同时要派人到他们的内部，在内部造成一种左倾的派别，使他们内部分化。同其他各党派的统一战线，亦应具体进行。陈铭枢^[104]派应很好的与之合作。

三、工人运动，应该从底下做起，不要一开始就建立什么上层机关。在工厂内主要的要从斗争中吸收积极分子入党，建立支部。有了几个支部之后，再派某一个同志或几个同志负责领导。领导者除给各支部的负责同志以一定的指导方针外，一切厂内的斗争，由厂内同志自己领导，不要从外面去干涉。领导者的任务是要加强对于下面工作同志的教育工作，使他们自己能够运用党的策略。由一般的区委领导产业支部的办法是不适当的。

工人运动中一切赤色小组应该取消，所有同志应到黄色工会、国民党工会中去活动。过去洛佐夫斯基^[105]的所谓争取公开的方针，实际上是错误的。其实问题不是争取公开，而是利用公开，实际上就是利用合法的意思。一切可利用的公开组织，都应利用。一切合法的条文，可以利用的，也应尽量利用。如新生活运动^[106]中某些口号，在工人斗争中也是可以利用的。

在工人运动中，同在别的运动中一样，要注意建立坚固的堡垒与保存有生力量，一切没有群众的少数人的斗争应坚决停止。所谓厂内活动，不应只是罢工的活动，凡在党的方针下的活动，都是厂内活动。在某种情形下，主要的活动方式不是罢工，而是文化工作（比如说！）。在工

人运动中,一切旧的关门主义的传统,应该克服。

四、在学生运动方面,我们觉得,近来在平津许多次的示威罢课的行动中,群众似乎在减少。党必须及时的估计到目前形势的特点,迅速转变斗争的方式。照我们看来,你们现在应该注意于学校内力量的巩固与宣传教育工作的开展。应使学生同志懂得,除了示威游行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工作。

对于学生运动,我们不应该交普通的区委去领导。这种区委是脱离学生的,他们决不会很好的领导学生运动。我们应该在省委下成立学生委员会,领导学校各支部的工作与学联的工作。这些负责人应该都是学生中的优秀分子。党的省委只要同他们中的一人接头,经常说清学运的指导方针就够了。一切具体工作,让他们自去办理,因为他们自己是学生运动的领导者,他们自己决定问题,一定更为适当。

对于学生中公开的领袖,务必使之继续进行公开活动。把公开活动的人都吸收到党内来做秘密工作的办法,应彻底纠正。这些公开的领袖,我们当然应吸收入党,但这些党员不应参加小组等党的组织的生活,不应受秘密党的“严格训练”,只要我们指定某一同志把党的方针同他们谈清楚就够了。对于他们,应以另一方法对待,不应采取平均主义。他们应该是秘密党员,是“特别党员”。(在军队方面更应如此。)

对文化界救国会^[107]的领导,只要我们同志同它的

领导机关中某些接近我们的领导同志共同协商,用共同同意的方式来解决,就行了。过去党团^[108]决定一切的方式,应该改变,或者不要党团的组织更好。对于文化工作的同志,我们更应该采取比较灵活的与机动的领导方式。

狭小的左联、社联等组织应该取消^[109]。党应该吸收其中许多分子入党,而所有这些人应该加入更广泛的学术团体或时事讨论会等中间去活动。许多人还可分配到其他方面去工作。

五、根据国际^[34]的意见及我们的经验,C Y 是应该取消的^[110]。象现在C Y 这样的组织,结果会变成秘密的狭隘的第二党式的组织的。我们现在要利用各种各样的公开的名称组织青年群众,北平的民族解放先锋队^[111]之类,实际上就是这类性质的组织。如果我们自己没有这类公开组织,我们可到其他已有的青年组织中去工作,争取其领导。党的方面只要有负责青年工作的同志就够了。青年组织的名义不一定到处一样,只要能公开活动,吸收广大青年群众就好了。等到各地有了这样的群众组织,再来组织上层的总的组织。

这种青年的群众组织,应在抗日的号召下面团结最广大的青年群众。这样的青年工作的领导干部,在现在学生运动中真是多得。问题是要拿完全新的策略去武装这些干部。

六、军队中特别是二十九军^[112]中的工作,现在特别

重要,我们应该用最大的力量去进行。应该从学生中或其他同志中调出同二十九军的官兵有关系的去同他们接近,坚持的向他们做抗日的宣传鼓动。特别要抓住官长中的工作,要有一定的人同一定的官长发生良好的关系。过去我们只做士兵工作不做官长工作的白军工作,是根本错误的。在工作的过程中,应从宣传进到组织。凡愿意加入党的白军官长应成为特别党员,便于他们的活动,使他们能够埋藏在内部。他们的活动方式应适合于他们自己所处的环境。在没有发动的必要以前,他们只能利用各种公开的活动,在部队中造成抗日的情绪与派别,准备在发动时,我们在他们内部有领导的人。这种力量平时不能随便使用,或使用时超出他们可能公开活动的范围而遭受破坏。在士兵中当然应依照兵运原则建立小组。这种小组也不要过多。

估计到目前的时局,白军工作现在特别重要。

七、你应该把在北方不能立脚的干部如老柯^[113]等调来苏区,吸收在斗争中表现坚定的干部,教育他们担负领导工作(“带徒弟”)。同时省委的组织方式与领导方式,依然应该进一步的改变。在省委下用不到组织很多的区委,只要几个产业的与职业的委员会,由他们负责独立的领导自己部门的工作。省委只要经常给以重要的指示,用不到天天接头,忙于事务。对外埠工作,也不要一开始就建立一个上层的机关,而应该从下面开始。工作的方面也不要太宽泛,似乎处处都要去做,处处都

要派人的样子,而只着重于几个地方。这些派出去的人,要有独立工作的能力与方法,不然,尽管派的多,结果一定是很少的。

华南我们已开始建立关系。你们派往华南工作的同志在那里很难工作,请你写信去把他调回,送到我处来。你处现在应该避免多头的领导,而着力于华北工作的建立与开展。

八、关于这些问题,我们拟发一正式文件。今天我只把大意告诉你,作为你的参考。

北方工作,我们认为自你去后,已经有了基本的转变。大家都很高兴。望继续努力,并经常把新的问题与新的经验告诉我们。

敬礼!

洛 八月九日

再:

- 一、请多派一些人来受训练;
- 二、特科工作由王兄^[114]面谈。

欢迎北上抗日的二、四方面军^{*}

(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五日)

向艰苦奋斗转战万里北上抗日的英勇的二、四方面军 ,致最热烈的兄弟的敬礼 !

二、四方面军为着抗日战争的伟大的任务 ,不避艰险 ,不畏困难 ,不怕牺牲 ,克服了种种天然障碍与敌人的截击 ,以大无畏的精神 ,直出甘南 ,现在已经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二、四方面军进入甘南 ,正当一方面军在西线上获得了伟大的胜利、完成了第一步战略计划的时候。一、二、四方面军的共同的胜利 ,使甘、宁、青的敌人手忙脚乱 ,惊慌失措。现在已经没有任何天然的或人为的障碍 ,能够阻止我们三个方面军的伟大的会合^[115]了。

这是红军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大会合 ,这是兴奋全国抗日民众及全世界劳苦大众的光荣的会合 ,这是具有全国与全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胜利的会合。这一会合 ,首先给予占掠华北、侵略内蒙的日本帝国主义以最响亮的有

* 本文根据一九四二年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编印的《军事文献》所载文本刊印 ,署名洛甫。

力的回答。日本强盗为着进一步侵略西北,隔断中国与苏联的联系,来实现灭亡全中国进攻苏联的毒计,现在正向着绥远^[116]、宁夏伸张腥污的血手。在日本指挥之下的李守信^[117]部队,已于八月初向绥东直接进攻^[118]。用坚决的抗战来斩断日本伸向内蒙的血手,以保卫内蒙、华北,收复东北失地,这已经成为全中国人民的一致的奋激的要求。抗日先锋的人民红军的一方面军,以其坚决抗日的主张和实际行动,已经使汉奸卖国贼焦急忧虑,三个方面军的会合的伟大力量,难道不使日本强盗和汉奸卖国贼胆战心惊吗?抗日红军的三大主力,同心一致的在全国民众面前宣誓道:“我们不怕一切牺牲,誓为抗日救国大业的胜利奋斗到底。”人民红军的三大主力,将永远站在抗日的最前线上,夺取日本强盗屠杀中国人民的刺刀,来为中华民族杀开一条自由解放的大道。

其次,三个主力的会合,一定要更进一步推进全中国的抗日统一战线的运动。“抗日则生,降日则死。”现在凡有血气有良心的中国人,没有不痛切的感觉到坚决抗日是中国人民唯一的出路。我们党所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119],显然已经成为全国广大民众心坎中所激发出来的呼声。抗日的群众的怒潮,不仅影响了国民党内的一派(两广)公开揭起抗日的大旗(广东虽受挫折,广西尚在继续奋斗)^[120],而且还影响着许多不愿做亡国奴的将士,倾向于抗日。以共产党与红军为中心的抗日统一战线的运动,正以急速的步伐向前开

展着，推广着。正因为如此，所以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合及其力量的巨大的加强，不仅兴奋着全国民众的抗日斗争，不仅巩固着抗日联合战线，而且更推动着现在动摇中的政派与白军趋于抗日联合战线的道路。三大主力会合，无疑的更能使我们抗日统一战线的工作上获得新的成功与胜利。

最后，这一会合，正是强有力的保卫着西北并促进西北抗日大局面的实现。由于红一方面军在西北战线所获得的胜利，由于我们抗日联合战线及蒙民、回民的工作的成绩，我们已经为西北抗日大联合^[121]造成了好些必要的条件。二、四方面军的到达西北，更有利于促成西北大联合的具体实现。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奸卖国贼正在焦急的企图消灭西北抗日力量，可是我们三大主力红军会合着的铁拳，是要给日本帝国主义汉奸卖国贼的这一狠毒的企图以当头打击的。我们要扩大联合抗日战线，联合回、蒙少数民族，要实际联合外蒙和苏联，来实现西北抗日的大局面。西北抗日大联合是全国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71]的枢纽，是大规模民族革命战争的枢纽，而我们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合，足可以说是西北抗日大联合的枢纽。英勇的二、四方面军，增加到西北抗日前线上来，这是如何伟大的啊！这个日子，一定不会很远的了！那时候，在我们西北会建立起广大的抗日根据地，而高高的飘扬起“西北抗日大联合”光荣的义旗。

全苏区的抗日人们：

热烈欢迎北上抗日的二、四方面军！
人民红军一、二、四方面军铁的团结万岁！
抗日民族革命战争胜利万岁！

中共中央关于抗日 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 民主共和国的决议*

(一九三六年九月十七日)

一、日本帝国主义自去年策动华北独立^[122]以来,对于中国的侵略没有一刻停止的,不论它侵略的方法与方式怎样随具体情况的变化而变比,然而它并吞全中国的基本政策,是始终不变的。在华北进兵之后,高唱着的“经济提携”^[123],实际上不过是以经济的侵掠方法巩固已得的阵地,并给新的进攻准备基础。平津与察北的增兵^[124],绥东的进攻^[118],成都、北海、汉口、上海、丰台等地的挑衅^[125],表示出日寇的新侵略行动又将开始,民族危机,较之过去是更加严重了。这指出:保卫华北、保卫西北、保卫中国、收复东北失地、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的民族革命战争的任务,更加严重的放到革命政党与全民族的身上了。

二、一年来全中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广大发展,抗日统

* 这是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决议。

一战线开始发动,已经给了日寇侵略计划以相当的打击,暂时的阻止了日寇建立华北国与建立“防共统一战线”^[126]的实施,这是中国人民一年来抗日救亡运动的胜利。然而由于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还不够广泛,它的力量还不够雄伟,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有组织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现时还仅在开始的阶段。最大的政党——国民党及其领导与影响下的军队还没有参加这个战线,国民党的政策还没有基本的转变,因之,民族革命战争还没有能够发动,以致我们不但没有能够停止日寇的继续侵略与保持中国领土主权的再不受损害,而且日寇还巩固了它在华北的地位,获得了对于中国领土主权的新的侵占,并准备新的大举进攻。这证明:日本帝国主义是能够战胜的,但是需要全中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共同行动与艰苦卓绝的奋斗。

三、在日本帝国主义不断进攻之下,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主要的表现在全国工农小资产阶级广大群众抗日救亡运动的继续增长,中国共产党苏维埃红军抗日救国主张的得到全国广大人民的赞助与全国主力红军的集中于西北抗日前进阵地,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开始转向抗日战线。国民党军队官兵中广大成分抗日情绪的增长,和在这些基础上产生的国民党及其南京政府的分化与动摇。国民党南京政府内外政策的摇摆不定,其言行的自相矛盾,与其各派间关于抗日问题上的争论,明显的表示出它现在是在动摇

的中间。在日寇继续进攻、抗日救亡运动继续发展、国际形势新的变动等条件之下,国民党南京政府有缩小以至结束其动摇地位,而转向参加抗日运动的可能。

四、为着集中全国力量去抵抗日寇的侵掠,驱逐日寇出中国,我们不仅要收集更广泛的民众的力量和一切真正革命的觉悟的纯洁的分子,而且要争取统治阶层中一切可能的部分到抗日斗争中来,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更加扩大起来,更加增强自己的阵容与力量。推动国民党南京政府及其军队参加抗日战争,是实行全国性大规模的严重的抗日武装斗争之必要条件。但这绝对不应放松对于国民党南京政府一切违反民族利益的错误政策的严厉的批评与斗争。只有这样,才能使国民党南京政府内部的抗日倾向日渐发展,扩大抗日分子的影响,克服其本身的动摇,战胜亲日派,而走向抗日救国的大道。中央必须着重指出:共产党在为实现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斗争中,不但对于统一战线之公开的或秘密的敌人应该进行严厉的斗争。而且对于口头上赞成而实际上消极的假抗日分子,以及各种各样的同盟者,应该保持批评的完全自由。同时,中国共产党赞助一切真正的抗日战争之发动,即使这种发动是部分的。但是主要的,应用尽一切方法与力量,最迅速的促进大规模的全国性的真正对日武装抗战。为此目的,共产党应继续坚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119],反对一切在民族危亡面前自相残杀的内战。

五、中央认为在目前形势之下,有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国口号的必要,因为这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来保障中国领土完整和预防中国人民遭受亡国灭种的惨祸的最好方法,而且这也是从广大人民的民主要求产生出来的最适当的统一战线的口号。民主共和国是较之一部分领土上的苏维埃制度在地域上更普及的民主,较之全中国主要地区上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大大进步的政治制度,因此便更能保障抗日战争的普遍发动与彻底胜利。同时,民主共和国不但能够使全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参加到政治生活中来,提高他们的觉悟程度与组织力量,而且也给中国无产阶级及其首领共产党为着将来的社会主义的胜利而斗争以自由活动的舞台。因此,中国共产党宣布积极赞助民主共和国运动。并且宣布:民主共和国在全中国建立、依据普选权的国会实行召集之时,苏维埃区域即将成为它的一个组成部分,苏区人民将选派代表参加国会,并将在苏区内完成同样的民主制度。

六、中央着重指出:只有继续开展全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扩大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加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政治领导作用,极大地巩固苏维埃与红军,同一切丧权辱国及削弱民族统一战线力量的言论行动进行坚决的斗争,我们才能推动国民党南京政府走向抗日,才能给民主共和国的实现准备前提。没有艰苦的持久的斗争。没有全中国人民的发动与革命的高涨,民主共和国的实现是不可能的。中

国共产党在为民主共和国而斗争的过程中，应该使这个民主共和国从实行本党所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127]开始，一直到中国民主资产阶级革命的基本任务彻底的完成。

七、去年十二月中央政治决议^[128]上所确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大半年来，党在执行这一总路线下，得到了许多成绩，主要的在于苏维埃红军的力量是加强了，党在全国的政治影响是扩大了，向各党各派各界各军进行统一战线的工作是进步了，这些成绩应当成为今后工作的有利基础。但是许多党的组织极不善于具体的运用统一战线的策略，对于每一个人、每一个派别、每一个社会团体、每一个武装队伍、每一阶级与阶层，常常不善于根据它们不同的情况，不同的需要与要求，在抗日救国的总方针下，同它们接洽、协商、谈判，以求订立各种地方的、局部的、暂时的或长久的、成文的或口头的具体实际的行动纲领，并在为着实现这些纲领的共同斗争中，引导推动与组织它们走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高形式——全国抗日救国代表会议（或国防会议），国防政府，抗日联军，以至民主共和国。我们许多党的组织不善于这样做，而仅仅满足于一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满足于少数先进分子的活动，以抽象的刻板的与机械的方法方式，去对付各个具体的问题。同时在统一战线一时不能建立的场合，却又表现出“共产党员以共产主义精神来教育群众、动员群众与组织群众的独

立工作”^[129]之放松或不足。这些弱点,是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直到今天还没有成为千千万万抗日大众实际参加的主观上的重要原因。

八、中央认为必须及时纠正那种以为阶级斗争的发动会妨碍民族统一战线的观点。民族革命的胜利,决不是少数上层分子所能完成的。不吸收成千百万工人农民与小资产阶级群众参加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就不能形成抗日救国的雄厚力量,就不能推动与逼迫动摇的游移的上层分子与当权者走向真正的抗日的道路,就不能实现民主共和国。而领导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群众的日常经济政治的斗争,解决他们迫切的生活要求,是组织他们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要关键。但在领导这种日常经济政治的斗争中,共产党员要同样的善于运用统一战线的策略,吸收最广大的群众到斗争中来。并根据于他们的觉悟程度与组织力量,把群众的日常斗争提到更高的阶段,使这种斗争成为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继续扩大、继续发展与继续前进的力量,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实的基础。

九、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实现民主共和国的斗争过程中,绝对不应该削弱苏维埃红军的力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71],是苏维埃红军在一定纲领上同其他政权及武装力量所成立的政治军事协定,但苏维埃红军并不与其他政权及武装力量相混合。可以在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统一指挥之下,但并不取

消苏维埃红军组织上与领导上的独立性。须充分注意于红军的扩大与巩固,那种不经过选择的允许学生及其他军队的旧军官加入红军的意见是错误的,因为这样足以破坏红军的统一和团结。必须充分注意加强苏维埃的领导成分,那种允许资产阶级参加苏区政治管理的意见也是错误的,因为他们可以从内部来破坏苏维埃机关。即在民主共和国建立之后,共产党也决不放弃对于苏区人民与原有武装力量的绝对的领导,相反的,党在坚决领导全中国人民群众的抗日斗争与日常经济政治斗争中,要坚持着扩大与巩固自己的政治的与军事的力量,保障抗日战争与民主共和国之彻底的胜利,争取社会主义前途的实现。

十、扩大与巩固共产党,保障共产党政治上组织上的完全独立性和内部的团结一致性,是使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与民主共和国得到彻底胜利的最基本的条件。因此在苏区内特别是在非苏区内,有系统的征收党员是非常必要的。但必须避免大批入党的办法,而只吸收经过考察的工人农民与革命知识分子入党。在这个意义上,去年中央十二月决议中“一切愿意为着共产党的主张而奋斗的人,不问他的社会出身如何,都可以加入共产党”与“党不怕某些投机分子侵入”的意见是不正确的。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必须采取实际办法培养党的工作干部,因为不论在苏区与非苏区,在彻底实现党的政治路线上,有独立工作能力的优秀干部,有着决定一切的意义。动员成千成万的

共产党员到一切无组织与有组织的群众中去争取千百万的群众在自己的周围,正确的建立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联系,是中国共产党在为着完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政治任务面前一刻不可放松的任务。在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为民主共和国而斗争的过程中,对于忽视党的政治上与组织上的独立性,忽视巩固苏维埃与红军,放松对于广大下层群众的日常经济政治斗争的领导,对同盟者批评不够等等右的机会主义倾向,必须及时的给以纠正。但在目前说来,“左”的关门主义倾向,依然是妨碍彻底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主要的危险。正确的党内思想斗争的发展,将是完成党的一切政治任务的有力武器。

关于白区工作中的一些问题^{*}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八日)

论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

共产党有着它自己独立的组织,但这并不是说,共产党员应该同群众脱离关系而生活在社会之外。相反的,共产党员应该生活在社会中间,在群众中起核心的领导作用。

在目前形势之下,在国民党区域的共产党的组织是应该秘密的。但这并不是说,共产党员都要秘密起来,离开一切公开的活动。相反的,共产党员除参加党的秘密组织外,其余的活动均应该公开。

有自己独立的秘密的组织,而同时又需要在群众中进行公开的活动,这个课题必须正确的解决,方才说得上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正确联系,方才使共产党员能够完成自己的任务。

要正确的解决这一课题,必须清楚的分别党内工作

^{*} 本文曾以小册子印行,署名洛甫。全文共四节,收入本书的是第一、二两节。

方法与群众工作方法的根本不同。

党内工作的对象是最少数的最先进的共产党员。关于党的任务与策略等问题,只要向每一个同志解释清楚,就够了。这里宣传说服的方法,占主要的地位。而群众工作中的对象则是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水平极不相同的千百万广大群众。要提高他们的觉悟程度,使他们接受党所提出的主张与口号,单靠宣传说服的方法,是不够的。这里需要群众自身的政治经验。因此,党内工作方法要简单得多,率直得多,容易得多,而群众工作方法要复杂得多,曲折得多,变幻得多。因此,党内工作,现在应该而且也是可以秘密的,而群众工作的方法,却无论如何是必须公开的。

共产党员参加到群众组织中去工作,他必须以群众之一员的面目出现。如果他在群众中挂出一块共产党员的招牌,那他就会立刻被敌人捉去坐牢杀头的。因此在共产党内的工作方法,在群众中是不能拿出来运用的。在共产党内所讲的话,在群众中是不能赤裸裸的搬出来讲的。我们的一切行动都需要群众化,适合于当时当地所处的环境。比如我所参加的群众团体,是国民党的群众团体,在那里开会时照例要背诵《总理遗嘱》^[130],那就不应立异,说,共产党员决不能背诵《总理遗嘱》。相反的,我完全可以同他们一起背诵。比如,我参加了哥老会^[131],那里有许多的宗教仪式,那我也不能立异,说,共产党员决不做迷信仪式。相反的,我完全可以同他们一样举行宗教

仪式。总之,我的行动都需要同群众一样。我决不要因为在这类问题上暴露出自己是共产党员,使我不能立足,白白牺牲送命。

但这并不是说,共产党员一到群众中去就完全变成一个普通群众了。不是的,我依然是共产党员。因为我仍旧要在群众中进行共产党的活动,以提高群众的觉悟程度与组织力量,使群众最后接受共产党的主张与口号。要达到这个目的,我必须暂时抛弃党内工作的方法,而采用群众工作的方法,我暂时不讲群众今天所不了解的或不赞成的话,而只讲群众所了解与拥护的话。要达到这个目的,我必须细心的分析我所处的环境,深刻的了解群众心坎中所要求的与希望的。然后我根据当时当地群众的觉悟程度与斗争能力,提出大多数群众所要求的与希望的口号,采取群众所拥护的斗争方法与手段。这样,群众不但不会把我看做“外面来的捣乱分子”,而且反会把我看做他们自己的人,他们的领袖。这里我完全不是以共产党员的面目出现,而是以群众的一分子、群众的领袖的面目出现。我所代表的是群众的血中血、肉中肉,我与群众是不能分割的。

我这样在领导群众的斗争中,我决不要因为群众今天还没有接受党的主张与口号而着急。如果在斗争中群众还是宣言拥护国民党反对共产党,我暂时可不必同他们争辩,因为我相信在斗争的过程中,群众根据于他们自己的政治经验会了解国民党是反对他们的利益,而共产

党是拥护他们的利益的。在开会时,群众认为有必要读《总理遗嘱》或挂一下青天白日旗,我们是完全不用去反对的。问题是:只要群众真正开始为了他们自己的切身利益而参加斗争时,他们就会在斗争中走向共产党所指示的道路上来。我虽然是领导着群众,然而我依然是群众中的一员,我决不提出群众现在还不能了解与不能接受的主张。如果我能够这样做,虽是统治阶级还可能利用共产党的罪名来逮捕我,但是,因为我是群众中的领袖,所以群众一定会起来进行反对敌人逮捕我的斗争。他们拥护我,不是因为我是“共产党”,而是因为我是他们的“头子”。

这种例子我可以举得很多。在目前抗日救亡运动中,共产党员如果坚持抗日救亡的立场,进行公开的活动,那统治阶级虽是要用“共产党”的罪名来逮捕我,但在群众前面我被逮捕却是因为“爱国有罪”的关系。这样,一切抗日的人民都会反对这种逮捕,而使斗争继续前进。

群众的力量是我党的最后依靠。为了民族的与民众的利益而奋斗,而牺牲,这是共产党员的本职。共产党员决不怕这样光荣的牺牲。然而,由于我们自己的错误与幼稚,由于我们不懂得如何在群众中工作的方法,而遭受逮捕与屠杀,那是可惜的与不值得的。这种牺牲应该竭力避免。

那末,我这样不公开我共产党员的面目,是否会失去了共产党员的立场呢?完全不会。我这样做,我正是为了

要完成党的政治任务。共产党的面目不是在公开说我是共产党员,让敌人把我捉去,而是坚持的在群众中进行争取群众的工作。对于党的公开宣言、传单、口号,共产党员有散发的责任,但这种散发的方式方法,是应该完全秘密的。

然而,这是不是说,共产党员必须成为群众的领袖,在群众中露头角,以至必须最先受到敌人的打击呢?也不尽然。照一般的规律,因为共产党员是群众中最先进的分子,而且又是最活动的分子,所以共产党员经常成为群众的领袖,因此在长期的白色恐怖之下,共产党员也牺牲的最多。但这种情形也是可以改变的,共产党员虽是必须在群众中起领导作用,然而他不一定把自己放在领袖的位置。如果我所提出的主张与口号,的确是大多数群众的主张与口号,那我可以担保,一定会有不少积极分子起来为了这种主张与口号而斗争的。这样的积极分子在群众中是非常多的。我应该推举这些积极分子起来做群众领袖,而我只站在帮助的与推动的地位。这并不是因为我怕死,怕负责,而主要的是因为我们需要不断提拔新的群众领袖,培养新的干部,使他们也承担起领导群众的任务,同时这样做也可以更好的保存党在群众中的核心,使党的组织,不论在任何困难的条件下都能继续存在。特别是最负责的同志不要轻易的暴露,以免遭受到敌人的打击。

无疑的,共产党员是应该过秘密党的组织生活的,没

有这种生活就不能清楚了解与完成党的任务与策略,就不能经常得到党的指导,就不能培养自己成为更好的共产党员。但除了党的生活以外,除极少数上层领导分子根本无法公开,不能不专任党内秘密工作的以外,最大多数的党员,都应该在群众中间公开活动。只有这样才能使上层领导的秘密机关缩小到最低限度,减少无数靠党生活的同志,而主要的可以使党在群众中有坚固不可拔的基础。这样,共产党员除了每星期开次把秘密会议,花上一两点钟时间外,其余就都在群众中间。就是少数秘密机关也能够埋藏在社会内部,使敌人无法破坏。这样敌人破坏党的组织的机会就会减少到最低限度,而群众工作的效能却大大增强了。也只有这样,才能把过去头重脚轻、秘密机关内塞满干部,而公开工作却无人去做的不正常现象,加以彻底的改变。

也只有严格分别党内工作方法与群众工作方法的不同,而且遵守这种不同的规律时,我们才能使许多公开的群众团体继续存在与发展,我们才能创造许多公开的群众团体。过去曾经有许多群众团体,由于我们的同志把党的基本主张与口号赤裸裸的拿到那里去发表,把党的工作方法任意搬到那里去运用,甚至把党的组织混入群众团体中去,结果使这许多群众团体完全坍台,或者变成了少数先进分子的狭小的第二党的组织。

我们现在必须把党的组织与群众团体的界限划分得清清楚楚。群众团体的一切活动应该完全公开(至少半公

开)。必须使每一共产党员了解,共产党的组织是应该而且可以秘密存在的,但广大的群众组织是不能长久秘密存在的。凡是群众组织变成秘密时,结果一定会变成为少数先进分子的组织。这种例子,是不胜其多的。

比如现在一切抗日救国的群众团体都应该完全采取公开的活动方式,内部的一切生活完全要采取民主制度,一切决定都应经过大家讨论通过,丝毫用不到少数人的包办。“光明正大”、“理直气壮”,这是每一个群众团体所应该有的特点,在里面活动的共产党员,都应该恪守这个原则。

一切公开活动的群众团体,不要惧怕合法的外形,不要惧怕同某些有权力的人们发生关系。共产党员在某些条件之下,甚至可以拿黄色工会的外形去进行保护工人利益的工会工作,拿民团^[132]的形式去进行武装农民的工作。

许多共产党起领导作用的群众团体,共产党决不应该向外面公布说,某某团体是我们领导的,这种公布无异是向敌人告密。在那里的共产党员,决不要因为他们在那里已经起了领导作用,就以此自骄自满,采取命令主义的工作方式。他们应该很谨慎的虚心的进行自己的工作,一切自己的提议应该经过一定的民主的组织方式,而且尽量的经过非党的群众领袖去做,尽量提高其中优秀分子的地位与威信。

我们常常在共产党内讨论如何争取领导权问题,这

种讨论丝毫也不应该去发表。这是党内的秘密,是党所要达到的目的,不是要到群众中去议论的题目。某部分群众或某个群众团体是否在党的领导之下,不是依靠于我们的宣言,而是依靠于我们的实际工作。党是否取得了对于这个团体的领导,要看那里的群众是否接受了党所提出的主张与口号,依照党的指示而进行工作。我们要做到那些群众团体事实上在我们领导之下,而外面却不知道他们是在我们领导之下,以至团体里面的群众也不必知道他们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这对于我们没有丝毫的损失,相反的,这却有许多的好处。

许多问题在共产党里要说的,要讨论的,或已经决定了的,在群众团体里则是我们只要做而不要讲的。把自己的一切秘密告诉人家,使人家戒备起来,那种幼稚的愚蠢的办法,现在应该终结了吧。

党必须吸收工人中的、农民中的、革命知识分子中的群众领袖入党,但这种领袖入党后,仍然要保持他们过去的公开地位,决不要因为加入党而变为不能公开分子。研究过去许多群众领袖加入共产党后即不能公开活动的原因,是由于我们往往要他们完成过高的任务,要他们做不适合于他们地位的工作。结果,使敌人知道他们是共产党,使他们不能继续立足,继续公开工作。好的分子,则抛弃一切,到党内过秘密工作的生活;有的则表示不如意而消极,以至最后又离开党;有的则很快的被捕牺牲了。

必须用尽一切方法,发挥群众领袖公开活动的才能,给他们以能够胜任的任务,给他们想出许多领导群众的具体办法。如果认为必要,这样的分子,不一定急于吸收他们加入党,即使在他们自己屡次要求的条件之下。党的周围应该有许多这样能够公开活动的群众领袖,同他们建立很好的同志关系,给他们一定的指示,但决不要过分的干涉他们自由,相反的,应尽量发挥他们的创造性与天才。

为了能够公开的活动,共产党员应该在各种现存的与任何反动的有群众的组织中去进行工作,去同那里的群众发生联系,拥护他们切身的利益,争取对他们的领导。

现在已经是时候了。共产党员应该决然取消那些最少数的先进分子的秘密的群众组织,如象共产主义青年团、赤色工会、社联、左联等团体^[133],把这些分子放到许多更广大的公开与半公开的群众团体中去,不论这些团体是在什么反动分子领导之下,或者根据各地的具体环境,使他们去创造能够公开的群众团体,首先是抗日救国的团体。那些叠床架屋的狭小的秘密组织只有使党脱离群众,使他们从这一秘密机关到那一秘密机关,从这一秘密会议到那一秘密会议,给敌人以无数破坏的机会。

可以供我们活动的公开组织为数是很多的。除现在许多救国团体外,还有许多公开团体。举例来说,如象工人中的黄色工会、帮口,农民中各地方的民团保甲,国民

党的军队,各种封建的秘密结社(如哥老会、清洪帮等),各种文化教育团体(如教育会、学生会、体育会、戏剧团体等)、青年会^[134]、童子军^[135]、各地同乡会等。只要有群众的团体,我们就应该进去工作。

就是在反动的群众组织中,共产党员也不要惧怕取得领导的位置。相反的,那里的共产党组织应该指定适当的同志,帮助他去取得这类的地位。但这类位置的取得,一般应在群众拥戴之下,而且是为了便于我们的工作。比如在黄色工会中,我们是让最坏的工贼盘踞在里面反对工人利益为有利呢?还是把代表工人利益的分子推举上去代替他,更为有利呢?当然是后者有利,不是前者。如果这个黄色工会中的工作人员都改变了成分,那这个黄色工会虽是名义上不变,然而实际上不是变成工人自己的工会了吗?其他许多群众团体都是如此,在军队民团保甲中,虽是情况有很大不同,使用方法要更为曲折,然而这种位置的取得,还是可能的。

对于这种取得领导地位的同志,当地党方面应该给以经常的监督,另一方面应该绝对避免给他以不能执行的过高的任务。这种任务的执行或提出,立刻会使敌人发现他的真相而使他垮台,使他牺牲。当地党应该帮助他维持已得的地位,给他解决困难,使他能够敷衍上级,而同时能够取得群众的信赖,掩护党在群众中的工作。当地党千万不要因为那里的领导者是自己的同志而为所欲为,好象这里已经是革命胜利了的地方一样。如果这样做,必

然立刻要遭受失败。这类教训过去也是很多的。应该清楚了解,我们的同志取得的地位,是在敌人统治之下取得的,是在维持敌人的统治之下取得的,也是在敌人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的情形之下取得的,而不是推翻了敌人的政权取得的,也不是因为敌人知道他是共产党员而取得的。如果认为今天还没有到暴动起来以推翻当地旧政权的时候,那我们只能满足于在敌人统治之下所能达到的最高限度,而不必希望过高的超过这一限度的东西。这在军队中尤为重要。

为了使得这类同志能够维持已经取得的地位,当地党不应该使一般同志知道他是同志,以防止泄漏秘密,前功尽弃,而只由最负责的一个同志与之接头。这类同志一般的不应该参加支部生活。他的一切活动,应该完全公开。

有些地方,为了求得隐蔽,不使敌人注意,我们的党除在群众中进行公开活动外,不做党的秘密活动,比如散发党的宣言、传单、标语等。

只有这样看到党内工作方法与群众工作方法的根本不同,才能把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划分清楚,不相混淆,并且把它们正确的联系起来。不然,名义上是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的联系,而实际上是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的混淆,把应该秘密的拿去公开,应该公开的拿来秘密,结果使秘密组织与公开组织都坍台破坏,使党的工作受到极大的损失。

领导群众斗争的几个原则

党目前的战略方针是在组成千千万万中国抗日人民的革命军队,率领他们进入抗日的革命阵地,选择有利时机,从防御转向进攻,战胜日寇与汉奸卖国贼,以争取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

但是要组成这样强大的革命军队,要率领它进入革命阵地,没有党的正确领导,没有持久的与艰苦的群众工作是不可能的。

训练与教育共产党员,使他们懂得领导群众斗争的革命原则,是完成这一伟大任务的重要关键。

象前面所讲过的,领导群众斗争的首先的任务,就是必须清楚的了解当时当地的具体环境,群众的迫切要求,他们的觉悟程度与斗争能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提出为群众所拥护的适当的要求与口号,找出适当的斗争方法与手段。

但这只是准备斗争的第一步。在我们提出要求与口号之后,我们即应利用宣传与鼓动的方法使我们的要求与口号在群众中普遍起来,使我们的要求与口号成为群众自己的要求与口号,同时在这一过程中使群众了解,应该用何种斗争的方法与手段以达到自己的要求,实现自己的口号,并且开始为准备这种斗争进行具体的组织工作。

这种斗争的准备工作,是为了争取斗争胜利的必要条件。没有这种准备工作而发动斗争,结果必然是步伐混乱,此起彼落,被敌人各个击破。这即在一个工厂的罢工,一个地方的示威游行,都是如此。

但有了准备之后,是否应立即发动斗争呢?这里要注意发动时机的选择。这种时机,不但要在群众斗争情绪高涨的时候,而且也要在其他条件最有利的时候。恰当的发动时机的选择,对于斗争的能否取得胜利,有重要的意义。

如果斗争发动之后,形势的发展对于我们非常有利,那我们必须力求满足原来的要求,取得胜利的结果。比如,罢工发动之后,求得工人要求的全部满足。

在斗争胜利之后,如何利用胜利的形势开展更大的斗争,争取更大的胜利的问题,必须依据当时具体的情况来决定。

如果因为胜利冲昏了头脑,不顾当时任何的具体情形而继续“扩大与深入斗争”时,那结果常常会遭受到敌人的打击,而使已得的胜利也完全失去。这样的教训,对于我们是太多了。罢工胜利之后,不知道胜利的结束罢工而继续“扩大与深入”,结果不但已得的胜利完全失去,而且原来在那一工厂中的党的组织全部垮台,使许多斗争中的积极分子不能立脚而脱离生产,许多被捕牺牲。这是胜利后的冒险主义。

如果由于斗争的胜利,群众斗争的情绪大大提高,敌

人更加张惶失措,各方面形势均非常有利于斗争的继续开展,那我们应该大胆的组织进攻,取得更多的胜利。比如,工人由于罢工斗争的胜利,大大地提高了他们参加抗日斗争的积极性,那无疑的,我们应该领导他们继续参加抗日的斗争。或者由于一厂罢工的胜利,使我们有组织几厂同盟罢工的胜利的可能,那无疑的,我们应该组织这类的同盟罢工。或者由于一次示威运动的胜利,而广大群众要求组织更大的示威游行,那无疑的,我们应该组织这类的示威游行。特别在目前形势开展的情形之下,斗争的发展,常常以很快的速度前进,稍一迟缓犹豫,即有变成群众尾巴的危险。如果不管形势如何顺利,在一次胜利后而满足于已得的一点胜利,这是胜利后的尾巴主义或保守主义。

不论是胜利后的冒险主义或是保守主义,对于我们都是危险的。

但如果斗争发动之后,形势的发展不利于我们时,那我们即应该机动行事,比如减低工人原来的要求,以取得部分的胜利。如果就是这种胜利也是不可能时,那即应该实行暂时的退却,结束斗争,以保存实力。坚持没有胜利可能的斗争,结果一定会遭受失败。

在各种情况之下,斗争的形式可以从请愿、示威、包围、抗议、罢工以至武装斗争的发动等。斗争的性质可以从防御、反攻以至进攻。共产党员必须要懂得在环境改变时迅速改变斗争的方式与方法,依照斗争发展的程度从

防御转入反攻与进攻。这是困难的任务,然而这个问题必须解决。

但不论在何种情况之下,党都要善于保存与巩固自己的力量。在胜利之后,应很好的巩固已得胜利,利用胜利以提高群众的自信心与积极性,扩大群众自己的组织,巩固党的基础。即在失败之后,也应很好的组织退却,隐蔽自己的力量,不使遭受损失。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积聚雄厚的力量,以准备将要到来的决胜负的斗争。

对于自发的斗争,过去那种跟着每一自发的斗争而转移工作方向与注意力、从外面调集力量去取得对于每一自发斗争的领导的做法,是应该抛弃的。在全中国,这种自发的斗争不知道有好多,我们的注意力决不能随着自发斗争的方向而转移,我们也没有力量去领导每一个自发的斗争。我们应该有自己的一定的工作方向与对象。如果这个自发的斗争正发生在那个我所要建立工作基础的地方,那我当然即应利用机会去活动,以便在这次斗争中去开辟我的工作。如果那个自发斗争同我的目标不相合,那我只有暂时听之而已。

从外面临时调动力量去领导自发斗争的方法,是很危险的。第一,派去的人对于内部的情形是不了解的,他很难正确的领导斗争。第二,派去的人是外来的,他很容易为侦探走狗所认识而被捕牺牲,并连带到许多其他组织的破坏。第三,这种做法使党的组织天天忙于应付,疲于奔命,而缺乏一定的方针,失去工作的中心。

但常常有这样自发的斗争,虽是那里有我们的核心,但斗争却超过我们的领导而自动爆发了。在这种情形之下,党的同志一般的应该参加斗争,尽可能的推动斗争走向胜利的方向。如果当时情形证明无胜利的把握时,党的同志在一般的参加斗争的过程中,要避免暴露自己,避免受到敌人的打击,而使已有的组织坍台。

至于每当纪念节不顾具体环境必须“纪念”,必须发传单,写标语,出刊物,到马路上去喊口号,组织游行集会等等,这种传统是必须废止的。但这里需要废止的是那种不顾具体环境而组织的“纪念节”活动,不是一切纪念节。如果形势非常有利,利用纪念节有动员广大群众到马路上的可能时,那我们应该组织这类的纪念节活动。比如正在日本进攻中国、形势紧急、群众愤激的情形之下,“一二八”与“九一八”这种纪念节是最能动员群众的。在这种具体情形下,党应该组织这种纪念节活动。但如果到那一天,敌人方面戒备严密并决心制造流血而我们动员的群众依然不够广泛时,如果举行集会或示威有给先锋队遭受严重打击的可能时,那我们仍应该停止这类的集会或游行。所以,问题不是一般地要不要纪念节,而是在何种条件之下利用纪念节,以动员群众。

在斗争中间,要注意在某种环境下,斗争所能达到的最高限度。比如过去在上海等地所要“争取公开”的一些赤色工会,纲领上写着“打倒国民党”、“拥护苏维埃与红军”等要求。这种赤色工会,显然只有在苏维埃革命胜利

之后,才有公开存在的可能,而在国民党统治之下是无法“争取公开”的。如果一定要“争取公开”,那这种争取必然是一种冒险的行为。

在目前形势之下,要使抗日救国运动成为公开的运动,那在抗日救国团体的纲领上,决不能写上“打倒卖国的南京政府”的要求,而只能写上“要求南京政府出兵抗日”、“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要求抗日救国的民主权利”这类口号。这些口号是在目前这种形势下所能做到的最高限度。

当然这种最高限度,只是在某种具体的形势下的最高限度,而不是任何形势下的最高限度。如果形势变化,“打倒卖国党”成为千千万万抗日群众的要求时,则打倒的口号的提出,就成为正确的了。

在领导群众斗争中,所谓部分的口号与基本的口号的联系,是指在一定的斗争过程中,把部分的口号提高到基本的口号,不是一开始就把部分口号与基本口号“联系起来”(即并提出来)。这种联系,是完全错误的。比如某地农民开始了反对某种苛捐的斗争、要求取消某种苛捐时,党的任务首先是在领导这种斗争,扩大这种斗争,组织群众的力量,巩固党的领导作用,依照斗争形势的发展,再来决定何种口号的提出为适当,不是一开始就把“反对某某捐”的口号同“取消一切苛捐杂税”的口号,或进一步同“打倒抽收苛捐杂税的某某军阀”的口号联系起来。这种联系只会吓退群众,使斗争在开始时即遭受到敌

人的镇压而失败。

至于共产党在发表某种对于时局的宣言时,当然要提出对于时局的基本主张,把群众当前的痛苦,同斗争的最后目标联系起来。这种联系是必要的。但这是共产党的宣言,这种党的工作方法,拿到群众斗争去用,是完全错误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在第一节中已经说明了。

在领导群众斗争中,任何时候不要提出过早的、群众还没有了解的口号,不要把这种口号同他们迫切要求的口号联系起来。

而且在一定的形势下,斗争口号的提高也有它的最高限度。比如上海某一工厂中,我们党掌握着绝对领导,以至我们如果提出组织苏维埃时,群众也会拥护,但整个上海的形势,还没有达到可以组织苏维埃的程度,那这种口号依然不能提出。如果我们同志一时狂热而实行这种尝试时,他一定会遭受严重的失败,使全部工作坍台。在这类工厂中,我们还是应该遵守最高限度的原则,依照一般的条件进行工作。譬如党的组织依然应该完全秘密起来,不要公开出来,以防随时可能的袭击。

必须纠正那种以为共产党员除了领导斗争(如罢工示威等)以外就无事可做的观点。共产党员领导群众斗争的目的,不是为了斗争而斗争,而是为了要在斗争中提高群众的觉悟程度与斗争力量,加强共产党对于他们的领导作用,以准备同敌人进行最后的决战以解放自己。因此一切其他工作,凡是能够帮助达到这个基本目的的,共产

党员都是要去做。如文化、教育、互助、合作以及各种团体结社方面的工作,我们都应该参加进去,认真的工作,以具体揭破剥削者的罪恶,提高群众的觉悟程度,加强他们的组织能力与集体生活等。共产党也只有在这些工作中,更能深切的了解群众,体验他们的痛苦和要求,同他们发生最亲切的联系,更能正确的领导他们的斗争。我们过去对于这种工作的忽视,是错误的。

在领导群众中,还有一个基本原则,就是集中力量消灭当前的主要敌人。这就是要善于取得各种同盟者,不论是暂时的也好,动摇的也好。由于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各地环境的非常复杂,在各种各样派别领导之下,所发生的各种各式带有革命意义的斗争,是非常多的。问题并不是大家怕共产党,因此使共产党找不到同盟者,而是由于共产党自己高慢的宗派主义,拒绝了一切可能的同盟者。过去常常发生这样的例子,当某一派别领导下的群众斗争发动时,共产党员不是想法如何去参加这一斗争,引导斗争到胜利的结果,而是站在旁观者的地位批评这一斗争如何不彻底,斗争领导者的话如何是“反革命的欺骗”等等,甚至号召斗争的群众立刻驱逐他们的领导者。结果往往是相反的,斗争的群众不但不相信共产党的话,反而说共产党“唱高调”,同时那些领导者便振振有辞的在群众面前宣布共产党“破坏斗争”,而斗争也因为得不到共产党的援助与合作而失败了。

在这种情形之下,共产党员的首先任务,不是站在旁

边唱高调,而是实际的参加到斗争中去,真正代表斗争群众的利益,帮助斗争群众取得胜利。在斗争中,如果看到其他派别的分子也是真正为了群众当前的利益而斗争的,那末应该亲密的与之合作;如果他们是欺骗群众的,那末在斗争中很容易在群众面前揭破他们的欺骗,用群众的力量把他们驱逐出去。只有这样做,才真正能够发展斗争,取得群众对于我们的信任,而真正揭破反革命派的一切阴谋诡计。

这种利用各种各样的同盟者以反对主要敌人的方法,在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尤为重要。不论是抵货^[136]也好,缉私^[137]也好,我们必须参加进去,真正为抵货为缉私而斗争,扩大这些斗争为广阔群众的运动,在斗争中同其他派别联合,在斗争中批评某些派别的动摇,不彻底,同叛变的分子进行坚决的斗争。只有这样做,共产党员才能成为抗日运动中的领袖,使群众团集在我们的周围,并使抗日运动成为千千万万群众的运动。

对于同盟者的态度,有时应该赞扬,有时应该批评揭发,有时却需要斗争,这都要看同盟者当时所表现的具体情形来决定,即要看他们对于我们的共同事业(如抗日救国)的是否坚决或动摇来决定。

这个斗争的原则,现在必须广泛的运用,当然必须严格注意不是投降同盟者,不是做他们的尾巴,而是使自己成为有坚定立场的领导者。

最后,必须善于利用敌人内部的每一冲突与矛盾,以

达到革命斗争的目的。千万不要把敌人内部看做清一色的整体,他们内部也有各种各样的派别,各种各样的集团,这些派别间与集团间常常有许多矛盾与冲突,特别在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条件之下。我们在斗争中必须极端注意敌人内部的这类矛盾与冲突,使这种矛盾与冲突扩大化与尖锐化,推动这一派别这一集团去反对另一派别另一集团,以削弱敌人对付革命的总的力量。我们不是圣洁的清教徒,说,我们决不应采取纵横捭阖的手腕。相反的,应该不失时机的利用这种矛盾与冲突,使这种矛盾与冲突扩大化与尖锐化而有利于革命事业的发展。

千万不要由于我们方面“打倒一切”的策略,使敌人内部更加团结起来。我们的策略是在打倒今天最主要的敌人,今天敌人中最反动的派别或集团,其他在今天不是主要的或次要的敌人,我们不妨暂时放松些,并尽可能的在我们与主要敌人的斗争中使之中立。只要我们今天能够把主要的敌人打倒,则其他不是主要的或次要的敌人,我们就比较容易的去对付他们。打倒一切敌人的策略,结果使你什么也打不倒,反而给予革命以重大的损害。

举例来讲,今天英国同日本的冲突是加深了,我们即应利用这种冲突以反对日本。我们今天首先应打倒日本,对于英国不妨暂时放松些,并尽可能的使之在我们抗日斗争中采取中立态度。在事变发展的过程中,我们更不拒绝采取联合英国以反对日本的策略。

共产党员无论如何不要拒绝在敌人中间利用纵横捭阖的手腕,共产党员不是小孩子,只知道高喊革命的口号,同敌人进行正面的斗争。共产党是最先进的革命的政党,它应该使用一切武器去对付敌人。

斯大林同志说,敌人内部的矛盾与冲突是革命的间接的后备军^[138]。这是值得我们深思而熟虑的。

国民党三中全会^[139]后的 形势与我党任务^{*}

(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三日)

—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积极进攻,全中国抗日运动的高涨,资产阶级内部的大分化,以及国际形势有利发展的推动(如英法的倾向和平,特别是苏联为中心的和平阵线的巩固),使得南京政府的中派蒋介石不能不产生对内对外政策的转变。在这种形势下召集的国民党三中全会,我们对它的估计是,其基本政策是有了相当的转变。

根据会议发表的文件及其经过情形可以看出,它在对内政策上是主张和平统一的,而和平统一的目标是集中全力以抵御外侮。一般的说来,它主张对国内问题不用武力手段解决,而采取政治解决的途径。对于西安事变,也认为以和平解决为适当。在其对西安事变的报告中,对张、杨的抗日八大主张^[140]是全文转述的。决议虽说到这

* 这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

种主张以“叛逆之行为及胁迫之方式”提出,不问其内容是否正确都不能接受,但对张杨与及首事诸人并未加以谴责。在民主问题上,决定要修改国民大会的选举法^[141]。同时,蒋介石在他发表的谈话^[142]中对于开放言论、释放政治犯,也有相当表示。

在对日政策方面,《宣言》中说到,如果“蒙受损害,超过忍耐之限度”,只有“决然出于抗战”之一途。“抗战”二字,在国民党文件中这是第一次出现。对于王英^[143]、李守信^[147]等汉奸行动,也加以指斥。这些都较二中全会^[144]的说法有所进步。在国际上,表示愿意参加到和平阵线方面来。虽然说得没有这样明显,其意思是倾向这一方面的。

对于同我们党的关系问题,三中全会的根绝“赤祸”决议虽然在前面阿Q式的说了一大套话,把些责任推到我们身上,但是最后提出了四个条件,表示在这四个条件下可与共产党谈判。这些条件和我们所提出的四条^[145],实际上是初步的接近了。虽然它的说法有些不同,实际上跟我们所提出的是大同小异^[146]。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说,国民党三中全会不论在对内、对外、对民主、对群众方面,都表示国民党政策开始了转变。

再看会后的事实。南京政府部分改组,张群^[147]的外交部长由王宠惠^[148]接替,交通部长换上了俞飞鹏^[149]等,都多少对抗日派有利,对于亲日派给了一些打击。传

说熊式辉^[150]、驻日本大使许世英^[151]等也要调动,最近孔祥熙^[152]又去英国,这些都具有相当的意义。对于绥远抗战^[153]阵亡将士的追悼,以及孙科^[154]最近对中日外交的谈话,都表示对日态度比较强化。西北问题^[155]一般的已得到和平解决,对红军在前线上没有进攻的布置。与我党还是继续谈判,所谓“剿匪”基本上是停止了。这些事实,都说明南京国民党方面正在朝着抗日方向前进。虽然它的前进很慢、很慢,在决议中缺乏具体的明确性,但不可否认是在前进。

所以我们应该说,三中全会后国民党的政策基本上开始结束了动摇,开始向抗日方面走。当然,仅仅是开始。我们在去年九月决议^[156]中曾估计到这一动摇有结束的可能,现在却是这一可能已开始趋于实现。这证明中央的估计是正确的。

二

这一转变,会使国际国内的形势产生很大的变化。在国际方面,将更加巩固和平战线。南京与英、美要更加接近,与日本的冲突会增加,与苏联会更密切些。这会有利于争取太平洋集体安全制度的努力,对于侵略阵线则是更大的打击。日本假使要进攻苏联,必然要顾虑到中国的牵制。因此,这是对世界和平有利的因素。

这里最重要的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侵略策

略,也必然会有重大的变化。

在三中全会前,日本对于中国的侵略遭到了很大的失败。如王英、李守信的绥东进攻^[157]是失败了,伪军已被抗战的军队赶出了绥远。这是第一。第二,日本对西安事变的挑拨^[158]是失败了。第三,在华北特殊化^[159]问题上,它最近碰到很多钉子。二十九军^[112]方面也不愿超过限度的执行日本旨意。他们内部团结,日本要消灭他们也不可能。就是石友三^[160]这类人,也不可能完全听命于日本。《字林西报》^[161]说:“中国人的民族性并不弱。”这是日寇很棘手的。所以,日本在华北问题上虽有所得,但大的成绩是没有的。最后,在三中全会期间,日本企图引诱南京,争取南京并指使其中的亲日派在会上提出对日妥协的主张,然而都未能得逞。

这样,逼得日本最近在对华外交的方法上不能不作重大的改变。日本现在正在大放和平空气,鼓吹其所谓新政策,即所谓佐藤^[162]外交政策。这一政策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用各种方法来和缓中国,另一方面却在这种和缓的掩盖下积极准备侵略战争。日本表示,不一定要国民党承认“满洲国”,因为事实上已经占领了它。在华北问题上则强调“经济提携”^[123],实质是要把华北经济完全握在手里。所以,佐藤外交在形式上似乎有些变动,但在实际内容上并没有放弃什么东西。广田三原则^[87]还是基本不变。仅仅是散播甚嚣尘上的和平空气,作为掩蔽其侵略中国、灭亡中国的烟幕。

日本要在对华外交上采取这一方式,当然是因为以前的政策受到了打击,不能不转个弯。同时,也是因为日本内部的冲突,如议会、政党与军部的矛盾、农民问题等,都没有得到解决。在国际关系上,日本也处于孤立的地位。它自订立日德防共协定^[163]后,除与德、意侵略者为友外,与英、苏关系都很差。

日本采取新政策的目的是,主要是想同中国和缓冲突,争取南京,把南京拉到防共协定方面。其次是想用以华制华办法来挑拨新的反蒋^[97]联共的内战,企图以最少的代价来攫取与征服中国。第三是想利用缓和的时间来巩固华北地位。在国际关系上则企图拆散和平力量,分裂和平阵线。

很明显,日本所谓新政策,所谓佐藤外交,其主要内容,还是实际的积极的准备武装侵略中国。一切花招,目的都在于此,都在朝着这样的方向走。所以,我们可以说,现在是日本用战争来夺取中国的准备时期。我们不应当为日本散布的和平空气所蒙蔽,而必须积极揭穿它的阴谋,准备抗战。

三

国民党三中全会后,中国国内形势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

自“一二九”运动至西安事变,是中国政治形势新时

期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中心的一环,是停止内战。我们在这段时期中坚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方针,广泛的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且部分的建立了统一战线的工作,但全国的统一战线还没有建立起来。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开始了一个新阶段,这就是准备实际抗战的过渡阶段。这个时期的特点,表现在南京政府开始转到抗日道路上来。南京政府要抗日,便不能不找群众,不能不找共产党,对于地方军阀也不能不寻求合作。

在这一阶段,主要的关键是实现民主权利。只有民主权利的实现,和平统一才有巩固的可能。现在全国民众普遍要求实现民主,从许多杂志的言论中都可以看到这点。民主问题将来在我们与国民党的政治斗争中要成为争论的焦点。我们必须完成实现民主主义的任务,绝对不应看轻民主主义在历史上的意义。我们应该争取国民大会通过给以民主权利的决议,这是在客观上有可能做到的。

总之,这一阶段是以转向抗日达到准备实际抗战。这种准备是必要的,我们主张加速度的准备。我们要集中一切力量,一旦实现了抗战,就争取抗战的彻底胜利。到了那时,中国的形势又要进到另一个新阶段。

现在这个准备达到抗战的阶段,是有很多斗争,不是太平无事的。这些斗争主要是:(一)在国际上是和平阵线与侵略阵线的斗争,其中包含中国与日本外交政策上的

斗争 ;(二)中国内部亲日派与抗日派的斗争 ;(三)民众与政府还是有斗争的 ;政府还是有动摇与妥协的 ,我们对此要严格批评 ,当然不是谩骂 ;(四)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斗争 ;(五)独裁与民主的斗争。抗战的实现 ,就决定于这些斗争的结果。因此 ,在这一时期可能发生各种曲折、困难 ,同时也包含着对困难的克服。如内战一般是停止了 ,但部分的内战的发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 ,进步派同妥协派的内战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以后我们的态度不是一般的反对内战 ,而是反对日本的挑拨。

这一进到实际抗战的准备时期的长短 ,决定于各种力量的斗争与国际形势的变动。欧洲的局势一定要影响到中国 ,日本冒险发动战争也是可能的。应该估计到形势变化与战争突然发生的可能。

因此 ,应该进行加速度的准备。这是一个战斗的时期 ,我们应该一分钟也不丧失的来进行准备。

四

在各种力量的斗争中 ,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争取领导权的问题。运动是由国民党领导呢 ,还是共产党领导 ? 我们怎样取得领导呢 ?

国民党在国共合作后 ,其内部会有新的变动。在我们方面 ,则应帮助它前进 ,并且设法改造它。应该充实其力量 ,以新鲜力量参加进去。共产党员个别的秘密的加入进

去是应该的,这样可以经过国民党来夺取广大的群众。我们要有忍耐性,坚持性。

但是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斗争依然存在,只不过斗争的方式有了改变。国民党企图控制这一运动,要同我们争夺领导权。它在这方面有很多优势。它拥有全国的统治,拥有全部的政权机关。它有长期的政治经验。它参加抗日,会提高它的地位。但是它的弱点是很大的。它要依靠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它的内部冲突也是不可能解决的。另一方面,我们的优点是:在全国享有崇高的威望;有十年斗争经验;内部团结统一。我们的弱点是在白区的组织薄弱。这一弱点是可以克服的。总之,争取领导权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我党的政策与领导是否正确,将决定于能否解决好这个问题。工作是很艰苦的。

我们怎样取得领导权?(一)坚持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坚持抗日救国的方针。民主与群众生活等问题的处理都要环绕于抗日问题。这一方针是不能改变的。(二)善于应用一切适用的斗争方式,从武器的批判转到批判的武器。现在使用的斗争方式不是与国民党对立的方式。过去的方式是革命的,现在则适用一些改良的方式,当然这种改良是革命主义的改良。此外,还要利用从上而下、从下而上的联系,利用公开的、合法的斗争方式,利用旧的形式为新的内容服务,等等。斗争形式很复杂,各种形式相互交叉。(三)要加强白区党的领导,建立全国范围的工作,每个中心地区要有坚强的能独立工作的干部。(四)苏

区、红军中要特别加强党的领导。以后在苏维埃中、红军中实现领导,要靠我们的政治斗争,要使我们的同志有高度的觉悟。在苏区内要大大地发展党内民主,要向党员做报告,实行选举,开代表大会等。苏区改特区后,加强党的作用将更加重要。(五)要重新教育干部,培养干部,使他们懂得新的政策,适合于新的要求。

最后,要保障党的领导,开展党的思想斗争。在目前,“左”的危险是主要的。“左”倾实际上是破坏党。反对“左”倾,反对托派^[164],揭破托派的思想,现在非常重要。北方局提议特别注意反对“左”倾,是有它的根据的。另一方面,右倾的危险也在增长。如在西安工作的个别同志表现腐化。特别是在新的环境下,一些同志容易接受外来的诱惑。有些同志在与人谈判时失去自己的立场,做了资产阶级的尾巴。要同这些倾向作斗争,保障党内思想一致,继续发挥长期以来艰苦奋斗的作风。要在两条战线的斗争中巩固布尔什维克的一致,以保障我们的领导权的实现。不是在纸上,而是只有在艰苦的工作中,才能实现我们的领导权。

我们要全力工作,迎接实际抗战的到来。

中国共产党 苏区代表会议的任务*

(一九三七年五月二日)

一、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与国民党三中全会^[139]后内战的停止,结束了从华北事变^[165]开始的中国革命新时期的第一阶段。这种局面的取得,是党的政治路线的伟大胜利,证明了党的新政策的正确性。

二、二月十日中央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的电报,决不能解释为“共产党的投降”。因为我们给国民党的四项保证^[139]:(一)只是本党两年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发展的必然结论;(二)并不取消或降低共产党组织的独立性与批评的自由,并不放弃党对军队与政府的领导;(三)相反的,正是为了争取共产党在全国的公开活动。因此,本党的这种决定是完全正确的。

三、决不能因为今天的改变,而认为过去十年来本党为苏维埃而斗争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相反的,就是这一

* 这是在中国共产党苏区代表会议上所致开幕词的提纲。会议于一九三七年五月二日至十四日在延安召开,会上批准了遵义会议以来党的政治路线,为迎接全国抗日战争的到来作了重要准备。

路线的坚决执行使我们:(一)继承了并发扬了过去民族革命的光荣的传统;(二)继续发动了广大的群众,推动了革命运动的前进;(三)创造了苏维埃与红军——中国革命的核心;(四)保存了与锻炼了领导的干部与领导的机关。

这是十年来的伟大收获与成绩。这些收获与成绩,首先是我党同志的努力奋斗、自我牺牲的精神所造成的。纪念在各条战线上英勇牺牲了的战士、我们的最忠实的同志、中华民族的最优秀的儿女李大钊^[166]、陈延年^[167]、陈乔年^[168]、许白昊^[169]、赵世炎^[170]、罗亦农^[171]、王一飞^[172]、郭亮^[173]、夏明翰^[174]、彭湃^[175]、杨殷^[176]、颜昌颐^[177]、张太雷^[178]、苏兆征^[179]、王荷波^[180]、蔡和森^[181]、瞿秋白^[182]、恽代英^[183]、邓中夏^[184]、向警予^[185](女)、刘华^[186]、汪寿华^[187]、方志敏^[188]、沈泽民^[189]、何叔衡^[190]、赵博生^[191]、董振堂^[192]、黄公略^[193]、黄甦^[194]、刘畴西^[195]、寻淮洲^[196]、唐在刚^[197]、陈寿昌^[198]、徐彦刚^[199]、林瑞笙^[200]、高生^[201]、严图阁^[202]、刘伯坚^[203]、贺昌^[204]、陈阿金^[205]、孙小保^[206]、傅维钰^[207]、黄励^[208](女)、韦拔群^[209]、夏曦^[210]、陈香波^[211]、崔琪^[212]、鲁易^[213]、汤慕禹^[214]、朱勉之^[215]、谢子长^[216]、刘志丹^[217]、杨琪^[218]、杨森^[219]、刘天章^[220]、蔡申熙^[221]、王平章^[222]、甘济时^[223]、吴焕先^[224]、孙玉清^[225]等。纪念在国民党区域内,在苏维埃革命战争中,在满洲抗日战争中,在“一二八”上海战争中一切牺牲了的

我们的最亲爱的同志们!(起立,静默三分钟)对一切活着的残废了的我们的同志,以及在帝国主义国民党监狱中受着磨难的成千成万的同志们,大会向他们致最热烈的慰问与敬意。

四、正是过去十年来艰苦奋斗的光荣历史,使本党今天:(一)在全国人民的心目中,有这样崇高的信仰,为他们所爱戴;(二)有资格成为民族统一战线的创始者与组织者,并成为其中的先锋与坚强的核心;(三)能够有阵地的前进,并且开辟了光明的前途。我们同志的努力不是徒然的。烈士们的鲜血不是白流的。没有过去,我们就不能有今天。

五、我们丝毫也不用否认,在这十年中,中央也曾犯过许多严重的错误。六次大会^[226]后,中央曾犯过立三路线的错误。四中全会^[62]到现在,虽是中央的路线一般的是正确的^[227],一般的执行了国际^[34]的路线,但是在白区群众工作中对长期存在着的关门主义的恶劣传统没有能够克服,在国内战争中曾经犯过军事上的冒险主义与保守主义的错误,“九一八”事变后对新发生的阶级力量的某些变动不能及时的认识与利用,对中国革命的持久性缺乏深刻的了解,以及干部政策中有过某些错误等。在地方党中间也曾经发生过各种不正确的倾向与错误,甚至还产生过张国焘同志那种反党反中央的机会主义与军阀主义的路线错误。但是在国际^[34]路线的指导之下,我们的党终能战胜一切不正确的倾向,纠正了自己的各种

错误,并从这些错误中学习与锻炼了自己。本党今天的收获与成绩,就是本党在反对各种倾向与错误中得来的,这就是本党的伟大处,也就是本党能够不断前进的基本原因。应该承认,经过十年的艰苦奋斗,本党是坚强了与进步了。这使本党更有信心去领导中国革命到胜利。

六、自内战结束后,革命已经开始了新的阶段。党目前的迫切任务,应该是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与实现对日抗战。为了完成这些任务,党必须大大加强白区党的组织与领导,使特区^[228]成为抗日的模范区。白区党的工作薄弱,是我党目前最大的弱点。国内和平之后,战争的最前线已经从苏区转移到白区了。我们应该:(一)细心的总结几年来特别是二年来白区工作的经验与教训,以此来重新教育与培养坚强的干部;(二)抓住抗日救国民主运动的中心一环,善于利用国民党每一允诺、每一合法的口号,提出积极的主张,组织群众,把运动推向前进;(三)恢复、整理、重新建立各地党的组织,加强已有的党的组织的领导;(四)克服对于目前发展形势怀疑动摇与悲观失望的情绪。大会对于现在白区艰苦奋斗着的同志们表示敬意!

七、为使特区成为抗日的模范区,我们还需要十倍的努力,去完成下列任务:(一)文化教育工作的加强;(二)群众生活的改善;(三)群众组织的改造;(四)新的民主制度的建立;(五)同一切汉奸卖国贼的破坏捣乱、阴谋、暗算做坚决斗争,以肃清心腹之患;(六)善于利用同外面的

各种关系,进行统一战线的工作,以扩大特区的影响。

八、红军必须成为模范的抗日军,成为抗日战争的领导的核心。这需要:(一)加强与保障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二)加强红军干部的军事、政治、文化的教育;(三)增进与改善红军在友军中与居民中的工作;(四)同红军中发生的太平观念和享乐腐化倾向做斗争,发扬红军艰苦奋斗的精神以及一切固有特长与光荣传统。

九、一切上述的任务,只有存在着坚强的党的领导时,才能完成。巩固我们的党,现在成为一切工作的核心。这就必须:(一)加强党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学习马克思列宁的工作作风,为共产国际的路线奋斗;(二)发展党内民主与自我批评(适合于白区与苏区的不同的条件);(三)彻底转变党的工作方式与群众工作方式;(四)实行正确的干部政策,团结忠实于党、同群众有联系、有独立工作能力、能遵守纪律的干部(“干部决定一切”^[229]);(五)同关门主义与增长着的右倾机会主义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肃清国焘路线。

十、只有实现上述任务,共产党才能在民族统一战线中取得自己的领导权。取得共产党在民族革命运动中的领导权,是目前一切工作的中心。这是一个困难的任务。应该看到,在我们的前面,磨难与阻力还是很多。首先我们必须集中全力战胜凶恶的日本帝国主义,战胜中国的汉奸、卖国贼、亲日派与托洛茨基派^[164]。其次,在民族营垒内部的斗争,还是继续着。内战停止,并不是阶级斗争

的消灭。阶级斗争将采取更复杂、更曲折的形式。阶级的敌人,特别是民族资产阶级^[230],将利用一切方法(欺骗、阴谋、诡计、捣乱、破坏、暗杀、侦探、金钱的收买、妇女的诱惑、利用落后意识——家庭观念等)来孤立我们,削弱我们,战胜我们,同我们争夺领导权。只有我们坚持党的正确路线,善于依靠群众与领导群众,善于使用一切斗争形式,发扬我党十五年来艰苦奋斗、百折不回、前仆后继的光荣传统与模范作用,我们才能战胜一切困难与阻力,取得与保证自己的领导权。只有取得这一领导权,才能使以后民族资产阶级叛变革命时,革命不是失败,而是继续前进。所以新的形势不但不减轻,而且加强了我们的领导责任,不但不放松,而且更应大大提高我们的政治警觉性。任何的疏忽与错误,会使革命受到挫折,以致失败。

十一、在中共身上寄托着中华民族的伟大的过去与将来。我们是伟大的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女。我们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已经奋斗了十五年,曾经充分发挥了中华民族的英勇气概,艰苦奋斗与自我牺牲的精神,创造了可歌可泣的空前的事业与传奇一般的光荣的历史。这证明,本党的胜利与中华民族的胜利是不能分离的。只有本党的存在与发展,才能使中华民族的最后解放得到可靠的保证。但是我们还没有达到我们的目的。我们离开我们的目的还是很远。我们需要足够的忍耐心与坚持性,积蓄雄厚的力量准备持久战,使中国革命得到最后的胜利。我们是能够胜利的。这就是我们代表会议的任务。

平津失守后的形势与党的任务^{*}

(一九三七年八月九日)

一、日本帝国主义由于国内矛盾的尖锐化,与国外比较有利的形势(主要的如中国的和平统一的局面尚未巩固,德、意、日防共协定^[231]的支持与德、意在西班牙的新进攻^[232],英国对于法西斯侵略国的妥协让步的政策),又开始了对于中国本部的大规模的侵略战争了。这一战争推动着中国走向全国性抗战的发动,威胁了世界和平,使第二次世界大战更加紧迫。

二、从七月七日到三十日,日寇达到了占领平津的目的。平津是华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与军事的重镇。平津的失守是“九一八”后中华民族的最大损失,这使中国失去华北与中国西北部的最重要的屏障,而使日本得到了侵略华北与中国西北部、进攻外蒙与苏联的最好根据地。它这样也可以隔断中苏的联系。

三、平津的失守,不是二十九军^[112]和平津守卫部队的不愿意抵抗,他们英勇的抵抗了;也不是平津人民不愿

* 这是在中共中央召集的一次会议上的报告。

意援助,他们都一致起来了。这是由于冀察最高当局宋哲元^[233]之辈,第一,没有抗战的决心,始终摇摆不定,妄想以投降妥协求得苟且偷安,保存私人实力;因此第二,在军事上没有抗战的积极准备,也没有一定的作战方针与作战计划;第三,始终惧怕群众的爱国运动,采取一切办法禁止群众运动;第四,对于汉奸亲日派及日本奸细的活动,不但没有肃清,而且为他们所包围与影响。这是平津失守中冀察当局应负的责任。

四、平津失守也是过去南京政府一贯退让政策的结果。塘沽协定^[234]、何梅协定^[165]的订立,华北特殊化^[91]的容忍,使日本帝国主义政治经济与军事的势力深入了冀察,造成了抗战的困难与不利的条件。同时南京政府对于日寇进攻芦沟桥虽发表了坚决抗日方针,但是在实际的行动上却表示迟缓、游移与不彻底。这是平津失守中南京政府应负的责任。

五、日本占领平津不过是对于中国本部的大规模侵略战的开始。它现在正在调动大军来华,来巩固与扩大已得阵地,压迫中国政府放弃华北。日本是决不会满足于平津的占领的。它必然还要前进。首先将以占领察绥^[235]为目的。同时它又表示愿意和平妥协、地方解决、不扩大事态,以欺骗中国人民,以和缓全国抗日的激昂情绪,动摇中国政府抗战的决心,使全国的抗战不能爆发,以争取它巩固平津,准备继续进攻的必要时间。

六、南京政府对于这次日寇的进攻,已经表示了坚

决的抗日方针。在军队的调动上亦已有比较积极的抗战布置，冀察方面的局部应战已经开始，七君子^[236]的释放，国防会议^[237]的召开，全国各地抗敌后援会的组织，这都表示南京的进步。这一方针的坚持与发展，必然会引导全国性抗战的发动。但是南京在实现这一抗日方针的具体行动方面，还表示迟缓、不坚决与不彻底，特别在实现民主政治与民主权利、释放政治犯方面进步很少，国共合作问题没有最后解决。对日寇在华的一切特权与活动，尚不敢有所侵犯。在外交上尚未脱离过去的消极状态。对英国的依赖性，还相当大。徘徊不定、妄想偷安的妥协传统，尚未完全克服。一切这些造成了目前时局的重大危机。

七、全国人民在芦沟桥事件之后，一致要求抗战。各地的大资产阶级，国民党的各地党部，国民革命军的将领及各地方的军政长官，也表示了他们的积极，提出了抗战的要求。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到处要求行动的统一，并且到处组织了这类统一救亡的组织，这使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前进了一大步。这些运动逼使南京当局不能不相当允许群众爱国运动，这造成了运动的公开的更大可能性。但是另一方面，运动的发展，又造成了南京当局的恐怖，使他们用各种方法来限制与抵制运动，以致给运动的更大发展以约束与损害。

八、目前形势的发展，将必然从现在局部的应战的形势转变为全国性的抗战。这种转变的速度决定于各种力

量的复杂的结合与斗争,首先决定于抗日统一战线力量的扩大与巩固。转变的过程中,可能发生各种波折与变化。目前的主要危险是民族失败主义,是那种以让步妥协来停止日寇进攻的幻想,是对于英帝国主义的依赖性。

九、为了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我们认为南京政府必须把局部应战的形势,转变为全国性的积极抗战,并立刻实现下列十大纲领:

(一)停止中日和平谈判^[238],宣布对日绝交,向全中国全世界公布实行全国性民族抗战的坚决方针,反对民族失败主义及一切动摇妥协、苟且偷安的倾向。

(二)动员全中国的海陆空军实行抗战。立刻召集国防会议,集中抗战的军事领导,建立每个战线上的统一指挥,以积极抵抗的方针去对付日寇的进攻。在日军四周发动广泛的游击战争,援助东北人民革命军与义勇军,以配合抗日主力的作战。

(三)全中国人民的总动员。开放党禁,开放爱国运动,释放政治犯,实行民主权利,实行大规模的发动民众,建立各种各样的抗日统一战线组织。

(四)全面的对日抗战。实行武装缉私^[137],抵制日货,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银行、矿山、工厂与财产,取消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政治与经济的特权。封闭一切日本大使馆、领事馆与特务机关,逮捕一切日本侦探与汉奸,解除日寇与汉奸在中国内地的一切武装的与非武装的团体。

(五)立刻改组政府组织,使中央及地方政府民主化,使国民大会成为代表全国人民的机关,使国民政府成为能真正代表全国人民的抗战机关,吸收各党各派参加。

(六)立刻实现国共两党的亲密合作,以此为基础,团结一切抗日的党派,建立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

(七)立刻实现财政、经济、土地、劳动、文化、教育的新政策,巩固国防,改善民生。

(八)立刻实现抗日的积极外交,公开拥护国际和平阵线,与英、美、法、苏订立协定,推动英国。^[239]

如果实行这样的抗战,就可争取抗战的胜利。这一纲领是争取中华民族前进的关键。

十、目前我党的工作中心,是争取全国性抗战的发动与胜利。

(一)坚持同国民党合作的方针,发扬其每个进步,批评其动摇与妥协。反对急躁病,不断推动它前进,逼它前进。另一方面,合作并不是投降,反对满足、迁就的投降倾向。

(二)提出我党独立的积极的主张,提出保障抗战胜利的办法,来号召与团结全国群众,迫使蒋^[97]走向我们方面,使我党实际上起指导作用。

(三)参加国民党所发起的一切合法团体与活动(如抗敌后援会等),扩大它们的群众基础与组织内部的民主,使之成为公开的广泛的统一战线的组织。同时不放弃利用一切公开的可能,独立的进行发动、组织与教育群众

的工作。造成推动南京政府的力量 ,而不是与之对立。

(四)争取党的公开与半公开 ,巩固与扩大党的秘密组织。加强在群众中与军队中的工作。

(五)转变一切工作方式与方法 ,以适应于目前的新形势。

继续抗战与国共关系^{*}

(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一 目前形势

一般说,目前形势是向好的方向发展。南京失守,标志着日寇完成了第一期军事计划。同时,日寇着力进行和平活动,是个很大的危机。这个危机是被克服了。经过蒋介石谈话^[240]与共产党《宣言》^[241]的发表,和平的危机克服下去了。日本当时感觉,蒋介石发表谈话是要准备进行持久战。现在,日寇转入第二期战争,其中心目标是西安与武汉,其次便是陕北。

在这段时间中,在中央与地方^[242]都有一些进步,如广东、山东、山西等都有进步。军队中政治工作开始建立。民众运动更加发展。国共两党关系也比以前好些。两党委员会已经成立^[243]。特别与蒋介石的关系有发展,与各党派关系也好了些。

新的干部与人材也在涌现出来。

* 这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标题是本书编者加的。

上次政治局会议^[244]指出,中国只要继续抗战,必然能取得胜利。现在证明,中国时局是在向好的方面前进,在战争中进步。

但是必须指出,目前的进步还不能适应于战争的需要。行动非常慢,有些事决定了也不能执行。

第二个弱点便是新的人材没有大的引进,陈腐的分子没有排除,没有以新的有朝气的分子来代替老的分子。腐朽的东西阻碍着抗战的进步。

国民党中许多人害怕共产党的进步与发展。这说明抗战的弱点还是严重的。

因此,在抗战的进程中,一旦西安、武汉失守,仍然会产生很大的危机。因为新的困难增加,国际上英国等也可能出来劝和,这样就会有新的危机。但蒋介石被迫下野的可能性较小。

争取继续抗战是有可能的。在日本进攻下,投降妥协没有前途。而且,投降必然会大乱,会引起全国人民与进步分子的反对。过去许多例子证明,投降是没有出路的。

我们要看到这些进步与弱点,克服这些弱点,坚持继续抗战,坚持在持久战中争取胜利。

二 国共两党关系问题

最近两个月来,两党关系是有进步的。蒋介石也看

到 ,要继续抗战 ,国民党必须同共产党合作。但国民党又怕共产党与八路军的发展 ,制造许多谣言 ,还利用托派^[164]向我们进攻 ,打《新华日报》馆^[245] ,企图在政治上打击我们 ,限制我们。历史决定了国共两党需要合作 ,但是合作中是存在着两党争取领导权的问题。中国资产阶级是有经验的。他们目前需要两党合作 ,但又怕我们发展 ,要利用共产党与人民的力量 ,但又害怕共产党与民众的力量。目前阶级斗争的形式更复杂了。我们要看到 ,与国民党有些磨擦是不奇怪的。我们的任务便是要推动国民党进步。与国民党吵一下是难免的 ,但注意不要分裂了。我们无论何时不要忘记要与国民党合作 ,但也必须时时保持戒心。如这次在武汉发生党派问题的论争 ,毛主席发表了谈话^[246] ,便打击了他们的进攻气焰。

我们一方面要保持与国民党的合作 ,同时也要发展自己的力量 ,在巩固国共两党合作原则下求得我党力量的巩固与扩大。

有些人一看到与国民党发生磨擦 ,就觉得恐怕马上就要分裂了 ;一看到与国民党关系好一些 ,就认为没有问题了。这些都是错误的。

三 我们的任务

我们要在保卫武汉的抗战中进行各方面的改造 ,同时要解释 :就是武汉失守了 ,中国还能继续抗战。我

们要准备一个军事建议,交给国民党。

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247],我们应有提议。要公开发表一个文件,在群众中造成舆论:只有实行各党派的民族联盟^[248],才是真正的统一,企图利用统一来取消别的党派,实际上是造成分裂。

目前民众工作进步很小。发展统一战线只与国民党谈判是不够的,必须用强大的民众力量来推动统一战线的发展。目前许多民运工作还没有人注意去研究和讨论。我们必须用很大的注意力,具体研究职工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的问题,作出新的决议。党的力量要重新配备,要把更大的力量放到民运工作上去。与国民党的谈判则不要许多负责同志去。

同意泽东同志意见,要大量发展党。目前只有九万余党员,太少了。要发展民运,便要发展党,当然党的发展又要民运的发展。现在发展党组织的工作有一个很大的弱点,便是只找旧的关系,不去发展新的。

在干部问题上,今后主要的是要培养新的干部。各地要能独立工作的老干部,但是很少,只有在发展党的过程中来培养。同时,地方党组织也要解决一部分干部问题。新党员要送一批到新疆去。

关于中央主要干部的集中与分散问题,要保证集中的领导,又要相当的分散。中央经常要保证四、五个人的集体领导。

在党的力量的使用方面,要用很大的力量去创造各

个地区的根据地,不要平均使用党的力量。华北山西的力量也不能削弱。在南方各特区^[249],我们有基础的、有武装力量的地区,需要加强力量去发展。在战区,发展党最为有利。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发展要绝对平衡也不可能。首先要加强鄂豫皖与中原地区。

党的领导机关的设置要随时改变,使之适合抗战的形势。

讲一下游击战争问题。八路军要以一个师为单位,这样便于扩大,便于在战争中组织许多附属的游击队,并且使这些游击队又扩大起来,创造许多根据地。八路军要展开起来,在各地起核心的作用,依靠军队来开辟根据地,即抗日战争中的据点。象晋察冀边区的那种形式的政府^[250],其他各地也要组织,也要采用这一形式。

论青年的修养^{*}

(一九三八年四月十二日)

同志们 你们都是从全国各方面来的青年 ,所以我今天就同你们讨论讨论关于青年的问题。

从全国民族抗战开始到现在这个时期内 ,青年的确占着一个很重要的地位。我们无论从那一方面来看 ,不论是军事方面也好 ,政治方面也好 ,文化教育方面也好 ,都可以看到广大青年群众的活跃。他们总是站在抗战的最前线 ,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牺牲奋斗。同时 ,由于抗战规模扩大和展开 ,青年的责任也更加重要了。怎样使我们的青年更能在抗战中尽他们的责任 ,是我们大家所要商讨的问题。我今天所要讲的青年的修养问题 ,即是想在这方面向大家贡献一点意见。

我认为中国现代的青年 ,有很多共同的优点 ,同时也有一些共同的弱点。怎样发挥这些优点 ,克服那些弱点 ,即是青年的修养问题的内容。我现在就根据我们的经验与考察来具体讲几点 ,希望大家来讨论。

^{*} 这是在陕北公学的讲演。最初刊载于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第三十九期(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二日出版),署名洛甫。

一 要有坚定的高尚的理想

青年有一个很大的优点,这就是他们有高尚的理想,不论这个理想是抗日救国也好,共产主义也好。他们对于现社会是不满足的,他们希望着一个理想的社会的出现。青年的这种理想是最可宝贵的东西。正是这种理想不断的鼓舞着我们的青年向前进步。正是这种理想使他们不愿在现社会中醉生梦死,而愿意为理想社会的实现牺牲奋斗。正是这种理想,使我们的青年,在过去,在现在,创造了许多惊天动地与可歌可泣的伟大事业。眼前的例子,也可证明这一点。比如你们,陕北公学^[251]的同学,究竟为了什么不远千里而来陕北这个比较荒凉的地区呢?陕北公学的物质条件是很困难的。住的是窑洞,吃的是小米饭。教育设备都很简陋。然而你们为什么不怕一切困难而来呢?如果你们不是为了寻找高尚的理想,我想你们是不会来的。所以高尚的理想对于青年是最可宝贵的东西。我们对于青年的理想,不但不应该鄙视,而且应该极大的爱护。旧社会里的人,常常骂青年为“理想太高”。这种骂法,我们认为是根本错误的。这只是证明那些骂青年的人的无理想之可鄙而已。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理想,不是也给人家骂为“大炮”吗?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共产主义理想,不是给人家骂为“空谈”吗?然而我们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孙中山的伟大,也正是在

于他们有高尚的理想。所以青年有高尚的理想，正是青年的优点。

但是如果我们把青年人的某些理想研究一下，那我们即可发现有些青年人的理想不是理想而是空想。空想可能常常是美丽的东西，然而究竟是空想而不是理想。那么，理想与空想的区别究竟在那里呢？

首先，我们应该说，我们的理想是建筑在现社会的物质基础之上的东西。空中楼阁，究竟是幻想而不是理想，因为它是脱离现社会的物质基础而建立在空中的。一切伟大的理想，都从现社会的具体分析得来。闭户造车究竟只能是幻想而不是理想，因为它是个人头脑中间随便想出来的，而不合于具体的与实际的物质条件。共产主义的理想，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崇高的最伟大的理想，然而这个理想，只能从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基础上产生出来。脱离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分析的“大同世界”的思想，究竟是幻想而不是理想。

其次，我们的理想应该适合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说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的三民主义可以是我们今天的理想，因为中国社会今天正是向着这个方向发展着的。我们说共产主义社会是我们将来的理想，因为人类社会终究是要向着这个方向发展前去的。如果今天有人要恢复原始共产社会或恢复奴隶社会，或仿效君主专制或法西斯独裁的统治，那这种思想就不是真正的理想，因为这种思想是违反于人类现代社会发展的

趋势的。这种思想,我们不叫它理想,而叫它做反动思想。因为这种思想不是要使社会走向前进,而是要它转向后退,就是所谓“开倒车”。一切不合于人类社会发展趋势的思想,只能是一种空想。

第三,理想与空想不同,就是理想是能够实现的,空想则是永远不得实现的。而理想的实现,需要有在一定的物质条件下所产生的社会力量。没有这种力量,理想也就不能实现。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理想,就要依靠在全国一切不愿意当亡国奴的各阶级、各党派、各团体的民族统一战线力量之上。离开实现自己理想的社会力量而谈理想,那也是一种空想而不是理想。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离开工人阶级的社会力量,就成为乌托邦,成为空想。

第四,理想之为理想,除上述条件外,还需有实现理想的具体办法。比如,实现民族解放的理想,就要有建立、扩大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办法。实现共产主义,就要有一定的纲领与步骤,一定的策略与战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与战略是每一共产主义者所必须学习的科学,因为离开了它们,理想虽是很好的,然而仍然成为空谈而不能实现,使理想成为空想。

这就是理想与空想的基本区别。我们的青年如果赞成我所说的这些区别,那末请你们就拿这几个标准,来检查一下自己的理想:究竟你们过去所抱的理想,是理想还是空想?如果是空想,那就应该决然抛弃。如果是理想,

但又不完全,那就应该修正与充实,或重新加以检讨与整理。我们应该不客气的说,在我们青年的理想中,常常不免有些空想的成分,因此,他们有时对于自己的理想把握不定,而发生一些朝三暮四的摇摆现象。要免去这种现象,就必须把自己的理想建筑在结实坚固的科学的基础之上。

这是我所要说的第一个问题。

二 要为实现自己的理想奋斗到底

青年人在一旦觉醒,找到了自己的理想之后,都能够不顾一切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这种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牺牲奋斗的精神,是我们青年的一个很大优点。我们在社会中看到不少这样的人,他们也不满意于现状,他们也希望能有个较好的社会出现,他们甚至同情共产主义,但是他们自己不愿意为改造社会而奋斗。他们舍不得自己的妻子儿女,他们舍不得自己的家乡故土,他们舍不得自己的生命财产,他们不得不“马马虎虎”的生活,不得不“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但青年就不是这样。他们不了解到自己的理想则已,一旦他们了解自己的理想,他们就会抛弃一切,奔赴自己的理想,去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这种不顾个人利害而牺牲奋斗的精神,是值得钦佩与歌颂的。

但是,实现理想,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理想虽是建筑在现社会的物质基础之上,但理想是超过现社会的东西。理想好比泥土中生长出来的花。它虽生长在泥土中,但它又不是泥土。所以理想看来常常是美丽的,而现社会则看来是丑恶的。要把这个丑恶的现社会变为美丽的理想社会,那决不是一天两天以至一年两年的事,而需要几十年以至上百年的奋斗与工作。不但这样,在奋斗与工作的过程中还必然要碰到无数的困难与波折,有时甚至看来似乎是不能克服以至绝望的困难。所以不论在任何困难之下,坚持自己的理想,坚持为自己理想的实现而奋斗,是绝对必要的。没有这种坚持性,任何的理想也都不能实现。

一切伟大的革命家之所以伟大,不但因为他们有着伟大的理想,而且还因为他们始终能够为了自己的理想奋斗到底。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252],虽是在他奋斗的过程中碰到了无数的困难,然而他始终坚持他的理想,为他的理想奋斗到最后。世界无产阶级的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的伟大,就是他们那种为自己的理想而坚持奋斗到底的精神。他们在丑恶的旧社会中看到美丽。他们在黑暗中看到光明。他们排除万难,克服一切困难而前进。

中国共产党人曾经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件事震动了全世界。为什么二万五千里长征能够有这样伟大的影响呢?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在这次长征中充分的

表现出了它为了自己的理想而牺牲奋斗与坚持到底的精神。没有这种精神,就是一千里的长征也是不可能的。在这次长征中,我们的确曾经碰到了无数的困难。我们曾经碰到了几乎不能渡过的天险金沙江与大渡河。我们曾经碰到了人类几乎没有到过的雪山与草地。我们处在敌军的四面包围之中。困难几乎是不能克服的。然而我们那时只有一个思想,就是无论如何要克服这些困难,要为自己的理想奋斗到底。最后,我们还是完成了我们当时的任务,到达了当时的目的地。

就以今天的抗战为例吧。中国的民族抗战是一个持久的战争。困难也是很多的。波折也是很多的。如果我们碰到一些困难,遭受一些挫折,就悲观失望,就准备同敌人妥协,那中国就有亡国的危险。显然的,如果我们不能坚持抗战到底,则最后战胜日寇、实现民族独立的理想是不可能的。

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在为了自己理想的实现而奋斗到底的问题上,我们有些青年常常表示一些弱点。他们一开始往往以无限的热情与兴奋去奔赴自己的理想,但是一旦他们碰到困难,碰到波折,他们往往不能坚持到底,以至半途而废。过去常常有人以“五分钟热度”讥笑青年学生。这种讥笑在现在说来已经不对了,因为中国青年学生经过无数的斗争,现在已经有了极大的进步。然而在某些部分的青年中缺乏斗争的坚持性,则依然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为什么在我们部分青年中发生这种现象呢？我以为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我们的青年往往对于革命的持久性估计不足。要把人类的高尚理想实现出来的革命,象我在前面说过的,不是一天两天以至一年两年的事,而是几十年以至上百年的事。这是一个持久的斗争。不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是如此,即最后战胜日寇也不是一年两年的事,而是一个持久战。同志们大多数是从西安步行到延安的。你们对于走陕北的山地,大概已经有了相当的经验。革命就好象走陕北的山地一样,翻过了一座山又一座山。你们在路上不是常常想,翻过了前面一个山头一定再没有山了吧,一定可以到延安了吧。然而事实常常是相反的,山接连着山,而延安总是还在前面。这样你们在路上就要走十天,才得到达延安。这对于你们,就是一个很好的入学考试。然而革命究竟比翻山要持久得多,困难得多。如果我们青年参加到革命中来,没有持久斗争的准备,结果是一定要失望与半途而废的。正象你们到延安来,如果你们没有这样一定要到延安的决心,你们一定会半途而返的。

第二,我们的青年往往对于革命的困难性估计不足。要把人类高尚的理想实现出来的革命,不克服无数的困难是不可能的。革命决不象上海的大马路那样平坦好走,决不象吃饭睡觉那样容易简便。这简直同爬着没有人迹到过的崎岖的高山一样,山上没有路,没有人家,到处是

荆棘与浓密的森林,到处有毒蛇猛兽的威胁,有些地方简直是不能越过的绝壁。但是我们必须前进,必须克服一切困难前进。我们有时会被荆棘树枝所刺伤,有时会被毒蛇猛兽所咬伤,我们前面的伙伴有时会用尽了一切气力而倒毙,但是我们必须前进。如果我们的青年参加到革命中来,不预先看到这种困难,没有克服一切困难的准备,那结果必然是“知难而退”。

第三,旧社会的思想习惯以及一切物质上的诱惑,也往往是使青年半途而废的一种极大的力量。我们常常看到一些有志的青年,受不起这种力量的压迫而退却了,而放弃了自己的理想。旧社会对于青年的理想,总是取着敌视的态度。他们用各种思想上的毒素,讥笑青年,陷害青年,使青年“老大”;“颓丧”;“消沉”。他们用地位、金钱、美女腐化青年,笼络青年,消磨青年的“朝气”。你们看到过无数这类的例子吧。当青年学生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往往“志向远大”,想“给国家民族谋点幸福”;“为人类解放做番事业”,然而一出学校到旧社会中混上几年,往往把过去的一切完全抛弃了。旧社会吞没了他们。旧社会融化了他们。所以,如果我们的青年不能同这种旧势力奋斗,坚持自己的理想,不为这些力量所动摇,那结果也必然是半途而废。

第四,我们的有些青年本身常常有一种“动摇性”,缺乏足够的忍耐与坚定。我们常常称这种特点为“小资产阶级性”。他们往往今天参加革命工作,就希望革命在明天

胜利。如果明天革命不能胜利,那他们就失望而消极了。他们在革命形势高涨的时候,常常趋向狂热与盲动,而在革命形势低落的时候,则又转到消沉与绝望的深渊。他们胜利时常常为胜利冲昏头脑,失败时则又因失败而垂头丧气。他们不会把今天一点一滴的切实的工作,同他们远大的理想联系起来。他们不能穷年累月的去为自己的远大的理想而进行今天看来好象是没有结果的工作。他们常常讨厌这种“琐碎”与“麻烦”的工作。他们不能清楚了解,一切革命的工作,只要能够坚持的干下去,一定可以得到一定的成绩。巨大的建筑工程没有一砖一瓦的砌筑,是永远不能成功的。伟大的理想不经过许多胜利与失败,是永远不会实现的。

这些是常常使我们的青年不能坚持自己的理想、为自己的理想奋斗到底的原因。这些弱点的克服,是每一个中国青年的严重任务。这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然而这件事是必须做到与可能做到的。

当然,今天我们离开我们的理想还很远,然而我们总是在一天一天接近着自己的理想。社会主义的理想,过去还只是在书本上,而现在已经在占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的苏联,变成了完全的现实。所以只要我们能够坚持自己的理想,为自己的理想奋斗到底,我们的理想的实现是可能而且是必然的。

三 要学习实现理想的办法

有了理想,有了实现理想的决心,是不是就已经够了呢?还是不够的。我们青年还要有实现理想的办法。

青年有一种很大的长处,就是有热烈的革命情绪,纯洁坦白的胸怀。正是因为他们有热烈的革命情绪,所以他们能够勇往直前,不顾一切困难与个人利益,向着自己的理想前进。正是因为他们有纯洁坦白的胸怀,很少受到旧社会的各种陈腐的思想、习惯与传统的影响,所以他们比较容易接受革命的真理。青年同那些麻木不仁的人是不相同的,同那些顽固守旧的死硬派也是不相同的。青年是有生气的,活跃的,充满着愉快与光明的一代。他们是旧社会中生长起来的美丽的花,他们也是美丽的新社会的创造者。

在中国革命史上,我们可以举出无数例子,来证明中国青年如何常常站在民族解放的前卫地位,以他们的头颅与热血创造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勇的光荣的史诗。在今天伟大的民族抗战中,我们也可以到处看到青年怎样为民族抗战的最后胜利而进行着勇敢无比的斗争。如果他们沒有热烈的革命情绪与纯洁坦白的胸怀,则一切这些事业的创造是不可能的。我们共产党人对于青年的这一优良的特质,尤其有深切的感觉。当我们在最黑暗最困难的时候,当在我们的周围到处是恐怖与造谣污蔑

的时候，我们总是从许多青年朋友那里得到他们的同情与拥护。在今天，他们对于我们所表示的爱戴与信任，也是我们不能以言语来表示感激的。谁都可以看到，在我们延安，没有官可做，没有薪水可拿，没有很好的生活可过，还有不少人在我们的周围造我们的谣言，破坏我们，然而你们仍然不远千里而来，其原因何在呢？除了你们的那种热烈的革命情绪与纯洁坦白的胸怀，还能有其他的说明吗？

青年的这种优良的品质，是我们所应极力爱护与发扬的。

但是光是热烈的革命情绪，纯洁坦白的胸怀，还是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完成伟大的革命事业的。有些青年的弱点，常常表现在不会使革命的热情去服从于革命的理智，不会把纯洁坦白变为对于真理的深刻的追求。响亮的革命口号，耀眼的革命词句，可以迷惑我们的青年，使他们发狂，使他们以此为满足。他们往往抓住问题的一方面，把它发挥，把它夸大，认为这是唯一的“真理”，排除一切其他的方面，否认一切其他的意见。他们的革命热情容易变为盲目的冲动，他们的纯洁坦白容易走向片面性、狭隘性与幼稚病。他们往往不能更冷静的去考虑问题，想出具体的办法来实现自己当前的任务，来实现自己的理想。这种弱点，当然是我们的青年所应该设法克服的。

我们应该使我们的青年清楚的了解到：在理想确定之后，有了为理想而奋斗到底的决心之后，学习实现理想

的具体办法就有着决定的意义。在这一方面,我想向同志们贡献几点意见。

第一,就是要了解具体情况。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首先的问题就是了解情况。正象一个在前线上指挥军队的将军,他为了要实现他打胜仗的理想,就必须讲求作战的方法。这里,首先就是要弄清敌情,然后来决定作战的计划。我们的工作方法也是如此。比如,你们将来从学校毕业之后,你们到一个地方去工作,你们的责任决不是到那里去照你们自己的头脑中所想的来乱干一顿,而是要首先了解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比如那里的抗战形势,那里的政治与经济,各阶级、各阶层、各党派、各民众团体以及党、政、军、民间的相互关系等。没有这种了解,我们就无法决定正确的工作方针与工作计划来实现自己的理想。

当然了解具体情况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一切具体情况都是在矛盾中发展着的,都是依照普遍的辩证法的规律变动着的,所以只要我们能够把握住这些方法,那比较正确的去了解具体情况也不是不可能的。问题只是要我们的青年在接触具体情况的时候,能够更多的“想一想”,更多的研究一下,考察一下,决不要以自己的一些片面的主观的了解为满足。世界上的一切都是非常复杂的,不是马马虎虎、冒冒失失就能够了解的。如果我们没有这种了解具体情况的要求与忍耐心,那我可以告诉大家,你们是什么事也做不好的。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彻底了解具体情况之后才能开始工作。这种彻底了解,在一个短的时期内是不可能的。但我们要求在开始工作之前,有一种初步的与起码的了解。不然,到一个地方不管一切乱干一气,那是异常危险的。

第二,在我们对于具体情况有了初步的与起码的了解之后,我们就要根据对具体情况的了解来决定我们的方针,我们的任务,斗争的形式,工作的方法方式等。比如你们现在到上海工作,你们在了解到了上海的具体情况之后,你们就必须规定你们今天在上海需要做什么,能够做什么,而且如何做。显然的,在上海日寇军队占领的地区,我们今天的具体任务、斗争形式、工作方法方式等,决不能同其他区域相同。你们要考虑,究竟今天在上海是同在其他某些战区一样地去发展游击战争,进行公开的反日的活动,或者是这里需要执行另一种任务,即积聚自己力量准备待时而动的任务,采取另一种斗争形式,即秘密的反日斗争的活动,还是组织公开的抗敌后援会,还是一方面组织秘密的抗日团体而同时去利用公开的合法的的组织形式呢?只有正确的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才能使我们的力量巩固与发展,达到最后配合全国力量战胜日寇的理想。如果我们的任务规定得不正确,工作方法方式等都规定得不对,那我们必然会遭受严重的失败,而达不到我们的目的地。

在目前全中国人民的前面的最中心的任务是坚持抗

战,最后战胜日寇。但是实现这个中心任务的方法是在各个具体的地方都不能完全相同的。我们青年要善于根据不同地区的具体情况,来决定实现这个中心任务的具体办法。由于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由于中国的地大物博,所以实现目前中心任务的方法,都不能有千篇一律的公式。公式主义常常是我们实现总任务中的最大的障碍物。

就是各地方的具体情况,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它同样的变动着。所以你们就在一个地方的工作中仍然要时时刻刻注意新的情况的变化,而及时的改变自己的任务及工作方法方式等。至死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这里,要求我们以极大的灵活性、机动性与创造性,来实现自己的理想。固执自己的死公式或老办法,结果必然会遭受严重的失败,而达不到目的地。

第三,在任务等规定之后,就应该立刻开始自己的实际工作。我们是革命家,行动家,而不是空谈家。“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恶习惯,我们青年是决不应该学习的。我们必须把我们自己所决定的方针与计划来见诸实行。只有革命的行动才能改造世界。革命的伟人马克思曾经说过,我们的任务不但在认识世界,而主要的在改造世界^[253]。要改造世界就要革命的实际工作。而且也只有在实际工作中,我们才更能进一步的认识世界,更正确的来决定自己的任务与工作方法方式等。也只有实际工作,能够考验我们过去的决定是否正确,充实与发展我们的决

定,改正错误等。

所以我们青年在实际工作中也仍然不是盲目的乱干一顿,而要时时刻刻注意自己在实际工作中所碰到的一切问题,总结自己在实际工作中的经验。如果在实际工作中证明过去自己的决定是不正确的,是做不通的,那自己应该毫无怜惜的抛弃过去自己的决定,而根据自己对于具体情况的新的了解来重新决定自己的任务。如果有部分的错误,即应改正部分的错误。如果有不够的地方,即应以新的经验使之充实,使之发展。这里所需要的是虚心的服从真理的态度,而不是“自作聪明”去蛮干。不顾事实的蛮干,是会碰到钉子以至毁灭自己的。

所以我们的青年,应该时时刻刻在实际工作中实行工作的检查,发展自我批评,总结工作中的经验与教训,使我们的工作能够更好的得到进步与成绩。一切先进的革命的理论,我们也只能当作行动的指南而不能当作教条。一切先进的革命理论,也要在实践中充实自己与发展自己的。

我想,这三点是我们青年人在工作中所应该注意的。这三点的中心所在,即是要使我们的青年不但要有理想,有实现理想的决心,而且要学习实现理想的具体办法。

当然,青年人终究是青年人,他们一般是富于革命热情而缺乏实际经验,因此他们有时要“感情用事”,有点“冲动”,有点“幼稚病”。我们指出青年的这些弱点,并不想以此来责备青年,而只是要求青年们在自己的工作中

注意到自己的这些弱点,克服这些弱点,使自己逐渐的在实际工作中成为一个比较“能干的”与“老练的”革命青年。

四 要同群众在一起去 实现自己的理想

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要实现革命的理想,一定要依靠于一定的社会的力量,这社会的力量就是千千万万的群众。历史上的伟人,固然在创造人类历史中起了很大的作用,然而如果没有群众的拥护与群众的行动,任何推动历史前进的理想都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我们青年要实现自己的理想,就必须能够率领群众去为自己的理想奋斗。

青年在革命行动中肯负责,肯出头,肯打先锋,这是很可宝贵的品质。在中国民族解放的历史中,青年常常起着先锋的作用,就是由于青年这种优良品质的结果。但是就在这个方面,部分青年仍然表现出他们的弱点。他们肯负责,肯出头,肯打先锋的品质,往往发展到好出风头,目空一切,自高自大,包办,不耐烦,脱离群众的偏向。这种例子,我是见得很多的,不知道你们见过没有?我想一定是见过的。

在陕北公学学习的青年,一般的是觉悟程度较高的一部分中国人,他们的确有责任去领导另一部分比较落

后又占最大多数的中国人,发动他们,教育他们,训练他们,以提高他们的政治水平与组织力量。没有先锋的领导,广大的比较落后的群众,是不会自己走到先锋的地位的,这是无可否认的真理。

然而怎样可以使我们陕公的青年能够负担起这个先锋的领导的责任呢?是不是我们青年装出一个领导者的架子,自命不凡,目空一切,就能够实现这个领导作用呢?是不是只要我们的青年把我们的理想在群众前面一解释一宣布,群众就会跟了我们走,就实现了我们的领导作用呢?这些都是不能成功的。任何领导者,如果自命不凡,目空一切,装出领导者的架子,那结果他不但不能领导群众,而且会脱离群众。至于把很美丽的理想讲给群众听,群众自然可能来听一下,然而要他们为了这个理想来牺牲奋斗,那单靠这种宣传工作是不能达到目的的。

领导群众,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青年人决不要把这个看得太简单了。这里,第一个问题,就是要求我们的青年到群众中去。我们的青年对于“群众”两个字的观念常常是比较抽象的,有时把“群众”理想化,有时看不起“群众”,而不能活生生的去了解“群众”。所以下决心到群众中去,实是开始领导群众时的必要的一步。

我们青年到了群众中之后,就要学习如何去接近群众,去同他们生活在一起,去了解他们,以至取得他们的信任。这里,首先就是要时时刻刻去为群众服务,处处能够为他们谋利益,为他们的利益牺牲自己的一切。其次,

要我们处处谦逊和气,刻苦耐劳,宽宏大量,急公好义,海人不倦,做人家的模范与教师。第三,要能够团结与培养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发挥积极分子的作用,依靠积极分子推动全体。第四,要以民主的精神与民主的工作方法来吸收与教育群众积极参加工作,不要个人包办一切。第五,要善于孤立最顽固的少数坏人,依靠群众的公愤去打击他们与驱逐他们。只要这样,群众就会把我们当做他们“自己的人”,就会信任我们,接受我们的领导。

无疑的,当我们真正深入到群众中去时,我们必然会看到群众中有许多落后意识,落后的思想与习惯,他们的狭隘的宗法的与行会的观点。这一切我们都会碰到的。然而我们是不是因此就失望而脱离他们呢?决不是的。我们的责任,正是要提高他们的政治水平,克服他们的落后性。但是当我们认真在群众中工作时,我们更会碰到群众中的光明的一面,他们的丰富的革命性与他们的伟大的革命力量。我们在他们的深处,可以看到在旧社会的上层所没有的那种德性。他们的力量,他们的德性,可以给我们以最大的信心,使我们相信他们是我们的最伟大理想的负担者,而且他们最后一定能胜利。这就使我们在他们中间感觉到一种崇高的安慰与喜悦,这就使我们在任何困难的情形之下,总是不会脱离他们,而且总是要依靠他们的力量来克服一切困难。事实已经证明,正在证明,将要证明,一切我们当前的困难,只要我们真能发动千百万群众起来,并且依靠他们的力量,就是一定能够克服的。

一切前进的革命者,是决不应该惧怕群众的,相反的,他们必须依靠群众。

领导群众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要善于使群众根据自身的经验来了解我们的领导的正确。比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开始时不是大多数中国人都能了解与拥护的。当时我们用什么口号使群众根据自身的经验来了解我们的方针的正确呢?这就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119]。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对于中国内战的痛苦都是切身感受到的,他们都能够懂得日寇的无限制的侵掠同内战是不能分离的。因此他们也许还不了解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然而对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是热烈拥护的。结果,内战停止了,中国开始统一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到了初步的成功。不久芦沟桥事变发生了。当时我们用什么口号使群众根据自身的经验来了解我们的方针的正确呢?这就是“为保卫平津、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而战”。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对于日寇的这种无限制的侵掠已经到了不能再行忍耐的地步,他们都要求抵抗。全国抗战开始了。于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了进一步的 success。在抗战发动之后,我们用什么口号使群众根据切身的经验来了解我们的方针的正确呢?这就是“坚持抗战、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口号。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对于这个口号是能够懂得的,因为谁都可以看到,如果中国今天半途投降妥协,那中国就会亡国,中国人就会变为亡国奴,而亡国奴是不好当的。于是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有了更进一步的成功。

这不过是举一个例子罢了。不但在提出口号上是如此,即在斗争形式的采用上也是如此。我们要使自己不脱离群众,必须采取那种能够吸引群众参加的斗争形式,他们认为今天可以而且需要的斗争形式,以锻炼他们,提高他们的觉悟程度与组织力量。在斗争形式上是如此,在其他问题上也莫不如此。

不估计群众今天觉悟的程度,而提出很高很“左”的口号,是决然不能动员群众参加运动的。这里需要采取各种过渡的办法来动员他们,再在运动中提高他们走向我们的理想。这里,一切急性病是有害的。这里,领导者的努力工作的精神,要同极大的忍耐心配合起来。群众的觉悟的速度,不但依靠于我们的工作,而且依靠于无数客观的政治经济的要素。革命是决不能凭主观的愿望来制造的。在没有革命形势的时候,特别在反动的黑暗的时期,群众觉悟的速度非常缓慢。那时我们如果没有等待时机的忍耐心,而想用强迫命令的方法去对待群众,那结果是必然会失败的。所谓等待时机,当然不是不要努力工作,而是把我们的工作放在准备必要的力量上,以便将来革命形势到来时,群众成千成万卷入革命浪潮中时,我们能够站在浪潮的前面负担起领导者的责任。

在群众工作中的命令主义,结果没有不遭受失败的。群众在某种压力之下,可能勉强的服从,然而一切不根据群众自觉的服从,违反于他们意志的服从,最后必然会引

起他们反抗并推翻那些压迫者或命令主义者。只有群众自觉的自愿的服从,才能发挥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力量到最高限度,来实现我们远大的理想。所以我们领导群众的中心问题,也就是如何使群众心悦诚服的来接受我们的领导,并且为了我们的理想的实现牺牲一切。这就要求我们在领导工作中善于使群众能够根据自身的经验来了解我们领导的正确。这里,应该反对那些光会喊喊革命口号、唱唱高调的空谈主义者,与企图以强迫命令的方法来“驱使群众为己用”的老爷们!

但是,当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群众觉醒的速度一日千里的时候,我们要谨防自己落后于群众,变为群众的尾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仍然应该站在群众的前面,组织群众的积极性向着一定的目标前进。我们要善于迅速的改变过时的口号,提出新的更高的动员口号,采取大刀阔斧的办法来动员、组织与武装群众,推动群众斗争走向最高的形式。比如在目前被敌人占领区域的广大乡村与战区的情况,就是如此。群众抗日的斗争往往一开始就采取武装斗争的形式。在这里,几天内群众所达到的觉醒程度,可以比上过去的几十年。旧的口号、旧的斗争方式与工作方法等,决不能满足群众今天的要求。群众的民族革命的高潮,会冲开一切这些陈腐的东西,找到他们的新的领导者,走向他们的目的地。

领导群众的第三个问题,就是要向群众学习。一切革命的经验,都是从群众的实际斗争中创造出来的。离开群

众的革命实践,我们就不能有革命的理论。而群众的革命实践是长生的,是无穷的,是永远继续前进着的。它发展与充实我们的理论,它改正我们的错误,它使我们一天一天接近着绝对的真理。所以我们必须在群众斗争中去学习,在这个人生的大海中去学习。我们的学习是没有止境的。

群众的革命实践不断创造出极可宝贵的斗争形式、组织形式、工作方法与方式以及各种极可宝贵的经验。这些群众创造出来的东西,常常是一个领导者,即使是天才的领导者,也不能预料到的。有时一个领导者常常苦于找不到一个适当的斗争形式或组织形式以进一步开展群众运动。但是群众的革命实践常常创造了这种适合的形式。群众对于一个问题所发表的意见,他们对于一个问题的看法与感觉,常常是一个领导者,即使是天才的领导者,也想不到的与感觉不到的。而正是他们的意见,他们的看法与感觉,可以补足一个领导者对于某个问题的理解之不足与缺陷,使某个问题得到圆满的正确的解决。

所以,群众不但需要我们去教育,而且他们也教育我们。我们的青年切不要在群众前面摆资格,自高自大,瞧不起群众,而应该很虚心的去跟他们学习,很细心的去倾听他们的意见,与他们的脉搏一起跳动。

总之,我们在领导群众中的基本原则,是无论如何要领导群众前进,而同时无论如何不要脱离群众。脱离群众的先锋主义与落后于群众的尾巴主义,都是我们所不应

该赞成的。

同志们,要把这样广大的、千千万万的、觉悟程度不同的群众动员到为我们的理想而牺牲奋斗的一条战线上,真不是简单的事。要达到这个目的,你们无论如何不要脱离群众,而要成为他们的领袖。

* * *

同志们!这就是我今天想同同志们讨论的关于青年的修养的四个问题。

同志们!我前面已经说过,革命是一件最伟大的事业,也是最困难的事业。我们在革命中犯些错误,甚至是非常严重的错误,是免不了的。至于青年朋友们,由于生活经验与斗争经验的缺乏,犯些错误更不是什么不得了的问题。我们决不能因为怕犯错误,就不干革命。相反的,我们就要在错误中学习。

我们青年人切不要以自己已经有的一点知识与一点经验,甚至一些生吞活剥的革命的公式与口号为满足。这对于青年们是最大的危险,因为这种满足就阻碍了你们的进步,结果必然会使你们成为无用的“空头革命家”。青年们必须以列宁的“学习学习再学习”^[254]的口号,当作自己的座右铭。你们今天在陕北公学学习,明天就要到抗战的前线与后方的实际工作中去学习。青年应该有最热烈的学习愿望,很高的学习精神与谦逊的学习态度。只有这种不断的学习,才能丰富你们的知识与经验,才能使你们成为一个能干的革命者,才能使你们更能承担起在自

己肩膀上所负担的责任。

我重复的说,工作中的错误是谁也免不了。我们就在错误中学习。任何错误,不论为它曾经付了如何高昂的代价,只要我们从错误中得了宝贵的经验,那这种代价也是不算可惜的。所以,我们用不着怕犯错误。但犯了错误,我们应该知道很快的去改正错误,切不要坚持错误。任何错误,如果坚持下去,那是非常危险的。青年人应该打破“爱好面子”、不肯或者害怕承认错误的恶劣倾向。青年人应该“爱好真理”。一切错误的非真理的东西,都应该决然抛弃,丝毫也不应该留恋。只有这样,才能使你们不断的进步。

所以,同志们,你们更努力的去学习革命理论吧,更大胆的去工作奋斗吧,在学习的过程中,在工作奋斗的过程中,去锻炼你们自己成为钢铁一样的战士吧,要不怕困难,不怕挫折与失败,要不怕天不怕地,要再接再厉地不屈不挠地向着你们光明的伟大的理想前进!

读了《张国焘敬告国人书》^[255]之后*

(一九三八年六月七日)

—

每一个中国共产主义的叛徒,在他叛变共产主义之后,照例要发表一个“自首书”,在自首书中,照例要乱骂一顿共产主义如何如何错误,共产党如何如何要不得,而同时又要表面上颂扬一顿三民主义如何如何正确,国民党如何如何好等等。这类照例的自首书,不但我们共产党人看了毫无兴趣,就是一般国民党人与普通中国人看了也只觉得自首分子之无耻与无聊而已。

我们也早已料到张国焘被中共中央开除党籍之后,一定也要来这么一套的。最近他在武汉公开发表的《张国焘敬告国人书》,也就是张国焘的自首书。在这个自首书中,张国焘骂中共过去的政治路线如何“连串错误”,骂中共过去的牺牲奋斗如何“完全与民族利益背道而驰”,骂中共如何“持久的阻挠内求统一与外抗强敌的斗

* 本文最初刊载于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第四十二期(一九三八年六月二十日出版),署名洛甫。

争”，骂中共现在“已经不是什么无产阶级的政党，而是以农民占多数的小资产阶级的集团”，骂中共今天所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完全是阴谋诡计等等。总之，凡共产主义叛徒以及一切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托派^[164]汉奸们所用来谩骂中共的滥调，张国焘都完全用上去了，甚至字句上都是完全相同的。

中国共产党对于共产主义的叛徒们以及一切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托派汉奸们关于共产主义与共产党的各种造谣污蔑，曾经有过无数次严正的驳斥。现在就是普通的中国人都不相信他们所讲的那一套滥调了。因此对于张国焘的自首书，我们也觉得没有多费精力来加以逐条驳斥的必要。但是我们不能不附带指出：张国焘的这个自首书，却出乎他的意料的给了我们以很大的帮助。张国焘在共产党内是一个从来不肯讲老实话的人，然而这一次叛党之后他竟能这样赤裸裸的把他的全部立场和盘托出，我们不能不对他这次举动表示一点谢意。从张国焘的这个自首书中，现在谁都明白中共中央为什么要开除张国焘党籍了，现在谁都可以明白中共中央开除张国焘的党籍，完全不是象他所说的那样，因为他要到汉口同中共中央负责人“商讨”什么抗战建国问题，而正是因为他的思想与行动已经走到了违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走到了对共产主义与共产党绝对仇视的地步。从张国焘的自首书中，现在谁都可以看到，今天的张国焘是何等下流无耻与穷极无聊！请张国焘君更多的去散发他的《敬告

国人书》到全中国以至全世界去吧！大家从那里可以明白看出张国焘的一切真相！

因此，我在本文内关于张国焘的自首书只想写一点简单的评语。

二

只要略微知道中国革命史及中共党史的人，就可以知道，张国焘今天的叛变共产主义与共产党，实在不是偶然的。如果我们研究张国焘过去在中共党内所犯的各种严重错误的历史，再读一下他今天的自首书，那我们可以确定的说，张国焘从来就不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真正的共产党员，而是一个混在中国革命队伍中，混在中国共产党内的投机分子与破坏者。

张国焘在中共党内有他一贯的错误路线。详细的分析起来，他的错误路线有三个组成部分。

第一，是他的腐朽的机会主义。无论什么时期，他在中国革命的紧急关头没有一次不犯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的。他总是想以他的机会主义路线来反对党的路线，即是以他的使中国革命失败的路线来反对使中国革命胜利的路线。他有时“左”得发狂，他有时右得可耻。但不论是“左”是右，他的路线总是要使中国革命走到失败的。比如在第一次大革命时代，他开始以极左的言论行动反对国民革命的统一战线^[256]。后来，他的企图失败了，国民革

命的统一战线成功了,于是他又一转到极右,成为陈独秀机会主义的最可靠的助手。在苏维埃革命时代也是如此。他一方面以极左的言论行动破坏工农的巩固联盟,想使共产党、苏维埃在群众中得不到信仰,但另一方面当他一受到围攻与部分挫折时,他又转到极右,立刻张皇失措、退却逃跑,以至准备投降出卖。在现在抗战建国的新时代,又是如此。他开始以极左的言论行动坚决反对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后来他的反对失败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起来了,于是他又向右一转,转到叛变共产党,叛变革命。

第二,是他的自私自利的极端个人主义。无论什么时候,张国焘总是把个人的利益放在中国革命利益的前面。他的个人利益是一切,革命对于他不过是儿戏,是进身之阶。他在党内总是进行小组织小派别的活动,破坏党内的团结与统一,以反对革命与反对党。在进行小组织与小派别的活动时,他可以用一切下流无耻与造谣污蔑的手腕对付自己的同志,他可以同一切反革命的分子联合对付自己的党。在革命与党处于困难而他认为有机可乘时,他不惜在党内公开反对党,反对革命,公开成立伪中央^[257]以分裂党与葬送革命。在军队中,他的自私自利的极端个人主义,转变为无恶不作的军阀主义。在这方面,他曾经给了中国革命以很多的损害。

第三,是他的口是心非、言不顾行、行不顾言、两面三刀的恶根性。在他的机会主义和小组织、小派别等的错误

受到党的严重批评与打击时,在党内的情况使他坚持自己的错误成为不利时,他就会随风转舵,表示退却。于是他的“声明书”、“悔过书”就不断的来,他会痛哭流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而实际上他从来没有真正承认过他自己的错误,他只是把他自己的错误隐藏在心上。这种两面派的态度,是张国焘的“保护色”,因为这样做,可以保持他在革命队伍中的与党内的地位,使他能够等待有利时机,向革命与党实行新的袭击或进攻。

当然,张国焘路线的这三个组成部分,不是在一个时期都一齐暴露出来的。在某种情况之下,他的错误的某一组成部分特别明显的暴露出来。因此要彻底认识他的错误的三个组成部分,也不是在一个短时期内所能做到的,而必须从他在革命队伍中、在党内的全部历史中去考察才有可能。但只有当我们正确的理解了张国焘路线这三个组成部分的统一与总和之后,我们才能全部把握住张国焘的本质,他的人格与他的真面目。

我们并不否认张国焘曾经拥护过党的革命路线,曾经为革命为党做过一些工作,没有这个条件张国焘是一天也不能混在革命队伍中与党内的。但是当我们彻底把握住了张国焘一贯的错误之后,我们应该说,张国焘这样做的目的,决不是为了革命的利益,为了巩固与发展党,而是为了企图以此取得革命群众的与党的信任,取得与保持他在革命队伍中与党内的地位,为了欺骗群众与蒙蔽党,以便利于他反对革命与反对党的工作。今天他的自

首书,不过用张国焘自己的口供来证明这一点罢了。所以,我们说,张国焘从来就不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而是混在中国革命队伍中,混在中国共产党内的投机分子与破坏者,这是完全正确的。

这里,也许有人要问,张国焘既然是这样一个混在中国革命队伍中与混在中国共产党内的投机分子与破坏者,那末共产党为什么不老早就把他驱逐出党,而直等到今天呢?这是不是表示中共本身的糊涂与不警惕呢?不是的。前面已经说过,张国焘的真面目不是在一个短时期内全部暴露出来的。中共对于张国焘过去所暴露的每一个错误,从来没有放松过去。中共发展的历史过程,也是同反对张国焘错误的斗争不能分离的。然而中共过去为挽救一个老干部起见,对于他的错误每一次总是采取最耐心的说服与教育的方法,每一次总是诚恳的希望他真心改正错误,为革命效力。这是中共历来对于自己的干部的态度。不论张国焘过去怎样口是心非,两面三刀,中共的这种工作,仍然得到了一定的结果的。每一次反对张国焘的斗争,使张国焘不能不暂时放弃他的错误,向党表示屈服,在一个时期内为革命为党做点工作。而更主要的,这些反对张国焘错误的斗争教育了全党同志,使全党同志懂得了张国焘的错误,使张国焘没有法子以他的错误思想与行动影响同志,使不肯真心改正错误的张国焘最后完全陷于孤立,使他在革命队伍中与党内投机与破坏的阴谋完全失败,结果不能不“单枪匹马,落荒

而逃”。

请问在张国焘反党的斗争中,究竟是张国焘胜利了还是中共胜利了?我们说,结果是张国焘的完全失败与中共的完全胜利!这个投机分子,这个破坏者,这个口是心非的阴谋家,这个没有丝毫政治道德的腐朽的政客,在革命队伍中,在中共内部混了十七年,曾经占据了极高的地位,然而当他叛变革命与叛变党的时候,在群众中找不到一个同情者,在党内拉不到一个受他影响的共产党员。这真是空前的惨败。现在出党之后,他还想以他的自首书来影响群众,影响我党同志,岂不滑稽可笑?

不管张国焘等怎样谩骂污蔑,中国共产党即在反张国焘斗争的彻底胜利这件事上,也已经充分表示出它作为生气勃勃的、有战斗力的、健康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本质了。张国焘这类投机分子与破坏者的滚出党,对于中共只有好处,没有丝毫的坏处。张国焘这类投机分子与破坏者滚出革命队伍,对于革命也只有好处,没有丝毫的坏处。

三

关于过去的张国焘既如上述,今天的张国焘又如何呢?

张国焘在他的自首书中装腔作势,似乎要表示他是“素具抗战到底的坚强决心和抗战必胜之坚强信心”,似

乎他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决拥护者,甚至不惜捏造种种事实作为证明。然而事实怎样呢?远的且不说,只要把张国焘的自首书从头至尾读它一遍,立刻可以看出张国焘的抗日真相了。

第一,张国焘说是要“抗日”,然而张国焘的自首书中全部都是“反共”。全中国全世界一切有良心的人,只要研究一下中国革命史与中共党史,他们就会明白中共历年来牺牲奋斗的历史是与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史血肉相关的。中共始终把彻底解放中华民族的事业当成自己的神圣的任务。为了完成这个任务,中共已经艰苦奋斗了十七年。它以无数同志的生命与鲜血,奉献给了中华民族彻底解放的伟大事业。没有过去的那种英勇牺牲与艰苦奋斗,今天的全民族的抗战显然是不可能的。现在任何的造谣污蔑,已经封锁不了这一历史的真理了。关于今天中共同志在抗战前线与后方充分发挥了民族先锋队的作用,更是谁都可以看到的铁的事实。然而,张国焘今天却昧尽天良,抹杀一切历史真理,不顾一切事实,向中共进行疯狂的攻击。在今天,正当全国人民以争取中华民族彻底解放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去对抗日寇灭亡中国的“防共统一战线”^[126]之时,张国焘自命不凡,担负起“防共”丑角的不名誉职务,其丧心病狂,可以想见。难道张国焘是为了要“抗日”而这样做的吗?

第二,张国焘说是要“抗日”,然而张国焘的自首书中却是全部充满了挑拨国共两党关系的谰言。国共两党合

作则中国兴,分裂则中国亡,这已经是全国各党派与全国人民所公认的真理。只有托派汉奸,才利用一切方法来造成国共两党的分裂,以此来达到他们帮助日寇灭亡中国的目的。今天张国焘竟象鹦鹉学舌一样,完全重复托派汉奸们拥护此党打倒他党的论调,企图以此造成国共两党以及全国各党派间的磨擦与分裂,使中国抗战最后遭受失败。他表面上似乎是拥护国民党,而实际上,这正是打击国民党并使国民党与其他各党派同归于尽的阴谋。难道这又是表示张国焘的真心抗日吗?

第三,张国焘说是要“抗日”,然而张国焘的自首书中,对于在前线浴血抗战的国民革命军八路军、新四军,对于中华民国领土内的一个良好的抗日根据地陕甘宁边区,进行各种造谣污蔑。张国焘不能不承认:“八路军奋勇杀敌,深为国人所赞许”。然而他却有意否认八路军已成为国军之一部的明显事实,企图利用“国军化”的口号,在八路军中进行破坏工作。陕甘宁边区政府的一切进步的设施,正是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与《抗战建国纲领》^[258]的彻底执行。它不但得到陕甘宁边区全体人民的坚决拥护,而且也得到全国人民的赞许。事实上边区政府也早已是中央政府的一个组成部分了。今天国民政府^[259]还没有正式承认它的原因,我们只认为是国民政府工作中的疏忽,而不是边区政府的不愿意。国民政府的这种疏忽,在目前抗战紧急的关头,是可以原谅的,虽是我们希望它能够赶快纠正这个疏忽,免为奸徒所利

用。今天张国焘就想利用这件事来破坏边区政府,挑拨边区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他的所谓“还政中央”的口号,实际上是要边区政府停止抗日除奸的工作,放弃民主制度的实行,取消一切改善人民生活的具体设施,是要使边区人民在日寇汉奸的前面解除武装,重新回复到过去的黑暗时代。至于其他各地的游击部队早已集中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四军,开到前线上去杀敌,难道张国焘还不知道吗?请问张国焘对于全国抗战的优秀力量的这种造谣污蔑,是表示他的真心抗日吗?

第四,张国焘在他的自首书中,还向中共提议什么“一致站在国家民族的立场上,从事实中央之外交政策”。请问张国焘的这个提议应作何解呢?如果说中央的外交政策,就是象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260]及《抗战建国纲领》上所昭示的,那这样的外交政策不但为本党所坚决拥护,而且也是本党历来的主张。关于这一点,张国焘当然是完全知道的。然而张国焘为什么又要特别拿这一条向中共“提议”呢?可见张国焘所说的“中央之外交政策”必然是另有所指。大概是要中共拥护叶青^[261]、陶希圣^[262]等把德、意法西斯侵略国认为好朋友,赞扬张伯伦^[263]的妥协政策为最好的“现实政策”,天天进行反苏联的宣传煽动的“外交政策”吧。那我们要告诉张国焘,这种外交政策并不是今天“中央之外交政策”,我们也自始至终反对这种实际上帮助世界法西斯侵略集团、孤立我们自己的错误的“外交政策”。请问张国焘为什

么不把他自己要讲的话,明明白白的说出来呢?难道这也是证明他的真心抗日吗?

此外,张国焘在自首书中还想来点“回忆”,想把他过去反革命反党反中央的丑恶史写成为张国焘如何如何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斗争的“光荣史”。这真不免令识者哑然失笑。然而张国焘在这里又不免弄巧成拙。他的“回忆”证明的不是光荣的张国焘,而正是无耻的张国焘!

从张国焘的片断回忆中可以证明什么呢?这只能证明中共中央过去关于张国焘的错误路线的一切估计是完全正确的。过去中共中央在川西北与张国焘会合时,张国焘反党反中央的政治幌子,是说中共中央执行“避免斗争,不要根据地”的“右倾机会主义与逃跑主义”,而张国焘却执行“要坚决消灭敌人,要创造新根据地”的“进攻路线”。张国焘当时在党员中,在部队中,在群众中,就是这样大吹大擂宣传的,这也是大家所亲耳听到的。然而今天张国焘的回忆,却自己证明执行右倾机会主义、逃跑主义的是张国焘,不是中共中央。看!张国焘在自首书中自己就这样说:“本人彼时估计长征是失败,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前途早成过去,吾人应在川西和西康地区或甘肃西北部之甘凉肃一带,首先求得与中央军之休战”。请问张国焘这种主张在当时环境下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中共历年来的革命斗争已经完全失败了,创造新根据地的事业已经完全不可能了,唯一的出路只有退避西陲,向中央军接洽投诚了。这就是张国焘的所谓“坚决消灭敌人,创

造新根据地”的“进攻路线”事实上这不就是十足的右倾机会主义、逃跑主义与投降主义吗？这也就是张国焘的所谓抗日主张。事实上把部队放在川西、西康、西藏、甘西北是为了要抗日吗？难道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张国焘要“抗日”就搬了家吗？以后的事实只是证明了中共中央当时坚决北上抗日、创造抗日根据地的路线的完全正确与张国焘路线的完全破产！

张国焘又把他的北上描写成为似乎由于他坚决拥护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共产国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决定^[264]之结果。这真是天大的笑话！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决定，在中共中央一九三五年有名的“八一宣言”^[265]上，已经明确的宣布了。张国焘的北上，完全不是由于他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是由于他的错误路线的破产与中共中央路线的胜利，由于二方面军的推动及四方面军最大多数同志与将士的要求，也是由于当时中央对他的耐心的劝导与宽大的态度。事实也证明了：在四方面军与中央会合后受党的审判的，是张国焘不是中央；承认自己是右倾机会主义、军阀主义、反党反中央的，是张国焘不是中央；亲自写声明书、悔过书，在党员群众面前痛哭流涕的，也是张国焘不是中央。

请读者看一看下面的一段话：

“经过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266]许多同志对于我的错误的彻底揭发，使我对自己的错误有更深入的了解。的确，我的错误是整个路线的错误，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退却

路线和军阀主义最坏的表现,是反党反中央的错误,这错误路线不仅在各方面表现它的恶果,使中国革命受到损失,而且造成极大罪恶,客观上帮助了反革命。”(《党的工作》^[267]三十一期,一九三七年四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出版)

这就是张国焘在一九三七年四月六日亲手写的《我的错误》的声明书!而这样的书面的与口头的声明书,还多得很哩!

想来再用不到其他的说明了把!

至于说张国焘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了解始终与中共中央是不一致的,这倒完全是事实。当中共中央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艰苦奋斗的时候,也正是张国焘远在西康、西藏当“土司”^[268]的时候。当我们告诉张国焘我们关于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时,他完全以讥笑、谩骂的态度对付中央的方针,完全不相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建立之可能。然而,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建立,他却又转到另一极端,主张取消共产党实行投降。而主张取消共产党的那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际上不就等于取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吗?

所以不论在过去或现在,张国焘都是反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因此他要到武汉,要反革命,要叛党,要反共,真正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巩固与发展而奋斗的,是中共中央而不是张国焘。请张国焘永远放弃这样的念头吧,似乎中共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应该首先取

消自己。相反的,中共认为: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与发展,中共不但应该保持自己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而且还要大大的使之巩固与发展,以适合于目前展开的抗战形势。今天全国多一个共产党员,即多一分坚决抗敌的力量。这不但是共产党的要求,也是全中华民族的要求。

由此可见,张国焘的一切抗战到底的什么“信心”、“决心”、“回忆”之类,都不过是张国焘的烟幕弹,而实际上他的全部论调,完全是从叶青、柳宁^[269]之流的武器库中取来的,他所做的工作是不利于国家民族的。难怪张国焘的自首书发表之后,所有托派的刊物都异口同声的赞扬张国焘的“觉悟”,把张国焘称为“同志”了。古人云:“物以类聚”,信然!

然而这究竟不免使我们有点失望。在张国焘出党之后,我们曾经这样的希望张国焘:你不愿在共产党内为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而奋斗,为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那你在党外多少为国家民族做点有益的事业吧。你不要同托派汉奸合流,遗臭万年吧!然而今天的张国焘竟死命的向着这个牛角尖里钻去,真是可叹。这也许就是张国焘的最后归宿地吧。然而我们仍然希望张国焘能够及早回头,痛改前非,重新做人。不然,他的前途实在是不堪设想的。

今天的张国焘,就是如此。

四

从过去的张国焘发展到了今天的张国焘。从他的过去与现在去推测他的将来,大概不是一件什么难事吧。他今天已经向着叶青、柳宁等人方面急进,在他们那里寻找朋友,这已经是无疑的事实。

那么以后呢?

这当然要决定于张国焘自己。我们并不想给张国焘“算八字”^[270]。但不论张国焘以后怎样,今天的张国焘想在社会上找一个位置,那是无疑的事实。张国焘的《敬告国人书》就是他的投标广告。他那种向着当局卑躬屈膝阿谀奉迎的态度,显然是为了要达到他的这个目的。

也许有人要把张国焘当作可居的奇货吧,要利用他来做“反共”的“特务工作”吧。张国焘在他的自首书中也已经表现了一下他在这方面的本领,当做一种样本,给主顾去赏识了。然而我们相信这种货色的销路现在究竟是不很旺的。因为现在全国不是“反共”的时代,而是国共合作与全国大团结的时代。除了日寇及其在华的代理人外,究竟还有谁去购买这种货色呢?武汉各大报拒绝登载张国焘的自首书,就是最好的证明。

如果有人以为,张国焘今天在他尚未表示痛改前非、重新做人之前,还可以用来做抗日救国的事业,那我们根据十七年来关于张国焘的经验愿意向我们的抗日朋友们

贡献一点关于张国焘的简单意见：张国焘是一个自私自利的、极端个人主义的、口是心非的、言不顾行、行不顾言的、两面三刀的、没有任何政治道德的政客。他可以公开奉承你、阿谀你、拍你的马屁，但同时他可以暗算你、陷害你、叛变你。他口里所说的是一件事，他背地里所做的又是一件事。仁义道德、礼义廉耻，在张国焘的身上是一点也找不出的。革命与张国焘是根本不相容的。

好吧，让张国焘去声嘶力竭的叫卖他的破铜烂铁吧。中华民族的神圣抗战必须坚持到最后的胜利，我们共产党人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究竟谁将是张国焘的主顾，我们是毫无兴趣的！

但是我们希望全国抗日的朋友们，不要上张国焘挑拨离间的当，中他花言巧语的奸计。我们需要的是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与发展，是全国内部的更加团结——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克服抗战中一切困难，而最后战胜日寇！

论待人接物问题^{*}

(一九三八年七月二十六日)

同志们！

在民族抗战的大时代，动员全国绝大多数的人民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争取抗战建国彻底胜利的主要关键。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一个革命者，一个革命的政党，必须要有先进的科学的革命理论，正确的坚定的革命主张，实现这些主张的正确办法，以及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关于待人接物问题，即为这种办法中的重要的一部分。

我们共产党人，在待人接物问题方面，同样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上。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但要求估计到中国社会各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作用及其相互间的区别，而且也要求认识一切中国人所有的民族的、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思想的、风俗习惯的各种传统与特点。在待人接物问题上，估计到中国人的这些传统和特点，再加

* 这是对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毕业同学的讲演。最初刊载于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第六十五期（一九三九年二月二十八日出版），署名洛甫。文中的插题是本书编者加的。

以改造与发展,使之适合于中国革命的要求,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重要任务之一。我们相信在这个问题上加以注意,对于动员全国最大多数的人民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定有很大的帮助。

我现在就这个问题提出一点意见,是否有当,希望同志们讨论。

要有伟大的胸怀与气魄

在待人接物方面的第一个要求,就是要有伟大的胸怀与气魄。

这就是说,决不要把党派的偏狭成见去看待无党无派的人,似乎除了本党本派的人外,那些无党无派的人都是不中用或不好的人。这种态度,显然是完全不正确的。“宽宏大量”——这本是中国人从来所称道的美德。一个革命的党派固然因为代表一定的社会历史利益,会有自己一定的党派性;固然根据自己的政纲吸收了一个阶级或几个阶级中的最先进分子;然而这并不是说除了这些先进分子外,就没有能干的与有用的人了。相反的,一党一派所吸收的优秀分子究竟有限,而人民大众中间有才干的与有用的人却是无穷的。革命的党派需要善于学习《中庸》上所谓“天地之所以为大”^[271]的精神,不但应该从他们中间不断的吸收最先进的分子入党,扩大自己的革命队伍,而且应该吸收一切非党的积极分子参加一切

革命工作,依靠他们或经过他们的帮助,来完成革命的事业。如果人们的眼光,只限制在现时自己党派内的几个人身上,只相信这些人是可靠的,甚至想以这些人来包办一切,甚至“包而不办”亦在所不惜,那我们可以说这些人是决然不能成就什么大事业的。

这就是说,决不要以一个幻想的公式去对待人,似乎只有合乎这个公式的才是好人,而不合乎这个公式的,就是坏人。这种态度显然是完全不正确的。因为天下的人虽然有着“人”的共同点,然而仍然是多种多样的。不但各党派与各党派间的人不相同,各阶级与各阶级间的人不相同,即在同一党派同一阶级内的人,虽是又有他们的共同点,也是不相同的。我们决不能把天下各种各样的人装进一个幻想的公式里去,这是非常显然的。如果一切不合于幻想的公式的人,就是坏人,那就怕天下坏人占大多数而好人却占少数了。如果这样,那未来光明社会的建立,还有什么希望呢?事实所证明的,也正好相反。不合于公式主义者的要求,然而有才干能做事的人,却正多着呢!

这就是说,决不要把自己的眼光限制在个人的家属、朋友、师生、同事、亲戚等更狭小的圈子之内,似乎只有在这个圈子内的人才是可靠的,在这个圈子以外的人就不可信任。这种态度显然是完全不正确的。因为在一个人的家属、亲戚、朋友、师生、同事中间固然也有可用之才,然而这个圈子究竟是非常狭小的,要在这个圈子之内解

决天下大事,当然是不可能的。这种小圈子主义的现象,在中国旧社会内甚为普遍,其流毒亦甚深。关于这一点,想来用不到任何的说明了。

这就是说,决不要以一时的好恶去对待人。同志们不但要善于能如“禹闻善言则拜”^[272],并要能够在一定的原则下,服膺中国人所谓“不念旧恶”,实行恕道。人们的弱点,在于常常欢喜恭维自己、奉承自己、拍自己的马屁的人,而有这样弱点的人,对于那些正直不阿、大公无私的人,却常常抱有厌恶与不快之感,对于过去有过争论的人,有过恶感的人,常常表示怀恨。这种态度显然是完全不正确的。事实上,那些善于恭维自己、奉承自己、拍自己马屁的人,正是那些最容易把事情弄坏的人。而那些能够经常指出与批评自己的缺点与错误的人,却正是对于事情最有帮助的人,最可宝贵的人。历史上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中国人从来所最为称道的美德之一,是“从谏如流”。事实上,在中国历史上,凡是愿意事业成功的,都是知道这点的。反之,都会陷于失败。所谓“禹汤罪己,其兴也勃,桀讨罪人,其亡也忽”^[273],这已成为中国人公认的历史真理。而承认这个真理,就是一方面要善于自己批评自己,另一方面又要善于接受他人对自己的批评,不讳疾忌医。孟子说:“不信仁贤则国空虚。”^[274]这句话在国难的今日,是具有特别价值的。李世民(唐太宗)也说过以下几句中肯的话:“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

为镜,可以知得失。”^[275]抗日建国的事业,是一种极艰难的事业,如果不善于“以人为镜”,以求战胜敌人之道,则事业的成功是很困难的。如把人们对于自己的谗言、劝告、批评,当做人们对于自己的攻击,当做人们要破坏自己的威信,当做人们要同自己争取地位或所谓“争领导权”,这种人不论今天占据着何等重要的位置,是断然不能成就大事的。至于因为某人过去同我有过争论,有过恶感,所以我始终怀恨在心,这种小气的态度,也是错误的。相反的,不论某人过去对我如何不好,只要今天与我们的抗战建国的目标是共同的,那我们就应该不念旧恶,互相宽恕,大家一齐为共同目标的实现而奋斗。

最后,这就是说,我们必须善于找到同人家合作的共同点。许多人常常善于“吹毛求疵”,善于找人家“岔子”,善于找人家与自己的不同点,因而他们不能同任何人合作,始终陷于孤独。这种态度,显然是完全不正确的。怎样从一个同我在各方面都不相同的人中间找出今天为了革命事业而合作的共同点,即使是很小的共同点,这正是我们所应该学习的本领。只有善于在各种共同点上与各种人们进行合作的人,从各方面推动人们与我们一同行动的人,才能把最广泛的人们团结起来,组织起来,走向一个伟大的总的战斗目标。“落落寡合”、“洁身自好”的人,也许是非常清高的,然而究竟不能成就什么大事。

以上各点,都是造成伟大的胸怀与气魄的必要条件。气量狭窄、“目光如豆”的个人与政党,是决然不能“识

人”、“容人”与“用人”的。这样的个人，这样的政党，决然不能成就什么大事业，难道还用其他的证明吗？因为谁都应该明白：抗战建国、改造旧社会建立新社会的伟业，决不是靠少数人所能成功的。这里需要成千成万有才干的人，需要千千万万普通的人，不很合乎公式主义者的理想的人。没有他们的参加，任何伟大的计划，是不会实现的。

在目前民族抗战的伟大时代，我们认为凡对于抗战建国有一点用处的人，都应该成为我们的好朋友。我们应该以同志的态度去对待他们，同他们发生亲密的关系，而且善于使用他们的才能，使他们能够为了国家民族尽他们的责任。就是这些人对于我们（即拿我们共产党来说吧）还有成见和误会，我们也决不能以此为理由而疏远他们。相反的，我们的责任，正是要同他们接触，正是要以自己光明正大的言论与行动去消除他们对于我们的成见与误会。

所以在待人接物方面，我认为首先要有伟大的胸怀与气魄，要能够打破一切成见、一切公式、一切小圈子、一切私人的好恶等的限制，而容纳各种人材，使用各种人材，以便“人尽其才”，使他们在民族抗战中起他们的作用，即使是不大的作用也好。这种在抗日总原则下的“博爱”、“宽宏大量”、“兼容并包”的态度，是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条件。

同志们都知道，我们是真诚地为实现国内各抗日党

派的团结而奋斗的。我们希望大家,希望一切党派,在驱逐日寇的大目标上,减少磨擦,当然更不该互相排挤,而是需要互相帮助,互相让步。现代中国人必须善于警戒自己民族有过的历史覆辙。宋代欧阳修在《朋党论》一文中,曾正确地论到君子需要“为一大朋”,所谓“善人虽多而不厌”,而国赖以兴。同时欧阳修又痛切的论到各代暴君的惨兴党祸,诛戮善类。他说到:“后汉献帝时,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276];唐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说是“此辈清流,可投浊流”^[277]。结果,都乱亡其国。我以为我们现在特别需要沉痛记忆的,乃是明末罪恶贯盈的魏忠贤^[278]奸徒们排除异己、清除善类的流血党祸。魏忠贤奸徒们外纵强敌,而在内则对于一切善类概指为东林党^[279]而去之,因此就弄到“群小无不登用而善类几空”。《诗经》上说得好:“人之云亡,邦国殄瘁。”^[280]民族的精华既被淘汰,而外祸披猖,就更不可收拾。现在日寇经过一切亲日派汉奸托派^[164]以破坏我国内部团结,力图排斥一切赤心为国的民族先进分子——首先就是力图排斥中国共产党人,并力图将一切民族先进分子、热血青年男女概指为共产党,而以去之为快。这点,正是需要一切抗日革命的政党、一切爱国的同胞,所要特别警觉的。而要以历史的覆辙为鉴戒,就需要大家尽量发挥我民族本有的“宽宏大量”的美德,善于吸收一切民族的精华,而不限于少数人。

然而伟大的胸怀与气魄,决不是同一切人“同流合

污”。中国古代哲人说,一个人的人格应该“至大至刚”^[281],这是很对的。一方面要宽大,另一方面却要坚定。一方面要具有远大的眼光和抱负,要宽宏大量,善于容纳人,另一方面却必须有坚强的气魄,为着一定的真理,而具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282]的大丈夫态度。要“疾恶如仇”,要“临大节而不可夺”^[283],要“黑白分明”。必要“至大”,才能成其“至刚”;也必要“至刚”,才能成其“至大”。偏狭小人说不上“大”,也说不上“刚”,这是很明显的。我们要善于同一切人合作,要能够“兼容并包”,这并不是无原则无目的的同一切人苟合。不是的,一个革命者,一个革命政党的任务,是要引导一切同我们合作的人逐渐走上坚决革命的道路,走上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后战胜日寇、建立民主共和国、直至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道路,使我们真能成为他们的好朋友、教师,使我们的行动真能成为他们的模范。

要有“循循善诱”^[284]与 “诲人不倦”^[285]的精神

所以,待人接物方面的第二个要求就是要有中国古代哲人那种所谓“循循善诱”与“诲人不倦”的精神。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说,决不要为人们觉悟程度的不齐而表示失望,决不要轻视或鄙视任何思想落后与思想复杂的人。我

们常常看到有些先进分子只欢喜跟同样先进的人们高谈阔论，而且谈起来可以终日不倦，以后就很快成为知己朋友了。但是对于思想落后或思想复杂的人，则表示不愿意接近，表示冷淡，三言两语之后，即表示“话不投机”，不愿再谈了。这种态度，显然是完全不正确的。这实际上等于放弃了我們自己的责任。因为我们的责任，正是要引导这些思想落后与思想不正确的人成为同我们一样进步的分子。我们要能够善于接近一切“名流学者”、“庸夫俗子”、“三教九流”、“引车卖浆”之流，善于找到同他们接谈的机会，善于同他们进入精神上的接触，从具体的日常生活的问题，纵谈到一般的政治问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了解到他们内心的情绪与要求，他们的思想与感觉。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找出各种提高他们觉悟程度的具体办法。

这就是说，决不要以强迫命令的方法去让人们接受我们的意见。这种强迫命令的方法，也许可以一时使人家接受我们的意见，然而这不过是勉强的暂时的接受，不是自愿的长期的接受。这种接受是很少用处的。我们应该以思想上的民主态度来代替思想上的强迫命令。我们的意见应该公开提出来，同大家商讨。因为如果我们的意见是光明正大的，是合乎大家的要求的，是基本上正确的，那么这种自由的商讨，不但不妨碍我们的意见的实现，而且更能使我们的意见易于为大家所接受，做到使人“中心悦而诚服”^[286]。同时，我们的意见也决不会没有错误，这

种商讨,就可以考查我们的意见是否正确,使我们意见中的缺点与错误能够在商讨中得到改正与充实。而且也只有这种思想上的民主态度,才能使人们把自己心胸中所有的思想,大胆的无顾忌的和盘托出,使我们能发现其中的错误缺点而给他们以纠正与克服的机会。思想上的强迫命令或统制,结果只能使人们把自己的真心真意深藏起来,使我们反而无法去纠正与克服他们的真正的错误与缺点。我们在共同商讨中的主要方法,应该是启发式的,而不是教训式的;应该是从旁帮助,而不是“越俎代庖”。只有这样经过对方以自己的努力得来的思想,才能真正成为他们自己的思想。这种思想,才是最可靠的,最有力量的,能够使人们行动起来的思想。

这就是说,决不要对什么人都使用千篇一律的八股文章与老调。人们的阶级、阶层、社会地位、家庭职业、生活经历、习惯、性情、文化程度、年龄、希望、要求等各不相同,所以引导他们走上革命道路的方法也不能完全相同。例如对于工人所说的话,不能相同于农民,也不能相同于知识分子。如果千篇一律去进行工作,结果必然是牛头不对马嘴而遭受失败。虽然我们知道全中国最大多数的人都会参加到革命中来,但是他们将要经过的具体道路,决然不会完全相同的。有的经过康庄大道,笔直的向目的地前进,有的则经过许多羊肠小道,迂回曲折的前进,这些都是自然的现象。因为我们所对付的,是复杂的活生生的活人,而不是模型里铸造出来的死人。这里主要的基本的

原则,是要善于使人们从实际的行动中,从经济的政治的与思想的斗争中,从切身的经验中,锻炼他们自己,提高他们自己的觉悟程度,使他们成为坚决的革命的战士。脱离行动、脱离斗争、脱离切身经验的宣传教育工作,是浮面的,不深入的,不能动员人们为了革命而牺牲奋斗到底的。

这就是说,对于人们的错误与缺点,要诚恳的劝导,采取忠恕的态度。错误与缺点是谁也免不了,错误与缺点是要改正的。因此,对于有错误与有缺点的人,我们应该不怕麻烦的以诚恳态度去劝导他们,而且要善于利用具体的事实向他们证明,他们的错误与缺点,对于他们自己的事业何等不利。要有一而再,再而三的忍耐心,以至诚与忠恕的态度去感动他们。千万不要把“大帽子”(如汉奸或机会主义者等大帽子)随便戴在人家的头上,随便以讥笑谩骂与打击斗争的态度,对待犯错误与有缺点的人。即使有人在再三劝导之后,对于自己的错误与缺点,还是不能了解,我们也要有等待他们觉悟的忍耐心。要给他们以充分的时间去思索,去纠正自己的错误与缺点,不要操之过急。我们总要更多的设法给人家一条自新的活路,不要把人家的“逼上梁山”,使人家的“走投无路”!

这就是说,要善于根据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形,群众具体的要求和情绪,去进行教育群众和说服群众的工作,而坚持反对“朝三暮四”;“东倒西歪”的各种动摇,反对有时

看到革命形势的有利条件就兴高采烈到疯狂盲目程度，有时看到革命形势的不利条件就垂头丧气到悲观绝望程度的那种从这一极端跳到另一极端的现象。中国古人有句话说，“过犹不及”，^[287]“过分”与“不及”都是不正确的。中国人过去讲究的“中庸之道”，如果不把它像古代及现时的许多人那样解释成为折衷主义，调和主义，如果不像过去和现在许多人那样，认为它是把历史的东西和思想当成僵死不变的东西和教条，这就可以看作一定历史事物在一定时间空间中所持的坚定的、中肯的、恰当的、如《中庸》上所谓“强哉矫”^[288]的立场。一切过分的、偏激的或庸俗的、不及的论调，都是夸大片面性的结果。只有坚定不移的不偏不倚的正确立场，才能使人们迈步前进，才能有力量去克服一切困难，才能教育人们正确的把握现实与改造现实。我们共产党人所进行的两条战线的斗争，即是反对过分与不及的偏向的斗争。一些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看成简单的“过激”言论，这实在是由于他们的无知。

在目前民族抗战的大时代，我们认为中国人中除了极少数死心塌地甘为日寇走狗的败类之外，绝大多数都是愿意为中华民族的最后解放而奋斗的。只要我们能够以“循循善诱”与“诲人不倦”的精神去进行教育，就一定能使全中国绝大多数人都成为民族解放的良好战士，而使反对我们的力量减少到最小限度。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使全中国的人同我们一起，向着光明的前途迈进。一

切真正的革命者,真正革命的政党,决不能采取愚民政策,决不能惧怕民众走向自我觉醒,走向自由与光明的道路,而应该使自己成为他们的好朋友,成为他们的模范,成为他们的教师,使他们成为自由与光明的坚决拥护者。旧社会中人们的愚昧与无知,是人类进步的极大障碍。我们的任务是在扫除这种障碍物!

对人要有很好的态度

在待人接物方面的第三个要求,就是对人要有很好的态度。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说,决不要自高自大,目空一切,盛气凌人。那种态度,使你纵有多大本领也得不到人家的赞成与拥护,而且相反的,还会使你不能同人们接近,不能同人们共事,会使你到处碰钉子,会使你永远不会进步。那种态度,是完全要不得的。孔子说:“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289],这话是很正确的。我们的态度,应该是谦逊的与和气的态度。具有这种态度,才能使我们的同志与朋友关系,同他们打成一片。也只有这种态度,才能正确的认识客观环境与自己工作的对象,才能虚心的倾听人们意见,接受人们的批评,改正自己的错误与缺点。自然、社会、思想的现实,是非常复杂的,是永远发展着的,是多方面的,人类穷千万年的力量,还是不能把一切发现到最后

的尽头,我们个人这一点知识,这一点经验算得什么呢?有什么可骄傲的呢?我们要从过去人类的知识与经验中学习,要从现在的工作中学习,要从普通的人们那里去学习一切对革命有用的东西。有什么能够使我们自满自足的呢?

但谦逊和气,不能了解为敷衍滑头的政客手腕。这两者是根本不相同的。谦逊和气,正是人们对于人生的诚恳的、严肃的态度。这中间贯穿着诚恳与严肃的内容。换句话说,谦逊和气正是诚恳与严肃的表现形式。

这就是说,必须要尊敬与仁爱。孟子说过:“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290]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自尊心,都不愿人家侮辱他。所以对人的尊敬态度,是同人们接近的必要态度。所谓尊敬,当然不但是表面上礼貌上的尊敬,而且也包含着对于对方意见的尊重,很好的倾听对方的意见,郑重的考虑他的意见,诚恳的互相交换意见。也只有这样,人们才肯倾吐自己的真意,把赤心拿出来,而便于互相了解。但尊敬还须有仁爱来补充,这就是要善于关心人们的切身问题,善于为他们解决各种困难,善于照顾他们。一个人的感激心,就是从这种仁爱中产生的。而这种感激,就能使人们“永世不忘”。

这就是说,要能发扬自我批评的精神。关于这点,我在上面说到“容人”问题时候,业已说了一些。在这里我还要说几句。我们决不要幻想我们的工作是没有错误与缺点的,相反的,我们应该预先承认我们的工作是有或可

能有错误与缺点的。应该坦白的将自己的错误与缺点告诉人家。人家对于我们的批评不论是客气的,或是严格的,我们都应该仔细的倾听,接受其中的真理,即使是很细小的真理,即刻加以检查与纠正。我们应该有“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291]的精神。我们是求进步与光明的人,我们不想保持任何陈旧腐败的东西,所以我们不但怕自我批评,而且欢迎自我批评。也只有这种自我批评的态度,才能消除人们对于我们的误解与恐惧,才能使革命的事业真正很快推进。

这就是说,要真诚、坦白与婉转。我们对人应该真诚、坦白。只有如此,才有相互了解的可能。我们不应该把自己的真面目掩盖起来,用虚伪的态度去敷衍人家,同人家“打官话”。但是真诚坦白,并不是什么都是赤裸裸的、突然的、刻板式的、三言两语的、无情的,不讲面子的、没有任何转圜余地的。不是的,真诚坦白的态度,应该在婉转的形式中表现出来。采取各种曲折的形式,适合于对方的思想习惯性情的形式,使自己的真意能够逐渐表达出来,使对方能够懂得我的真意的“来龙去脉”,使双方能够有充分的时间互相交换意见、考虑问题,使双方有转圜伸缩的余地。这种婉转,不但不是虚伪的、矮揉造作的,而且正是合乎“人情之常”的。

这就是说,要“言而有信”。人们对于我们的要求,我们应该仔细考虑是否合理。如果是合理的,我们应该考虑我们是否能够满足。对于不合理的要求,我们应该

婉转的拒绝，详尽的说明我们拒绝的理由。如果我们答应做某件事，就必须认真的把它付诸实现，决不要敷衍了事。做事要贯彻到底，决不要半途而废。“阴谋诡计”、“口是心非”、“言而无信”，是没落分子维持他们的统治与威信的办法，我们革命者与革命的政党，是决不应该采取的。

这就是说，我们在群众中，要能“以身作则”，要善于体贴群众，顾虑群众的利益，顾虑群众的困难。所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292]（上面这“由”字的意思和“犹”字同）要用这种急切和诚恳的态度，这种言行一致的精神，去对待群众的问题和困难，才能使群众了解我们对于他们的忠心。中国古代劳苦大众伟大的代表者——墨子，他生平以自苦为乐，所谓“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293]，这种精神正是我们所应该继承而不断学习的。

这就是说，我们在群众中替群众解决问题、指导群众奋斗的当儿，必要采取敬谨而周密的态度。对于群众奋斗的步骤，应当慎思明辨，以求事业的正确进行和顺利成功。但这里，同时也绝对必须警戒并反对畏怯和临阵脱逃。必要不怕事，必要笃行，勇敢、从容、慷慨。当然“暴虎冯河”^[294]的粗笨办法，是要不得的。在民众中，在事业上，不要了草，不要随便，不要不负责任。要时时记挂到我对于民族、社会，对于群众事业，负有极大的责任，所以要力求正确，要努力避免错误，要如古代哲人所谓“临事而

惧,好谋而成”^[295](这所谓“临事而惧”的“惧”字,不是害怕的意思,而是敬谨的意思)。这样,奋斗就更有把握,而群众就会因此进一步地信仰自己的事业。

这就是关于态度方面,我们所要讲的几点。态度的好坏,有些人觉得似乎是无足轻重的,因而不予注意。其实这是大错特错的。态度的好坏,同革命工作的开展与否,有很大的关系。普通的人常常不注意你所讲的道理是否正确而首先看你的态度;如果你的态度不好,你的话就是说得很好,他也不愿意听的。态度是一种表现的形式。它同数千年来中国社会的民族传统,有着最深切的关系,是最容易为人们所了解的东西。我们如果抛弃这些东西,人们就会把我们看做不懂人情世故的小孩子,把我们看做是外国来的洋货,把我们看做不能亲近的可怕的怪物。我们有些同志过去因为在这方面的疏忽,曾经吃过了不少的亏,受了许多冤枉。我们现在必须坚决的注意这个问题。

要适当的对付坏人

在待人接物方面最后一个要求,就是要适当的对付坏人。没有这一条,我们所说的待人接物问题是不完全的。所谓适当的对付坏人,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说,应该区别不同种类的坏人,决不要以为既然是坏人,那就是“天下乌鸦一般黑”了。不是的,坏人也

有各种各样的。即拿今天的汉奸来说吧,有大汉奸、中汉奸、小汉奸之别。有死心塌地忠实于日寇的汉奸,有动摇不定的汉奸,有一时受欺骗的汉奸,有临时被迫的汉奸。就是那些今天破坏抗战破坏民族统一战线的顽固分子,其中也有大小不同。有的就是汉奸;有的主观上虽还想抗战,而所作的工作却有利于日寇;有的为了保持个人或派别的特权地位与利益,而反对一切进步设施;有的为了“反共”,而逻辑的走到同日寇、敌探、汉奸、托派^[164]结成“统一战线”而破坏抗战;还有一些守旧分子,一时被利用受蒙蔽的分子。即拿贪官污吏来说,也有各种不同的种类,也不能一概而论。同时这些坏分子中,有的是完全孤立的,有的是还能蒙蔽一部分群众,在群众中还有影响的;有的是在野的,有的则是在朝的,等等。

这就是说,对于不同种类的坏人应该采取各种不同的对付方法。决不要以简单的敌对的态度去对付一切坏人,或打倒一切坏人。这实际上只是一种幼稚病者的空想。而且这种打倒一切,反对一切的态度,客观上只能促进坏人内部的团结,帮助少数最坏的分子增强他们反对我们的力量。相反的,在目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时代,我们的方针是使坏分子内部发生分化,使极少数最坏的分子陷于孤立,使最大多数的坏分子“回心改意”,转变到坚决抗战方面来。这是必要的。因为这样可以使反对抗战的分子减少到最低限度,而使绝大多数的人都团结在抗战一方面。这也是可能的。因为今天真正死心塌地愿

意效忠于日寇的人,究竟是少数中的少数。至于如何实现这个方针,那就要依照各种不同的对象而采取各种不同的方法,决不能有任何的公式主义。

这就是说,我们应该首先学会以光明正大、仁至义尽的态度去劝导坏人走向正路,要他们“改邪归正”。这种方法有下列好处:第一,可以使广大的人民看到我们的立场是光明正大的,一切都是从国家民族的利益出发的,而引起他们对于我们的同情;第二,可以使坏人们看到我们对于他们的劝告是出于至诚的,他们自己的确是不对的,而使一切可能挽救的人都能为之感动而翻然改悔;第三,可以使不可救药的坏人失去任何欺骗与蒙蔽他们影响下的群众的口实(如说:“他们不要我,不是我不愿意”等等),而使他们内部发生分化,使少数最不可救药的分子陷于孤立,而便于我们的肃清工作。

这就是说,我们应该坚持站在拥护领袖拥护政府的抗战国策、拥护《抗战建国纲领》^[258]及一切有利抗战的法令的立场上,用适当的方法同坏人进行斗争。我们应该学会用最明显的不能否认的事实,去证明坏人们的非法行动,去揭破他们的阴谋诡计。今天是民族抗战的时代,坏人们的一切活动,都是对于民族抗战不利的,都是为全国最大多数的人民所反对的,因此他们的活动总是怕公开,带有阴谋性与特务性的。而我们的任务,正在把他们的一切破坏捣乱下流无耻的事实,公开的揭发出来,使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受到全国人民的审判。如果这些坏分

子还有一点“羞恶之心”、“是非之心”，经过这种揭发之后，他们一定会反躬自省，知所改悔，这对于抗战是有利的。如果这些坏分子在事情被揭发之后，不但不知改悔，而且变本加厉，那只有为人们所不齿，使自己陷于孤立而已。须知今天已经不是过去的时代了，今天的时代潮流，对于坏人是不利的，而对于全国人民却是有利的。

这就是说，不要随便相信坏人的话。对坏人要有“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的戒心。坏人中有一些往往因中毒过深，不易转变。当他们处于某种不利的情况下，常常善于改变表面态度，表示他们是一个十足的好人，以便在这种外表的掩盖之下，取得我们的信任，以便于他们将来在内部进行破坏工作。所以对于坏人表示的转变，我们一方面应该表示欢迎，另一方面决不要以他们的几句好话为满足，相信他们所讲的几句空话。我们要求他们不但在言论上，而且在行动上来表现他们对于革命的忠实。而且要把他们放在这样的地位，即使在他们反叛的情况下，也不至于严重危害到革命事业。对于一切坏人的活动，我们要有很高的警觉性，要老练，不要上他们“花言巧语”的当。我们要站稳自己的立场，紧靠住坚定的力量保证自己不至为坏人所暗算。在这方面我们革命者与革命政党吃的亏着实不少，以后要真正注意才好。

最后，这就是说，应该使反对坏人的斗争变为大多数人对于最少数人的斗争。这首先就是应该同坏人中的最坏的分子进行斗争，使别的坏人改邪归正。同时要使人人

懂得,这不是我们内部的私斗或派别斗争,而是原则的斗争,为国家民族利益的斗争。我们一切反对坏分子的话,也均应由此出发,丝毫不应夹杂意气的谩骂或个人的攻击。我们讲话的态度,应该是向着广大的民众,使他们在具体事实上了解坏人的真面目。只有这样,反对坏人的斗争才能成为最大多数民众反对最少数坏人的斗争,成为有力的群众斗争,以至使坏人们不能立足。但是,因为今天的政府已经是抗战的革命的政府,它也有责任制裁违反《抗战建国纲领》等等的坏分子,所以我们除动员群众与坏分子斗争外,向政府控告,也是必要的。

关于坏人们的结合,欧阳修在《朋党论》中说得很好:“小人所好者,利禄也;所贪者,货财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他的意思就是说:小人都是以利禄、货财相结合的,他们都是人情阴薄,不断互相争权夺利的,因此他们也决不能有真正牢固的结合。关于这点,他是观察得很对的。所以坏人并不是怎样难对付的。根据上面所指出的一切说来,我们对付坏人,就要善于分散他们的力量,使他们彼此隔离起来,使好人的势力可以增长起来,并且使那些真正最坏的完全不可救药的坏人,容易被好人所收拾。

同志们,这就是我所要说的关于待人接物问题的几点意见。这些意见,我知道是很不完备的,只希望以此作为同志们出去工作时的一种参考。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开幕词

(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九日)

同志们！从一九三四年一月的五中全会到现在已经五年了。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而奋斗的五年。

这五年中间有过许多重大的事变。反对五次“围剿”的英勇斗争，二万五千里的长征，中央到达陕北地区，创立陕甘宁抗日根据地，渡过黄河东征^[95]，以及后来的西征^[296]——这是一系列艰苦卓绝的斗争。由于日寇进攻华北，引起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我党在一九三五年发表了“八一宣言”^[265]和十二月决议^[128]，一九三六年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发生，实现了全面抗战，中国革命发展到了抗日民族战争的新阶段。现在抗战已经进行一年多了。

在这许多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变中间，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解放而英勇斗争，发挥了模范作用。

在这五年中间，我们牺牲了许多同志，有知名的同志，还有许多不知名的同志，以及党外的同志，我们深深

地悼念他们。

〔宣读牺牲者名单^[297]。全体起立 静默三分钟。〕

我们还要向目前正在前线上浴血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抗日联军、全国国民革命军表示敬意。

同志们 在我们今天开会的时候 ,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都是非常紧张的。国际上和平阵线和侵略阵线进行着激烈的斗争 ,国内武汉的抗战正处在最紧急的关头。我们是处在抗战的新阶段前面。如何使我们在中国民族抗战中发挥先锋作用 ,坚持已经进行了一年三个月的抗战 ,并增强我们的力量 ,这是这次全会要讨论的问题。我们要总结民族抗战的经验与教训 ,要正确估计目前形势 ,克服当前困难 ,使抗战走向胜利的前途。我们要确定明确的方针 ,使我们党进一步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使我们党成为广大的群众性的布尔什维克的党 ,以保证抗战的胜利。我们还要讨论召开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问题。所有这些 ,都是为着使中国共产党能在抗战中起先锋作用 ,实现民主共和国 ,直到将来实现社会主义。

我相信我们全会一定能解决这些任务。目前的历史条件对于我们党完成这些任务是有利的。我们有正确的政治方针 ,有共产国际对我们的宝贵支持 ,有全党的统一和团结 !只要我们有克服困难的决心 ,在中央的正确领导下 ,就一定能够实现民主共和国的任务 ,并在将来转变到实现社会主义。

现在 ,我正式宣布 :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开幕 !

组织工作要中国化^{*}

(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五日)

组织任务要服从政治任务,政治任务要靠组织工作来保证。两者的关系中,政治路线是起指导作用的。政治路线不正确,组织路线也不会正确。这次中央会议的政治报告^[298],规定了我党的政治路线,组织工作就是要保证这条政治路线的完成。组织工作如果失去了政治方向,埋头在小的问题上,失去了总的目标,就会出现事务主义。另一方面,政治任务确定后,组织工作有决定的作用。如果没有组织工作,政治路线即挂在空中,没有实际的工作来完成它,就会陷入空谈主义。我们既反对事务主义,又反对空谈主义。

组织工作,包含斗争形式、组织形式、工作方法。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方法是国际性的,但我们是在中国做组织工作,一定要严格估计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民族习惯、道德的特点,正确认识这些特点,再来决定我们

* 这是在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所作《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党的组织问题》报告的《绪论》部分。标题是编者另拟的。

的斗争形式、组织形式、工作方法。我们要的是国际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我们要使组织工作中国化,否则我们就不是中国的共产党员。将外国党的决定搬到中国来用,是一定要碰钉子的。所以不仅要懂得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而且要在民族环境中来实现这些原则。若以为政治上有了马克思主义,在组织上就可以不要考虑中国特点,那是不对的,那是机械主义。如在上海曾搞过突击运动,结果是完全失败了。那就是机械搬用外国经验的结果,就是因为不懂得运用各国经验要适合中国的情况。

我们确定组织工作的方针时,还要分析中国各地方不同的特点。中国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各地情况不同。尤其现在处在战争环境中间,情况很复杂,而且变化迅速。这就要求我们分析各地的不同特点及其变动。所以我们要原则性,还要有具体性,要根据各地的情况实现我们的原则,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我们反对千篇一律。

对中国革命各个时期组织工作的经验教训,一定要研究考虑。过去为此付出了血的代价,今天要认真汲取。过去碰过钉子的,今天不要再干,决不能马虎。就是今天新的经验,也要考虑将它总结起来,帮助以后工作的发展。过去的经验有其连续性,同时也不要为过去的经验所限制。要有创造性。要向下级、向群众学习。

以上是组织工作必须遵循的一般原则。

在民族自卫战 最前线的岗位上^{*}

——中共十八周年纪念

(一九三九年六月三十日)

两年来伟大的神圣的民族抗战,使全国人民清楚的看到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存在着两条不同的保卫民族利益的路线:一条是不彻底的,而另一条则是彻底的。

什么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保卫民族利益之不彻底的路线呢?

当日寇坚决进攻中国时,它是要进行抗战的。但是必须在少数上层统治者无理的包办统制底下进行,而不赞成全面的全民族的总动员,不赞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军事、政治、党务、民运、文化教育等方面,只求某些不得已的、缓慢的、胆怯的、微小的改革,不愿并且惧怕各方面的主动的、大胆的、彻底的改革,尤其不愿并且惧怕给人民

* 本文最初刊载于中共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一九三九年六月三十日,署名洛甫。

大众以民主的自由权利,不愿改善他们的生活与地位,来大量的发动与组织他们,提高他们的觉悟程度,使他们积极的参加抗战。相反的,它的很大力量常常不用于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抗战胜利,而用于打击比较进步的分子与团体,尤其用力于打击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组织。而对于落后的、顽固的、黑暗的、甚至反动的势力,则表示最大的容忍、袒护与纵容。对于执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表示不彻底与不坚决,特别对于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表示怠工。对于外力的援助有过度的希望,对于自力更生的信念极不坚定。它从没有抛弃过经过国际会议的方式,以求得中日战争“和平解决”的希望,而且不断的为着这种希望的实现而活动。对于朝野人士投降妥协倾向的打击,很不彻底,很不坚决。而且在敌人诱降的活动与英、美妥协派的调停之下,自己也表示动摇不定,准备投降妥协,甚至表示只要日寇退出华中、华南,中国就可以停止抗日。华北是准备随时放弃的,东四省则早已不放在应该收复的失地之内了。……

什么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保卫民族利益之彻底路线呢?

它始终站在坚持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国共合作、用一切力量克服一切困难、驱逐日寇出中国、打到鸭绿江边、收复一切失地^[299]的立场上。它坚决主张全国军队、政治、党务、民运、文化教育等方面的主动的、大胆的、彻底的、迅速的改革,尤其着重

于民主自由权利的保障与现代民主政治的建立,着手于大量发动、组织与武装民众,提高他们的觉悟程度,使他们在中华民族与国家内取得应有的政治的与社会的平等地位。它坚决拥护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而且要求三民主义的全部实现。它认为,民族解放运动应该对于全国一切参加抗战的阶级、阶层与党派有利,而不只对于少数上层分子有利。它坚决拥护与赞助一切前进的、光明的、自由的、民主的、活跃生动的运动与力量,而反对一切落后的、黑暗的、保守的、腐化的、专制野蛮的东西。它主张力争外援,但坚持自力更生的基本方针。它在敌人诱降与英美妥协派调解前面决不动摇。它坚决反对任何东方慕尼黑^[300]形式的投降妥协。它揭破一切国内投降妥协分子“防共反共”的阴谋,指出这是他们准备投降的具体步骤,主张从一切机关与团体上肃清汉奸及各种隐藏的民族危害分子。……

谁都可以看到:前一条保卫民族利益之不彻底的路线,今天主要是为中国一部分上层资产阶级及少数上层分子所支持;而后一条保卫民族利益之彻底的路线,今天主要是为工人阶级及最大多数人民所支持。

两年来伟大的神圣的民族抗战,使全国人民清楚的看到:中国共产党是站在工人阶级及最大多数人民保卫民族利益之彻底的路线的。正因为如此,所以中共同一切拥护抗战的各阶级、各集团与各党派,不管它们是彻底抗战的也好,不彻底抗战的也好,进行统一与团结。中共深

信,只有这种统一与团结才能扩大抗战的力量到最大限度,使抗战得到最后的胜利。而且,中共为了坚持这样的方针,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不但动员了自己的全部力量走到抗战的最前线,使自己在抗战中起了先锋与模范的作用,而且尽了最大的努力,去和缓国内各阶级、各集团、各党派间的矛盾与冲突,采取真正光明正大、仁至义尽、谦逊忍耐的态度,去解决这些矛盾与冲突。正因为如此,中共也坚决的拥护一部分上层资产阶级及少数上层分子一切积极的抗战方针与方法,而且用了一切方法推动其持久与进步。但是同时,中共对于一部分上层资产阶级及少数上层分子不彻底的抗战路线中一切违反抗战利益的、错误的与消极的方针与方法,则采取了批评、忠告与反对的立场,而且也用了一切方法帮助其改变与克服。中共深信,如果中共对于中国一部分上层资产阶级及少数上层分子,不采取这种态度,那末中国工人阶级及最大多数人民保卫民族利益之彻底的路线,断然无法贯彻,中国的抗战,也断然不能最后胜利。

两年来伟大的神圣的民族抗战,使全国人民清楚的认识:中共所主张与拥护的这一工人阶级及大多数人民的彻底的抗战路线,是唯一正确的路线,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所必须采取的路线,也是完全代表中华民族的利益的路线。

不幸的很,中国一部分上层资产阶级及少数上层分子,虽是为了自己的阶级利益参加了民族自卫战,获得了

全国人民的拥护,但是由于他们历来的不彻底性、妥协性与动摇性,所以惧怕民族抗战的最后坚持与最后胜利,他们始终反对中国工人阶级及大多数人民的彻底的抗战路线,要同主张与拥护这一彻底抗战路线的中国共产党进行坚决的斗争。

两年来伟大的神圣的民族抗战,在全国人民前面充分暴露了中国一部分上层资产阶级及少数上层分子对于争取民族抗战的这种不彻底性、妥协性与动摇性。当日寇向中国主要采取坚决的军事进攻的方针,使一切和平妥协的谈判成为无望时,中国的一部分上层资产阶级及少数上层分子就不得不表示他们对于抗战的坚决。这种情况,也就促进了中国内部的团结,促进了中国各方面的某些进步。但是当日寇暂时和缓其军事上的坚决进攻而更多施展挑拨离间的政治阴谋,使和平妥协的谈判似乎带有某些希望时,中国的一部分上层资产阶级及少数上层分子就立刻开始表示他们对于抗战的不坚决。这种情况,也就引起了中国内部的各种磨擦,使已经开始的某些方面的进步无形的停滞下来。特别自日寇占领武汉、广州之后,它侵略中国的方针主要的从军事的进攻转到了诱降的政治阴谋,同时英、美、法各国的妥协派为了保持它们在东方的权益,积极调停中日争端。于是中国的一部分上层资产阶级及少数上层分子就大大的动摇起来,并且极力希望经过东方慕尼黑的方式,以达到停止抗战与投降妥协的目的。这种情况,也就使中国内部的

磨擦大大尖锐化，把中国拉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与危险的关头。

中国一部分上层资产阶级及少数上层分子清楚的懂得：当他们要求坚决抗战时，他们必须得到中国共产党的拥护与支持；当今天他们企图停止抗战与投降妥协时，坚决站在中国工人阶级及最大多数人民彻底抗战路线的中国共产党，就成了他们走向投降妥协道路的最大障碍。因此，他们今天为了准备停止抗战与投降妥协，必须首先集中全力“防共”、“反共”，反对共产党，压迫共产党，捕杀共产党员，同共产党找磨擦，并且散布各种谣言，似乎共产党的存在与发展是使他们不能继续抗战与企图投降妥协的主要原因。

这当然是一种无耻的造谣与欺骗！因为共产党的存在与发展正是坚持全国抗战之最有力的支柱。共产党的抗战路线，就是中国工人阶级及全国最大多数人民的彻底抗战路线。共产党的一切主张与行动，没有一件是对中华民族没有利益的。在全国各地、在我后方、在战区、在敌后方，共产党员都为民族国家的利益，为抗战的彻底胜利而牺牲奋斗。为了保卫祖国的主权与领土，而在敌后方血战着、坚持着的，正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英勇的八路军与新四军！

一切事实证明，共产党的存在与发展，决不是一部分上层资产阶级及少数上层分子不能继续抗战与企图投降妥协的原因。相反的，正是因为他们企图停止抗战与投降

妥协,所以他们不能不努力“防共”、“反共”,企图以此扫除他们走向停止抗战与投降妥协的前进路上的最大障碍物。这一点,显然也是日本帝国主义者所清楚知道的。所以,自从占领武汉、广州以后,日本帝国主义者即集中全力于“扫荡”八路军与新四军,加强“防共反共”的活动。一切汉奸、汪派^[301]、托派^[164],也都在这方面同声响应。他们知道,不打击坚持彻底抗战路线的共产党的力量,中国的投降屈服是不可能的。“防共反共”是中国一部分上层资产阶级及少数上层分子准备停止抗战与投降妥协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们诱降政治阴谋的一个组成部分。

两年来伟大的神圣的民族抗战,向全国人民明确的指出,中国一部分上层资产阶级及少数上层分子的不彻底的抗战路线,如果任其贯彻下去,必然要引导到中国的屈辱投降与亡国灭种。中国一部分上层资产阶级及少数上层分子的那种不彻底性、妥协性与动摇性,如果任其发展下去,也只能得到这样的悲惨结果。两年来的伟大的神圣的民族抗战,更教训了全国人民,要坚持抗战到最后胜利,必须坚持工人阶级及最大多数人民的彻底的抗战路线,以改变与克服一部分上层资产阶级及少数上层分子的那条不彻底的抗战路线,必须以自己的彻底性、不调和性与坚定性,去改变与克服他们的不彻底性、妥协性与动摇性。在中国一部分上层资产阶级及少数上层分子今天准备投降妥协的危险前面,如果我们放弃自己的立场,不

去批评、忠告与反对他们的一切违反民族利益的言论与行动,不去停止他们“防共反共”的玩火阴谋,不去向他们指出为中国近二十年来的革命现实所再三证明了的“投降必反共”、“反共必亡国”的真理,并且用一切力量去挽救他们的没落沉沦,而自己表示动摇、不坚决与张皇失措,那就不但不能防止投降妥协的实现,而且正会加速其实现的过程。

中国共产党在日本帝国主义、汉奸、汪派、托派及一切投降妥协分子“共同防共”的逆流前面,是决不会动摇自己的坚定立场的。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向全国人民指出目前时局的真相,指出一部分上层资产阶级及少数上层分子的投降妥协的倾向是目前时局的主要危险;“防共反共”是投降妥协的实际准备;另一方面,号召全国人民站在中国工人阶级及大多数人民彻底抗战的路线上,一致动员起来,去克服这种危险,去击破这种“共同防共”的逆流的侵袭,使中国的抗战坚持到最后的胜利。中共必须再三告诉全国人民,中国如果没有坚决主张与拥护中国工人阶级与全国最大多数人民彻底抗战路线的中国共产党,则中国一部分上层资产阶级及少数上层分子将更加为所欲为,中国抗战决然不能胜利,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决然不能实现。

中国共产党为了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的事业,已经奋斗了十八年。它一方面认清了中国革命的持久性、曲折性与艰难性,同时认清了中国革命正要在这种

持久的、曲折的与艰难的过程中发展到最后的胜利。“七七”抗战开始之初,中共中央即指出:“在今后抗战过程中,可能发生许多挫败、退却、内部分化叛变、暂时的与局部的妥协等不利情况。因此,应该看到这一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但我们相信,已经发动的抗战,必将因为我党及全国人民的努力,冲破一切障碍物而继续的前进与发展。我们应该克服一切困难,为实现本党所提出的争取抗战胜利的十大纲领^[302]而坚决奋斗,坚决反对与此纲领相违背的一切错误方针,同时反对悲观失望的民族失败主义。”(见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303])

显然的,中国共产党并未因汪精卫等的叛变而动摇中国工人阶级及全国最大多数人民保卫民族利益之彻底的路线,也不会因为新的汪精卫等的民族叛徒的出现而动摇这条路线。这条路线必须坚持,而且必能坚持到最后胜利。

中国共产党是屹然的耸立在民族自卫战最前线的岗位上!它以锐利的目光瞭望着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彻底解放的光明的前途,它有充分的自信与足够的毅力去战胜一切前进路上的困难与障碍!

支持长期抗战的几个问题^{*}

(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三日)

恩来、博古同志的报告^[304]与上次政治局会议^[305]的精神基本上是相同的。恩来同志更充实了许多材料。这些材料证明,关于反共是妥协投降的准备等估计是正确的。

投降妥协的危险性问题

我们要看到这种危险性。

英日谈判^[306]达成了协议,英国还将继续让步。欧洲最近又要开四强会议^[307],有形成第二个慕尼黑的危险。

日本的诱降政策仍在加紧推行。汪精卫在广州发表了广播讲话^[308]。这些将增加妥协投降的危险。

资产阶级^[309]仍在继续动摇与变化中。

* 这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原有七节,收入本书时删去第五节。标题是本书编者拟的。

从目前时局的发展,可以看出这种危险性在增长。我们要严重的指出这种危险性,同时要准备应付突变。前次政治局会议指出这种危险性,是必要的。

武汉、广州失守后的形势变化

在武汉、广州失守前,敌人以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进攻为辅。现在却正相反。

在敌人的军事进攻方面,在前期以进攻正面主力为主,现在却以“扫荡”敌后为主。

在中国的军事抗战方面,前期以正规战为主,以游击战为辅,现在却正相反。在国际方面,一些民主国家,如英国,前期主要以援助中国抗战的办法来保持自己的权利,与日本妥协不是主要的。现在英国企图以对日妥协来保持自己的特权。以援助中国来保持它的特权,变成了辅助的方面。

武汉、广州失守前后这两个时期有很大的不同。我们认为,现在这个时期是过渡时期,它持续已将一年了。

我们了解当前形势,是为了把它作为规定当前任务的出发点。

过去是军事抗战推动了各方面的进步,军事进步带动了政治的进步。战争改变一切。战争促使中国进步,促进了中国的团结,使国民党也进步,民运也进步了。在这一时期,统一战线中的统一性比较突出。

现在日本的军事压力减弱,正面的战争减少,它的主要力量集中于“扫荡”八路军与新四军。就国民党而言,现在抗战的旗帜还存在,但正面战争却减弱了,外来的压力减弱了。在这种情况下,疲倦与悲观失望情绪增加。敌人军事进攻减少而政治诱降加强,国民党的投降危险也增加了。内部磨擦增加,统一战线中的斗争性突出了。这种局势可能长期继续下去。

当前党的任务

因此,当前的问题,全国人民面前的问题,是用什么办法来打开局势,支持长期抗战。前次会议提出了很多任务,我对前次提出的任务加以说明。

在武汉失守前,我们要在各方面拥护抗战,以军事抗战为主。只要抗战,各方面都会进步。当时敌人的军事进攻客观上对中国的进步有帮助。我们利用这种形势扩大了自己的力量。这是顺水推舟的办法。这样做是对的。

现在形势变了。我们在拥护抗战时,需要确定不同的任务。我们拥护抗战,但今天正面的军事抗战很少,国际上大规模援助的希望也不大。今天的任务是要援助全国的进步力量,与妥协投降的倾向进行坚决的斗争。目前要自力更生,就是要团结一切进步的力量,与妥协、投降、退步的倾向作斗争,把统一战线推向前进。我们的方针,不

是在同盟者的压迫下进行防御,不是完全采用退却、消极的防御。我们要在政治上采取主动的积极方针,压迫蒋^[97]向前进步。目的不是为了分裂,而是从斗争中来团结进步力量,分化坏的分子。

斗争的形式是政治斗争:以主战反对主和,以民主反对压制,以团结反对分裂,以进步反对退步,以真三民主义反对假三民主义。

斗争的旗帜是三民主义,是真三民主义反对假三民主义,不是强调以马列主义与三民主义对立。

推动斗争的核心是共产党与八路军、新四军。只有共产党坚持的斗争才能团结一切进步力量。现在不能完全照搬过去的办法,那已经不够了,而是要采用谈判以外的更多的办法。

同时,要反对那种认为今天只要求异而不求同的倾向,不是要强调与国民党的对立。

要争取一切抗日的阶层,包括中产阶级^[310],继续参加抗战。要在坚持国共合作、坚持三民主义的前提下进行坚决的斗争,用这种斗争去团结进步的力量。

关于三民主义问题

我认为,过去中央对于三民主义有一定的了解,并不模糊。泽东同志在苏区党代表会议的报告中有过说明^[311]。

我个人对三民主义的了解是：

一、马列主义，科学的社会主义，同三民主义有原则的区别。我们没有人说三民主义就是马列主义或科学的社会主义。

二、我们拥护三民主义，是拥护它作为今天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

三、我们拥护三民主义，是拥护三民主义的革命的政治纲领。

四、我们只从马列主义立场拥护三民主义。

五、我们反对对三民主义的曲解，反对一民主义^[312]，反对假三民主义。

我认为，上面的了解还是对的，不要修改。

今天的任务，是要写小册子，要具体的研究，把真、假三民主义区别开来。

我认为，有三种三民主义，即：假三民主义，如汪精卫的三民主义；不彻底的三民主义，即一民主义；真三民主义。

我们了解，三民主义是民主革命的纲领。我认为，只有把握住三民主义的三大基本原则^[313]，才能有利于当前的局势。

没有马列主义的帮助，真正的三民主义是国民党所把握不住的。即使孙中山也要我们的帮助，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314]时便是这样。但三民主义也不能发展为马列主义。

我们的任务是坚持三民主义的旗帜,以真三民主义打击假三民主义。我们要使全国人民了解,我们同国民党的斗争是真、假三民主义的斗争,彻底的与不彻底的三民主义的斗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只有经过严重的斗争才能实现,只有经过民主革命阶段长期的斗争才能实现。

对于三民主义的解释,我们要多做工作。

文化政策

中宣部提出了一个提纲,政治局须给以原则的指示,请求各位同志发表意见。我同意这个提纲。

一、我们要提倡民族化、大众化的文艺,使文艺工作者到民众中去锻炼,在民众中活动。

二、我们并不反对少数人从事“专门”的艺术,也不反对少数人有些欧化的倾向,而且还联合这些人反对共同的敌人。

三、我们的文化在内容上是民主主义的(也是三民主义的),并且提倡进行马列主义的宣传。

我不赞成个别同志的意见。有人认为民众剧团没有办法,才不得不实行民族化、大众化,认为民族化、大众化是降低艺术。我认为,要到民众中去了解民众,了解民众究竟需要什么,才能使中国的文艺成为民族的文艺。如果只是模仿欧美,是不会有重大成绩的。

党的工作问题

我认为,我们党在国民党区域内的组织是不巩固的。为了巩固党的组织,需要明确几点。

一、在全国范围,主要任务是巩固党的组织,一般停止发展。

二、注意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联系。这是一个严重的原则问题。要使我党同志了解,根据过去经验,秘密工作是一个原则问题,不是一个技术问题。同时,只讲秘密工作不讲公开工作也是不对的。我们要培养一批秘密工作的干部,建立秘密机关。但要秘密,就必须深入到群众中社会中,这样才能达到秘密的目的。秘密工作不仅是消极的建立机关、缩小组织等,而且要积极进行群众工作,打到合法的组织中去。遵守秘密工作条例不仅是组织纪律问题,而且也是政治问题。对于面目不清的人要特别注意,不要随便相信。

三、把党的组织建立在下层政权机关,武装组织,小学校,合作社,国民党下层的党部。要参加到国民党的管、教、养、卫^[315]组织中去。要建立我们党在农村中的基础。党的组织要完全秘密,但要在政权、武装中进行公开工作,有计划的发展我们的工作。要布置支点与工作网。要告诉我们的同志去注意进行政权中的工作。

四、培养与适当的布置基本的干部,适当的分布党的

老干部。同时要加紧培养新干部,加强新老干部中的团结。

对于国民党区域内党的在职干部的教育问题,希望各同志发表具体意见。

略谈党与非党员 群众的关系^{*}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七日)

党与非党员群众的关系问题,是马列主义论党的学说的基本问题。

为了正确的处理这个问题,我想在这里提出下列几个原则或一个基本原则的几个方面来说一说。

第一,党是群众(这里主要指工人群众,同时也指非工人的劳动群众)中的一部分,而同时又是群众中先进的、觉悟的、马列主义的、有组织的一部分。因此,它必须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同群众生活在一起,处处依靠群众;同时它必须保持它的特性,不溶化于群众的大海中,而成为群众的政治领袖。

由于我们党内某些同志对于这点的不了解,所以在党内常常发生两种不正确的倾向。或者把党看做是“超群众”的,因此不去巩固与增强它同群众的联系,使党成为与群众隔绝的、硬化的、宗派的小团体。或者把党看做同

* 本文最初刊载于中共中央主办的党内刊物《共产党人》第二期(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出版),署名洛甫。

群众“没有分别”的,因此使党成为群众的尾巴,成为群众自发性的崇拜者,溶化于群众的大海中。这两种倾向,都是会使党趋于灭亡、趋于瓦解的危险倾向。

同群众在一起,而又领导群众,是群众的学生,而又是群众的政治领袖:这就是党与群众的正确关系的基本原则。

第二,从上述的基本原则出发,党必须照顾群众现有的政治水平(包括思想、习惯、传统、情绪等),把这个政治水平当做出发点,以接近群众,而同时党必须提高这个政治水平到更高的阶段,以完成一定的革命任务。

党的工作对象是群众。因此,党必须从群众今天所有的具体情况出发,而决不能凭自己的主观的空想。群众今天同党所要求的比较起来是落后的,这就使党不能不去迁就群众。但这种迁就,不是为了崇拜群众的落后,而正是为了发扬群众的革命性,克服群众的保守性,提高群众到党所要求的更高的政治水平。

由于我们党内某些同志对于这点的不了解,所以在党内常常发生两种不正确的倾向。或者只顾空喊党的纲领、口号、马列主义原则,而不去了解群众今天的政治水平。结果纲领、口号、原则虽好,同群众却不发生关系。这是党内教条主义、清谈主义的宗派主义的倾向。或者只顾迁就群众今天的政治水平,而忘记从此出发去提高群众。虽是有人把这种倾向美其名曰“实际主义”,但这是一种庸俗的尾巴主义,同马列主义的实际主义是完全不相同

的。

迁就群众,从群众今天所有的实际出发,是为了提高群众,这就是党与群众的正确关系的一个方面。

第三,从上述的基本原则出发,党必须满足群众今天切身的、局部的要求,取得群众的拥护与信任,而同时党必须使群众从这种切身的、局部的要求的满足中去为了远大的理想(即整体的要求)而奋斗。

党要取得群众的拥护与信任,不为他们今天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利益而奋斗,是不可能的。群众决不拥护与信任同他们今天的切身问题没有关系的人。但党绝不能以群众生活的局部改善为满足。党必须向群众解释:在现代社会下面,不论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或在资本主义的阶级社会下面,群众生活的彻底改善是不可能的;只有彻底改造现代社会,建立没有人剥削人的共产主义社会,他们才能得到最后的解放。

由于党内某些同志对于这一点的不了解,所以在党内常常发生两种不正确的倾向。一种是只顾群众今天切身的、局部的利益的工团主义、行会主义、经济主义。另一种是只谈崇高的理想,而对于目前群众的要求采取消极态度的空谈主义。

满足群众今天切身的、局部的利益,而又领导他们去为了他们的最后解放的远大理想奋斗,这就是党与群众的正确关系的另一个方面。

第四,从上述的基本原则出发,党必须善于等待与帮

助群众根据自己的切身经验来了解党的指示的正确,以便能够同群众一同前进,使党在前进中取得群众的直接拥护。

对于群众,仅仅靠宣传教育是不够的。只有当他们从切身的经验中了解到党的路线正确时,他们才会赴汤蹈火为党的路线而牺牲奋斗。不把党的路线变为群众的行动方针,取得群众的直接拥护,任何历史上的重大任务都是解决不了的。但要使群众从切身的经验中了解到党的路线的正确,就必须给群众以必要的实践的时间。这种时间由于当时当地具体条件的不同,有时可能很长,有时可能很短。党在任何情况之下,必须善于等待与帮助群众的这种实践。这种等待与帮助不是要使群众停留在现状之下,而正是为了要同群众一道前进,以实现党的路线。

由于我们党内某些同志对于这一点的不了解,所以在党内常常发生两种不正确的倾向。一种是不愿意等待群众一同前进,而只想由少数先进分子冒险冲锋的急性病与盲动主义。另一种是为了要等待群众一同前进,而消极怠工的自流论。

在群众前面,而又不脱离群众;等待群众,而又不做群众的尾巴;这是党与群众的正确关系的又一方面。

第五,从上述的基本原则出发,党必须采取各种各样的组织形式去组织群众,参加到一切有群众的群众团体中去,而又经过这些团体去实现党的统一的领导,同时尊

重这些团体的特殊性与组织上的独立性,依靠它们的主动性与积极性。

群众是多种多样的,他们的要求也是多种多样的,因此党如果要组织最大多数的群众,它决不能拿一种形式,而必须采取各种各样的组织形式去组织群众。同时社会上现有的群众团体也很多,不论是公开合法的,或半公开半合法的,或完全秘密的。党如果要同那里的群众接近,它必须积极参加到那些群众团体中去。在一切这些群众团体的多样性中,党必须以自己坚定的、正确的政治立场,灵活的、革命的实际主义及英勇牺牲、艰苦奋斗的精神,去实现党的领导的统一性。党必须力争对于一切这些群众团体的领导,反对群众团体离开党的政治领导而“中立”的观点。但这种领导的实现,必须经过每一群众团体的特殊性,建立在尊重它们的组织上的独立性及依靠它们的主动性与积极性的基础之上。

由于我们党内某些同志对于这一点的不了解,所以在党内常常发生两种不正确的倾向。有些同志把群众单纯化,理想化,公式化,不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去组织他们,放弃到各种各样有群众的团体中去工作,而满足于只包含少数先进分子的、非常狭窄的少数群众团体。他们不懂得党必须经过各种各样的群众团体去实现对全国最大多数群众的领导。但在那些党已经取得领导的群众团体中,他们却又不去估计群众团体的特殊性,而一律使之“党化”;或者不去尊重群众团体的独立性,依靠它们的主动

性与积极性,而使自己成为包办一切、命令一切的“党老爷”。他们不懂得党是群众的领导者,而又是为群众服务的公仆。

经过群众组织的多样性,去实现党的领导的统一性,在实现党的统一领导中,又能尊重群众团体的特殊性与独立性,又能依靠它们的主动性与积极性,领导群众而又服侍群众,这就是党与群众的正确关系的又一方面。

第六,从上述的基本原则出发,党必须善于向群众学习,总结他们实践中的一切新的经验,以便能够更好的领导群众。

没有群众的革命实践,就不会有马列主义。马列主义根据社会发展规律与革命运动规律的正确把握而预测未来,指导未来。但群众的实践是无穷的,它比马列主义所能预见的要复杂得多,丰富得多。所以党必须不断的向群众学习,总结他们实践中的一切新的经验,以丰富与发展马列主义,使党能够更好的领导群众。同时,群众的实践是测量党的领导之是否正确的最后标准。党要根据群众的实践来考验党的决定的是否正确。如果群众的实践证明党的决定是不完全正确的,那党必须根据群众实践的经验来校正或修改党的决定;如果群众的实践证明党的决定是错误的,那党必须抛弃过去的决定,根据群众实践的新的经验,来重新采取新的决定。党是群众的教师,而又是群众的学生。只有愿意做群众的学生党,才能领导群众到革命的最后胜利。但群众的实践,

没有马列主义党的总结,只能成为一大堆混乱的原料。这种原料,虽是很可宝贵的,但并不能帮助群众达到革命的胜利。

由于我们党内某些同志对于这一点的不了解,所以在党内常常发生两种不正确的倾向。一种是自高自大,藐视群众的实际经验,不愿去向群众学习的高慢的宗派主义。一种是崇拜群众的实际经验,而在这种经验前面束手无策的狭隘经验主义。

向群众学习,而又能在学习中更好的领导群众,这就是党与群众的正确关系的又一方面。

*

*

*

为了正确的处理党与群众的关系,我认为,我们的同志必须真正时刻的去了解上述的几个原则或一个基本原则的几个方面。是的,这些原则,看去好象是很简单的,然而要在实际工作中运用,却是十分困难的。因为党与群众的关系,原来也是为矛盾统一律所支配着。党是群众的一部分,而又不是群众。它要迁就群众,而又不要迁就群众(提高)。它为了群众的今天奋斗,而又不是为了今天(明天)。它要等待群众,而又不要等待群众(前进)。是群众的领袖,而又是群众的公仆。是群众的教师,而又是群众的学生。多种多样的组织,然而又是统一的领导。何等生动的矛盾呵!矛盾的任何一方面,如果把它孤立起来,夸大起来,都可以发展成为一种不正确的倾向,而党内成分的复杂,具体环境的影响,可能造成这种倾向发展的条

件。所以只有在不断解决矛盾、克服矛盾的过程中,才能正确的解决党与群众的关系。这个问题,不是一次能够解决完的,它要在不断的斗争中去解决。所以关于这个问题上的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决不能放松的。但上述原则的提出,可以帮助我们正确的去指导这种斗争,使我们能够有正确的方法去解决这个复杂的问题。

中华民族新文化 的内容与性质*

(一九四一年一月五日)

一、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必须是为抗战建国服务的文化。要完成这个任务,它必须是:

民族的,即抗日第一,反帝、反抗民族压迫,主张民族独立与解放,提倡民族的自信心,正确把握民族的实际与特点的文化;

民主的,即反封建、反专制、反独裁、反压迫人民自由的思想习惯与制度,主张民主自由、民主政治、民主生活与民主作风的文化;

科学的,即反对武断、迷信、愚昧、无知,拥护科学真理,把真理当做自己实践的指南,提倡真能把握真理的科学与科学的思想,养成科学的生活与科学的工作方法的文化;

* 这是在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所作报告的大纲《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的第三节。全文十五节,最初刊载于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第一三期(一九四一年四月十日出版),署名洛甫。

大众的,即反对拥护少数特权者压迫剥削大多数人、愚弄欺骗大多数人、使大多数人永远陷于黑暗与痛苦的贵族的特权者的文化,而主张代表大多数人民利益的、大众的、平民的文化,主张文化为大众所有,主张文化普及于大众而又提高大众。

二、上述新文化的四个要求是有机的联系着的。真正民族的,必然是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但任何一种主义,一种学说,只要对于上述要求中的一个要求或一个要求中的一点要求有所贡献,即可成为新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任何一个主义、一种学说包办新文化的企图,都是有害的。新文化运动中,除抗日的统一战线外,应该有各种各样的广泛的文化统一战线。

三、但各种主义、各种学说的革命性、科学性及其对抗战建国与新文化运动贡献的程度各不相同,因此相互间的思想批评、思想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最革命的阶级工人阶级对新文化的要求是最彻底的。日寇、汉奸根本反对新文化。其他阶级,有只赞成其中的一点的,也有赞成其中一部的,也有赞成大部的。新文化运动中的思想斗争,即为抗战建国中的阶级斗争在文化上的反映。

四、在新文化中最有地位的,最能得到推崇的主义与学说,应该是能够为新文化的全部要求的实现而斗争的主义与学说,为最富有革命性与科学性的主义与学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这样的主义与学说(关于这点,以后还要继续讲到)。

五、为抗战建国服务，以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与大众的因素作为自己内容的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性质，基本上是民主主义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文化，在新文化运动中起着最彻底的一翼的作用。

六、新文化今天只在个别因素上(如抗日的因素上)在全国占统治地位，但整个说来，它的力量还很薄弱。一切反对抗战建国的力量，正在从各方面向它进攻。但正象抗战建国是有前途的一样，新文化也是有前途的。它要有同一切困难与障碍斗争中前进，它要在克服自己的错误与弱点中前进。我们要用全力去发展新文化。

提倡朴素与 切实的工作作风^{*}

(一九四一年五月十六日)

什么叫做朴素？朴素就是有什么讲什么，就是老老实实，就是真实的意思。

为什么在我们党内要提倡朴素呢？因为：第一，我们党是无产阶级的党，是全世界最彻底革命的党，所以我们不需要任何的“虚伪”去欺骗别人，欺骗自己；第二，我们的党是建筑在科学的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党，所以我们不需要任何的“夸大”去安慰别人，安慰自己。只有把我们党的政治路线与策略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之上，我们所要完成的共产主义事业才能达到胜利的目的。

举个例子吧。比如在我们工作中有好多优点，我们就应说好多，不要增加一点。比如在我们工作中有好多缺点，我们就应说好多，也不要减少一点。因为只有老老实实的说出自己工作中的优点与缺点，我们才能正确的去发扬自己的优点，改正自己的缺点，才能使工作向前进

* 本文最初刊载于中共中央主办的党内刊物《共产党人》第七期（一九四一年六月出版），署名洛甫。

步。对工作如此,对党内同志也应该如此。我们应该老老实实说出一个同志的长处与短处,使这个同志知道应该如何舍短取长而向前进步。如果不是这样,如果我们对自己工作中一些优点大吹大擂,而把自己工作中的缺点掩盖起来,默不作声,那我们的工作就无法进步。如果我们对于一个同志采取捧场的办法,只说他如何如何“了不起”,而对于他的弱点一句话也不说,那我们对这个同志的进步也就不会有什么帮助。

我上次在本刊上所说的“了解具体情况”^[316],实际上也即是对于当前情况采取老老实实的态度的意思。革命处在严重危险中,我们就应承认这种危险。没有革命形势,我们就应承认没有革命形势。革命失败了,我们就应承认革命失败了。革命形势有好转,我们就应承认好转。我们丝毫也不用掩盖事情的真相,来欺骗或安慰别人与自己。如果不是这样,我们的政治路线与策略就不能建筑在真实的基础之上,我们就会发生错误,遭受失败。比如,党在李立三路线时代所遭受的损失,就是这样的例子。

所以我们在党内今天要提倡朴素的工作作风。我们要反对那种吹牛、夸大、粉饰、掩盖、装腔作势、华而不实、形式主义、风头主义等毛病。这些毛病,不幸在我们党内今天还是存在着的。

吹牛、夸大等等,也许会发生一时的兴奋的或是“催眠”的作用,然而这同吗啡针之有害于身体一样,究竟是

有害于党的健全的发展的。共产党人要有面对赤裸裸的现实的勇气,要有说老实话的勇气,他不需要任何的兴奋剂与催眠剂来刺激或安慰自己。只有老老实实,我们才能把我们的思想与工作建立在确实的、坚固的、科学的基础之上。

什么叫做切实呢?切实,就是说,我们的工作要适合于实际;就是说,要根据于老老实实的认识,根据于具体情况的了解,来决定当前的具体工作;就是说,要经常检查已经开始的工作,把已经开始的工作进行到底。

为什么在我们党内要提倡切实呢?因为:第一,我们的党是革命的行动的党,我们的任务不但在认识世界,而且还在改造世界;第二,我们的党是言行一致的党,我们要说得出做得到。只有把我们党的政治路线与策略在实际行动上实现出来,我们才能把我们共产主义的理想变为地上的现实。

只有根据于老老实实的认识,根据于具体情况的了解,才能提出切实的工作计划或工作任务,并且保证被提出来的计划与任务能够得到完成,能够贯彻。空洞的、包罗万象的大工作计划,照例是在夸大与不真实的认识上被提出来的。这类计划照例也是不能实现的。它不过是一种“空空如也”的装饰品,除满足空谈家的一些夸大狂而外,不会有任何其他的意义。

我深切的感觉到,包含一百零一条美丽的条文却一条也不能实现的漂亮的工作计划,倒不如包含一条能够

实现的朴素的条文的朴素的工作计划为好。在我们提出任何工作计划或工作任务时,我们必须切实考察这种计划与任务的实现的可能性及其可能实现的条件。我们决不能单凭自己主观的愿望来决定我们的工作计划或工作任务。

切实的工作计划不过是切实工作的开始。要保证工作计划的实现,我们还需要经常检查工作计划实现的程度,经常采取各种具体办法来推动工作的前进与完成。没有这种工作的检查与推动,任何工作计划也是不能实现的。

我觉得我们党内许多同志还有这样的习惯:对于工作计划务求包罗万象,一丝不漏,然而对于工作计划如何实行,如何检查工作计划执行的情况,如何保证工作计划的完成,如何把已经开始的工作进行到底,则常常漠不关心。因此造成计划自计划,工作自工作,造成计划找不到工作、工作又没有计划的现象。这当然是一种奇怪的不正常的现象,然而不幸这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

自然,说大话,订大计划,比之切实的工作要容易得多,而且也痛快得多。实际工作,要一点一滴做去,一步一步前进,这对于空谈家是最麻烦的事。然而没有这种工作,任何革命的胜利都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党内今天要提倡切实的工作作风。我们要反对那些讲大话、订大计划,而不肯或不会脚踏实地切实工作的空谈家。我们要在切实的点滴工作中来实现我们

崇高的、远大的理想。我们要打破一切现实的障碍，在现实的基础上建立起我们理想的、自由的王国。

所以，我们党要在朴素中，要在切实中表现出我们的力量，我们的生气勃勃，我们的不屈不挠，我们的光明前途。这是我们无产阶级政党的本色！

更多的关心群众的 切身问题^{*}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日)

只有关心与解决群众的切身问题,才能动员群众积极参加革命战争。我们过去与现在所以能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就是因为我们关心了与解决了群众的切身问题。

但是,由于中国革命战争的长期性与残酷性,使我们不能不经常把很多的负担加在群众的身上。为了支持这个革命战争到最后的胜利,许多扩兵、征粮的动员工作是必要的,但每一次这类动员工作,对于群众也不能不是一种新的负担。

正因为中国革命战争的长期性与残酷性,正因为革命战争要求群众很多很重的负担,所以我们对于群众的切身问题,也就应该给以更多的关心。也只有这样,才能使群众更加积极的参加革命战争,为革命战争的最后胜利而牺牲奋斗。

* 本文最初刊载于中共中央主办的党内刊物《共产党人》第八期(一九四一年七月二十日出版),署名洛甫。

可是检查各抗日民主地区的党的工作,我们不能不承认,我们问群众要的很多,但是我们对于群众切身问题的关心却极端不够,有些党部与同志甚至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这是一个极端严重的问题。

经常的扩兵、征粮等战争动员工作,在我们同志中积累了很丰富的很可宝贵的动员工作的经验,但同时也在许多同志中造成了一种片面的思想与习惯,以为这些动员工作就是党的工作的全部。只要上级党部关于动员工作的数目字“分配下来”,他们就有了工作,他们就会把工作“布置下去”,他们就会动员全体同志进行“突击”,一直到“工作如期完成”或“提早完成”,以至“超过原定数目”为止。除此之外,他们就觉得没有别的工作可做了。

这种片面的思想与习惯,在党内造成了一种不关心群众切身问题的恶劣倾向。许多党部与同志(自然包括党所领导的军队中的、政府中的、群众团体中的、学校中的党部与同志),只晓得如何向群众“动员”这样那样,甚至不惜采取强迫命令的方法来达到他们的目的,而对于群众的要求、群众的情绪、群众的生活则毫不注意。这种倾向的发展,再加上其他内外的不良影响(这种影响在各个抗日民主地区均不完全相同),在某些党部与某些同志中产生了脱离群众、同群众对立、把党所领导的组织当作凌驾群众的“办差机关”、“官僚机关”,而党员变成了站在群众头顶上的“党老爷”、“党官”的严重现象。这对于党、对于革命实是一个最大的危险。

这种把群众当作无知的任人摆布的“阿斗”，而自己当作万能的高高在上的“诸葛亮”的倾向，实是地主资产阶级的思想在我们党内的反映。

党必须最严重的提出这个问题，同那种脱离群众、同群众对立的官僚主义与军阀主义倾向进行坚决无情的斗争，并从我们的队伍中彻底肃清那种对于群众的地主资产阶级的态度。各机关、各部队、各民众团体、各学校必须严格约束自己的工作人员，不使他们有任何违反群众利益的行动。每一件违反群众利益的举动，都必须给以最大的警觉与注意。对于那些鱼肉民众、压迫民众、欺侮民众的官僚、老爷们，必须给以严厉的革命纪律的制裁。对于他们的任何放任与姑息的态度，对党、对革命均会造成莫大的损失。

党必须大胆的发展党内与群众中的民主作风，建立各种组织的民主制度，发扬党内党外的自我批评，以揭发与清除各种组织内所存在的这些违反群众利益的严重现象。党必须不断推举那些真为群众所信任、所爱戴、在群众中有威信的新的领袖，来代替那些贪污腐化分子与老官僚主义者，为群众办事，为群众工作。要使群众在新的民主的生活中切身感觉到：革命是同他们血肉相关的问题，是他们自己的事；他们自己是革命的主人翁，是当权的人；他们完全有权力任用真正能够为他们服务的“自家人”，而罢免那些违反他们利益的坏蛋。

党必须坚持教育全党同志，要善于经常保持同群众

的密切联系,同他们打成一片,迅速的反映他们的要求与意见,经常关心与解决他们的切身问题。我们不但要善于向群众提出革命的要求,而且也要善于满足群众向革命提出的要求。只有这样,党才能紧紧的同群众靠拢在一起,向革命最后胜利的目标前进,而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

党必须坚决纠正党内把动员工作当做党的全部工作的片面思想与习惯。各级党部除动员工作外,必须经常讨论当时当地群众中所发生的一切问题,把解决这些问题当作同动员工作一样重要的党的任务。而且,动员工作是临时的突击性的居多,而群众工作却是经常的持久的。不关心群众的切身问题的党部与党员,同群众隔绝的官僚主义的党部与党员,是最坏的党部与党员。这种党部与党员应该使之在党内党外都被认为是党的最大耻辱,不使其有存在的余地。

“工人阶级的党如果不同群众保持广泛的联系,不经常巩固这种联系,不善于倾听群众的呼声和了解他们的疾苦,没有不仅教导群众而且向群众学习的决心,那它就不能成为能够领导千百万工人阶级群众和全体劳动群众的真正群众性的党。”(《联共(布)党史》)^[317]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左”倾危险*

(一九四一年八月十日)

抗战正在最困难的关头,全国人民正仰望着中国共产党拿出办法来,克服困难、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正确执行与否,对于以后时局将起决定的影响。

为了正确的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我们必须开展反对党内关于这一政策的两种倾向的斗争,即反对关于这一政策的右倾机会主义与“左”倾关门主义的斗争。一年半来抗日反磨擦的斗争,使我党得到很大的胜利,给了右倾危险以很大的打击。目前右倾危险在某些地区虽然仍然存在,然而“左”倾危险却在许多地区大大增长了。因此我就想根据中央最近的决定^[318],把统一战线中的“左”倾危险,单独拿出来谈一谈。

什么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左”倾危险呢?

第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左”倾危险表现在对

* 本文最初刊载于中共中央主办的党内刊物《共产党人》第十期(一九四一年九月二十日出版),署名洛甫。

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本身的动摇。党内有些同志以为这个统一战线只是在全国形势顺利时才需要,在全国形势逆转时就不需要了。在某些地方,有些同志在同顽固分子进行反磨擦的斗争中根本忘记了统一战线工作。有的甚至以为这样斗争下去,统一战线时代很快就会过去,土地革命时代很快就要到来,因而感觉到痛快。

这种“左”倾的思想与行动,当然是同我党的政策没有丝毫相同之点。犯这种错误的同志不了解,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我党在中国革命的一定历史时期内的坚定不移的政策。这一政策指出,我们今天唯一的死敌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其汉奸走狗。一切抗日反汉奸的力量,我们都应该吸收到统一战线中来。这一政策指出,在统一战线内部的斗争,只是为了扩大与巩固统一战线,而不是为了分裂与破坏统一战线。过去一年半来,我们反对顽固分子的斗争,并不是我们的目的。这只是为了达到团结抗战的目的而被迫采取的自卫手段。所以不论形势好转逆转,我们在这一历史时期内决不能动摇我们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在形势好转的时候,我们需要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在形势逆转的时候,我们仍然需要加强统一战线工作。统一战线内部的斗争时紧时松,不论是紧是松,斗争总是要为扩大与巩固统一战线的总方针服务的。

我们党内还有不少同志固执着一个老公式,以为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必须经过两个阶段,即民族统一战线

的阶段与土地革命的阶段。因此,以为今天民族统一战线的阶段,迟早必然要转变到土地革命的阶段去。其实,这种必然性是很成问题的。相反的,新的情况,新的实践,将证明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不一定再要经过那两个阶段。农民土地问题不必一定要经过土地革命的阶段来解决,而可以就在民族统一战线的阶段中经过革命的逐渐改良的办法,来求得解决^[319]。这在敌后方抗日根据地实际经验的例子中,已经显示了它的端倪。同时,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逐渐的分别的脱离民族统一战线,也不会根本动摇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根据,而迫使我们改变这个基本政策(这个问题,我这里只能提及,不能详说)。所以这种等待土地革命阶段到来的观点,不但在实际政策上不正确,而且在理论上也没有充足的根据。

所以,不要统一战线,离开统一战线而只讲斗争的立场,好象是很“左”的,很“革命的”,其实,这种倾向的发展,只有害处,没有好处。

因此,为了坚持党的基本政策,争取抗战建国的彻底胜利,必须同这种“左”的倾向进行不调和的斗争。

第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左”倾危险表现在不肯细心的、审慎的、深入的去研究与分析统一战线的不同对象,而采取不同对策。中国的天才军事家孙子有句话说得好: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但是我们党内有许多同志却不肯这样做。他们轻易的把顽固分子当做汉奸,把中间分子当做顽固分子。他们看不到顽固分子、中间分子内部的

各种派别及其相互间的关联与矛盾。他们看不到广大中间分子的各阶层在抗战中的重要性。他们采取千篇一律的方法去对付这样复杂的对象。这种态度,显然是完全要不得的。

由于中国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由于中国当前神圣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由于国共两党的力量的强大等原因,使中国国内各阶级的关系表现得十分复杂、十分微妙。即以代表中国大资产阶级大地主的顽固分子而论,其中就有各种不同的集团与阶层。在对帝国主义各国的关系上来讲,其中就有亲日派、英美派、德意派;在地域上来讲,其中又有中央派、地方派;在中央派内部来讲,又有党务派、特务派、别动派、政训派、军官派^[320];在特务派内部又有张三特务系、李四特务系等。而这些派别在政治立场上又是互相斗争,互相渗透。他们在抗日问题上,虽都还没有公开反对抗日,但他们要求抗日的程度,却因为他们的不同地位、不同利益、不同关系而有若干的差别。他们对“共党问题”,虽都主张反共、限共、溶共,但他们在反共活动的程度上也因为他们的不同地位、不同利益、不同关系,而有若干的区别。这种区别可能是微乎其微的,在抽象的共产主义原理的宣传家看来也许是无关重要的,但是在我们的共产主义的实际行动家、策略家看来却是十分重要的。如果我们把所有顽固分子看做完全一样的东西,而采取千篇一律的对策,那结果一定会大碰钉子。在顽固分子问题上是如此,在中间分子问题上

也是如此。至于把顽固分子当做汉奸,把中间分子当做顽固分子,那只会破坏统一战线,使自己完全陷于孤立无援的地步(关于什么是顽固分子、中间分子及我们的对策等问题,将有专文论及,这里为篇幅所限,只能略略提及而已)。

所以,为了扩大与巩固统一战线,我们必须反对不研究统一战线的各种对象,不讲求统一战线中的各种对策,把统一战线的对象简单化,把统一战线中的各种对策公式化的“左”倾关门主义。不了解对方,就不能决定正确的对策,没有正确的对策,只有百战百败,而决不能百战百胜!

第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左”倾危险表现在不愿意或不会用一切方法去接近一切抗战的人们。党内有些同志,常常倚仗共产党员的资格,自高自大,看不起别人,同非党分子总是格格不相入,或采取盛气凌人的态度。只有人家来拜访我们的时候,我们才不得已的敷衍了事。从我们这方面积极的、主动的去接近人家的事,那当然是更少了。党内还有些同志只知道用一种方法去接近人家,即直接拿共产党或八路军代表的资格去接近人家。如果对方对我表示冷淡,表示“话不投机”,那就以为没有其他办法了,从此即轻易的得出对方如何如何的“不可救药”,如何如何的“顽固”等等的结论。这种立场,显然也是要不得的。

我们共产党人对于中华民族的前途是完全负责的。

共产党人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人,最积极的主张者与拥护者。因此,在这方面,共产党人首先要表现出自己的模范作用。因此,共产党人对于一切抗战的人们,不论是顽固分子也好,不论是中间分子也好,不但不应该自高自大,拒人于千里之外,而且都应该采取主动的、积极的、热情的同他们交朋友的态度。这种态度,显然也会遭到少数人的“闭门羹”,少数人的“奚落”,但这种态度,无疑的,必为大多数人民所欢迎。就是在少数人给我们以“闭门羹”之后,我们是否就绝望了呢?还是不。在另一时候、另一时机,我们仍然应该主动的去亲近他们,去接近他们。这样至再至三,也是需要的。因为这样做,我们虽不能完全影响对方,但至少可以减少对方与我们之间的隔膜或仇恨,或多少延长对方与我们合作的时间。如果在我们多方努力之后,对方仍然反对我们,仍然与我们对立,那责任当然不属于我们,而属于对方了。

所以,共产党人在这方面不但要有主动的、积极的、热情的态度,而且要有极大的忍耐心与极大的度量。因为这样做,正是共产党人的责任。

同时,共产党人也决不要用一种方法去接近对方,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我们应该采取各种不同的方法。我们在一种情况下,可以用共产党或八路军代表的资格去接近对方;在其他情况下,我们可以经过家属、亲戚、朋友、同乡、同事、同学、世交等关系去接近对方。每个共产党员的这种社会关系,我们都应该充分利用来进行广泛统一

战线的活动。使每一个共产党员斩断同社会的一切关系，使每一个共产党员超然于整个社会之外的思想与办法，实是十分幼稚可笑的！

而且交朋友，也不是一定要一开始就是交党派的、政治的朋友。在一切社会活动方面，我们均可而且均应进行交朋友的工作。比如在文化教育事业方面，在生产经济事业方面，在公益社会事业方面，在私人感情方面，在军事建设与行动方面，我们都可进行交朋友的工作。而且只有这样广泛的多方面的交朋友，我们才能同最广泛的社会各阶层发生联系，推动他们从各方面逐渐的向着抗战建国的共同目标走去。

“左”的高慢的“光荣的孤立”，同我党扩大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团结的总路线，是水火不相容的。党必须纠正这类的“孤立政策”！

第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左”倾危险，表现在要求太高，求成太急。党内有些同志常常不估计工作的具体对象，提出过高的要求，而且希望很快的能如愿以偿。如果这种要求不能很快达到目的，却又表示灰心失望，不愿继续活动下去。他们只看见统一战线的自己的这一方面，自己的要求、自己的希望，而不去顾及统一战线的另一方面，别人的要求、别人的希望。因此，也就犯了“单相思”、“空着急”等空想主义的毛病。

当然，谁都希望，其他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对抗战建国的各种问题均有正确的、坚定的立场。但是这种希望，还

只能表示出我们的善良的愿望而已。事实却是并不如此简单的。事实上,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从顽固派起到共产党止,对于抗战建国的各种问题,各有自己的不同立场。除“今天还要抗战”一点大体相同外,关于“如何抗战”、“抗战到何时为止”、“如何建国”、“建立什么样的国”等等问题,不但不能完全一致,而且还有完全相反的观点。如果谁以为只要我们提出我们的一套主张,我们的对方就会肃然起敬,表示完全接受,那是最幼稚不过的幻想。我们共产党人决不能有这样的幻想。我们必须了解,某一对象本身的性质,本身的利益,决定了他所能接受我们的意见的限度。一种意见,如果于他有利,那他就会觉得“动听”,表示接受;一种意见,如果于他无关,那他就会觉得“无关紧要”,表示中立;一种意见,如果于他有害,那他就会觉得是“逆耳之言”,表示反对。所以在我们统一战线的工作中,我们必须估计到我们工作对象的性质,根据他今天可能接受的程度来提出我们的意见,表示我们的希望。我们必须学会对什么人讲什么话,对什么人抱什么希望。我们不能对各种各样的人讲一样的话,抱一样的希望。这里,必须抛弃那老一套的“党八股”,来学一点生动的语言。这里,必须打破那种对于对方的各种不切实的空想主义,来学一点革命的实际主义。

我们应该估计到中国社会内某一集团、某一个人在不同条件下的某种可变性。如某一顽固分子,在某种条件之下(如政治形势的变化,我们的良好影响等),可以

变为中间分子，而某个中间分子可以变为进步分子。这类好转的例子，是不少的。但在另一种条件之下，某一进步分子可以变为中间分子，某一中间分子可以变为顽固分子。这类逆转的例子，也是常见的。在这类情况下，我们主观方面当然应该力争好转，防止逆转（这是否能成功，当然不完全决定于我们主观的努力）。但如果以为顽固分子都可以转变为中间分子，中间分子都可以转变为进步分子，那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唯心主义的思想。个别顽固分子的好转，并不取消顽固派的存在。个别中间分子的好转，并不取消中间派的存在。在我们对顽固派进行统一战线工作时，我们只要提出适合于顽固派的意见就够了，不必有过高要求，过多希望。这就是说，我们对顽固派进行统一战线工作时，我们应该正确的认识顽固派，承认其客观的存在，用一切力量推动他们，使他们接受他们所能够接受的我们的意见，用尽他们所能贡献给抗战建国的一点可能性。同样，对中间派进行统一战线工作时，我们也应该正确的认识中间派，尊重其“中间”的地位，使他们接受他们所能够接受的我们的意见，发挥其所能够发挥的革命作用。我们决不因为顽固派只能接受我们的一点意见，或中间派只能接受我们的部分意见，而放弃我们统一战线的工作。事实上，只要我们的一点意见，即使是不十分重要的意见，为顽固派或中间派所接受，那就是我们统一战线工作的胜利。我们也决不能因为顽固派或中间派不能全部的接受我们的

意见,而表示我们对他们的轻视或失望。事实上,要顽固派或中间派接受我们的全部意见,只是表示我们自己的无知与幼稚而已。就是对方今天完全不接受我们的意见,我们也不要乱骂,也不要失望。这里特别重要的,就是我们要等待对方觉悟的忍耐心。对方一时不赞成我们的意见,这是不足为怪的常事,我们不必着急,我们尽可以等待一下。等待对方在实际政治经验中了解到我们的意见的正确(即对抗战有利,对他也有利),是必要的。因为对方对我们的一种意见的接受,不但依靠于我们的意见之是否恰当,而且也依靠于对方的政治经验。这种政治经验的取得,是需要一定时间的。这种政治经验的取得可能很快,也可能很慢。而我们必须有等待的忍耐心。在这种时候,我们只能尽旁敲侧击的责任。这里尽可处之泰然,不必干急,急性病是没有用的。因为意见提的恰当不恰当在我,接受不接受我们的意见却在对方。勉强的接受,常常比不接受还要坏。过分性急,反会使对方轻视我们,把我们的好意当作我们的弱点。

只有等待到一定的时候,在新的恰当的机会到来时(所谓“火候”到来时),我们又可向对方提出我们的意见。这样耐心的工作下去,我们相信,如果我们提出的意见真是合乎抗战的利益,也合乎对方的利益的,那对方最后仍有接受我们意见的可能。即使对方最后仍然不接受我们的意见,那人民就会看到:责任是在对方,不在我们。

因此,要求过高,求成太急,对扩大与巩固统一战线,

是有害的。

第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左”倾危险，表现在斗争时不会利用各种矛盾，在一时一地集中力量，打击当面的最主要的坏人。我们党内过去某个时期“打倒一切”的不懂策略的恶劣传统，直到今天还未被很好克服。如果要反对顽固分子，就把顽固分子看做完全一样的东西，而一概的反对，却不会利用他们内部的矛盾，分别对付他们，中立这个，麻痹那个，向第三个让点步，同第四个拉拢一下，集中力量打击当时当地顽固分子中最坏的一个。这种“打倒一切”的办法，结果只是帮助对方团结起来，联合起来，一致的对付我们。结果，使打倒一切，变成为一切也打不倒。这是共产党内“左”倾幼稚病的一种严重表现。

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顽固分子虽是有顽固分子的共同点，但是其中有各种不同的集团、派别与个人。他们内部存在着很多的矛盾，他们内部不断的互相斗争着。同时，他们同中间分子、进步分子之间存在着更多的矛盾。对于这类复杂错综的矛盾，我们应该很好的仔细的去研究。然后，我们选择当时当地最反动的、最坏的一个家伙，作为我们斗争的目标。这时，我们就应利用他们内部的一切矛盾，对其他一切顽固分子，采取中立、麻痹、妥协、拉拢的办法，务使那个最坏的家伙完全陷于孤立无援的地位，务使我们能够集中最大限度的力量去打击这个最坏的家伙，以取得斗争的胜利。这种斗争不但不破坏统一战

线,而且正可帮助反对最坏分子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的形成。这种斗争的胜利,也就是当时当地这个统一战线的胜利。

这种例子,在军事斗争中表现的特别明显。在某一部队向我们实行武装进攻时,我们即应集中全力对付当前这个最顽固的对手,对一切其他的部队,我们均应与之取得联络,与之进行各种谈判,使他们在我们反顽固的武装斗争中采取同情、赞助、中立,或消极至少不积极援助对方的立场。显而易见的,这对于我们斗争的胜负,有十分重大的关系。

所以我们在前面说过,坏分子间的矛盾,在抽象的共产主义原则的宣传家看来,似乎是不关重要的,但是在我们的共产主义的实际行动家、策略家看来,却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许许多多的战斗,常常因为我们不会利用对方的矛盾,分别对付,而遭受严重的失败。斗争的胜负常是由我们是否善于运用对方内部的矛盾来决定,这是对于革命斗争的胜败有决定意义的东西。

必须使我们的同志最后懂得,革命力量内部的团结是对革命有利的,反动力量内部的团结却是对革命不利的。因为反动力量内部团结了,就是反动的力量加强了。这就使革命力量在反对反动力量的斗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反动力量内部团结不起来,甚至发生很大的斗争,那是对革命方面非常有利的。因为反动方面内部的这种斗争,削弱了整个反动力量,这就使革命方面在反对反动方

面的斗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因此,必须充分利用反动力量内部的矛盾与斗争,以达到当前革命的目的。拒绝利用他们内部的矛盾,拒绝采取“各个击破”的策略,是不可救药的傻子!

斯大林同志如何巧妙的利用了帝国主义列强内部的矛盾,是我们在这方面的最好的模范。

当然,某些“左”倾空谈家,是不愿意这样做的。他们觉得,我们如果只打击当前的最坏的家伙,而同其他坏分子去讲交情,去谈拉拢,这岂不是有损于共产主义的纯洁性与庄严!这些“左”倾空谈家把对于马列主义策略的无知,解释为共产主义的纯洁与庄严,实是非常可笑的。

我们认为,只有能够巧妙的、有效的运用马列主义的策略,使革命能够得到胜利,这才是对于共产主义事业的真正的忠诚。

第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左”倾危险,表现在斗争时不肯认真遵守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党内有些同志在斗争中常常只凭一时的义愤与冲动,而不去遵守斗争的原则。有的地方,为了斗争对自己有利,就不大顾及斗争的是否有理了。有的地方,为了斗争对自己有利,就陶醉于斗争,而不大估计到斗争能收缩时即应收缩的必要了。有的地方,却是相反,因为自己有理,于是不估计斗争条件的是否有利,而进行冒险的斗争了。这些错误,都是必须纠正的。

为什么我们在统一战线中要同顽固分子反共分子进

行斗争呢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 ,这实在因为他们太没有道理 ,太不顾国家民族的利益(虽是他们口头上天天叫喊着“民族至上”、“国家至上”^[321]!)。所以我们在每一斗争中都应该站在有理的一方面。这种有理 ,不但要我们自己觉得有理 ,而且尤其要使最大多数人民都觉得我们有理。后者对于我们特别重要。

为了使我们的有理为最大多数人民所周知 ,所以在斗争不可免时 ,我们不必忙于发动斗争 ,而应该在斗争前进行充分的准备工作。我们应该发表宣言 ,张贴布告 ,用确实可靠的事实到处揭破对方对我们进攻之无理及我方的有理。我们应该诚恳的劝告对方 ,警告对方 ,希望他们不要逼人太甚 ,我们应在各种具体事实上表示我们决心团结 ,不愿斗争。只有这样做 ,才能使大多数人认为 ,斗争的发动在我们说来是万不得已的 ,我们是有理的。这种工作 ,就是在斗争发动之后 ,我们仍应不断的进行。

这种工作 ,如果我们做得好 ,还可以使对方内部发生分化与瓦解。愿意团结、不愿斗争的分子 ,会因我们的不愿斗争而同情我们 ,而不赞成他们自己方面死要斗争的人。他们即使无力停止斗争 ,至少会对于斗争表示不坚决、不积极 ,这对于我们斗争的胜败就有很大的关系。而这种准备工作 ,对我们自己 ,则有很大的团结与动员作用 ,这是不用说的。

斗争不但要有理 ,而且要有利。因为斗争是力量的比较。如果斗争的发动毫无胜利的把握 ,那我们即使有

天大的道理,我们还是不应发动。所以在斗争发动以前,我们还须冷静估计彼我双方的力量。如果斗争的条件对我们不利,我们应该坚决的拒绝发动。我们应该忍耐一下,等待与争取有利条件的到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力量的某种后退(或“撤退”),或转移地区,是完全必要的。

在斗争一旦发动之后,我们应毫不动摇的以全力争取斗争的胜利,彻底击破对方对于我之进攻,逼使对方转入防御或退却,逼使对方不能不在我们的力量前面表示某些让步。之后,我们的任务已经不是继续追击,彻底消灭对方,而是及时的结束战斗。之后,我们应该重新表示我们方面原来的态度,希望对方向我们继续合作,“言归于好”,来共同对付当前的民族敌人。如果对方经过我们的警告后,有所觉悟,那我们就可与之进行具体谈判。在这里,我们不必以战胜者自居,提出苛刻的条件,我们只要达到我们原来的要求就可表示满意。如果对方仍不觉悟,但是暂时没有力量重新进攻我们,我们亦可与之保持暂时的和平局面,采取“相应不理”的态度。这样,在大多数人民前面,我们在事实上表现出我们对内“和平团结”的立场,使人民在事实上看到我们的有理而同情我们,使对方陷于孤立。

必须拿这些斗争原则,去教育我们党内的同志,使他们懂得,我们的斗争,是为了团结,而不是为了分裂。“打”只有打得恰当时,才是革命的。乱打一顿,对革命事

业不但利,而且有害!

第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左”倾危险表现在民主精神的不足与党包办一切的工作作风。党内有些同志在统一战线中总是不会或不愿同各党各派无党无派的群众与干部共同工作,共同领导^[322],共同奋斗,或者同他们对立,对他们表示怀疑、冷淡,甚至恐惧,或者由我们来包办一切。这种现象,在我党占领导地位的地区,特别表现得明显。既然党领导整个工作,那党就应该包办一切,——这就是这些同志的“哲学”。因此对于各种民主制度的建立,他们也就表示了消极。

这种工作精神与工作作风,显然是不符合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基本要求的。

统一战线的扩大与巩固,没有民主主义的工作精神与工作作风,是不可能的。统一战线就是各党各派无党无派的人们的合作。既然是合作,那一切事情就需要经过共同商讨,共同决定,共同遵守,共同实行,谁也不能包办。既然是统一战线,那参加统一战线的各党各派无党无派的人们的地位,就应该受到尊重,他们的意见就应该受到注意,他们自己就应该积极的参加各方面的工作,而不允许有一党一派的包办。

就是在我党起领导作用的地方,我们仍然应该这样做。因为党的领导作用,不是同参加统一战线的各党各派无党无派的人们脱离,而正是要经过各党各派无党无派的人们共同商讨、共同决定、共同遵守、共同执行来实现。

包办只是起了代替的作用,而不是起了领导的作用。

在统一战线内贯彻这种民主主义的工作精神与工作作风的基本原则,就是一切要取决于大多数、经过大多数。参加统一战线的各党各派无党无派的人们,可以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意见,但经过共同讨论之后,最后的意见必然是大多数人的意见,也只有为大多数所采纳的意见,才能经过大多数而见诸实行。

为了在统一战线中发扬我们的领导作用,我们首先必须很好的考虑大多数人们当时当地的共同要求、共同利益,然后提出真能代表大多数人们的共同要求、共同利益的主张。这种主张的提出,必须采取提议的、商讨的方式,而不采取强迫人家接受的方式。同时除我们的提议外,我们应该欢迎其他党派其他人们的其他提议、其他意见,而且一样郑重的讨论他们的提议与意见。如果在讨论中我们发现我们的主张中有不对的地方,我们就应修改。如果发现其他党派的意见中有很好的地方,我们就应采纳。务使大多数最后所通过的决议不是一党一派的意见,而是各党各派无党无派所有人们的共同意见。也许其中大部分是我党的意见,但我们决不要以此自夸,而一样的把它看作共同的决议。

在执行共同决议的实际工作中,我们也应该使各党各派无党无派的人,均有工作可做,使他们对于共同的决定的实行,负担起实际的责任。当然在实际工作中,也许(不一定!)我们做得好些,但这不过是一种模范作用,是

为了带领其他人们一同前进,而不是把人们抛开一边,单独前进。而且事实上,真正做好一项工作,单靠我们少数党员,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的。这里,必须要有大批的非党积极分子与非党干部的积极参加。

只有这样共同决定、共同执行,才会使人们深切感觉到他们是为自己做事情,为自己奋斗牺牲,而不是受什么人的“利用”。只有这样,才会发挥人们的积极性到最高度,才会使统一战线发展与巩固下去。也只有这样,才会培养出无数的非党积极分子与非党干部。没有这批积极分子与干部,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当然,在统一战线中坏蛋与捣乱分子总是有的。他们会在内部进行破坏的活动。他们可以提出各种各样不合于统一战线原则的意见。他们可以有意对统一战线工作实行怠工或破坏。对于这类分子,彻底的民主主义工作精神与工作作风,似乎会给他们以便利。其实,却正相反,我们愈是实行民主,则这类分子的活动愈是困难,这类分子在大多数前面的破产也愈快。只有在大众前面公开讨论、公开批评这类分子的一切错误意见与行动,才能使大多数了解这些人的真面目,使这些人最后陷于完全孤立的地步。也只有这样,即不是由我们包办,才能使我们反对坏蛋的斗争,在大多数人看来不是少数人之间的“党派之争”,而是大多数人反对少数坏蛋的斗争。

这种民主主义的工作精神与工作作风,在我们的一切工作中均应加以贯彻。我们一方面向国民党要求民主

自由权利,另一方面应该自己做出实行民主的模范,首先在我们自己领导的地区内。国民党顽固派处处表示惧怕民主、反对民主、不实行民主;我们则应处处表示我们拥护民主、尊重民主、实行民主。我们不是拿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去同国民党顽固派的一党专政、一派专政对立,而是要拿真正民主的统一战线的政权去同国民党顽固派的一党专政、一派专政对立。

在我们领导的地区,凡是向国民党所要求的一切民主权利,我们都应该首先自己实行起来。党中央一切关于实行民主主义的各种决定,各种制度,如“三三制”等,各地党部必须认真的彻底的执行。

事情是很明显的,在我党所领导的地区,各党各派无党无派的人愈是感觉到民主与自由,则我们同他们之间的关系,就会愈加密切、愈加发展。党的领导作用,也会因此愈有保证。反之,如果他们到处感觉到我们的包办与命令,则我们与他们之间的关系,反会疏远起来、恶化起来,党的领导作用因此也会减少保证。这种相反相成的浅显道理,是每一个共产党人所必须了解的。

对于一切愿意到我们这里来工作,愿意同我们为抗战建国的胜利而共同奋斗的人,我们一律欢迎。但往后他们又要离开我们时,我们也不勉强。正象他们有“来”的自由一样,他们也有“去”的自由。

这可以在军队关系方面举个例子。某些队伍愿意接近我们、靠拢我们,我们是否要采取改编或吞并政策呢?

不需要。我们只要在对方愿意的程度内给以某种必要的、可能的帮助。我们应该尊重对方的独立性。当对方因为另一种原因而不愿意接受我们的领导,要离开我们时,我们是否一定要勉强留他们呢?也不需要。我们的责任,不是强留,而是好好的欢送他们。在欢送会上,我们还应好好的告诉他们:“你们现在要另找出路,我们是不能反对的。但究竟谁走的道路是正确的道路,你们将来自会明白。如果你们以后觉得我们的道路是正确的,因而还想回来,那我们这里总是欢迎你们回来的。”我们想,这是对于要离开我们的人的应有的光明磊落的态度。

所以,党包办一切的办法,好象是“最革命的”,甚至似乎是在发扬高度的“党性”,其实这是使党脱离群众的一种“左”的关门主义,因此这种倾向必须适时纠正。

最后,必须说到的,就是党内许多同志对于“阶级立场”、“党性”、“忠实可靠”、“清白纯洁”等等名词的片面的了解,这种片面的了解大大的妨碍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很好执行。

许多同志以为一个党员有没有“阶级立场”,有没有“党性”,是否“忠实可靠”,是否“清白纯洁”,就看他是否到处能够同其他阶级、党派、群众严格的区别开来,而且能够同他们的一切非党的与反党的思想与行动进行坚决的斗争。这自然是真理的一面,但这只是真理的一面。

如果从此得出结论说,凡是最不能同应该进行统一战线的其他阶级、党派、群众发生密切联系,最不能同他

们合作的共产党员,是最有阶级立场、最有党性、最忠实可靠、最清白纯洁的党员,那真是大错而特错了。

我们决不能把保持“阶级立场”、“党性”、“忠实可靠”、“清白纯洁”等等,抽象的孤立起来看。脱离了同应该进行统一战线的其他阶级、党派、群众的密切联系,一味高傲自大、洁身自好,非马列主义的原则不谈,非共产党内的工作不做,这能够说是什么“阶级立场”,什么“党性”,以至什么“忠实可靠”、“清白纯洁”吗?决不能的!

我们所说的阶级立场、党性、忠实可靠等等均不是这样。我们说,只有真正能同应该进行统一战线的其他阶级、党派、群众发生密切联系,而又能够不丧失阶级立场、党的立场的共产党员,才能说是有阶级立场、有党性、忠实可靠的同志。愈是能够同那些阶级、党派、群众密切联系起来,而始终保持阶级立场、党的立场的共产党员,才愈能表示出他的阶级立场与党性,他的忠实可靠与清白纯洁。

事实上,我们在党内常常看见两种相反的现象。一种是同应该进行统一战线的其他阶级、党派、群众脱离,把自己孤立起来,同时高唱“阶级立场”、“党性”、“忠实可靠”、“清白纯洁”。另一种是一同那些阶级、党派、群众发生接触,或深入到他们内部去的时候,又把阶级立场、党性、忠实纯洁等等付诸东流,而被他们所同化,成为他们的俘虏或尾巴。前者即是我们所说的“左”倾关门主义,后者即是我们所说的右倾机会主义。

但是,什么叫做能够同应该进行统一战线的其他阶级、党派、群众发生密切联系,而又能够不丧失阶级立场、党的立场呢?这就是说,一个同志不但能够深入群众,深入社会,而且懂得如何实际上引导最广大的人民去完成党在当时所提出的具体任务。这里,空喊共产主义的原则与口号,背诵党中央的决议与宣言,是没有用的。这里最需要的,是灵活的随机应变的策略。只有经过灵活的、随机应变的策略,而保障党当时所提出的具体任务的完成的共产党员,才能说是具有坚定的阶级立场与坚强的党性的同志,是对党最忠实可靠、最清白纯洁的同志。当然,忠实可靠同“老好人”不同。忠实可靠,不等同于“老实”,不等同于“人云亦云”。清白纯洁不是“简单幼稚”,也不等同于“天真烂漫”。只有能够运用各种方法、各种策略来实现党的具体任务者,才配真正叫做忠实可靠、清白纯洁的共产党员。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是我党在中国目前历史时期内的基本政策。谁能在实际上坚决执行这一政策,正确的执行这一政策,使抗战建国得到最后胜利,谁就是最有阶级立场、最有党性、最忠实可靠、最清白纯洁的共产党员。今天离开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空谈阶级立场、空谈党性、空谈忠实纯洁,这是没有用处而且有害的。把阶级立场、党性等等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对立的观点,是根本错误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即是我党今天的“阶级立场”,忠实于这个政策,即

是忠实于党,即是党性。打破“左”倾关门主义,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扩大与巩固而奋斗,也即是“阶级立场”、“党性”的一种具体表现。

当然,在同应该进行统一战线的各阶级、各党派,在同广大群众密切联系中来实现党的政治路线,比脱离那些阶级、党派,脱离广大群众而空谈“阶级立场”、“党性”、“忠实纯洁”等等,要困难得多。究竟用什么方法把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民引导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使他们为抗战建国而牺牲奋斗,这实是非常复杂、非常艰巨的任务。这里,我们会发生很多错误,碰到许多困难,遭受到许多挫折与某些失败。这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只要我们不怕困难,克服困难,时时纠正工作的错误缺点,百折不回的做去,我们是能够胜利的。

所以不但要有马列主义的原则,而且要有马列主义的策略,不但要接受与了解党的政治路线,而且要有实现这个路线的方法。一个干部具备了这两方面,才能算是真正有了坚定的阶级立场,坚强的党性,才能算是真正的忠实可靠与清白纯洁!

*

*

*

这就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左”倾危险的几种重要表现。只要我们看到这种危险,同这种危险进行不断的斗争,从斗争中去加强对我们同志的教育,那我相信这种危险是能够克服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是能够得到更大成绩的。

只要我们彻底击破我党内历来存在着的“‘左’倾比右倾要好些”的错误观点，坚决的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那抗战建国的事业就有了胜利的保证。

发展文化运动^{*}

(一九四一年九月十日)

一、关于国民党区域的文化运动。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很可能广泛发展与极应该广泛发展的一顶极端重要的工作，是抗日文化运动。这项工作的意义在目前有头等重要性，因为它不但是当前抗战的武器，而且是在思想上干部上准备未来变化与推动未来变化的武器。因此在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党(敌占大城市亦然)应对发展文化运动问题特别提起注意，应把对文化运动的推动、发展及其策略与方式等问题经常放在自己的日程上。对于文化运动的进行，应该联合一切不反共的自由资产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与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共同去做，而不应该使共产党员尖锐突出与陷于孤立。在反对复古、反对大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政策、反对日寇汉奸的奴隶文化等方针之下(根据各地情况将口号具体化)，是能够动员各阶层知识分子、各部门文化人与广大青年学生加入这一运动的。须知对广大人民群众，对于在军队中、政府中、党部

* 这是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

中、学校中、社会中的广大中下层人们,如果不在思想上引起一个变化,则政治上的根本变化或彻底好转(即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是不可能的。关于如何在各个文化部门(理论的、政治的、学校的、社会的、文学的、艺术的)中推广与深入这个运动,希望国民党区域的党部加以切实的研究。

二、关于各根据地的文化运动。在这里我们有全部权力来推行全部文化运动。我各地党部与军队政治部应对全部宣传事业、教育事业与出版事业作有组织的计划与推行,用以普及与提高党内外干部的理论水平及政治水平,普及与提高抗日军队、抗日人民的政治水平。要使各根据地的干部、军队与人民的理论政治及文化水平高于与广于全国各地。各根据地的文化教育工作,不论是消灭文盲工作,学校教育工作,报纸刊物工作,文学艺术工作,除党校与党报外,均应与一切不反共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及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联合去做,而不应由共产党员包办。要注意收集一切不反共的知识分子与半知识分子,使他们参加在我们领导下的广大的革命文化战线。应反对在文化领域中的无原则的门户之见。每一较大的根据地应开办一个完全的印刷厂,已有印刷厂的要力求完善与扩充。要把一个印刷厂的建设看得比建设一万几万军队还重要。要注意组织报纸、刊物、书籍的发行工作,要有专门的运输机关与运输掩护部队,要把运输文化粮食看得比运输被服弹药还重要。

正确处理文化人 与文化团体的问题^{*}

(一九四一年十月十日)

为了发展各抗日根据地的文化运动,正确的处理文化人与文化团体的问题,实为当前的重要关键。为此,特提出下列各点。

一、应该重视文化人,纠正党内一部分同志轻视、厌恶、猜疑文化人的落后心理。须知一个在社会上有相当地位、相当声望、能有一艺之长的文化人,其作品在对内对外常常有很大的影响。

二、应该用一切方法在精神上、物质上保障文化人写作的必要条件,使他们的才力能够充分的使用,使他们写作的积极性能够最大的发挥。须知爱好写作、要求写作,是文化人的特点。他们的作品,就是他们对于革命事业的最大贡献。

三、党的领导机关,除一般的给予他们写作上的任务

^{*} 这是为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起草的党内指示。原题《关于各抗日根据地文化人与文化团体的指示》,现题是本书编者另拟的。

与方向外,力求避免对于他们写作上人为的限制与干涉。我们应该在实际上保证他们写作的充分自由。给文艺作家规定具体题目、规定政治内容、限时限刻交卷的办法,是完全要不得的。

四、对于文化人的作品,应采取严正的、批判的,但又是宽大的立场,力戒以政治口号与偏狭的公式去非难作者,尤其不应出以讥笑怒骂的态度。我们一方面应正确的评价他们的作品,使他们的努力向着正确的方向,同时鼓舞他们努力写作的积极性,不使他们因一时的失败而灰心失望。

五、估计到文化人生活习惯上的各种特点,特别对于新来的及非党的文化人,应更多的采取同情、诱导、帮助的方式去影响他们进步,使他们接近大众,接近现实,接近共产党,尊重革命秩序,服从革命纪律。共产党人应有足够的气量使自己能够同具有不完全同我们一样生活习惯的文化人共同生活,共同工作。对于文化人生活习惯上的过高的苛刻的要求是不适当的。

六、各种不同类的文化人(如小说家、戏剧家、音乐家、哲学家等),可以组织各种不同类的文化团体,如文学研究会、戏剧协会、音乐协会、新哲学研究会等。这些团体亦可联合起来,成立文化界救亡协会之类的联合团体。但应该估计到这些团体同其他民众团体的不同性质,而规定它们的特殊任务。这些团体的任务,一般是:介绍、研究、出版、推广各种文化作品;吸收与培养各方面的文化

人材 ;指导大众的各方面文化活动 ;联络文化人间的感情与保护他们切身的利益 ;组织文化人向各地报章杂志写稿 ;介绍并递寄他们的作品或译著到全国性大书局出版 ;向外面的及大后方的文化团体进行经常的联络。纠正有些地方把文化团体同其他群众团体一样看待及要它们担任一般群众工作的不适当的现象。

七、上述各种文化团体 ,一般的只吸收文化人及一部分爱好文化的知识分子。它们的作用 ,不在数量之多 ,而在质量之好。它们也不必在各地建立自上而下的、系统的、普遍的组织。只有在文化人比较集中的中心地区 ,可以建立它们个别的分会。团体内部不必有很严格的组织生活与很多的会议 ,以保证文化人有充分研究的自由与写作的时间。

八、文化人的最大要求 ,及对于文化人的最大鼓励 ,是他们的作品的发表。因此 ,我们应采取一切方法 ,如出版刊物、公演戏曲、公开讲演、举办展览会等 ,来发表他们的作品。同时发表他们的作品也即是推广文化运动的最主要的方式。

九、各文化团体应该努力指导各学校、各机关、各部队、各民众团体的文化运动 ,帮助他们组织各种群众的文化小团体 ,如歌咏队、剧团、文学小组之类 ,并供给他们以指导者与研究材料。必要时可召集他们开一定的代表会或座谈会。但在组织系统上 ,这些群众的文化小团体不属于各文化团体 ,而仍属于各学校、各机关、各部队、各民众

团体的文化教育宣传部门,以避免各文化团体忙于日常的组织工作,而妨碍文化人基本任务的完成。

十、在文化人比较集中的地区,应设立文化俱乐部一类的地方,以供给文化人集会与娱乐之用。此外,为了使作家们有创作的适当场所,可特设“创作之家”一类的住所,使他们能够安静下来,从事他们的创作。

十一、挑选对文化工作有兴趣的青年知识分子开办各种文化工作干部的学校或训练班,以培养新的文化工作干部。选择机关部队中有文艺才能的“小鬼”,给以长期的训练,亦甚重要。鼓励文化人去担任一定的教课是必要的。

十二、从有相当威信与地位的共产党员文化人或非党的文化干部中,培养一小部分在文化运动中能够担任组织工作的干部。他们自己虽是文化人,但他们的活动应偏重于组织工作,而不是写作。没有这些文化组织工作者,文化人内部的很好团结,文化人及文化团体的效能的充分发挥,是很困难的。现在各地文化运动中特别缺乏这类干部。

十三、继续设法罗致与吸收大批文化人到我们根据地来。必须使我们的根据地不但能够让他们安心于自己的工作,求得自己的进步,而且也是最能施展他们的才能的场所。

提高干部学习的质量^{*}

——纪念五五学习节^[323]

(一九四一年四月七日)

提高干部学习马列主义的质量,是当前干部学习中的一个中心任务。

为了完成这个任务,现在急需解决下列三个问题。

第一,关于培养干部独立阅读(也即是独立研究)的能力与习惯的问题。

每个干部要养成独立阅读的能力,首先应该知道自己的文化理论水平,不要好高骛远,妄想一步就跨进马列主义的大门。文化程度不够的干部,首先应该把文化水平提高,不要急于从事马列主义的专门研究。对马列主义的某部门连常识也没有,那就应该首先找些入门书来看看,待有了初步准备后,再找专门书来研究。这样按部就班的学习上去,独立阅读的能力就会一天一天增进。

可惜现在有许多干部在学习上常常缺乏自知之明。

* 本文最初刊载于中共中央主办的党内刊物《共产党人》第十七期(一九四一年四月出版),署名洛甫。

文化水平低的干部,不肯学习文化,以为学习文化课,对于他是一种耻辱。他硬要阅读马列主义原著,结果,因为嚼不烂而对马列主义的学习灰心了。有些对于政治经济学毫无常识的同志,一开始就要读《资本论》,对哲学毫无常识的人,一开始就要读《反杜林论》,结果当然也是碰壁。这些同志,花费的时间很多,所得到的却是太少。

一个干部要养成独立阅读的习惯,首先应该知道,学习马列主义,必须自己下一番工夫。因为马列主义是人类有史以来最高发展了的科学,光是到大课堂上、讲演会上、研究会上去随便听听,自己不去研究,是很少用处的。听讲、参加研究会只是为了启发自己的研究,而不就等于研究。应该着重提出的,就是我们的主要学习时间,应该放在自己阅读、自己研究上,而不应该放在听讲上。自己学习是主要的,听课是辅助的。

可惜现在有许多干部还不肯这样做。他们花费了大部分的时间在讲演会、研究会上,甚至有的成了无讲不听的“听讲专门家”。然而结果是十分可怜的,听讲听了二三年,还是一个一知半解、道听途说的“空头马列主义者”。他们始终只能是在马列主义的大门外东张西望的流浪儿!

要提高干部学习的质量,不纠正上述的不良倾向,是不可能的。虚心一点,放下空架子,切实了解自己,从自己今天的文化理论水平出发,养成独立阅读的能力与习惯,自己下一番苦功来攻打马列主义科学的堡垒——这些应

该是我们提高学习质量的一个基本方面。

第二,关于增加各种具体的社会知识与科学知识的问题。

马列主义是人类文化知识最高的发展,学习马列主义必须有很丰富的、具体的社会知识与科学知识做基础。没有这样的基础,要成为一个优秀的马列主义者,是不可能的。

可惜的是,我们常常还只是注意于马列主义的抽象原则的学习,而对于学习马列主义所必需具备的具体知识则很少注意。甚至有这样的干部,他一方面相信共产主义,同时又相信鬼神的存在。也有这样的干部,他一方面知道矛盾统一律,同时对于自然、社会、思想上的具体的矛盾统一,却完全无知。也有这样的干部,他可以说到世界三个营垒的对立^[324],但却不知道这三个营垒究竟在哪里。这样的例子,是举不胜举的。正因为如此,所以许多马列主义的理论,对许多没有具体的社会知识与科学知识的干部,只是成了空洞的、没有内容的、生硬的教条与公式。尤其是唯物辩证法中一些最一般的规律,对于他们常常变成了毫无内容的滥调。

我们不能不承认,我们干部中各种具体知识的缺乏,是使党在克服教条主义、公式主义中发生困难,是使党的策略不会被灵活运用,是使党的原则指示不会被具体化的很重要的主观原因之一。

为了增加各种具体知识,每个干部应该首先学习历

史、地理,以及各种必要的社会常识与科学常识。关于中国的历史、地理和社会的各种常识,对于我们干部尤为需要。每个干部应该经常注意于这种知识的获得,而不满足于抽象的、空洞的原则。除阅读与研究我们出版的马列主义书籍以外,也还有许多书籍,可以作为我们增进知识的辅助读物的。例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官场现形记》等旧小说的阅读,对我们了解中国社会的黑暗方面,有不少的帮助。而不了解中国旧社会,则改造旧社会就不可能。至于鲁迅先生的小说及论文,则更是每个干部所必须研究的读物。

从具体到抽象,应该是学习上的一般原则。必须遵守这个原则,学习到的抽象才是具体的真理,而不是空洞的教条。至于已经学到了许多抽象理论的干部,更应该注意于从抽象到具体的研究。

第三,关于中级读物及辅助读物的编辑与出版问题。

要使干部学习能够按部就班的前进,能够学习具体的知识,没有适当的中级读物与辅助读物的供应,是不可能的。因此中央宣传部及各高级党组织的宣传部在这一方面还应予以更大的注意。一般说来,延安解放社出版的许多马列原著,对于一般干部,还是吃不下的。其中许多东西,还是他们看不懂的。

编辑中级读物及辅助读物,一年前在延安就已经开始了,但成绩还是很少。最近时事研究会^[325]出版的《抗战中的中国丛刊》^[326],西北研究社^[327]出版的《西北丛

书》^[328] ,文化教育研究社^[329] 出版的《文化教育丛书》^[330] ,是供给同志们以各种具体知识的有益读物。但这还只是开始而已。现在工作的弱点 ,就是宣传机关在这方面的注意力还不够集中 ,它罗致各方面编著人才还不够广泛 ,在组织上对他们的各种推动与鼓励也还不够。在出版物的总量中 ,这些读物所占的比例也太少了。

在所有干部学习中与干部学校中 ,以后应增设文化课及关于各种具体知识的科目。在教学上必须遵守由具体到抽象的原则。

这三个问题 ,是今后我们在提高干部学习的质量中所应该十分注意 ,并力求解决的。

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日)

一 宣传鼓动工作的任务与范围

我们党的宣传鼓动工作的任务,是在宣传党的马列主义的理论、党的纲领与主张、党的战略与策略,在思想意识上动员全民族与全国人民为革命在一定阶段内的彻底胜利而奋斗。这种宣传与鼓动,同时包含有对共同思想进行联合、对敌对思想进行斗争的两个方面。

宣传鼓动是思想意识方面的活动,举凡一切理论、政治、教育、文化、文艺等等均属于宣传鼓动活动的范围。因此,宣传鼓动工作的活动范围是非常广泛的。把宣传鼓动限制在狭小的范围内的了解,是错误的。这种了解的结果,往往放弃许多重要的宣传鼓动工作的阵地,不能把我们宣传鼓动工作的活动扩展到社会的各方面去。而只有扩展我们宣传鼓动工作的范围,才能使党的宣传鼓动工作的任务得到完成。

* 这是为中共中央宣传部起草的文件。

二 我党宣传鼓动工作的特点

我党宣传鼓动与其他党派宣传鼓动的基本的原则的区别,就在于我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是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原则的。这些基本的原则的区别,具体表现在:

第一,我党所宣传的理论、纲领、政策等,是符合于客观真理的,符合于客观发展的规律的。我们在认识客观真理、客观规律中,指出历史发展的方向和前途,并为着这种前途而奋斗。因此,我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是有生命力的,有力量的。

第二,我党所宣传的理论、纲领、政策等,是符合于全民族与全国人民的利益的。我党的宣传鼓动工作就是为着全民族与全国人民的利益而服务。因此,我党的宣传鼓动是能为群众所接受与拥护的。

第三,我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是与党的行动相符合的。言论和行动的一致,是我党的特点。群众所重视的不仅是言论,而主要的是行动。要是一个政党的言论与它的行动不相符合,要是它不履行自己的言论,要是它的言论不兑现,这样的政党必然要失去群众的信任,必然要遭受失败。共产党有别于其他阶级的政党,就是严格的保持言论和行动的一致。因此,我党的宣传鼓动是行动的,战斗的。

三 宣传与鼓动的相互关系

宣传与鼓动是组成我党整个宣传鼓动工作的两个部分,这两个部分是统一的,同时又是有区别的。宣传工作是在于把一个问题从理论上解说得明白,使比较少数的人了解这个问题的原因、结果、前途和发展规律,给比较少数的人以许多观念。鼓动工作是在于从一个问题中抓住人人都知道的事实,给广大群众以一个观念,极力激起群众的感情。所以从任务上、内容上、对象上、方式上来说,宣传与鼓动都是有区别的。宣传工作主要是文字上的,并带更多的经常性,而鼓动工作则主要是口头上的,并多带临时性。

鼓动工作为宣传工作开拓更广泛的基础。鼓动工作可能在一个场合中就取得广大群众的同情。宣传工作则帮助巩固鼓动工作中已经取得的地盘。宣传工作又是鼓动工作的加深,使群众由对某一事实的同情或愤怒,而走向对某一问题的发展规律的认识。鼓动工作做得愈好,则宣传工作愈容易进行;宣传工作做得愈好,则愈容易扩大鼓动工作的范围。

要善于适应情况,当使用鼓动时就使用鼓动,当使用宣传时就使用宣传。要善于根据情况的不同,环境的变化,由鼓动工作过渡到宣传工作,或由宣传工作转变为鼓动工作。

四 宣传鼓动工作的基本原则

在宣传鼓动工作的进行中,我们必须注意下列基本原则。

第一,必须掌握党的路线与党的政策。这是决定宣传鼓动工作成败的中心关键。不根据党的政策的宣传鼓动工作是一定要闹乱子的,而且一定是收不到效果的。

第二,必须正确估计客观的环境,了解具体的情况,了解宣传鼓动的对象。不然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就成为无的放矢,成为教条主义与公式主义的叫喊。

第三,必须区别各种不同情况下的宣传鼓动工作:(1)党内与党外;(2)干部与群众;(3)公开环境与秘密环境;(4)战时与平时;(5)各种不同的区域(如大后方、抗日根据地、敌占区;城市、农村等等)。

第四,必须根据群众自身的政治经验,使群众接受党的宣传鼓动。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是要使得群众在自身的政治经验上来认识我们党的理论、政策、主张、口号的正确。因此,必须根据群众今天所切身懂得的东西,根据群众今天的觉悟程度与文化水平来进行宣传鼓动,必须使我们的宣传鼓动能引起群众的兴趣与行动,并在这种同群众打成一片的基础上逐渐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

第五,必须使我党的宣传鼓动工作,循着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的道路来进行,并善于同各种不同的同盟军

建立各种不同程度的合作。这里,总的方针是巩固与发展自己,联合大多数,争取中间分子,孤立妥协分子,分化顽固分子,集中力量打击敌人、汉奸及少数亲日派分子。

第六,必须善于使用一切宣传鼓动的方式,从通俗的形式到高级的形式,以及由一种形式过渡、转变到另一种形式。要善于采用通俗化的形式,群众所能了解的语言,去进行宣传鼓动工作。

第七,必须善于使用一切宣传鼓动的工具,熟知它们一切的性能。在现代科学和技术发达的条件之下,许多科学上的成就,都应该运用到宣传鼓动上来。尤其要使现代的印刷业、无线电及电影等等,成为宣传鼓动的有力工具。

五 宣传鼓动工作的方法

在宣传鼓动工作的进行中,我们必须注意留心研究宣传鼓动工作一般的方法,以及宣传工作和鼓动工作所应特别注意的方法,这是为着我们宣传鼓动工作能够更顺利的进行和收到更大的效果所必要的。关于宣传鼓动的一般的方法,应注意下列几个问题。

第一,你要讲什么,事先必须自己充分准备好所要讲的东西,不然,你的宣传鼓动就不能有清楚的内容,而收不到应有的效果。

第二,对什么人讲,把对农民讲的话,拿去对工人讲,

有时就会牛头不对马嘴。你讲话的对象是何人,他们的情绪是怎样,都要预先弄清楚。

第三,要达到什么目的?或者是为了解释一个问题,使他们明白事实的真象;或者是为了要发动一个运动,使听众听了你的话就拥护这个运动。总之,你的讲话或文章,或其他宣传鼓动品也好,是为了要达到一定的目的的。

第四,怎样讲 既然讲什么,对什么人讲,达到什么目的,你都想好了,那么问题就是怎样讲才能把你的意思讲清楚,使对方了解,以达到你所要达到的目的了。

第五,随时留心群众的反应。讲话中及讲话后应注意听众的反应,以便随时改变你的宣传鼓动的内容与方法。

第六,除了应注意上述宣传鼓动工作一般的方法外,在进行宣传工作时,又应特别注意下列各项:(1)宣传的内容必须是充实的,而不是空洞的;(2)宣传的语句应当简单、明了、清楚、透彻;(3)宣传的事实应当是真实的、生动的、恳切而带有说服性的;(4)由具体到抽象,由近到远,由中国到外国。

第七,在进行鼓动工作时,又应特别注意下列各项:(1)抓住为广大群众所熟悉的事实;(2)抓住为广大群众最切身的、最迫切的、最易感动的事实;(3)讲话要生动,富于情感,富于煽动性;(4)时间要短。

六 党内教育工作

党内教育工作是党的宣传鼓动工作中一个重要的部分。党内教育的目的，就是提高全党政治理论的水准，思想上巩固党的队伍，培养掌握马列主义的能独立解决问题的老干部。党内教育的内容，应当集中在几门主要的课程上：（1）马列主义；（2）中国共产党的建设；（3）中国革命运动的经验教训，党在各个革命时期的政治路线与具体政策；（4）中国历史；（5）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知识。党内教育应当是普遍的，从最高级的领导干部到每个党员都应当把学习当作是自己的责任。党内教育应当有计划的、经常的、不间断的进行。解决党内教育的基本问题就是：（1）供给教材；（2）培养指导员、教员；（3）领导机关对学习制度的建立、监督、检查。

党内教育可分为三个主要部分。

第一，在职干部教育，是党内教育的一个重要的环节。这是工作与学习互相联系的最好办法。每个在职干部应当了解学习是每个共产党员的责任，党的领导机关应当把每个干部学习成绩之优劣作为鉴定一个干部许多标准中之一个。在全党内应建立在职干部学习的制度，提倡学习的风气，养成独立的看书、独立的思考问题的习惯。

第二，支部教育，或普通党员的教育。每个党员应

当了解做一个共产党员的起码知识，共产党是什么，做一个党员的资格、责任和权利义务，党的组织原则，党的纪律等等，进而了解党的理论，党纲党章。党的支部教育，应当经常有计划的进行。除了党的决议、策略政治教育外，还应提高每个党员的文化水准。对新党员应加以特别的教育。

第三，党校，党的训练班及政治学校，这也是党内教育一个重要部分。每个党的干部经过相当时期的工作后，进党的学校去学习，以提高理论水准，是非常必要的。尤其在根据地内办党校办训练班及政治军事学校，大批的培养干部，是非常必要的。应当逐渐使党校正规化，提高党校的质量，慎重挑选党校的教员。

在公开环境下与秘密环境下的党内教育，应加以区别。在秘密环境下党内教育的进行，必须不妨碍党的组织的安全，主要的应采取个别教育的方式。

七 群众鼓动工作

群众鼓动工作是党的宣传鼓动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群众鼓动工作的任务就是利用群众所熟悉的事实及切身的问题，目前国际国内或当时当地所发生的事件向群众解释，使群众认识事件的真相，提高群众的情绪，提高群众的积极性，引导他们到革命的道路上去。

群众鼓动工作有下列两方面的任务。

第一，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揭露工作。这就是对异民族残暴奴役，及旧社会内各种压迫人民的黑暗的揭露。共产党应当从各方面揭露异民族、旧社会压迫各阶层人民的黑暗，应当表达各阶级因异民族旧社会的黑暗所引起的不满。这是从各方面训练群众的革命积极性的最好的方法。

在抗战中我们首先要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残暴，从各方面加以揭露，唤起人民的民族觉悟、参加抗战的热情以及对抗战胜利的信心。

同时也要对当权的国民党在抗战中各种不合理的设施加以揭露，尤其是对它的反共政策、妥协阴谋以及危害人民的民主民生的办法加以揭露，使人民认识到这种办法只能引导中国走向亡国的道路，使群众了解到只有改变当权的国民党这套办法，抗战才能胜利。

第二，在各种运动中、动员中的群众鼓动工作。这就是为当时当地的一定的任务吸引群众参加到这个运动那个动员中来，利用当时的情况解释运动的任务，动员的办法，使群众了解而自动的参加到这个运动和那个动员中来。

尤其在根据地内，在战争的环境下，各种运动与各种动员是很多的，要使群众能够迅速的了解运动或动员的任务和目的，这就依靠于我们的群众鼓动工作。

每个共产党员应当经常的在群众中进行个别的或集体的鼓动工作，揭露旧社会的黑暗，解释党的政策。

八 文化运动

文化运动实际上是党对外宣传工作的一个有力的武器。党应当经过文化运动来宣传革命的思想，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党应当从各方面领导和组织文化运动，帮助文化运动的发展，在大后方、在敌占区、在根据地内都应当依照各种不同的情况发展文化运动。

党在文化运动方面有下列任务。

第一，团结一切抗日不反共的文化力量，建立文化运动方面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向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反对民族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反对民族投降主义，反对黑暗复古主义。

第二，发展进步的文化力量，发展民主思想，主张思想自由，研究各种学术，宣传科学的社会主义，推进中国的文化向前发展。

第三，团结文化干部，培养文化干部，爱护文化干部，尤其在根据地内更应大批的吸收知识分子、各种专家学者参加一切抗战的工作。

第四，参加国民教育，发展国民教育，这是文化运动最基层的工作。

九 报纸、刊物、通讯社 及出版工作

报纸、刊物、书籍是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最锐利的武器。党应当善于充分的利用这些武器。办报、办刊物、出书籍应当成为党的宣传鼓动工作中的最重要的任务。除了中央的机关报、机关杂志及出版机关外，各地方党应办地方的出版机关、报纸、杂志。除了出版马恩列斯的原著外，应大量出版中级读物，辅助读物以及各级的教科书。应当大量的印刷和发行各种革命的书报。

在现代无线电业发展的情形下，以及在中国交通工具困难的情形下，发展通讯社的事业，无线电广播事业，是非常重要的。应当在党的统一的宣传政策之下，改进现有通讯社及广播事业的工作。

十 宣传鼓动工作与 组织工作的关系

宣传鼓动工作和组织工作是我党工作中两个有机的部门，也是其他一切部门工作中两个有机的部分。宣传鼓动工作和组织工作对于我们整个党的工作正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不可缺一。宣传鼓动工作与组织工作对于我们党都是同样重要的。对于宣传鼓动工作与组织工

作相互关系的正确了解，对全党是必需的。在党的某些机关与党员中存在有某种忽视宣传鼓动工作的观点，必须加以纠正。

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是为党的组织工作开辟道路，组织工作为宣传鼓动工作巩固地盘；反转来，组织工作为宣传鼓动工作扩大地盘，宣传鼓动工作又为组织工作巩固阵地。

没有宣传鼓动也就没有组织工作，没有组织工作也就不能把宣传鼓动工作变为物质的力量。

宣传鼓动工作本身也带有组织工作，组织工作本身也带有宣传鼓动工作。

因此，开确的了解宣传鼓动工作与组织工作的相互关系与有机联系，是使我们党的整个工作相互配合的必要条件。

十一 宣传鼓动工作 干部的培养

党的宣传鼓动工作的发展，首先决定于宣传鼓动工作干部的培养。培养掌握马列主义而又富于实际工作经验的宣传干部，这是党的一个严重的和长期的任务。党应当经常的注意到从知识分子党员和知识分子工人中培养出党的宣传家。

在目前党的宣传鼓动工作达到异常广大范围的情形

之下，在各级党的组织之下，应该有相当数量的宣传员和鼓动员。应该经常对他们进行教育，以提高他们的质量。

除此以外，在高级党校内设立专门培养宣传鼓动工作者、报纸编辑及新闻记者的科系，是非常必要的。

对宣传家与鼓动家的品质和素养应有以下要求。

对一个布尔什维克的宣传家的要求：(1) 忠实于无产阶级事业，通晓马列主义学说，深刻了解党的路线与政策；(2) 有政治的眼光，善于揭破敌人的一切欺骗，有很高的革命警觉性；(3) 有自我学习的精神；(4) 不是教条式的解说马列主义，而是创造性的解说马列主义。

对一个鼓动家的要求：(1) 了解党的路线政策；(2) 有鼓动的能力，不管是用激昂、比喻、幽默来鼓动都可以；(3) 熟悉群众的语言；(4) 与群众有密切的联系，了解群众的生活和心理。

我们党应该向着培养大批的有上述品质的宣传家和鼓动家的道路上走去。

十二 宣传鼓动工作的统一 领导和组织系统

宣传鼓动工作的发展，有赖于宣传鼓动组织机构的健全。在各级党的组织内建立强有力的宣传鼓动部门，集中宣传鼓动的人材，统一宣传鼓动工作的领导，这是非常必要的。现在还有不少的党部忽视这个部门的工作，对

此应该加以纠正。

各级党的组织都应设立宣传部(科或股),统一同级党的一切宣传鼓动工作。凡关于国民教育、党内教育、文化工作、群众鼓动、对敌伪宣传、出版发行、通讯广播等工作均应受宣传部的直接领导。各级党部应依各地不同情况,在宣传部内设立必需的不同的部门。

全党的宣传鼓动工作必须统一在中央总的宣传政策领导之下。如果各自为政的不履行中央统一的宣传政策,这是非常危险的。只有在中央统一的宣传政策领导之下,才能在现代的宣传战中战胜我们的敌人。

缺乏实际工作经验要补课^{*}

(一九四一年九月)

一

毛主席的报告^[331]，对党的路线的彻底转变有极大的意义。过去我们对苏维埃后期的错误没有清算，这是欠的老帐，现在必须偿还。犹如现在做了领导工作而过去没有做过下层工作的，也要补课。

反对主观主义，要作彻底的清算，不要掩盖，不要怕揭发自己的错误，不要怕自己的痼疾头给人家看。

过去国际^[34]把我们一批没有做过实际工作的干部提到中央机关来，是一个很大的损失。过去没有做实际工作，缺乏实际经验，现在要补课。过去的老帐，必须要还。

二

这次会议精神极好，对自己极有帮助。必须把自己个

* 这是在一九四一年九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两次发言记要的节录。第一节是十日的发言，第二节是二十九日的发言。标题是本书编者拟的。

人问题弄清楚,才更好讨论。

我个人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极严重,理论与实际脱离,过去没有深刻了解到。自己虽是对这个问题说得、写得都很多,但了解并不清楚。原因是行动方面夸夸其谈,粗枝大叶漫画式、一般的了解问题,而不是很具体清楚了解后再提出问题,所以得出的结论是主观的。真正自己动手做得不够,因而不能深刻了解和处理问题,在实际工作上纠正理论与实际脱离的错误也不可能。

对中央苏区工作,同意毛主席的估计,当时路线是错误的。政治方面是“左”倾机会主义,策略是盲动的。军事方面是冒险主义(打大的中心城市、单纯防御等)。组织上是宗派主义,不相信老干部,否定过去一切经验,推翻旧的领导,以意气相投者结合,这必然会发展到乱打击干部。思想上是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不研究历史与具体现实情况。从“九一八”、大水灾、冲破三次“围剿”、四中全会等决议^[332]开始,便已发生了“左”的错误,这些错误在五次反“围剿”中发展到最高峰,使党受到很严重的损失。我是主要的负责者之一,应当承认错误。特别在宣传错误政策上我应负更多的责任。我们的错误路线不破产,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便不能显示出来。但应该说没有当时来中国的外国人^[333]的支持,我们的错误不会这样有力的发展。

我过去处境顺利,自视太高,钉子碰得太少,经过毛主席的教育与帮助,使我得益极大。今后当努力克服自己

的弱点。不能希望一下子做得很好,但是要向这个方向坚定去做。

出发归来记^{*}

(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七日)

出发经过

我同几个同志于去年(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六日从延安出发。从二月十八日起至四月十二日止,为在神府^[334]县直属乡贺家川调查时期,整理出的材料有《贺家川八个自然村的调查》^[335]。从四月二十二日起至九月十日止,为在晋西北兴县高家林区调查时期,整理出的材料有《碧村调查》(此外还有十三个自然村的调查材料,是别的同志写的)及《兴县十四个自然村的土地问题研究》^[336](大纲式的)。从九月二十六日起至十一月二十一日止,为在警备区^[337]米脂县杨家沟村的调查时期,整理出的材料有《杨家沟地主调查》^[338](此外还有刘家峁、高庙山二村地主的调查,是别的同志写的)。从十一月二十三日起至十二月二日止,为在米脂城内调查时期,搜集了一些材料,没有整理出。从十二月十日起至一九四三年一

* 这是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六日摘要刊载于《光明日报》。本书按手稿收录,略有删节。

月十五日止,为在西川^[339]、双湖峪^[340]市镇乡调查时期,搜集有双湖峪市镇乡各花户^[341]经济状况及公粮材料,未整理好。附带调查有张家寨子户地^[342]材料、马蹄沟盐滩^[343]材料、徐家沟炭窑材料及西川各区地主材料,均未整理)。从一月十八日起至二月二十四日止,为在绥德市调查商业的时期,搜集的材料,尚未整理。一九四三年三月三日,回延安。

今将一年来调查工作过程中一些经验教训择要写在下面,作为本人向中央一年余工作的报告。

打破教条的囚笼

这次出发使我深切地感觉到,我知道中国的事情实在太少了。到处看到的東西,在我都是新鲜的、生疏的、不熟悉的。必须经过一番请教之后,我才能认识它们,同它们交起朋友来。但这些东西,又是如此的生动活跃,变化多端,如果我不同它们保持经常的接触,紧跟着它们,它们又会很快的前进,把我远远的抛弃在它们的后面。同时一切事实又如此明显的告诉我,如果我们不去认识它们,熟悉它们,了解它们的动向,我们决然不能决定我们的任务与政策,即使马马虎虎的决定了,任务仍然无法完成,政策也无从实现。

冲破了教条的囚笼,到广阔的、生动的、充满了光与热的、自由的天地中去翱翔——这就是我出发归来后所

抱着的愉快心情。

不再空谈“理论与实际的联系”，首先要自己联系起来试试看；不再空谈“以马列主义的立场与方法来研究中国的实际”，首先要自己做一点这类“研究”的小榜样试试看。我想，这也许比一切关于这类辞句的空谈的作用，要大的多！

我想，我这次所走的途径，或许是改造象我这类知识分子出身的老党员所应该遵循的途径吧。这就是说，首先应该彻底击破阻止他们走向实际的思想壁垒，如关于“知识分子”与“理论家”之类的错误思想，然后使他们在行动上真正同实际、同群众接触起来，使他们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切身经验上体验到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方向的正确，决心来一个彻底的自我改造。延安一年来的整风运动，已经做了第一步的工作，现在必须以第二步的工作来充实第一步，没有第二步，第一步的了解是不会深刻的。

从实际出发

在过去，我从未怀疑过我是一个唯物论者（我主要是指历史唯物论）。因为我觉得，既然我已经承认了马列主义关于唯物论的一切原则，我当然是唯物论者无疑了。然而一年来的经过，使我对于我过去是否一个真正的唯物论者这一点，发生怀疑了。因为粗枝大叶、夸夸其谈、自以

为是的作风,决不能认为是一个真正唯物论者的作风。相反的,这正是主观主义唯心论者的特点。所以我的自我改造,还得从做一个真正唯物论者开始。

要做一个真正的唯物论者,首先必须承认,我们的一切工作必须从客观的实际出发,而不能从主观的愿望出发。这当然似乎是谁都知道的普遍真理,然而真能在一切实际行动上这样做的,却并不多。客观的实际虽是天天在我们的面前出现,要求我们尊重它的存在,承认它的统治地位,然而我们却偏偏来个“熟视无睹”,不肯去理会它,甚至根本不承认它。但是客观的实际,并不因为我们的“熟视无睹”,我们的不理睬或不承认而消极退休。相反的,我们愈是不理会它,愈是不承认它,它愈是积极的同我们捣乱,使我们到处碰钉子,到头来只弄得我们头破血流,家破人亡。我们在很久的时期内,简直象一个天真烂漫的小孩子一样,受了这许多痛苦,还不知道这钉子从何而来。只在经过许多牺牲与损失之后,经过毛泽东同志许多次的指出以后,我们才开始觉悟到,这钉子是客观的实际的钉子,如果我们再不理睬它,再不承认它,我们就有亡国灭种的危险。于是去年来毛泽东同志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号召,才得到全党有力的响应。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的最普遍的真理,我们中国党仍然是支付了极大的代价,才把它接受过来的。可见,我们主要的不是从书本上接受马列主义,而是从实际经验中,从错误中把它接受过来的。

既然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一切工作必须从客观的实际出发,那我们就必须好好的尊重它的存在,承认它的地位,向它毕恭毕敬,老老实实,而决不能目空一切,自高自大,调皮捣蛋。真正做一个唯物论者,对客观的实际只能有这样的态度,不能有别的态度。

同时,要做一个真正的唯物论者,还必须承认,只有正确的认识了这个客观的实际之后,我们才能提出改造这个实际的正确意见。这个简单的普遍真理,要求我们对于客观的实际必须有详细的调查研究,而决不能粗枝大叶,自以为是,夸夸其谈。

任何伟大的天才,对于任何事物,即使是非常细小的事物,在经过一番调查研究以前,是决不能发表任何正确的意见的。那末象我们这类普通的人才,怎能在经过一番调查研究以前大发议论呢?关于一件事物的许许多多的议论,无数篇的文章,无数次的讲演,在对于这件事物做过真正调查研究以前,除了浪费精力、财力外,究竟还有什么价值?许多问题的争论不决,闹不清楚,许多事情的办不通,办不好,归根到底,还不是由于我们对于这个问题没有做过一番切实的调查研究,因而找不到共同承认的真理而造成的吗?!

所以真正的唯物论者,不论在发表意见时,不论在决定问题时,必须采取经过调查研究的,实事求是的,知之谓知之、不知谓不知的,小心谨慎的老实态度。真正的唯物论者,决不能有其他的态度。主观主义者不是从客观实

际的调查研究中得出结论,而是从个人的脑筋中任意抽出感想,所以粗枝大叶,自以为是,夸夸其谈,就必然成了他们的特性。客观的实际如果对于他们有什么关系的话,那只是在于他们可以从中找出许许多多“事实”来证明他们的意见的正确罢了。党内有许许多多的报告,就是先做了“结论”或“总结”,然后列举“事实”做证明的。这类意见的必然破产,是毫不足怪的。

所以一个真正唯物论者的起码态度,就是一切工作必须从客观的实际出发,必须从认识这个客观的实际出发。一个共产党员是否真正的唯物论者,不仅在他口头上是否承认或宣传唯物论的普遍原则,而主要的要看他在实际行动上是否真能这样做。整顿三风,对于一个共产党员是否有了实际的效果,也可以拿这个标准加以测量。他可以满口的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党八股,然而如果他不能从实际出发来办理一切事情,那他的三风仍然不能称为“正风”的。

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曾经使我们犯了无数的错误,使我们受到过极大的损失,如果我从这里能够得到什么教训的话,那就只有无情的同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做坚决的斗争,把自己的一切工作,放在坚固的唯物论的基础之上。

调查研究是从实际 出发的中心一环

要从实际出发,要认识实际,其基本一环,就是对于这个实际的调查研究。没有这一基本工作,一切关于从实际出发、要认识实际一类的话,仍然只是毫无意义的空谈。

调查研究工作,不论对于领导者或被领导者,都是绝对必要的。象前面说过的,一个领导者,如果他对于当前的具体情况没有精密的调查研究,他就无法提出正确的任务。这正象一个军队的指挥官,如果他对于当前的各种情况没有精密的调查研究,他就无法决定作战的命令。这已经是很明白的了。但一个领导者,在正确的提出任务之后,是否可以不再需要调查研究,让事情自己发展下去,所谓自流的发展下去呢?当然是不可以的。然而我们常常在任务提出之后,就以为万事大吉,不再过问,只是到了一定时期之后,才照例召开一个检查会议,或总结会议,照例的检查一下,总结一下工作。但是,正因为 we 平时对于运动发展的实际情况缺乏详细的调查研究,所以我们在检查会议、总结会议上,也就提不出新问题,新办法,以推动运动的继续前进。至于在会议前后,给下级以经常的具体帮助者,那就更少看见了。因此,许多工作的检查总结,常常是照例的、形

式的、死板的、没有内容的、空谈的，因而也很少结果的。这正好象一个军队的指挥官，只发出了作战的命令，而没有根据于各种变动着的情况来进行不断的作战指挥。这种正确的作战指挥，对于一个战役的胜利，是一个重要的、有时是决定一切的因素。

所以一个领导者，不但在决定任务之前须要做一番精密的调查研究工作，即在正确的任务提出以后，也仍然需要不断的调查研究。一个好的领导者，不但须要对于一件事情有正确的原则的领导，而且还须要作战指挥一样的行动的领导。只有把原则领导与行动领导结合起来，我们才能把这种领导称为具体领导。这种具体领导，不以精密的调查研究工作做基础，是决不可能的。这种作战一样的行动的领导，在我们党内有特别强调的必要！

在被领导者方面，在接受了上级规定的任务之后，在执行任务时，是否可以对于当时当地的情况不进行调查研究呢？当然也是不可以的。因为他不能在接受任务之后盲目乱干一气，而必须考虑一番：如何执行任务，才能不脱离群众，不违反政策。一个被领导者，不但对于上级所给与的任务应有清楚的认识，有完成任务的决心与勇气，而且还须要有不脱离群众、不违反政策的完成任务的具体办法，而这，没有对于当前情况的调查研究，也是不可能的。这正好象一个战斗的部队，在以自我牺牲的精神坚决执行上级命令时，仍须不断侦察战斗情况，以便适时的改变自己的战斗形式与组织形式，以争取胜利一样。

事实证明,一个任务可以用两种不同的相反的方法来完成。一种方法是不问实际情况的,死板的,强迫命令的,脱离群众的,违反政策的。一种方法是根据实际情况的,灵活的,发动群众积极性的,执行政策的。说用前一种方法不能完成任务,是不合实际的。但是只问任务完成与否、不问任务如何完成的观点,是不足为训的。我们要完成任务,但只有拿后一个方法来完成任务,才是我们所拥护、所赞成的。不了解当前情况的人,是不能用这种方法来完成任务的。

所以不论是领导者或被领导者,都必须把调查研究工作作为自己的一切工作的基础。

中国社会的复杂性,其发展的不平衡性,在全世界是少有的。即以陕甘宁边区来说,有警备区与老边区之分,有土地革命地区与非土地革命地区之分,有中心地区与边界地区之分。所以,上级的决定,必须很好的估计到这些不同地区的特点,使决定带有原则性。下级执行上级决定时,必须估计到本地区的特点,使决定带有具体性。只有这样,才能使上级的原则决定,在各种不同的地区内能够具体执行,而使领导者与被领导者能够步调一致,和谐的合拍的前进。这没有双方深入的调查研究工作做基础,是不可能的。

所以,调查研究工作,不是什么一个时期的突击工作,也不是只在工作的某一阶段才需要的工作,也不只是对于某一种人才需要的工作,这是一切工作的基本,是贯

穿在全部工作过程中的基本工作,是全部工作中最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一切工作者都需要做的工作。调查研究工作做的是否充分,是决定一项工作成败的主要关键。一个共产党员只有在实际行动上能够把这个工作当做自己一切工作的基础,他才算是一个真正的唯物论者,他的整顿三风才算有了实际的成效。

在实际中和在群众中审查工作

马列主义者均得承认“实践是真理的标准”这一普遍的真理。这就是说,我们的一切意见、决议、办法的是否正确,必须要在实践中找到证明。实践中证明做不通的,或找不到证明的东西,不论说的如何动听,或如何“伟大”,我们必须认为是无用的、有害的东西,决然加以抛弃。反之,在实践中证明做得通的,不论说的如何平淡无奇,如何“不足道”,我们必须认为是可靠的真理,加以抬举与尊敬。这就是说,我们必须在实际中、在群众中,审查我们的工作有无成绩,有何优缺点。

我感觉到,我们的工作审查,常常偏于在上层,在办公室里,在工作报告上,在会议上,因此常常是片面的,空洞无内容的,吃力不讨好的。正象上级决议向下传达时常常不断的打折扣,到最下层只剩下一个赤裸裸的数目字一样,下级把实际情况逐级向上报告时,也是不断的打折扣,到最上级时,常常只剩下几条硬化了的

结论了，而这些结论，或者毫无内容可言，或者有点内容而毫不可靠。因为下级同志向上级做报告时，往往只选择他认为是特别要紧的东西，往往是从他的了解做出的结论，而真正重要的东西，真正宝贵的经验教训，却往往被抛弃了。我有过无数的经验：常常我们认为十分重要的材料，下级同志却认为不重要；我们认为不重要的，他们却长篇大论的叙说。我参加过很多的会议，听过很多这样的报告，报告人可以说到他们如何开会，如何传达，如何布置，到会人数，发言人数，以及“经验教训”等许许多多的话，然而实际材料却是很少，实际问题究竟在哪里却是无法知道。这类报告再经过许多次的传达、讨论、总结，就变成什么也没有的空话了。但人力、精力、物力的浪费，却是不可计算的。

偏重于这样的审查工作，甚至把这样的审查当做审查工作的唯一方式，实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领导之所由来。这种领导因此常常不能不是主观主义的、官僚主义的、形式主义的，其表现形式，也不能不是党八股的、老一套的。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实际中，在群众中，即在决议执行的地方，按决议实际执行的结果来审查，那情形就会大大的不同。在机关审查中纠缠不清的、颠三倒四的问题，一到这里会豁然开朗起来。在机关审查中死气沉沉的、闷人的空气，一到这里会生动活跃起来。因为决议的真正变为实际行动是在这里，而不在机关里。决议的真正执行者

是广大的群众,而不是少数机关工作人员。决议的真正实行是在紧张的斗争环境中,而不是在和平的讨论中。正象斯大林所说的,工作人员的优缺点,执行机关的优缺点,决议本身的优缺点,在这种审查中,就会清楚的看出来^[344]。

所以每一个做领导工作的同志,经常地保持同实际、同群众的联系,抓住一个典型的村或乡或一个市镇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同最下层的干部与群众举行会谈,实是绝对必要的。从这里他可以得到最直接、最可靠的材料。这是一个又简便、又生动、又实际的办法。只要每个领导者懂得使用这个方法,我们就可以转变我们上层审查工作中的一切缺点,而使上层审查也变为有内容的、生动的、有实际效果的。上层审查不是不需要,但必须以下层审查做基础,才有意义。所以在党内,虽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审查均有必要,但自下而上的审查,我以为在今天必须强调。

过去毛泽东同志常常告诉我,做事情要亲自动手,出一身汗才做得好。我过去对于亲自动手,只是了解为亲自看文件,亲自同高级干部谈话,亲自参加工作讨论会,没有了解应当亲自接触实际、接触群众、接触最下级的干部。而正是后者,是亲自动手的主要意义。

过去毛泽东同志常常告诉我,他有时对于一件事情,感觉到毫无主意,感觉到沉闷,但一同实际接触,一同群众与下层干部接触之后,主意就出来了,人也感觉得松动

了。他的这句话 ,我到今天才算多少有了一点了解。不在实际中、群众中审查工作 ,是很难有什么可靠的主意出来的。

过去我以为要同实际、同群众接触 ,一定要出发得很远 ,其实未必如此。我们是生活在实际中 ,在群众中 ,只要有决心去同他们接触 ,我们是到处找到他们的。不愿同实际、同群众接近 ,熟视无睹 ,才是我们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基本原因。

把我们的工作同群众、同实际结合起来 ,应该是我们全党的战斗任务。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调查研究

马列主义教导我们 :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所结合成的社会生产 ,是一切政治的、法律的、文化的、艺术的、宗教的物质基础。所以 ;“从实际出发” ,首先应该是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所结合成的社会生产状况出发。所以调查研究的首要对象 ,也应该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但这方面的调查研究 ,正是在我们平常工作中最被忽视的。我们可以天天高谈“改善群众的生活” ,“坚决执行阶级路线” ,然而对于自己所在地群众的生活 ,群众中的阶级关系 ,却可以毫不调查。我们可以登记某一个士绅的政治态度、政治意见 ,称他为中间派或进步分子 ,然而对于此人的经济地位、阶级地位 ,却可以毫不调查。讲“一打一拉” ,而不知打

谁,拉谁;讲减租减息,而不知租佃关系、借贷关系是什么;讲发展生产、春耕秋收,而不知如何生产,如何收获。这种态度,显然是非马列主义的。我们在工作中闹的许多乱子、许多笑话,也就出在这里。显然的,没有这种社会生产状况的调查研究,任何阶级路线与阶级政策的执行,是不可能的。

也许有人以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调查研究,是很神秘、很困难的。其实,这种调查,既不神秘,也不怎样困难,只要我们肯动眼、动口、动耳、动手、动脚,我们就会在这方面得到成绩。因为,我们现在是生活在群众中间,老百姓们如何生产,他们在生产间的关系如何,是我们到处可以看到、天天可以看到的最平常、最普遍、最大量,而且千万次反复着的東西。

但是正因为这些东西太平凡了,太普遍了,太常见了,所以我们常常容易把它们忽略过去。特别是我们这类知识分子,常常喜欢“昂首向天”,在天上的星星中间寻找世外的、奇异的“理想”,而对于这些事情,则简直看不起,认为太卑鄙、太功利、太平淡无奇,以致采取漠不关心、熟视无睹的态度。我们不了解这些最平凡、最普遍、最常见的事情,是牵连到千千万万人民生活的事情,一切伟大的理想,如果同这类事情脱离了关系,那是一个铜钱也不值的。马克思、恩格斯对于人类最伟大的贡献,完全不是在于他们发现了什么天上人间少有的、奇怪的东西,而正是在于他们发现了这类最平凡、最普

遍、最常见的东西。他们发现了：人们要生活，必须吃饭穿衣，而要吃饭穿衣必须使用一定的工具来生产，这种生产使人们之间发生了一定的关系，这种关系叫生产关系，是社会的经济基础。试问这种理论不是最平凡、最普通的吗？然而其伟大也正正在此，因为他所要解决的正是千千万万人民的生活问题。

说来也很奇怪，我们常常可以在脑筋中装进很多海外奇谈，以及小广播上听来的新闻，但在解决实际问题时却很容易把群众中的这些最普遍、最平常，但又是最重要的东西忘记掉。这在脱离生产太久的、脱离群众太久的知识分子，特别如此。但不论解决任何问题，如果我们一忘记或只是不很重视这些问题，那乱子就会出来的。

农民出身的干部，一般都是熟知农村中的生产情况及阶级关系的，但他们常常以为这些材料是上级不需要的，或者以为这些材料同他所要完成的任务是没有关系的，因而也常常不很重视这些问题。这无疑的，是主观主义领导的恶果。

各级领导机关与领导者，必须首先熟知当地民众的生活情形，熟知生产上的一切问题，熟知各阶级间的关系，了解各阶级间的矛盾究竟在哪里，明确知道自己是站在什么阶级的立场之上，斗争应该向着什么阶级进行。不明瞭这些情形，掌握政策是说不上的。

如果我们在农村中工作的同志，都能调查清楚土地的种类，各种土地的质量，一垧地有好大，每垧地需要好

多布袋粪,好多种籽,需要几多人工、牛工来耕种、锄草、收割,何时耕、何时种、何时锄草、何时收割,每垧地能打多少粮食等等,以及谁是地主,谁是富农、中农、贫农、雇农,谁是二流子,调查清楚他们相互间的各种关系,如租佃关系、借贷关系、劳动互助关系等等,以及他们间的各种斗争形式等等问题,那我们的事情就好办得多了。

必须特别指出,几年来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我们常常把马列主义最基本的原则,即阶级斗争的原则,置之脑后了。很多同志,甚至高级干部,不知道如何划分阶级,不知道阶级斗争采取些什么具体形式,不知道以阶级斗争观点来分析形势,不知道党派斗争中阶级斗争的实质。这是好大的危险呵!

着重典型

调查研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关于典型的问题。我们的时间与精力都是有限的,我们不能把所有的事物都一件件调查研究清楚,而且事实上也无此必要。我们的办法,就是在同一类事物中选择典型来调查研究。比如我们调查边区的农村,我们不必调查边区的每一个农村,我们只要调查一些典型的农村就可以了,如经过土地革命地区的农村与未经土地革命地区的农村,川地的农村与山地的农村,中心地区的农村与边境地区的农村,同姓的“父子村”与异姓的杂居村。如果能够真正把几类典型的

村子调查清楚了,那对于边区的农村也就能得到具体的了解,这正象我们对于人体生理只要解剖几个人的身体就可了解,不必把所有的人都加以解剖一样。解剖所有的人不但不必要,而且也是不可能的。就如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也不能把所有国家的资本主义都加以研究,而不能不以英国的资本主义为典型来研究。

我们过去的调查,常常是走马看花式的一般的调查,调查的事物虽然很多,但常常是表面的、空洞没有内容的、不深刻的。这种调查,可以列举某类事物的许多现象,但并不深入其内部,发现其内部的运动规律。从这种一般的调查而得出的一般的结论,照例是不能正确的提出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而且这种一般的结论,结果不能不变为老一套的党八股,只能为夸夸其谈者供给资料。

典型的调查研究则不然。它对于一事物虽是花费的时间比走马看花式的要超过许多倍,然而它看得深入,看得透彻。它能够发现该事物内部的运动规律。而从这种典型研究中所得出的规律性,对于同类事物却带有极大的普遍性,可以成为了解同类事物的指导原则。这在我们一年来的调查工作中,已经完全的得到证明了。

所以,马列主义告诉我们,真理必须从具体事物的具体研究出发而得出。普遍的东西,决不会在单独的东西之外,脱离单独的东西而存在;普遍的东西,实际只是单独的具体事物的质、属性、本质而已。这就是说,真理是个别与普遍的统一。

列宁说：“真理总是具体的”^[345]。对于这句话，我过去的了解是抽象的，概念的，因此实际上是不了解的。因为如果真正的了解了这句话，那我们追求真理的工作，就得从具体事物的调查研究出发，而决不会粗枝大叶，漫画式的了解问题了。

当然，这并不是说，从某一事物典型研究得出的结论，可以概括同类事物的一切特性，因此可以把这一结论硬套在一切其他同类事物的头上。这只是说，从典型研究中得出的结论可以成为一个有力的思想武器，成为研究其他同类事物的原则指导。其他同类个别事物的具体解决，仍须对该事物做具体的研究。比如马克思《资本论》的原理，可以成为研究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原则指导，但决不能以他的公式硬套在中国资本主义的头上。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特点，是必须加以单独研究的。

再举一个眼前明显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比如关于陕甘宁边区农村阶级关系的动向问题，西北中央局应该根据几个典型农村的调查研究，得出全边区农村阶级关系的一般动向的结论。这个结论拿到警备区地委，是否可以机械的运用到警备区的一切农村呢？不能够的。它只能以西北中央局的结论为原则指导来研究警备区几个农村的典型，指出警备区农村阶级关系发展的特点。这样一直到乡的支部。上级的结论只能成为下级的原则指导，下级的具体情况仍须加以单独的具体的研究。这样，才能称为领导的原则性与具体性的统一。这就是从个别到一般，

再从一般到个别的一个完整的认识运动的过程。

在研究典型中应该注意的一点,即关于典型的选择问题。最好的典型,应该是最能做同类事物的代表的具体事物。典型选择得愈好,则其得出的结论就愈带有普遍性,当然例外仍然是有的。但要选择这类的典型,如果对于这类事物没有一般的了解也是不可能的。故对于一类事物的一般的了解仍然是需要的。但这种了解也要有先前深入的典型的研究做它的基础。

分析与综合

在选择好调查研究对象之后,调查研究工作的主要方法是分析与综合。从感性方面得来的关于调查对象的统一的、笼统的印象,必须首先加以分析,加以解剖。如调查一个农村的阶级关系,我们必须首先把它分解成为它的各个组成部分,分解成为各个家庭。我们的调查就先从各个家庭开始。但一个家庭还只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如果我们要进一步研究,我们必须继续加以分析,如一个家庭的人口、劳动力、土地、牲畜、农具,等等,然后加以个别的调查。关于“家庭人口”一项我们仍然可以加以分析,如儿童、壮年、老年,儿童、壮年、老年又可分为男的、女的。关于劳动力一项,我们可以分析为男劳动力、女劳动力,全劳动力、半劳动力。关于土地一项,我们如依土质来分析,可以分为山地、川地、水地,其中又可分为上中下三类;如

依占有性质来分析,可以分为自种地、租入地或租出地、伙入地或伙出地^[346]等等。经过这样的分析方法,我们可以把这个农村的各个组成部分分别加以认识。这是我们的思想从全体的认识到部分的认识的过程,这就是分析的过程。这种分析,是了解整个事物所必须经过的步骤。没有这种分析,我们对于一个事物的了解,只能是笼统的,一般的,没有内容的。这种分析方法,我们过去在工作中实在用的太少了。

但如果只有分析而没有综合,那我们得到的关于一个事物的各个组成部分的了解,就会变成孤立的、静止的、死板的。它们不是整个事物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变成脱离整体的独立的东西了。这使我们对于这个事物的整体,同样得不到了解,或者得到完全错误的了解。所以我们的分析方法必须要以综合方法来补充,使我们时时记到我们分析出来的部分,是一个整体的部分,是不能脱离整体的部分。分析只是思想上的一种抽象,为研究便利暂时把部分从整体中分解出来的。这些部分必须还原到它们原来在整体中的位置,这就是综合。所以综合是从部分到全体,从抽象回到具体的思想的运动过程。我们仍以上述一个农村的调查为例。在将一个农村分解成为许多家庭,并将各个家庭加以调查之后,我们就应把这些家庭综合起来,这样就可使我们知道这个村子的户口总数,使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大村子,还是一个小村子。在将一个家庭分解为人口、劳动力、土地牲畜、农具等等各个组成部

分,并将这许多部分加以调查之后,我们就应把一个家庭的这许多组成部分综合起来研究,使我们了解这是一个什么阶级成份的家庭,是地主的还是农民的家庭等等。再把不同的家庭成份综合起来,我们就可以了解这个村子所有户口的阶级成份了,如地主好多,富农好多,中、贫农好多等等。这样,我们不但可以了解全村的总户数,而且可以了解其阶级关系了。

但如果我们要进一步了解这个村子的各阶级间的具体关系,我们还得把这个分析与综合的过程继续下去。比如关于全村不同阶级成份各家庭之人口、劳动力、土地、牲畜、农具的各方面,还应加以分析与综合的研究。以土地一项为例,应该把各阶级的土地占有、土地的租出租入、伙出伙入等加以分析与综合,使我们了解全村各阶级土地占有、土地租出入及伙出入的各种关系。经过对土地、牲畜、农具等各方面分别进行这样的分析与综合,我们就可以把全村各阶级间的生产关系及其矛盾的各方面的具体表现,层层研究清楚。如果再把这些方面综合起来,那这个村子的阶级关系,就可以弄得很清楚了。经过这样分析与综合的研究过程之后,对于这个村子的了解,已经不是象开始那样对于这个村子的一般的、笼统的印象,而是充满了具体内容的具体概念了。这种概念,如果在分析与综合中不犯什么错误的话,那就会是这个村子在我们思想上的正确反映。

所以,在调查研究一个事物时,首先把这个事物分解

为各个方面、各个部分,把这些方面、这些部分加以分析与综合,得出各个方面、各个部分的规定性,然后加以全面的综合——这就是认识这个事物的整个思想运动的过程,这就是从模糊的、笼统的具体印象到抽象,再从抽象到明确的、充满丰富内容的具体概念之认识过程。所以,分析与综合的方法,在调查研究中是不能分割的,它们是对立的,但又是统一的,它们是一个对立的统一。综合而没有分析做基础,综合是空洞的,表面的;分析而无综合统一起来,分析是死板的,虚假的。在这方面,我们应该特别强调,综合必须建立在分析之上。主观主义者的综合,并无分析做基础,他们只是从许多一般的感想中,再综合出一般的感想,这种感想当然是不能反映实际的。

分析与综合的方法,不论在研究事物的现状或历史发展时,都是必须使用的。

调查方法点滴

除以上所说的一些问题外,关于调查方法,可以提出谈谈的,有以下数点。

一、在开始调查以前,应弄清楚调查的目的,即要调查的是什么事情,根据调查材料所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

二、选定调查对象后,对调查对象所处环境应有必要的了解,不要把调查的东西从它的具体环境中孤立出来看。

三、善于同群众接近,生活群众化,诚心诚意抱定当群众小學生的态度,一切不懂的事情都应好好的向他们请教。态度应不太庄严,使群众害怕;也不要油腔滑调,使群众看不起。待人和气、亲热、自然,是最主要的。

四、同当地党、政、军、民机关取得联系,得到他们的帮助,但应该完全独立自主的做工作,不要依赖他们。只有亲自动手得来的材料,才是比较可靠的。别人的材料,只能当做参考。

五、从当地群众中的积极分子着手,同他们交朋友,从他们那里开始调查,经过他们的介绍,推广到其他的群众。但也不要以此束缚自己,落在少数积极分子的小圈子内。如能找到别的关系,应抓住不放。

六、调查方式,可以采取开调查会、个别谈话及实地调查三种,适当的把它们结合起来。调查材料,能当时记录者,即应记录,当时记录不便者,事后即应记录,记忆力的可靠性不大。谈话次数可不拘,总以问题谈清楚为主,但谈话时间,力求以不妨碍对方生产、损失对方利益为原则。农忙时的中午休息时间及夜晚时间,及冬天农闲时间,是最便于调查工作的。谈话不要采取象审问或填表格的形式,而以生动的、随便的,但又有一定方向的“拉话”^[347]为最好。

七、尽量搜集书面材料,如各种账簿、契约、分家单、收条、收据、家谱、碑记等。关于过去历史材料,平常人不易记忆清楚,以书面材料较为可靠。

八、发现被调查方面的各种矛盾,如阶级间的、个人间的、大姓与小姓间的、老户与外来户间的矛盾,利用这些矛盾进行调查。如从农民调查地主,从小姓调查大姓,从张三调查李四等等。但不应只以调查矛盾的一方面为满足,矛盾双方均应调查,免受一方的蒙蔽。

九、在调查中如果发现同多数群众有切身利益关系的问题,能经过当地党、政、军、民机关解决的,应帮助解决,以取得群众对调查者的信任与拥护。这对调查工作有很大的便利。

十、调查来的材料,应经常加以整理。这样可以使已有的材料更加熟悉,不足的补充,缺乏的增加,发现中间有矛盾的,不确实的,给以校正。决不要相信,初次调查来的材料就是可靠的;应该相信,初次调查来的材料常常有很多不可靠的。可靠的材料,是要经过几次三番的调查才能得来。

十一、调查工作初步完成后,最好能在当地即加以研究,在研究中发现问题还不清楚的,再行搜集材料。研究工作应该紧跟在调查工作之后,而且最好就在调查的地方进行。两者相隔太久,会使研究工作流产,因而也不能完成调查的任务。

十二、调查工作,不要太匆忙,以从容不迫为有利。熟悉一个地方的情形,不但需要问话,而且需要生活,需要有一定时间的考察与体验。

*

*

*

据我个人经验,看人家写的、听人家说的关于调查经验之类的文章或讲演,印象很少,大概在看过听过之后就会忘记的。但自己亲自调查研究一番之后,自己就会有点“经验”,不大容易忘记。在自己有了一点经验之后,再来参考他人的经验,得益就多些。以上十二条,在有经验的同志看来,是简单不足道的,故解释更成为不必要的了。

坚持下去

接触实际、联系群众的调查研究工作,我总算从去年开始了。但应该特别强调说明的是,这只是在开始。因为是开始,所以事情还需要长时期的坚持下去;因为是开始,所以调查研究出来的材料,其质量是不会很好的。

接触实际,联系群众,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终身事业,所以决不要梦想,以为一年半载的工作,就可使自己有了实际,联系了群众。任何共产党员,即使他过去既接触实际,又联系群众,只要他一旦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他就会硬化起来,走进老布尔什维克的博物馆,做历史的陈列品。那末,象我这一类共产党员,怎么能不更加真心诚意向着接触实际、联系群众的方向长期努力下去呢?!

显然,这个方向没有什么最后的止境,没有可以停止下来、不需要再行前进的地方。这只是一个方向,而且永远是一个方向。它没有尽头。但虽然如此,只要我们向着

这个方向努力去做 ,就会有好的结果。我努力一分 ,就会有一分的结果 ;我努力二分 ,就会有二分的结果。这个无穷的方向 ,也就这样在我的长期努力所获得的有限的结果中 ,能够被一步一步的体现出来吧。

这次出发 ,从调查研究中得来的一些材料 ,一些具体知识 ,当然就是我一年来工作的结果。但最重要的 ,还不在于这里。最重要的 ,还在于我最后认识到 :我以后有向着接触实际、联系群众的方向不断努力的必要 ,象我在上边所说的。其次 ,还在于我实际开始使用了马列主义的方法 ,来研究了一下中国的实际。不容讳言 ,因为我是开始学着射箭 ,所以我觉得我的箭术很是生疏。但每射一次 ,比着上次总觉得要熟练些。求得射箭术的进步 ,除实际练习外 ,是没有其他方法的。一次二次是射不好的 ,必须几百次、几千次的射下去 ,才能射得更加熟练些 ,射得更加正确些。

所以 ,我并不惭愧 ,因为我原是一个初学射箭的人。我也并不着慌 ,因为我还准备长期的从容不迫的射下去。人患无“自知之明” ,一旦自知了 ,他就会把自己放在一个适当的地位 ,尽他的力量 ,来好好的工作下去吧。

关于公营工厂的几个问题^{*}

(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日)

公营工厂的任务

公营工厂的任务有三,即供给公家的任务,发展边区经济的任务,培养管理工厂干部的任务。

我们工厂的生产,属于完成政府定货的性质,即公家需要什么,我们工厂即生产什么。这要求政府方面郑重其事的决定各工厂的生产计划,并且供给各工厂以各种必要的原料、粮草,不使工厂生产发生困难。而工厂方面,亦应用尽一切方法保证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质量上完成政府定货计划,不使政府供给受到影响。对工厂的产品,政府有收买的责任,不得借故推诿,使工厂再生产发生困难。过去由于供给任务之没有明确规定,反革命分子的破坏,领导上官僚主义、本位主义的存在,故在工厂之供给、生产、推销的三个方面,发生了很多矛

^{*} 这是在陕甘宁边区政府直属工厂会议上讲话的节录。讲话共五节,最初刊载于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西北局的机关报《解放日报》一九四三年五月一日,署名洛甫。收入本书的是第二、三、五节。

盾,使政府与工厂方面均受到了很大的损失。为解决供、产、销的矛盾,应该象这次会议所规定的,把统一供给、统一订货及分散制造的原则确定下来,并采取一切必要的具体办法使之实现。

其次,我们工厂的发展,又促进了纺棉、纺毛等家庭手工业的发展,又促进了植棉业、养羊业的发展。后者的发展,又保证了工厂原料、材料的供给,即又保证了工厂的进一步的发展。这两者的互相影响,促进了边区经济的日益向上。

敌人、汉奸、顽固分子,想尽一切方法在经济上封锁我们边区,尤其在工业原料及工业必需品的输入方面。我们的办法就是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工业,来打破他们的经济封锁。我们依靠我们本地工业的发展,来解决各种日用品的困难,来平抑物价,调剂金融,使我们逐渐减少对于外地的经济的依赖性,以达到半自给与完全自给的地步。

我们公营工厂的这一任务,是我们必须明确认识的。我们办理我们的工厂,不单是从解决公家的临时需要出发,而且是从发展边区经济的长期打算出发。所以发展我们的工厂不是一时的任务,而是长期的任务。

培养善于管理工厂的干部,是公营工厂的第三个任务。比较起来,我们有不少政治干部、军事干部、文化干部,但经济干部,尤其是管理工厂有经验的干部则甚少。而发展工业,没有这类干部是不行的。所以我们在工厂中

工作的干部,应该好好的学习管理工厂的经验,有意识的把自己培养成为善于管理工厂的干部。党与政府也应该好好的帮助他们,使他们能够向这方面发展下去。

当然,我们应该尽量的吸收外来知识分子技术干部参加工厂的生产工作。在这方面,我们是有成绩的。的确,有许多这类干部诚心诚意为我们工作。但也有少数破坏分子,以他们的知识与技术为掩护,来做反革命活动。对于前者,我们应该赞扬;对于后者,我们必须加以严防,必须实行清洗。

建设公营工厂的基本 原则——经济核算

要办好一个工厂,必须很好的计算成本与利润。怎样最能节省的使用原料、材料,怎样最能合理的使用生产工具与保护生产工具,怎样最能发挥工人职员劳动积极性,怎样最能使用一切生产工具上的改进以提高生产力。总之一句话,一个好的工厂厂长,必须很好的计算这一切,使他的工厂产品不但数量多,而且价廉物美。这就是工厂的经济核算制。没有这种经济核算制,工厂是决然办不好的。

过去,我们的工厂还带着浓厚的行政机关内的供给部性质。它们买进原材料,雇用工人,制造生产品以供本部门的需要。工厂的一切费用,则向本部门编制预决算,

实行报销制。本部门只问工厂是否完成生产任务。至于工厂是否办的合理,生产的是否经济,那是不问的。工厂内部的一套大架子,工作人员的配备及其工作作风,大体上同行政机关相差不多。因此,工厂产品成本比私人工厂要高,价格比市场上买来的要贵,所以使用公营工厂的产品,也就不合算,不经济。工厂内部贪污腐化浪费的现象,也就容易产生。

为了办好工厂,必须使工厂企业化,实行工厂的经济核算。政府方面,必须根据一般工厂的具体情况,定出每种产品的标准质量,标准成本与利润率。一个工厂如果计算得好,人力物力使用得合理节省,它的成本就会比别的工厂低,它的利润就会比别的工厂高,它因此比别的工厂更易发展。对于这样的工厂,政府应该特别给以奖励。反之,一个工厂,如果不会计算,人力物力大量浪费,那它的成本就会比别的工厂高,它的利润不但会低,而且甚至会亏本,因此它的工厂就会垮台。对于这样的工厂,政府应该给以处罚。一切这类奖励与处罚,均应在报纸上公布,以鼓励进步的,警告落后的。可惜过去我们还没有这样做,但以后我们必须这样做。

只有实行这样的经济核算制,我们才能在工厂与工厂之间引起生产合理化的竞赛,才能推动各工厂创造出各种各样提高生产力的办法,如淘汰冗员,节省原材料,反对浪费贪污,加强工人教育,严明劳动纪律,改善管理制度,改变平均主义的工资制度等。在这种情形下,工厂

内部的奖惩办法也才能认真执行,全体职工的工作与劳动热忱才会大大提高。

为了贯彻经济核算制,政府方面必须及时的供给工厂原料、材料与粮食,及时的支付工厂货款,不使工厂因原材料的不济及资金周转不灵,而受到生产停顿的损失。为了经济核算制,政府方面必须保证各工厂以一定自动流转的资金,在经济上同它发生平等的买卖关系,尊重它在经济上的相对独立性,使之独立的发展下去。过去把工厂看做行政机关供给部门的观点,是必须打破的。

当然,在有些工厂内,我们已有了一些经济核算的初步基础,如统计与成本会计之类。但这些还是形式的,并没有成为办好工厂的有力武器,相反的,有的甚至脱离工厂厂长的掌握,而成为“超然”的东西(所谓“超然会计”)。

当然,在认真实行经济核算时,还会发生许多困难问题。然而我们必须克服一切困难,坚决为实行经济核算而奋斗。

国营工厂管理的一元化

为了彻底改造我们的工厂,我们必须贯彻工厂管理一元化的方针。工厂是一个统一的生产单位,有一定的生产任务,只有由政府、由厂长集中管理时,才能办好。多头的分散的管理,只能把事情弄坏。

工厂管理一元化,包含政府与工厂关系的一元化。工

厂应该只同政府的一个管理工厂的部门发生关系,不同许多部门发生关系,如象过去那样。政府直接管理工厂的部门,应该集中的具体的领导工厂,帮助工厂解决实际问题;把管理工厂的权力,放在完全可靠的干部手里,反对官僚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倾向。在工厂方面,必须绝对服从政府领导,反对任何闹独立性的倾向。

在工厂内部,厂长代表政府,集中管理工厂内部的一切。凡有关生产上的一切问题,他均有最后决定之权。任何部门闹独立性的倾向,必须纠正。一切工人、职员,均应服从厂长领导,完成生产任务,反对同厂方对立的经济主义、平均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偏向。总之,我们在工厂内必须在厂长集中领导下团结一致的为完成生产任务奋斗。生产就是战斗,战斗必须是集中的统一的行动。工厂内党的支部与工会工作也必须以完成工厂的生产任务为其基本的内容。一切党内的、工会内的教育与活动,只有对提高工人的劳动热忱与劳动纪律有帮助时,才有意义。一切违反于这个方针的教育与活动,都是有害的,应该停止的。显然的,工厂管理的一元化,要求我们工厂内党的工作与工会工作有一个彻底的转变。关于这一点,邓发^[348]同志会给你们详细的报告。

但工厂厂长的集中管理,并不取消工厂内部的民主。相反的,因为我们的工厂是革命政权的工厂,不是资本家的工厂,所以工厂的生产任务,只有依靠全厂工人与职员的积极性才能完成。所以,我们工厂厂长必须善于管理工

厂,反对贪污腐化分子,反对浪费,提倡节约,具体教育工人与职员,关心他们的生活,解决他们的困难,奖励积极分子,处罚消极分子,依靠厂内党的支部与工会的帮助,发挥民主精神,来动员全厂人员为完成本厂的生产任务而奋斗。工厂管理的一元化,决不能同官僚主义、家长制混为一谈。

我们相信,工厂领导的加强,工厂管理的改进,会大大提高工人的劳动积极性与劳动纪律,发展各工厂的赵占魁^[349]运动。也只有在这一基础上,赵占魁运动才能持久下去,才能成为工人的群众性的运动,才能成为提高所有工厂的生产标准的运动。

关于处理满拓地、 开拓地^[350]的意见^{*}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八日)

对满拓地、开拓地,我们初步研究之后有以下意见。

一、被没收土地不应退还原主,而应重新分配给无地与少地的农民,变为他们的私产。^[351]

二、分配土地按应得土地者每户人口之多少为标准,以达到平均分配之目的。^[352]

三、分配方法。上面,可由政府颁布布告,派出工作团^[353]。下面,则组织以少地无地农民为主的分地委员会(即今后之农会)。

我们最近派出了三个工作团下乡,宣传了我们的土地政策。大多数农民均热烈拥护我们的主张,并要求快分。二十二日即拟召集三个村子的农民积极分子及工作团同志开一个座谈会,通过一个我们拟订的没收分配敌人土地大纲^[354]。然后再派工作团下乡,正式组织农会,

* 这是给中共中央北满分局的电报,标题是本书编者加的。当时张闻天同志作为北满分局代表,在宁安县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以此指导牡丹江地区的工作。这一电报发自牡丹江。

并协同他们开始分配土地。关于租子^[355]，我们暂时不强调。待土地分好、基本农民均拥护我们时，再提这问题。此间租子一般说来并不高。

城市清算运动^[356]中 应注意事项^{*}

(一九四六年七月四日)

为发动城市工人与平民,使他们翻身,同时不使工商业因而衰落起见,我们在城市清算运动中应注意如下事项。

一、除罪大恶极的汉奸特务的工厂、矿山、商店应全部没收外,对其他配给店与加工业^[357]清算的项目,主要的应为:

(一)群众已交款项而未配给群众或少配给群众的配给品;

(二)群众虽未交款项,但已经从敌人那里领到的配给品;

(三)“八一五^[358]事变前后从敌人仓库中直接获得之敌产;

(四)占领敌人之仓库、房屋与土地^[359]。

二、配给店与加工业在历年配给营业中额外克扣老

* 这是为中共合江省委起草的文件,以合江省民运工作委员会的名义下达。张闻天同志从一九四六年五月起任中共合江省委书记。

百姓的部分,老百姓现在要求清算也是正当的。但这一部分如完全被清算,则势必使所有过去经营配给店与加工业者破产,使本人畏罪逃跑。这会影响到工商业的衰落,在工商业者中间造成恐惧,使工人失业,使上条所举各项的清算亦发生困难或不可能。这对于人民大众本身也是不利的。因此,在老百姓要求清算额外剥削时,我们应采取如下立场。

(一)赞助老百姓反对额外剥削的斗争,认为这种剥削是不合理的。

(二)要被清算者承认这种行动的错误,向老百姓赔罪。

(三)按照不使被清算者的工商业倒闭的原则,对于这一部分的清算应采取有限数量的罚款形式。如被清算者对于第一条所列各项积极履行,则可少罚款,以示宽大。否则,可多罚些,但仍应使之能过日子,决不能采取消灭政策。

(四)对于纯商业的配给店及加工业的配给店,亦应有所区别。对后者应以不使其生产完全停顿为原则。

应向干部说明,我们对待城市工商业资产阶级与对待封建地主阶级的政策,应有原则的区别。清算地主阶级的目的,是在消灭其封建剥削,而清算配给店与加工业,则只是收回其不应取得的意外之财及限制其过于苛刻的额外剥削。同时应注意防止配给店及加工业者利用这一原则作为拒绝清算的借口。

三、在清算过程中,应尽量采取物资登记及取保的方式,尽量不要妨碍或少妨碍被清算者的营业尤其是生产之照常进行。只有被清算者逃跑时,才采取封闭与看管其企业的方式。

分地办法要有利于 团结大多数农民*

(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四日)

二十三日来信收到。关于分地的方法,是很值得研究的问题。我们过去在宁安采取以人口为标准,在无地与地少的农民中实行平均分配的方法,对特别贫苦者略略照顾,使之得到较好较近的土地,但不特别强调。这里分地的办法,则很强调农民中的各阶层的区别,正式规定最穷的人分最好的地,富人分坏地,即人分几等,地分几等,然后一等人分一等地的原则。对于这个办法的优缺点,我想加以研究。这个方法是否会影响大多数农民内部(主要为佃中农及一部分富裕的佃中农)的团结,是否会使佃富农(自己有地的中农、富农当然没有资格分地,有资格分地的为无地的或地少的佃富农、佃中农)积极反对我们?我们今天在农村中的政策,还是在团结大多数农民(其中包括中农、富裕中农)同汉奸、特务、豪绅、恶霸、买办奸商做坚决的斗争,当然,雇农与贫农在合江^[360]各地农村中大

* 这是给当时在合江桦川下乡工作团工作的陈勉同志的信,标题是本书编者拟的。

体说来是占多数,我们满足了他们的要求,我们就取得了多数。但要争取大多数,我们还必须紧紧抓住中农。特别强调农民中各阶层区别的分配土地的方法,是否有缩小农民阵线的缺点,请你在实际工作中加以研究,并告诉我为盼。

对土地问题的意见^{*}

(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日)

对七月九日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询问^[361] ,我提出以下意见供中央参考。

一、为孤立蒋介石、建立广泛的反蒋统一战线 ,对地主生活给以照顾 ,不树立过多敌人 ,这一思想与政策是正确的。

二、由政府以法令征购地主的剩余土地的办法 ,因那些地方农民已经翻了身、工农在政府中已占了优势地位 ,因此可以施行 ,而且也是行得通的。

三、但这种办法在北满一带新地区还是不适合的。这里首先的问题是在放手发动农民群众 ,以革命的手段把地主阶级的政权打倒 ,建立起以工农为主体的民主政府。而要做到这一点 ,必须在反奸清算^[356] 中使农民直接的无代价的取得敌伪及豪绅恶霸地主的土地、房屋与牲畜。否则 ,农民的真正发动是不可能的。

四、为照顾地主生活 ,不树立过多敌人 ,规定对小地

* 这是给中共中央东北局并中共中央的电报 ,标题是本书编者加的。

主以实行减租为原则,而保留其土地^[362],对被清算的地主可给其保留多于中农一倍的土地,其工商业部分及某些动产给以保留等办法,是适当的。这会使地主内部起分化,而且还能和缓被清算的地主同我们之间的对立。

发展工商业的 若干政策问题*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七日)

在合江^[360]的群众已有初步发动、土匪已经开始肃清、民主政权已经开始建立之后,正确的规定与执行工商业政策已经成为当前的迫切任务了。今后如果没有一个正确的工商业政策,则人民经济生活的真正改善是不可能的,因而根据地的真正巩固也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对于几个有关工商业的主要问题作如下初步规定,望各地党委讨论执行。

关于私资与公资

一、为繁荣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支持长期战争,必须承认,大量的吸收私人资本,发展私人资本主义,是非常重要的任务。过去为了打垮城市中敌伪反动势力的统治、发动基本群众、彻底改造旧政权而进行的反奸清算运

* 这是为中共合江省委起草的决议。

动^[356] ,是必要的 ,基本上也是正确的。但在这个目的初步达到之后 ,我们即应停止城市中的清算运动 ,而把我们的注意力转移到繁荣工商业方面去。沉溺于城市的清算运动 ,模糊我们对于资本主义与对于封建主义的政策的原则区别之偏向 ,是应该纠正的。我们应该劝告与鼓励纯正的工商业者恢复与继续他们的工商业活动 ,同时在一切可能方面帮助他们 ,保护他们的生命财产与经营工商业的自由与安全。一切侵犯工商业者正当权益的行动 ,必须严格禁止。

二、公营资本在繁荣工商业方面是占有重要地位的。它的主要任务 ,不是在排斥与吞并私人资本 ,与民争利 ,而是在调节私人资本的活动 ,补助私人资本的不足与缺陷 ,使之与支持长期战争的需要及整个社会发展的利益相符合。但能够起着这种照顾全局的调节与补助作用的 ,只有大公家^[363]的资本。至于小公家的资本 ,一般都是为了解决本单位供给上财政上的需要 ,往往只照顾本单位的局部 ,不照顾全局 ,容易与民争利 ,破坏政策 ,因而小公家资本的活动范围是应该受到限制的。它们使用各种特权同私人资本争利的一切举动是应该禁止的。

贸易政策

三、凡是遵守政府法令的贸易 ,在我们地区内是应该自由的。我们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国民党大地主大买办

所实施的统制贸易^[364]。为使我区的大量农产品(如豆子、麦子、高粱、小米、烟叶子等)及加工业品(如面粉、油、酒、豆饼等)大量输出换入工业必需品(特别是布匹与盐等),我们应该鼓励私人贸易的发展。一切妨碍私人贸易的障碍物(如许多不必要的关卡、税收、摊派、检查与没收,以及强占商店商场等),必须坚决废除。这里还应再一次指出,一切伪满时代的“军用品”,除枪支武器外,均得自由出卖,不得任意检查与没收。

四、本省贸易以后均统一于省政府的贸易公司。每个县以后只能有一个商店^[365],直接受省贸易公司的领导,执行党的统一的贸易政策。军区如经营商业时,亦应服从省政府的一切法令,并受省贸易公司之指挥。为避免特殊,公家贸易人员以后一律穿着便衣,不得携带武装警卫员。其他小公家的贸易,连粮食的贸易在内,一律禁止。过去有些机关或单位依靠军政特权而进行的贸易,不但破坏了工商业政策,而且也损害了自己。既解决不了自己的供给问题,又腐化了自己的一部分干部,使干部放松了对业务的掌握。实在是利小害大的小公家的各种商店,必须于最短时期内宣告结束。

物 价 政 策

五、为改善农民生活,使工业品与农产品的价格不致相差太远,农产品价格的自然上涨或有意的酌量提高,是

应该的。为了大小公家的局部利益而有意压低农产品价格的政策,是错误的。这种政策只对少数市民及小公家有利,对大多数人民、对大公家都是不利的。

六、大公家的贸易机关必须善于掌握物价政策,使之有利于工业品的输入与农产品的输出。大公家的贸易还应善于吸收或抛出物资以提高或压低物价,使之有利于大多数人民的生活。单纯的财政观点或盈利观点,是错误的。同时政府方面必须及时使用政权力量同投机操纵、囤积居奇者作斗争。

工业政策

七、为鼓励重要工业部门的发展,政府对工业家恢复与发展生产的企图,应给予特殊的保护与帮助。一切妨碍生产的不法行动(如占领厂房、低价强买,买货不给钱等),应一律禁止。银行对重要工业部门,应给予必要的贷款。

八、大公家的公营工业(军事工业除外),应一律采取经济核算制,并在平等权利的基础上同私营企业实行经济上的自由竞争,不得借特权的保护,吞并或排斥私营工业。真正公私合营的企业,须根据公司法或习惯法,实行民主的管理。公家人不能利用其公家的地位,把持一切,使私资代表处于旁观或无权的地位。相反的,我们应充分利用他们的经验,以改造生产事业。“好汉股”^[366]类的公

私合股,一律禁止。小公家的小手工业生产,在其上级机关允许的条件下是可以发展的。

工资政策

九、工资政策的正确与否,对发展工商业起着重要的甚至决定的作用。酌量提高工资以改善工人的生活,是必要的。但片面的、不顾一切的提高工资的方针,则是错误的。其结果必然是工商业的衰落,因而也增加工人失业的机会。根据最近多方面的经验,分红制对劳资双方有利,既可发扬工人的劳动热忱,又可提高资本家的生产积极性,是对发展工商业有利的好办法。因此,我们必须很好研究各生产部门的具体情况,细心的具体实行。

税收政策

十、税收政策不应同发展工商业的政策相对立。反之,它应该是帮助工商业发展的有力武器。为此,各种不合理的苛捐杂税、以及县与县间的过境税(这等于变相的厘金等),应该取消。对工商业除少数出厂税、面粉税、酒税外,只收营业税。为避免人力与物力的浪费,免除税收人员的贪污中饱,以后营业税一律采取合理摊派的简单办法。省的过境税的征收目的,不过是为了相当调节省与省间的贸易,鼓励农产品的输出与工业品的输入,并非要

实行封锁性的关税政策。因为我们现在的出口,是向着自己的邻省,而不是向着敌占区。

十一、公营工商业机关,除特许者外,同私营工商业机关同样纳税。为保证省方需要,面粉出厂税、酒税、省过境外税归省征收,其他则归地方。

合作社的建立

十二、在发展工商业方面,以个体经济为基础的生产与消费合作社,应该起很重要的作用。各地方党应根据人民切身的需要,帮助建立民办合作社。首先在一个区、一个乡,建立一个典型性的,先行突破一点,然后再向其他地区发展。官办的、强制性的、形式主义的合作社,一律禁止成立。

加强领导

十三、为加强对工商业的领导,省委、地委或中心县委下应设财经委员会,以掌握与监督经济政策的正确执行。此外,必须教育所有党、政、军干部紧紧把握住长期打算的观点,反对“抓一把”观点,加强群众观点,抛弃本位主义观点。我们必须同心协力保护与发展工商业,同各种乱摊派、乱没收、敲诈勒索、横行霸道的各种倾向作斗争。只要工商业繁荣起来,人民的生活改善了,政府的收入自

然也会增加起来,大小公家人的生活自然也会得到改良。老百姓丰衣足食了,作为老百姓中一部分的公家人自然也丰衣足食了。人民的利益同公家人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

论群众工作中的诸问题^{*}

(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二日)

消灭封建法西斯集团

有的同志把放手发动群众与执行政策相对立,以为执行政策就是照顾地主与富农,因而提出反对“政策观点”的论调,这实在是对于执行政策的一种曲解。在放手发动群众中,规定我们打击的主要敌人,争取与中立的对象,可靠的同盟者及斗争的主力,这就是我们的阶级政策。只有正确的执行阶级政策,我们才能真正的去放手发动群众。

我们应该一再强调,农村斗争的主要敌人,是恶霸地主。关于这点,省委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日《为进一步深入土地斗争》的文件,已经有了明确的指示。这次群工会议,关于这个问题更做了一些新的补充。这就是说,我们所要打击的这个主要敌人,是一个日寇倒台后保留下来

* 这是在合江全省群众工作会议上的总结报告的节录。全文共十二个问题。最初刊载于中共合江省委机关报《合江日报》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五日。收入本书的是第四、十二两个问题。

的封建法西斯集团。这个集团中包含有地主、汉奸、特务、警察、土匪、封建迷信团体中的坏头目。这个集团中间,某一地区的汉奸、特务、警察、土匪、封建迷信团体的头子,不一定出身地主,但他们必然是同该地区的地主密切联结着的。而且,一般的说来,凡是当地著名的汉奸、特务等,照例都是当地著名的地主。反之,当地著名的地主,差不多没有不是当地著名的汉奸、特务,没有不是恶霸的。恶霸地主是这个集团的中心人物。他们对于土地的垄断及由此垄断所实行的对于农民群众的经济的与超经济的剥削,是这个集团的经济基础。其他一切,均是这个集团的政治的、军事的与精神的上层建筑。

从这种政治经济情况出发,我们反对恶霸地主的斗争,必然是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与思想的斗争的结合。因此,如果以为反对恶霸地主的斗争只是简单的经济斗争,只是分配土地牲畜的斗争,自然是不妥当的。如果我们不用一切方法,把这个封建法西斯集团从各方面打倒、打垮、打烂,那农民即使一时分得土地、牲畜,也是不可靠的。挖掉“穷根”是与挖掉“坏根”的斗争密切结合着的。“坏根”是维护封建土地所有制——“穷根”的上层建筑。但反对这一集团的一切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与思想的斗争,归根到底,必须把这一集团的经济基础挖掉,即把恶霸地主的土地、牲畜、清算出来分配给农民,才算真正解决了土地改革的根本问题。因此,把斗争停留在政治的、军事的与思想的斗争上,而不用一切方法把斗争引导

到分配土地、牲畜的斗争上,也是不妥当的。只有挖掉了“穷根”、“坏根”才会丧失它的物质基础。

根据于以上的了解,这次群工会议均同意在清算分地中把所有大地主、中地主清算至中农地位。罪大恶极者,依群众公意严惩。对普通小地主酌量实行减租^[362]。但依靠其在伪满时的政治地位实行经济掠夺而起家的恶霸小地主,则在经济上应清算至中农地位。罪大恶极者,依群众公意严惩。对普通富农,酌量实行增资,清算去其封建剥削部分的土地。但依靠其在伪满时的政治地位实行超经济掠夺而起家的恶霸富农,在经济上、政治上的处理办法,应与恶霸小地主同。至于非地主富农成分而在政治上罪大恶极者,亦应依群众公意严惩,但在经济上以不动其家产为原则。对所有政治上有罪但非罪大恶极者,必须实行政治清算,并依其犯罪之大小及其犯罪时之地位,来分别轻重,加以处理,重则徒刑,轻者经坦白反省后根据具体情况,交保释放回家生产,或者组织他们参加集体劳动。

以上处理办法的规定,指出了我们在反对封建法西斯集团中的下列三个原则。一、我们必须坚决消灭地主阶级对于土地的垄断。二、我们必须严惩罪大恶极者。这里必须“镇压”,决不能“宽大”。三、对政治上有罪,但非罪大恶极者,除一律实行政治清算外,应依照其犯罪轻重,公平处理。这里有“镇压”,又有“宽大”。我们认为这三个原则的适当性,就在于我们坚持了挖掉这个封建法西斯集

团的经济基础,而同时对于这个集团中一切在政治上有罪的分子采取了“镇压”与“宽大”正确结合起来的方针。不分轻重的一样“镇压”,与无原则的“宽大”,都是不正确的。

把解决土地问题同 生产与战争结合起来

发动群众解决土地问题,是我们合江^[360]当前的基本任务。但在完成这一任务的过程中我们即应向群众解释,分得土地虽是解决了农民翻身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但并未完全解决这个问题。要完全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一方面使农民们真正从分到的土地上得到实际的利益,使他们能够过足衣足食的生活,另一方面必须使分得的土地永远保留在他们手中,不被恶霸地主抢回去。为要达到第一个目的,必须使农民们在清算分地运动中,立即准备土地分配完毕后的春耕大生产运动。他们应该把分得的粮食罚款等节省下来准备春耕时作为种子及购买牲畜农具等之用。他们分到的牲畜农具应该好好的爱护,不要糟塌。他们应勤俭节约,反对大吃大喝,把每个钱都用到生产中去。向农民们做这样的宣传解释工作,一方面可以使他们积极准备春耕,同时更可以推动他们更加积极的参加土地斗争。为达到第二个目的,必须在清算分地运动中动员农民中的青壮年参加武装部队,参加

民兵、地方警卫队、地方独立团、前方主力兵团，参加剿匪及打中央胡子^[367]的爱国自卫战争。一般农民则应该好好的进行拥军优属，慰劳伤病员，安置残废，及帮助军队担架运输，完成政府征粮购粮任务。必须向农民们再三再四的解释，不积极生产，有土地并不能改良生活。不积极参战，有了土地也不能保住。我们的口号应该是“努力生产，安家立业”、“保卫土地，保卫家乡”、“消灭中央胡子，过好日子”、“一切为了前线的胜利”等。我们必须把土地改革同生产结合起来，同战争结合起来。土地改革是我们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基础，是使我们的爱国自卫战争真正成为人民战争的基础。同时只有大生产运动，只有充分的斗争动员，我们才能支持长期的战争，争取战争的最后胜利。

在平分土地运动^[368]中 保护城市工商业^{*}

(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六日)

一、在最近的平分土地运动中,已有数县发生了违反城市工商业政策的现象。其表现有以下几种。

(一)对地主兼工商业者挖后门、挖家底^[369],有的在挖家底之外还实行罚款,结果使他们全部破产,或者关了门,贴上出兑的广告。

(二)原为地主,但在日本没收其土地后已转为工商业者,仍被订为地主,有被挖家底者。

(三)“八一五”^[358]后,土地改革以前,已全部或部分转为工商业者的地主,有全部被没收或被挖家底者。

(四)曾在伪满做了点事,尔后转为工商业者,或与敌伪稍有关系者,都被认为是敌伪残余,有被没收被挖者。还有因与地主、富农有亲戚关系,而被没收被挖者。

* 这是为中共合江省委起草的指示,最初刊载于中共合江省委机关报《合江日报》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一九四八年一月三十一日指示中共中央东北局:“合江省这一指示,经修改后,可适用于整个东北各地。”

二、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

(一)认为东北被敌伪统治十四年,并实行了专卖配给制度^[370],已无民族工商业与私人资本,而只有敌伪资本。

(二)认为现时不同于过去土地革命时期^[371],那时是被封锁,需要私人工商业,现时已有国营工商业,加上合作社,没有私人工商业也不要紧。

(三)没有在贫雇农大会与代表会上讨论保护工商业政策的问题。

(四)某些农村工作者只希望农民多得点浮产,因而对于不合政策的行为不加纠正说服,反而助长。

三、以上的认识与做法都是不对的,是与我党现阶段的工商业政策相违背的。对农民、贫民行为不加领导,是一种尾巴主义。这种违反政策的情况若不及时加以改变,则我合江^[360]各城市私人工商业在短时期内将有全部被搞垮之危险。这对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支援前线与满足农民本身的需要都是不利的。为此特规定如下。

(一)对地主兼工商业者,除没收其封建剥削部分外,即除没收其乡村的土地及其出租的牲畜与房屋,并废除其高利贷外,其他一律不动。

(二)凡在土地改革以前(即一九四六年七月以前)之纯工商业者,不管其过去出身是否地主或富农,一律保护。

(三)除东北局一九四七年八月八日指示^[372]中允许没收的“在全县全市范围内政治上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

罪大恶极的”大汉奸、大特务、大恶霸、大地主之工商业及其财产,以及一九四六年七月以后为逃避斗争而搞点小买卖的真正化形地主^[373]的财产、反革命国特的伪装的工商业及其财产,应坚决没收外,对其他过去有过错误与缺点,而现在服从政府法令、安份守己的工商业者,除使其政治上坦白外,不能借故没收其工商业及其财产或任意进行罚款。

四、今后清算与没收工商业者的办法。

(一)农民不得直接查封工厂商店,或直接没收工商业者的财产,或私自捕人罚款。

(二)凡合乎第三条第三项规定而应没收的工商业者的财产,须一律经县市政府审查批准,由县市公安局查封没收,然后转交给有关农民或有关机关。捕人与罚款亦应照此办理。

(三)凡没收的工厂商店,一般不应使之分散或荒废。除大工厂大商店应交政府经营外,应采取群众合作社经营的方式或出卖给私人的办法,使之继续开办。

(四)凡农民要求入城清算没收工商业者,各区负责人应采取负责态度,根据党的政策,将案件材料加以审查研究。不能没收者,应向农民解释清楚,不使其徒劳往返,发生不满。同时,必须在贫雇农大会与代表大会上将工商业政策讨论清楚。

(五)凡未经县市政府或县市公安局而私自进行的查封、没收或捕人、罚款,为非法行为。

从土地斗争转入生产斗争^{*}

(一九四八年二月)

新形势的估计

根据实际情况,我们认为合江^[360]全省大部分地区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土地改革的任务。这就是我们对于合江农村新形势的估计。

我们这种估计是否适当呢?是否夸大了我们的成绩呢?我们认为,这种估计是适当的,也不是夸大的,因为它是合乎客观的实际情况的。如果我们现在不做这种估计,那就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那我们对于当前情况就不能有正确的了解,我们就不能根据于新形势提出新任务,就会迷失前进的方向。显然,我们如果不做这种估计,我们是会在工作中发生错误的。

* 这是一九四八年二月十九日、二十日在合江全省群众工作会议上的总结报告《合江农村的新形势与新任务》的节录。全文共三部分十二节,最初刊载于中共合江省委机关报《合江日报》一九四八年三月四日,署名张平之。收入本书的是第二、七、十二节,标题是本书编者另拟的。

但这里必须解决一个问题，即：斗封建，领导农民翻身，要斗到什么地步，翻到什么程度，才算彻底？在这个问题上，如果看法不同，估计也就不同，任务方向的规定也就不同。比方有的人从经济上提出标准，说，地主的财宝还没有挖尽，所以不能算彻底。我们承认挖财宝重要，但是财宝是黑东西，群众说得对：“谁也摸不清，谁也没有办法彻他底。”如果拿这个做标准，那就很难有彻底的时候，钻进去出不来，很难按时提出新的任务，进行别的工作了。这是不妥当的。又比方有的人从政治上提出标准说，地主还想翻把^[374]。所以也不能算彻底。我们承认地主想翻把，会翻把，不但今天是如此，将来在很长时间内，也是免不了的。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但正因为这是比较长期的斗争任务，所以也就不能成为今天彻底与否的标准。

那么，彻底与否的正确标准是什么呢？我们认为，从经济上说，地主富农方面，丧失了进行封建剥削的生产手段，不能继续剥削农民，剥削者被剥夺了；农民方面，占有了一切必要的生产手段——如土地、牲口、衣服、粮食、农具等等——并能以之进行独立的农业生产，不受封建剥削，这就叫基本上彻底。换句话说，一方面消灭了地主富农封建半封建的剥削，另一方面满足了农民目前必需的生产要求，这就是经济上斗争彻底的标准。从政治上说，就是今天是地主富农阶级当权还是农民阶级当权？今天究竟是谁统治谁？谁说了算？今天的事实很

明显,地主富农在政治上被打倒了,统治者被统治了。好的地方、贫雇农经常参加活动的几乎占贫雇农全人口百分之八九十,一般也占百分之五六十。在有些地方,虽然还是少数贫雇农代表、少数干部说了算,但这些代表和干部都是贫雇农自己推举出来的积极分子,虽然其中有些有毛病的人,但大多数基本上还是代表贫雇农利益的。至于发动落后是否充分,发扬民主够不够,干部工作方式好不好,中农团结得紧不紧,那是农民内部的民主问题,是当权当得好不好的问题,不是当不当权的问题。贫雇农在共产党领导下,经过贫雇农大会与贫雇农代表会,团结了中农,实行了对于地主富农的统治,这就是贫雇农当权的标准。地主富农是否丧失了生产手段?是否丧失了进行封建剥削的条件?是否在政治上被打倒了?农民是否占有了一切必要的生产手段?是否能够独立进行生产不受封建剥削?是否当了权,统治了地主富农?这就是今天消灭封建、农民翻身彻底与否的标准。这是主要的标准。其他种种,都不能成为主要的标准。因此,我们估计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土地改革的任务,这也就是正确的合乎实际的估计。

当然,这种估计,并不否认我们运动发展的不平衡,相反,我们说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任务,也就是说还有小部分地区基本上还没有完成任务。同时大部分基本上完成任务的地区当中,也有完成得很好的,有完成得比较好的,有完成得较差的种种差别。如果把合江农村翻身

的彻底程度分成上中下三等,那上等的约占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中等约占百分之四五十,下等的约占百分之一二十。此外,还有百分之十以下基本上未完成土改任务的靠近山边草甸的小屯子。

当然,这种估计,也并不否认我们运动中还有缺点。如打击面还比较宽,发动落后还不够,对地主富农的分化还很少,农民内部的民主还不够等等。同时,这种估计,也并不否认地主富农还想翻把,农民的统治还不够巩固。

运动中的缺点与弱点,那是应该指出的。但我们并不能以此来否定在合江大部分地区的土地改革任务基本上已经完成的这一基本情况,相反的,我们应该肯定,胜利是基本的,而缺点与弱点是从属的。

发展生产、勤劳致富

土地改革后,农民有了土地、牲口、农具、粮食和衣服。有了必需的生产手段。如何使这些生产手段同劳动结合起来,进行生产,这是今天农民的基本要求,也就是我们的基本任务。土地改革的目的,原来也就是为了发展生产,提高农村生产力,改善农民的生活。

封建半封建的剥削制度之所以必须消灭,就是因为在这种制度下,少数地主富农利用了他们对于一切生产手段的垄断,残酷的掠夺与剥削农民生产者的大部分劳动果实,因而使农民生产者既不能以自己的劳动所得去

改善自己的生活(相反的,他们的生活是愈来愈苦了),也不能与不愿去努力生产,去发展农村生产力(相反的,农村的生产力是愈来愈低了)。这种不合理的制度现在终于为农民所消灭了。现在的情况根本不同了。现在生产者的农民,已经自己占有了一切必要的生产手段,他们可以独立自主的进行生产,他们的劳动所得,可以完全归自己所有。于是农民对于生产的态度,起了根本的变化。只要农民们现在知道(有谁不知道的,我们应该使他知道!)他们今后努力生产,勤干活,多侍弄,多铲多趟,多打粮,多打柴,多喂猪羊等所得的生产果实,都将归他们自己所私有,以改善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就会空前高涨,农村的生产力就会大大提高。目前农民要求的满足,还只是初步的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平的满足。一般说来,他们现在的生活水平还是很低的。所以今后农民要过富裕幸福的生活,还要靠进一步发展生产。同时,也只有进一步发展生产,才能增加我们的物质力量,更有力的去支援前线。过去我们是以土地改革来发动群众,支援前线;现在我们要以发展生产来发动群众,支援前线,以加速战争的胜利。而这种胜利的获得,又是农民进一步发展生产与最后解放的保障。

为了充分发展生产,提高农村生产力,改善农民生活,今后必须大大提倡在农民个体私有经济基础上,组织互助合作的劳动。农民的个体经济,不经过劳动的互助合作,生产力是很难迅速提高的。所以今后我们不能以简单

的发展农民的个体经济为满足,而必需在这一个体经济的基础上,组织互助合作的劳动,以发展生产。这不仅是目前经济上的必需,而且也是农民的迫切要求。农民从过去的个体经济中体验了互助合作的必要,也从去年的插秧换工^[375]中认识了互助合作的好处,他们有了痛苦的经验,也有了胜利的收获。因此,他们在准备生产时,很快就朝着这个方向前进。他们在平分土地运动^[368]中即自动组织了许多小型的以一副大犁为单位的生产互助组。农民的这种自觉,是很可宝贵的,我们必须进一步加以推广、发展和提高。

今年发展农村的互助合作,不仅有了农民的自觉作为思想动员的基础,而且还有农民经济上的优势成为运动发展的有利条件。大多数农民现在不仅有了好地,而且有了够用的牲口和农具,这些都是互助合作劳动的基本条件。因此互助合作的主动权,现在完全操纵在农民手里,首先是操纵在贫雇农手里。所以,我们有信心把今年的互助合作劳动向前推进一步。

农民的互助合作,这是一种新的生产关系,这就是我们在破坏了旧的生产关系之后所必须积极建设的一种新的生产关系。旧的生产关系,是农民与地主富农结合的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即是封建半封建的生产关系。新的生产关系,是农民与农民结合的互助合作的平等互惠的劳动关系,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生产关系。这种新的生产关系去年已开始萌芽,现在也正在发展着。这种新的生产关

系,由于没有封建剥削的存在,所以能够大大提高农村生产力,改善农民生活。我们今后的任务,就是通过大生产运动把这种新的生产关系巩固的建立起来。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在今后的农村生产运动中,还会产生一部分吴满有^[376]式的新富农的经济,而且这种新富农经济从农民的个体经济中产生,将是不可避免的与必然的。这是一种新的资本主义性的经济,它将向着互助合作方向发展的农民个体经济同时并存。这种新富农经济同旧富农经济的区别就在于:在经济上,它对于雇工决不能有封建性与半封建性的剥削,而只能有劳资两利的剥削;在政治上,它必须拥护民主政府的一切法律,不能有任何反动的行动。这样的新富农,对于发展农村的生产力,有其一定的进步作用。所以,民主政府对于这种新富农是应该而且必须容许其存在与发展的。我们今后不是反对一切剥削,如雇佣劳动、借贷与租佃的剥削,而只是反对其封建性与半封建性。凡劳资两利的新富农式的剥削,凡非高利贷的互利的借贷关系,凡确由缺乏劳动力而不能不出租其少量土地的平等互助的租佃关系,我们今后还是可以而且应该允许其存在的。但是我们今后发展农村经济的总方向,还是发展农民个体经济间的互助合作,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农村经济发展的方向。这一方向,可以使大多数农民现在不至受到资本主义的剥削,将来可以使一切劳动农民得到最后解放。我们今后要向这个方向努力前进。而且我们必须在事实上证明,这种新的

互助合作的劳动组织,远胜于旧的封建半封建的劳动组织,我们相信,我们也能够这样证明的。

总之,今后我们的任务,就是用一切力量,动员全体农民,发展生产。我们要使今年农业方面的收获量不但赶上而且超过去年的收获量,完成今年省政府提出的增产粮食八万吨的任务。因此,我们必须及时的、坚决的从土地斗争转入到生产斗争,从平分土地运动转入到生产运动。

生产运动,同平分土地运动一样,必须坚持贯彻群众路线,必须以贫雇农为骨干,紧紧团结中农、动员广大人民自己动手来完成,使生产运动同土地改革一样,成为一个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

为了贯彻群众路线,开展大生产运动,我们必须把生产运动的“底”交给全体贫雇农和中农,直接同他们见面,向他们说明:《土地法大纲》^[377]是斗倒封建的最高的、最彻底的纲领,实现了这个纲领之后,共产党是主张勤劳致富而不主张靠斗争来吃饭的。只有劳动,才能创造一切财富,才能进一步改善生活。过去斗争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要斗争而斗争,而是为了要消灭封建的剥削制度,使农民取得发展生产、勤劳致富的生产条件。现在这个目的达到了。所以,我们就应当将斗争转入生产,在生产中发财致富。不管什么人,凡是靠劳动生产出来的财富,都归他个人所有,任何人都不得侵犯。新富农,我们不反对。二流子要改造。越穷越光荣;“永远斗争”、“循环斗争”的思想

是不对的,必须打消。同时,“一年之计在于春”,我们现在就要动员农民立即在行动上准备起来,打柴、上粪、订生产计划,准备草料马料种籽,编生产互助组,准备展开生产比赛,以造成一个热烈的大生产运动。

为了贯彻群众路线,开展大生产,我们还必须动员全体干部,对生产运动积极加以领导和组织。我们不但要学会领导土地改革运动,还要学会领导生产运动。我们不但要组织群众生产,还要自己动手生产,组织国营农场,组织集体劳动。在农业生产中创造新的财富与新的生产经验,做出榜样,推动群众的生产,使领导与群众在生产上真正密切结合起来。

我们应当承认,今年的生产运动,有它的特殊困难存在。例如地主富农有的不积极生产,因而可能使少数土地撂荒或歉收,在建立新的劳动关系上,我们的经验与准备还不够等等,这些都是领导上必须注意的。但我们肯定:有利的条件是主要的。只要我们能够坚持贯彻群众路线,充分发挥一切有利条件,同时预见某些困难,设法予以克服,那我们一定能够象过去取得了土地改革的胜利一样,取得今年生产运动的伟大胜利。

加强思想领导

从以上报告中可以看到,我们今后的任务还是很繁重的^[378]。各级领导机关,领导同志,必须加强对于运动

的思想领导,才能胜利的完成这些任务。

为了加强思想领导,首先必须坚决贯彻群众路线。其主要关键就是领导与群众结合。我们必须吸收这次平分土地运动的经验,把它运用到今后一切工作中去,并继续加以发展。这里必须特别强调调查研究,深入下层,深入运动,发现问题,总结经验,实现交底与运动密切结合的领导方法的重要性。关于阶级关系的调查及对于群众新创造的发现与宣传,今后尤应特别重视。

为了领导上正确的掌握政策,必须经常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在这一方面,我们过去的领导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379]。当我们在主要反对一部分干部中的右倾思想时,我们曾经批判了许多错误的“左”倾观点,如富裕中农可以征收,对政治上被斗的中农可以同时斗经济,私人工商业不必保护,地主富农出身的知识分子一概不要,群众运动中不必强调党的思想领导等等的“左”倾观点。但由于运动发展的迅速与猛烈,由于领导上在划分阶级问题上,如象前面所说过的,本身有缺点,同时也由于及时发现问题,纠正偏向不够,所以某些方面的“左”的偏向,仍然是发生了。现在我们主要是要反对一部分干部中的“左”倾思想,所谓“‘左’比右好”、“宁‘左’毋右”的思想。这些“左”倾思想,是小资产阶级的急性病、疯狂性与迎合性的产物,也是一种机会主义的表现,在本质上同右倾机会主义是没有差别的,虽然表现的形式完全两样。我们对于这种“左”倾思想,同我们对于右倾思想一样,应该给以

无情的批判。但我们仍然需要注意，我们在反对“左”倾思想中，必须防止右，防止从右的方面来反对“左”，正象过去防止从“左”的方面来反对右的那样。应该特别指出，领导上在运动的一定阶段，强调基本的一面，是必须的，但必须防止因强调这一面，而走到夸大这一面抹杀另一面的谬误地步。那就不是正确的强调，而是错误的夸大了。因此，我们做领导工作的同志，必须在热烈的群众运动中，经常保持头脑的冷静与清醒，而不要冲昏头脑，失掉方向。

由于我们合江全省运动发展的不平衡，工作好坏的不平衡，我们还要特别提起领导同志们注意，遵守对于不同地区采取不同办法的原则，不要平均主义与千篇一律。

同志们 我们过去的胜利是伟大的，今后的任务是艰巨的，我们还有很多的缺点与困难需要克服，我们不要因为过去的胜利而骄傲自满，我们还要百倍努力，密切联系群众，巩固已有的阵地，继续前进，在发展生产、支援前线上，做出新的成绩，以推动全国革命胜利的早日到来。

城市的地位和 城市工作中的阶级路线*

(一九四八年八月三十一日)

一 关于过去城市工作的估计

过去两三年来东北的城市工作,东北局认为是有成绩的,而且成绩不小。

第一,支援了前线。城市在军火生产、军需品加工、军用物资运输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哈尔滨就造了两千门六 炮,许多城市都加工了粮食、被服。城市人民参军、优属、劳军,也出了很多力。如果我们东北没有现在这些城市,没有城市的支援,那么打现在这样规模的运动战和攻坚战是很困难的。如果只有农村,我们就只能打游击战。

* 这是在中共中央东北局召开的东北城市工作会议上所作总结发言的节录。张闻天同志当时是东北局常委委员,受东北局委托作总结。总结分六节,收入本书的是第一、二两节和第三节的一部分。标题和第三节的插题是本书编者拟的。第三节的其余部分后来由张闻天同志补充修改,为东北局写成《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见本书第 396 页。

第二,在城市中打垮了旧政权系统,建立了新政权系统,安定了城市的社会秩序。当然,这方面的工作是否彻底,还可以研究。各地的情况也不一样。但是总的说来,伪满和国民党的封建官僚资本统治是被推翻了,反动派受到严重打击,工人、贫民翻了身。城市不再是官僚、买办的城市,而是人民的城市了。

第三,恢复并部分改造了经济。铁路、矿山、电站、工厂,很多已经恢复。伪满殖民地时期和国民党时期的汉奸资本、买办资本、官僚资本已被没收,国营经济建立了起来,私人工商业经济得到了发展。旧的经济制度改变了,新民主主义经济诞生了,并且由我们党实现着领导。

第四,发动了工人群众和一部分贫民,取得了他们的拥护。尽管发动群众的斗争中有过一些毛病,工人毕竟是新的、解放了的工人,贫民也毕竟抬起头了。我们还吸收了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和文化、技术人员参加军队、政权、生产各方面的工作,打破了他们把国民党当成正统的观念。我们同群众的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群众由不了解我们,变成拥护我们了。

第五,经过两三年的摸索,取得了城市工作的初步经验。工作中虽然有过一些“左”右摇摆,但是这些偏向得到了克服。在这一过程中,培养和锻炼了一批城市工作干部。

第六,建立了党的一些支部,还建立了工会和青年团的组织。

可见，这两三年来我们的确做出了许多成绩。这些成绩是依靠党中央、东北局的领导，依靠各省市同志们和城市人民的共同努力取得的。否定这些成绩是不正确的。过去伪满统治下的黑暗的、落后的、腐朽的旧城市，变成了新民主主义的光明的、先进的、蒸蒸日上的新城市。我们的城市如旭日东升，夸大它的缺点是不正确的。

我们的城市工作也有缺点和错误。首先是调查研究不够。至今还没有或很少对一个城市进行详细的全面的调查研究。对城市中的阶级关系、各种经济成分的状况及其相互关系，对哪些行业应该发展，哪些应该限制，都缺乏系统的了解。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总结城市工作经验也不够。其次是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在砍挖运动^[380]，特别是在平分土地运动^[368]中，出现了一些“左”的偏向，侵犯了私人工商业。在有些地区，这种错误相当严重，纠正也不及时。第三，是对城市工作领导的集中统一不够，计划性不够。你搞一摊，我搞一摊，无政府状态相当严重。这些缺点和错误无疑是应该注意纠正的。

至于东北党过去对城市工作注意不够，这是不是一条缺点呢？如果这是指土改结束以后没有更早一些注意城市工作，那么这样批评是可以的。但是，在土改以前，在土改进行当中，我们的工作重点和主要力量只能放在农村。一万二千名干部下乡，摧垮农村封建势力，在农村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这些都是正确的。在那时，把城市工作

放在次要地位,也是正确的。不先把农村搞好,就不会有城市。我们不能根据现在情况来批评过去的工作。责备过去没有把主要力量放在城市,那样做是不正确的。我们应当历史地看问题。土改以后的今天,应当及时注意城市,把城市工作提高一步,却仍然注意不够,那就是缺点了。

虽然过去对城市工作注意不够,但是如果说我们过去对城市工作没有方针,那也是不对的。对城市工作,中央、东北局是有其基本路线、方针的。彻底摧毁旧政权,建立新政权,就是一条方针,这条方针是正确的。当年有的同志主张对旧政权采取原封不动稍加粉饰的办法,东北局是批驳了的。发展公营经济,保护私人工商业,没收买办官僚资本,也是一条方针,这条方针也是正确的。至于有的地方是否没收得多了一些,这可以研究,但即使如此,也只是执行中的缺点。发展工人运动,发展学生运动,改造青年知识分子,注意文化工作,又是一条方针,这也是正确的。利用城市的生产力,动员城市的一切力量支援前线,这条方针也是正确的。正因为我们有方针,而且这些方针是正确的,所以我们在城市工作中才取得前面提到的那些成绩。

当然,我们这些方针还比较原则,实现这些方针的办法当年还不可能提得很具体,因为我们缺乏管理城市的经验。在摸索过程中,难免走弯路、翻筋斗。我们要善于在实践中学习,多多总结经验,以便更有把握地前进。

现在形势发展了,新形势提出了新任务,必须注意加强城市工作了。

我们的军队打了胜仗,从防御转入反攻,转入进攻,要进行攻坚战,要大兵团作战了。前线需要大量的军火、被服等等,没有城市工业的支持,只靠乡村的小生产是满足不了这个要求的。过去我们是打到哪里就吃到哪里,今天的军需品则仰仗运输,只是依靠乡村也不行了。战争的胜利和发展要求我们大大发挥城市的力量。

东北广大农村土地改革基本上已经完成,农民也向城市提出了新的要求。他们要农具,要日用品,将来还要机器,要文化,要科学技术。农民供给了城市粮食,城市就应当满足农民的这些要求。否则工农联盟就不能巩固。

我们现在必须充分发挥城市的力量,以支援战争,巩固工农联盟。这就是我们面临的新任务。我们要加强城市工作,把注意力向这方面转移。要把城市工作看得和农村工作同样重要,有些地方还要看得比农村工作更重要。这是说必要性。至于这样做是否可能,那么我们说,过去不可能,今天则是可能的。土地改革的基本完成,使我们可以抽调一部分干部加强城市工作了。

大家都希望把城市工作做得更好,这次会上为此提出了几百个问题。归纳起来,大体上是三个问题:如何认识城市的地位;如何动员一切力量,发展城市生产;如何集中统一,加强领导^[381]。

二 关于城市地位的新认识

城市的地位问题 ,实际上就是城市与乡村的关系问题。

过去我们说 ,城市要为乡村服务。现在我们要增加一条 :乡村也要为城市服务。就是说 ,城市和乡村要互助合作。这同旧的殖民地的城乡关系有根本区别。那时是城乡对立 ,城市剥削乡村。农民害怕城市 ,仇恨城市。土改以前 ,乡村没有改造 ,城市也没有改造 ,两者不可能互相合作。当时一万二千名干部下乡 ,为农民服务。现在不同了。农民要拥护城市 ,城市也要欢迎农民。农村供给城市粮食、原料 ,城市在经济上文化上帮助农民 ,城市和乡村的关系是互助合作的关系。

但是 ,一般地说城乡互助合作还不够。还应该指出 ,城市对乡村起领导作用 ,城市领导乡村。城市在城乡互助合作中领导乡村 ,其实质就是 :工业与农业并重 ,工业领导农业 ;工农联盟 ,工人阶级领导农民。城市代表更高的生产力 ,代表工业、技术、科学与文化。城市代表最先进的工人阶级。因此 ,它应该而且有资格领导乡村。离开了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城市工业和城市工人阶级 ,社会不能前进 ,社会主义也不能实现。

在城市中间 ,在大、中城市同小城市的关系中 ,是大、中城市起领导的决定的作用。但是小城市也是必要的。它

是大城市的分支,就好象末梢神经之于中枢神经。它为大城市吸收农业原料,推销工业产品。没有它,大城市就会孤立。

城市性质不同,作用也不一样。工业城市是生产的城市,起决定作用。商业城市只起辅助作用,辅助工业城市。

三 我们在城市中的阶级路线

过去三年我们比较充分地发挥了乡村的力量。现在,我们又要比较充分地发挥城市的力量,就是说,要发展城市生产力,发展城市工业,扩大工人阶级的队伍。这就是我们的任务。应该怎样完成这项任务,发挥城市的力量呢?应该为此采取什么方针呢?

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从城市的实际出发,必须首先认识城市的实际,认识城市的阶级关系和经济结构。

不同的城市,阶级情况不完全相同。但是一般说来,城市中大体上有以下一些阶级和阶层。

一、工人阶级。包括产业工人,手工业工人,店员,职员,公教人员,“公家人”(即干部,哈尔滨有五万,是个很大的数字),以及其他薪金劳动者。

二、资本家。资本家有大、中、小之分,要看其雇佣工人的数目而定。有的城市只有小资本家。

三、独立劳动者。即小生产者,多是手工业者。自己

有点资金,有点生产工具,靠自己劳动为生,不剥削别人,也不被别人剥削。这种人数相当多。自由职业者、小商人也在内。

四、城市贫民。有些是贫苦的独立劳动者,生活很苦。有一些还要部分地出卖劳动力。也就是说,他们是被剥削者。很多小贩也属贫民。

五、知识分子。虽然他们的家庭出身各不相同,但他们是一个阶层。

六、游民。他们不事劳动,不同于贫民。如小偷、妓女、扎吗啡的等都是,流氓、地痞也包括在内。有些贫民偶尔也有偷窃行为,但主要以劳动为生,不能把他们都看成游民。贫民和游民有时不大好区分,但是一定要分清。

七、城郊农民。要按照农村划分阶级的办法去划分。

八、封建地主、官僚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分子及其代理人。他们已被打倒,但未消灭,还有残余。

同志们回去,要把城市的阶级关系详细调查一下。如果不了解各阶级之间的关系及其力量对比,是不好做工作的,做了也一定会是盲目行动。

我们在城市工作中的阶级路线,或政治路线,或策略路线,实际上就是我们对各阶级的不同态度,对它们的政策。什么是这条阶级路线呢?

(一)依靠工人、店员、职员、“公家人”、贫民,即依靠被压迫被剥削的无产阶级及半无产阶级。共产党到什么地方都要依靠这些人,翻天下就是依靠他们。

(二)团结独立劳动者和知识分子。特别是独立劳动者,他们象中农一样,经过改造,可以同我们一道进入社会主义。我们要紧紧地团结他们,要通过组织生产合作引导他们走向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

(三)联合中、小资本家。在新民主主义的现阶段,还需要他们。但是,他们同我们是两家人,作为一个阶级,他们是反对社会主义的。我们在一定条件下与他们联合,一定条件下与他们斗争,联合中有斗争。对少数开明士绅也是这样。

(四)反对和打倒封建地主、官僚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这是在新解放城市的政策。在基本区,则是防止和镇压他们的破坏和复辟活动。对这些人没有什么客气。

这就是我们在城市工作中的阶级路线。它的道理很简单,也没有人反对。问题是要在复杂的实际斗争中掌握它,防止“左”右偏向。

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有两条路线,一条是无产阶级发挥领导作用的路线,一条是听任资产阶级起领导作用的路线。有人说,现在资本家有什么可怕,军队都在我们手里,他们不会争取领导权的。这实际上就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说话。不要看资产阶级对我们客客气气,实际上它总是想夺取领导权的。不一定是他们自己出面。他们往往让小资产阶级出面,甚至以共产党员的面貌出现。这就容易迷惑我们。我们一定要有明确的阶级观点,善于批判分析,才能在统一战线中发挥无产阶级的领导

作用。

我们到东北三年来的工作中,有“左”也有右。我们开展了两条战线的斗争,工作才得到发展。

初到东北时,有些同志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搬到东北来,产生了右的倾向。把一些封建地主、伪满上层人士都包括在统一战线以内。特别在建军工作上,对谢文东^[382]、李华堂^[383]等封建代表下了委任状,将伪满警察、土匪部队收缩为民主联军,还给他们发新枪,就是所谓“老兵老枪,新兵新枪”^[384]。结果这些部队很多叛变了,拿了新枪打我们。我们批判了建军工作上的资产阶级观点,纠正了右的倾向,才建立了真正的人民自己的军队。在建政问题上,初期也有人主张只要将旧政权稍加粉饰就行了。我们反对了这种右的观点,坚持将旧政权彻底摧毁,这才建立了人民的新政权。建党问题也是如此。开头不少地方男女老幼一齐来,开明士绅乃至汉奸特务都发展成党员。有些人甚至主张建设新东北要以国民党为主而以我们为辅。我们批判了这种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右倾观点,纠正了右倾错误。

后来,又发生了“左”的倾向。它从砍挖运动已开始露头,到平分土地运动时更为发展。在城市中的表现是混淆对乡村封建地主阶级和对城市资产阶级的两种不同性质的斗争,以及片面强调满足群众要求的所谓“群众观点”,结果是侵犯私人工商业。这种“左”的错误,实际上是有利于资产阶级争取群众来反对我们的。“左”倾错误也助长

右倾偏向,因为“左”行不通,必然又右回来。“左”成了右的借口,助长右的气焰。我们迅速批判和纠正了这种“左”的偏向,否则小资产阶级和独立劳动者会产生动摇,我们会脱离群众,我们的领导权也会成问题。

由于前一时期集中力量纠“左”,现在右的倾向又出现了一些萌芽。在少数同志中间,暴露了一些右的观点。有人说,对工人和资本家要“一视同仁,不要偏心”。我们是共产党人,不论何时何地,总是要偏向工人的。有人不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同资产阶级联合,而是觉得“劳资之间只有合作,没有斗争”。有人甚至说:“工人养活资本家,资本家也养活工人”;“究竟是穷人养活富人,还是富人养活穷人,还要研究。”劳动创造世界,工人的剩余价值养活资本家,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难道这还要研究,还能改变吗?

在实际工作中,有些同志对工人关心少,对资本家关心多,听工人的话少,听资本家的话多。对于工人群众,我们一定要关心他们的劳动和生活,倾听他们的呼声,否则就不成其为无产阶级政党。当然,关心工人,并不是说要把工资提高到不适当的水平。听工人的话,也不是说不要听资本家的话。资本家的话也要听,但是要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去听。

另一方面,也还存在着明显的“左”的观点。例如,有些人根本反对纠偏,还自认为代表群众利益。其实他们只代表群众的眼前利益和经济利益,不代表群众的长远利

益和政治利益。他们的观点自然也是错误的。

我们必须在党内经常从两条战线上开展斗争,反对“左”右偏向,克服地主、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并且在这种反偏向的斗争中锻炼自己的思想。这样,我们才能正确地掌握阶级路线,做好城市工作。

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

(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五日)

一 东北经济

东北经济在彻底消灭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取消帝国主义在东北的经济特权以后,基本上是由五种经济成份所构成,这就是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小商品经济(尚有小部分自然经济,因意义不大,故略)。正确地认识这五种经济的性质、地位、发展方向及其相互关系,是正确地决定东北经济政策的出发点与基础;也只有从此出发,我们才能在经济战线上把握住正确的路线,实现无产阶级对于社会经济的正确领导。

二 国营经济

东北的国营经济,由于东北过去的特殊历史条件,比

* 这是为中共中央东北局起草的文件,曾经中共中央修改和肯定。

较中国的其他地区都要发展，所有大的企业，差不多全部都掌握在国家手中，如铁路、电气业、煤矿、铁矿、航运、邮电、金矿及其他各种矿山、林业、化学工业、纺织工业、造纸业、盐业，以及银行、对外贸易、国营农场、大的贸易公司等，无不掌握在国家手中。这种国营经济，在东北的总生产量中虽还未占有绝对大的比重，但已占有很大的比重，并掌握了社会经济的命脉，居于国民经济的领导地位。特别是在东北城市工商业中，国营经济的这种领导地位更加明显。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国家所经营的这种经济，已经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这种国营经济，是当前支援人民革命战争，争取胜利的最主要的物质力量；是城市无产阶级同乡村农民在经济上结成联盟的依据；是新民主主义政治的主要的经济基础；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支柱；是无产阶级在经济战线上反对投机操纵，和资本主义进行经济竞争的最有力的武器。这是国家最可宝贵的财产。它的发展前途是无限的。因此，我们对它必须特别关心，使它获得一切可能的发展，把它放在国民经济建设的最主要的地位，尤其是工业中的重工业与军事工业应当如此。我们必须节衣缩食，用一切方法挤出资金来，以恢复与发展国营经济。任何轻视或忽视恢复与发展国营经济的观点，任何把恢复与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放在国民经济建设第一位的观点，都是错误的。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如果不去有意识地掌握这一国家经济的命脉，

不去用一切可能的和正当的方法并在一切方面强化这一经济力量，它将会遭受不可补偿的损失，以至最后的失败。当然，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国家所经营的这种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的经济是处于对立地位的，它和私人资本主义发生经济竞争是不可避免的。这种矛盾，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在彻底消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以后，新民主主义社会中的基本矛盾。在这个矛盾上的斗争，特别是在这个矛盾上的长期的经济竞争，将要决定新民主主义社会将来的发展前途，到底是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抑或过渡到普通资本主义社会。

但是，国营经济在目前还有很多缺点，除开战争状态在经济上所造成的各种破坏与困难而外，目前我们还很不善于经营管理经济事业，有不少的经济单位是管理得极坏的，以至经常赔本。此外，由国家有计划地合理地去集中统一管理一切国营企业也还不够，许多企业仍然是各自为政地去独立经营，在各个国营企业之间，存在着严重的无政府状态，因而就更加造成市场上的无政府状态与混乱。由于我们在经济建设中的路线还不够具体与明确，有许多同志还常常用一种旧的资本主义的办法，或者用官僚资本主义的办法去经营与管理国营经济，因而就使国营经济不能很好地领导市场，领导整个国民经济，服务于人民大众。因此，我们必须用心学习管理经济，必须由国家统一集中管理一切国营经济。一切国家经济机关，

必须在统一的法律、制度和计划之下,在一个统一的领导机关的指挥之下,去进行经营管理,首先消灭自己的无政府状态,并与市场上的无政府状态进行斗争。为此,就必须由国家颁布严格的法律,规定严格的制度,建立强有力的统一领导机关,并按各个产业系统,实行适当的分工,建立各种公司与托拉斯,在统一领导之下去进行分别的经营。原料的供给,工人、职员雇请,成品的运销,流动资金的调剂等,都应建立专门机关统一管理,并须适当地规定各个地区各个时期收买原料和推销商品的统一的价格政策,不许各个国营企业用不同的价格到市场上去竞争。国家银行必须普遍发展其促进生产、稳定市场的社会业务。除国家总的银行外,还必须建立工业、农业、商业、交通、储蓄等各种专业银行,去分别进行各方面的银行业务。如此,就会使所有的国营企业,在统一的计划之下去经营。如果再经过合作社系统,去结合广大的小生产者,在国营经济的领导之下,并用国家资本主义的方法,把一部分私人资本也吸收在国营经济体系之内,就使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国家有可能把整个社会和国家的经济加以组织,使它成为有计划的经济,避免资本主义经济的无政府状态和恐慌。

三 合作社经济

东北的合作社经济,在生产与供销(消费)方面已经

开始,但还只是在开始。

现在的合作社,主要的是农业生产中的劳动互助组织,即毛主席所说的“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私有财产基础上)的集体劳动组织”^[385]。它们在东北农村中虽较普遍,但其中的问题还很多。在城市中还有手工业合作社,但为数极少。供销合作社(或消费合作社),在城市中虽有,但大部等于合股小商店,并未真正起合作社作用,在乡村中则还很少。

我们认为,把小生产者(主要为农民)组织在劳动互助组一类的合作社中的工作,今后必须严格根据自愿和两利的原则,使之继续发展。这种合作社可以提高生产力,以增加生产品,增加小生产者的财富,养成小生产者的劳动互助的习惯,给将来农民的集体化准备若干有利条件。但把一切小生产者和劳动人民组织在供销合作社中的工作,今天更必须引起我们的严重的注意。只有生产合作社,而没有供销合作社,则在小生产者与国家中间,还缺乏一条经济的桥梁和一根经济的纽带,把小生产者与国家在经济上结合起来,把小生产者的生产合作社与国家的国营经济结合起来。反之,如果我们在农村中、城市中普遍地有了供销合作社,国家就可以经过这种合作社去和小生产者在经济上直接结合起来。国营经济生产的日用必需品及手工工具、农业用具等,可以经过供销合作社合理地分配给小生产者;农民、小手工业者的各种生产品和原料,国家也可以经过供销合作社去有计划地收

买,然后由国家配给各工厂,或出卖,或出口。这样,国营经济可以得到丰富的原料、粮食与各种生产品的供给,掌握着充足的物资,去进行生产分配与出口,去同各种破坏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投机操纵作斗争,而小生产者又可有计划地出卖他们的生产品,用他们的生产品去交换他们所需用的各种必需品,免除商业资本家的中间剥削。国家同小生产者经过供销合作社的这种经济结合,自然更会刺激小生产者的生产积极性,因而就能进一步地推进农民和小手工业者的生产合作社的发展。

很明显,如果没有广大的供销合作社为桥梁和纽带,把小生产者与国营经济结合起来,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就无法在经济上对于千千万万散漫的小生产者实行有力的领导,就不能顺利地进行新民主主义的国民经济的建设,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就会去领导千千万万的小生产者,而使无产阶级领导的国营经济无法施行对于国民经济的领导。

必须了解:无产阶级在领导农民起来消灭封建制度的时候,用一种直接的革命方法即行政手段就可以达到目的,但要在经济上去领导农民小生产者,要使千千万万的农民小生产者依照无产阶级的计划去进行生产,并在将来要使他们走向社会主义的前途,采用这种行政手段,将是完全不中用的,而且是很危险的。无产阶级必须采用农民小生产者所能接受的经济上的办法,才能在经济上组织与领导农民小生产者。这种经济上的办法,就是合作

社,就是供销合作社、生产合作社以及将来的集体农场等。而目前农村中的供销合作社,则是在经济上指挥农民小生产者的司令部,是组织农村生产与消费的中心环节,是土地改革后在经济上组织农民与小手工业者最主要的组织形式;没有这种供销合作社,我们就不能在经济上去组织领导和指挥千千万万的农民小生产者。因为农民小商品生产者是靠市场的,他们在过去不能不依赖残酷剥削他们的商人,而今天他们就可以也有权利指望依赖无产阶级领导的不剥削他们的供销合作社,去进行他们的小商品生产。如果无产阶级能够在这方面给予他们满意的帮助和领导,他们自然会跟无产阶级一道前进,否则只有去依赖商人,并跟着资产阶级前进。因此,我们必须抓住这一个中心环节,依靠供销合作社作为我们目前的主要手段,去推进农民小生产者的生产事业,并在经济上实现对他们的领导。

由于国家政权在东北比较集中,交通便利,人民日用必需品如油、盐、布、煤、木材、火柴、部分粮食等,主要地是掌握在国家的手中,所以普遍地建立供销合作社的物质条件,是十分有利的。供销合作社应当是城市和乡村的一切劳动人民群众的普遍的经济组织。它的任务,应该是以尽可能公道的价格供给社员所需要的生产资料(例如工具、原料)与生活资料(例如粮食、煤炭、油、盐、布匹等),收买社员所生产的商品(例如农民多余的粮食、棉花,手工业者的成品),再运销出去或卖给

国家，免去了商人的中间剥削，从而在经济上为社员服务，保护社员的利益。它必须直接地向国家经济机关及其他生产机关定货，运输到一切社员所需用的地方，卖给社员，又将收买来的各种原料，直接卖给国家经济机关或卖给消费者，而不要经过商人的手，即在广大范围内，在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担负社会分配的任务，代替投机操纵的商人。因此供销合作社，决不当照商人一样去经营自己的业务，决不当贱买贵卖，单纯地以营利及分红为目的，而必须尽可能地作到以比较低廉的价格，出卖必需品给社员，又以公道的价格收买小生产者的产品。这样，才能把千千万万的小生产者及劳动人民巩固地组织到供销合作社中来，否则它就决不能普遍地组织小生产者和劳动人民，并且不可避免地要失败。为了使供销合作社能够巩固地组织千百万小生产者和劳动人民，为了使供销合作社能以比较低廉的价格供给社员必需品，及以公道的价格收买小生产者的产品，除开合作社自己的组织与经营的合理化及克勤克俭而外，国家在资金、税收、运输以及定货诸方面，给合作社以经常的适当的优待和帮助，是完全必要的。而且必须使供销合作社在国家统一的经济计划之下来进行经营，避免合作社与国家经济机关及合作社与合作社互相之间的竞争和无政府状态。供销合作社为了在千百万劳动人民中执行自己这一伟大的经济任务，必须制订自己的统一的章程，规定自己的任务、经营业务的方针、社员的权利

及必须遵守的纪律和义务,以及组织的范围和系统等。政府亦须制订关于合作社的法律,严格保护合作社的财产,保障合作社章程的实行,规定国家税收及经济运输等机关对于合作社的优待,取缔冒名合作社去进行投机操纵剥削人民的一切行为。这种供销合作社,必须有从上至下的系统的组织,有全东北的总社,及各地方的省社、县社、市社、区社、村社和工厂机关学校中的支社,及某些专业的总社和分社,例如盐业、渔业合作社等。在合作社内部,必须实行严格的民主集中制,召开定期的会员大会及各级代表大会与代表会议,并选举各级委员会,由各级委员会任命各级合作社的经理及其他重要办事人,并须严格实行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下级合作社的成立,必须经上级组织的批准,业务的经营则在统一的计划之下进行。我们党则在这种合作社的各级领导机关中建立健全的党组,并应创办合作社运动讲习会,培育大批有能力的干部,给以足够的训练,来作为这种合作社的骨干。必须有一大批懂得马列主义理论,并清楚地了解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具体规律,精通合作社业务和全心全意为劳动人民服务的干部,去领导这种合作社,才能系统地执行无产阶级对于合作社的正确领导路线,把合作社普遍办好,完成上面所指出的伟大社会任务与国家任务,否则这种任务是不能完成的。在这种供销合作社健全地组织起来以后,国家贸易公司的许多商店,就可由合作社来代替,国家商店与合作社商店就可以实行一种适当

的分工,并可根据国家商店与合作社商店的统一计算,了解各地市场的需要和市场的条件,国家和合作社就可以根据市场的确实需要和条件,去计划和指导各种生产事业,就可以使生产适应市场的需要和条件,避免生产上的盲目性和经济危机。但是要办好这种合作社,决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必须是有步骤地有重点地去进行。

我们认为:在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之下的合作社经济,是在各种不同程度上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是国营经济的最可靠的有力的助手。国营经济没有合作社的帮助,它在经济战线上就会是孤立无援的。国营经济只有与合作社经济结合起来,并领导与帮助合作社经济,才能有可靠的经济上的同盟军,才能把千千万万的小生产者吸引到自己一方面,去和各种私人的投机操纵的行为作斗争,同无政府无组织的经济破坏活动作斗争,使新民主主义的计划经济取得优势。而合作社经济也只有与无产阶级领导的国营经济结合起来,并取得国家经济机关的领导和帮助,才能使组织在合作社中的小生产者免除商业资本家的中间剥削,而大家富裕起来;才能使他们在将来从国营经济方面得到各种机器,而进一步地实现生产的集体化(合作化);才能使他们不走资本主义的道路,而是经过新民主主义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

四 国家资本主义经济

这种经济形式,在东北已经开始出现,而且以后还会发展,特别显著的类型如下:(一)出租制:国家把自己现时还无力开发的林场、农场、渔场以至矿场,出租给资本家开发,同资本家订立一定年限的合同,规定双方有利的条件,资本家负责开发、取得利润,国家给资本家以一定的便利条件,并从资本家方面取得一定的租额。(二)加工制:国家配给资本家以原料,订立加工合同,资本家为国家制造成品交给国家,资本家得到一定的利润。(三)定货制:国家向资本家定购一定数量与质量的成品,资本家从此获得一定利润。(四)代卖制:国家给一定的私人商店或公司以成品,由该商店或该公司推销,资本家从中挣得一定的商业利润。在城市和乡村供销合作社大大发展之后,这种代卖制的需要,就会大大减少。现在东北加工制的形式比较发展,其余的形式还在开始。这种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特点,是国家为了经济上的需要,给私人资本家以进行生产或交换的一定的必要条件,而私人资本家利用这些条件,从生产与交换活动中挣得一定的利润,是国家根据同资本家依自愿和两利的原则所订立的合同,对资本家的活动进行必要的管理与监督。这种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方向,对于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是有利的,因为这是从国家需要出发,吸引私人资本来为国家服务,并

把私人资本置于国家的管理与监督之下,使之成为国民经济建设计划的有机的一部分。而且这种经济所需要的资本,一般的不是一个小资本家的资本所能承担,而必须是许多资本家的合资或合股,这可促使小资本向大资本集中,小生产向大生产发展,使国家的管理监督更为便利。

这种经济形式,是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中最有利于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的一种形式,因此,我们应该有意识地承认“国家资本主义”这个经济范畴,有意识地加以提倡和组织,特别是在开始时,还应给以有利的条件,并保证其原料、粮食等的供给以及运输的便利。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它应该成为私人资本主义发展中的有利的方向。

我们过去在这方面还做得很少,还只是被迫地、自发地、无目的地做了一些,我们还缺乏自觉地、主动地去做。在这方面,我们还必须在干部的思想克服许多错误。我们有些干部,对于现在发展一般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常常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甚至过分迁就私人资本家的态度,而对于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形式的经济,则往往采取关门主义的态度,特别对于出租制的国家资本主义。他们宁愿把天然富源荒弃着,不愿给资本家开发,怕国家受损失赔本。他们还不了解:把一切富源开发出来,增加社会的财富,即使用的是私人资本,仍然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甚至可以说是绝对有利的,虽然资本

家取得了一定的利润。在国家无力经营的地方，在私人资本的经营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地方，如果采取排斥私资的政策，那就是错误的。

五 私人资本主义经济

东北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以中小资本家，尤其是小资本家为多。由于战争的关系，目前私人资本主义偏于商业投机及部分军需民用的小机器工业及小手工业方面。较大的私人资本，则一般是向着分散，而不是向着集中。由于目前国营经济的力量还很有限，由于合作经济还不发展，由于战争与人民的各方面的需要，由于自由贸易的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是必然的，在一定限度内还是必要的。凡国营经济及合作社经济力量所不及的地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相当的发展，在生产与交换上都有其一定的建设与积极意义，决不可轻视，决不可以过早地采取限制现时还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办法。同时，由于无产阶级在国家机构中政治与经济力量的强大，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也不是可怕的。我们目前对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方针，就是把必然要发展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引导到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方向，并限制在有利于国计民生范围以内，除把一部分私人资本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上去以外，其他私人资本都应使之战争与人民服务。我们的

各种经济政策，应该做到这样的程度，即是：凡属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都有利可图，因而都能生存与发展；凡属无利或有害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都使之无利可图，因而被迫转业，特别是逼使商业投机资本向工业方面转移极为重要。在国民党统治的旧中国，对国计民生十分有害的商业投机资本，是有极大的膨胀的，几乎全部的银行资本都成为商业投机资本。在城市中的商业资本，常常占到总资本的百分之八十至九十。我们对于社会上这样强大的商业投机资本，不能不采取坚决的办法，迫其转入工农业生产方面。其办法除由国家宣布法律禁止一切操纵国计民生的经营外，必须发展国家商业与合作社商业，在广大的范围内去代替私人商业资本的地位，使商业资本无高额利润可图，才能迫使其向生产方面转移。这就是我们对于私人资本鼓励与限制的标准，也就是联合与斗争的标准。

但一切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即使是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也罢，既然是资本主义，就必然包含有投机和操纵的本质，就包含有无政府无组织的带有破坏性的经济活动，所以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投机性和破坏性的经济活动作斗争，是今后经济战线上的经常任务。只有正确地坚持这种斗争，才能使私人资本向着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方向发展，减少它的破坏性，增加它的建设性。但是这种斗争是一种长期的经常的斗争，而且主要地是在经济上的和平竞争，而下应该不适当地采取行政上的办法去进行这种

斗争。

当然,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东北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今天已经落后于国营经济,将来还会落后于合作社经济,其比重今天还不算是很大的。但是我们决不能因此就轻视它的作用与意义,尤其是因为它在小商品经济中有着深厚的根源。因为小商品经济,照列宁的说法,是每日每时生长着资本主义的^[386],它在将来还会要发展。因此如果我们放任私人资本主义自流地发展,则私人资本会经过自由贸易去联合小生产者,而发展生产与交换中的商品的资本主义所固有的无政府、无组织的经济活动与投机操纵,来破坏新民主主义经济的计划性,而使整个国民经济向着资本主义的方向发展。

因此,为了使私人资本不起这种有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的作用,而且还要使它成为国营经济在组织小生产者的合作事业中的一个帮手,我们对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必须适当地加强国家的管制与监督。对私人资本主义的放任自流的态度,在根本上是很危险的,也是很错误的。

至于一般的私人资本家在我们的管制与监督之下如何去投资发财,那是用不到我们去给他们一个个操心的。他们在这方面确实比我们有更多更丰富的经验。相反地,在合理生产的技术方面,在经济核算方面,我们还应好好地向资本家学习。

六 小商品经济

这种经济主要地是农民和小商品经济。在东北国民经济中,它在数量上还占优势。斯大林说:“农民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经济。农民经济按绝大多数农户来说是小商品经济。小商品农民经济又是什么呢?它是站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间的十字路口的经济。它既可以向资本主义方面发展,象现在资本主义国家里的情形那样,也可以向社会主义方面发展,象在我们国家里,在无产专政条件下一定要发生的情形这样。”接着斯大林解释农民经济“这样不稳固”、“这样不独立”的原因时,又说:“原因在于农民经济散漫,无组织,依赖城市,依赖工业,依赖信用系统,依赖国家政权性质,最后还有一个大家知道的原因,即无论在物质方面,还是在文化方面,农村都是跟着城市走,而且一定是跟着城市走的。”^[387]

显然的,这种小商品经济在无产专政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也是会要发展到社会主义方面去的。这已经在东欧的许多新民主主义国家里得到了证明,而且在经过比东欧各国更长的过渡时期以后,也将在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得到证明。但正是由于我们这里是国营经济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同时并存,所以小商品经济向着社会主义方面发展,还要经过比较长期的教育与斗争过程。

我们对于小商品生产者(主要为农民),现在要用一切方法去巩固他们的私有制,在他们个体的私有经济的基础上,鼓励他们的生产热情,使他们努力生产,发家致富。象我们在前面所说,根据于小生产者自愿和两利的原则,把他们组织在各种合作社里,不但不应动摇他们的财产私有制,不但不违反他们发家致富的要求,而且正是为了使他们更能迅速地改善他们的生活,使他们发家致富。这种合作,对于小生产者本身是很有利的。但是,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强调:

第一、小生产者的这种合作,是以他们的个体私有经济为基础,是以落后的手工业技术为基础,它还不是苏联那样的集体农场。要使中国的农业走向社会主义,当然必须实行集体农场制度。但是,这在中国的条件下,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是做不到的。这必须经过许多准备步骤,主要地是由国家供给新式的农业机器,并为农民所乐于采用,方能做得到。

第二、因为小生产者的这种合作,是根据于“等价交换”、“按劳得值”的两利原则,因而在合作的小生产者内部,是必然会由于勤劳程度的不同而存在着贫富不齐的现象。

第三、因为这种合作社是根据于自愿原则,小生产者可以而且应该有完全的自由加入或退出合作社,因而除已经组织起来的小生产者外,独立的无组织的小生产者的存在,也是必然的,而且甚至会是很的。

由于以上情况,因而在发展小商品经济的过程中,在农民小生产者内部的某种程度的分化,将是必然的与不可避免的。少数的农民小生产者,在今后将会上升而为富农或小资本家,另一部分农民小生产者,则会下降而为贫农雇农、为半雇佣或全雇佣的劳动者。这是社会生产力向上发展的必然结果,用不到害怕的。只要我们坚持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我们可以并且能够经过发展合作社的道路,使大多数农民小生产者都上升为富裕的农民,或富裕的手工业者,而不去重抄旧资本主义时代少数人上升为富农资本家、大多数人陷于穷困与破产的悲惨境地的老路。但是要经过长期的斗争过程,充分发扬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力量,克服各种阻力,才能取得确定的胜利。

在小商品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将必然会发生在农民小生产者中争取影响与争取领导权的斗争。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经济,将要一切方法,把农民小生产者组织在供销社的与生产的合作社内,使之与国营经济结成巩固的联盟,以利于他们走向社会主义;资产阶级则将在一切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的残余的协助之下,用一切力量去争取农民小生产者,使之向着资本主义的道路发展。而农民小生产者呢?他们是劳动者,因而只要我们在政策上不犯错误,他们是愿意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组织起来向合作经济的方向发展的。但农民小生产者同时又是小部分生产品的出卖者,因

而带有或多或少的小商人的投机性,这就造成了资本家商人争取他们并与他们合作,来反对国家对于商品的资本主义进行管理 & 监督的可能性。这种发展的危险性,是我们必须清楚看到并加以防止的。

如前所述,资本主义的力量,不仅在于资本主义经济本身,而且也在于小生产者的商品经济。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归根到底是在于使资产阶级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上从小生产者(主要为农民)中孤立起来,并使农民小生产者处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而要做到这一点,特别要使农民小生产者在经济上也处于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即使把他们组织到合作社之后,小生产者们原有的那些弱点,例如无组织性、散漫性、动摇性、投机性、极端自私性、偏狭性等,还会在合作社内部同无产阶级的领导进行或大或小的对抗。如果无产阶级的领导缺乏坚定性,如果在无产阶级的领导集团内部缺乏铁的纪律,而向着那些小资产阶级的弱点投降,那么合作社也就会要变质,而向着资本主义的方向发展。显然,资产阶级是会利用一切方法使合作社变质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在小生产者中争取影响的阶级斗争,在合作社内部还会长期地存在。

所以,无产阶级对小生产者的各种弱点进行必要的斗争与教育,并加以克服,实是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不可分离的部分。这种斗争,不但在合作社内,而且在国营经济内,在共产党内,在人民政府内,是同样存在着的。而

要克服小生产者的这些弱点,如果采取行政的强迫命令的办法,那是一定会失败的,只有采取毛主席所指出的“耐心说服,典型示范”^[388]的办法,才能生效。这也就是斗争的困难与曲折之所在。所以,无产阶级必须有极大的容忍性。但是我们相信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的胜利与国营经济的发展,以及国际国内其他各种有利于中国无产阶级的因素,还是会保证中国人民在这一斗争中的最后胜利,使小商品经济最后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农民手工业者,在前进的道路上,根据其切身经验,会最后地了解到:只有合作社化,只有把合作社同无产阶级领导的国营经济结合起来,才能使小生产者免于分化,免于少数人上升为资本家,而大多数人沦入贫穷与破产的境地。也只有如此,小生产者的私人利益与全体人民的公共利益,才能真正结合起来,并使这种小生产者的私人利益,服从于人民群众的公共利益,而最后走向社会主义。

七 东北经济建设 中的阶级路线

以上所述,就是东北经济构成的具体内容。一般的说来,所有上述的五种经济成份,现在都应加以发展,但在发展中,我们在经济政策上必须实行一条明确的无产阶级的领导路线。这条路线应该是:以发展国营经济为主体,普遍地发展并紧紧地依靠群众的合作社经济,扶助与

改造小商品经济,容许与鼓励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尤其是国家资本主义经济,防止与反对商品的资本主义经济所固有的投机性与破坏性,禁止与打击一切有害于国计民生的投机操纵的经营。这条路线是无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中所必须力争其实现的。只有实行这条路线,才能顺利地发展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加强新民主主义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并为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开辟道路,以便将来能够顺利地不流血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反之,我们如果把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等同于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如果把一切希望寄托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向资本家的要求表示无原则的让步,向小资产阶级的弱点表示投降,那我们就不能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不能加强反而削弱新民主主义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而在实际上则是建设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那时,我们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也将因为缺乏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基础而不能巩固与持久,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也必然将会因此蜕化而为旧民主主义的政治,而这在实际上就必然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统治的复辟。这条路线是在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中放弃无产阶级领导地位的小资产阶级的路线,这是我们应该坚决反对的。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中这两条路线的斗争,因而有意识地在我们党内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反对在每一个具体的经济建设问题上的左右摇摆。

我们只有根据这一条无产阶级的正确路线,才能制订出明确的经济建设计划,减少盲目性,减少自发性,少走弯路。因为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特点,正是在于它具有明确的计划性,正是在于它能以明确的经济计划去适当地布置我们的人力与物力,去动员千百万人民为这一计划的实现而奋斗。

大量提拔与培养新干部^{*}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九日)

全东北的完全解放,在东北党前面提出了许多巨大的新的任务,尤其是经济建设的任务。这使我们工作的范围愈来愈广大了,使我们工作的性质愈来愈复杂了,因而我们需要的干部也就愈来愈多了。于是到处感觉到了“缺乏干部”、“没有干部”的困难。干部的需要与干部的供给之间,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如何正确地解决这一矛盾,已经成为我们工作前进道路上的一个严重问题了。

从关里补充老干部的希望,早已没有了。由于全国革命的巨大胜利,由于全国革命局面的很大开展,我们不但不能希望从关里派来老干部,相反地,我们还有准备从东北抽调出大批干部到关里去帮助新收复区建立新解放区的任务。在老干部方面,我们目前只能做到加强对他们的教育,提高他们的质量,进一步发挥他们的力量,并在各个部门中间加以适当调整,把他们的力量使用在最主要的方面。但这并不能解决干部缺乏的困难,是很显然的。

^{*} 这是为中共中央东北局机关报《东北日报》主持起草的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九日社论。

老干部的数量是如此有限,企图在老干部的圈子里解决干部缺乏的问题,是没有希望的。

只有大量提拔与培养新干部,才是解决干部困难问题的主要方法。今天没有成千成万的新干部来担负各方面的负责工作,我们就不可能完成新形势在我们前面所提出的新任务。当然,在提拔与培养新干部方面,我们过去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也有很多成绩;但是,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还是做得很不够,尤其在今天迅速开展着的新形势前面,更加显得不够了。而党内某些老干部中存在着的对于新干部的一些不正确的认识与不正确的态度,却常常束缚着他们的手脚,使他们在大量提拔与培养新干部的道路上,不敢迈步前进。因此,为了大量提拔与培养新干部以适应于今天新形势与新任务的需要,对于那些不正确的思想与态度,实有加以指出的必要。

有些担负领导工作的老干部,当他们提出干部缺乏时,在他们的心目中往往只看到为数很少的老干部,而不看到大量存在的新干部。他们不了解,三年来东北形势的顺利发展的过程,和我们工作的扩大与深入的过程,就是东北新干部从群众中大量涌现出来的过程。政治形势愈是对我们有利,群众运动愈是扩大与深入,在工人、农民与知识分子中愿意为革命服务的人,从群众中涌现出来有才能的人也就愈来愈多。新任务的提出,同时也提供了解决新任务的干部条件。正象马克思所说,“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

中的时候,才会产生”^[389]。这在干部问题上,显然也是如此。

无疑地,老干部曾是建立东北根据地工作中的领导者与骨干,而且今后还是如此。但如果没有成千成万新干部帮助与支持老干部,东北根据地的建立也是不可设想的。事实上,在前方与后方,在农村与城市,在各个战线与各个方面,在少数老干部领导下到处活跃着、战斗着、工作着的大多数干部,不正就是新干部吗?在东北根据地的建设中,新干部同老干部一样,是有很大功劳的。新干部与老干部,正象“车之两轮”,缺一不可。如果我们看不见这成千成万的大量新干部的存在,对他们的作用估计不足,就会使我们在干部问题上片面强调老干部而忽视新干部,就会使我们在解决干部困难问题上,老在老干部中打圈子,而找不到正确的出路。反之,如果我们除了少数老干部之外,还看到这大量新干部的存在,那我们就会知道如何从提拔与培养新干部中去解决干部的困难问题了。现在不是没有干部,现在有的是干部,只是要我们去大量提拔与培养而已。对干部困难问题,表示束手无策与悲观失望的情绪,是不正确的,是不合于当前的实际情况的。

还有些担负领导工作的老干部,当他们提出干部缺乏时,往往只看到老干部的优点,而没有看到新干部的优点,因而往往偏于信任老干部,而不够信任新干部。当然,信任老干部是应该的,看到老干部的优点,也是对的。正

象斯大林所说的,老干部“有年轻干部所没有的东西:丰富的领导经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性锻炼,业务知识,明辨方向的能力等”^[390]。这自然是老干部的优点,虽然这种优点,在具有不同长短的斗争经历的老干部中也不是一样的。至于新干部,正因为他们是新干部,所以暂时还不可能具备老干部的那种优点,要具备那些优点,还须在今后工作中继续加以培养与锻炼。但是新干部也有新干部的优点。这正如斯大林所说的,“他们对新事物有足够的敏感,而这是每个布尔什维克工作者宝贵的品质”^[390]。同时还应该看到,东北新干部较之关里来的老干部更为熟悉当地的情形,他们与当地群众有更密切的联系。他们在工作中有高度的热情与积极性,他们有刻苦耐劳的精神。新干部的这些优点,是我们应该充分看到的。因此,只要我们老干部能很好地领导他们,大胆地去提拔与培养他们,信任他们,给他们以更多负责的工作,他们就会很快地学会革命的新知识与革命的新经验,他们就会很快地向前进步,而且会很快地赶上老干部,成为老干部的有力助手与接替者的。甚至在有些地方,有些工作部门,他们还会比某些老干部进步得更快,不仅会赶上,而且还会超过。因为不幸的是,在老干部中,有些人还背着包袱,摆老资格,自以为是,固步自封,缺乏对于实际生活中新事物的知觉,因而不能进步,不能发展,结果不能不在前进道路上掉队落伍。所以斯大林曾经严重地警告过老干部,“丧失对新事物的感觉”是老干部的“很严重

很危险的缺点”^[390]。所以我们目前也必须着重加强对老干部的理论的、政策的与策略的教育,把老干部提高一步,使老干部不愧为新干部的领导者。

毫无疑问,我们应该欢迎与帮助新干部的迅速上进,欢迎他们赶上老干部,甚至超过某些不愿进步的老干部。对于妨碍工作进步的某些顽固不化、傲慢自大的落后的老干部,应该毫不迟疑地调换他们的工作,让优秀的朝气蓬勃的新干部去接替他们。这对于革命的工作,只有好处。任何压制新干部上进、害怕新干部上进的思想与行为,都是应该反对的。因为这不但不是解决干部问题,而且是在解决干部问题之前预先堵塞死解决干部问题的大门。

有些担任领导工作的老干部,他们不敢提拔新干部的主要理由,是说新干部提拔早了,怕他们在工作中犯错误,使工作受到损害。这种顾虑是似是而非的。因为事实上,现在已经不是对新干部提拔过早的问题,而是要及时提拔的问题了。三年来,在东北战争与土改的巨大革命浪潮中所涌现出来的大批新干部,已经经过了相当的锻炼与培养。在这一基础上,大量地进一步地提拔其中的优秀分子,现在已经是时候了。现在已经不是等到哪年哪月把新干部锻炼好了,培养好了,再来提拔的问题,而是立即在过去锻炼与培养的基础上加以提拔,再在提拔之后继续加以锻炼与培养的问题。难道在老干部中,曾经有过谁是预先锻炼培养得十全十美,然后才被

提拔的吗？这是没有过的，也不会有的。如果那样，我们就一辈子也解决不了干部问题。至于新干部，在新的工作岗位上会在工作中发生错误与缺点，那是一定不能避免的。只要我们老干部对于新干部在工作中的错误与缺点有正确的态度，那么这些错误与缺点，反而能用来教育新干部与提高新干部。

这里要提起所有老干部注意的，就是对于新干部必须在工作中进行耐心的教育工作，既要奖励他们工作中的成绩优点，又要指出他们工作中的错误缺点，并告诉他们如何发扬成绩优点，如何纠正错误缺点。平时只知道使用，不知道教育，一见工作中有了错误，也不加教育，就一脚踢开的办法，都是不对的，是一辈子也培养不出新干部来的。过去在平运^[368]中对新干部所采取的“搬石头”、“跳圈子”^[391]的办法，都是错误的，今后再不能重复。今后在大量提拔新干部的过程中，我们老干部不但不应放弃教育新干部的责任，而且更应加强我们对于新干部的教育工作。培养新干部是一件需要极大耐心的细致的工作，又是最有意义、最有结果的工作，决不能粗心大意，马虎从事的。如果我们今后在党内外能够很好加强对于新干部的教育，正确地发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用各种方法密切干部同群众的联系，我们相信，新提拔起来的干部，一定会很快进步，对于他们所负担的工作也一定会胜任愉快的。

应该克服一切忽视与轻视新干部、不敢提拔新干部

的偏向,真正做到这次东北局高干会^[392]的决定,在最短时期内使区级职务都由新干部担任,使县级职务除县长、县委书记、公安局长及少数县委部长、个别县府科长外,也由新干部来充任,并在各种工作部门中增设由新干部担任的副职,给新干部以学习的机会。同时根据东北局决定,在各省县市大规模地开办党校、训练班、专门学校,大批地培养新干部,把他们提高一步,使他们能担负更多的工作。只有如此做去,我们才能真正按照东北局的决定,把大批的老干部抽调出来,派到新收复的城市与新收复的地区去做领导的工作。否则干部困难问题,我们就无法解决,我们也就无法完成新形势向我们提出的新任务。

关于发展农村 供销合作社问题^{*}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一、东北全境解放,即将彻底消灭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取消帝国主义的经济特权。此后,东北经济的状况是这样的:在城市主要是掌握了社会经济的命脉、居于一切经济领导地位的无产阶级领导的国营经济,在乡村主要是数量上还占优势、大量存在的农民小生产者的小商品经济,处在这两种经济之间的则是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今天以前,国营经济经过自己的贸易机关与国营商店,购买了农民一部分生产品,也供给了农民一部分必需品,但农民必需品的买进与生产品的卖出,大部分仍仰给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商业资本,同时国营经济的产品推销与原料购买,其中不少一部分也仍指望于商人。这种国营经济与农民小商品经济缺少密切联系与两者没有互相适应的情况,就给予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主要不是向着工业农业生产方面发展、而主要是向着商业方面发展的可能,有利于私人商业资本在市场上的投机操纵,使物价

^{*} 这是为中共中央东北局主持起草的决议草案。

波动,金融不稳,既使国营经济的发展受到破坏,又加给农民以高额的中间剥削,于国于民都是有害的。因此,为了巩固和发展国营经济在国民经济建设中的领导地位,为了发展和改造农民小商品经济,就必须在农村中普遍地建立供销合作社,以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国营经济对千千万万农民小商品经济的联系和领导。合作社经济的建设,现在已成为东北全党今后经济建设中心仅次于国营经济的重要任务,而对农村的一切党组织,合作社经济的建设则是它们的头等任务。目前东北农村的合作社经济中,具有农业生产合作社性质的劳动互助,经过土改后今年生产运动的进行,已有初步开展,对今年的生产运动起了很大作用。当然问题还很多,强迫命令的现象曾经很严重,今后必须严格根据自愿和两利的原则,加以改进,使之继续发展。但是建立供销合作社的工作,除个别县份(如吉林汪清)有较好的成绩、少数地区已开始注意并着手培养典型外,绝大部分地区党政的领导还没有引起严重的注意和树立正确的认识,也还没有着手培养典型,取得经验。因此全党对这个工作必须给予重大的注意,必须抓紧这一工作,必须普遍地把供销合作社建立起来。我们应当懂得:办好农村供销合作社,与提高农业生产技术,发展农业生产互助,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必须把适当时机建立东北供销合作总社及各省社、加强合作社领导这一自上而下的方法,与各个县区有重点有步骤地建立基层合作社这一自下而上的方法结合起来。老停在典型试验

或典型培养,而不及时适当普遍推广的小手小脚的方法,则是错误的。

二、合作社的历史任务,是在经济上巩固工农的联盟,使农民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下,经过新民主主义的道路,走上社会主义。合作社的方针应当明确规定为为群众的供销和生产服务。发展合作社的道路,必须遵守“从供销到生产”的规律,必须遵守列宁在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关于合作社的指示:“农业发展的道路,应该是通过合作社吸收农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逐渐把集体制原则应用于农业,起初是农产品的销售方面,然后是农产品的生产方面。”^[393]我们的同志应当了解供销合作事业的巨大重要性,而不应有重农轻商的观点。应当了解在小商品经济的范围内,商业是可以控制农业甚至破坏农业的。只有合理的商业的发展,才能使农业有合理的发展,而这种合理的商业就是供销合作社。由于封建剥削的消灭、东北的全部解放与工业的发展,农业品必然大量地商品化,农民为了发展生产,必然提出合理解决供销的迫切要求。很显然,这个要求的满足,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消灭了封建剥削的农民,是有权利不指望于剥削他们的商人,而指望于不剥削他们的供销合作社的。因此,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村供销合作社必将日益成为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农村商品生产的指挥机关。我们必须使供销合作社成为组织农村生产与消费的中心环节,成为土改后在经济上组织农民小生产者最主要的组

织形式,用它去推进农民小生产者的生产事业,用它去保证社员利益,免除商人剥削,并在经济上实现对千千万万农民小生产者的组织和领导。随着合作社对农民供销问题的解决和供销合作社的进展,必须使合作社及时与适当地进行组织副业、扶助农业等工作,以使集体制的原则,逐渐能由供销方面进到农业产品的生产方面;同时,合作社供销与生产事业发展以后,又必须及时与适当地使合作社的事业向着运输合作、手工业合作、信用合作、文化卫生合作及社会事业合作诸方面展开起来,使农村合作社成为综合性的合作社。

三、在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的合作社经济,是国营经济和千千万万农民小生产者经济联系的桥梁和纽带,是国营经济领导小商品经济最可靠的有力助手,是国营经济在经济战线上同一切投机操纵与经济破坏进行斗争的最可靠的同盟军。在农村中普遍地首先建立起健全的供销合作社以后,国营商店与合作社应当实行一种适当的分工,国家经过这种合作社和农民小生产者在经济上结合起来,国营经济可以经过它供给农民所需要的各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同时又经过它去收买与运销农民的各种生产品,使国营经济可以有保障地得到各种丰富的原料、粮食与农业生产产品的供给,而农民也可以有计划地把他们的生产品去交换他们所需用的各种必需品。由此,既巩固了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又免除了商人资本家对农民的中间剥削,使农业生产力

和农村各种副业得到提高和发展。因此在合作社经济建设过程中,国家必须在资金、税收、运输以及定货诸方面,给合作社以经常的、适当的、有区别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优待和帮助,一切国营经济机关都应当扶助合作社,特别是商业部和各地贸易局应当把扶助合作社的正当发展看做自己的基本任务。这种扶助,首先就是要比较廉价地供给合作社以农民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并销售合作社从农民中收买来的产品。其次,必须给合作社以国家统一经济建设计划的指导,以及给合作社以政治方向的领导。政府并须制定关于合作社的法律,严格保护合作社的财产,保障合作社章程的实行,规定国家税收及经济运输等机关对于合作社的优待,取缔冒名合作社进行投机操纵剥削人民的行为。合作社则必须接受国家统一的经济计划与政治方向的领导与帮助,必须与国营经济密切结合,服从国计民生的需要,遵守国家的政策,使合作社成为新民主主义经济整体的一部分,由此使合作社在经营一切业务时,去掉自己的盲目性,加强自己的计划性。必须协助国营经济在经济战线上进行反对一切投机操纵、经济破坏的斗争,必须协助国营经济贯彻无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各种经济政策。所以,在对待合作社问题上,必须反对资产阶级的单纯的企业观点和小资产阶级的片面的群众观点。这些观点都是只看见局部的国家利益或只看见片面的群众利益,而把国家利益与群众利益对立起来的观点,都是片面的错误的观点。

四、合作社经济的建设与发展,必须正确处理 and 资本主义经济的关系。新民主主义国营经济领导下的合作社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关系,是团结和斗争的关系。凡属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合作社应贯彻国营经济对他们团结的政策,使他们都有利可图,因而都能生存和发展;凡属无利或有害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合作社则应当协助国营经济对他们实行斗争的政策,使他们都无利可图,因而使其被迫转业,特别是逼使不事生产的商业资本向工业农业方面转移更为重要。同时,即使是正当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合作社也应协助国营经济容许与鼓励它向着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方向发展,防止与反对这种商品的资本主义经济所固有的投机性与破坏性。因此,供销合作社首先就必须和私人商业资本进行经济的竞争。在此经济竞争中,首先做到使私人商业资本在国营经济与合作社经济的指导下,为农民的供销生产事业服务,然后达到在广大的范围内由合作社来代替私人商业资本的地位。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合作社就必须不同商人一样地贱买贵卖,不应以剥削社员和非社员群众从而单纯地以盈利及分红为目的,相反地必须做到以比较廉价的工具和商品供给农民,又以公道的价格收买和运销农民多余的粮食和原料及副业生产品。为此目的,合作社除应得到国家各方面的优待与帮助外,必须使自己的组织与经营合理化,必须克勤克俭,设法减低成本,加速周转。特别重要的,是不要把收买生产品与出卖必需品的价格问题,当作

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来处理,而应当作联系群众、区别自己与商人,因而决定经济竞争中成功或失败的政策问题来处理。应当懂得,这是合作社和私人商业资本之间长期的经常的斗争之主要内容和表现。这主要地是经济上的和平竞争,企图采用不适当的行政的办法来进行这种斗争,是错误的,也是危险的。决定合作社和商人经济竞争成败的另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即合作社必须树立联系群众的作风,必须反对官僚主义的恶劣作风。合作社在经营自己的一切业务时,必须做到平易近人,群众称便。合作社的一切规章制度,均应以利于群众、服务于群众为归宿。合作社必须深刻体会群众情绪、群众利益、群众要求,一切问题的处理都应从群众出发而又以群众为归宿。这就必然会把一切事情办好,必然会得到群众衷心的拥护与广泛的支持。容许官僚主义作风在合作社内部的存在和发展,则必使合作社在和商人的经济竞争中完全归于失败,必致合作社于死命。这是必须时刻警惕、经常认真反对的一种危险倾向。

五、新民主主义的合作社经济,是以个体的私有财产为基础的合作社经济,所以必须遵守自愿和两利的原则。不能强迫入股,禁止摊派股金。合作社不应限制社员对股金处理的权利,每个社员都有随时入股随时退股的自由。除被剥夺公权者,也不应限制社员资格,各阶层人民都可加入,机关社团也可加入。在入股方法上,也不一定要用现金入股,一切实物与劳力都可入股,使群众称便。在分

红方法上,在今天农村经济文化条件下,不可能实行按消费能力的分红办法,而以按股分红为便利。但在政治上,则不论股金多少,任何社员都只能有一票权利,以保障合作社的领导权掌握在贫雇农和中农的手里。

合作社在经营一切业务时,必须反对平均主义思想的影响。合作社必须规定社员的权利和义务。合作社的文化卫生与社会事业,应使社员享有区别于非社员的优待。合作社放款该当有息,社员存款应当有利,反对放款无息存款无利的现象。应当明确规定借贷赊垫和信用等制度,应当计算成本,巩固资金。为了在物价波动中不使合作社与社员受到损失,可以实行股金折实,与实物核算。

合作社为了在千百万劳动人民中执行自己伟大的经济任务,必须反对合作社与国营经济机关和合作社与合作社之间盲目竞争等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必须进行自己有系统的组织建设的工作,必须制定自己的统一的章程,规定自己的任务、经营业务的方针,以及组织的范围和系统等。合作社必须有从上至下的系统和组织,全东北要有全东北的合作总社,各地方要有省社、县社、市社、区社一直到村社等。在合作社内部,必须实行严格的民主集中制,召开定期的社员大会及各级代表大会与代表会议,选举各级委员会,由各级委员会任命各级合作社的经理及其他重要的办事人,并须严格实行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的原则。下级合作社的成立,必须经上级组织的批

准。一切不好的合作社,必须进行改造。业务的经营,则在统一的计划之下去进行。实行这些办法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合作社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也是为了发展合作社内部的民主生活,加强社员对合作社干部的监督,使合作社的领导骨干与群众有经常密切的联系。我们党则应在合作社各级领导机关中建立健全的党组,以加强党对合作社的领导。

六、为了加强党对合作社的领导,党必须把大批最好的干部和党员送到合作社去,使其在合作社内部起核心领导作用。同时党和政府必须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加强干部、提高干部的工作上,及时总结合作社的经验,及时向他们提出问题,指明方向,纠正偏差,巩固成绩。使一切合作社的领导干部清楚了解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发展规律,自觉掌握合作社发展的具体规律,精通合作社的业务,并具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决心和忠诚。我们的干部必须用心学习做生意,但不是学习商人那样如何去剥削农民小生产者,而是学习如何能使他们减轻以至免除这种剥削。为此目的,我们的各级政府与合作社各级领导机关,必须经常举办教育合作社干部的合作学校与各种合作训练班,以培养大批合作社干部。在合作社的领导思想上,必须反对任何的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的倾向,在今天,特别要反对经验主义的倾向。我们的同志应当懂得,我们是在商品经济占了优势,自然经济已被摧毁,封建剥削彻底消灭,工业农业将要很大发展,城市对乡村的领导

作用日益形成,经济上业已联成一个整体的东北做经济建设的工作。如果我们仍然从局部观点或狭隘的地域观点出发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如果仍然坐井观天,只顾眼前,仍然以自己的狭隘经验为满足,拒绝接受一切非“亲身经验”,碰得头破血流而不知悔,那末,任何经济建设上的重大任务,都是不能完成的。只有反对经验主义,加强马列主义理论的学习,我们才能学会从全局观点出发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我们才能掌握合作社普遍发展的规律,而又注意结合当时当地的具体条件,使合作社经济建设的任务得以顺利完成。

关于农村供销合作社赢利 分红等问题的意见^{*}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四日)

农村供销合作社不应专以赢利分红为目的,而应把为社员群众的消费事业与生产事业服务、免除商人的中间剥削作为自己的基本方针,这似乎是没有争论的。但如果把合作社为群众服务与合作社的赢利分红对立起来,似乎为群众服务就不能赢利分红,赢利分红就不能为群众服务,因而特别强调反对合作社的赢利分红,那末我们认为这种提法与看法是不妥当的。

对于目前的合作社与合作社的赢利分红问题,应当进行分析。有的合作社确实做到了为群众服务,但也确实赢了利、分了红。同时也正因为贯彻了为群众服务的方针,所以它的赢利分红反而更多。应当说,这是一种好的合作社。这种合作社的赢利分红,是不应当反对的。另外有的合作社,则执行了相反的方针。它不是为群众服务,而是学习商人,跟着商人走,或者剥削群众,或者投机倒

* 这是给中共中央东北局的信。

把,或者违反政策,由此来使合作社赢利分红。这是一种不好的合作社。这种合作社的赢利分红,当然是要反对的。听任这种合作社的自流发展,对国家对人民都是不利的。我们应当采取坚决的态度,改造这种合作社,使之克服错误的方针,采取正确的方针。还有一种合作社,则既不赢利,也不分红,而是赔本垮台。这也是一种迫切需要改造的合作社。

由此可见,问题的本质不是赢利分红问题,而是合作社应当采取一种什么方针的问题。是采取新民主主义的方针,还是采取资本主义的方针,是采取正当的办法赢利分红,还是采取不正当的办法赢利分红,采取新民主主义的方针,采取正当的办法赢利分红,则这种赢利分红是不应当反对的,即使赢利分红愈来愈多,也是应当赞成的。采取资本主义的方针,采取不正当的办法赢利分红,则这种赢利分红是应当反对的,即使不赢利分红,也是应当反对的。赢利分红的本身并不能决定问题,决定问题的是合作社采取什么方针。单是一个赢利分红问题,不能决定合作社的好坏。把赢利分红问题,做为区别好坏合作社的主要标准,是不合实际的。因为好合作社赢利分红,坏合作社也赢利分红,其现象相同,其本质根本相反;而另外一些坏合作社则根本不赢利不分红,同是坏合作社,其本质相同,而现象则相反。近来下面关于合作社情况的反映日渐多了,合作社有些什么毛病,我们知道得也比较具体了。但有些同志为表面现象所迷惑,被某些采取不正当办

法赢利分红的合作社所造成的坏结果吓住了,因而把这种现象夸大化,绝对化,认为合作社的一切毛病,都是来源于“赢利分红”,以为“赢利分红”是合作社“万恶之源”。因此,笼统地认为合作社赢利分红都不好,不论合作社的好坏,赢利分红都一律反对。这是一种片面的绝对观点,应当引起领导机关的警惕,并应在实际工作中加以防止和纠正。

我们不当一概否定一切合作社的赢利分红,而应当正面确定一切合作社都要在贯彻正确方针下取得合理的赢利分红。合作社如果不贯彻为群众服务的方针,一定要脱离群众,一定不能发展,一定要垮台,这是一切地方的经验都证明了的。但是,合作社如果把为群众服务与赢利分红完全对立起来,如果把为群众服务的方针,了解为完全不要赢利分红,这种不赢利不分红的合作社,也同样是要脱离群众,同样不能发展,而且也不能很好为群众服务。显然,合作社为群众服务的方针与赢利分红,不是对立的東西,而是统一的东西。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合作社才能有很好的发展前途。

下面把赢利问题与分红问题分别来谈谈。

首先,是关于合作社的赢利问题。合作社为群众服务的方针,应在自己的业务中求得坚决贯彻,应把自己主要的力量放在解决群众的供销困难,满足群众的供销要求,但同时也应当使合作社在经营自己这种主要的业务时,实行严格的经济核算制度。这就是说,合作社必须用降低

成本、节省开支、扩大营业、加速资金周转等办法，以增加赢利（即合作社利润）。这种赢利的增加，就是合作社的资金积累，也就是合作社为群众服务这一方针在经济核算上的表现。合作社有了自己不断的日益增加的资金积累，就可使自己的业务发展，规模扩大，这样才能巩固与提高自己为社员群众服务的能力，更好地为群众服务，才有力量来组织与扶助社员群众的生产，才有力量来经营文化卫生等社会集体事业。（例如汪清合作社^[394]，如果它没有赢利，前年和去年的春夏是不能以价值十五亿元——吉林全省去年的农贷才二十四亿元——的籽种、粮食、农具、肥料及日用品贷给农民进行生产的，是不能在大规模组织做道木时，给群众大批垫款，以解决群众的困难的。如果没有赢利，则汪清合作社所举办的文化、卫生等社会集体事业，都要成为不可能的了。）尤其重要的，合作社有了不断的日益增加的资金积累，将来才有力量为社员购买新农具，采用农业新技术，提高和改进农村生产的技术，最后结合国家的帮助，为社员采办购买农业机器。这样，才可使农村合作社由低级形式发展到高级形式，把农村供销合作社发展为农村生产合作社。

合作社在贯彻为社员群众服务方针下的资金积累，实质上就是把个体经济引向集体化方向发展，是合作社目前发展和改造农村生产以向着将来集体化方向推移，为将来社会主义农村集体化准备必不可少的经济条件。反对这种资金积累，根本排斥合作社赢利，只是消极主张

“不赔钱”，把合作社为群众服务的方针了解为合作社在经营一切供销业务时只起一个转手的作用，不使合作社在供销过程中取得合理的“赢利”与赚钱而壮大起来。这等于主张合作社把仅有的一点股金倒来倒去，其结果，是使合作社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维持原样，使合作社的发展陷于停顿，陷于萎缩。而另一必然的结果，则是合作社的发展变成对国家的完全依赖。要知道，合作社的发展固然需要国家财政与经济的各方面的极大援助，但如果使合作社在为群众服务方针下，用资金积累的办法，去把千百万的个体经济的微小的力量，汇合成为集体经济的力量，如果不使合作社成为个体经济基础上的集体经济的储水池，光只依赖国家的帮助，合作社是难于完成一个改造小生产者的社会制度的历史任务的。我们不应当害怕合作社的资金积累，理由很简单，合作社有了不断的日益增加的资金积累，它自己既可以更好地为社员群众服务，国营经济也可以因此更有力量，经过与依靠合作社来扩大与巩固其对于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

供销合作社的赢利或资金积累从哪里来？基本上从两方面来。一方面从国家来，即国营经济批发工业品给合作社时，给予合作社合理的利润，本质上这是合作社从城市工人与手工业工人方面得来的利润。另一方面，从社员非社员群众来，即合作社购买农产品副产品时得到的合理的利润，本质上这是合作社从乡村农民方面得来的利润。这里根本的问题，是合作社从这两方面获得利润时，

必须与私人商业资本获取利润有原则性的区别,不能象商人那样追求中间剥削,相反地应当尽量为社员与非社员群众免除所受商人的中间剥削。不是象商人那样,在贱买贵卖中追求超额的商业利润,相反地,应当在“薄利多买”、“薄利多卖”的原则下,取得合理的商业利润。因此,合作社应当坚决遵守国家的价格政策,国营经济则应给予合作社方针政策的领导与监督。合作社采取这种方针去取得利润,就是一种合理的利润。不但不象某些同志所想的,以为只要合作社赢了利,就是“剥削了国家”、“剥削了群众”,相反地,这既有利于国家,又有利于群众。这种利润,同商人资本家的“利润”是有根本区别的。这不是一种剥削,相反地,这是在反对商人资本家的中间剥削中所得来的利润。这种利润是来自工农、又用之于工农的利润,即用之于国家,又用之于群众的利润,是小生产者的集体经济的利润,因而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利润,是不能反对的。为什么我们新民主主义的国营经济要有利润,而合作社经济却不许有利润呢?难道我们能因为国营经济直接分取了工人的剩余劳动的一大部分,而说国营经济剥削了工人吗?

其次,关于分红问题。合作社的赢利怎样使用?合作社要不要分红?我们基本的方针是使合作社的赢利用于增加合作社的公积金,以积累合作社的资金,但原则上我们不当反对分红,而且应该确定目前还应分红。农民开始时不相信合作社对他们有利,要求分红,我们是不能反

对,也不应反对的。分红问题,决定于在自愿原则下加入合作社的群众。在合作社创办的初期,群众的觉悟还不高,分红可以多一点。合作社取得群众的信任,群众的觉悟也随之提高以后,分红则可以减少一点,而公积金则相对地可以逐渐增加,使分红部分相对逐渐减低。这是说服农民的过程,要由农民的觉悟程度来决定,由我们主观地武断地来规定是不妥当的。

经过去年生产运动以后,农村经济发展的方向问题,已经成为一个现实问题了。是向着资本主义农村经济的老路走呢?还是向着新民主主义合作经济的道路走?这个历史性的原则问题,已经现实地摆在千百万经过土改以后的农民面前,已经不是农村党领导工作上的理论问题,而是农村党领导工作上迫切需要严肃认真解决的实际工作问题了。我们不能反对农村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但不使农村经济走资本主义的老路,是我们确定的方针。这个问题提到我们农村党员面前则更尖锐:党员劳动致富了,生产发财了,他是雇劳金^[395]使自己成为新富农呢?还是把他的资金钱财向合作社入股,使自己成为合作社的骨干与先锋?没有疑问,我们不能用行政的办法禁止农民党员变为新富农。但作为农村党的领导方向来说,我们是应当采取各种办法说服教育我们的农民党员,要他们把发家致富所得来的资金钱财入股到合作社,并使他们成为合作社的骨干与先锋的。为了使农民党员向合作社入股,为了使农民群众向合作社入股,为了使党

员与群众认识到合作社是他们由贫穷到富裕的唯一道路，需要我们党对他们的政治教育，尤其需要巩固政治教育的经济基础。这就需要合作社好好地给他们办事，需要合作社为他们赢利，使合作社的利润一部分或大部分能成为公积金，使合作社因资金充足而更好地为所有群众（首先是社员，然后是非社员）服务，为国家服务，同时以一部分或一小部分给他们酌量分红。使多入股者多分红，少入股者少分红，使各个社员能够随其入股的多少而得到不同的报酬，因而刺激其对于发展合作社及入股的兴趣。这是使合作社把农民的（也是工人的）共同的利益与农民的个体的利益结合起来的具体方法之一，因而也是使合作社很好发展起来的具体方法之一。根本反对分红的思想，实际上是一种平均主义的思想在合作社问题上的反映。其结果与合作社不能赢利的观点所产生的结果一样，将使农民的剩余资金钱财游离于合作社之外，不能使农民个体经济的细流从四面八方向着一个储水池汇合，不能使这个储水池逐渐地成为湖泊，成为大海，相反地，还会使细水乱流，而流到资本主义的方向去。这在农民看来，道理是非常简单的：既然入股多少，都是一样享受权利，那我又何必多入股呢？我为什么不拿积蓄的资金钱财去雇人而当富农，或者自己去作买卖呢？只有当合作社在实际生活上给农民证明，不用富农的方法，不用商人高利贷的方法，而用经过合作社入股以发展合作社的方法，也能改善其生活，而且改善得更好、更有把握

改善时,合作社才能成为农民衷心拥护与积极支持的农村集体化的方向。

人们会提出这样的问题质问我们:我们的国家银行与信用机关,对于任何人(不仅是工人农民)的存款都要给以利息,而且存款多的多给,少的少给,有时为了更多地吸收存款,甚至必须适当提高利息,而独有合作社的入股却根本不能分红(这也是一种利息),理由何在?我想,我们是说不出理由来的。

有些同志害怕合作社确定了赢利分红的原则之后,会刺激钱多的人多入股,因而容易使合作社为少数人所控制,使合作社变成钱多的少数人剥削多数人的“合股商店”。提出这种顾虑,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的合作社的基本方针,是为群众服务,合作社的主体是农村劳动人民,是农村的贫雇农与中农,政治上有共产党的领导与民主政府的监督,经济上有国营经济的帮助与配合,上面又有各级合作总社的管辖与掌握,组织章程上又有不论入股多少只有一票表决权的规定,合作社在经营其业务时,可以经常在外部同商人资本家进行竞争与在内部同资本主义倾向进行斗争,——这一切就可保证合作社成为劳动群众的阶级组织,成为劳动群众进行经济斗争的阶级工具。执行这种方针的合作社系统,是不可能为少数入股较多的人所控制而变为资本主义的“合股商店”的。只有当个别合作社违反其正确方针时,它才会被少数人所利用而变质,但这里决定的仍然是方针问题,而不是入

股多少与分红多少的问题。

有些同志一讲到农村中能向合作社多入股的人，就联想起了旧时农村中的商人、富农与地主的凶恶相。但是我们决不能忘记今天东北的农村是已经经过土改的农村。今天能向合作社多入股的人，当然不能是商人，商人不是农民劳动者，没有加入合作社的权利。当然，也不是已被斗争的旧地主与富农，他们今天虽然也开始劳动生产，但他们或者没有钱或者钱不多，即使有钱，也不敢都拿出来入股；而且他们有无向合作社入股的权利，可由有无公民权来考查决定。今天农村中比较有多入股的可能的，是农村中占有很大数量的新旧中农（中农今后将成为农村中的大多数了）。中农是劳动人民，不是剥削者，他们能多入股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他们能多入股就是表示合作社的事情办得好，就是表示他们信任合作社，丝毫也不用害怕。同时，中农，即使是富裕中农也罢，因为是劳动农民，家底并不太厚，今天顾虑也较多，所以他们今天入股也不会太多的，给他们的入股以限制，也是大可不必的。害怕他们从合作社分得些红利之后变为“资本家股东”，这也不免是杞人忧天。当然，红利会给农民社员在发展生产上、在改善生活上以帮助，但这又有甚么不好呢？经过合作社使农民富裕起来，不正是合作社的目的吗？

可见，反对合作社赢利的主张，是没有充分理由的。反对把赢利的一部分给社员分红的主张，也是没有充分

理由的。

斯大林说过：“苏联的“集体农庄只是在销售合作社和供应合作社发展和加强之后，才开始产生和发展起来”^[396]。完成中国农村集体化这个伟大的历史任务，要求我们在几年或相当长的时间之内，把农村供销合作社大量、普遍、充分地发展和加强起来。因此，我们应当为供销合作社确定正确的方针。同时，还应当确定这个方针之后，解决一系列原则性的问题，例如赢利分红问题这个重要原则问题。对于这样一个原则问题，如果不给予正确的解决，则正确的方针难于实现与贯彻，合作社的发展也必然会受到阻碍。

此外，还有一个合作社对私人商业资本的态度问题。事实上，任何地方只要一着手办合作社，就一定接触这个问题，我们应使各级党委与干部对这个问题树立正确的认识。合作社一方面应当协助国家打击私人商业资本投机倒把的破坏活动，另一方面则取得国家经常有力的帮助，来与正当的私人商业资本进行经济的竞争。我们又应在合作社的面前正面地提出，用经济的办法和私人商业资本家进行争取群众的斗争，进行争取对千百万农民小生产者经济领导权的斗争。但鉴于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还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二中全会决议）^[397]，又鉴于合作社还处在创办时期，力量还很小很

弱,因此,合作社和私人商业资本家争取经济领导权的斗争,必须是逐步的、慎重的与有步骤的,任何急躁或粗鲁,甚至企图用行政的办法去达到这个目的,则是不对的,危险的。

其次,合作社是劳动群众的阶级组织,是无产阶级领导农民小生产者在经济战线上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因此,党的领导应当在合作社内部经常开展对资本主义倾向的斗争,对合作社干部经常进行这种教育,以克服资产阶级的各种影响,克服小资产阶级的各种动摇,坚持无产阶级对合作社的领导方向。

最后,县级以上合作社的任务,除基本的是掌握检查政策方针外,还应包括经营各该社所属地区带有全局性的经济业务,并经过经营这种经济业务的办法,去具体贯彻合作社的各种政策方针,保证上级合作社对下级合作社的领导。这些业务,可以包括与国营经济订立统一的合同,办理农村服务,组织下级合作社力所不及的必要的生产事业,了解各地行情和供销状况,统一组织调度供销运输等。

以上意见是否有当?请作参考。

关于农村工作的三个问题^{*}

(一九四九年五月)

关于农村工作,我向你们提出三个问题。我的看法是否妥当,请给以指示。

正确认识 and 对待土改后 农村经济中的新趋向

一、东北农村土改后在经济上已发生了如下的新的情况。(一)多数贫雇农上升为中农,中农在农村中开始成为多数。(二)一部分分得土地牲畜的贫雇农生活仍很困难,并有失去牲畜土地者。(三)少数新旧中农(其中还有很少数被斗富农)开始上升为富裕中农及极少数的新富农。(四)一部分贫雇农及一部分被斗的地主富农,要求出租土地,甚至出卖土地另找职业。有的要进工厂矿山,当工人当职员,有的要专搞副业或做小买卖、当苦力,有的

* 这是给中共中央东北局并报毛泽东同志的电报,于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七日、二十二日、二十三日分三次发出,标题和文内插题都是本书编者加的。张闻天同志当时任中共辽东省委书记。

仍愿留在农村当雇工。(五)过去分了土地的工人,现在凡能回到工厂者,均要出租或出卖其分得的土地,甚至无代价地交出其土地回到工厂去。(六)还有一部分农民或被斗地富要求出租或出卖其在本地所分得的土地,迁移到别地去租进或买进土地,或去开荒。许多关里来的农民,因华北解放,宁愿不要这里的土地,而搬回到关里去分地。以上情况在南满特别显著,因南满农民分地少(每人二亩上下),劳动力过剩,而工矿业恢复又快。

二、这些新的情况,表现出东北农村经济中有以下的几种趋向。(一)多数农民的生活有改善。(二)阶级分化已开始。(三)农业人口向城市工矿业转移,工人回工厂矿山,一些农民向工人转变。(四)土地的所有与使用,有更趋于合理的新的调整。这些趋势是农村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力要求向上发展的各种不同的表现。

三、根据这些新的情况与趋势,我们在农村中的经济政策的基本方针应该是:(一)继续采取具体办法,尤其是发展供销合作社与劳动互助等办法,以进一步提高农村生产力,改善大多数农民的生活,为农村集体化准备有利条件。(二)清醒地正视农村中阶级分化的实际情况,既不要粗心大意,熟视无睹,也不要过分夸大阶级分化的危险,而表示恐慌,或采取不必要的行政手段,来加以限制。(三)凡有利于土地的合理使用,及有利于工矿业副业的发展,即凡有利于社会分业的发展的租佃关系及买卖、移居,我们不应反对。(四)继续在各方面帮助贫雇农解决其

生产中的困难,并保护贫雇农不受新富农的过分剥削。(五)凡不愿从事生产的地主富农分子及一小部分二流子,则仍应加以监督,使之在劳动中得到改造。

为使同志们在农村新情况前面不是茫无头绪、举棋不定,或步骤零乱、“左”右摇摆,我认为以上看法与基本方针目前有提出的必要。

发展劳动互助要反对 强迫命令和放任自流

关于农村中发展劳动互助问题,我们同志中还有一些糊涂观点,使他们在强迫命令与放任自流这样两种偏向中摇摆不定,而不能解决问题。这些糊涂观点归纳起来如下。

一、不承认农民中自发的、小型的、临时性的、季节性的,亲友好间的插犋换工^[375],也是“组织起来”,而以为必须是依照我们主观所要求的,参加户数较多,比较经常,搭配合理、评工记分清楚的劳动互助组,才算“组织起来”。

二、不承认因种种原因而不参加或不能参加劳动互助组的农民雇牛犋或出租土地,是使他们的土地能够种上的一种办法,而以为不参加互助组,地一定种不上,因而要种上地,就一定要把他们编入互助组,即使强迫一点也是可以原谅的。

三、不承认有足够车马能独自种地的个体农民有不参加互助组的权利,因而以为要组织起来就一定要把他们编入互助组。

四、以为要农村不走资本主义道路,就必须把所有农民都依照我们的愿望组织在生产互助组内。为此,似乎即使多少强迫命令一点也不要紧。

由于同志们中间存在有这种糊涂观点,所以强调组织起来,就必然会发生强迫命令。强迫命令的结果,如众所周知,或者是农民被迫依照我们的愿望组织起来,或者是向我们作假报告,说已经“普遍组织起来了”,而实际上还是照他们的习惯办事。其结果必然使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受到障碍,使党脱离群众。也正由于这种糊涂观点的存在,所以一反对强迫命令的组织起来,同志们也就觉得无事可做,而只有放任自流了。

为了澄清同志中的上述糊涂观点,我认为应该说明以下几点。

一、承认农民中自发的插犍换工,是最能为农民接受的组织起来的初级形态。我们不但不应反对这种初级组织,而且还应该帮助没有参加这种组织的农民同样地互相组织起来。同时,这种初级形态的具体表现也是多样性的,在各时各地都不尽相同,因而也不能千篇一律到处硬搬硬套。

至于一切比较高级的劳动互助组织,只能是从这种初级的形态出发,根据生产力的发展程度与群众的觉悟

程度,而加以提高的结果。它是不能主观地任意提高的。这种比较高级的组织,开始也只能为比较少数的先进分子所接受。只有先做出榜样,使农民亲身体验到高级的组织的确比初级的组织更为有利时,这种高级的组织形式,才能为广大农民所接受而普遍化。这里任何的急性病都是有害的。

二、承认因种种困难而不参加插犂换工的农民,有雇牛犂,出租其土地,使土地种上的权利。只有对那些有劳动力而不肯生产的二流子或地主分子才应给以适当的强制与监督,使其亲身参加劳动,把地种上。

三、承认有足够牛犂与劳动力的农民,有不参加插犂换工而独自耕种其他土地的权利。他们土地不够种时,可以租入土地;他们牛犂有多余时,也可以出卖套子^[398]。但我们应该注意,不使在这种买卖关系与租佃关系中复活封建性的剥削。

四、为使农村向着集体化的方向发展,今天应特别重视农村供销合作社。在今后农村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农民最关心的是供销问题。因此,今后使农村走向集体化的道路是先供销合作然后生产合作。供销合作是今天促进农村生产的发展与准备农村集体化的中心环节。农民在生产上的集体化,必须在城市工业给予他们以农业机器之后。今天的初级的劳动互助组甚至较高级的劳动互助组,在没有改变农业技术以前,只能给将来的生产集体化造成若干有利的准备条件而已。这种劳动互助组同集体

农庄之间,还有很大的距离。以为不经过农村生产技术上的革命,不发展城市工业使之能给予农民以机器,就能使农村集体化的观点,是错误的。

五、这种在农村工作中违反毛主席“耐心说服,典型示范”⁽³⁹⁹⁾的方针的强迫命令的工作作风,必须加以坚决的转变。这种作风在过去军事时期还有若干地方可以为农民所原谅,在现在生产时期,则已开始为农民所不能忍受了。我们应该觉悟到农民今天已经很不高兴我们在生产上的各种强迫命令与过多的干涉,对各种冗长的充满政治清谈的会议,也已经表示厌倦。这种作风如不加以坚决的转变,我们会脱离农民群众,而为敌人的反革命活动制造有利条件。不说清楚上述许多问题,空喊反对强迫命令是反对不了的。

六、反对农村领导生产工作中的强迫命令的作风,决不能等同于主张放任自流。以为不强迫组织我们主观上所要求的劳动互助组,我们在发展农村生产力上就无事可作的观点,实在是非常错误的。在今天农村中去帮助农民因时因地组织农民所乐意接受的各种形式的插犍换工组,与帮助农民组织与发展供销合作社,这就是能做而应该做的艰巨而又有价值的工作。此外,如改良生产技术,改进农作法,发展水利事业,繁殖与保护耕畜,发展副业生产,提倡技术作物的种植等提高农村生产力的工作,我们不是做的太多,而是做的太少,或是根本还没有做。而且事实上,劳动互助组之从初级向高级的转移,及供销合

作社的发展与巩固,是同这些农业技术上的改良与农村分工分业的发展密切结合着的。把这一切能做而应做的工作置之不顾,这就是真正的放任自流。这种领导上放任自流的实质,是在于不了解群众的迫切需要与党的方针,不懂得如何真正去为群众服务。它也是脱离群众的一种表现。但反对领导生产上的这种放任自流,是决不能等同于回转 to 强迫命令去的。反对放任自流而不说清放任自流的实质,不指出农村中许多可做与应做的工作,放任自流也是反对不了的。

农村党员要为合作化方向奋斗

土改后的农村,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必然是资本主义方向与合作社方向即社会主义方向之间的顽强的斗争。我们党在农村中一方面不能不容许少数新富农的产生与其在某种程度内的发展,但同时必须为农村的合作化而奋斗,以争取农村社会主义前途的胜利。因此,在农村共产党员前面提出这样的问题,即由于新富农的产生的不可避免,因而去帮助新富农的发展,或自己“以身作则”转变为新富农呢,还是坚决为农村合作化而奋斗,使自己成为合作运动的先锋与骨干呢?这即是说,今天在农村共产党员面前提出了发财致富的两条道路,即新富农的道路与合作化的道路。我的意见如下。

一、应该教育农村共产党员,坚决为农村合作化的方

向奋斗 ,而且应该使自己成为合作运动的先锋与骨干。

二、应该教育共产党员 ,只有经过合作社的道路才能使大多数农民发财致富 ,也才能使自己的生活得到真正的改善。

三、应该向农村共产党员指明 ,新富农的剥削贫雇农的道路 ,同共产党员是不相容的。凡农民党员有向新富农转化的趋势时 ,应给以事前的警告 ,使其转变 ,如不可能时 ,应允许其自由退党 ,或开除其出党 ,不要留恋。为此 ,在党内应加强反对资本主义思想的教育。

四、注意在合作社运动的积极分子中 ,在真正贫苦农民出身的积极分子中发展党。

五、增加党员中城市工人成分的比重。

关于东北私人 资本主义的报告^{*}

(一九四九年七月十九日)

根据几个市的私人资本主义发展的材料,我认为东北私人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一时期大体已经结束,现在正要进入它的发展的第二时期。

大体上说来,从八一五^[358]解放到全东北解放(实际时间可算到今年三月),是私人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一个时期,这是东北私人资本从日帝的殖民地经济体系的一个附属的有机部分转变为新民主主义经济体系的一个附属的有机部分的过渡时期。

伪满时期,东北私人资本大体上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在政治上是大汉奸大特务,在经济上是掌握大加工业、大配给店^[357]的大资本家大商人,在农村中往往又是大地主。这是伪满时期的一种汉奸资本。这一部分资本依靠日帝政治与经济的势力,与日帝资本结成一体,为非作恶。其资本较大,势力较大,但人数不多。另一部分是中

* 这是给中共中央东北局的报告。

小资本家,特别是小资本家,虽也依附于日帝资本为生,给日帝加工,做些零件小玩意,或执行配给任务,但经常受到日寇的压迫,特别在日寇实行经济统制^[400](伪康德^[401]七年即一九四一年)后,受到的打击很大,故对日寇不满,同汉奸资本亦有矛盾。这一部分资本数量较多,但力量很小,在日帝经济统治下,只能苟延残喘。

八一五解放,伪满殖民地经济体系被摧毁。过去依附于这一体系的汉奸资本,同时也受到了应受的惩处,没收的被没收了,破坏的被破坏了,有的为逃避目标,化整为零了。但中小资本家,却得到了解放。这三年余来,东北的中小资本家,尤其是小资本家,虽然经过了许多曲折,但在比较自由的条件下,一般地都得到了相当的发展。

但应指出,在过去这一过渡时期内,私人资本主义是在一种比较不正常的条件下发展着的。主要的特点,就是这是战争时期。东北被分成许多块,南满几个最大的工业城市还在敌人手里。由于战时财政的入不敷出,物资的缺乏,故物价总是不断上涨,特别从一九四八年夏季起。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物价表现极不平衡。由国家没收过来的公营企业,这时正在恢复,生产量又低又少,还发挥不了调节市场的作用。国家对私资的发展,除土改后期的一个短时间外,一般是比较放任的。虽然从一九四八年下半年起,国家开始了对于私商的某些限制与管制,在经济上进行了一些平抑物价与反对投机倒把

的措施，但作用不大。在这样条件下发展着的私资，大部分要利用物价的波动与不平衡来进行商业活动，那是很自然的。这部分商业资本，固然也解决了国家与人民的某些需要，但同时它却大大地发展了投机倒把的活动。商业利润是特别的高。商业资本从国家与人民手中发了很大的财。如果说，这一时期私人资本的活动，主要是商业资本的活动，那也是不算过分的。至于另一部分工业资本，则主要地为国家加工而获利，尤其以军工军需的加工为多。有的则为一时一地市场的需要，制造一些日用必需品出卖。工业的发展是盲目的，无计划的，游击性的，抓一把的，大多数是小型的。有原料、有销路，就生产开工；没有就另想办法。看到投机有利，就去参加投机。为避免目标太大，避免税收负担，及为适应市场的迅速变化、力求资金周转的迅速与灵活起见，较大的工厂与商店，均走向分散而“化整为零”。小手工工厂与作坊，特别是行商、摊贩如雨后春笋一般地发展起来了。各地工商业户数的增加，研究起来主要地也就是这种小商店、行商、摊贩及小手工工厂及作坊的数量的增加。这种情况，反过来又促进了投机倒把的发展。显然，这是循着无政府的老资本主义的方向发展的一种自发的运动。这种运动，到今年三月可以说达到了它的最高点。

当时在我们同志中间，曾经有过这样的错误思想，以为这就是发展工商业的主要方向，这种思想实际上是当时小资本的要求在党内的反映。但东北局当时的方针（见

去年九月高干会《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东北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草案)》^[402],是全力恢复控制经济命脉的国营工业与商业。因为它懂得只有加强国营经济的力量,才能在经济上巩固我们的政治与军事的力量,反对私商的投机倒把,给私人资本主义以经济上的领导,使之成为新民主主义经济体系内的一个组成部分。现在事实证明,这一方针是正确的。

全东北解放后,私人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战争停止了。全东北和平统一了。东北大军的进关,使财政收支的平衡成为可能了。由于对外贸易的发展及大城市全部收复后国营企业生产的恢复与扩大,大量物资可用之于调节市场了。国营商业与合作社的力量增强了。物价开始达到平衡,有的甚至下降了。国家在经济战线上开始取得了主动,加强了计划性。天津、上海的相继解放,使东北市场同关内市场联系起来。这些都对东北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决定的影响。商业投机困难了。军工军需的加工定货减少了。价廉物美的东北大城市的本地工业品及关内来的工业品,进入东北内地市场来,同本地货竞争了。许多原料的来源,还不够发展着的国营企业的需要。物价、原料与市场的条件,都起着不利于私人资本“自由发展”的巨大变化。虽然大部分商业资本还在盲目地待机与挣扎,到处找空子钻,但一部分商业资本却看到了自己暗淡的前途,而想转入工业生产了。有的工厂与作坊,如象安东^[403]之棉织

业、造纸业等，因缺乏原料而无法进行经常的生产；有的，如象安东的铁工业、丝织业等，则虽有原料，但没有市场，而不敢进行生产；有的虽有原料市场，但成本贵，不能同国家的、大企业的及外来的成品相竞争，也不敢进行生产。大部分私人工商业同过去比较起来，现在开始表现出了停滞与萧条的状态。有奖实物公债的推销，银根的紧缩，对他们商业活动的严格管制，又增加了对他们的压力。一切这些在私人资本家的头脑中，造成了惶惑与混乱。私人资本主义向何处去？物价如何？原料如何？市场如何？国家意图如何？成为每一个资本家所要解答的严重课题了。

这些问题必须由国家来加以解答。于是东北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必须从第一时期转入第二时期。带有极大自发性的比较“自由发展”着的私人资本已经面临歧路，他们现在如果不循着新民主主义经济体系所铺设的轨道走去，就不能求得他们自己的发展了。显然，如果我们不在国家经济建设计划中给私人资本指定一定的活动地盘，在原料与市场方面给以一定的照顾，并在税收政策、价格政策、劳动政策、运输政策、借贷政策等方面给以一定的有利条件，逐步引导它使之循着我们所需要的方向发展，因而使之成为新民主主义经济体系中的一个附属的有机部分，那今后东北私人资本主义的健全与正常的发展，是不可能的。不如此，我们也不能充分利用私人资本的积极性，使之成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而服务。至于

私人资本的一切越轨活动,要受到一定的限制,那也是不言而喻的。所以,关于今后发展东北私人资本主义的方向与办法问题,我们必须从东北经济建设计划的全局着眼,加以根本解决。我们必须定出发展私人资本的计划,使之成为东北经济计划中的一个有机部分并根据计划去定出各种具体的法令规章。我认为这样做的物质条件,现在大体上已经具备。

为了给私人资本主义今后的发展方向与办法提出一些有益的意见,我认为具体检讨一下过去我们对于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的政策各个方面,是有必要的。

在三年余来私人资本主义发展的过渡时期内,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曾经发生过一些“左”右摇摆。在我们开始进入东北时期,在党的总的领导方针上虽然是右的,但在城市内实行了反奸清算^[356]的地方,在打击汉奸资本时,有时也扩大了打击面,把不应该打击的某些中小资本家打击了(强调了东北私人资本的汉奸性)。在多少进行着工人运动的地方,也有个别增加工资过高的现象。虽然这种情况当时并不严重,甚至相反地,在解决当时财政困难问题上,在迅速争取工人贫民靠近我们上,还起了积极的作用,但在一部分干部中,从私人资本那里抓一把的思想及片面的工人福利观点是有的。较大的私人资本的转移及其“化整为零”,同我们当时的这些作法,也是有些联系的。七七决议^[404]后,全党转入土改,对私人工商业一般采取了放任的与不侵犯的方针,私人资本主义在当时得

到了若干发展。但到土改后期,农民进城没收清算工商业者的封建性,有些政府机关与部队从财政观点出发,从工商业方面抓了一把,街道斗争中的工人贫民,也从中侵犯了一部分工商业。这给了私人资本家,尤其是较大的私人资本家,一个比较严重的打击(在安东当时受到影响的,占全部工商业户数的百分之十六,其中较大的私人工厂被没收的比例更大)。这是在私人资本主义问题上的严重的“左”倾错误。但由于时间短,纠正快,纠偏后私人资本又得到了恢复。以后物价的飞速上涨,促进了象我们前面所说的私人资本主义在商业方面的特殊繁荣。纠偏后,在干部思想中曾经发生过过分强调发展私人资本主义企业而忽视了发展国营企业的迫切需要,忽视了同私人资本家在商业上的投机倒把做斗争的必要,及片面强调了保护资本家而忽视了依靠工人的一些右的观点。在中央与东北局“纠偏必须防右”的方针^[405]下,这些右的观点迅速得到了纠正。自此之后,党对私人资本主义的方针,一般是正确的,但在实际工作中的偏差也仍然是有的,尤其在防右后的“左”的偏差。为了进一步发挥私人资本家的积极性,纠正一切这类偏差,尤其是“左”的偏差,今天极为必要。

我认为目前在私人资本主义问题上的一些“左”的偏差,主要表现在以下的一些方面。

第一、在公私兼顾方面。原来强调国家的利益及国营企业的利益是对的,但如果由于强调了这一方面而侵犯

了正当的私人工商业,那就不对了。而这样侵犯私人工商业的事,还是不少的。特别是有些财经部门、财经机关,为了本部门或本机关的利益或便利,而损害了私人资本家的利益,这类事件是比较多的。东北行政委员会^[406]最近所检查的本溪县三仁石灰窑的故事^[407],不过是其中一个小小的例子而已。在公私合办的企业内,这种只顾公方利益不顾私方利益的事也不少(关于这类的材料见另件^[408])。

第二、在劳资两利方面。原来在城市工作中强调依靠工人阶级的方针是对的,但如果由于强调了这一方面而发生片面的工人福利观点,因此损害了劳资两利的原则,那就不对了。而这样的例子,也是很多的(关于这方面的材料,见省委关于调整劳资关系决定草案^[409])。

第三、在税收政策方面。(这个问题原来是公私两利问题中的一个问题,但这里特别提出是有必要的。)原来给工商业者以一定的税收负担以解决国家财政的收入,那是正确的。采取各种办法限制商人投机倒把的活动,也是正确的。但是如果为了税收,给工商业者的活动以过多的过分的干涉与限制,那就不对了。在一些同志中,尤其是在税收机关工作的同志中,培养税源的思想太少,而“杀鸡取卵”的思想有时甚至还有表现;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的思想太少,而限制的思想却多了些。这对发展私人资本主义是很不利的。

在实际工作中发生以上这些“左”的偏差,其思想

根源主要是对于私人资本主义在东北经济体系中的必要性与重要性的程度认识不足。东北国营企业与私营企业的比重的悬殊，国营企业在工商业中所占的优势地位这一明显的事实，往往容易在我们头脑中产生私人资本无足轻重的思想。同时领导机关过去差不多集中全力于恢复与组织国营经济成为计划经济，因而对私营经济的注意不能不有所放松。过去物价波动时期，私人资本主要是商业资本的投机倒把活动，给我们困难很多，损失很大。这些明显的突出的事实，也容易使我们过分强调私人资本的投机倒把的破坏方面，而忽视了它在我们正确的工商业政策下，可以发挥其积极建设的方面。这也就使我们容易强调对私人资本主义的限制方面，而对积极扶助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方面注意不够。其他如片面的国家观点，片面的财经观点，片面的群众观点，也常常容易侵犯到私人资本的利益。而这种观点，常常是较之右的观点更加难于克服的。在党内，“‘左’比右要好”的残余思想也还是或多或少地存在着的。所以在干部中就私人资本主义存在与发展的必要性与重要性进行反复的教育，坚决贯彻中央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在目前是非常重要的。现在国营经济的建设多少有了一些头绪，私人资本又陷于这样的一种困难情况，党的领导机关更多地去注意于积极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的工作，也是可能的与必要的了。

当然，在干部中的右倾思想也仍然是有的，而且在批

判一些“左”的思想与做法中,右倾思想一定又会乘机抬头。但只要我们的头脑是清醒的,哪里发生右倾思想,我们也就能在那里加以纠正,不用害怕。为了正确贯彻中央、东北局关于私资的方针,在党内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去克服党内这一问题上的“左”右摇摆,是必要的。说“‘左’比右好”是错误的,说“左”比右难于克服些,因而“不妨右一点”的思想,也是不正确的。

以上看法,是否有当,请指示。

关于本省直属各市的材料,有的照原来报告,有的经研究室^[410]同志略加整理,现在一并附上,供你们参考。

关于调整劳资关系问题,我们写了一个决定草案,已寄上请批示。

此外,我们还想写一个关于公私兼顾问题的文件^[411],待写好后,再寄上请示。

努力提高业务水平^{*}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三日)

由于有党中央领导和全国人民作后盾,我国的外交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我们外交部的业务水平并不高。工作只能说大体上完成了任务,也就是说,上下左右要我们办的事大体办了,应该由我们自己主动办的事却多半没有办,有些甚至没有想到要办,已办的质量也不高。国际形势在发展,我国的外交战线在扩大,要同我国交往的国家日益增多,许多未建交的国家终究要同我们建交,联合国终究要让我们进去,就连美国也不得同我们来往。我们外交干部必须提高业务水平,熟悉和精通业务,才能应付这种迅速开展的形势和局面。

加强调查研究

提高业务水平,关键在于加强调查研究工作。调研

* 这是在外交部科长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克服落后,努力提高业务水平》的节录,标题和文中插题是本书编者另拟的。张闻天同志当时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

工作是一切日常业务工作的基础。办任何一件案子，大部分时间要用于调查研究。只有调查研究，才能使业务问题的处理符合实际，否则只能是“瞎子摸鱼”，一定要出乱子。

工作中主动性、创造性的加强，有赖于调查研究。不调查研究，就发现不了问题，提不出解决问题的建议，而且根本想不到要提建议，就只能应付事务。日常业务工作的提高，也靠调查研究。工作经验不可能自然获得。必须把已经办过的事情加以系统研究，才能取得经验。例行公事，天天照办，干多少年也干不出名堂，错误还是不断重犯。反之，注意综合、研究、总结，工作时间不长也可以很快熟悉业务。同样的实践，结果却大不一样，关键就在于是否注意研究，是否动脑筋，用思想。

我们的调研工作，是为解决当前的外交工作任务服务的。有人一提调研工作，就以为是研究同当前任务很远的问题，这是不对的。外交干部应该读些历史书籍，而且要尽可能多读，但是不能把研究历史当作主要业务。要围绕当前外交工作任务来加强调研工作，防止把它同当前任务相分离的偏向。

各地区司要加强研究时局动向，及时提出看法和对策。世界局势是发展变化着的，我们要在局势中发挥作用，使它朝着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变化，这就要求我们密切注意其发展动向。任何国家里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不应从我们眼前漏过。一旦发生某个事件，我们就要能立即说明

其实质,提出对策。要做到这点,就要下苦功,而且苦功必须经常下。局势不断变化,我们要不断跟踪,不断收集材料,不断综合、分析。往往最初的结论是片面的,似是而非的,等到钻进去反复思考,才能看出问题所在。不能怕麻烦,不能怕绞脑汁。

动向研究不仅限于研究某些个别具体事件,还要研究地区性全球性形势及其发展趋向。研究这些重大问题要花时间,但是这样做是值得的。因为这样解决的不是某一个别问题,而是一系列问题,管的不是一天两天,而是一个长时期。研究某一地区的形势和我们的政策,文件修改了一遍又一遍,虽然很费力气,但是使大家在这些原则问题上取得一致认识,以后就好办事了。否则,每件事零敲碎打地做,做错了即使把承办人骂一顿,他下一回还是不知道怎么办。研究重要问题要多花时间,并不是说可以无限期拖下去,拖到后来就可以忘记掉。相反,我们要强调检查督促,在完成任务方面强调纪律性。要求严格些,逼得紧些,成果就会大些。

为了进行动向研究,必须注意资料积累。这是基本建设工作。我们现在积累的资料少得可怜,以后要把每个国家的材料编印成册,而且要每年编一次,补充动向材料。另外,还要注意各驻外使馆反映的情况和意见。

各专业司要加强研究各种专门业务,总结经验,使之系统化、条理化。每一种专业,不论是领事、礼宾、条约、法律、文书、人事、总务等,看起来千头万绪,复杂纷纭,但是

都有规律可循。我们要找出规律,用以指导工作。开始时
可以着重收集材料,将有关本专业的上级指示、条例,部
内和本单位的文件,国内其他单位的专论、报告、经验总
结,外国有关本专业的历史、理论、法令等,都编印成册。
有了材料,就可以分析研究。还要研究专业工作的动态材
料。单是今年的国庆节,就有多少次送往迎来,握手干杯!
研究这些材料,就可以看出专业工作的发展变化。做了调
查研究,专业司、地区司都会觉得大有学问,否则就都只
能应付事务。只要系统地加强调查研究,一定能把繁杂的
专业工作搞出一个章法来。

加强学习

要提高业务水平,还必须加强学习:学理论政策,学
业务知识,学外国语文。前一阵肃反运动期间,一些学习
停止了,现在要恢复。

不学理论,就不懂得前进的方向,没有观察问题和解
决问题的正确立场、观点、方法。外交工作从事国际斗争
和合作,要求更高的理论修养。只有提高干部的马列主义
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我们的业务水平才能真正提高。

同时,外交工作的专业性又很强,要求干部具备渊博
的专业知识。部里现在组织大家学习的国际法、国际关系
史,只是最起码的两种。没有这种基础知识,外交业务水
平就很难提高。

外国语文也很重要,我们有许多科长以上的干部对这点注意不够。不懂外文在国外工作是很困难的。大使随身带译员还勉强可以,参赞、秘书也要带翻译就太不“经济”,有些“奢侈”了。我们现在要强调一下,科长以上的干部至少要精通一种外文。学习外文固然头痛,但是学习好了,一旦到国外,能说话,能看报,出门也不会迷路,就不觉得头痛了。希望大家努一把力。

加强对业务的领导

所谓加强对业务的领导,就是要我们从科长到副部长这些领导干部钻研业务,并且深入下层,组织群众钻研业务的积极性。

要克服事务主义,挤时间阅读材料,研究问题。我们大家,从副部长到科长,都有此必要。人总是要思考的。所谓“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不皱眉头,计是上不来的。提高业务,首先要自己钻研问题,光靠下面科员同志不行。我自己有体会,要是有一个晚上没有看当天的新闻,第二天就提不出问题来。有些同志连报纸、新闻、电报都不看,凭天才和灵感办事,那怎么行?当然,看材料要有目的性,否则材料多得很,无论如何也看不完的。

往往一提领导干部要自己钻研业务,就会有人叫喊:忙得很呀,没有时间呀。其实时间要看怎样安排。要是拖拉拖拉,或工作没有条理,时间是永远不够的,还会忙得

乱糟糟。要是工作紧张而有条理,就会从容不迫,能有富裕时间研究问题。我看我们外交部的时间是很多的。过去许多同志总是叫嚷干部不够。现在精简了百分之五十,也没有觉得不够。我自己也试过,一个星期挤出两个下午看材料,还是可以做到的。如果不挤,这两个下午也不会闲。可见时间是可以挤出来的。

要加强领导,必须克服官僚主义,挤时间深入下层,密切上下联系,增进上下之间的了解。这样才能提出问题,改进工作。领导外交工作要看材料,了解世界大事;领导各司的工作,就要到下面去,了解司里的情况。否则,脑子里没有新鲜东西进来,就会僵化。但是现在我们外交部却存在着脱离群众的问题:官僚主义、上下脱节,我们的意图下面不了解,下面的新情况、新问题很少反映上来,部领导也很少下去检查。看起来似乎什么问题都没有,天下太平,八方无事,大家都“和平共处”。这样倒是很省事,可惜就是有点官僚主义。

要对提高业务进行具体指导。要抓住本单位业务中的关键问题,提出研究计划,拟定题目,分配任务,限期完成。光分配任务还不行。好比造房子,有了任务书,还要有设计书。领导研究工作,也得做些初步设计工作,出点主意,给点指示,使下面同志接受任务时清楚这项课题要求的是什么。必要时还要介绍几篇材料,使他们的工作有个线索。不能出了题目,就什么也不管,让下面同志自己“摸”。那样是“摸”不出东西来的。还要运

用集体的力量。选题、初步设计，都要在会上研究。提纲写好后，还要让大家看看，提提意见。这样做，一方面是集思广益，避免个别人的局限性，同时也能使领导和群众共同提高。

要使组织形式适应提高业务的需要，使各单位内部的分工合作更加机动灵活。一个人要同时应付“门市部”的事务工作而又研究问题，是比较困难的。可以实行小规模轮换，轮流抽出人来研究问题。在科长、专员中，如果有人要研究某个问题，别人就可以多管些，给他腾出时间。等他完成了这项研究任务，脑子也需要松弛一下时，他就可以把门市工作更多地担负起来，让先前多管门市的同志去坐一下板凳，花一点脑筋，研究研究问题。这样，既不耽误门市部的工作，也研究了问题。为了这样做，分工就不能太死。一个人不能只管一个国家的来往事务，兼管几个国家的也是可以做到的。门市部的工作，就是要有本领揽得起，丢得开。干部使用中的这种机动性，不仅不会影响工作任务的完成，而且还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克服不同干部之间的忙闲不均，或同一干部前后的忙闲不均。现在的问题是有一部分人忙些，另部分人闲些，许多力量没有用上。我们的目的是要人人都忙，让每个干部的潜力和积极性统统发挥出来。只要这样做，我们就会发现许多能干的同志，从中逐步培养出一批优秀干部。

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要提高业务水平，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要批评自满自足、得过且过、安于老一套的保守思想，批评“时间不够呀”、“忙呀”等消极情绪，批评各种缺乏信心的悲观论调，什么“能力弱呀”、“我这块料只能搞事务呀”等等。能力是靠努力得来的，没有什么人生来能力就强。发现问题、研究问题的潜在能力人人都有，问题在于要实践。有人爱说“没有办法”，但是办起来就有办法了。其实，有些人的真实想法是怕动脑筋，想只做些少花脑筋的事务工作。但是这不现实。做外交工作固然要动脑筋研究问题，在其他任何岗位上何尝不是如此。所以，希望在座的科级以上同志们支持钻研业务的方针，不要在下面叫喊，不要拆台，也不要只有“五分钟热度”。

要发扬干部提高业务的积极性。对于任务完成得及时的，积极提出新建议、新意见的，要表扬鼓励。要更多地表扬工作中的主动性、创造性、思想性和纪律性。对于工作拖拉、成绩不好和犯错误的，也要批评。要把能否完成工作任务和完成的好坏，当作考核干部的一条重要标准。埋头工作，钻研业务，是干部高度政治觉悟的重要标志。脱离业务工作的空洞的政治觉悟是没有的。常常有人说，某某干部“业务很好，政治很差”。我们要问，

差的是什么政治？如果只是指作风生硬、态度不好，这当然要改进，但是不能因此忽略他们的基本方面。他们努力工作，钻研业务，并且做出了成绩；没有政治觉悟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我们一方面要使思想政治工作同提高业务的工作密切结合，另一方面也要防止因为强调业务工作而放松思想政治工作。业务本身固然就包含政治，提高业务本身就是要求掌握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但是，业务工作是人做的，要使人们团结一致、朝气蓬勃地搞业务，就要做思想政治工作。光是自己努力，周围的人们却思想混乱，甚至相互对立，那是做不好业务工作的。同时，钻研业务本身会遇到许多思想阻力，例如不安心、没有信心等，需要克服。所以，不做思想政治工作，没有集体的政治生活，只是埋头业务，就是一种单纯业务观点的表现，其结果，业务工作本身也做不好。

总之，我们要正确处理政治同业务的关系。业务受政治指导，政治又为业务服务，做思想政治工作就是保证把业务工作做得更好。政治和业务是统一的，不能割裂，不能对立。做精通业务的共产党员、有马列主义思想的专家，这就是我们在政治和业务的关系问题上的要求。

关于执行我国和平外交 政策中的一些问题^{*}

(一九五六年三月)

根据党中央和政府的历次指示以及外交部和驻外使馆五年多来的外交实践,特将执行我国和平外交政策的一些问题,综合成为以下十二条,供同志们研究和参考。

一、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是我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而不是一时的策略措施。我们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上所有国家建立和发展关系。任何对五项原则的违反,都对和平事业不利,对中国人民不利。因此,在我们的外交实践中必须坚持为贯彻执行五项原则而奋斗,同时要从政治上、经济上和理论上证明我们对五项原则的忠诚,我们还要努力争取使五项原则成为国际关系的普遍准则,因为它符合世界和平和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符合联合国宪章的精神,并为一九五五年的万隆亚非会议^[412]所确认。

* 这是为提供外交部使节会议讨论而写的文件,得到会议肯定。

二、根据五项原则,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关系,加强同各国的经济、文化联系和合作,扩大和平地区,扩大国际和平统一战线。在国际上,要团结一切能够团结的国家和人民,集中力量打击侵略和战争势力。对任何国家,不论它是否参加军事集团,它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如何,思想信仰怎样,都应该尽可能同它建立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必须争取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一切国家和平共处。这种和平共处是可以多种多样的,具有不同的形式,而不必强求一致。同有外交关系和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都可以和平共处。同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可以先从建立和发展经济和文化上的联系着手,逐渐走向建交。对所有邻国,一律执行睦邻政策,主动地用谈判协商的方法,解决同它们之间的一切争端,消除同某些国家曾经有过的历史上的仇恨隔阂,建立正常关系,增进双方友谊。

三、承认一切国家和民族不论大小,都一律平等,坚决反对大国主义。尊重每一个国家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它们的历史、文化、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和领袖人物。学习他们的优点。对过去和现在受压迫的国家和民族,要采取同情和谅解的态度,对它们争取独立、自由和解放的任何努力,都应该给以支持。在同其他国家的关系上,必须反对大国主义和傲慢自大、自以为是的态度。

四、坚持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反对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正象反对人家把他们的意志强加于我一样。在相

互关系上,凡对方不愿意的事,不要勉强。要承认并且在实际上尊重一切国家和民族有依照自己的意志、自己的思想,实行它们认为合适的社会制度、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的神圣权利。革命决不能输出。革命与否,如何革命,都是各国人民自己的事情。每一个国家革命的经验,对别国只有参考的价值,机械搬用是完全错误的。

五、要同不同思想体系的国家内不同思想观点的人物,寻找思想上的接触点和共同点,实行求同存异的方针。我们要宣传我们的思想观点,正象人家要宣传他们的思想观点一样。我们有权利批评、赞成或反对人家的思想观点,正象人家有权利批评、赞成或反对我们的思想观点一样。不同的思想观点之间,思想的争论和互相批评是不可避免的,但为了和平共处,思想上的某些共同点是应该找到,而且也是可以找到的。不同的思想体系,不同的思想观点,决不能成为国家间不能和平共处的根据。我们在宣传自己和批评别人的时候,应该是理直气壮、入情入理、富有说服力,而且在形式上要有多样性,要生动活泼,切忌公式化和千篇一律。

六、在处理国家间的实际问题时,必须坚持平等互利的原则。既要考虑到自己的利益,也要照顾到对方的利益。一切协议,必须对有关方面都是平等的和互利的。所谓协议,实际上也就是双方在平等互利的条件下取得的妥协。要善于从平等的和互利的角度出发,寻找可以妥协的地方,达成协议。即使是不大的协议,对改进国家间的

关系,对缓和紧张局势也是大有裨益的。

七、要有实事求是、谦虚老实的态度。要认真对待客观现实。要人家看自己的优点,也要人家看自己的缺点。对自己,优点不要吹嘘夸大,缺点不要遮遮掩掩。对别国,缺点不要夸大,优点不要抹杀。不轻易发出诺言,但是诺言必须遵守。条约、协议一经签订,就要认真执行,不能马虎从事。因此,签订条约,承担义务,事先必须认真考虑,办不到的不要做,只有办得到的才做。对外国的新议论,新事物,既不一味否定,也不盲目轻信,而是加以切实考察,给以正确估计,然后再采取相应措施。对对方的意图,也不要凭主观愿望、一时的好恶或情感冲动加以臆测或推论,而要根据实际情况,切实弄清。只有这样的态度,才能取得主动,而不致陷于被动。

八、要同各国各种派别的各种人物,进行广泛的接触,特别是同统治集团中各派人物广交朋友。各国间的和平共处,就是要同各国统治集团中各派人物和平共处;各国间的友好合作,也是同这些人物的友好合作分不开的。撇开他们、越过他们去搞和平共处和友好合作,是达不到目的,也是不适当的。同这些人物的友好合作关系,对双方国家和人民,对整个和平事业都有利。

九、在外交工作中,要使主观的需要和客观的可能结合起来。只有照顾到双方的需要和双方的可能,事情才能办成。因此一方面要积极进行工作,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条件,促进事情朝有利于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增进

相互关系的方向发展 ;同时也要反对外交活动中的主观主义 ,反对不根据实际可能条件的盲目积极性。凡事要力求做到“瓜熟蒂落” ;“水到渠成”。国际事件和各国情况的发展变化是复杂的 ,曲折的 ,只有经过反复的工作 ,才会看到结果。我们不能因某些表面的好转就盲目乐观 ;也不能因一时的挫折而悲观失望。对其他国家 ,不进行工作 ,消极等待 ,是不对的 ;但是急躁冒进 ,要求过高和过急 ,也是不对的。

十、要坚持我们和平外交政策的原则性 ,但是在策略上必须根据当时和当地情况 ,力求灵活 ,争取主动。反对把原则变成僵硬的死教条 ,使原则缺乏新鲜的生命力。违反原则是不允许的。但是灵活运用不仅是可以的 ,而且是必要的。原则必须在多样性中体现出来。在对外活动上 ,也不要同一些兄弟国家千篇一律 ,不要公式化 ,而要根据本国的地位和特点 ,尽量发挥各自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做到异曲同工 ,殊途同归。

十一、坚持执行和平外交政策 ,必须以我们的国内工作为基础 ,为加强和巩固我们的国力服务。我们决不侵犯别人 ,但是也决不允许别人侵犯我们。我们的和平政策必须以我国在经济、政治、军事上的强大和我们社会制度的优越性为后盾。我们反对“实力地位”政策 ,因为它是侵略的 ,但是我们也必须加强自己的国力 ,以便有可能击退帝国主义“实力地位”政策的威胁 ,保卫和平和打败任何敌人的侵略。

十二、对于执行和平外交政策应该具有充分的信心和勇气,因为这种政策不但符合我国人民的利益,得到我国人民的全力支持,而且也符合各国人民的利益,得到全世界人民的拥护。执行这种和平外交政策,使我们有可能争取到和平的国际环境,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和平的外交政策是唯一正确的外交政策,具有极大的优越性。它能使我们在外交上处于特别有利的地位,在同帝国主义的外交斗争中,掌握主动,取得胜利。

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

(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一日)

我是搞外交的,对经济是外行,情况知道得很少,发言权不那么多,讲些外行话吧!这次庐山会议,是总结经验嘛!

一 大跃进的成绩

“成绩应该说够”,我也赞成。《记录》草稿^[413]列举的成绩都是事实。工农业发展速度很高,公社建立起来了,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各方面都有跃进,应该加以肯定。中国人民在总路线的鼓舞下,鼓足干劲,反对保守,解放思想,创造了许多奇迹。连外国人也称赞我们的大跃进。《记录》的这一部分有必要讲充分,因为在民主人士中、党内外干部中,对成绩估计、认识不足的情况是有的,表示怀疑的也是有的。

* 一九五九年七月二日至三十日,中共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庐山会议)。这是张闻天同志在华东组会议上的发言。

成绩从何而来？来自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体现了主观与客观、精神与物质、政治与经济的结合，体现了生产中数量与质量的结合，也体现了按比例发展。三个“并举”，“两条腿走路”^[414]，就是按比例发展。总路线的贯彻执行，是靠发动群众，靠实事求是、群众路线这些原则。所以，大跃进的成绩，就是总路线的成绩。这些伟大的成绩，我是感觉到也看到了的。

二 缺 点

缺点主要发生在去年九月以后的一段时间。再后来，虽然还有一些，但基本上纠正了，没有那么厉害了。在这方面，同志们讲得少一些，我想多讲一些，希望不致引起误会，以为我专找岔子。既讲成绩，也讲缺点，这也是“两条腿走路”嘛！

对《记录》草稿所讲三条缺点，我都同意，但觉得可以讲得再具体些。例如关于比例失调的一条，可以指出其原因是指标过高、求成过急。关于“共产风”的一条，可以指出主要是所有制和按劳分配原则的问题。除了已列的三条，还可以考虑再加一条：下放过多，体制紊乱。内蒙就反映，下面各自为政，什么都调不动。

缺点的产生是由于没有很好执行总路线，违背了总路线，它们多少损害了总路线的成就，大跃进的成就。

三 缺点的后果

讲缺点,就要研究其后果之所在。这是为了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以便采取措施,纠正这些缺点。不讲缺点产生的后果,对缺点的认识就不具体,印象就不深刻,问题也不容易看清楚。《记录》草稿的一个缺陷,就是整个文件缺乏有机联系,东一团子,西一团子。其原因,就是在讲了形势之后,立即转入对各项任务(读书、综合平衡等)的叙述,没有指明缺点产生的后果。

那么,究竟产生了些什么后果呢?

先看比例失调这一条缺点带来的后果。

由于指标过高、求成过急,引起比例失调,就造成了很大损失。要是具体地算一算,就可以看出损失确实是很大的。

首先是钢铁产量指标过高带来的影响。最初定的是三千万吨,后来是两千万、一千八百万,再后来又不得不降到一千六百五十万吨。钢铁指标过高,其他指标也被迫跟着上,就造成生产的紧张和比例失调,引起很大损失。对钢铁的作用片面强调,强调得过分,所谓“元帅升帐”,其他让路,结果就破坏了按比例发展的法则。原来强调一下是需要的,因为要优先发展重工业。但是强调过分了,就不好,何况重工业也不单是钢铁。对发展钢铁生产的客观条件也估计过高,要求增产过急,同

当时的实际可能不相符合,以致产量指标被迫一缩再缩,影响所及,整个经济计划直到六月初才定下来。六月以前一再变动,每次开会都是大批人马算帐。这种变动造成生产中的动荡、不稳和混乱,带来了损失。比例失调至今还没有完全扭转,我们还在背这个包袱,还在被动,各个部门还在动荡。

一九五八年的粮食产量估计过高,以及今年粮产指标规定高达一万零五百亿斤,也造成了损失,使吃、用发生了问题。至于钢铁指标订得太高,是否就是由于对粮食估产过高,仿佛粮食问题既已解决,便可大干钢铁,两者之间是否有此因果关系,这倒不一定。有些同志认为是这样,有些同志认为不是。究竟如何,可以研究。但是,现在调整估产过高、指标过高引起的问题,确实要花很多时间和精力。

钢产指标过高,引来了全民炼钢。为了完成指标,不得不把一切力量,包括土炉子,也一起用上。应该怎样看炼钢这个局部问题的得失呢?全民炼钢的意义很大,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也得到了一定结果。但是,也应该看到它的缺点,看到它造成的损失。问题不单是赔了五十亿元,最大的问题还在于七千万至九千万人上山,抽去了农村中的主要劳动力,打乱了工农业劳动力之间的正常比例关系,使农副业生产遭受很大损失。粮食收得粗糙。棉花收起来了,但质量很差。松香、木耳、油漆,都没有人搞了。这么多人上山,历史上没有先例,可谓盛况空

前。但是,只搞炼钢一件事,单打一,这也是空前的,对农业、副业、手工业,都产生了严重影响。这个包袱,我们也是至今还在背着。在这一具体问题上的得失如何,可以研究,现在还难以断定。

但是,“全民炼钢”的口号本身是不妥当的。去年干什么事都提“全民”,甚至要求“全民写诗”,搞得老百姓不胜其烦。所有事情都搞“全民”,相互间势必发生冲突,有些事势必被挤掉。在炼钢这件事情上,只能是钢铁工人再加上一部分人。全民炼钢的方法也有问题。不经过事先调查资源,不知道有没有铁矿,条件还不那么清楚,就搞几千万人盲目上山。现在冷静下来考虑,去年有没有其他办法能够增产钢铁呢?我看是有的。去年五月八大二次会议^[415]时,少奇同志已经提出,钢产量可以超过七百万吨。如果在此基础之上,提高原有厂的利用系数,再按各地条件,搞一些小洋高炉,那么,把钢产搞到八百多万吨,恐怕是可能的。这样做,比较合乎实际,比较可行。可是后来却提出了钢产一千多万吨的指标,而且又采取了那样一种办法。当然,我现在这样说,是事后诸葛亮。有同志说,大洋炉^[416]必须从小土炉开始,炼钢一定要经过小土炉。那也不一定,从洋炉子开始也是可以的。实际上,中国的钢铁工业就是从大洋炉开始,后来才提出大中小结合。总之,我们承认全民炼钢运动有意义,但其得失关系可以研究,这个运动、这种方法,可以研究。当然,这是局部性质的问题,时间只有三个月。

由于指标过高、求成过急，生产和基建方面都产生了一系列问题：

——基建战线太长。一个指标提高，其他指标就得跟着提高，于是基建纷纷上马，现在又不得不纷纷下马：限额^[417]以上的项目下马者五百多个，限额以下的项目下马者五千到一万个。这些项目都是搞了一半，中途下马，挪用了银行贷款。当然它们将来还有用，但是现在资金积压，材料分散，造成很大浪费，而且使主要项目不能按期投产，今年上半年限额以上项目真正建成的只有六个。基本建设中边勘察、边设计、边施工的做法，浪费很大。即使搞成了一些项目，工程质量也差。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失调，固定资金和流动资金的比例失调，造成很大损失。

——新增工人太多。由于生产指标提高，去年招工两千零八十万，造成人浮于事。假定其中五百万人是确实需要的，一千五百万人是多招的，又假定平均每人每月工资二十元，那么仅多招工人的工资一项，一年就达五六十亿元。这还仅就县以上的招工而言。县以下究竟招了多少，还不清楚。这批多招的人，不仅不创造价值，反而使劳动生产率降低，产品质量下降，成本提高，起了妨碍生产的作用。这个问题造成的损失也很大。

——许多企业产品不成套。主要原因是原材料供应不足和生产计划多变，根子还是比例失调。产品有所谓“六保户”^[418]。生产任务朝令夕改，一下子命令生产这样，一下子又要生产那样，刚刚上去又下来，经常下马，经

常压缩,给下面同志造成很大困难。产品不成套,就没有使用价值,也不能实现价值,造成物资、资金积压。许多工厂流动资金用光,靠向银行贷款发工资,太原钢铁厂就是这样。

——许多企业原材料缺乏,经常停工待料。轻工业部有个材料说,不少生产香烟、糖、纸的工厂就是这样。甚至象石景山钢铁厂这样的重点企业,也因缺煤而要停产。上海这样的重要工业基地,也难保证按质、按量、按时地得到外地调拨的原材料而维持正常生产。外交部到上海采购国庆十周年用的香烟,当地先要烟纸,给了烟纸又要香料;到景德镇采购瓷器,要给煤炭,还要给包装用的木箱、锯末。工厂停工待料,就是发了工资而不创造任何价值,损失是很大的。

——产品质量下降,技术水平下降。不注意设备维修,提出什么“轻伤不下火线,重伤如何如何”,硬让机器带病运转。煤炭只顾出煤,剥离、掘进都不怎么管了。炼出的铁,很多是不能用的。钢铁产品的质量,直接影响机械产品的质量。铁的含硫量太高,拿来造普通机器还可以,假如造好的机器,就很危险。轻工业产品的质量也下降。棉织品有洞洞,有黑点,出口了不受欢迎。最近德国使馆有一封信,几十万套出口衣服要求重新加工,由我们出钱。许多出口商品在国外信誉扫地。煤炭运到瑞士,三分之一是石头,要我们赔钱。到东南亚的商品包装差,一下船就散掉。现在情况开始好转,那时确有粗制滥造。在

质量下降的同时,成本提高,利润下降,甚至赔本。

总之,由于指标过高、求成过急、比例失调,就造成一系列问题:国家资金、物资大量积压、浪费,发了工资不生产,或生产了不能抵偿消耗,给各方面造成很大损失。

再看《记录》草稿所列第二条缺点即“共产风”造成的损失。

农村除受七千万人上山的影响,又对粮产估计过高,办起公共食堂,实行“吃饭不要钱”,而且闹了一阵“放开肚皮吃饭”,因而浪费粮食不少。“一平二调”^[419],打击了农民积极性。生产无人负责,损失很大。“平调”时杀鸡宰猪,牲畜的损失,据山东说要几年才能恢复。农村情况不好,使人口向城市盲目流动。总之,“共产风”在物质上造成很大损失,这是大错误。幸亏纠正得快,不然还有更大危险。主席在郑州会议^[420]上也讲,那时造成阶级关系的局部紧张,同农民关系的局部紧张。

以上这些问题,反映到市场上,就是供应紧张。不仅个人消费品的供应紧张,而且生产资料的供应,即生产部门内部的工业与农业之间、各工业部门之间的供应关系也紧张。因为比例失调了,不失调,哪有那么紧张?粮食紧张,只剩了这一点后备。食油紧张,城市供应定量降低,农村根本不供应。肉紧张,上海的供应量减少到每人每月六两。物资缺乏,人民手中拿了货币买不到东西。物价有些上涨,甚至有黑市。人民对这些情况是不满意的。当然没有到愤怒、仇恨的地步,但是不舒服,闲话不少。他们不

是同解放以前比,而是同一九五八年以前比,觉得今天不如那时。这就是说,市场供应问题,反映了人们之间的关系问题。

现在,供应情况有了一些好转。但是,要真正解决问题,还不是一下子的事。这是个同生产的调整联系着的问题。城乡人民手里拿着货币,当然可以储蓄一些,但是总要买东西,而国家手里却没有东西,因为生产失调,劳动力闲着没有创造价值。所以说,市场问题,不是简单的几样副食品问题,而是整个经济的比例调整问题,是经济法则问题。自来水供应,看上去很简单,现在也紧张了,抽水马桶没有水,有的钢铁厂因为缺水要停产。在这个简单的事情里,就非常突出地暴露了比例失调问题。

问题反映到财政金融上,是结余用完。一九五八年的结余用光了,今年上半年多收三十七亿元,也用掉了。国家大量的资金、物资浪费或者积压,货币不能回笼,只好靠银行增发钞票。经济上的问题,从财政金融不平衡上反映出来;财政金融不平衡,又对各方面产生影响。一个国家出现这样的情况,就很危险;如果再发钞票,问题就更大。这个问题可以解决,现在已经采取很多步骤,但也不是一下子可以解决的,要解决还得要有一段时间。

还有,国家的物资后备减少了。钢铁如此,粮食也如此。一个国家搞得只剩三百三十亿斤粮食后备,确是相当

紧张。计划经济要有后备,因为生产中的局部比例失调是经常可能出现的,有了后备就不怕。现在的情况是,比例失调太大,许多后备都用掉了。我们不仅不应把后备用掉,还要使它有所增加。一旦有个三长两短,例如大荒年或国际形势紧张,就能做到有恃无恐。

还有,外贸也很紧张。进口计划上半年完成百分之四十七,出口完成百分之三十七。也就是说,人家完成了计划,我们完不成。进口多,出口少,逆差七亿元。出口商品质量差,在国外名誉不好。总理专门为此召集会议,还是解决不了。

经济生活中这些方面的问题,应该同整个比例失调问题联系起来考察,不能夸大,但是要重视。

至于《记录》草稿所列的第三条缺点,即虚报浮夸、强迫命令,情况已发展得相当严重,带来的损失也相当大。它造成信誉损失,使我们党在人民中、在国内、外,失掉了信用。“你们吹牛皮,没有生产这么多,硬说这么多。”弄得我们很被动,产量指标公布不公布都被动。

虚报浮夸、强迫命令还造成很不好的风气。群众中本来是有不同意见的,但是不允许讲话,不允许怀疑,怀疑了就给扣帽子,“怀疑派”、“观潮派”^[421]之类。这些问题的严重存在,主要是去年三个月中的事。现在有了好转,基本上有了好转,但是要完全克服也不容易,这是要长期做工作的事。虚报现在还有,少报产量也是虚报。强迫命令也还有:你要退出公共食堂,就不给你粮食,而且要斗

你。这类事还不一定很少。

下放太多,体制紊乱,造成了半有计划、半无政府状态,发展了某些地方的本位主义、地方主义,破坏了各地区之间的协作关系。

总之,这些缺点损害了我们党和国家在人民群众中以至在国外的信誉。主席就说,我们在宣传问题上很被动。所以,我们在讲大跃进时,不仅要讲成绩,也要讲缺点及其后果。成绩是主要的一面,要肯定。讲缺点则可以使我们头脑冷静一些,全面一些。当然,由于领导不同,条件不同,这些缺点的严重程度在各地区并不是千篇一律的。

四 对缺点的估计

我同意《记录》草稿所说,这些缺点是局部的(但却是重要的),暂时的,有许多是难免的。《记录》草稿还讲到,这些缺点纠正得快,这点讲得很好。有的已经纠正,有的正在纠正。中央、毛主席领导很坚强,抓得紧,因此我们有信心纠正这些缺点。但是,纠正缺点,例如把比例调整好,也需要相当时间。可能有些问题现在还没有发现。例如财政平衡问题到这次才提出来,过去就没有得到重视。有了正确的决议案,能否一下子贯彻执行得很好,也不一定。而且,旧的缺点纠正了,新的还会产生。

五 产生缺点的原因

同意《记录》草稿所说,主要是缺乏经验。缺乏经验既是主观的,又是客观的。但是,总结经验时,就不能满足于说缺乏经验,而应该从思想观点、方法、作风上去探讨。脑子冷静地想一想,就可以取得经验,发现当时有些缺点是可以避免的。而且,现在已经证明当时确实就有人坚持实事求是、挡住了“共产风”。他们当时被当作白旗拔了^[422],现在证明是红旗。所以,《记录》草稿讲到产生缺点的思想上的原因,说缺点部分地是由于主观主义、片面性所引起,这话是对的。从研究、总结经验的角度看,尤其应该着重从思想方法、思想作风方面寻找原因,研究哪些缺点难以避免,哪些又可以避免。这样,今后就可以避免重犯这些错误。否则,都讲客观原因,就总结不出经验,接受不了教训。

六 主观主义和片面性

对于主观和客观、精神和物质关系的了解有片面性。有一个时期,把主观能动性强调到荒谬的程度。干劲虽大,但是强调得过了分,还反对讲条件,这就造成了主观主义。这是违反马列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的。有良好的愿望是好的,但是还要考虑实际可能。好大喜功也是好

的,但要合乎实际,否则就会弄巧成拙,欲速不达,好事变坏事。说坏事也可以变成好事,是就可以接受经验教训而言的。坏事本身并不是好事,我们要尽可能不办坏事。

比如订产量指标就不能凭愿望,想当然。可是,在这类问题上,正好看出我们的主观主义。冶金部过去订钢产指标,两千万吨、三千万吨,都说可以做到,结果总是做不到。现在降到一千三百万吨,能否完成,我看也还有问题。不论两千万吨,三千万吨,所提根据都是同样的几条,究竟这些根据是否经过调查研究得来的呢?订指标,总得有现实的可靠的根据。我们是外行,但是搞业务的人,应该有这样的根据的。在各个相互联系的部门中,如果有一个部门根据实际情况说高指标不可能实现,就可以对整个计划产生好影响。当然,这个部门也可能会因此被插上白旗。

如果说,虽然指标高了些,计划没有完成,但是总还是搞到了一些东西,我说,这样搞到的局部的成绩,不能拿来为主观主义及其造成的损失辩护,损失总是大的。主席经常讲要实事求是,上面这种说法就同主席讲的精神不相符合。

七 政治和经济

按照马列主义学说,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因此,领导经济要政治挂帅,这是对的。但是光政治挂帅还不

行，还要根据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客观经济规律不能否定，只能利用它来为我们服务。经济有经济的规律，它与政治、军事的规律不一样。但是，搞经济工作，不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同样是要吃亏的。我们是否真正认识按经济规律办事的意义？是否注意研究和运用经济规律？有的人根本看不起经济规律，认为只要政治挂帅就行。有的人公然违反客观经济规律，说是不用算经济帐，只要算政治帐。这是不行的。我们的经济活动，总是受经济规律约束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按经济规律办事，不能光凭主观愿望，光凭政治上的要求。单靠提几句政治口号，那是空的。今天总结经验，应该着重从经济规律上进行探讨。今后提任务，也不能单纯从政治任务的角度考虑，而是一定要合乎经济规律的要求。一定要考虑这项任务同各方面的平衡，否则，把重点过分突出，就会造成失调。工业布局，就不能光从战略上考虑。比如建设武钢，就要考虑到它与各方面的平衡，不能说武汉是战略要地，从政治上考虑一定要建设武钢，而其他条件是否适应就不加考虑。

“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这是法则，当然是对的。但是在经济建设中正是要找出相对平衡，利用相对平衡，按照相对平衡办事。我们利用相对平衡制定年度计划和五年计划，使之大体上是个平衡的计划。在经济上运用相对平衡，要考虑到计划可能会突破，遇有某一方面被突破，便及时平衡，这就是积极平衡。保守，消极平衡，

是必须反对的。但是 积极平衡也是平衡。

生产不能只满足于得到产品 ,还要考虑成本 ,要计算。有些“高产田”确是高产 ,但所用的化肥、种子多 ,成本太高 ,要赔钱。农民搞这种生产就要破产。有些企业 ,如重工业的某些企业 ,开始时总要赔本。但是 ,到底赔多少 ,要有个数 ,要争取逐步少赔 ,争取早日做到能有盈利。因此 ,我建议 ,在《记录》草稿中加一条——经济核算。

主张经济核算 ,主张算帐 ,并不是“算帐派”^[423]。主席说 ,经济工作要越做越细。就是说 ,要精打细算 ,要算帐。不算帐 ,社会主义是建设不起来的。有一个时期 ,我们的建设有不计成本、破釜沉舟的偏向 ,说是要算“政治帐”。其实 ,“政治帐”同“经济帐”是统一的 ,不能把它们对立起来。算经济帐 ,不仅要算今天的帐 ,而且要算明天的帐。这就是政治。因而它同算政治帐是一致的。如果现在无利 ,将来也无利 ,这样的事情就不能办。有些准备兴建的企业 ,如果从经济上考虑不合算 ,就应该考虑修改决定。当然 ,特殊的可以例外。

总之 ,我们国家“一穷二白”^[424] ,社会主义制度给了我们很快改变面貌的条件 ,但是目前还是“一穷二白”。我们的资金有限 ,应该严格控制使用。应该实行节约原则 ,把钱用在最有效的地方。摊子不能铺得过大。要反对大少爷作风 ,反对满不在乎 ,大而化之 ,以为从政治上算个大帐就行。我们每增一个工人 ,都要经过核算。现在有些工厂不执行中央关于招工的规定 ,一招工就是千把人。听

说太原钢铁厂现在有万把人放着,要做很多工作动员他们回去。这样的事是很不好的,划不来的。

主席要我们学政治经济学,据我的体会,就是因为我们忽视客观经济规律,对它估计不足。领导经济建设,不懂或不熟悉经济规律是不行的。中国的经济建设有其特殊性,但是普遍规律在我国的建设中同样起作用。问题在于要使普遍规律同我们的实际相结合,使马列主义理论得到发展。否认普遍规律是不对的。我们一定要研究、认识和掌握运用客观经济规律。

政治经济学,不仅高级干部要学,一般干部也要学。我提议编些通俗本。例如,农业上花多少人工,多少化肥,要计算成本,不然就要赔本。

搞经济工作,要学点科学技术知识。这方面许多东西我们缺乏常识。许多已有的技术措施、操作规程等,要研究其科学根据。要改革,也要在人家已有科学成就的基础之上改革,不能随便把原有的东西推翻。更不能随便吹,使人家看了觉得我们很外行。鞍钢把工业生产质量定额制度一把火烧掉了,好象打土豪时烧地契一样。现在到处找也找不到,弄得一个时期生产秩序很乱。生产技术措施没有科学根据,光用土办法蛮干不行,蛮干是要死人的。节约原材料,也要有根据。基建中不适当的节约,搞得建筑物摇摇晃晃,危险之至。对于已有的科学成果要重视。要搞新办法,一定要反复试验。“一切经过试验。”试验确实成功了,再推广。实验室里成功了,再推广。

还不等于在工业生产中也已成功。工业中少量生产和大批量生产也不一样。使一项产品的生产工艺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稳定下来并不容易，这也要经过一个时期的反复试验才能做到。例如，活性染料，我们说已经超过英国，英国人说我们吹牛。上海的“英雄”100型钢笔超“派克”，据说美国人开始很怕，后来试验了，说：“没有什么了不起，很多关键没有摸到。”原来并不超“派克”。上海造的表，也吹了一阵，其实走得也并不怎么行。“八字宪法”^[425]的原则完全正确，但是密到何种程度，肥要施多少，等等，也还要反复试验。超过世界水平之类的话，要谨慎，的确比人家高明再讲也不迟，而且以自己不讲，让人家替我们讲为有利。

八 三种所有制的关系

在刮“共产风”时，这方面的偏向很大，现在已经基本纠正。

集体所有的历史使命还没有完成，它还有生命力。现在的问题是要把它巩固、稳定下来。目前是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将来发展到基本公社所有制，也还是集体所有制。要发展到全民所有制，时间还相当长。现在不要强调它的改变。

要坚决贯彻按劳分配。我个人建议，取消“吃饭不要钱”，改为实行社会保险。对少数丧失劳动力的人，实行

“吃饭不要钱”是对的,但对多数人这样做,就不对了。我们不能搞平均主义。按现在的规定,工资部分在社员的劳动报酬中应占百分之六十至七十。这个比例实际上达不到,即使达到了,也还嫌少;以百分之三十作为社会保险,比例还是嫌大。我主张彻底一点。不缩小供给部分,按劳分配的原则就贯彻不了。现在有些人把供给制、公共食堂等同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怕取消供给制就不够进步,退出食堂就不是社会主义。其实,这完全是两回事,是两个不同的范畴。社会主义并不一定要采取供给制、公共食堂这种办法。

贯彻按劳分配,就要强调保护消费品个人所有制。现在在农村里,个人所有的东西比消费品还多一些,如自留地、小农具。至于消费品个人所有制,到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存在的。生产愈多,消费也应该愈多。对于穷和富的观念,要慢慢改变。按照多劳多得原则,劳动好,对国家贡献大,所得报酬就多,生活就富裕,富是由于劳动好。这样的富对个人好,对国家更好。它是应该的,光荣的。由于不爱劳动,好吃懒做而使生活穷苦,是活该,是可耻的。在社会主义社会,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是结合的,不能否定个人利益。共产主义风格、为集体牺牲个人的思想,这些可以宣传,可以用来要求少数人、先锋队、先进分子,但是不能当作制定现行政策的根据。如果社会主义不能满足个人物质、文化需要,就没有奋斗目标,社会主义也就建设不起来。对于这一点,中央是清楚的。但是一部分干部中

认识上有问题。他们仍想来一个拉平,用平均主义的态度来对待贡献大、生活富裕的农民,批判多劳多得而生活较好的人,说他们有资本主义思想,等等。对这些干部,要多做解释工作,给以耐心的教育,使他们的错误思想得到纠正。

九 民主和集中

首先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中国社会历来分散,革命胜利后需要强调集中。搞计划经济,不多注意集中更不行。过去的集中有缺点,分散一下是对的,但体制下放太多了,分散主义搞得很厉害。这有其社会、历史、地理的根源,往往是分散容易集中难。现在中央、毛主席强调权力收回,很好,我很赞成。企业随便招工,银行随使用钱,这怎么行?当然,集中要同发挥地方积极性结合。什么叫地方积极性?它主要应该表现在保证完成国家计划上。地方根据本身特点需要投资建设一些项目,也要列入国家计划。至于地方搞点油水,则是在完成国家计划后,在所得的利润中适当地分点成。

工业化要求分工更细。分工协作的发展,在历史上是一个进步。现在对这点应该加以强调。不能让各省、区都搞自己的经济体系,甚至一个工厂也要搞成既炼钢、又搞机械的托拉斯。这样做,据说是为了方便,简单,自己要什么就有什么,结果却是搞得质量降低,资金积压。社会愈

进步,组织愈复杂,就愈加要求分工协作,想简单,原始社会就更简单。

工厂企业内部的民主集中制,采用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形式,是正确的。但是,一经党委讨论决定,厂长负责这一条就很重要,不能弄得厂长不敢负责。现代化企业的特点是生产的连续性,需要有科学的、果断的指挥,不能慢腾腾,不能凡事都要讨论讨论。好象打仗要有指挥官一样,生产中也必须有集中的指挥,只能一人指挥,不能多人插手。

群众路线问题很重要,我们在这方面有很多创造。问题在于经济建设中实行群众路线应该有其特点。它与群众斗争中的情况不一样。搞群众运动要适应生产的要求,要有利于生产,而不能妨碍生产。我看到有些工厂里花样太多,似乎要想把所有好事一下子都做完。又是党的会议,又是团的会议,又是工会活动,还有写诗、学习,等等。结果搞得工人疲倦不堪。开会太多,工人休息不了,第二天就出事故。马雅可夫斯基^[426]讽刺“开会迷”,讽刺得很厉害。我们工人在这方面花的精力也相当多。所以,会议必须精简。还有大字报,是否要经常贴?我看,总结工作时可以贴,但是不能规定指标,追求数量,每人一定要写多少张,弄得工人通宵不眠。总之,花样要精简,政治工作要保证工人精力充沛,有利于生产。否则,搞得工人精疲力竭,不利于生产,算什么政治工作?还有,熬夜妨碍工作很大,不可多搞,只能在十分必要

时，偶尔来一次。

讲一下党内民主作风问题。主席常说，要敢于提不同意见，要舍得一身剐，不怕杀头，等等。这是对的。但是，光要求不怕杀头还不行。人总是怕杀头的，被国民党杀头不要紧，被共产党杀头还要遗臭万年。所以，问题的另一面是要领导上造成一种空气、环境，使得下面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形成生动活泼、能够自由交换意见的局面。《记录》草稿的第三部分第二小段有一段话说：“……必须在全党干部中间提倡说老实话，提倡实事求是的讨论。对于有些问题的认识一时可能有参差不齐，只要大家在实际行动中遵守纪律，那么这种现象是完全正常的，允许的。应该通过真正同志式的交换意见，逐步达到一致，不要采取粗暴武断办法，不要随便扣帽子。”我很欣赏这一段话。

这个问题对我们当权的政党特别重要。我们不要怕没有人歌功颂德，讲共产党英明、伟大，讲我们的成绩，因为这些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怕的是人家不敢向我们提不同意见。决不能因为人家讲几句不同意见，就给扣上种种帽子。是否提错了意见，就一定是观潮派、机会主义、右派呢？这也不一定。一个人是否真有问题，要经过一定时间观察。对一个人，经过长期观察其言论、行动，证明他确实是右派或观潮派，再扣帽子也来得及。这样做，对团结干部有利，对工作有利。

总之，民主风气很重要。要造成一种生龙活虎、心情

舒畅的局面,才会有战斗力。过去一个时期就不是这样,几句话讲的不对,就被扣上帽子,当成怀疑派、观潮派,还被拔白旗,有些虚夸的反而受奖励,被树为红旗。为什么这样呢?为什么不能听听反面意见呢?刀把子、枪杆子,都在我们手里,怕什么呢?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群众路线的人,一定能够听,也一定会听的。听反面意见,是坚持群众路线、坚持实事求是的一个重要条件。毛主席关于群众路线、实事求是的讲话,我认为是讲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真正要培养这种风气不容易。

十 缺点讲透很必要

至于说缺点正在改正或者已经改正,就可以不必讲了。这不对。现在经历了这样一段过程,问题看得更清楚了,事后诸葛亮嘛。这一段有痛切的经验,应该严肃研究,认真总结,这样才可以得到深刻的教育。如果采取轻率态度,泛泛地讲几句,就不解决问题。缺点要经常讲,印象才会深刻。我们那时犯盲动主义,毛主席就经常讲。所以,对缺点要采取郑重的态度,不要采取轻描淡写的态度。

有人说:“讲缺点会泄气,会打击积极性。”我看不会。对于我们参加庐山会议的同志说来,就更不会了。至于有些人不怀好意,企图否定大跃进的成绩,把我们说成漆黑一团,那就要同他们辩论、斗争,也不是泄气不泄气的问

题。相反地,光讲成绩,不讲缺点,是否会保持积极性呢?我看也不会,因为人家不服。我们对农民检讨几句,他就高兴,积极性就提高。马列主义者鼓励积极性靠真理,现在我们觉得有些虚,就是真理不够。增产数字报了那么多,实际上没有那么多。马克思说过,革命时容易办蠢事。列宁也说,要正视这些蠢事^[427]。做了蠢事不要怕讲,不要怕泄气。合乎马列主义的气,要鼓,但是不合乎马列主义的气,就是要泄。虚气泄掉,实气才会上升。是鼓是泄,要有一个标准。这次会议的文件,就是针对缺点写的,就是泄虚气的。

至于说,讲了缺点,就被认为是对成绩怀疑,对总路线怎么样,这种现象我看不会有。如果有,就要防止。讲缺点不是反对总路线,而是为了拥护总路线。何况总路线本身也是发展的,正如马列主义也是发展的一样。它也要通过实践的证明,并且不断修正补充,达到完整。所以,拥护总路线也要批评缺点,这不是同哪个人算帐。

十一 光明前途问题

前途光明,这是不成问题的。马克思、恩格斯当年只有两个人,就开创了无产阶级的天下。我们加入共产党,就看到了光明前途。我们现在有成绩、有希望、有办法,国内形势对我们有利,使我们可以继续跃进,因此,早已是光明前途。对我们参加庐山会议的同志说来,这一点更不

成问题,讲不讲都可以。

现在的问题是要防止骄傲自满、麻痹大意的情绪。要更多地看到存在着问题的一面。有些地方发生浮肿病,死了一些人,数字虽不大,但是问题是存在的。我们是乐观主义者,但是问题既然存在着,也得忧虑一点。主席讲的“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三句话中,“问题不少”一句值得特别重视。我们的胜利一个接着一个。胜利本身有消极面,因为它容易使人头脑发热,骄傲自满,问题也就容易随着产生。这一点必须严加警惕。去年搞了大跃进,就很容易地产生不冷静。去年九月以后,在国际关系中产生了严重的骄傲情绪,气焰很高,大国主义思想表现得相当明显。中国人过去受压迫,现在不断胜利,容易产生大国主义。不碰这个钉子,气焰还压不下去。中央现在纠正这种现象,很必要。谦虚一点有好处。头脑冷静一点,倾听一下不同意见,苦苦想一想我们的问题在哪里,把热锅上的蚂蚁变成冷锅上的蚂蚁,就可以总结经验,接受教训。否则,满足于成绩,虽然心宽体胖,却研究不了问题,接受不了教训。

许多事情,要等待时间来证明。毛主席就讲,要证明总路线正确与否,需要十年时间。我国经济建设的速度到底怎样,还要做起来看,要等待事实来证明。现在不要吹。农业生产能否每年保持增加百分之十,也要研究,要多想办法,不能骄傲。我们的发展一定比苏联快,也应该快,因为我们有它的经验可以借鉴,我们是“拿来主义”,把人家

最新最先进的东西拿来。加上我们人口比它多,天然条件比它好,中央领导坚强,能把普遍原理同具体条件相结合。但是,我们究竟能够快多少,还要研究,还要努力。现在不要吹,做到以后再吹不迟。我的意见是即使做到了也不要吹,让人家吹比我们自己吹更好些。我们有了成就,人家自然而然就会来研究我们的经验。

十二 关于彭德怀同志 的意见书^[428]

这份意见书提出了一些问题,中心内容是希望总结经验,本意是很好的。但是从各方面的反应看,不少同志似乎对彭德怀同志这个出发点研究不多,只注意了他这封信中的一些具体说法。其实,他的信是好的,是肯定了成绩的。他说,成绩是基本的。这同大家说的一样。至于个别说法,说得多一点少一点,关系就不大。

例如,他说,“基本上证实了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是正确的”,这话是对的。毛主席说,总路线正确与否要看十年。彭德怀同志说,一年就基本上证实了总路线是正确的。这估计就很高,没有什么不足。

关于得和失的提法,他是就局部问题而言的:在炼钢问题上,有得有失。而且从他讲话的意思看,他强调的是成绩。在这一方面有得有失,考虑一下是可以的。

至于各方面关系的紧张具有政治性的说法,我认为

要看怎样讲。在刮“共产风”时,各方面的关系确实紧张。现在已基本好转,但是除反革命利用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攻击我们外,人民内部还有矛盾,还有些问题没有妥善解决,我们还不能麻痹。所以,他提出这个问题,我们应该考虑。

他讲浮夸风,是从北戴河会议^[429]时对粮食估产过高说起,说它吹遍了各地区、各部门。他这样说,是说它的普遍性。当然,各地区、各部门的情况不平衡,对某些地区、部门说来,他讲的话可能严重了一些。但是,浮夸风确实是严重的,是很大的问题,现在也并不是已经完全解决。

彭德怀同志说:“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这个问题不说可能更好一点,说了也可以。究竟怎样,可以考虑。但是,刮“共产风”恐怕也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

至于说“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我认为,如果讲的是一个时期的事,这样讲问题并不大。

关于纠正“左”的偏向是否比纠正右的偏向更加困难的问题,有人说容易,有人说困难。“左”的毛病我犯过,那是盲动主义的路线错误,现在是局部问题,纠正错误肯定比过去容易。但是,是否一定那么容易,容易到什么程度,还要看我们的工作做得怎样。做得好,抓得紧,就容易;做得不好,抓得松,就不那么容易。

十三 成绩和缺点的关系

关于大跃进中缺点和成绩的关系,有人提二八开或三七开,我认为是一比九的关系。但是,人家那样说,我们也不要生气。这些说法可以研究,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坏处。即使说是三七开,也是肯定它基本上是好的。我们肯定斯大林,但是也说斯大林三七开。当然,斯大林是一个人的问题,我们的问题性质与斯大林不同。总之,成绩和缺点是客观存在,说多说少,都不会对它有所增减。今天我对缺点讲得多些,目的是为了总路线,为了更好地跃进,我并非怀疑派。有些地方措词不当是可能的,外行人容易说外行话嘛!

关于按劳分配提纲^{*}

(一九六一年八月)

(1)不劳动者不得食。多劳多得,少劳少得。

(2)这是社会主义原则,即是初期共产主义的原则。它为今日的社会主义服务,也为将来的共产主义服务。不实行这一原则,就不可能过渡到共产主义。

按劳分配所带有的资产阶级法权,是必要的,必然的,正是适合于实际情况的。要消灭这种法权残余,就要经过按劳分配阶段。

(3)关于按劳分配的错误宣传:

一种,似乎叫人们只关心个人的物质利益;

另一种,似乎叫人们不要关心个人的物质利益,而只关心集体利益,(所谓共产主义风格,其实列宁就反对过早向农村灌输共产主义!)^[430]说强调按劳分配就是经济

* 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以后,张闻天同志离开了外交部,一九六年起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在此期间他写下了不少理论研究笔记。本文选自“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笔记本(6)”,写于一九六一年八月十日、十一日。原题《关于按劳分配》,现题是张闻天同志在后来的笔记中提到此文时使用的。

主义。

这两种偏向都不对。正确的解释应该是建立正确的国家、集体与个人的关系,先公后私,公私两利。今天的共产主义教育,就是要使人们懂得,集体好了,个人也好了。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431])

多劳多得,同时也是对国家多贡献。多劳,多贡献,多得。

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各尽所能,就是为公;按劳分配,则是为私。

计较物质利益,并不只是计较个人利益,也是计较国家、集体的利益。我们不是利他主义者,也不是利己主义者,是两者的统一。

今天的评工计分^[432]、三包一奖^[433]、劳动定额、计时和定额奖励等等,经济核算等等,都是要斤斤计较物质利益。目的不仅是为了个人,也是为了集体,为了建设社会主义,也就是为了共产主义。

(4)关于“政治第一,物质第二”。

关于工资政策,劳动报酬政策,应该研究的首先是物质报酬问题。这个政策规定得正确,执行得正确,就是政治。正确地宣传按劳取酬,就是政治宣传。

把政治同物质报酬脱离,甚至对立,是不妥当的。

政治教育,必须有适合于当前经济政策的具体内容。不能脱离实际,成为空谈、说大话。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就是为了人们生活得更好。怕说

生活,怕生活好了就会资本主义化,这是一种错误的思想。

(5)必须从社会再生产的原理,来阐明按劳取酬。其实,按劳取酬并非完全按劳取酬(不折不扣的),而是有折扣的按劳取酬。

国民收入应分为积累基金与消费基金。

消费基金应分为个人消费基金与集体消费基金。

人民要改善生活,就要提高生产,努力劳动,给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集体的利益,同个人的利益是密切结合在一起的,——这正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优越性。不去谈多劳多得,怕谈多劳多得,实际上对社会不是有利,而是有害。

(6)既然劳动是光荣的,多劳多得是正当的,那么劳动好的人生活得好些,生活富裕些,就是应该的,正当的。这样生活好的人,对社会主义更加积极拥护。说愈穷苦的人拥护社会主义愈坚决,愈富裕的人愈不坚决,这样的观点,应该有适当的修正。

把公社农民的生活提高到富裕农民的水平,这应该是理想,不应该反对。富裕了就不好,那末谁还愿多劳多得呢?愈穷愈好,甚至装穷,这种思想与现象,并不能认为是正常的。

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矛盾是存在的,而且还将长期存在。但这种矛盾不在于多劳多得,而在于有些人想少劳多得,或者多得的人不愿再多劳,而想采取不正当的方

法(如投机等等)来更大地多得。这些资本主义思想的残余,或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思想,是必须经常进行教育与斗争而加以克服的。

(7)为什么社会主义的按劳取酬是客观的必要?

第一,因为生产资料公有制决定了人们劳动的平等权利,使用生产资料的平等权利,从而取得劳动产品的平等权利。

第二,因为生产力水平不够高,产品数量还不足以满足每个人的需要,因而分配只能根据已经生产的东西来分配,只能根据劳动来分配。

第三,因为劳动还没有成为人们生活的第一需要,所以只有利用这一原则来鼓励劳动(按数量与质量),发展生产。鼓励劳动者多方面提高其技术文化水平和劳动的熟练程度,更多地发明创造,利用新经验新技术等等,同时遵守劳动纪律,改进劳动组织等等。

(8)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力的再生产,也决定于劳动者及其子女的生活所必要的消费品的价值。但这个价值,不象在资本主义社会是支付工资的最高界限,而是最低界限。消费在社会主义社会内只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

(9)反对小资产阶级的平均主义,也反对过分悬殊的现象。

(10)增加集体消费基金是必要的。是以个人消费为主,还是以集体消费为主?应该以个人消费为主,但逐渐

增加集体消费基金,量力多办集体福利事业。

(11)工资政策,要有利于生产,也有利于生活。

(12)工资的提高,应该跟在劳动生产率的后面提高。扩大再生产是保证工资提高的先决条件。

(13)劳动力不是商品,不能买卖。这同资本主义有本质的差别。但国家也雇用劳动者。列宁曾经指出,在国营企业中,全体工作者都受雇于国家。当然这种雇佣不同于资本家的雇佣。这里存在着国家与个人的矛盾。当然不是对抗性的矛盾。为何要订立劳动合同,为何工会特别要在这方面起作用,其原因就在这里。国家往往可能为了国家的利益,不重视工人的利益,违反工资政策。

劳动力虽然本质上不是商品,但在商品生产的形式还存在的条件下,劳动力也还有其价值。如果劳动力没有价值,工资如何决定就成问题。劳动力的价值,就是第八项内所指的维持和再生产劳动力所必要的消费品的价值。

许多教科书不讲这些问题,怕说劳动力有价值。

社会主义下的劳动基本上虽为直接的社会劳动,但也不完全。由于劳动的差别性(熟练与不熟练、脑力与体力、复杂与简单等等),要计算劳动消耗,还必须把它转化为单一的抽象劳动,转化为价值,转化为价格。(还不能直接用劳动时间计算劳动,如象在共产主义社会那样。)在社会主义下,劳动力虽然基本上不是商品,但仍然需要有价值形态,有工资形态。这种形态有时使人们看不清劳动

和劳动力的本质,而产生雇佣观点(当人们只看到外表,而看不到本质时)。雇佣观点的产生今天还有一定的社会基础。

人们强调社会主义下的劳动是自觉、自愿、平等、自由的劳动,这基本上是对的,但也还有不自觉、不自愿、不自由、不平等的一面。按劳分配是自觉劳动的分配原则,但也带有强制性(不劳动者不得食)和不平等性(多劳多得)。因此,在劳动内部还有矛盾,还有两重性。有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个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有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矛盾。

在人们的思想行动中,不想劳动,怕劳动,挑拣“好”的、轻松的劳动,这些雇佣观点和雇佣态度的表现还是不少的,甚至还是相当多的。按劳取酬就是同这种思想行为斗争的有力武器。虽然它还带有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但却正好是反对资产阶级思想残余的有力武器。对付资产阶级思想残余,就要有带有资产阶级法权残余的武器!

(14)关于计件工资和计时工资。采用何种制度,应该根据何者有利于促进生产、何者适合于生产的具体条件为标准。其他标准都是次要的。

(15)关于物质鼓励和精神鼓励。

是物质鼓励加精神鼓励。

怕说物质鼓励是不对的。

仿佛谈物质利益就卑鄙,谈精神就高尚?

精神不能离开物质,无物质就无精神。

只追求物质享受,而不愿劳动,那是卑鄙的。劳动之后得到一定的物质享受,这有什么卑鄙?共产主义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要为它奋斗?一定的物质条件,使工人更有可能提高其文化与技术。物质鼓励同精神鼓励是分不开的。它们达到同一个目的,即促使人们努力生产、努力创造发明的目的。

精神鼓励是必要的。说明为什么一个人要受到物质鼓励,也就是一种精神鼓励。

为什么穷苦的人最革命?因为他们生活得最苦,迫切要求改善生活。改善生活的愿望无疑是推动人民群众积极参加革命、发展生产的伟大动力。经济生活决定人们的思想意识,人们的精神。精神一经发动,也就成为巨大的物质力量。

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都是利益,都属于物质鼓励的范围。

关于从物质利益上关心生产的原则,有不同的理解。怎样使收入差距缩短?

(1)按劳分配既反对平均主义,也要求消除工资上过分的、不符合实际劳动支出的差别;(2)缩小劳动者之间熟练程度上的差别;(3)收入上的差别会随着向共产主义前进而缩小,这在很大程度上同免费满足需要的公共事业的发展有关。

马克思讲,把工资从资本主义限制下解放出来,就能

够“把它扩大到一方面为社会已有的生产力所许可,另一方面为个人的完全发展所必要的消费的范围”(《资本论》卷3,1148页)^[434]。

工资的作用在于,一方面从物质上鼓励工人的生产,另一方面也从精神上鼓励其发展智慧、才能和技巧(“发展个性”)。

生产的发展,也是人的发展。生产的技术改造,也是人的改造。人的改造,又推动生产的发展。人的个性的发展,文化技术知识的提高,劳动能力的提高,经验的生长,也使人的要求不断提高和多样化(人的个性多方面的自由发展)。

按劳分配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着物质的和精神的条件:提高劳动生产率,巩固自觉的自愿的劳动纪律,提高人民的文化、技术水平和他们的生活水平。

按劳分配是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学校。

当前的主要矛盾 已不再是阶级矛盾^{*}

(一九六一年八月)

—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在思想意识上还将长期存在。但今天在思想意识上的主要矛盾,是否在于思想落后或超越于实际。当然这种矛盾也带有阶级烙印,但主要问题在于不能正确认识客观规律。在生产关系方面,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也还多少存在,但不占主要地位。在这方面的基本矛盾,能否说是在于生产力发展不足,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与个人的需要。

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基本规律,其本质应是一个东西:不断发展的生产与不断提高的需要之间的矛盾的统一。基本上是统一的(生产为了满足需要),但有矛盾(生产不能满足需要)。这种矛盾统一,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 这是几则笔记,选自“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笔记本(6)”。第一、二则写于一九六一年八月十五日,第三、四则写于八月十六日。标题是本书编者加的。

的矛盾统一的表现形式。

二

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即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当时社会的基本矛盾,是谁战胜谁,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个阶级、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等到集体农庄运动胜利,公布斯大林宪法^[435],宣告社会主义建成、私人资本主义消灭,谁战胜谁的问题、两条道路问题就基本上解决了。以后的问题,已经不是谁战胜谁、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的问题,而是不断发展生产以满足人民需要的问题了。

我国的情况是,在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七年的时间内,社会的基本矛盾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但在一九五八年后,就不能这样说了^[436]。同资产阶级思想残余的斗争是长期的,但不能说今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还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

三

把社会主义本质的东西、基本矛盾,归结为共产主义因素和旧社会残余的矛盾,把三个差别、所有制的差别、劳动报酬的差别,都说成是旧社会的残余、资本主义残余,是不正确的。这种差别同旧社会的差别,有根本性质

上的不同。这不是资本主义残余,这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特征。要改变这种差别,不能同这些差别去“斗争”,而是利用这种差别,去发展生产,最后消灭这些差别。

四

把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说成是两个阶级(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和两条道路的矛盾,说在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这一矛盾贯彻始终,这是否把阶级矛盾与斗争扩大化了?把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许许多多不同的意见,都看成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就必然要乱戴帽子,任意开展斗争了。“双百”方针当然也不可能实现了。

社会主义经济若干理论问题^{*}

(一九六一年八月)

一 关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

现在普遍的论点是,政治经济学只研究生产关系。湖北教科书^[437]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典型例子。它那里只讲生产关系,不讲生产力,使生产关系和生产力脱节。其实,这两者的不可分是如此的明显,有意把它们分割,必然陷于片面性。这种片面性,也就无法正确说明和了解生产关系本身。

马克思的《资本论》是马克思自己提供的研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的统一的鲜明的例子。它论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如何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又如何进一步促进了生产关系的变化,最后生产关系又如

* 这是一组笔记,选自“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笔记本(6)”,写于一九六一年八月。标题和第一、五、六、七、八个插题是本书编者加的,顺序也作了调整。其中第一节写于八月二十九日、二十一日,第二、三、四、六、七、八节写于八月二十三日,第五节写于八月十七日。

何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必然导致社会主义革命。离开了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发生、发展以至灭亡,是全然不可了解的。离开了生产力谈生产关系的发展,必然陷于主观唯心主义(“唯生产关系论”),正象离开了生产关系而谈生产力,必然陷于机械唯物论(“唯生产力论”)一样。湖北教科书就犯了第一种偏向。

马、恩、列确实也曾多次说到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生产关系的科学。他们为了强调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指出这一点,是必要的。他们指出,在物的关系的背后,要看到人的关系,阶级的关系,而过去一切经济学却忽视或有意隐蔽这一点。但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说,他们认为政治经济学“只是”研究生产关系的科学。他们的看法不但在《资本论》中可以看到,在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中也可以看出。

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也认为“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人们生产关系发展的法则”(见该书第65页),也有片面性。但是,他虽然把政治经济学看做是研究生产关系的科学,却没有主张离开生产力而孤立地研究生产关系。他说:“马克思主义把社会生产看作一个整体,它具有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同上书第56页)“只有具备生产的这两方面,才能有社会生产——不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或其他社会形态下都是一样。”(同上书第57页)

人们普遍认为,研究生产力就会使政治经济学成为

研究生产技术的科学。其实，“生产力”本身并非技术科学的范畴，而正是政治经济学的范畴。生产力是“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结合”，是“人们为了谋得物质生活资料而对自然界进行斗争的能力”。这是一种社会行为，一种经济现象，正是属于政治经济学的。当然，生产力的一些要素，如机器、生产工具等，可以从技术方面去研究，但为何不可以从政治经济学方面来研究呢？

也有人认为，研究了生产力，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就不明确了。其实，对事物愈是正确了解，阶级性就愈鲜明。片面性并不能代表阶级性。满口“生产关系”，其实际可能是完全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政治经济学把物的生产和人在这种生产中的关系结合起来。见物不见人，是“唯生产力”论，见人不见物，是“唯生产关系论”，都是不对的。不谈物的生产，不谈生产关系在物的关系中的表现，还有什么政治经济学？！

“生产”这个词本身，就包含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生产首先是对自然的关系，是生产力，其次是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商品有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有物的关系，也有人的关系。再生产有物质的补偿，有两个部类的比例，有生产力；也有价值的补偿，也有生产关系。劳动有具体劳动，生产力；有抽象劳动，生产关系。

政治经济学中，有些规律突出表现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统一的规律，有的规律生产力表现的比较突出（如按比例规律，劳动生产率不断增长，优先发展生产

资料的生产等),也有的规律生产关系表现的比较突出,但没有一个规律不是表现二者的一定联系的,因为没有一方面,就没有另一方面。

湖北教科书的缺点之一,就是只谈改变生产关系,而且强调不断改变生产关系,却很少联系发展生产力。过分强调改变生产关系的重要性,而不知归根到底改变生产关系是为了发展生产力,生产关系的改变最后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湖北教科书甚至将主张发展生产力的意见,名之曰“生产力论”。

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生产关系的科学,但它必须结合生产力和上层建筑来进行研究。

应该把“生产关系”分为二类。一类是所有关系,分配关系,阶级关系,另一类是劳动关系和上下左右的关系(如领导与被领导,中央与地方,这一部分与那一部分)。这二类生产关系原则上是有区别,但互相影响。它们都是生产关系,而不是政治关系或思想关系。后者属上层建筑,对生产关系起反作用,但不同于生产关系。教科书把这一切都混同了。对第一类关系,在一定时期内(相当长时期内)不能不断改变(或叫“调整”),第二类关系比较可以更多地改变,但也不能过多。不能把不断改变生产关系当做拜物教。没有生产力的一定程度的发展,生产关系是不能任意变更的。过早改变生产关系(如共产风)会破坏生产力,不利于社会主义的建设。

二 关于人与物的关系

教科书批评唯技术论,因而过低估计技术、生产资料、生产工具的重要性,而且把自己偏向了唯意志论。

教科书批评了“见物不见人”,但它自己却有点“见人不见物”。在生产中人是决定的因素,因为没有人就没有生产。但人的行动,受当时的物质条件限制;人不能为所欲为,物又决定着人。人要改变现状,首先要改善物质条件。人要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必须改变生产技术,实行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没有最新的技术,单靠体力劳动,社会主义是建立不起来的,更不用说共产主义。在工厂管理中不能单靠专家,要反对专家路线,这是对的。但是没有专家,工厂生产也是搞不好的。教科书在这方面是估计不足的。

三 关于平衡与不平衡

毛主席说:“所谓平衡,就是矛盾的暂时的相对的统一。过了一年,就整个说来,这种平衡就被矛盾的斗争所打破了,这种统一就变化了,平衡成为不平衡,统一成为不统一,又需要作第二年的平衡和统一。这就是我们计划经济的优越性。”(《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平衡与不平衡是矛盾的统一,不平衡是绝对的。这些道理都是对的。但湖北教科书从此得出国民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强调国民经济发展不平衡,则未必对。

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的规律,是在不平衡的运动中要求平衡,要求按比例。国民经济的运动有两种可能:不平衡的趋势和平衡的趋势。人们的有计划的领导,就是要避免不平衡,争取平衡。如果不平衡出现,及时加以调整,使之平衡。平衡本身是发展着的,但由于人们的主观能动作用和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社会主义国民经济可以经常是有计划的按比例发展,虽然这种发展是在不断调整的过程中的发展。在这里,由于情况不明,计划工作的缺点,可能发展成或大或小的比例失调,但那是可以改正的。说因为国民经济发展中有不平衡趋势,所以得出平衡只能是暂时的,不平衡才是经常的,这是否定了社会主义经济的有计划的领导作用,把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同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混同了。

再者,平衡本身也有相对稳定性,持续性。国民经济计划,可以是短期计划和长期计划。生产力的一定的发展,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需要有时间。同时,计划的制定,生产的安排,也需要有一定的时间。计划不能时时改变(指较大的改变)。社会主义初期,计划时间短些,越到后来计划时间愈长。

再者,制定国民经济计划,也不是只看今年一年的现状,而要瞻前顾后,估计到各种可能发生的变化。

四 关于眼前利益 和长远利益

有人把眼前利益说成只是物质利益,而长远利益说成是精神利益,这是不对的。其实在眼前利益中有物质利益,也有精神利益;在长远利益中也有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不过一个是今天要兑现的,另一个是在思想意识中存在(观念上存在),今天还未兑现,但将来也要兑现的。这两者是统一的,又是矛盾的。如何正确解决两者的关系,需要好好研究。不能一谈到眼前利益,就说是物质刺激,是经济主义,好象只有谈长远利益,才算合乎理想,才算高尚。不知道眼前利益中也有精神刺激,而长远利益中也有物质刺激!

生活比较困难的人,吃不饱饭的人,他们对眼前利益特别重视,甚至“斤斤计较”。这是不足为怪的。因为不计较,他们就要饿死、冻死。党的力量,就在于能够立即采取办法改善他们的生活,因此能够立即取得群众的拥护。如果空谈长远利益,而不解决眼前利益,群众就会不相信我们。未来的利益所以能动员群众,因为这使他们相信,经过斗争和生产是会改善他们现在的生活状况的。不能否认,物质利益对群众是一个巨大的推动力量。当然,这要加以思想政治上的解释,才能使群众了解。物质利益和思想教育是分不开的。

只给物质利益而不进行思想教育,就不能了解物质利益同政治的关系,同阶级斗争的关系,就不能提高人民的觉悟水平;只进行思想教育,而不给物质利益,思想教育就没有具体内容,就成为“买空卖空”了。

按劳取酬是根据劳动的质量和数量给以物质报酬,但它又是社会主义的分配政策,符合于社会主义利益,也有利于将来的共产主义。要解释这个政策的政治意义。把这一政策单纯当作物质刺激是错误的,同时因为要加强思想教育,就反对按劳分配,认为它是资产阶级法权,也是不对的。

五 关于资产阶级法权

教科书过分强调政治挂帅,反对物质利益原则,认为按劳分配的原则保留了“资产阶级法权”。

马克思和列宁都谈到过资产阶级法权(见《哥达纲领批判》、《国家与革命》)。

真正的资产阶级法权,没有引号的资产阶级法权,不但承认生产资料私有制是神圣的权利,而且承认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地主对农民的剥削、他们对工农的压迫也是他们神圣的权利,并且用一切法权关系保证这种权利。在社会主义下的所谓资产阶级法权,即带引号的资产阶级法权,不但不存在对生产资料私有的权利,而且也不存在对工农剥削、压迫的权利,而只是承认在实行按劳分配

之后,还存在着生活上的差别,生活水平上的不平等。这是平等劳动者间的不平等。把这种不平等称为“资产阶级法权”,正象列宁称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一种“资产阶级的国家”一样的。两者是根本不同的,但外形上还有近似之处。

马克思、列宁为什么特别讲到“资产阶级法权”呢?这是因为他们当时要同小资产阶级的平均主义者、一切平等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进行斗争,因而使用了这一术语。

六 关于党的领导和一长制

湖北教科书因为强调党的绝对领导,而主张党要“包办代替”,主张党政不分,显然是不妥当的。

决不能把党的领导等同于党包办代替一切。

党包办代替一切,把国家、工会、青年团的单独的作用给否定了。

马列主义原则是党领导一切,但必须经过各该组织的党员在群众中进行艰苦的工作,说服群众接受党的指示,并做出他们自己的决定。在群众中可能对党的指示有不同意见,有补充修改的意见。这种意见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不正确。党都必须加以郑重考虑。如果各该组织中多数人坚持他们的意见,党也不能强迫群众服从党的决定。

要知道党员在群众中只是“沧海一粟”。一千五百万党员在六亿五千万人中,是一个很小的比例。他们是先进分子,但并无命令一切的特权。

至于全盘否定一长制,把一长制说得一无是处,也是不妥当的。把一长制说成不要党的领导等等,是不合实际的。没有党的领导,哪里来的一长制?!

过分强调党委领导会产生两种结果,或者书记制代替厂长制,或者有党委集体领导而无厂长负责。最近强调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438],是对的。但党委的决定权也不能是有限的。工厂的生产计划、财务计划、调拨计划等,凡上级党、政决定的,党委一定要保证其执行,不能任意改变。不然,就只有民主,而无集中了。

七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矛盾和统一

湖北教科书过分强调社会主义内部的矛盾,因而否定精神上、道义上、政治上一致的重要性,这也是不对的。首先,矛盾并不否定统一,而是以统一为条件。有统一,才有矛盾。其次,正由于社会主义社会,是人统治物,不是物统治人,矛盾是非对抗性的,所以一发现矛盾,就能及时加以克服,所以团结、统一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各部分人民中间是基本的。团结、统一内部,旧矛盾克服了,又会发生新的矛盾,但新矛盾又会克服。如果说社会主义社会各部

分人民中间矛盾是基本的,斗争是基本的,那就是把社会主义社会等同于资本主义社会了。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矛盾的基本方法。毛主席的公式是:团结——批评、斗争——团结,团结是出发点与归宿点。这同教科书中的解释不相同。

八 关于所谓两条道路的斗争

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阶段,许多问题的争论,并非属于两个阶级和两条道路的斗争。如果把一切争论都归结为这种斗争,就是把阶级斗争扩大化,不利于党内民主,人民内部的民主。

如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是否能长期共存?有的人可能认为要长些,有些人则认为要短些,在这里尽可展开争论,各抒己见,做实事求是的研究,得出实事求是的结论。不能说,说长些的,就是右倾,而说短些的,就正确的了不得。

再比如高速度与按比例。有的可能主张速度快些,有的可能主张慢些。这里,也尽可以争论。不能说,主张慢些的,就是少慢差费,快些的,就是多快好省。

又比如按比例中的二大部类的比例的多少,积累与消费的比例的多少,都需要研究许多条件,需要经过实践的检验,不能说要求积累多些的人就对,少些的人就不

对 ,而且就是阶级斗争等等。

又如在现代企业中如何搞群众运动 ,等等。

这类问题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是大量存在的。这是人民的内部矛盾 ,只有多方面提出意见 ,交换意见 ,提供材料、证据 ,才能作出比较正确的决定。

关于社会主义和 共产主义的要点*

(一九六一年九月)

一 共性和差别(个性)

(1)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共产主义的两个阶段。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共产主义是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

(2)社会主义不是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从无产阶级专政的胜利到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完全胜利,在中国大约有八年时间是这样的过渡时期^[436]),它本身就是共产主义,不过是初级阶段的共产主义。

社会主义不是在共产主义经济形态以外独立的经济形态,它本身就是共产主义的经济形态。

否认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或否认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经济形态,把社会主义看作是一个没有独立经济形态的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

* 本文选自“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笔记本(7)”,写于一九六一年九月六日、七日、八日、九日、十日、十五日。

在理论上是站不住的,在政治上也是不利的。

(资本主义的发展也经过几个阶段,如生产协作阶段,工场手工业阶段,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阶段。但不能因此就否定以前的资本主义阶段是资本主义,而把它们看作是从封建主义到帝国主义的过渡时期。)

(列宁讲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是指从无产阶级专政到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并不是指整个社会主义阶段。)

(3) 社会主义的巩固和发展,就是共产主义社会的成长,就是为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准备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条件。它是共产主义社会发展阶段中的一个过渡阶段。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一切阶段,都是过渡的阶段。社会主义发展本身就有不同的小的阶段,在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之后,相信共产主义阶段还会有许多发展的小的阶段。共产主义社会不但不会停滞不前,而且还会以人类社会从未有过的速度向前发展。否认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从初级阶段到高级阶段的过渡阶段,是不对的。

(4)为了向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过渡,首先必须充分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促进社会主义的成长壮大。社会主义的彻底胜利,就是共产主义胜利的保证。社会主义阶段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必经阶段,不能跳越。不走完这个阶段,不完成在这一阶段所应完成的任务,不准备好向共产

主义过渡的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条件,就不能向共产主义过渡,不能到达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在社会主义阶段拥护社会主义就是拥护共产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就是反对共产主义。

(5)社会主义阶段担负着准备好向共产主义阶段过渡的一切条件、物质的和精神的条件的的光荣任务,所以这个阶段不可能是短期的和轻而易举的阶段,而必然是比较长期的,需要艰苦奋斗的阶段。社会主义建设者担负着为后人创造共产主义的巨大的、光荣的任务,为共产主义大厦建立基础工程的任务。反对轻视社会主义、急于想过渡到共产主义去的思想观点。

(关于社会主义阶段的“相对稳定性”和关于“凝固论”。)

为何说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是共产主义的经济形态(虽然还是不成熟的)?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有以下的基本共同点:

- (1)生产资料公有制;
- (2)劳动人民当家作主,互助合作,永远根绝了人剥削人和民族压迫民族的根源;
- (3)国民经济的有计划领导;
- (4)发展生产的目的,只是为了满足社会及其成员日益增长的物质的和精神的需要;
- (5)生产的动力是全体劳动人民各尽所能的劳动积极性。

为何说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不同于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呢?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还有以下的差别:

(1)生产力的水平还不够高,社会产品还不够丰富,还不能实行按需分配;

(2)两种公有制(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差别的存在;

(3)工农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城乡差别的存在;

(4)文化、技术和政治觉悟、道德水平还不够高;

(5)按劳分配而不是按需分配。

为何说,要实现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必须经过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必须巩固与发展社会主义呢?这是因为,巩固与发展社会主义,可以大大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文化、技术和政治、道德的水平,使消除两种所有制的差别以及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和劳力劳心的差别成为可能,并使按需分配也成为可能。简言之,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为共产主义准备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条件。

社会主义的巩固和发展过程,就是给共产主义建立物质、技术基础的过程,就是教育人们成为有高度文化技术和政治道德水平的共产主义者的过程,就是使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逐渐发展成为共产主义生产关系的过程。共产主义只有在社会主义所建立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才能达到。(这同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根本不同,社

会主义只有消灭资本主义才能建立起来。)

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规律,不只是社会主义本身发展的规律,而且也是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规律。认识和利用这些规律,不但是为了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而且也是为了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共同规律,在共产主义阶段仍将起着作用。社会主义的一些特殊规律(如按劳分配规律)在共产主义阶段将失去作用而为另一种规律(如按需分配规律)所代替。但社会主义的特殊规律仍然是为过渡到共产主义服务的。

二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1)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建立之后(即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动力,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的统一运动。现在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基本上适合于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因此,当前的任务是利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来充分发展生产力。没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社会主义就不能成长,向共产主义的过渡也就不可能。这不是“生产力论”,而是历史唯物论。

(2)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使生产关系要经常做一些必要的调整。这种调整是根据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而且只是为了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脱离发展生产力的需要而不断调整生产关系,不但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会妨碍生产力的发展。把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看做僵化不变

的东西,和把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看做可以任意调整的东西,都是把生产关系同生产力脱离,都是不对的。

生产关系调整的是否适合,要看它是否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增加了物质生产。

(3)在社会主义阶段,某些生产关系的局部调整(如属于所有制或分配制方面的),反映生产关系的局部的质变。因此这类性质的调整,不但本身需要具备有一定的条件,不能轻易进行,而且更不能违反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的质的规定性。某些生产关系的局部调整,如在生产管理的民主集中制方面或劳动组织方面的调整,虽然不属于生产关系的局部质变性质,但对生产力的发展很有影响,也必须慎重从事。一切生产关系的调整,都必须冷静估计当时生产的具体条件及改变后对生产可能发生的利害关系,不能保守落后,也不能轻举妄动。

社会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的发现和解决,必须要有一定的时间。发现矛盾需要时间,对矛盾进行具体分析并提出适合于这种矛盾的具体解决办法,也需要时间。匆促从事,并不是良好的方法。

(4)在社会主义阶段内,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本身也有自己的发展阶段。如从人民民主革命胜利、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以后到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七年),这是一个阶段,这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440];从社会主义全面建设开始到社会主义建成,这又是一个阶段;从社会主义建成到向共产主

义过渡,这又是一个阶段。在第一阶段,矛盾表现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这是“谁战胜谁”的斗争。这一斗争是以社会主义的彻底胜利、无产阶级的彻底胜利而告终。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建立之后,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基本上已经堵死了;资产阶级作为阶级基本上也已经消灭了(它的主要队伍在人民民主革命胜利时已经消灭)。虽然资本主义的某些因素还存在着,资产阶级思想残余还存在着,资产阶级分子也存在着,但已经不成其为决定的因素了。虽然对于这些残余下应有丝毫的忽视,但这终究是次要的矛盾了。所以,自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建立起来之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的主要表现,或基本表现,已经不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或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或“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因素和旧社会残余”的矛盾^[注1],而是生产和需要(也即是积累和消费的矛盾,农、轻、重的矛盾)或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矛盾^[注2]。这些矛盾的特点,就是在于它们基本上的一致性,统一性,不再是敌我矛盾,而是人民内部矛盾了。因此矛盾可以不断发现和不断得到解决。当然,由于资本主义因素的存在,资产阶级思想残余的存在,这种矛盾有时也带有阶级矛盾的烙印,但这并不改变这类矛盾仍然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性质。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的资产阶级思想,是可以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解决的。

〔注 1〕有人把供给制说成是共产主义因素,这当然是不对的。各取所需性质的供给制才是共产主义的。最低限度的必要消费品的供给制,不能这样说。

〔注 2〕在社会主义社会内,生产和消费的矛盾,从多方面表现出来。它可以表现为生产资料的生产 and 消费资料的生产的比例的矛盾,也可以表现为农、轻、重的关系的矛盾,也可以表现为积累和消费的矛盾。这些矛盾在生产关系上,表现为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的矛盾,也表现为人民的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的矛盾。这些矛盾解决的原则,是全面照顾、适当安排,是国家、集体、个人利益的结合,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的适当结合。但究竟如何结合为好,如何结合才算适当,这就可能发生各种不同意见和争论。这种争论,只有经过民主讨论,批评和自我批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才能解决。

有人把社会主义内所存在的几种差别(如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和由于按劳分配的结果所产生的人民生活水平上的差别),当作资本主义残余,或旧社会的残余,因此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就是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和这些残余的矛盾。这种思想是错误的。社会主义同共产主义所以有质的差别,就在于存在有这些差别。这些差别不是靠斗争能够消灭,而正是要发展社会主义,才能消除。这些差别,根本上已经不是资

本主义的残余。社会主义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以及生活水平上的差别,已经同资本主义下的这些差别根本不同了。这是社会主义下的差别,不是资本主义下的差别。消除这些差别,是社会主义本身的历史任务。当然,这些差别在形式上还带有资本主义残余或斑痕,还有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这是从资本主义转变过来的社会主义,不可能没有的。这些残余的最后消失,也只有依靠社会主义的生长壮大,和它的过渡到共产主义。

社会主义本身的发展就是成长着的共产主义。它的发展的动力,应该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内容去寻找,而不是从它同旧残余的斗争中寻找。

社会主义社会内的许多矛盾(许多差别),产生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身,不能任意消灭。它的存在与克服是这种生产方式的客观必然性(客观规律),是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过程的动力。这些矛盾不能看做是偶然性的“缺点”或“资本主义的残余”,它们是共产主义社会成长过程中的合乎客观规律的东西。只有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才能创造克服这些矛盾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同时这些矛盾的表现,在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也是发展着的,变化着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人们的任务,是不断发现这些矛盾的具体表现,并创造条件不断加以克服。(矛盾的解决,必须要有一定的条件。发现矛盾,并不等于现在就能解决这些矛盾。)

(5)在资本主义社会内,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统一的规律的表现,是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的私人性。这种矛盾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断“两极化”,不断激化。在一定阶段,内部矛盾也能得到暂时的解决。但每一次解决之后,矛盾不是削弱了,而是以新的更激烈的形式再产生出来,一直到对立双方以内战的形式出现,并以无产阶级的革命手段,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彻底改变生产方式而告终。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是被消灭了。社会主义代替了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特殊经济规律退出了历史舞台,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开始产生并起着作用。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统一的规律,是一切社会发展的普遍的规律,但在社会主义社会内的表现和作用却与资本主义社会根本不同。^{[注1][注2]}首先,在社会主义内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等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基本上是统一的,两者间有矛盾,但并非对抗性的矛盾。第二,矛盾的出现,可以经过人们的认识和自觉行动而及时得到解决。第三,矛盾解决之后,新的矛盾还会出现,但并不是旧矛盾的激化,而是两者间更加统一(和团结)。第四,因此,社会主义的发展,不是引导到(爆发式的)新的革命的转变,而是(渐进性的)和平转变。不是一个阶级消灭另一个阶级,而是阶级差别的最后消灭。从差别到无差别。第五,因此,共产主义不是从根本消灭社会主义而产生,而是从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起

来的。这种发展经过的是和平的转变。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是新的质变,是一种飞跃,但不是革命的突变(使用“不断革命论”的名词,应该是有条件的)。^[注3]第六,解决矛盾的方法,经过批评自我批评。是民主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而不是专政的方式。

[注1]在社会主义下,矛盾不是对抗性的,因此矛盾的发展有不同的规律性。

在社会主义下矛盾的性质改变了,这反过来又改变了矛盾发展的趋势、克服矛盾的形式和手段。

在社会主义下和在资本主义下,矛盾的发展的路线和趋向是不同的。

[注2]必须具体研究矛盾,不能把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的性质硬套到社会主义中来。

试比较资本主义矛盾和社会主义矛盾的差别:

(1)资本主义的矛盾

对抗性的矛盾。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阶级利益根本对立的两个阶级间的矛盾。

(矛盾的性质)

矛盾不能根本解决。矛盾的暂时解决,只是造成在更高基础上的重复。一时的缓和只是更激烈斗争的准备。

矛盾的发展过程是从差别到本质差别到对立(“两极化的对立面”)。矛盾必然发展为对立。

(矛盾发展趋势)

只有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才能根本解决资本主义的矛盾。

社会主义只有在消灭资本主义之后,才能产生和胜利。

因此只有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用革命暴力的方法,才能解决矛盾。

(矛盾解决方法)

(2)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

非对抗性的矛盾。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利益根本一致。

矛盾的解决,是可能的。矛盾不断产生,但可以不断解决。

某些矛盾的不断解决,可以使矛盾逐渐缓和以至消灭。

如几个差别,可以从资本主义的对立,到本质差别,到非本质差别,到消灭。当然旧矛盾解决了,新矛盾仍会产生,但新矛盾也可以逐渐解决。矛盾是永远会有也永远可以解决。

客观上,矛盾不能转化为对立。

但如主观上犯错误,矛盾就有发展为对立的可能性。改正了错误,对立性的矛盾又会缓和下来。

社会主义的矛盾,是在发展生产力、改善生产关系中求得解决。它不要求消灭社会主义,而是发展

社会主义,使社会主义逐渐向共产主义过渡。它是和平的转变。在思想意识上,解决矛盾的方法是批评自我批评。公式是团结——批评或斗争——团结。

〔注3〕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两个阶段的关系,能否套用“革命阶段论和不断革命论”的成语?值得研究。这里不是革命的阶段,如象人民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那样。这里是发展的阶段,同一经济形态的发展的不同阶段。飞跃,“渐进的中断”,质变,可以是革命的结果,也可能是改良的、完善的结果。在社会主义内,属于后一种。

三 社会主义的扩大再生产

社会主义的发展与成长及其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经济规律性,必须从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过程中来研究。社会主义的一切经济规律(包括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的规律性)只有在再生产过程中才能表现出来。离开了社会主义的再生产,孤立起来谈各种经济规律或经济范畴,必然会使理论与实际脱节,不能解决问题。

我们这里只想谈一谈从再生产过程来看社会主义怎样成长并且怎样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规律性,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统一的规律性。

(1)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问题,是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一切社会的基础,也是社会主

义社会的基础。其他一切,如精神生产,都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之上。物质存在是第一性的,精神存在是第二性的。

社会主义再生产问题,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问题。这里有人对自然的关系,即生产力问题;也有人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问题,即生产关系问题。再生产过程,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统一的过程,就是提高生产力和改善生产关系的过程,就是增加物质财富,改善人民生活的过程。

社会主义再生产,必然是扩大的再生产,而且是高速度的扩大再生产。否则社会主义就不可能迅速成长,最后向共产主义过渡。这就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这里的问题是:社会主义的壮大,国家的富强,决定于物质资料的扩大再生产,物质产品数量的增多和质量提高(多快好省)。因此,社会主义国家要最合理地最大限度地利用一切物力和人力(当然也是财力)来进行物质生产,缩减非生产性的物力和人力的消耗。要考虑如何合理安排或以何种比例分配物力(物化劳动)或人力(活劳动)于生产与非生产部门,分配于生产资料部门和消费资料部门。在利用物力、人力方面,主要是最合理地、最充分地使用现有物力和人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同时增加新的物力和人力。教育人民真正重视生产劳动,重视物质生产。

(2)社会主义再生产是扩大的再生产,高速度发展的再生产,因为社会主义国家年生产的总产品和总产值不

仅能在自然形态和价值形态方面(前者分为生产资料的产品和消费品;后者分为 $C + V + M$)补偿生产中的消耗,而且还有新的剩余产品和剩余产值,也就是还有积累。所有生产部门的产品和产值,不但够本,而且还有赢利。没有剩余产品和产值,没有盈利,没有积累,就不可能有扩大再生产,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自然也不能过渡到共产主义。

这里的问题是:要研究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比例,成本与利润的比例,安排年总产品、国民收入、纯收入的关系,国民收入中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的比例。所有生产单位必须进行经济核算,精打细算,不但算大帐,而且也算小帐。使每年生产,不但够老本,而且有盈余。目前没有盈余的企业,同样也要经济核算,以便将来也有盈余。必须实行严格的节约制度,不浪费人力物力,不浪费时间,不浪费一针一线,以增加社会主义的积累。

社会主义生产愈发展,积累愈多,积累愈多又愈能扩大再生产,这样使社会主义经济可以有高速度的发展,有利于为共产主义准备物质基础。

(3)扩大再生产,就要把积累基金分成生产基金和消费基金,生产基金中又要分成生产资料生产的基金和消费资料生产的基金;消费基金中又要分成满足个人需要的消费基金和满足社会需要的消费基金。(一般教科书只把国民收入分成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积累基金只指扩大生产用于物质资料方面的资金,而用于增加工人,增加

消费品方面的资金,则归入消费基金。)为了扩大再生产,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生产的工业部门,同时也要相应发展消费资料的生产部门。这中间必须要有一定的比例,使之适合于高速度的扩大再生产,其目的是要既能满足生产的高速度发展,又能更多地满足人民的消费需要,适当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这里的问题是:社会主义生产的扩大和高速度发展的程度,要根据于生产产品积累的数量和质量,有多少布做多少衣服,有多少米做多少饭,不能有主观主义。生产资金的分配,要有一定的比例,生产的需要和生活的需要,要统筹兼顾,从全局出发来打算。必须要有一定的物资后备,准备生产脱节或自然灾害或战争之用。

(4)从扩大再生产的过程可以看出,社会主义的发展就是国家经济力量(全民所有制)的加强,就是人民公社经济力量(集体所有制)的加强,就是人民生活水平文化水平的提高。这都有利于向共产主义更高阶段准备条件。(人民公社经济的发展,使人民公社的公积金增加,社有经济力量增加,有利于从基本队有制向基本社有制以至向全民所有制逐渐过渡。这也有利于这种差别的逐渐消灭。)

从扩大再生产过程中可以明显看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怎样表现为生产与消费的矛盾,积累与消费的矛盾,生产两大部类和农轻重比例的矛盾,国家、集体与个人之间的矛盾,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的矛盾。党和国

家的任务,就在及时发现矛盾,加以妥善解决。从这些矛盾的表现中可以看出,这些矛盾并非对抗性矛盾,这些矛盾是在社会主义发展壮大中的矛盾,是成长中的矛盾,这些矛盾是可以解决得使之既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成长,又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的。〔注〕

〔注〕关于这一矛盾,在各阶层、各集团、各种人物中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反应,表现出多种多样的不同意见。这类意见只要不是反社会主义的,就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应以人民内部的方法求得解决。是否真是反对社会主义的,也要认真研究,不能乱戴帽子。即使原为反对社会主义,经过批评,已经放弃己见的,也应以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要以反社会主义论罪。各种不同思想中间,会有各种各样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思想,那都可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求得解决。思想上不通的人,只要组织上服从多数,服从上级决定,也容许保留。这样方能言路大开,真正做到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使一切关于这类问题的解决,真正合乎实际情况。

(5)社会主义经济学对社会主义再生产问题,应该做很好的研究,而现在,一般对这一问题都很马虎,或者不考虑。不考虑在这一问题中所包含的马列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甚至违反这些原理,这是不应该的。把再生产

过程全面摆出来,指出其中无可争论的基本原理,对不了解问题的人,就会有很好的说服力,对于伪马列主义者也容易揭发。〔注〕

〔注〕虽然由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生产发展速度要比资本主义快得多,但物质生产的增长,是一点一滴的,物质、技术、经验积累过程,在手工业、半机械化的条件下,不可能太快。从建设开始到建成到过渡,不能不是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不可能很短。人们文化、技术水平和思想、道德水平的提高,新的劳动习惯和风气的养成,也要相当长的时期。

四 社会主义的经济 基础和上层建筑

(1)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是有机的统一体,所以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必然要联系到它同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虽然上层建筑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特别是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不能不研究它同上层建筑的关系。因为社会主义经济不同于资本主义经济,它是由党和国家自觉地根据被认识的经济规律来组织和领导的。

(2)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这是马列主义阐明的社会发展的普

遍规律。但在社会主义社会内,这个规律有它自己的特殊表现。

党所领导的国家,是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政治。社会主义的政治决定于社会主义经济。由于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劳动人民之间在生产中的互助合作关系,和按劳取酬的制度,所以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除了政治职能以外,特别突出的,是它的经济组织的职能和文化教育的职能。它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并动员和组织全体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并准备过渡到共产主义去的一切条件。它为全体人民服务。政治决定于经济并为经济服务。政治不能脱离经济而独立存在。

(3)社会主义国家是国民经济的组织者。国家所采取的一切经济政策和措施都影响于国民经济的发展进程。国家所采取的政策如果是符合于国民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国家就能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否则就会阻碍其发展。国家对经济不是消极的,被动的,而是积极的,能动的。共产党对国民经济的领导作用,首先通过国家来实现。政治占首位,就是指党和国家对国民经济的领导作用而言。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或者可叫全面表现,全局表现,概括表现,统一表现)。它全面反映国民经济的诸规律,并利用这些规律为国民经济服务。没有党和国家的领导,社会主义就不可能成为自觉的、有计划的,就不可能顺利地发展,当然这样也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

同自发论、同客观主义不相容。经济不能脱离政治,而且政治占首位。

(4)党和国家对国民经济的领导作用,直接表现于它的经济政策,经济计划和许多具体经济措施,表现于动员和组织千百万人民为实现这些而斗争。国家对经济的发展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在一定条件下(在归根到底它是为经济决定的条件下),它起决定的作用。但这并不等于说党和国家可以违反社会主义经济规律而为所欲为。党和国家不能无视、取消或改变客观经济规律。党的一切政策等等都必须根据客观规律来制定,都必须和客观经济规律发展的主要趋向相一致。党必须善于利用和驾驭这些规律为共产主义服务。党和国家愈能正确地认识这些规律,熟练地运用它们,它们就愈能顺利地建设社会主义、愈能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社会主义同主观主义、唯意志论不相容。

(5)正因为党和国家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巨大作用,正因为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必须在为人们认识之后,成为“被认识的必然”,才能为人们所利用,所以它们对国民经济的领导作用,无比复杂和艰巨。它们必须对经济做深入的调查研究,发现其规律性,然后根据此种规律性定出政策、计划、措施。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在这方面犯了错误,就会直接影响到经济,影响到亿万人民的生活。因此,对此必须谨慎从事。在这方面,一般说来,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问题在不犯大错误,即使犯了大错误能

及时发现,及时纠正,就是很好的领导了。

资本主义经济规律是自发起作用的。资本主义国家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在这些客观经济规律前面无能为力,它不能起经济组织者的作用。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必须在被认识、被利用之后,才能起积极作用。而党和国家由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可以认识和利用这些规律,所以国家就有直接组织经济的任务。

(6) 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内,工、农、知识分子的经济利益基本上是一致的,各族人民的经济利益基本上也是一致的。这种经济上的一致,又表现为政治上精神上的一致。如果说,生产资料私有制使人们分散、隔离、对立,把人们分成为不同的敌对的经济集团,那末,生产资料公有制则使人们联合,统一成为一个伟大的集体,把各族人民团结成为一个友爱的大家庭。这种团结、统一和友谊是社会主义优越性最显著的表现之一。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任务,就是发展和巩固这种团结。但是由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内还存有几种差别,因此也就存在有矛盾。这种矛盾也在政治上表现出来。工、农、知识分子间的矛盾,国家、集体与个人之间的矛盾,在政治上的表现是很为复杂的。由于这种矛盾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党和国家的任务,就与资产阶级国家不同,不是站在一个阶级、一个集团的利益上,反对另一个阶级、另一个集团,而是“统筹兼顾,全面安排”,是照顾到各个

阶级和集团的利益，巩固工农联盟。矛盾的解决，不但不破坏团结，而更有利于团结；不但不削弱群众生产的积极性，而且更有利于发挥群众的积极性，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根据生产力的发展不断调整生产关系，就是要经过党和国家的自觉行动来实现。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客观经济规律，一定要经过人们的自觉利用，才能发挥其积极作用。由于这种矛盾不是对抗性的矛盾，所以解决的方法，主要的应该根据民主集中制原则，依靠教育与说服，依靠批评和自我批评。

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内，几种差别将长期存在，所以矛盾也将长期存在。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改善，矛盾将不是激化，而是逐渐和缓。党和国家的任务，就在于及时发现矛盾，解决矛盾。

(7)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国家必须使人们能够掌握经济规律，掌握生产技术，并且有高度的生产积极性，正确的劳动态度，很健康的身体。国家的文化、教育职能，就是为此服务的。社会主义生产力的提高，生产关系的改善对人们提出了新的要求。党和国家不但要改造自然，而且也要改造人。上层建筑的文化思想领域，也必须动员起来，为经济建设服务。思想政治工作，文化教育工作，都要为发展生产服务。只有生产发展了，劳动时间缩短了，人们的文化水平、思想水平，才能进一步提高，人们才能从自然力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从生活问题上解放出来，而成为多方面全面发展的自由的人。文化教育应为经济服务，

经济又把文化教育工作提到更高的阶段。

社会主义文化教育的特点,就是马列主义是唯一统治的思想体系。所有各阶级各阶层都接受马列主义,在马列主义的旗帜下团结一致。但在思想领域内的矛盾,还是比较复杂的。这里,需要克服的是各种各样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各种保守落后的思想和盲动冒进的思想。在思想领域内实行民主,发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发展自由争论的空气,在社会主义国家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正因为马列主义是唯一的统治的指导思想,所以更需要如此。)人民思想生活的活跃,科学文化的繁荣,真正做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极为重要。

(8)从上面可以看出,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基本上适应于经济基础,能为经济基础服务,但两者也有矛盾。基本适应,表现在党和国家基本上掌握着经济规律并利用这些规律指导着国民经济的发展。矛盾主要表现在,党和国家在领导经济上,由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短,经验不足,还有缺陷。这些缺陷表现在:有的经济规律还未摸透,有的规律还未充分认识或者认识有片面性,因而某些政策、计划或措施不尽合乎实际情况。有些政策虽有原则规定,但还缺乏具体措施,或者虽有具体措施,但未被下级正确了解和执行,或被官僚分子或反坏分子有意歪曲。

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还有官僚主义,脱离群众,下情不能上达,群众未充分发动,没能很好贯彻群众路线。没

有很好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管理制度,民主不够,或集中不够,批评与自我批评未能很好开展,等等。这些缺点,都使经济方面所发生的问题,不能及时迅速反映,加以正确的研究和处理。但这些矛盾,是能够解决的。虽然它们的解决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和条件。每一次解决,会使上层建筑更能为经济基础服务。当然,经济的发展又会使两者之间发生新的矛盾。矛盾及其解决,永远是我们前进中的动力。

待研究:在经济建设中如何大搞群众运动?轰的办法如何?

实践在认识事物中的作用,应强调。它是认识的基础,真理的标准。

提高文化的重要。社会主义建设,没有文化不行。

关于集市贸易等 问题的一些意见^{*}

(一九六二年七月十日)

一

在我国当前经济形势发展过程中,在市场和物价方面,有以下趋势表现得比较明显。

一、由于工业品不足、农副产品特别是粮棉油不足和国家发行货币过多,农副产品在集市(即所谓“自由市场”)上的价格(即“自由价格”)提高很多,虽然由于供求关系的变化,这种价格也有一定程度的起落。国家在计划市场上按计划价格供应的工业品(包括食品工业的产品)在集市上都有黑市价格(即“自由价格”)。在那里甚至国家的各种票证和购货证也都有黑市价格。这些黑市价格都比国家的计划价格高得很多。农民对国家开放集市贸易是满意的,因为他们可以高价卖出他们的农副产品,同时也可以买进(虽然也是高价)一部分国家所不能供应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但他们对市场上物资数量太少、品

^{*} 这是张闻天同志一九六二年四月至六月在江苏、上海、浙江、湖南四个省市的城镇、农村进行调查研究后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

种太少,国家对集市贸易管理太严、限制太死,使他们不能自由卖出他们的农副产品并买入他们所需要的物资,是不满意的。看来,许多人为的限制并不能取消黑市,却反而助长了黑市物价的上涨,给投机商人以更多机会。而在限制较少的集市,上市物资就比较多样,物价就比较低些,投机倒把也比较少些。

二、国家对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包括征购和派购),也多少随着自由市场价格的提高而相应提高了。一九六一年,国家公开提高了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一九六二年,各地所实行的单项奖售^[439]和综合换购^[440]等办法,是各种变相的提价。各地实行这些办法时,标准不一,造成收购价格上的一些混乱现象。农民对这些办法虽然有比较好的反应,但他们还不以此为满足。他们比较普遍的要求是,国家把征购、派购的任务一次定死,他们保证完成这些任务;同时,他们要求有权把一切剩余农副产品(包括一类物资^[441])^[441]在集市上按自由价格出卖,并自由选购他们所需要的商品。虽然国家现在禁止一类物资及完成派购任务前的二类物资^[441]的公开出售,但这些物资仍然经过各种途径和形式进入自由市场。这种趋势,也就影响到国家对农副产品收购计划的完成。这里要特别提一下,国家完全禁止一类物资的出售,目前使重点产粮区的粮农损失比较大。粮农按国家收购价格出售农产品,不但不能保证其扩大再生产,甚至简单再生产也难于维持。国家今天急需粮食增产,而粮农今天却处在最不利的

地位,这对各方面说来都是不利的。

三、工业品(包括手工业品)的价格,除一部分国家计划供应的必要品种以外,也多少正在跟着自由市场物价的提高而提高,其中有的是公开的提价,有的是变相的提价。国家为了平抑物价,或维持原定物价,使不少轻工企业和手工业企业亏本。它们难于维持生产,或使国家财政受到损失。不少国营工业企业,甚至供销合作社,为了勉强维持国家原定价格,也做着赔本的买卖。在各种原料、材料和生活资料涨价更多的条件下,国家要维持许多产品的原定价格已日益困难。各地方企业为了维持生产和职工生活,自动提价的比较多。同时,国家用高价出卖的产品品种也正在增加。这对回笼货币,起了一定的良好作用,但对提高物价也是一种刺激。以上这种趋势,已经引起城市职工生活水平的某种程度的下降,从而也引起了他们的某些不满。

四、为了谋利谋生,一部分农民、手工业者、城市中失业的和一部分下放职工及其家属和学生等,现在参加集市贸易,甚至干脆成为小商小贩的,数量日益增多。这一方面解决了许多人的生活问题,对活跃集市贸易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同时投机倒把违法乱纪的行为也大为增加,对社会秩序也有不好影响。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有所发展。合作商店、夫妻商店和专业的小商小贩重新活跃起来了。资本主义成分有从中生长起来的趋势。

五、集市贸易的发展,自由市场的影响的扩大,使国

营商业、供销合作社和手工业合作社也逐渐参加进集市贸易中来了。它们的活动开始在集市贸易中发生了一定的领导和调节的作用。集市上出现了两种倾向,即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倾向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倾向,它们之间的矛盾开始发展起来了。集市贸易市场有扩大成为地区性市场并成为—个地区的经济活动中心的趋势,它要求突破妨碍物资交流和商品周转的一个地区内或各个地区之间的各种人为的限制和障碍。

二

我认为,这种趋势是当前经济生活中所必然要产生的一种客观趋势,因而认为,象中央现在所采取的利用这种趋势中的积极因素,给这种趋势以调节和领导(所谓“因势利导”),使之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有利于克服当前财经情况的困难的方针政策和计划措施,是完全正确的。我现在还想根据中央指示的精神和当前市场、物价方面的上述趋势,提出一点意见。

一、坚持中央发展集市贸易,使之成为经常的和固定的集镇贸易的方针。那里,不但可以容许直接生产者和直接消费者的买卖活动,不但应该有国营商业、特别是供销合作社、手工业合作社的贸易活动,而且也应该容许和利用合作商店、夫妻店、个体手工业者以及小商小贩的合法的买卖活动。这些活动,除了本集镇以外,还可以有领导、

有计划、有组织地超出本地区范围,而同其他有关地区发生物资交流的关系。国家应多想方法使一个地区内和各地区之间物资交流的各种渠道畅通无阻。这样,使集镇市场既成为本地区经济生活的中心,又成为全国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样做,不但有利于调剂本地区的有无,而且也有利于调剂各地区之间的有无,有利于挖掘全国许多没有动用的物质资源和潜力,有利于发展农工业生产和满足群众生活上和生产上的需要。显然,在国家物资供应困难的条件下,经过物资交流的发展,是可以解决许多实际困难问题的。

二、我认为,国家应明确宣布:完成一类物资的征购任务和二类物资的派购任务,是农民对国家的义务。这是一种义务交售制,是农民对国家的经济任务,也是政治任务。国家把现在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固定下来,不再继续提价,也不再采取单项奖售和综合换购等许多复杂麻烦的办法。同时,国家把这种义务交售的数量和品种加以可能的压缩。一类物资的交售数量,应该根据城镇人口的减少及农村返销的减少而相应减少(这方面似乎还大有文章可做)。二类物资的派购的数量和品种,更可缩小,办法也还可改进。此外,国家还可以有计划地从征购派购任务中减去国家估计可以从市场上购进的农副产品的数量和品种。这样,农民的负担可以有部分的减轻,农民手中就可以有更多的农副产品了。国家再明确宣布,农民在完成其交售任务后,有在集市上按照市场价格自由出卖其农

副产品(包括粮棉油在内)的权利。这样,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就可以划分得更加清楚。农民是很拥护这种办法的。这种办法可以大大提高农民生产和增产的积极性,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同时也更能动员农民手里的剩余农副产品到市场上来出卖,有利于商品周转和调剂有无。对农民手里的这一部分剩余农副产品,国家可以从集市上按照市场价格购进必要的数量和品种,以补足国家的需要。事情办得好,国家不但从收购中可以补足在征购派购中所减少的数量和品种,而且还可以超过。这对国家也是有利的。当然,事情办得不好,也可能完不成收购计划,风险也是有的。

三、为了基本稳定城市职工的生活水平,国家对城市居民已经实行了必要商品的定量供应及对一定品种的商品实行购货券的办法。国家在保证城市职工的生活水平上所做的努力,城市职工一般是满意的。实际上这是一种配给制。凡配给的东西,国家都按现在低价的配给价格出售。除此以外,我认为:国家的所有商品,不论是那一种工业品(包括食品工业产品),都可以一律按较高的市场价格在城市和集镇出售。特别缺乏的工业品和食用品,象现在中央已经采取的高价办法那样,可以用特高价格出售。同时,国家就利用这样售得的货币,在集镇市场上依市场价格来购买农民自由出售的剩余农副产品。国家就是这样,将工业产品和农民手里所剩余的农副产品进行交换。这是从农民那里取得其多余的农副产品的有效方法,是

最易为农民所接受和欢迎的方法,也是巩固工农联盟的正确方法。

如果采取以上办法,城市职工的基本生活水平虽然仍然可以保证,但可能还会有某种程度的下降。为此,国家在必要时可以考虑从商品提价所得来的收入中,拿出一部分来补贴城市职工的工资。这种办法对职工有好处,对国家也不会有额外的损失。

四、象中央所指示的,集镇上合作商店、夫妻店以及个体的小商小贩的活动,在今天发展物资交流和商品流通中,还有其积极的一面,应该加以利用并发挥其积极的作用,但必须加以管理。凡是从事专门商业活动的小商小贩,应该进行登记,使之合法化,以便于必要的管理和监督,从而减少他们从事违法乱纪的破坏活动的可能。但“投机倒把”的观念,应该限制在违法乱纪的范围内,不要扩大化。关于何谓“违法乱纪”,国家也应该公布若干条,使大家有所遵循。商人是没有不搞一点投机倒把的。禁止一切投机倒把,就等于取缔小商小贩。这在目前而且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是不妥当的。同小商小贩和一部分农民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作斗争,不要采取简单的行政措施,将其“管死”,而要采取适当的经济措施,加以诱导和利用。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应该在集市上积极活动,发展业务,在“谁把生意做得更好”这一标志下同私商进行竞赛。我们要靠做生意的本领,即“文明经商”的本领,而不靠简单的行政措施去赢得竞赛的胜利。必须承

认,我们现在所不够的正是这种文明经商的本领。我们在这方面还必须努力学习。只要我们学会了文明经商的本领,资本主义的自发势力是并不可怕的,一些资本主义成分的产生也是不可怕的。我们拥有一切条件去战胜它,而且一定能够战胜它。而只靠单纯的行政措施,就达不到这样的目的。

附带提一下:我认为,对登记了的专业商人征税是必要的。对为数众多的农民、职工、学生、贫民等从事无定型的和流动性的零星贩卖活动的,国家应该给他们以教育和管理,使他们遵守国家法律和秩序。凡是能够参加生产的,尽可能动员他们参加生产,但以不收税,不对他们采取粗暴的敌对态度为有利,否则只会造成税务人员和公安人员同他们之间不必要的紧张关系,而有利于少数坏分子的从中挑拨和破坏。

五、我认为,只要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积极活动起来,再加上国家其他经济措施的影响,集市就不可能再是“自由市场”,集市上工农业产品的价格也不可能再是“自由价格”了。它们会逐渐向有领导和有调节的市场和价格过渡。当然,这种过渡的快慢,还要看我们的经济力量和经营业务的本领。这里是要有一个过程的,但是只要我们加强领导和调节,集市上工农业产品的市场价格,比较“自由市场”的“自由价格”必然会有逐渐下降的趋势。这里特别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要善于根据市场的行情变化,掌握工农业产品价格的适当比例。如果工业品价格提

得太高,农副产品价格压得太低,农民就不愿在集市上公开出售其产品,那样又会产生新的黑市和新的黑市价格,国家从农民手里就会买不到所需要的农副产品。这对国家显然是不利的。反之,如果把副产品的价格提得过高,工业品的价格压得太低,国家就买不足所需要的农副产品。当然,这对国家也是不利的。所以,今后如何规定集镇上工农业产品价格的适当比价,使之有利于国家、集体和个人,有利于工农联盟,这是一种非常复杂和困难的任务。但是实践的经验终会告诉我们,这种比例的分寸应该是什么。这里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国家在集市贸易上的价格政策,要尽量灵活,尽量主动,不要僵化和被动。一个地区的一种比价,如果发现不利于商品周转,不利于买卖双方,就要及时调整,变不利为有利,不要迟迟不决,坐失时机。由于我国地区辽阔,各地条件悬殊,国家在規定全国各地的物价指标时,应该富有伸缩性。同一种商品,不但有地区差价、城乡差价、季节差价、质量差价、批零差价和供销差价,而且这些差价本身,各地也还有差别,难于一致。所以,国家在集市贸易上应该给各地方商业领导机关和商业领导人员以较大的机动权,使他们能够根据当时当地集镇市场上行情的变化,及时调整工农业产品的比价。一种商品的价格,只要能销出买进,只要有利于产、供、销三方面,就大体上可以认为适当的。这里,应该自觉地运用价值规律和供求规律的调节作用,使买卖愈做愈活,愈做愈大。

六、国家在货币政策上,除了中央已经采取的回笼货币的许多办法必须坚持以外,我认为凡确实有利于发展生产和发展贸易的资金,应该投放的就应该及时投放,不然,就会使生产和贸易停滞,这对克服当前困难反而不利。应该发挥人民币在全国范围内一般等价物和流通工具的作用,充分利用它为发展生产和贸易服务。(注:对重点产粮区许多生产队生产资金不足的情况,特别希望加以重视。)

三

如果采取以上提出的一些办法,则今后我国市场和物价的发展趋势,大体可以预测如下:随着国家财经情况的好转,工农业产品的增多,通货膨胀的消除,市场物价会逐渐下降。那时,国家就会主动采取逐渐降低物价的措施。同时,随着城市职工工资的逐渐调整和提高,配给制度也就成为不必要了。两种价格的局面,就会逐渐消失,而为一种价格所代替了。

当然,采取以上一些办法的具体步骤,要尽量谨慎,做到稳步前进,减少突然性,不使在人民中间造成震动。采取以上一些办法,风险还是有的,但可能会更主动些。是否如此,是很值得研究的问题。根据我的体会,中央现在所已经实行的办法同这里所提出的一些办法之间的差距,是不大的。

不能把阶级斗争扩大化^{*}

(一九六四年二月)

一

许多思想上的矛盾,产生于认识上的差别。这种差别可能是由于两种不同世界观产生的,可能是由于同一世界观产生的,可能是由于基本上属同一世界观、但也有差别而产生的。即使两个马列主义者,对同一事物的认识也不可能完全一样,而常常是不一样,从而发生争论。这种争论当然不能说是阶级斗争。

二

工、农、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矛盾——基本上不是对抗性的矛盾,是劳动人民内部的矛盾。解决这些矛盾的方法,主要是批评与自我批评,

* 这几则笔记节选自“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笔记本(9)”。标题和段落序号是本书编者加的。第一则写于一九六四年二月三日,第二、三则写于二月七日。

不是阶级斗争。把它一律叫做阶级斗争 ,是扩大化。

三

消灭资本主义的残余(不论是思想的、政治的)同社会主义的建设是分不开的。

社会主义的建设包括经济建设和政治思想建设。

消灭与建设相比 ,建设是主要的 ,消灭为了建设。

“一分为二”的说法有缺点^{*}

(一九六四年二月五日)

现在一些文件上,把对立统一规律通俗地称为“一分为二”的规律。这种说法有缺点。因为“一”本来是对立统一的一,而不是无矛盾的一;“二”本来是统一的发展,而不是无矛盾的“一”的分裂为“二”。

国际工人运动中的分裂,是工人运动内矛盾的发展和激化,而不是先是无矛盾,然后才有矛盾。

人的“异化”,是社会分工的发展的结果,而不是相反。

矛盾的解决,要经过斗争,但不一定发展为分裂。矛盾发展到分裂,要有一定的条件。在另一种条件下,矛盾可以不发展到分裂。

^{*} 这是一则笔记,选自“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笔记本(9)”。标题是本书编者加的。

人民群众是主人^{*}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

—

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解放,必须依靠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领导的共产党,这是一条规律。但共产党只有同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紧紧团结在一起,并使他们接受和实行共产党的正确的路线,才能实现其领导。这又是一条规律。

领导必须有所领导。脱离群众的领导,不成其为领导,等于人的头脑脱离人的身体和四肢一样。没有人民群众的自觉自愿的行动,单有共产党,是什么事情也做不成的。人民群众的解放,是人民群众自己的事情,是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斗争过程。共产党不能靠命令、靠恩赐

^{*} 这是《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一文的节录。标题是本书编者另拟的。张闻天同志一九六九年十月被送往广东肇庆看管,在此后的六年中,写了许多文稿,本文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衡量党的路线政策的最高尺度》、《党内斗争要正确进行》、《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内的公私关系》,都是从中选出的。

来做到这一点,而只有靠正确的领导和教育。共产党必须在革命的每一阶段规定符合实际情况的自己的方针政策,以此来教育群众,使他们懂得为何斗争和如何斗争。这种教育不但要在口头上或书面上进行,尤其要在实际斗争中进行。这里,要使群众的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结合起来,并根据群众的切身经验,逐步提高他们的自觉性,达到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而斗争的水平,直到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为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斗争的水平。

这当然是一个长期的斗争过程和教育过程,但这是可以做到的。因为共产党所提出的方针、政策,在任何革命阶段内,只要是正确的,都符合于人民群众的要求和希望,都有可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不是凭空臆造出来的,而是从群众中来的,代表群众利益的,所以它以此来教育群众,到群众中去时,最后能为群众所接受和实现。这表示出党和群众之间的一致性。

但这种一致性,总是在两者之间的矛盾中展现的。这种矛盾表现在党开始不了解或不甚了解群众的要求和情绪,提出的方针政策不符合或不完全符合群众的利益,因而群众不赞成或反对;或是群众还不了解党的方针政策是真正代表他们的利益的,因而也不赞成或反对。这种矛盾,只有经过党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党加强对群众的方针政策的教育,以及帮助群众根据切身经验提高认识,才能逐步解决。这种矛盾是始终存在的。这种矛盾的不断解

决,是党自己教育自己,提高自己革命的自觉性的过程,也是教育群众,提高群众自觉性的过程,这也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自觉性的发展的过程。这也表示出,党不能没有群众,群众不能没有党。群众是基础,党是领导。

二

在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上,人民群众是主人,党是勤务员。

人民群众之所以需要共产党,就因为它能为人民群众服务,它是人民群众手中进行解放斗争的工具。党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产物,是人民群众的斗争的一定阶段上的产物。当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彻底解放了,共产主义实现了,党同国家机关一样,也就不再需要而自行消亡了。只有我们时刻记住党和人民群众的这种关系,我们才能自觉地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把我们一切工作的重心自始至终放在人民群众身上。

共产党的一切方针、政策必须来自人民群众,并由人民群众来检验。赞成与否,拥护与否,执行与否,只能由人民群众自己下决心。党不能对人民群众实行包办代替、强迫命令的办法,而只能用说服教育的办法,把真理告诉群众;但群众是否照此行动,只能由群众自己决定。如果群众不拥护和执行我们的方针政策,即使我们自己觉得我们的方针政策再好也没有,也不能把事情办好。世界决不

只是因为我們有了很好的方针政策而有丝毫的改观。世界是客观的存在,是物质的东西。这种物质的东西,只能用物质的力量,即人民群众的力量,才能加以改造。单有思想,即使是最好的思想,它对物质世界也不起一点作用。只有这种思想掌握了群众,为群众所拥护和执行,思想的精神力量才能转化为物质的力量。而要使党的方针政策为群众所拥护和执行,根本的条件是这种方针政策必须真正代表群众的利益和要求。否则群众是不会拥护和执行的。思想政治工作,可以是有效的,也可以是无效的,其最终的界限就在这里。不反映群众真正利益和要求的思想政治工作,做得再多,也不能动员群众自觉自愿地行动起来。我們的一切思想政治工作的中心,就在于使人民群众懂得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是真正代表他们的利益的,他们是新社会的主人,他们的解放是他们自己的事情,共产主义的事业是人民群众自己的事业,这一伟大事业是一定会胜利的,从而使他们对共产主义具有充分的信心和高度的革命热情,并决心为它牺牲奋斗。

三

党最容易犯的错误,错误中最危险的和致命的错误,是脱离群众。这种情况,在党成为执政党以前,固然容易发生;但在党成为执政党以后,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更容易发生,其危险性也更大。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党是国家机关的唯一的和最高的领导者,党的领导者也是国家机关的首长,他们做决议,下命令,领导一切,指挥一切。他们处在领导者和首长的一种特殊地位,工作特殊,生活也特殊。这种特殊的情况,使党和国家机关的某些领导者常常容易产生一种错觉,似乎他们是站在群众之上的官吏,他们有一种高人一等的优越感,似乎群众有义务服从他们的领导和指挥,他们可以为所欲为,发号施令。这样就把主人和勤务员的关系颠倒过来了,象旧社会历史上总是颠倒过的一样:他们是主人,而群众则是为他们服务的。由于某些领导者工作和生活的特殊性,加上旧社会地主、资本家、官僚政客的旧思想、旧作风的影响,有些人在思想上、作风上和生活上逐渐脱离群众,最后蜕化变质为同人民群众对立的官老爷。

同时,在人民群众方面,由于过去长期以来受尽地主、资本家、官僚政客的欺压,有些人也容易以旧思想、旧习惯来对待现在的党政领导者,把他们看做官老爷,认为他们有权有势,往往对他们唯命是从,把一切革命胜利的果实,都说成是他们的恩赐,说他们是群众的救命恩人、救世主,对他们歌功颂德,唯恐得罪他们而遭受惩处或迫害。人们还不了解或不完全了解,人民群众才是真正的主人。革命胜利和幸福生活的获得固然由于共产党的领导,对共产党人表示信赖和尊敬是正确的,也是自然的,但使革命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是人民群众自

己的力量。人民群众方面的旧思想、旧习惯，也是促使党和国家机关的某些领导者骄傲自大、自以为是、脱离群众的另一个原因。

这样，在无产阶级政党面前提出了一项任务，就是真正使人民群众成为国家的主人，而党和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是名副其实的人民勤务员。

四

为了使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脱离群众，首要的问题，是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和深入，发动越来越多的群众来参加党和国家的一切工作，使群众自己当家作主，自己管理自己。

为此，就需要党真正领会毛泽东同志所提倡的领导群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方法，即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在这个领导方法中，必须自始至终贯彻着人民群众是主人，而党不过是勤务员的根本观点。党不但要在“从群众中来”时，虚心向群众学习，而且在“到群众中去”时，也需要向群众学习，接受群众的鉴定和批判。这是自始至终向群众学习的过程。当然这也是党不断提高群众和教育群众的过程。在“从群众中来”时，党必须使群众的眼前利益和局部利益同群众的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结合起来。然后“到群众中去”，在宣传、教育中提高群众的觉悟水平，并见之于行动。这是党为群众服务的过程。在这个

过程中,党既当群众的学生,也当群众的教师。但这里只有能真正当群众的学生的人,才能当群众的教师,而教师的作用不过是人民勤务员的作用,决不能骄傲自大、自以为是、凌驾于人民群众的头上。这是关于党领导的群众路线的基本内容。能不能贯彻执行群众路线,是马列主义党还是机会主义党的根本区别。

五

但是,仅仅懂得群众路线的原则,还是不够的,这个原则必须在组织上巩固起来。组织上巩固这个原则的,是党和国家机关的民主集中制。

“从群众中来”,只有充分发扬人民的民主,即充分发动群众参加党和国家机关的任务的讨论,充分考虑到群众的各种意见,才有可能做到。没有民主,“从群众中来”就会变成空谈。但我们所讲的民主,是为了经过民主的讨论之后,把群众的各种意见集中起来,化为系统的党的意见,化为党的方针政策,然后把方针政策再“到群众中去”。这时又需要充分发动群众来鉴定和批判这些方针政策,坚持正确的,补充不足的,修改错误的,取得群众的支持,使政策成为群众自觉自愿的统一行动。然后又总结经验等等。这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又是在正确指导下的继续发扬民主。这种民主集中制,是党的群众路线的组织保证。能不能实行这样的民主集中制,也是马列主义的党

和机会主义党的根本区别之一,也是资产阶级国家和无产阶级国家的根本区别之一。

没有民主集中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群众路线。民主集中制是形式,但这是正确表现群众路线的内容的形式。内容决定形式,但内容一定要在一定的形式中表现出来;形式保证内容。表现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党章党法和表现国家的民主集中制的法制法纪,所以必须严格执行的原因,就在这里。

以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为例。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无产阶级国家的表现形式。一切国家机关的重要决定必须通过人民代表大会,照人民代表大会的规则办事。尊重人民代表大会的组织形式,就是尊重群众的表现。把代表大会当作无关紧要的可有可无的组织形式,就是不尊重群众的表现。关于党的代表大会,也应该这么说。党和国家的领导机关应该定期在党的代表大会或人民代表大会上做形势和工作报告,接受群众的批评,听取意见,经过讨论然后通过决议等等。所有这些,决不能看作是无足轻重的形式,它们是党和国家机关的领导的群众路线的具体体现。领导人的任命和撤换,经过一定的会议讨论决定,也是非常重要的。经过这些组织形式,使人民群众更多地了解国际国内的形势和工作情况。不但使他们知道有利的方面,也使他们知道不利的方面,和如何发展有利的方面,克服不利的方面。不但使他们知道工作中的优点,也使他们知道工作中的缺点,和如何发扬优点,克服

缺点。使他们把自己的那部分工作同国际国内的形势和工作情况结合起来,知道自己应该如何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作用,对党对国家做出自己应该做出的贡献。这是教育群众和吸收群众参加国家的管理工作的重要方法。这种民主形式的发展,是党和国家机关的大事,决不能等闲视之。这种民主形式,也使党和国家机关的领导人经常处于群众的监督之下,从而减少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主观主义等各种脱离群众的不良作风。当然,在这方面必须反对没有群众路线内容的形式主义,但问题在于充实内容,而不是废除形式。

这里,党和国家机关领导者的态度,常常起着重要的作用。应该象毛泽东同志所经常教导的那样,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热情欢迎群众提出的意见,即使是不同意见。如果上层领导者没有这种态度,而表现出一种相反的态度,即喜欢人们讲阿谀奉承和歌功颂德的话,而不欢迎人们讲不同意见的话,如果表现出这种骄傲自满的态度,那是不能真正发扬民主的。这种把群众当作阿斗的人,他们的思想作风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思想作风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害怕群众,害怕批评,是一切机会主义者的共同点。

因此,对党和国家机关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经常进行群众路线的教育,民主原则、民主作风的教育,同时要他们经常联系群众,面向基层,到群众中去蹲点,参加定期劳动,轮换工作和学习,生活水平向群众看齐,

防止各种特殊化,使他们既当官又当民——这些措施,在使党和国家机关的领导者不脱离群众上是非常重要的。

总之,我们在一切工作中,必须真正信任群众,相信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从而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自觉自愿的行动去完成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伟大历史任务。

当然,在放手发动群众、充分发扬民主的过程中,仍然不能放弃党的领导。相反,群众运动愈广泛愈深入,党愈要加强领导,把准方向盘,使群众的行动向着一个方向。充分发扬党的国家的民主,目的也是为了更好地集中,使群众分散的力量成为集中的力量。没有集中统一,各行其是,就会使力量分散,互相抵消(如派系斗争),达不到革命的目的。党的政策法令、规章制度的作用,就是在于使亿万人民团结起来,向着一定目的行动起来。这样的力量,就能创造奇迹。无政府主义、极端民主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凶恶的敌人。

六

无产阶级民主,不是短时期内所能完全实现的,它是要在长时期内经过不断斗争,才能逐步实现的。除了资产阶级和反动分子的破坏捣乱使我们不可能实现充分的民主的客观原因外,还有主观原因,即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本身对实行民主还缺少经验,还有思想上的障碍,同时人民

群众也还不知道如何实行民主 ,对运用民主还有戒心。其中最重要的 ,还在于共产党对实行民主的重要性还认识不足 ,对实行民主还缺乏经验。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 政治和经济*

(一九七三年九月二十日)

—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经济决定政治,政治又反作用于经济,——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和政治的关系问题的辩证法,是反映社会发展的客观真理的唯一科学的观点。

马克思主义虽然认为政治反作用于经济,但是,这个政治最后或归根到底仍然是由经济决定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元论,同经济决定政治、政治也决定经济的折衷主义的或二元论的谬说,毫无共同之点。

无产阶级的政治,在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下,地位很重要。但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和政治的辩证关系的根本观点,还是不能改变或动摇。

如果有人以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无产阶级的政治

* 本文最初刊载于一九七九年八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

既然有如此重要的作用 ,因而说政治最后不为经济所决定 ,而政治却可以最后决定经济 ,甚至认为政治可以超脱于经济或独立于经济之上 ,那就大错特错了。这种政治决定论 ,是一种唯心史观的古老形式 ,同唯物史观是根本对立的。

在阶级社会里 ,各个阶级在物质资料生产中的不同地位 ,决定了它们的不同的经济利益。在资本主义社会里 ,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处在对立的地位 ,因此 ,它们的经济利益也是对立的。资产阶级的政治 ,反映和维护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 ;而无产阶级的政治 ,则反映和维护无产阶级的经济利益。由于它们之间经济利益的根本不同 ,所以就有阶级矛盾 ,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 ,不论其表现形式是政治的、经济的还是思想理论的 ,其根本内容 ,都是各阶级之间的不同利害关系的斗争。无产阶级所进行的任何阶级斗争 ,都是为了谋求无产阶级的经济利益。没有什么阶级斗争 ,是同一个阶级的经济利益没有关系的。谁不能在错综复杂的阶级斗争的各种形式下 ,看到或揭示出不同阶级之间的经济利益的矛盾 ,并且自觉地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而奋斗 ,谁就不配称为马克思主义者。

一个阶级的经济利益 ,就是那个阶级的物质利益。无产阶级的经济利益 ,就是无产阶级的物质利益。阶级斗争 ,就是各阶级为维护 and 争取本阶级的物质利益而进行的斗争。这是唯物史观的简单、浅显、而又合乎实际的根

本观点。

马克思在谈到巴黎公社的时候说过：

“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结果，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如果没有最后这个条件，公社制度就没有实现的可能，而是一个骗局。”^[442]

恩格斯说过：

“……旧的、还没有被排除掉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不知道任何基于物质利益的阶级斗争，而且根本不知道任何物质利益；生产和一切经济关系，在它那里只是被当做‘文化史’的从属因素顺便提到过。”^[443]

列宁说过：

“当人们还不会从任何一种有关道德、宗教、政治和社会的言论、声明和诺言中揭示出这些或那些阶级的利益时，他们无论是过去或将来总是在政治上作受人欺骗和自己欺骗自己的愚蠢的牺牲品的。”^[444]

毛泽东同志说过：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445]

无产阶级的经济的、物质的利益，既包括眼前的和局部的利益，也包括长远的和根本的利益。为了实现这些利益，必须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消灭地主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私有制，使小生产者的个体所有制转化为

集体所有制,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向生产的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迈进。发展生产的目的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在分配上,要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原则。只有这样,才能为向共产主义过渡创造条件。任何离开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物质利益的所谓政治,决不是无产阶级的政治。

因此,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者,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或忘记无产阶级的经济的、物质的实际利益,而空谈什么抽象的政治或伦理道德原则。一切好听的言论、声明和主张,都必须考察其是否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而不能抱轻信的态度。

可是,现在有人却怕谈或有意回避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经济的、物质的利益,似乎这样说了,就是离经叛道,就应该戴上修正主义、经济主义、福利主义、改良主义之类的大帽子。同志们,再没有比这更糊涂、更愚蠢、更有害的了。为什么要把争取无产阶级的物质利益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说成是修正主义呢?这是在反对修正主义吗?不!这正是在给修正主义涂脂抹粉。一切修正主义者,口头上谈的是无产阶级的物质利益,实际上则是出卖无产阶级的物质利益。他们不是为大多数劳动人民的物质利益而奋斗,而是攫取劳动人民的物质成果,使少数人发财致富,大搞特殊化。

为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还是为少数人的物质利益而斗争,是无产阶级政治和资产阶级政治的分水岭。我们

反对修正主义那种牺牲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只为少数特权者谋取利益的行为,但是,决不能因此就拒绝为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而斗争。如果谁这样看待问题,甚至荒唐到把为人民群众物质利益而斗争的原则,也当作修正主义来咒骂,那就是不可容许的糊涂或欺骗!

有人会说,人们不能光为物质利益而生活呀!人们要为崇高的理想而斗争呀!不错,任何人都要有理想,要为理想的实现而斗争。

但是,理想是各种各样的。任何阶级的理想,都不能脱离自己的物质利益而存在,都不能不最终归结为实现自己的物质利益。共产主义是我们的理想。共产主义的理想,就是消灭剥削、消灭私有制度,解放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大幅度地提高社会生产力,使全体社会成员日益增长的需要能够得到满足。共产主义不是要我们象现在这样生活得差,而是要生活得更好。理想不是空中楼阁,不是不可实现的虚无缥缈的幻想、神话或乌托邦,而是经过努力,完全可以实现的。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有人还会说,人们应该吃苦耐劳、牺牲奋斗呀!不错,没有这种精神,共产主义的理想就不能实现。今天吃苦耐劳、牺牲奋斗,是为了明天的幸福生活,为了共产主义的伟大目标。但是,吃苦耐劳、牺牲奋斗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我们并不是为吃苦而吃苦,为牺牲而牺牲,这也是很明显的道理。

必须指出,人们只能经过生产活动,在各种不同程度上逐渐地认识人们之间的一定的相互关系,见物不见人的观点是错误的。见人不见物的观点也是不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脱离了物质,人就不能生存,也就谈不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二

说经济决定政治,并不否定政治反作用于经济。否定前者,就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而否定后者,就不是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

无产阶级有为无产阶级的经济利益而斗争的政治。这不等于说,在无产阶级开始形成之日起,它就有了真正代表自己经济利益的政治。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无产阶级虽然经受了残酷剥削和压迫的苦难生活,但是,它并不了解,什么是造成它的苦难生活的根源,如何才能铲除它。那时的无产阶级,在政治上还不成熟,还处于“自在的阶段”,并不知道自己的根本利益所在。只有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后,无产阶级才由“自在的阶级”变为“自为的阶级”,才能够认识到自己的根本利益,并为实现这个利益而进行自觉的斗争。

无产阶级要实现代表本阶级利益的政治,就要在科学的世界观、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

正确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无产阶级只有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经济及资本主义制度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客观规律，正确认识无产阶级所处的经济地位及其历史使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并进而消灭一切阶级，建成共产主义，解放无产阶级自己和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必须懂得如何正确进行阶级斗争，以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剥夺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这些问题的解决，只有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后，才有可能。因为只有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后，无产阶级才有了真正代表其经济利益的政治。无产阶级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不是偶然的、自发的、轻而易举的。它的必然性，深藏在经济最后决定政治和一切社会意识形态的客观规律之中。

代表无产阶级经济利益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是领导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和经济建设的指南针。这样的政治，必然会被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所接受，受到他们的拥护，并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作用于经济。因此，经济虽然决定政治，但是政治又反作用于经济，并为改造旧的资本主义经济和为建立、发展新的社会主义经济服务。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一旦离开了这样的政治领导，就会迷失方向，也就会违反它自己的经济利益。

这样的政治，任何时候都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政治、政治又为经济服务的辩证法。因此，无产阶级的政治，必须从实际出发，从一个社会当时的经济状况

是违反这些规律,而是认识这些规律,按照这些规律办事。在这个基础上确立起来的政治路线,才会得到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拥护,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作用,以促进达到共产主义目标的行程。这样的政治路线,就是正确的,符合无产阶级利益的。如果违反这些经济规律,它就不仅不能对社会的发展起促进作用,反而只能起促退或破坏的作用。这样的政治路线,就是不正确的,是损害无产阶级利益的。这样的政治路线,引起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不满,并在历史的进程中被否定,也是很自然的。政治路线正确与否,对经济可以起促进或促退的作用,但是,就一个长的历史过程来看,它不仅不能改变经济规律的必然趋势,而且它本身的命运,也要最后由经济规律来判决。正确的和错误的政治路线之间的斗争,总是或明或暗、直接间接地反映着经济和政治之间的矛盾。正确的政治路线由于同经济相适应,最后必然要胜利。列宁说的“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447],就是这个意思。

经济决定政治的观点,和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的观点,都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只有在无产阶级的正确的政治路线领导之下,依靠群众自己的行动才能实现。所以,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自始至终都只能是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即毛泽东同志历来提倡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448]的领导。无产阶级的政治,脱离了群众,不从群众出发,不为群众服务,不信任群众,不依靠群众,就一定要走向自己的反面,成为和经

济条件出发,从它的阶级关系出发,反映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这就要求对那个社会的经济情况作严格的、科学的分析和研究,正确认识各阶级的经济利益和它们之间的关系。从根本上说来,无产阶级的政治,必须建立在对经济状况的科学认识上,这就是“从实际出发”的主要含义。

在正确认识社会阶级关系和无产阶级的经济利益的基础上,无产阶级政党才能制定领导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并取得胜利的路线和策略。这种路线和策略,丝毫不能脱离经济,而只能为经济服务。代表无产阶级经济利益的政治,就是消灭资本主义经济,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经济。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牺牲流血,进行长期的英勇的革命斗争,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如果不是为了在经济上解放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不是如列宁所说的,“使全体劳动者过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446],不是为了最终实现消灭资本主义、建立共产主义的伟大目标,又是为了什么呢?可见,经济不仅是政治的出发点,而且也是它的归宿点。

无产阶级政治斗争尽管千变万化,错综复杂,但是归根到底,它在资本主义社会内不能违反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必然趋势,正象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不能违反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必然趋势一样。资本主义必然要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必然要过渡到共产主义,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共产党的政治路线,不

资产阶级的政治。

也许有人以为,共产党或党的领导人是无产阶级的领导者,因而可以高踞于群众之上,对群众任意发号施令。这种官僚主义、恩赐主义、家长制的想法和做法,实在没有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味道。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前,这种脱离群众的政治领导,决不可能使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这种领导就会导致无产阶级失去政权。总之,共产党的政治领导,离开了经济,离开了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就失去了基础,失去了依靠,失去了目的,失去了真理与错误的界线,当然不可能正确地提出任务,指导运动,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取得胜利。反映和维护无产阶级与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实现他们的利益服务,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共产党的领导。主人公是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党及其领导机构,不过是他们的服务部,党员、包括党的领导人,不过是他们的公仆,再没有别的了。

党的政治路线正确与否,对于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成败,具有关键作用。但是,起决定作用的,是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449]党有了正确路线,只是事情的开始。正确的政治路线,只有为群众自愿地接受并成为他们的自觉的行动时,新社会的创造才会付诸实现。党的正确路线来自群众,但是路线的制定并不等于路线的实现。它再回到群众中,变为群众的行动,还要经历一个过程。这里不仅

需要对群众进行政治教育,而且首先需要党向群众学习,需要群众的实践和切身经验。只有当群众看到党的路线能够给他们带来切实可见的利益,也就是说,能够不断地满足他们的经济要求和保障他们的民主权利的时候,群众才会为其实现而英勇奋斗。只有人民群众的实践,才能最后证明党的路线是否正确。最后决定问题的是人民。领导和群众的矛盾,常常通过党内不同的政治思想观点之间的矛盾,通过不同作风之间的矛盾表现出来。正确的政治思想观点和作风,适合于群众的要求,最后必然会胜利。

总之,并不是任何政治都能“挂帅”,而只有作为“经济的集中表现”的政治,即真正代表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根本的经济利益的政治,才能动员亿万人民群众行动起来。这又一次说明,把政治和经济对立起来,或使政治超越于经济甚至脱离经济的观点,是何等的错误。那些高谈政治,而怕谈经济的“政治家”,请仔细研究一下,什么才叫“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个马克思主义真理的真正内容吧!

三

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前,无产阶级的政治,为经济决定并为经济服务,其斗争的中心任务,是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当时的一切斗争,

直接服从于政治需要,在我国特别表现为服从于革命战争的需要。为着维护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这是完全必要的。因为不首先取得政权,不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就谈不上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当时的任务,主要是破坏旧社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但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无产阶级政权的最主要的任务,则是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了。

现在,无产阶级国家面前有三大任务:(一)镇压已被推翻的反动阶级中的死硬分子的一切反革命活动,打击各种刑事犯罪分子,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颠覆;(二)教育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以及一切可以教育好的人,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水平、文化水平、科学技术水平和卫生体育水平,使他们成为有觉悟的、有文化的和身体健康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和劳动者;(三)大幅度地提高社会生产力,创造越来越丰富的产品,为进入共产主义准备物质条件。国家的国防、外交、公安、司法等部门,主要是为完成第一个任务服务的;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部门,主要是为完成第二个任务服务的;各经济建设部门、交通运输部门、财贸部门,主要是为完成第三个任务服务的。无产阶级国家的这三个任务,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是缺一不可的。这些部门,不论它们的任务如何千差万别,都必须接受共产党的统一的政治领导,都必须贯彻执行党的路线。不容置疑,任何一个部门,如果脱离了党的正确领导,就会错

了方向，走上邪路。但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党的主要政治任务，就是把国家的所有部门以及各种群众团体的活动，从不同方向，直接间接地集中到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这个目标上来。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如果不能在全社会提高劳动生产率，不能迅速建立起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工农业、交通运输业、国防工业和现代化的科学技术，不能在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基础上促进两种所有制的接近，不能切实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总之，不能迅速发展和壮大社会主义经济，那它就不会有可靠的和强大的物质基础，就不可能是巩固的。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根本条件。没有这样的条件，生产落后、人民生活贫困，居然也要向共产主义“过渡”，只会使人民的事业受到挫折。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归根到底，就是为了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党领导阶级斗争，进行两条路线斗争，也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当然，这种关系不是机械的，而是辩证的。只要无产阶级的政治真正促进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经济也会促进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每一个胜利，都真正更广泛、更深入地动员着人民群众，使他们团结在党和国家的周围，真正能够发展社会主义势力，扩大社会主义阵地，孤立资本主义势力，缩小资本主义阵地，从而使阶级力量的对比，日益有利于无产阶级而不利于资产阶级。经济建设的成就，是动

员群众,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强大推动力,对群众认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也最有说服力。如果政治上说得袅袅动听,而经济却搞得一塌糊涂,那样的政治,还硬要叫群众举手称颂,群众怎么能不产生厌恶情绪呢?

可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在没有发生战争的条件下,党的政治路线究竟正确与否,正确的程度如何,无产阶级的政权究竟巩固与否,巩固的程度如何,最后都要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成就和成就的大小来衡量。不能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不能促进、推动经济发展的政治,不管表面上装璜得如何好看,听起来如何悦耳,终究是空洞的、甚至只能给人民群众和国家的建设事业带来灾难的东西。正确的政治领导和经济建设的成就,必然是正比例的关系。没有久经考验的、党的正确的政治领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最后胜利是不可能的。但是必须强调指出,政治对经济建设的领导作用,就是政治反作用于经济、为经济服务的具体表现。领导就是服务。领导人民,就是为人民服务。共产党的政治领导是重要的,它的重要作用,只是表现为为人民服务。

有人说,社会主义革命比社会主义建设更重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比发展经济更重要呀!当然,社会主义革命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请问,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革命而革命、为专政而专政吗?决不是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就是为了发展社会

主义经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它只有这样一个目的,而不能有别的目的。我们共产党人以实现共产主义为崇高理想。但是,共产主义是在高度发展的社会生产力的基础上才能建成的。如果不去努力提高社会生产力和人民群众的生活,而一味醉心于“共产主义”的高调,那么,共产主义就只能被糟蹋成画饼充饥的魔术。这当然是对于崇高的共产主义事业的莫大污辱!

有人说,抓革命保险,抓生产危险。这正是把革命和生产对立起来的错误观点。抓革命保险吗?如果你抓的革命,不从发展生产出发,并归结为推动生产力的提高,那么,这样的“抓革命”,就不保险。抓生产危险吗?人们必须首先解决衣、食、住、行方面的问题,才能从事其他社会活动。当政的无产阶级,如果不努力发展生产,自己的政治统治就一天也不能存在,这样的“抓生产”,谈何危险!

我这里所说的,不过是一些唯物史观的常识。所以要不厌其烦地重温这些常识,是因为现在有些人已经把它遗忘得所剩无几了。有人不是天天自称“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吗?如果连这样一些常识都丢掉,那还算什么“高举”呢?那除了给国家和人民带来越来越多的灾难之外,还能带来什么呢?!

衡量党的路线 政策的最高尺度*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八日)

党所制定的政治路线和策略,究竟正确与否,究竟有什么优缺点,只有在群众的实践中加以检验。凡是给群众造成损失的路线和策略,就是有错误的或有缺点的;相反,凡是给群众取得成就的,就是正确的或有优点的。群众的实践,是衡量党的路线和政策的最高尺度。除此之外,就没有什么别的尺度。党的一切工作,就是为人民服务,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党就没有其他利益。总结经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就是检查和发现我们党的路线和策略在群众实践中所表现出来的正确和错误,优点和缺点,从而坚持正确的,改正错误的,发扬优点,改正缺点。有些人以为,只要党决定了的东西,就一定是正确的。他们关心的总是党的决定是否执行了,至于执行中对党的决定的正确与否,优点与缺点,则漠不关心。他们对党负

* 这是《论我国无产阶级专政下有关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一些问题(学习笔记)》第六部分《关于正确解决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之间的矛盾问题》的节录。标题是本书编者拟的。

责,而不对群众负责的态度,实际上不仅是对群众不负责,而且也是对党不负责,因为党员的责任正是要检查和发现党的决定在执行过程中的实际情况,从而改进党的领导,使党能更好地为群众的利益服务。

党内斗争要正确进行^{*}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八日)

正确解决无产阶级内部矛盾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正确解决党内矛盾。如果不能正确解决这个问题,就不能正确解决无产阶级内部的矛盾问题,也不可能正确解决无产阶级同其他阶级的矛盾问题。

无产阶级内部矛盾的产生,有其社会根源。这种矛盾反映到党内,就产生党内的矛盾。党生活在阶级社会中,党员的成份也不可能是清一色的。特别是象我们这样的党,过去一直生活在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之中,有相当数量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尤其是农民和知识分子,党内容易产生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倾向,是不足为奇的。当然,党内也有资产阶级的思想倾向,这种思想的传染者,主要地仍然是小资产阶级分子。

为了正确解决党内矛盾,首先必须懂得,解决这种矛盾,只能采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即思想批判或思想

^{*} 这是《论我国无产阶级专政下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一些问题(学习笔记)》的第七部分《关于正确解决共产党内部的矛盾问题》。《人民日报》于一九七九年八月二十七日以现题刊出。

斗争的方法。党内矛盾不仅是人民内部的矛盾,而且是为人民内部的事业而奋斗的革命同志之间的矛盾,因此决不能用镇压的办法去解决。党内的各种错误思想和党工作中的各种缺点错误,只有靠思想批判去纠正。党内的思想分歧,步调不齐,只有靠思想批判去统一。一个正确的观点,一条正确的路线,只有在批判错误观点和错误路线的过程中,才能巩固和发展。所以,党内同志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好象人的呼吸对于人的生命一样,是党生存、巩固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党内的思想斗争,是党内生活的正常现象,是党内民主的主要标志,是党富有生命力和战斗力的具体表现。不敢或害怕在党内进行思想批评的和平主义、自由主义、调和主义倾向,是错误的;压制民主和取消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专制主义、军阀主义、家长主义倾向,也是错误的。这些倾向,都只能使党死气沉沉,思想僵化,丧失团结一致、共同战斗的力量,对党非常不利,必须坚决反对。

党内思想斗争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党的团结。思想上的一致,是党的团结的基础。因此,党的团结,是思想斗争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即遵循“团结——批评——团结”^[450]的公式,是毛泽东同志历来教导的党内斗争的一条根本原则。抱有这样的动机和目的的思想斗争,必然是光明正大的,因为这里除了党的利益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私利。反之,那种从个人主义、宗派主义或其他不可告

人的动机出发,利用各种不正当手段来达到其陷害、打击或打倒革命同志的目的的所谓思想斗争,是同党的这一基本原则相背离的,其中必然包含有程度不同的阴谋诡计。这种所谓批判,只能在党内引起纠纷,制造派别,造成对立和分裂。

党内思想斗争,涉及到两个方面,即批评者方面和被批评者方面。为要解决这两个方面的问题,领导同志和领导机关处于尤其重要的地位。

批评者方面必须重视的问题,是思想批判必须实事求是、以理服人。只有实事求是,“摆事实,讲道理”的批判,才最有说服力,最能教育同志、团结同志。那种夸张的、武断的、主观主义的、吹毛求疵的或人身攻击的思想批判,是既没有说服力,也不能教育同志、团结同志的,即使对于有错误的同志,也只能说服教育,决不应该动手动脚,进行体罚或变相体罚。既然被批评者所犯错误大小不同,那末就应该进行具体分析,批评也应该有轻重之分。在不影响大局的个别问题上犯错误,叫做个别错误,是小错误。在许多问题上犯错误,如果这些错误没有内在联系,仍然不过是个别问题上的错误,也属于小错误。如果这些错误有内在联系,则这种错误叫做有倾向性的错误,是较大的错误。如果这种有倾向性的错误进一步发展,就会成为右的或“左”的机会主义倾向的错误。这种错误如不纠正,最后会发展成为路线错误,这就是大错误了。一般说来,大错误不是突然发生,而是由小错误发展起来

的。如果小错误能及时批评、及时改正,就不会发展成为大错误。如果小错误没有受到批评、批评的内容和方法不正确或被批评者坚持不改,那就可能发展成为大错误。把小错误说成大错误,或把大错误说成小错误,都不是实事求是的批评。

是不是可以把党内犯有机会主义思想倾向的错误的同志,说成是“党内资产阶级代理人”呢?虽然这种倾向的结果,有利于资产阶级,不利于无产阶级,但是不能说有这种倾向的同志,就是“党内资产阶级代理人”,正象党内有封建主义思想倾向的人,并不就是党内地主阶级代理人一样。只有对犯有这种思想错误,造成严重的政治后果,并且坚持错误和在行动上违反党的决定和纪律的人,才能说他实际上成为党内资产阶级代理人,成为机会主义者或修正主义者了。这种人是不能允许其继续留在党内的。但是,一个人实际上是党内资产阶级代理人,同一个人本来是党内资产阶级代理人,是钻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还是有区别的。前一种情况有可能从人民内部矛盾、党内矛盾,转化为敌我矛盾,后一种情况则本来是潜伏在党内的敌我矛盾。那些人是资产阶级派进来或拉出去的内奸、特务,不管他们怎样貌似革命,对他们和对党内犯有思想倾向错误的同志,不能等看待。当然,在这种犯有倾向错误的人中间,也可能藏有内奸、特务,对此应该警惕,但是没有经过严格认真的审查,没有确凿的证据,就轻易地怀疑或断定犯有这样那样错误的同志,

即使是犯有严重错误的同志,为党内资产阶级代理人,为阶级敌人,为内奸、特务,是不能允许的。这必然会导致把人民内部的矛盾夸大为敌我矛盾,把同志当做敌人,给党造成极大的危害。至于把本来不是机会主义当作机会主义,把并无错误或犯有某些错误的好同志,诬陷为“党内资产阶级代理人”,那更是颠倒是非,混淆敌我,是对党的严重破坏。

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即使对党内犯有倾向错误或路线错误的同志的批评,也还是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451],而不是为了一棍子打死。对这种错误,既要批判,弄清是非,又要团结同志,一道工作。使同志们在思想上彻底了解错误的内容和性质,产生错误的原因和环境,以及改正错误的办法,避免重犯同类性质的错误。这是教育同志、团结同志的唯一正确的方法。当然,对犯有大错误的同志给以恰如其分的纪律处分,有时也是必要的。但在此之前,必须进行说服教育工作,而且这种工作做得越充分越好。这不但对犯错误的同志,而且对教育全党,提高全党的思想政治水平,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不实事求是,不用以理服人的方法进行党内斗争,对错误的批评,就会成为批评的错误。认为批评者可以不犯错误,或者批评别人就表示自己总是正确的想法,是不合实际的。事实上,批评者批评错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批评者是有党性的,就应该进行自我批

评,实事求是地纠正错误,并且给受到打击迫害的同志平反甄别。如果批判是不正确的或不合事实的,受到批判的同志完全有申诉和要求“翻案”的权利。怕因此使领导丧失威信的想法,是多余的。其实,自己纠正自己的错误,正是实事求是、以理服人的正确态度。这种态度,只会提高领导的威信。

被批评者方面应该注意的问题,和批评者方面是不一样的。当然,实事求是、以理服人的批评,对别人需要,对自己也需要;批评者同时应该接受批评。被批评者应该虚心倾听批评,但是必须唯理是从。特别是在一般同志和下级组织对领导方面提出批评时,即使不完全合乎情况,不完全正确,甚至完全不正确,也应该虚心倾听,决不能自以为是或借口别人批评得不合情况而听不进去。压制和打击报复更是错误的。应该仔细研究对方的批评,分析其合理的与不合理的部分,勇于承担责任,接受合理部分,对不合理的部分则耐心地加以解释。即使对完全不正确的批评,也要研究其发生原因,采取措施消除这种原因。在听取批评的时候,尤其是领导者对下级同志和下级机关,不应该提出过高的要求,否则,就谈不上“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党内常常出现的知而不言、言而不尽的情况,同党内那种言者有罪、闻者不戒的家长作风、军阀作风有直接的关系。每个党员都必须执行党的决议,遵守党的纪律,但是,同时又一定要切实保证他们向党的各级组织和领导人提出批评和建议

的权利。党内有不同意见，有争论的对立面，应该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使正确思想得到发展，错误思想得到纠正。这是促进党内思想活跃，提高思想水平的唯一有效办法。每个党员，不论其职位高低，在党内都有发表不同意见和相互批评的平等权利。为了坚持真理，每个党员都要有不怕撤职、不怕离婚、不怕开除党籍、不怕坐牢、不怕杀头的气概。必须同压制批评、打击报复的错误作法，特别是同诬陷同志、妄图达到某种不可告人目的的错误作法，进行坚决的斗争。

为了正确解决党内矛盾，弄清楚“左”倾和右倾的同异及其联系，是很重要的。关于右倾的危险和必须同右倾作斗争，现在大家懂得比较清楚，但是关于“左”倾的危险和必须同“左”倾作斗争，则似乎还有许多人不大明白。有的同志甚至认为“左”倾比右倾好，右倾是立场问题，“左”倾是方法问题，右倾危险，“左”倾保险，干脆来一个宁“左”勿右。当然，这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右倾表现为害怕阶级斗争，害怕群众革命运动，只要改良不要革命，只讲联合不讲斗争，搞阶级调和、阶级妥协、工联主义、经济主义和尾巴主义。“左”倾表现为玩弄响亮的革命口号和革命词句，只讲斗争不讲联合，搞冒险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宗派主义。应该看到，这两种倾向都是错误的，都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对于党的正确路线的背离，都是立场问题，也都是方法问题。

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即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斗

争,必然要表现为既反对右倾又反对“左”倾的斗争。当然,在不同情况下,何种倾向是主要的,并不一样。当右倾成为党内的主要危险的时候,应该集中主要力量反对右倾,同时注意防止“左”倾。“左”倾也可能成为党内的主要危险,那就应该集中主要力量反对“左”倾,同时注意防止右倾。如果不顾社会条件的变化,把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只是归结为反对右倾的斗争,因此只反右不反“左”,“左”的倾向就势必会受到鼓励而发展起来,在一定条件下甚至成为主要的危险。在“左”倾成为主要危险以后,还要继续集中力量反对右倾,就可能把正确的东西也当作右倾,极大地伤害同志,给党的事业造成严重的后果。特别应当注意的是,党内还有一种两面派分子,他们表面上好象拥护党的正确路线,实际上则尽量利用党内右倾、特别是“左”倾的错误,来进行反党、反革命活动。那些混进党内的真正的资产阶级代理人,就是这样干的。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对他们保持高度警惕。

党内的“左”倾或右倾都是比较严重的错误。但是,只要进行及时的、正确的批判和斗争,还是可以克服的。犯这类错误的绝大多数人不是坏人,而是能够改正错误的同志。经过批判和斗争,坚决不肯改正错误的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也是有的;那不过是已经在政治上被孤立了的极少数人,是容易对付和处理的。党内发生“左”的或右的倾向,既不奇怪,也不可怕。共产党人正是在两条战线的斗争中得到锻炼,增强识别真假马列主义、毛泽东思

想的能力,并提高理论思想水平的。党正是在这种斗争中,发展、壮大和巩固起来的。

为了正确解决党内矛盾,党内的思想斗争必须严格按照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来进行。党是根据这一原则组织起来的,它的正确的政治路线是由它的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的。违反或破坏这一组织路线,是组织上的错误,也是政治上的错误。当然,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比起来,不能不占首位。没有政治上的一致,就谈不上组织上的一致。但没有严格的民主集中制,党在政治思想上的一致,也就无法实现,无法保证,无法变为革命的行动。所以,那种认为只要政治路线正确,可以不照组织原则办事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是保证正确解决党内矛盾的组织原则。我们党历来主张,必须在广泛发扬党内民主的基础上,集中正确意见,作出决定,在相当的党员群众或其代表的会议上讨论通过,然后付诸实行。居于领导地位的党员,必须勇于负责,但是我们所要的,是集体领导,而不是个人专断,不是一个人说了算。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规定,少数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也必须执行党的决定,同时有权保留自己的意见。党的领导组织,首先是党的中央机构,有广泛的权力处理各种问题。但是,这种权力不應該是在党员群众之上,而应该是在党员群众之下。一则,这些领导组织的成员,应该是由党员群众或由其代表大会选举出来的,是受党员群众的委托来工作的,是党员

群众的勤务员。二则,这些组织的所有重要决议,都必须得到党员群众或其代表的批准,领导机构在其工作过程中,必须按期向党员群众及其代表做工作报告,听取党员群众或其代表的批评和建议,接受他们的监督,及时改正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三则,领导组织要定期改选,排除不称职的人,选进德才兼备的人,并对犯有错误的人提出批评或作出组织处分。这些体现民主集中制原则的规定,使党内矛盾能在党的组织范围内顺利地解决。

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是解决党内矛盾的唯一正确的形式。任何把民主和集中割裂开来或对立起来的做法,都是不正确的。只有认真实行这样的民主集中制,才能在党内形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片面夸大民主,反对集中,就会犯极端民主化、无组织无纪律、无政府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错误。片面强调集中,无视民主,就会犯专制主义、军阀主义、家长主义的错误。为了认真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在组织问题上,必须反对这两种错误的倾向。

对犯错误的同志的处理,同样必须遵循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一般党员犯有比较严重的错误,首先必须在党的支委会上,必要时则在支部大会上讨论解决。地方党委委员犯有比较严重的错误,要在地方党委会上,必要时则在地方党委扩大会或地方党的代表大会上讨论解决。中央委员犯有比较严重的错误,应该先提到中央政

治局，必要时则提到中央全会或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讨论解决。对初犯错误和重犯错误的同志，对愿意承认并改正错误和不愿承认并改正错误的同志，处分应有所区别。在批评某个同志的错误并给予组织处分时，一般应该允许他参加会议，听取批评，接受教育，他也可以对错误做自我批评或为自己辩护，不同意时还可以上诉，要求翻案。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党对自己的党员，决不能采取镇压的措施。党员违反国家法纪，应由国家司法、公安机关处理。

此外，党内斗争同党外斗争，在组织上也是应该有区别的。党内斗争只有在必要的时候，才向党外公开，使群众知道，什么是党的正确路线，什么是错误路线，借以教育群众，提高群众的思想政治水平。许多党内的争论，是不必向党外公开的。有时，党内斗争可以吸收非党群众参加，听取他们的意见，作为党的参考，最后决定权仍应属于党。党内的事情不能由群众任意决定，由群众说了算。如果那样，党就不成其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组织，而成为群众的尾巴了。这只能对党起瓦解和破坏的作用。因为群众一旦失去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统一的、有组织的领导，反动分子就可能利用某种自发性和盲目性，制造、煽动群众中的无政府主义、无组织、无纪律的倾向，来达到他们反对党的目的。这是非常危险的。

我们党已经有了五十多年的战斗历史，有了进行党内斗争的丰富经验，形成了一套真正能够弄清是非、团结

同志、纯洁党的组织和提高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的优良传统。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忘记和抛弃这些传统，都必须同一切破坏党的团结、践踏党的原则的错误倾向，进行坚决的斗争。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内 的公私关系

(一九七四年五月十九日)

公和私(也包含集体和个人、国家和个人)是一对矛盾而又统一的范畴。没有私,就无所谓公,反之亦然。两者是矛盾的、对立的,但又是统一的,互为条件而存在的。这种矛盾统一的关系,在不同社会制度内的具体表现和阶级内容,是不同的。我们现在想研究的,是社会主义社会内的公私关系,因为正确认识这个问题,对当前社会主义建设有非常重要的实际的意义。

在社会主义社会内,一小部分敌对分子的私,同社会主义的公是根本对立的。两者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这种矛盾在不能促使其转化时,就只能用不同程度的镇压的办法来解决。但对大多数人民群众来说,私的、个人的利益和公的、集体的(包含国家的)利益则是基本上一致的。因此公私之间虽然有矛盾,但这种矛盾是非对抗性的,可以用自觉的调节的办法来解决。

在社会主义社会内的公私关系中,由于社会主义生产资料的公有制(集体的和国家的所有制),公的、集体的

利益不能不居于首位(即主导的方面)。因为这个公的集体,是真正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的集体,没有这个集体,人民群众的私的利益也就没有保证,他们的最后解放也无法实现。所以在社会主义社会,私的、个人的利益必须服从公的、集体的利益。所以,我们党一贯提倡把“大公无私”、“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精神,作为对个人,首先是对共产党员和一切国家机关、军队和群众团体的工作人员的行动准则,而反对旧社会遗留下来的那种个人主义、自私自利的或是那种“假公济私”、“损公肥私”的言论和行动。那种“大公无私”、“公而忘私”,为了集体和国家的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的人,现在是越来越多了。这是社会主义时代的先进的英雄人物,没有他们带头的模范作用,社会主义的彻底胜利是不可能的。

但在社会主义社会,公和私也不是完全隔绝的。社会主义社会只反对个人主义、自私自利的或假公济私、损公肥私的那种私,却不反对个人在社会主义社会应该得到的个人利益的私。相反,社会主义社会的公的集体的利益不仅不违反这种私的个人的利益,而且在公的集体的利益内就包含有私的个人的利益,即是公中有私,而不是公中无私。这是公私利益基本一致的具体表现。任何个人,为集体利益劳动,就会得到一定的劳动报酬。职工得到工资,农民得到工分。在这里,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私和公是结合在一起的。

社会主义社会的公私关系的基本一致性,在它的按

劳分配的原则中表现得非常清楚。你为公劳动,你就可以从公的劳动果实中分得一部分。你为公劳动得多些,你个人所得也就多些。这种分配原则既适合于社会主义生产力水平,也适合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政治水平。这种分配原则为社会主义的生产所决定,但反过来也最有利于促进生产。这种分配原则最能调动最大多数人民群众生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因为他们从这里可以切身体验到:为公、为集体的利益而努力劳动和工作,同时也是为了他们个人的生活的改善;集体的、公的事业发展了,他们的私的个人的生活也就改善了,所谓“大河有水小河满”。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这种一致性,对最大多数人民群众说来,是很容易理解的。人们肯为社会主义事业而自觉自愿地劳动与工作并使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的根据,也就在这里。即使今天有人还不了解集体利益的首要意义,而不懂得应该自觉自愿地为集体事业劳动与工作,并使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但他为了他个人的利益,也懂得首先必须为集体利益而劳动和工作,因为他看到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社会内,离开了集体,个人的利益也无法实现。甚至那些对社会主义这种集体没有好感或怀有敌意的人,那些自私自利的人,这种分配原则也对他们有着强制的作用,因为在社会主义社会内,不劳动者是不得食的。

要建成社会主义,没有那些为了集体利益,不怕苦,不怕累,不怕死的“大公无私”、“公而忘私”的先进人物起

模范和带头作用,是不可能的。但他们在人民群众中终究还是少数。而社会主义建设没有最大多数人民群众以至全体公民的积极参加,是不可能建成的。为此,必须坚决贯彻实行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公和私相结合的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普遍的无报酬的、不计报酬的自觉自愿的劳动,只有到共产主义社会实行按需分配的时候,才能实现。因此,在社会主义阶段内,正确的政治工作就应该处处利用生动的事实向人民群众宣传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一致性,并使他们真正懂得个人利益必须服从集体利益的道理。应该理直气壮地说,我们平时所说的“大公无私”的“私”,是损害集体利益的私,“假公济私”的私,而绝不是个人在集体收入中所应分得的份额的私。这种应得的私,是每个人应有的正当权利。反对这种私,或否认有这种私,这是反对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的“左”的空谈。就是对那些大公无私的先进工作者,我们不但要同样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使他们得到他们应得的工资或劳动报酬,而且正因为他们能为集体作出比一般人更多的贡献,所以国家和集体还要给他们以一定的照顾,并在精神上和物质上给予奖励。

还有,在社会主义社会内,不但公中有私,而且在一定范围内,还允许公外有私。对人民公社的社员就是这样。社员们除从集体得到应得的劳动工分外,还允许他们在不耽误集体生产的条件下,利用业余时间经营个人的自留地或搞一点副业,并在集市上按照合理的价格出售

他们的产品,以此来补助他们个人生活用品和用款的不足。这种政策,当然对农民个人有利,但对集体也还是有利的,因为这些产品在市场上可以补助国家产品供应的不足,满足消费者的某种需要。这是公私结合的一种辅助形式,在目前条件下还不能废弃。

以上我们说了私应该为公,公中也有私。现在我们要说公还要为私。既然个人应该为集体,自然集体也应该为个人。不用说,我们社会主义的公,最后都是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的,是人民群众利益的集中表现。但是在职工得到工资、农民得到工分之后,国家和人民公社,特别是国家,为人民服务的任务还没有解决。为了使工资和工分真正落实到有利于个人,国家和公社还应该做很多的事情,例如,如何保证人民生活必需品的及时供应,如何切实解决交通运输、居民住房、文化教育和医药卫生等方面的问题,如何办好托儿所、幼儿园、妇产院、养老院、学校、医院、食堂、洗衣房、旅馆、修补服务站等问题,如何实行社会保险和社会保障等问题。总之,一切有关人民实际生活的大大小的问题,集体必须具体加以解决,并在解决的过程中使人民的私人生活社会化,个人的问题也变成集体的问题。公为了私,自然私也就向公转化。社会主义如果不能使每个人从个人日常生活的沉重负担下解放出来,不能使个人的日常生活社会化,它的最后胜利是不可能的。

那种以为只要职工有了工资,农民有了工分,人民的

生活问题就都解决了,国家和集体就可以不管了的想法和做法,是资产阶级的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的想法和做法,是完全错误的。当然,社会主义的集体利益是个人利益的集中表现。但是,只重视集体利益而不重视个人利益;只有个人为集体而集体不为个人,这样的集体必然会脱离群众,得不到群众的积极拥护和支持,因而这样的做法也不利于集体。要使人人为集体,必须集体为人人。列宁说的“众人为一人,一人为众人”^[452]的名言,就是这个意思。个人集中力量为了集体,使集体的力量不断壮大,集体也切实关心个人,使个人生活不断改进,——这是社会主义社会高速度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所以我们既反对片面为了个人利益而违反或破坏集体的利益的右的偏向,也反对片面为了集体利益而不顾个人利益的“左”的偏向,这种偏向实际上也不利于集体利益。

注 释

1 任曙,原名任旭,又名任昭明,四川南充人。一九二七年曾任中共中央农民部秘书、全国农民协会临时党团书记、中共中央长江局成员等职。以后公开拥护陈独秀取消革命的观点,并加入托派组织“无产者社”。——第1页。

2 指任曙的《中国经济研究》一书(中国问题研究会1931年版,上海东明书社发行),书中否认帝国主义有阻碍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作用,宣扬中国资本主义已经“代替封建经济而支配中国经济生活”,并且已达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俄国的水平,因而可以立即进行“反资本主义的革命”。——第1页。

3 在《中国经济研究》一书中,任曙把一切认为帝国主义阻碍中国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和资本主义在中国社会经济中尚不占优势的观点,都说成是所谓“资产阶级应声虫的见解”和“资本主义意识”。——第1页。

4 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一九三一年六月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都未能区分当时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这里的提法也有同样的问题。但是,作者在《中国经济之性质问题的研究》第六节中已经提到民族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他说:“不断的军阀混战与帝国主义的竞争,使民族资产阶级的民族工业没有发展的可能,这不能不常常使民族资产阶级表示些‘不满意’”。——第2页。

5 利息,这里指纯收益。——第4页。

6 任曙断言,“对外贸易是中国经济问题的中心问题的中心”。他的逻辑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经济的最大作用是中国的商品输入,即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而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则是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就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对于这些观点,张闻天在《中国经济之性质问题的研究》第一、二两节中作了批判。——第5页。

7 把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当作当时党内的“主要危险”，是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的“左”倾中央的主要错误之一。作者这里的提法，表明他在反对当时一些具体“左”倾政策的同时，也有“左”倾中央的上述错误。——第7页。

8 胡秋原，一九一一年生，湖北黄陂人。当时自称“自由人”，曾连续著文宣扬超阶级的“文艺自由”论。——第10页。

9 蓝衫团，又称蓝衣剧团、蓝衣剧社。这里指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在国民党统治区帮助建立的工人小型剧团，主要在工厂中演出，以工人衣着蓝布短衫而得名。——第15页。

10 “十八套”，一说十八句口诀，指旧时走江湖、卖膏药者所念的套语。——第16页。

11 国联报告书，又称李顿报告书，“九一八”事变后以英国人李顿为首的国际联盟调查团来华调查后提出的报告，一九三二年十月发表。它否认日本侵略，主张国际共管东北。——第19页。

12 上反，即上海反帝大同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上海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公开团体，成立于一九二九年七月。——第20页。

13 《劳动法》，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工农兵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全文共十二章，七十五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日公布《关于实施劳动法的决议案》，规定这个《劳动法》从一九三二年一月一日起生效。——第21页。

14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有时简称苏维埃中央政府，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领导建立的中央政权机关，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宣告成立，当时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第21、30、63页。

15 少共，即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因当时是少共国际（青年共产国际的另一译名）的一个支部而有此称呼。——第22页。

16 国际雇农工会，红色工会国际（又译赤色职工国际）下属的一个产业工会。——第23页。

17 全总，即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国工会的领导

机关。一九二五年五月成立,其前身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一九二七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被迫转入地下,一九三三年初又从上海转移到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第 23 页。

18 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一九三三年四月开始修改《劳动法》,同年十月十五日颁布新《劳动法》,共十四章,二二一条,除对旧《劳动法》的某些过“左”条文作了修改外,还特别规定:雇用辅助劳动力的中农、贫农、小船主、小手工业者及手工业的生产合作社,在得到工人与职工同意的情况下,“得免除本法的某些条文的拘束”。——第 28 页。

19 《宣言》,指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于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七日发表的《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第 30 页。

20 指一九三三年三月四日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言》和同年六月一日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为反对国民党出卖平津华北宣言》等文告。——第 30 页。

21 这一文告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革命军事委员会于一九三三年十月十一日发布的。——第 31 页。

22 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在“九一八”事变以后,“中间阶层和一部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地方集团已经发生了成为抗日同盟者的变化”。作者在这里认为整个国民党都是投降帝国主义的,在后文又把国民党内部某些集团对于革命人民态度的变化笼统地说成“欺骗”,称他们的主张为“‘左’的反革命政纲”,这些都是不正确的。但是,作者在本文中指出个别国民党军阀有可能同红军联合抗日,强调有必要争取他们为同盟者,同他们建立“上层统一战线”。这些从现实政治形势出发的策略主张,实际上是同上述不正确的说法相排斥的。——第 32 页。

23 广东国民党政府,指陈济棠等国民党内的一部分反蒋派一九三一年五月在广州成立而与蒋介石的南京国民党政府对立的国民政府,以及该政府取消后于一九三一年底成立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一九三三年五月,西南方面组织粤桂闽三省抗日军北上,同年六月与南京达成谅解,调回北上部队。——第 32 页。

24 见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 4 卷,

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225—226 页)。——第 34 页。

25 见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224 页)。——第 34 页。

26 中央给满洲省委信,指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六日《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第 36 页。

27 这个决议现存的各种版本,都在题下注“一九三五年一月八日政治局会议通过”。据查证,会议结束日期是一月十七日,决议则是在会后写成的。收入本书时,还根据各种版本作了校勘,订正了少数标点符号和个别错字。——第 37 页。

28 在会议上做报告的是博古(即秦邦宪),做副报告的是周恩来。在决议现存的各种版本中,这里和下文许多地方的姓名都以“××”或“×××”隐去。本书保持了这些版本的原样。其中第 37、38、39、49、52、54、55 页的“××”均指博古,其他待查。——第 37 页。

29 指中共中央《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五次“围剿”与我们党的任务的决议》。——第 37 页。

30 关于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党中央政治路线的错误,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了全面总结。遵义会议需要集中力量解决当时最关键的军事路线问题,没有解决错误的政治路线问题。——第 38 页。

31 赤少队,是赤卫队(简称赤队)和少年先锋队(简称少队)的统称。赤队是苏区带有地方部队性质的群众武装组织,队员年龄有的地方规定为二十三岁至五十岁。少队是苏区半军事性的青年群众组织,队员年龄有的地方规定为十六岁至二十三岁。——第 38 页。

32 堡垒主义,指国民党军在第五次“围剿”中修筑碉堡、步步为营、缓慢地向根据地内推进的作战方式。——第 39 页。

33 短促突击,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提出的战术原则。它要求中国工农红军在敌人修筑堡垒、步步为营地向前推进的情况下,也修筑堡垒防御阵地;当敌人走出堡垒前进时,则在短距离内对敌人进行突击。——第 40 页。

34 共产国际,简称国际,即第三国际,成立于一九一九年三月,是各

国共产党的联合组织。一九二二年中国共产党参加共产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一九四三年五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通过决定,宣布解散。——第 41、81、98、146、313 页。

35 中区,即中央苏区。——第 41 页。

36 洵口战役,一九三三年十月七、八日红军第三、五军团在江西黎川东北的洵口与国民党军进行的遭遇战。——第 43 页。

37 团村战役,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二日在江西黎川东南的团村附近进行。红军因兵力不集中,突击过早,只取得击溃敌人的胜利,歼敌不多。——第 43 页。

38 建宁战役,一九三四年五月中旬红军为保卫福建建宁进行的战役。结果未能阻止国民党军的进攻,五月十六日建宁失陷。——第 43 页。

39 温坊战役,一九三四年九月一日至四日在福建连城的温坊地区进行。——第 43 页。

40 将军殿战役,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在江西黎川附近的将军殿地区进行。红军同国民党军形成对峙,没有战果。——第 43 页。

41 十九路军事变,指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国民党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鼐等联合国民党内李济深等一部分势力,公开宣布与蒋介石破裂,在福州成立抗日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即福建人民政府)的事件。十九路军曾于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六日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签订了《反日反蒋初步协定》。一九三四年一月,福建人民政府在蒋介石的军事压力下失败。中共中央由于犯了“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没有给它以应有的援助。——第 44 页。

42 华夫,原名奥托·布劳恩(Otto Braun),一九——一九七四),又名李德,德国人。一九三二年受共产国际派遣来中国,一九三三年十月到中央苏区,担任中华苏维埃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顾问。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及长征初期,他同当时的“左”倾错误领导者一起,在军事指挥上实行一系列错误的战略战术,使红军受到重大损失。在遵义会议后不再担负指挥责任。一九三九年离开中国。——第 44 页。

43 广昌战役,一九三四年四月十日及二十七日晚在江西广昌进行。国民党军集中十一个师进攻广昌,企图打开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尔后夺占

瑞金。中共中央的“左”倾领导者则调集九个师的兵力，硬拼死守。红军采用阵地防御结合短促突击的战法，虽给敌人以重大打击，但自己也遭受重大损失，终于被迫撤出广昌。——第46页。

44 丁毛山战役，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至一九三四年初在江西永丰以南的丁毛山进行。红军进攻国民党军的碉堡群，准备在这里突破国民党军的堡垒封锁线，结果伤亡重大。这是一次得不偿失的消耗战。——第47页。

45 三溪圩战役，一九三四年三月中旬在江西南丰西南的三溪圩进行。红军向已有坚固堡垒工事的国民党军进攻，伤亡重大。——第47页。

46 平寮，亦称坪了，在江西黎川境内。平寮战役于一九三四年二月一日进行。——第47页。

47 关于十九路军的阶级性质，毛泽东后来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中作了进一步分析，指出他们代表着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乡村的富农和小地主，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地主阶级、买办阶级是有区别的。——第50页。

48 国际十三次全会，指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至十二月二日举行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会。——第51页。

49 五中全会，指一九三四年一月在江西瑞金举行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第51页。

50 这里所引共产国际一九三四年六月二十五日的电文，以及前文所引共产国际一九三三年十月和一九三四年二月的三处电文，都未能找到原电校对。本书维持了这个决议现存各种版本的原样。——第51页。

51 军委，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也称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红军长征中的军委纵队，原包括由红军总司令部及其直属机关组成的军委第一纵队（第一野战纵队），以及由中央机关和后勤系统组成的军委第二纵队（第二野战纵队）。它们于一九三四年十月十一日组成，同年十二月十八日合编为中央纵队。——第52、63页。

52 周指周浑元。薛指薛岳，一八九六年生，广东乐昌人。中央红军长征开始时，薛任国民党“追剿”部队总指挥兼第五军军长，周任第三十六军

军长。不久,薛改任国民党“剿匪”军第二路军前敌总指挥,其总部常随所属第一纵队行动。周则任该第二路军第二纵队司令。——第53页。

53 关于博古错误的性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重新作了结论。博古拥护这个决议,并在行动上改正了自己的错误。他在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第56页。

54 通南巴,指四川的通江、南江和巴中。一九三二年秋,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鄂豫皖苏区进入四川,建立了以通南巴为中心的川陕根据地。一九三四年九月,红四方面军粉碎了国民党军六路围攻,歼敌数万人。在胜利的形势下,张国焘却因害怕国民党军乘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之机腾出手来进攻红四方面军,竟于一九三五年初擅自退出通南巴,放弃川陕根据地,向西逃跑。——第60页。

55 总司令,指朱德(一八八六——一九七六),四川仪陇人。当时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随左路军行动。——第60页。

56 五军、三十二军,一九三五年七月分别由原红一方面军的第五军团和第九军团改编而成,同年八月与红四方面军主力合编为左路军。——第60页。

57 德怀,即彭德怀(一八九八——一九七四),湖南湘潭人。当时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总指挥。他在俄界会议上提出了缩编红军的建议。——第61页。

58 麻牙,现名亚日卡,在甘肃迭部县境。红军第一军团、第三军团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后来是在哈达铺(甘肃宕昌县境内)进行的。——第61页。

59 基本纲领,指《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又称《抗日救国六大纲领》。它由中国共产党于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日提出,得到宋庆龄等一千七百余人的热烈支持,经他们共同签名,并以“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的名义发表。纲领包括下列各项条款:(一)全体海陆空军总动员对日作战;(二)全体人民总动员;(三)全体人民总武装;(四)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在华财产及卖国贼财产以解决抗日战费;(五)成立工农兵学商代表选举出来的全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六)联合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敌人作友军,与一切守善意中立的国家建立友谊关系。——第63页。

60 三个条件,指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七日提出愿同任何武装部队订立作战协定,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三个条件。内容见本书《关于苏维埃政府的宣言与反机会主义的斗争》一文。——第63页。

61 见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7页)。——第63页。

62 四中全会,指一九三一年一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四中全会”开始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路线对党的第三次统治”。——第66、146页。

63 对于四中全会以后中央富农政策的错误,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了正确的结论。作者在这里对这一政策使用了肯定的语气,但是后文对当时消灭富农的实践的批评,实际上是指出了这一政策的错误。——第66页。

64 共产国际关于富农的这些意见,均见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秘书处一九二九年六月七日就农民问题给中共中央的信。——第66页。

65 作者作这个报告时,蒋介石正在继续出卖华北,并继续向红军进攻。因此,这里提出了“反对我们的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蒋介石”的策略。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党中央改变了这一策略,先后采取了“逼蒋抗日”和“联蒋抗日”的政策。收入本书的《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国民党三中全会后的形势与我党任务》、《中国共产党苏区代表会议的任务》等文反映了这种转变。——第67、71页。

66 给富农分坏田的原则,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决议》(一九三一年八月二十六日)中提出的。决议说:“未参加反对苏维埃武装斗争的富农,只能得到自耕的份地,但不能分好地,同时有一个条件,就是他们过去种过的地,今后仍亲自耕作。”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中国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明确规定富农“可以分得较坏的劳动份地”。——第68页。

67 互济会,即中国革命互济会,一九二九年十二月由成立于一九二五年九月的中国济难会改名而成。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革命互济精神

对受到压迫、摧残、牺牲的革命者及其家属给以精神、物质援助的广泛的群众组织。在苏区，互济会的活动主要是援助白区人民斗争、慰劳红军和动员会员参军参战等。——第 69 页。

68 参见本书《五一节与劳动法执行的检阅》一文。——第 70 页。

69 在瓦窑堡会议和其后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改变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实行的进行土地革命和建立苏维埃制度（工农民主专政制度）的纲领。后来为了适应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新形势，中共中央于一九三七年二月十日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表示，愿意保证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并将苏维埃政府改为特区政府。——第 72、88 页。

70 联邦共产党，指苏联共产党（布）。其俄文原名中的“всероссийная”一词，意为“全联盟的”（指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全国的），早年有时译为“联邦的”。——第 77 页。

71 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主张，即由各党派联合组织国防政府、由各抗日武装部队组织抗日联军的主张，最早是在中共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中提出的。这一主张后来未能实现。——第 79、87、92、103、110 页。

72 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的口号是中共中央在本决议中首次提出的。决议的第四节《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说：“为了使民族统一战线得到更加广大的与强有力的基础，苏维埃工农兵共和国及其中央政府宣告：把自己改变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苏维埃工农兵共和国（当时的正式名称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政权性质是工农兵民主专政，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的政权则以工农为主体，同时容纳其他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势力的阶级。一九三六年九月，中共中央改变了“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的口号。参见本书《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一文。——第 79 页。

73 别立中央，指张国焘一九三五年十月五日在卓木碉（四川马尔康县境内）非法成立“临时中央”。它后来于一九三六年六月六日被迫取消。——第 80 页。

74 对于张国焘的错误，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二日《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以及后来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二日《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一九三七年三月三十一日《关于张国

焘同志错误的决定》中作了详尽的分析和严肃的批评,但是对于他的党的组织结论一直暂时保留未作。直到一九三八年四月张公开叛党投靠国民党后,中共中央才于同年四月十八日作了《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第 80 页。

75 共产国际“七大”,指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五日至八月二十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第 82 页。

76 共产国际“七大”的两个最主要的决议是《法西斯的进攻和共产国际在争取工人阶级统一、反对法西斯的斗争中的任务》(根据季米特洛夫的报告作出)和《论共产国际在帝国主义者准备新的世界大战的情况下的任务》(根据陶里亚蒂的报告作出),均于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日通过。——第 82 页。

77 这里和下文所说的中央决议,都是指中共中央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第 82 页。

78 海军协定,指英、美、日、法、意五国在华盛顿会议期间于一九二二年二月六日签订的《限制海军军备条约》。它规定日本与英、美的战舰比例为 3 : 5。一九三四年十二月,日本要求拥有与英、美相等的舰队,在这一要求遭到拒绝后宣布将于该条约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期满时予以废除。一九三六年一月十五日,日本于上述要求再次遭到拒绝后宣布退出伦敦海军军备会议。——第 82 页。

79 华盛顿条约,指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十二日至一九二二年二月六日的华盛顿会议期间所签订的几个条约,《限制海军军备条约》即为其中之一。这些条约根据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力量对比的变化,对它们争夺远东霸权和海上霸权的斗争作了若干调节。——第 82 页。

80 阿比西尼亚,即埃塞俄比亚。——第 83 页。

81 凡尔赛条约,即《协约和参战各国对德和约》。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以英、法、美、日、意等战胜国为一方和以战败的德国为另一方,于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在巴黎西南凡尔赛宫签订。——第 83 页。

82 莱茵非武装区,通称莱茵非军事区。《凡尔赛和约》规定,莱茵河左岸由协约国占领十五年,右岸五十公里以内的区域为非军事区(非武装区),禁止德国在莱茵河两岸设防和驻军。一九三六年三月七日,希特勒德

国派军队进占莱茵非军事区。——第 83 页。

83 德国和日本后来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第 83 页。

84 海军协定,指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八日英国和德国关于限制海军军备的换文。按照这一协定,德国的海军舰队总吨位可以相当于英国的百分之三十五,潜艇总吨位可以相当于英国的百分之四十五。与《凡尔赛和约》规定德国交出全部舰队和不许制造潜艇相较,这是英国对于德国的妥协。——第 83 页。

85 法苏协定,指《法苏互助公约》,一九三五年五月二日在巴黎签订。它规定两国在“成为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的进攻威胁或进攻危险的对象”时即应相互援助。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七日和三月十二日,法国众议院和参议院分别批准了这一公约。——第 83 页。

86 中立法,指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七日美国总统签署的第二个中立法。这个中立法和同年二月底到期的第一个中立法都规定对交战国双方实行军火禁运。——第 83 页。

87 三大原则,指广田三原则。日本外相广田弘毅(一八七八——一九四八)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八日提出对华政策新方针,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一日明确为“对华三原则”,即:中国取缔一切排日运动;树立中、日、“满”经济合作;中、日共同防共。——第 84、138 页。

88 原记录在这里有删节号,表示漏记。李德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七日曾经向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提出《对战略的意见书》,强调要“帮助苏联的和平政策”,胡说中共中央的战略会起“日苏战争的挑拨者的作用”。——第 84 页。

89 东京事变,指日本法西斯军人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六日发动的武装政变事件。政变者占领政府重要机关,杀死大臣多人,并向陆军大臣实行“兵谏”,要求成立“军人政府”,建立军事独裁。政变因军阀集团内讧而未能成功,但事变后于三月九日执政的广田内阁却更为反动,标志着日本进一步法西斯化。——第 85 页。

90 广田三原则提出后,日本同国民党政府曾以它为基础在一九三六年进行了一年交涉。蒋介石起初表示原则上可以接受三原则。随着全国人

民抗日运动的更加高涨和英、美对日本趋于强硬,国民党政府的态度后来也有变化。——第85页。

91 冀察政务委员会,是国民党政府为适应日本帝国主义关于华北政权“特殊化”(参见本书注〔159〕、〔164〕)的要求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八日成立的机构。它负责处理河北、察哈尔两省和北平、天津两市政务,名义上隶属于南京国民党政府,实际上其委员长和委员的任命都须经得日本同意,其中不少人是直接由日本推荐的著名汉奸。在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以前,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汉奸殷汝耕已在通州(今北京市通县)成立了一个所谓“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的傀儡政权,十二月二十五日改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参见本书注〔122〕)。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后,其委员长宋哲元表示要同日本实行“亲善”。在后来的行动中,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要求妥协退让,但也不敢完全屈从。——第85、151页。

92 德王,即德穆楚克栋鲁普(一九二——一九六六),生于察哈尔部正白旗(今属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镶白旗),世袭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今属乌兰察布盟)扎萨克郡王。一九三四年三月七日被国民党政府任命为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秘书长,一九三六年一月十五日又任副委员长。他长期同日本帝国主义相勾结,进行所谓蒙古“自治”和“独立”的活动。一九三六年二月十二日,他在日本支持下成立“蒙古军总司令部”,宣布改用蒙古旗和成吉思汗年号纪年。同年五月十二日又成立“蒙古军政府”,任总裁。抗日战争爆发后,公开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第85页。

93 卓什海,即卓特巴扎普,原为察哈尔部牛羊群总管,后任察哈尔部蒙旗保安长官。一九三五年十二月,日本帝国主义操纵伪察东警备军司令官李守信部侵占察北,卓什海指挥各旗保安队与之公开合流,共同占据察北六县,并组织伪政权,由德王于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二日下令成立察哈尔盟,卓什海为盟长。在日本帝国主义后来操纵成立的伪蒙政权中,卓什海曾任“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的察哈尔盟长和“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的政务院长、参议会议长等职。——第85页。

94 广东,这里指国民党两广地方势力。参见本书注〔23〕、〔120〕。——第85页。

95 东征,指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六年从陕北进入山西作战的战役。这年二月二十日,红军组成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东渡黄河。蒋介石、

阎锡山部队在山西境内阻拦红军抗日去路。红军作战两个多月,取得重大战果。为团结抗日和避免不利决战,红军于五月初全部西渡黄河,回师陕北。——第 85、223 页。

96 作者作这一报告时,蒋介石还没有改变其投降卖国政策,并且以武力阻拦红军东征抗日。中共中央当时仍采取反蒋抗日的政策,在所倡议建立的抗日的人民统一战线中没有包括蒋介石在内。后来,随着形势的变化,中共中央相继实行逼蒋抗日、联蒋抗日的政策,抗日的人民统一战线的口号也不再使用。——第 85、90 页。

97 蒋,指蒋介石。——第 86、94、139、154、239 页。

98 原记录在此句之后有删节号表示漏记。《共产党是统一战线的核心》一文对这三个条件的内容作了具体说明,见本书第 94 页。——第 87 页。

99 国防政府十大政纲,最早在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中共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中提出,个别条文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的《抗日救国宣言》中有若干修改,最后的条文见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其中只规定没收汉奸卖国贼的土地,对一般地主未作此规定。《决议》中十大政纲的全文如下:(一)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财产作抗日经费;(二)没收一切卖国贼及汉奸的土地财产分给工农及灾民难民;(三)救灾治水,安定民生;(四)废除一切苛捐杂税,发展工商业;(五)加薪加饷,改良工人、士兵及教职员的生活;(六)发展教育,救济失学的学生;(七)实现民主权利,释放一切政治犯;(八)发展生产技术,救济失业的知识分子;(九)联合朝鲜、台湾、日本国内的工农,及一切反日力量,结成巩固的联盟;(十)对于中国的民族运动表示同情赞助或守善意中立的民族或国家,建立亲密的友谊关系。——第 89 页。

100 此文写作后不久,中共中央于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五日发表宣言,号召全国各党派团体建立抗日人民阵线,为抗日救国而共赴国难。这一主张后来没有实现。——第 92 页。

101 刘少奇(一八九八——一九六九),湖南宁乡人。一九三六年三月底,受中共中央委派到天津主持中共中央北方局的工作。——第 95 页。

102 指刘少奇。本书据以刊印的档案上收信人为“××”,另笔注明:

“复少奇信”。——第95页。

103 法西斯派,指当时统治集团中的蒋介石系。蒋介石一九三一年开始公开鼓吹法西斯主义,并且利用一九二七年成立的CC和一九三二年成立的复兴社两大特务和党务系统进行法西斯活动,扩展法西斯势力。——第95页。

104 陈铭枢(一八八九——一九六五),广东合浦人。一九三六年,把他组织的社会民主党改为“中华民族解放大同盟”,赞同中国共产党发布的“八一宣言”。——第96页。

105 洛佐夫斯基(Лозовский, Д ризо С А,一八七八——一九五二),苏联人。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三七年任红色工会国际(又译赤色职工国际)总书记。一九二九年七月十九日,他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会结束语中提出,在中国这样的国家中,应该开展秘密工会的工作,同时要在罢工运动的浪潮中从地下走出来,冲破一切严重的障碍,“争取公开存在的权利”。本书《关于白区工作中的一些问题》一文,对于这种“争取公开”作了进一步批判。——第96页。

106 新生活运动,是蒋介石一九三四年二月发起的标榜“复兴民族”的运动,以“礼义廉耻”,生活“艺术化”、“生产化”、“军事化”等为口号,宣扬封建道德和法西斯主义。当时中国共产党曾利用所谓新生活要以“整齐”、“清洁”等为标准的虚伪口号,领导工人群众向统治者争取经济利益。——第96页。

107 救国会,一九三五年“一二九”运动后在上海、北平、南京、武汉、天津、广西、山东等地陆续成立的各界群众的抗日救亡组织。除文化界救国会以外,妇女界、职业界等也成立了救国会。——第97页。

108 党团,根据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党章,由在政府、工会、农会、合作社及其他群众组织的领导机关中担任负责工作的党员(三人以上)组成。其任务是在各该组织的领导机关中指导党员为加强党的影响、实现党的政策而工作。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制定的党章,把“党团”改称“党组”。——第98页。

109 左联,即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社联,即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它们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文学团体和革命文化团体,分别于一九三三年三

月和五月在上海成立。在左联、社联之后,在上海还相继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教育工作者联盟、新闻记者联盟等革命团体。一九三六年初,为了更广泛地组织各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左联宣布自动解散,社联等也停止活动。——第98页。

110 C Y 是共产主义青年团(Communist Youth League)的英文缩写。一九三五年九月,青年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决定建立全世界青年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并为此指示各国青年团实行“根本改造”,使团“成为广大群众的非党的青年团”。在作者写了这封信以后,中共中央北方局于一九三六年九月决定取消C Y。中共中央又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一日作了《关于青年工作的决定》,规定取消国民党区域内原有第二党式的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所有团员可参加现有合法的公开的青年组织,并利用公开和半公开的可能,在青年群众需要和要求的基础上建立各种各样的青年组织。这一期间和后来抗日战争期间,曾先后出现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青年救国会、青年抗日先锋队等青年抗日救国团体。——第98页。

111 民族解放先锋队,即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原是“一二九”运动中的先进青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于一九三六年二月在北平成立的青年团体。后来在各地也陆续建立了民先队组织。一九三七年二月在北平成立了领导全国民先队的总队部。抗日战争爆发后,许多队员到敌后根据地参加抗战。国民党统治区的组织解散,解放区的组织合并于青年救国会。——第98页。

112 二十九军,指国民党军队的第二十九军,原系冯玉祥所属西北军的一部,当时在北平、天津一带驻防。军长宋哲元兼任国民党政府为适应日本帝国主义关于华北特殊化的要求而建立的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委员长,对日本的侵略妥协退让,但还不愿当汉奸。二十九军的官兵曾参加一九三三年三月的长城抗战。全国人民救亡运动的高涨,进一步增强了他们的抗日要求。——第98、138、150页。

113 老柯,指柯庆施(一九二——一九六五),安徽歙县人。当时任中共河北省委组织部长。——第99页。

114 王兄,指王世英(一九一五——一九六八),山西洪洞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联络处长。——第100页。

115 中国工农红军三个方面军的会合不久于一九三六年十月在甘肃

会宁地区实现。——第 101 页。

116 绥远,原是一个省,一九五四年撤销,辖区划归内蒙古自治区。——第 102 页。

117 李守信一八九二年生,热河卓索图盟土默特右旗(今属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盟)的蒙族人。一九三三年四月投降日本后,曾任伪“察东警备军司令官”。一九三六年四月任伪“蒙古军政府”所属“蒙古军”副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一九三六年八月上旬和十一月两次参加对绥东的进攻。一九三七年十月起在日本帝国主义操纵的伪蒙政权中任伪“蒙古军”总司令。日本投降后,为国民党军收编。一九四九年十二月逃往蒙古人民共和国,次年被引渡回国。——第 102、136 页。

118 向绥东直接进攻,指日本帝国主义一九三六年八月上旬,指使以德王为总裁的伪“蒙古军政府”所属部队对绥远东北门户、陶林县所属红格尔图(今属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盟察哈尔右翼后旗)发动的进攻,这一进攻被当地驻军击退。李守信部队参加了这次进攻。——第 102、105 页。

119 “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是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给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全国军队和各党派团体的通电中提出的。——第 102、107、180 页。

120 一九三六年六月二日,设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发表通电,以呼吁南京政府抗日相号召。接着,两广军队改称抗日救国军西南联军,由广东、广西的实权人物陈济棠、李宗仁分任总副司令,出兵北上与蒋介石对立。七月十八日,陈济棠因所属空军和主力之一余汉谋投蒋而告失败,出走香港。广西则与南京相持至九月中旬。——第 102 页。

121 西北抗日大联合,指红军同东北军、西北军以及蒙民、回民在陕、甘、宁、青的抗日大联合局面。——第 103 页。

122 日本帝国主义一九三五年策动汉奸进行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并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后改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企图制造“独立”的“华北国”,作为它并吞华北的一个策略步骤。参见本书注〔91〕、〔164〕。——第 105 页。

123 经济提携,即所谓“中日经济提携”,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实行

经济侵略、使中国的经济附属于日本、变中国为日本独占的殖民地的口号。一九三五年一月日本外相广田弘毅提出。据日本外务省同年二月拟定的方案，“提携”的内容包括：实行对华经济、技术、商务、金融的“援助”，确立“东亚经济集团”；减低对日关税；实行日本供给工业品、中国供给原料的物物交换制度（当时称为“工业日本，农业中国”）等。——第 105、138 页。

124 一九三六年四月十八日，日本陆军当局决定扩编中国驻屯军，增加兵力约二倍。——第 105 页。

125 成都、北海、汉口、上海、丰台等地的挑衅，指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挑衅和在中国人民爱国情绪高涨的情况下出现的一系列事件：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四日，成都群众示威反对日本强迫在成都设立领事馆，日本两名设馆先遣官员被殴毙；九月九日，广东北海（今属广西）日方潜伏特务人员中野被殴毙；九月十八日，日军向驻守北平附近的丰台的二十九军挑衅，遭到守军反击；九月十九日，汉口日租界的日警吉冈被击殒命；九月二十三日，上海虹口日租界日本水兵中山被狙毙。日本帝国主义以这些事件为借口，调动军舰、部队，并在上海等地中国境内举行军事演习，进行威胁讹诈，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侵犯中国主权的无理要求。——第 105 页。

126 “防共统一战线”，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一项阴谋。一九三六年一月，日本外相广田弘毅提出中日共同防共，作为其对华三原则之一，企图以“共同防共”引诱国民党政府，以便破坏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并增派军队来华，达到吞并中国的目的。由于中国人民团结抗日，这一阴谋未能得逞。——第 106、193 页。

127 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即国防政府十大政纲。参见本书注〔98〕。——第 109 页。

128 十二月中央政治决议，指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举行的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第 109、223 页。

129 语出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日通过的决议《法西斯主义的进攻和共产国际在争取工人阶级统一、反对法西斯的斗争中的任务》。原话是“共产党员一分钟也不应该放弃用共产主义精神来教育群众、动员群众与组织群众的独立工作。”——第 110 页。

130 《总理遗嘱》指中国国民党总理孙中山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一日病危时的遗嘱。——第 114 页。

131 哥老会,清代以来的民间秘密组织。会众多为手工业工人、破产农民、退伍军人和游民,也有地主分子掺杂其间。最初以“反清复明”为宗旨。在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会众多次参加农民起义、反洋教斗争和辛亥革命的武装起义。以后常为反动势力操纵和利用。中共中央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六日作出《关于争取哥老会的指示》,要求推动与吸引哥老会会众参加抗日统一战线。——第 114 页。

132 民团,是旧中国农村中地主阶级为维护自己的利益而组织的武装。——第 119 页。

133 共产主义青年团和社联、左联的取消问题见本书注〔109〕、〔110〕。赤色工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会,在国民党统治区只能吸收少数先进分子参加并秘密存在。——第 121 页。

134 青年会,即基督教青年会,基督教(新教)的社会活动机构。主张在青年中进行德、智、体的教育,并提倡改良主义。一八八五年由美国传入中国。——第 122 页。

135 童子军,原为某些资本主义国家中使儿童接受军事化训练的组
织。国民党统治时期,也设有中国童子军总会,领导全国童子军训练事宜,
并在初中设童子军课程,推行童子军管理。——第 122 页。

136 抵货,即抵制日货。——第 132 页。

137 缉私,这里指查缉当时日本帝国主义组织的武装走私。——第 132、153 页。

138 参见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249 页)。——第 134 页。

139 国民党三中全会,指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五日至二十二日在南京举行的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这次全会商讨了对中共和对日本的政策。全会召开前夕,中共中央为了推动国共两党重新合作,于二月十日去电,向国民党提出五项要求,即“(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二)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材,共同救国;

(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人民生活。”同时表示如国民党三中全会将五项要求定为国策,中共将给予四项保证,即:“(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二)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由于全国人民的压力和国民党内部的变动,全会通过了一个实际上接受中共提议的决议。这标志中国共产党组织和领导的全国范围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初步形成。——第 135、144 页。

140 张,指张学良,一九一一年生,辽宁海城人。杨,指杨虎城(一八九三——一九四九),陕西蒲城人。他们的抗日八大主张是在西安事变中通电全国并当面要求蒋介石付诸实行的。这些主张是:(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六)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七)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第 135 页。

141 国民大会的选举法,指国民党政府一九三六年五月十四日公布的《国民大会代表选举法》。按照孙中山的《建国大纲》,国民大会是决定宪法并在宪法颁布后行使中央统治权的机构。国民党政府曾决定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召开国民大会。这项《选举法》和同日公布的《国民大会组织法》,其用意在于保证实行一党包办的选举,使国民大会成为国民党独裁统治的工具。由于全国舆论的反对,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不得不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日决定将国民大会推迟至同年十一月十二日召开(后来没有实现),并授权中央常务委员会修改上述两项法律。——第 136 页。

142 指蒋介石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二日在三中全会闭幕后对中央社记者发表的谈话。——第 136 页。

143 王英,出生于绥远五原(今属内蒙古自治区)。当时是日本帝国主义委任的“大汉义军”司令官。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参加日本帝国主义策动和指挥的对绥东的进攻。抗战爆发后,被日寇委为“绥西自治联军总司令”,盘踞绥远西部。日本投降后,为国民党军收编。一九五一年被镇压。——第 136 页。

144 二中全会,指一九三六年七月十日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蒋介石七月十三日在会上讲话,对于他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九日在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说“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一语解释说,现在“并未达到和平绝望时期”,“并未达到最后关头”。——第136页。

145 四条,指中共中央一九三七年二月十日向国民党三中全会提出的四项保证。参见本书注〔139〕。——第136页。

146 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根绝赤祸案》中所提的四个条件是:取消红军;取消苏维埃政府;停止赤化宣传;停止阶级斗争。这些条件可以作不同的解释。红军和苏维埃政府改了名称,从名义上看也可以说就是已经取消。——第136页。

147 张群,一八九九年生,四川华阳(今并入双流)人。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二日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任内主持了中日“亲善”、“提携”的外交谈判。——第136页。

148 王宠惠(一八八一——一九五八),广东东莞人。他接替张群被任命为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是在一九三七年三月三日。——第136页。

149 俞飞鹏(一八八四——一九六六),浙江奉化人。原为国民党政府交通部政务次长,一九三七年三月三日被任命为交通部长,代替同汪精卫关系密切的顾孟余。——第136页。

150 熊式辉(一八九三——一九七四),江西安义人。当时任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第137页。

151 许世英(一八七二——一九六四),安徽至德(今东至)人。一九三六年二月八日起任国民党政府驻日本大使。他于一九三七年三月六日“告假”回国,三月十三日曾提出辞职,未获准。——第137页。

152 孔祥熙(一八八——一九六七),山西太谷人。当时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他于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日被任命为国民党政府参加英王加冕典礼的特使,四月二日以此名义去英国,行前表示希望此行“促成两国间更大之谅解”。——第137页。

153 绥远抗战,指一九三六年十一月绥远驻军傅作义所部在全国人

民抗日救亡运动推动下对于日本帝国主义进犯绥远的抵抗(参见本书注〔157〕)。一九三七年三月十五日,在归绥(今呼和浩特市)举行了追悼绥远抗战阵亡军民大会。国民党中央派汪精卫、阎锡山等人参加。——第 137 页。

154 孙科(一八九一——一九七三),广东香山(今中山)人。当时任国民党政府立法院长。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日,他发表谈话说:中日两国的经济提携,必须先排除“冀东、察北及走私”等“政治上之障碍”;“我人之欲与人合作,务须先有抗战之决心与力量”。——第 137 页。

155 西北问题,指原由张学良、杨虎城分别率领的东北军、西北军同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关系问题。这两支军队当时驻扎在陕西、甘肃一带。——第 137 页。

156 九月决议,指一九三六年九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见本书第 105 页。——第 137 页。

157 绥东进攻,指日本帝国主义在一九三六年八月进攻红格尔图受挫(参见本书注〔118〕)后,于同年十一月调动伪满军、伪“蒙古军政府”所属以德王、李守信信任正副总司令的伪“蒙古军”以及王英的伪“大汉义军”共二万余人对绥远的再次进攻。十一月十四日至十七日,王英伪军进犯红格尔图遭到惨败。绥远国民党驻军傅作义部乘胜反攻,十一月二十四日和十二月十日相继收复了百灵庙和锡拉木伦庙。——第 138 页。

158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变发生后,日本外相有田八郎于十七日发表声明,要求国民党政府“绝对不能与张学良妥协,否则日本政府将不能坐视”,十九日又约见国民党政府驻日本大使许世英,要求南京方面彻底实行“讨伐”。日本方面还表示对南京政府“不惜给以援助”,竭力挑拨中国内战。——第 138 页。

159 华北特殊化,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一个策略步骤。日本企图首先使华北脱离国民党政府,成为完全听命于它的特殊区域。经过一九三五年的一系列事件,“华北特殊化”计划在相当程度上得到实现。此后日本企图进一步策动“华北联省自治”和“华北各省同盟防共”的阴谋,则未能得逞。参见注〔91〕、〔164〕。——第 138 页。

160 石友三(一八九一——一九四) ,吉林长春人。他在一九三二年

起即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勾结土匪、汉奸,在冀东一带活动。一九三六年一月被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任命为冀北保安司令。——第138页。

161 《字林西报》,英帝国主义在中国出版的英文报纸,一八六四年七月创刊,一九五一年三月三十一日停刊。——第138页。

162 佐藤,即佐藤尚武(一八八二——一九七一),一九三七年三月三日就任日本外务大臣。他于三月八日、十一日连续在日本国会答复质询,表示今后对中国要“以平等地位进行谈判”;“充分考虑中国之要求,以及与中国有密切关系之权利”,并要“协助”中国统一及复兴。他同时强调,谈判不能“牺牲与日本有密切关系之利益”,对华外交根本方针“无加以任何变更之必要”,需要“重加检讨”的只是达到目标的“方法”。——第138页。

163 日德防共协定,即《反共产国际协定》。参见本书注[82]。——第139页。

164 托派,托洛茨基派的简称,原为联共(布)党内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反列宁主义的政治派别。这里指中国的托派。抗日战争爆发前夜,托派以极左的面目出现,诬蔑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出卖阶级”,“为资产阶级服务”。抗战爆发以后,从一九三八年九月起,中国托派成为第四国际的一个支部,又继续攻击中国共产党,从事分裂工人阶级队伍的活动。但是,托派在宣传上也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他们同日本帝国主义豢养的汉奸不是一回事。本书有时将托派同汉奸相提并论,这是当时流行的一种不确切的提法。——第143、148、158、187、219、233页。

165 华北事变,是一九三五年日本帝国主义为全面侵占华北而蓄意制造的一系列事件的总称。这一年五月,日本在河北挑起事端,向中国政府提出无理要求。七月六日,国民党政府在华北的代表何应钦正式致函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接受了梅津六月九日备忘录中提出的全部要求。这就是所谓“何梅协定”。六月,日本又在察哈尔制造事端,逼使国民党察哈尔省政府代理主席秦德纯于六月二十七日与当时在北京的日本关东军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以换文的方式达成协议,通称“秦土协定”。按照这些协定,中国在河北和察哈尔的主权大部丧失。十月,日本指使汉奸在河北省东部举行暴动,一度占领了香河县城。后来又相继成立了冀东伪政权和“冀察政务委员会”。参见本书注[91]、[159]。——第144、151页。

166 李大钊(一八八九——一九二七),河北乐亭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中共第二、三、四届中央委员,一九二四年底任北方区执行委员会书记。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被军阀张作霖逮捕,二十八日在北京就义。——第 145 页。

167 陈延年(一八九八——一九二七),安徽怀宁人。中共五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五大”后,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六日被捕,七月四日在上海龙华就义。——第 145 页。

168 陈乔年(一九二——一九二八),安徽怀宁人。中共五届中央委员,一九二七年底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一九二八年二月十六日被捕,同年六月一日在上海就义。——第 145 页。

169 许白昊(一八九六——一九二八),湖北应城人。中共五届中央监察委员。一九二八年二月十六日在上海担任总工会领导工作期间被捕,同年六月一日在上海就义。——第 145 页。

170 赵世炎(一九一——一九二七),四川酉阳人。中共五届中央委员。一九二七年六月任中共江苏省委代理书记。同年七月二日在上海被捕,十九日就义。——第 145 页。

171 罗亦农(一九二——一九二八),湖南湘潭人。中共五届中央委员。在一九二七年“八七”会议上当选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一九二八年四月十五日在上海被捕,二十一日就义。——第 145 页。

172 王一飞(一八九九——一九二八),浙江上虞人。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日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任内领导长沙暴动时被捕,一九二八年一月就义。——第 145 页。

173 郭亮(一九一——一九二八),湖南长沙人。中共五届中央委员。一九二八年三月二十七日于湘鄂赣边特委书记任内在岳阳被捕,二十九日在长沙就义。——第 145 页。

174 夏明翰(一九——一九二八),湖南衡阳人。一九二七年起历任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平(江)浏(阳)特委书记和湖北省委常委委员。一九二八年二月八日在汉口被捕,次日就义。——第 145 页。

175 彭湃(一八九六——一九二九),广东海丰人。我党早期农民运动领袖。中共第五、六届中央委员。在一九二七年“八七”会议上当选中央临时

政治局委员,“六大”后当选政治局候补委员。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四日在上海被捕,三十日在龙华就义。——第 145 页。

176 杨殷(一八九三——一九二九),广东香山(今中山)人。中共六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候补委员,并任中央军事部部长。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四日在上海被捕,三十日在龙华就义。——第 145 页。

177 颜昌颐(一八九八——一九二九),湖南安乡人。一九二八年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兼江苏省委军委委员。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四日在上海被捕,三十日在龙华就义。——第 145 页。

178 张太雷(一八九八——一九二七)江苏常州人。中共第四、五届中央委员。在一九二七年“八七”会议上当选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十月主持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兼任广东省委书记。十二月十二日在领导广州起义时牺牲。——第 145 页。

179 苏兆征(一八八五——一九二九),广东香山(今中山)人。一九二六年当选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中共五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六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工委书记。一九二九年二月二十五日在上海病故。——第 145 页。

180 王荷波(一八八二——一九二七),福建闽侯人。中共三届中央委员、第四届中央候补委员,五届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在一九二七年“八七”会议上当选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会后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在北京被害。——第 145 页。

181 蔡和森(一八九五——一九三一),湖南湘乡永丰镇(今属双峰县)人。中共第二、三、四、五、六届中央委员,“五大”、“六大”后均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一九三一年主持中共广东省委工作期间,于六月十日在香港被英帝国主义逮捕,同年引渡到广州后被害。——第 145 页。

182 瞿秋白(一八九九——一九三五),江苏常州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共第四、五、六届中央委员。在一九二七年“八七”会议后任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央工作。一九三四年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教育委员。一九三五年二月在福建游击区被国民党军逮捕,六月十八日在福建长汀就义。——第 145 页。

183 恽代英(一八九五——一九三一),江苏武进人。中共五届中央委员、六届二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一九三一年五月六日在上海被捕,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九日在南京就义。——第 145 页。

184 邓中夏(一八九四——一九三三),湖南宜章人。中共第二、五届中央委员,第三、六届中央候补委员。在一九二七年“八七”会议上当选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五日于中国革命互济会党团书记任内在上海被捕,九月二十一日在南京就义。——第 145 页。

185 向警予(一八九五——一九二八),湖南溆浦人。中国共产党早期妇女运动领导人之一。中共第二、三届中央候补委员。一九二八年三月二十日在汉口被捕,五月一日就义。——第 145 页。

186 刘华(一八九九——一九二五),四川宜宾人。五卅运动时上海工人运动领导人之一,任上海总工会副委员长。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在上海被捕,十二月十七日就义。——第 145 页。

187 汪寿华(一九一——一九二七),浙江诸暨人。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领导人之一。起义胜利后,被选为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委员和上海总工会委员长,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一日被杀害。——第 145 页。

188 方志敏(一八九九——一九三五),江西弋阳人。中共六届中央委员,赣东北苏区和红军第十军的创建者。一九三四年率领红军抗日先遣队北上。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九日在江西怀玉山与国民党军队作战时被俘,同年八月六日在南昌就义。——第 145 页。

189 沈泽民(一九一——一九三三),浙江桐乡人。一九三一年一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中央委员。一九三三年冬在中共鄂豫皖省委书记任内病故。——第 145 页。

190 何叔衡(一八七六——一九三五),湖南宁乡人。中共“一大”代表。一九三一年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工农检查人民委员、最高法院院长等职。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红军长征后留根据地坚持斗争。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四日在福建长汀突围战斗中牺牲。——第 145 页。

191 赵博生(一八九七——一九三三),河北黄骅人。宁都起义领导人之一。历任红五军团参谋长、副军团长兼第十四军军长。一九三三年一月八日在江西南城黄狮渡与国民党军作战时牺牲。——第 145 页。

192 董振堂(一八九五——一九三七),河北新河人。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四日同赵博生一起率部举行宁都起义,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后任红五军团军团长。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日在甘肃高台战役中牺牲。——第145页。

193 黄公略(一八九八——一九三一),湖南湘乡人。平江起义领导人之一。一九三一年任红三军军长。一九三一年九月在江西吉安东固附近作战时牺牲。——第145页。

194 黄甦(一九三——一九三五),广东人。一九三四年一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中央候补委员,后任红八军团政委,红一军团组织部长。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在陕西郿县(今富县)直罗镇战役中牺牲。——第145页。

195 刘畴西(一八九七——一九三五),湖南长沙人。曾任闽浙赣省军区司令员,红十军团军团长,北上抗日先遣队总指挥。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九日在江西怀玉山与国民党军队作战中被俘,同年七月在南昌就义。——第145页。

196 寻淮洲(一九一二——一九三四),湖南浏阳人。一九三四年七月任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总指挥,十月任红十军团十九师师长。十二月十四日在安徽太平谭家桥作战时负伤,数日后牺牲。——第145页。

197 唐在刚(一九三——一九三五),四川开江人。一九二九年起,历任中共赣东北特委书记、闽浙赣军区司令员等职。一九三四年闽浙赣红军主力北上抗日后,留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一九三五年一月五日在江西横峰作战时牺牲。——第145页。

198 陈寿昌(一九一六——一九三四),浙江镇海人。一九三四年四月任中共湘鄂赣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在湖北崇阳老虎洞战斗中牺牲。——第145页。

199 徐彦刚(一九一七——一九三五),四川开江人。曾任中国工农红一军团参谋长、湘鄂赣军区司令员等职。一九三四年秋红军长征后留湘鄂赣苏区坚持游击战争。一九三五年八月在江西安义、永修地区作战时负伤,被叛徒出卖,遭杀害。——第145页。

200 林瑞笙(一九一六——一九三五),江西萍乡人。一九三二年三月

任中共湘鄂赣省委书记,一九三五年四月在萍乡大安里牺牲。——第 145 页。

201 高泳生(一九 八——一九三五),湖南平江人。曾任红十六师师长。一九三四年八月在江西修水作战时牺牲。——第 145 页。

202 严图阁(一九 三——一九三六),河南沈丘人。一九三三年任湘鄂赣军区参谋长、司令员。一九三六年六月在湖南平江病故。——第 145 页。

203 刘伯坚(一八九五——一九三五),四川平昌人。曾协助冯玉祥部工作,任国民军总政治部主任。后任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红军长征后留赣南坚持斗争,任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一九三五年三月四日作战时负伤被俘,二十一日在大庾(今大余)就义。——第 145 页。

204 贺昌(一九 六——一九三五),山西离石县柳林镇(今属柳林县)人。中共第五、六届中央委员。曾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红军长征后留赣南坚持斗争。一九三五年三月四日在江西会昌附近与国民党军作战时牺牲。——第 145 页。

205 陈阿金(一九 ——一九三四),江苏阜宁人。红三军团五师政委。一九三四年八月在广昌高虎垅阻击战中牺牲。——第 145 页。

206 孙小保(一九 七——一九三二),江苏阜宁人。一九三二年在中央军委工作,任上海民众反日救国义勇军的军事指导员。三月二日在上海群众反日集会上被枪杀。——第 145 页。

207 傅维钰(一九 四——一九三二),湖北英山人。一九三二年三月一日在担任上海民众反日救国义勇军组织部部长期间被国民党逮捕牺牲。——第 145 页。

208 黄励(一九 五——一九三三),湖南益阳人。一九三三年一月就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同年四月二十五日在上海被捕,七月五日在南京就义。——第 145 页。

209 韦拔群(一八九三——一九三二),广西东兰人。百色起义领导人之一。一九三 年红七军主力开往江西后留在右江地区坚持斗争。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九日在东兰牺牲。——第 145 页。

210 夏曦(一九 一——一九三六),湖南益阳桃江镇(今属桃江县)人。一九三一年一月六届四中全会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曾任湘鄂西分局书记。一九三六年三月在贵州毕节附近牺牲。——第 145 页。

211 陈香波(一九 一——一九二九),湖北江陵人,曾任县委书记,一九二九年在湖北沙市牺牲。——第 145 页。

212 崔琪(一八九九——一九三二),湖北监利人。曾任中共湘鄂西省委书记、湘鄂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一九三二年十月下旬在洞庭湖附近牺牲。——第 145 页。

213 鲁易(一九 一——一九三二),湖南常德人。一九三一年起在洪湖苏区工作,曾任红三军政治部主任、红三军七师政委等职。一九三二年九月在作战中被俘,十月四日在湖北仙桃镇(今沔阳)就义。——第 145 页。

214 汤慕禹(?——一九三二),四川人。一九三 年到洪湖苏区工作,曾任红六军军长。一九三二年在荆门大瓦山战斗中牺牲。——第 145 页。

215 朱勉之(一九 四——一九三二),湖北武昌人。一九三 年到洪湖苏区工作,曾任红二军政委,一九三二年秋在洪湖牺牲。——第 145 页。

216 谢子长(一八九七——一九三五),陕西安定(今子长)人。陕北革命根据地创建者之一。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七日起在陕西清涧作战时负伤,次年二月二十一日逝世。——第 145 页。

217 刘志丹(一九 三——一九三六),陕西保安(今志丹)人。陕甘革命根据地和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的创建者之一。一九三六年春率领红二十八军参加东征,四月十四日在山西中阳县三交镇牺牲。——第 145 页。

218 杨琪(一八九六——一九三六),陕西延川人。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之一。曾任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师长等职。一九三六年三月九日在东征战役中牺牲于陕西绥德。——第 145 页。

219 杨森(一九 九——一九三六),陕西乾县人。曾在陕甘苏区工作,任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师长、红十五军团七十八师师长等职。一九三六

年四月在山西中阳作战时牺牲。——第 145 页。

220 刘天章(一八九三——一九三一),陕西高陵人。一九三一年任中共山西省委书记。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一日在太原被捕,十月四日就义。——第 145 页。

221 蔡申熙(一九一六——一九三二),湖南醴陵人。一九三一年五月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一九三二年七月任红二十五军军长。十月九日在湖北黄安河口地区战斗中牺牲。——第 145 页。

222 王平章(一九一——一九三三),湖北汉川人。曾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红二十五军政委、红二十八军政委等职。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八日在河南商城门坎山战斗中牺牲。——第 145 页。

223 甘济时(一九一——一九三二),湖北黄安(今红安)人。曾任中共鄂豫皖特委委员、红四方面军十一师政委等职。一九三二年十月九日在黄安河口地区战斗中牺牲。——第 145 页。

224 吴焕先(一九一七——一九三五),湖北黄安的四角曹门村(今属河南新县)人。鄂豫皖根据地的创建者之一。曾任红二十五军军长、政委。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一日在甘肃泾川四坡村作战时牺牲。——第 145 页。

225 孙玉清(一九一九——一九三七),湖北黄安(今红安)人。曾任红军第三十一军、红九军军长。一九三七年三月在甘肃酒泉南山地区作战负伤被俘,四月下旬在西宁就义。——第 145 页。

226 六次大会,指一九二八年六、七月间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第 146 页。

227 对于四中全会的路线,包括张闻天在内的党内多数同志有一个认识过程。这里的提法基本上是遵义会议决议的提法。经过延安整风,全党认识达到一致。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四中全会“开始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路线对党的第三次统治”。——第 146 页。

228 特区,指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原苏区。将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包含在中共中央一九三七年二月十日向国民党三中全会所作的四项保证之中。作者致开幕词时,国共第二次合作尚未正式成立,工农

政府并未改名。这里是就预计国共合作成立以后的情况而言的。——第147页。

229 见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红军学院学生毕业典礼上的讲话》。原话是“人材、干部是世界上所有宝贵的资本中最宝贵最有决定意义的资本。应该了解：在我们目前的条件下，‘干部决定一切’”。（《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6页）——第148页。

230 这里是指尚能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那一部分大资产阶级。——第149页。

231 德、意、日防共协定，指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德国和日本签订的《反共产国际协定》。意大利同它们立场一致，但正式加入这一协定则是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六日。——第150页。

232 德、意在西班牙的新进攻，指德、意军队直接支持西班牙法西斯将领佛朗哥于一九三六年七月发动内战，反对西班牙人民阵线政府。——第150页。

233 宋哲元（一八八五——一九四〇），山东乐陵人。当时任国民党第二十九军军长、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河北省政府主席。——第151页。

234 塘沽协定，国民党政府代表熊斌同日本关东军代表冈村宁次于一九三三年五月三十一日在塘沽（今属天津市）签订的停战协定。这一协定停止了中国军队对日本侵略军同年三月进攻长城沿线时的自动抵抗，规定中国军队撤出长城以南大片地区，并将这一地区划为“非武装区”。——第151页。

235 察绥，察，即察哈尔，是当时的一个省。一九五二年撤销，分别并入河北、山西两省。绥，即绥远，见本书注〔116〕。——第151页。

236 七君子，指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七人。他们因进行抗日爱国活动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被国民党当局逮捕，直至一九三七年七月三十一日才被释放。——第152页。

237 国防会议，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二日在南京举行。中国共产党派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前往参加。——第152页。

238 中日和平谈判,指国民党政府在抗日战争爆发后派其当时在国内休假的驻日本大使许世英于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七日返职,同日本政府进行的谈判。——第 153 页。

239 本文据以刊印的档案材料有脱页,十大纲领没有列全。后来中共中央于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正式公布《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条文有变动。——第 154 页。

240 蒋介石谈话,指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六日蒋介石的《告全国国民书》,表示要“抗战到底”;“争取国家民族最后之胜利”。从一九三七年十月底起,蒋介石一直通过德国同日本进行秘密接触,准备妥协投降。由于全国人民反对和谈的强大压力,又由于日本在十二月十三日侵占南京后提出了新的苛刻条件,这一场妥协投降活动暂告中断。——第 156 页。

241 《宣言》指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对时局宣言》。这个宣言呼吁加强国共两党和全民族抗日力量的团结,在持久抗战中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第 156 页。

242 这里指国民党统治区域中的中央与地方。本文下面所说军队中政治工作开始建立、民众运动更加发展、进步不能适应战争需要、新的人材没有引进等,也都是就国民党统治区域的情况而言的。——第 156 页。

243 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党参加政府问题的决定草案》曾规定,共产党中央及地方党部可以在一定的共同纲领并在完全平等的原则之下,同国民党中央及地方党部组织统一战线的组织,如各种联合委员会,以达到国共两党的合作。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中共中央和国民党中央各指派了四名代表组织两党委员会,并指定了双方参加起草两党共同纲领的代表。由于国民党的阻挠,两党委员会后来没有正式成立。——第 156 页。

244 指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九日至十四日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第 157 页。

245 打《新华日报》馆,指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七日国民党武汉当局唆使地痞、流氓数十人袭击和破坏《新华日报》营业部和印刷部的事件。——第 158 页。

246 指一九三八年二月二日毛泽东对《新中华报》记者其光发表的谈

话。一九三八年一月和二月,在武汉出版的国民党军事系统的《扫荡报》和国民党CC系的《血路》周刊连续就所谓“党派问题”发表文章,鼓吹国民党一党专政,叫嚣“国民党外的一切党派,都没有独立存在的理由”。毛泽东在谈话中驳斥了这一谬论。——第158页。

247 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后来于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九日至四月一日举行。一九三八年三月一日和二十五日,中共中央两次致电大会全体代表,先后提出巩固与扩大各党派的团结等提议。——第159页。

248 民族联盟,是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七年向国民党提议采用的抗日统一战线组织形式。按照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参加民族联盟的各党派保持组织上的独立性,同时按民主原则选出代表,成立中央和地方的委员会,依据共同纲领进行工作。由于国民党的反对,这一建议未能实现。——第159页。

249 南方各特区,指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抗日游击根据地。参见本书注〔227〕。——第160页。

250 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是敌后第一个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抗日民主政权,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一日由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在冀西阜平选举产生。同月二十八日,王明等致电中央书记处和八路军总部,反对成立晋察冀的人民抗日政权,认为这样做会“刺激”国民党,“对全国的统一战线工作,将发生不良影响”。——第160页。

251 陕北公学,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培养干部的学校,招收来自全国各地的进步青年。一九三七年九月成立于延安,一九四一年并入延安大学。——第162页。

252 见孙中山《遗嘱》(《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94页)。——第166页。

253 指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的话:“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页)——第175页。

254 见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倾向》(《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46页)。——第184页。

255 《张国焘敬告国人书》,是张国焘一九三八年四月逃到武汉投入

国民党特务集团并于四月十八日被开除出党后,于同年五月六日公开发表的。——第 186 页。

256 国民革命的统一战线,指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构成两党合作基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一九二四年一月)将当时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称为“国民革命”。——第 188 页。

257 伪中央,参见本书注〔73〕。——第 189 页。

258 《抗战建国纲领》,一九三八年四月一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内容包括抗战的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政策。这个纲领对人民作了某些让步,如规定组织国民参政机关,许诺给予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以后,蒋介石逐步推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取消了纲领中对人民的某些让步。——第 194、220 页。

259 国民政府,原为一九二五年七月一日在广州成立的“广东革命政府”的正式名称,一九二七年一月迁至武汉。蒋介石一九二七年四月发动反革命政变后,于同月十八日在南京另立政府,也称“国民政府”。它此后即为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央政府的正式名称。——第 194 页。

260 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一九三八年四月二日发表。这个宣言和同一大会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表示要坚持抗战,“不达目的决不中止”,并表示要“联合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之势力”,“联合世界上同情于我之国家及民族”。——第 195 页。

261 叶青,原名任卓宣,一八九五年生,四川南充人。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八年被捕后叛变,投靠国民党,从事反共宣传。——第 195 页。

262 陶希圣,一八九九年生,湖北黄冈人,当时任国民党《中央日报》主编。——第 195 页。

263 张伯伦(Arthur Neville Chamberlain,一八六九——一九四〇),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〇年任英国首相。任内执行纵容德、意法西斯侵略的绥靖政策。——第 195 页。

264 张国焘指的是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关于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决定。——第 197 页。

265 “八一宣言”,即中共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第 197、223 页。

266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指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七日至三十一日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清算了张国焘的错误,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第 197 页。

267 《党的工作》,中共中央主办的党内刊物。一九三六年六月十日创刊。——第 198 页。

268 土司,原为元、明、清时于西北、西南等地区设置的由少数民族首领充任并世袭的官职。这里讽喻张国焘企图偏安于远离抗日前线的西南边陲。——第 198 页。

269 柳宁,原名朱新繁。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叛变,投靠国民党。当时在西安主编《抗战与文化》,从事反共宣传。——第 199 页。

270 “算八字”,依八字推算,预卜命运的一种迷信方法。旧时以天干地支相配记录一个人出生的年、月、日、时,每项两字,共得八字。——第 200 页。

271 语出《中庸》第三十章:“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帔。辟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这番话说明,天地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它能够包容一切。——第 203 页。

272 见《孟子·公孙丑上》。——第 205 页。

273 语出《左传·庄公十一年》:“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勃,猝然。忽,迅速。——第 205 页。

274 见《孟子·尽心下》。——第 205 页。

275 见《资治通鉴·唐纪·太宗贞观十七年》。——第 206 页。

276 后汉献帝,即东汉亡国之君刘协(一八一——二三四),公元一八九年至二二年在位。《朋党论》中所说“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系指宦官专权,囚禁、杀戮名士的“党锢之祸”,先后发生在汉桓帝(一四六年至一六七年在位)、汉灵帝(一六八年至一八九年在位)统治时期。说是献帝时事系欧阳修误记。——第 208 页。

277 唐昭宗,即李晔(八六七—九一四)公元八八九年至九一四年
在位。唐哀帝(李祝)天祐三年(九一六年)梁王朱全忠诱杀士大夫裴枢等
三十余人于白马驿(在今河南滑县),时李振为泄愤对全忠说,“此辈自谓清
流,宜投于黄河,永为浊流。”全忠笑而从之。说是昭宗时事系欧阳修误
记。——第 208 页。

278 魏忠贤(一五六八—一六二七),河间肃宁(今河北)人,明宦
官,曾专断国政。天启年间,兴大狱,捕杀东林党人。——第 208 页。

279 东林党,晚明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政治集团,因其主要人物顾宪
成等在无锡东林书院讲学、议政而得名,他们主张改良政治,遭到在朝权党
的嫉视,后来更遭宦官魏忠贤捕杀。——第 208 页。

280 见《大雅·瞻卬》。意思是贤人都说要出走,则天下邦国都无法维
持下去了。殄,尽;瘵,困病。——第 208 页。

281 见《孟子·公孙丑上》。是孟子答公孙丑论人格时说的话。——
第 209 页。

282 见《孟子·滕文公下》。——第 209 页。

283 见《论语·泰伯》。——第 209 页。

284 语出《论语·子罕》:“夫子循循然善诱人。”——第 209 页。

285 见《论语·述而》。——第 209 页。

286 见《孟子·公孙丑上》。——第 210 页。

287 见《论语·先进》。——第 213 页。

288 《中庸》第十章记孔子答“子路问强”,说道:“故君子和而不流,强
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
强哉矫!”意思是说,待人和顺而不迁就,保持中立不偏不倚,国家有道时不
改变困穷的志向,国家无道时至死也不改变自己的志向,这才是真正的刚
强勇武啊!——第 213 页。

289 见《论语·泰伯》。——第 214 页。

290 见《孟子·离娄下》。——第 215 页。

291 见《论语·季氏》。意思是说,看见善良的行为,好象赶不上似的,

要努力追去,看见邪恶的行为,便好象伸手到沸水里,一定要避开。——第216页。

292 见《孟子·离娄下》。——第217页。

293 见《孟子·尽心上》。——第217页。

294 语出《诗经·小雅·小旻》：“不敢暴虎,不敢冯河。”暴虎,徒手打虎;冯河,涉水过河。譬喻有勇无谋。——第217页。

295 语出《论语·述而》：“子路曰：‘子行三军,则谁与?’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第217页。

296 西征,指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六年五月十八日开始的向陕、甘、宁三省边界进攻的战役。这一战役历时两个多月,解放了环县、豫旺、同心、定边、盐池等城镇,开辟了纵横八百余里的新区,扩大和巩固了西北抗日根据地,为迎接二、四方面军北上,实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创造了条件。——第223页。

297 牺牲者名单手书原件列于开幕词记录之后,文如下:

瞿秋白(中央委员)、方志敏(第十军军长)、顾作霖(少共中央书记)、董振堂(第五军团军团长)、刘志丹(第二十八军军长)、徐彦刚(第十六军军长)、寻淮洲(第七军团长)、何叔衡(工农监察委员)、陈寿昌(湘鄂赣省委书记)、贺昌(总政治部副主任)、刘伯坚(五军团政治部主任)、阮啸仙(中央苏区审计委员会主席)、殷鉴(河北省委)、李天柱(政治委员)、黄甦(军政治委员)、邓萍(五军团参谋长)、吴焕先(二十五军政委)、李才莲(少共中央分局书记)、夏曦(中央委员)、梁柏台(司法人民委员)、曾日三(五军团政治委员)、万永程(福建省委书记)、毛泽覃(中央政府委员)、谢唯俊(特委书记)、李弼庭(总政治部组织部长)、孙□力(二十三师师长)、古柏(特委书记)、顾雄(二十三师师长)、毕士梯(第十五军团参谋长)、钟伟健(西征纵队参谋长)、谢子长(陕西省委书记)、杨森(师长)、汤福林(二军团师长)、蔡会文(军区司令)、胡海(中央土地部长)、关英(省委书记)、曹德卿(三军区第六师师长)、胡南生(团省委组织部长)、李乐天(粤赣边特委书记)、李新庭(军政治部主任)、洪超(第四师师长)、陈阿金(第五师政委)、方维夏(特委书记)、余泽洪(游击队政委)、徐策(川南游击队司令)、戴原怀(川南游击队政治部主任)、陈桂(团长)、龙腾云(福建军区司令)、刘石(特委书记)、赖昌作(特委书记)、

钟瑜、钟昌才(少共省委书记)、宗孟平(特委书记)、李赐凡(江西军区司令)、李美群(女,少共省委组织部长)、张文楷(下江游击队队长)、李斗文(下江游击队政委)、陈荣文(东北联军第七军军长)、金伯阳(满洲省委委员)、夏云楷(抗日联军第六军军长)、何忠国(抗日联军第四军政治部主任)、孙玉清(九军军长)、陈海松(九军政委)、杨克明(五军政委)、熊国炳(省府主席)、邹剑平(八路军副旅长)、叶成焕、陈锦秀(八团团长)、刘立明(团政治部主任)、刘立年(团政委)、胡道全(团政治部主任)、潘文碧(营长)、刘国清(营长)、刘子炎(营长)、余□龙(营长)、谭公强(山西保安游击队第一支队队副)、刘森堂(山西保安游击队第一支队营长)、周平(山西保安游击队第一支队支队副)、钱亦石(文化工作人)、陈柱天(全国学联)、鲁迅、郝梦麟、佟麟阁、赵登禹、王铭章、罗芳伍、姚子青、李桂丹、陈恒民、刘在刚。——第 224 页。

298 这次中央会议的政治报告,指毛泽东所作的报告《论新阶段》。——第 225 页。

299 打到鸭绿江边、收复一切失地,这个口号是针对蒋介石的妥协主张提出的。蒋介石在一九三九年一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公开表明,他的所谓抗战到底,只要求“恢复芦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即把收复“九一八”事变后的失地排除在外。——第 228 页。

300 东方慕尼黑,指当时国际帝国主义者酝酿以牺牲中国利益求得同日本帝国主义妥协的阴谋。慕尼黑是德国南部的一个城市。一九三八年九月,英、法、德、意四国首脑在此举行会议并签订协定,将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区割让德国,换取德国许诺不对英、法进攻。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和一九三九年四月,英国驻华大使卡尔两次从上海到重庆,表示愿意在中日之间进行调停。一九三九年上半年,英、美报界鼓吹召开太平洋国际会议解决“中日冲突”。当时以英国为主要代表的国际妥协势力的这些活动,同一九三八年慕尼黑阴谋相类似,因而被称为“东方慕尼黑”。——第 229 页。

301 汪派,指以汪精卫为代表的公开投降日本帝国主义的汉奸。——第 233 页。

302 十大纲领,即《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洛川举行的扩大会议通过并公布。内容包括: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全国军事的总动员;全国人民的总动员;改革政治机构;抗日

的外交政策 ;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 ;改良人民生活 ;抗日的教育政策 ;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 ,巩固后方 ;抗日的民族团结。——第 235 页。

303 《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洛川举行的扩大会议通过。——第 235 页。

304 恩来、博古同志的报告 ,指他们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所作的报告。周恩来的报告于八月四日至十五日讲了七次 ,其内容为 :抗战两年的总结 ;目前时局的关键 ;统一战线诸问题 ;南方党与军队。《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节选了这个报告的提纲。博古于八月十八日和十九日作了《南方工作的报告》。——第 236 页。

305 上次政治局会议 ,指一九三九年七月三日至六日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提出“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 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 !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 !”——第 236 页。

306 英日谈判 ,指日本一九三九年六月十四日封锁天津英、法租界后由日本外务大臣有田八郎同英国驻日本大使克莱奇进行的谈判。一九三九年七月二十三日 ,两国签订协定。英国承认在华日军有保证本身“安全”与维持占领区“公安”的“特殊需要” ,保证在治安和经济方面与日本合作 ,并将在英租界被捕的四名爱国志士引渡日本。后来 ,英国又于一九三九年十月和十一月分别将其驻在中国的军舰和驻在华北的军队撤走 ,并于一九四〇年七月十八日同日本达成滇缅路禁运协定 ,以适应日本切断中国从海外输入战时物资的唯一通道的要求。——第 236 页。

307 四强会议 ,指英、德、法、意会议。一九三九年七月 ,英国向德国建议缔结互不侵犯和互不干涉条约 ,并建议吸收意大利和法国参加。八月上旬 ,报界传说英国建议召开英、德、法、意并有波兰参加的会议 ,讨论将波兰的但泽(今格但斯克)归并德国以满足希特勒要求的问题。这同一九三八年九月英、法、德、意四国在慕尼黑达成的妥协相类似 ,所以本文称之为“第二个慕尼黑的危险”。参见本书注〔299〕。——第 236 页。

308 这次广播讲话是一九三九年八月九日发表的。其主要用意在于诱使国民党将领特别是广东籍将领投降日本。——第 236 页。

309 这里指大资产阶级。作者在这篇讲话前后所写的《在民族自卫战

最前线的岗位上》(一九三九年六月三十日)和《论抗战相持阶段的形势与任务》(一九三九年十月二十四日)两文都明确指出,当时动摇不定、准备妥协投降的,是“一部分上层资产阶级”,一部分“大地主大资本家”。——第 236 页。

310 中产阶级,指中等资产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作者在《论抗战相持阶段的形势与任务》(一九三九年十月二十四日)中明确将“一切进步的工商业家(一般说来,是中等资产阶级)”列为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革命力量。——第 239 页。

311 参见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238—239 页)。——第 239 页。

312 一民主义,指舍弃三民主义中的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使它只剩下一个民族主义中的部分内容。作者在《拥护真三民主义,反对假三民主义》(一九三九年七月二十九日)一文中批判了一部分上层资产阶级及少数上层分子这种将三民主义“阉割为不彻底的一民主义”、“削弱与掩盖三民主义中基本的革命精神”的立场。——第 240 页。

313 三大基本原则,指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第 240 页。

314 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二四年一月在广州举行。这次大会是孙中山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召开的。它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使旧三民主义发展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第 240 页。

315 管、教、养、卫,即管理、教育、养育、保卫。蒋介石在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三日《推进县政与政治建设》的讲话中将它们列为“县政的四大要务”。按照他一九三九年六月二十八日《确定县各级组织问题》的讲话,管、教、养、卫组织指:乡(镇)公所和保甲组织、中心学校和国民学校、合作社和仓库、壮丁队。对于国民党统治区域中这些组织的方针,中共中央在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一日《关于深入群众工作的决定》中作了规定:“对于下级地方政府机关(保甲与联保)、地方文化机关(小学及教育会)、地方经济机关(合作社等)、地方武装力量(自卫队及民团),应尽其可能使之掌握在共产党员、左派人员与公正士绅的手中。”——第 242 页。

316 指刊载于《共产党人》第四期上的《党的工作中的一个基本问题

——了解具体情况”中的论述。——第 256 页。

317 《联共(布)党史》,即《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这段话见该书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398 页。——第 263 页。

318 指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政策的决定》(一九四一年七月七日)。其中提出要“纠正在执行统一战线政策中的左倾错误”。——第 264 页。

319 关于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途径 毛泽东后来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如果没有特殊阻碍,我们准备在战后继续实行下去,首先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减租减息,然后采取适当方法,有步骤地达到‘耕者有其田’。”(《毛泽东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1025 页)由于国民党在抗日战争结束以后发动了内战,农民土地问题后来是通过土地改革的革命运动解决的。——第 266 页。

320 党务派,指以陈果夫、陈立夫为首的在国民党各级党部中拥有实权的 CC 系。

特务派,指一九三二年四月一日成立的复兴社特务处(处长戴笠)以及由它演变而成的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特务派系。

别动派,指一九三三年十月三日成立的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南昌行营别动队(后改称军委会别动队,总队长康泽)的武装特务系统的势力。

政训派,指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处(一九三三年起处长为贺衷寒)系统的控制军队的特务势力。

军官派,泛指以蒋介石为校长的黄埔军官学校出身、构成国民党嫡系军队骨干的军官势力。——第 267 页。

321 “民族至上”、“国家至上”,是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一日国民党颁布的《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规定的“国民精神总动员”的所谓“共同目标”之一。——第 277 页。

322 这里是就共产党员同党外人士日常共事中的民主精神和民主作风而言的。至于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应该发挥领导作用和坚持领导权,则是另一性质的问题,作者在本文和其他文章中曾多次强调。参见本书《国民党三中全会后的我党形势和任务》、《继续抗战和国共关系》等文。——第 279 页。

323 五五学习节,五月五日为马克思诞辰,中共中央书记处一九四

年三月二十四日《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规定每年这一天为学习节,以“总结每年的经验并举行奖励”。——第 294 页。

324 世界三个营垒的对立,指德意日帝国主义阵线、英法美帝国主义阵线和苏联和平阵线之间的对立和斗争。中共中央一九四一年七月七日《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的决定》指出,这三大阵线的斗争是“目前国际形势的特点”。——第 296 页。

325 时事研究会,指时事问题研究会,是领导研究时事问题的组织。本身的工作偏重于材料的收集和整理。曾编印《抗战中的中国丛刊》、《时事问题丛书》、《战争中的世界丛书》共十种。——第 297 页。

326 《抗战中的中国丛刊》,包括《九一八以来国内政治形势的演变》、《抗战中的中国经济》、《抗战中的中国政治》、《抗战中的中国军事》、《抗战中的中国文化教育》五种,于一九四一年陆续出版。——第 297 页。

327 西北研究社,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出版《西北丛书》时所署的出版者名称。——第 297 页。

328 《西北丛书》,包括《抗战中的陕西》、《抗战中的甘、宁、青》、《抗战中的绥远》几种。——第 298 页。

329 文化教育研究社,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出版《文化教育丛书》时所署的出版者名称。——第 298 页。

330 《文化教育丛书》,包括中国历史、中国近代史等类书籍。——第 298 页。

331 指毛泽东在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报告。报告指出,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前党中央领导所犯的错误是路线错误,它比立三路线的“左”倾形态更完备,时间更长,后果更惨,其思想根源是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第 313 页。

332 “九一八”、大水灾、冲破三次“围剿”、四中全会等决议,分别指《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二日)、《中央关于全国灾荒、秋收斗争与我们的策略的决议》(一九三一年七月三十日)、《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日)以及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的决议案。——第 314 页。

333 外国人,指当时共产国际派到中国来的代表。——第314页。

334 神府,当时陕甘宁边区的一个县,由神木和府谷二县部分地区组成(当时二县县城均在国民党政府统治下)。解放后于一九五一年撤销,划归陕西省神木、府谷两县。——第316页。

335 《贺家川八个自然村的调查》,一九四三年十月由中共西北中央局调查研究室出版,署名延安农村调查团,书名改为《陕甘宁边区神府县直属乡八个自然村的调查》。——第316页。

336 《兴县十四个自然村的土地问题研究》,即《兴县二区十四个村的土地问题研究(报告大纲)》,未曾刊印。——第316页。

337 警备区,指绥德警备区,包括陕西省的绥德、米脂、葭县、吴堡、清涧五县。一九四一年五月,上述五县成立陕甘宁边区绥德分区。绥德警备区同时撤销。这里和本文下面所说警备区,是沿用原来的说法。——第316页。

338 《杨家沟地主调查》,一九五七年五月由三联书店出版,署名延安农村调查团,书名为《米脂县杨家沟调查》。一九八一年八月由人民出版社重新刊印。这个调查是在张闻天主持下由马洪起草初稿并经张闻天反复修改补充后定稿的。——第316页。

339 西川,指陕西绥德县西部河川地区。——第317页。

340 双湖峪,今陕西子洲县政府所在地。——第317页。

341 花户,即户口,旧时造户口册子时的用语。花,言其错杂繁多。——第317页。

342 户地,实行村公有制度的土地,因分给全村住户耕种而得名。每隔若干年重新分配一次。——第317页。

343 盐滩,即晒盐的场区。——第317页。

344 参见斯大林《论党的工作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的办法》(《斯大林文选》,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41页)。——第327页。

345 见列宁《进一步,退两步》(《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07页)。——第333页。

346 租出地、伙出地,都是地主出租的土地。租出地按固定租额收取

地租。伙出地就每年收获总额按成收取地租。租种和伙种是中国旧时租佃剥削的两种主要形式。——第 335 页。

347 “拉话”，当地方言，意为闲谈。——第 338 页。

348 邓发（一九一六——一九四六），广东云浮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中央职工委员会书记。在陕甘宁边区政府直属工厂会议上，他作了《论公营工厂党与职工会工作》的报告。——第 347 页。

349 赵占魁（一八九六——一九七三），山西定襄人。当时是陕甘宁边区农具厂的洪炉股股长。他在完成生产任务、爱护革命财产、关心群众生活、遵守劳动纪律、团结群众各方面都很突出，表现了对待劳动的主人翁态度。一九四二年九月十一日，《解放日报》发表了《向模范工人赵占魁学习》的社论，陕甘宁边区和其他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相继开展了赵占魁运动。——第 348 页。

350 满拓地、开拓地，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时期，先后通过“东亚劝业会社”和“满洲拓殖株式会社”（后扩大为“满洲拓殖公社”，名义上同伪满政府合办），以强行低价“收买”和无偿没收等形式掠夺的土地。其中分配给日本移民和移民团（称为“开拓民”和“开拓团”）的称“开拓地”，暂时租给中国农民以待分给日本移民的称“满拓地”。“满拓”即“满洲拓殖公社”的简称。——第 349 页。

351 满拓地、开拓地中不少是从地主手中夺取的。许多地主在土地被夺成了土地经理人，继续进行租佃剥削。日本投降以后，他们提出“物归原主”的口号，企图维持和恢复他们的土地占有权。这里关于被没收的土地不应退还原主而应分给无地、少地农民所有的主张，便是针对这种情况提出的。中共中央东北局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日《关于处理日伪土地的指示》对此作出了正式规定。——第 349 页。

352 这一意见是针对当时以劳动力多少为分配标准的另一种意见和做法而发的。——第 349 页。

353 工作团，指民运工作团，或称地方工作团、下乡工作团，后来也称土改工作团。由到农村发动群众先后进行反奸清算斗争和土地改革斗争的干部组成。一般派往一个县的干部组成一个工作团，其下可设若干工作队，分别进驻一至数个村子发动群众。——第 349 页。

354 没收分配敌人土地大纲,后来称为《敌人土地没收分配条例》,宁安县临时参议会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九日通过。——第 349 页。

355 租子,这里指减租问题。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中国共产党继续执行减租减息政策,只对日伪土地采取没收办法。随着情况的变化,中共中央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改变了这一政策,实行没收地主阶级土地的政策。——第 350 页。

356 清算运动,即反奸清算运动,是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在新解放区的农村和城市普遍开展的一次群众运动。目的是清算汉奸、恶霸的罪行,收回被他们霸占的土地、财产,摧毁伪政权,建立民主政权,组织群众团体。——第 351、356、359、460 页。

357 配给店与加工业,指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北时期为实行“经济统制”而指定的商店和加工厂,它们被允许销售和生受“统制”的商品,包括所有生活必需品。大加工厂、大配给店往往为汉奸资本所掌握,同日本帝国主义紧密勾结,可以得到许多特惠。小加工厂、小配给店则只能按日伪规定的工价和配售价格得到收益。但是由于它们是日伪“经济统制”体系中直接影响群众日常生活的基层单位,有些配给店还有利用其特殊地位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所以一般也为清算运动所波及。——第 351、455 页。

358 “八一五”,指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在这一天发表诏书,宣布日本对中、苏、美、英四国无条件投降。——第 351、370、455 页。

359 这些仓库、房屋与土地是日本投降、伪满政权崩溃时被一些配给店、加工业者乘机占领的。——第 351 页。

360 合江,当时的一个省,位于今黑龙江省东北部。一九四九年四月同松江省合并,一九五四年六月又随松江省同黑龙江省合并。——第 354、358、368、371、373 页。

361 这里所说的中共中央一九四六年七月九日的询问没有查到。但是,中共中央同年七月十九日曾就土地问题尚未解决地区的土地政策征求意见,其中包括是否宜于实行“地主土地超过一定数额者由政府以法令征购之”、“地主每人所保留的土地可等于中农每人所有平均土地的两倍”、“地主多余的农具、耕牛、房屋为农民所必需者亦得征购之,但地主所有之工厂、商店、矿山不得征购”等原则。——第 356 页。

362 张闻天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二日在合江省群工会议上的总结中解释,对小地主采取减租的原则,是因为“真正的小地主数量不多,作用也不大”;“一减租他就垮台”。为了集中力量打击大地主,所以采取不同的做法。同时,在‘小地主’这名义下,许多所谓‘小地主’实际上不是小地主,而是鳏寡孤独,丧失劳动力的农民,自由职业者,手工业者,小商人等。而对于这些人的土地,我们是不应该动的。”——第 357、367 页。

363 大公家,这里指由省、地区、县所掌握的公有经济。小公家,指党政军各机关、单位所有并经营的经济。——第 359 页。

364 统制贸易,原指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北时期日伪政权在商品的收购、供应(配给)、输出和价格等方面实行严格“统制”的贸易,其“统制”形式包括由日本垄断资本和伪满政权合资经营所谓特殊公司和准特殊公司,强令民间企业按行业组成“组合”,指定配给店实行专卖等。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通过各种垄断性商业机构所控制的贸易,也具有类似性质。——第 360 页。

365 这里所说的商店,其地位相当于县贸易公司。——第 360 页。

366 “好汉股”,原指旧中国恶霸、豪绅、军阀特别是黑社会头目,利用权势,分文不出或象征性出一点钱,就算入股,逞强分红。这里借用此词来表示我党政军个别单位不应该有类似行为。——第 361 页。

367 胡子,东北方言,即土匪。中央胡子是指受国民党加委的土匪。——第 369 页。

368 平分土地运动,东北解放区于一九四七年十一月至一九四八年二月进行。在这一运动中,根据《中国土地法大纲》的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乡村全部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实行统一平均分配。参见注〔377〕。——第 370、378、386、423 页。

369 挖后门、挖家底,指追查和没收金钱、财物等动产。工商业者前门开店,后门进货、堆货。“挖后门”一语即由此而来。——第 370 页。

370 专卖配给制度,包括伪满经济部专卖总局对面粉、盐、石油、火柴、酒精等商品的专卖,以及日本垄断资本和伪满政权合资经营的特殊公司和准特殊公司、伪满政权强行组成的各种“统制”组合通过零售业公会会员(配给店)实行的对生活必需品和其他各种商品的配给。——第 371 页。

371 土地革命时期,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第 371 页。

372 东北局一九四七年八月八日指示,指中共中央东北局《关于清算地主在城市工商业的指示》。——第 371 页。

373 化形地主,当时流行用语,泛指为了逃避土地改革斗争而变换身份的地主。有些地主在土地改革运动开始以前即已转入工商业,在当时也被认为是化形地主而没收了财产。为纠正这一错误,毛泽东在《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一九四八年一月十八日)中指出:“减租减息时期鼓励地主富农转入工商业的政策也是正确的,认为‘化形’而加以反对和没收分配是错误的。”(《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1212 页)张闻天在本文中所作的规定也是针对上述错误倾向的。以一九四六年七月为界,是因为东北解放区此后就由减租减息政策转为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一九四八年一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致电中共中央东北局,进一步明确指出:“在一九四六年七月以后如并未公布地主土地财产不许买卖转移的法令,而地主将其一部土地变卖或将其地财投资工商业经营者,其工商业部分,亦不应没收,应准许其继续经营,并不许其任意停业或破坏,但本人成份仍以地主论,其保留的地主部分的土地财产,则仍按地主处理。如果所经营的工商业,确实足以维持生活者,可以不再给地主分配土地。”——第 372 页。

374 翻把,当地方言,意即复辟。——第 374 页。

375 插犏换工,中国农村旧有的劳动互助形式。犏是牵引犁、耙等农具的畜力单位,能拉动一张犁或耙的畜力(如一头大牲口,两头或两头以上小牲口等)叫一犏。插犏即由两户或几户农民将各自的单只牲畜合成一犏,各户轮流使用,无牲畜的以人工抵换畜工,解决畜力不足的困难。换工则泛指两户或几户农民之间的换工互助,可以是人工换人工,也可以是人工换畜工、畜工换畜工。——第 378、449 页。

376 吴满有,陕西延安人,原是雇农,后成为新式富农,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在国民党军队进攻延安时被俘。——第 379 页。

377 《土地法大纲》,指《中国土地法大纲》,中国共产党全国土地会议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三日通过,中共中央同年十月十日颁布。——第 380 页。

378 本文第八节至第十一节分别论述了监督地主富农生产与防止复辟、发展民主与巩固政权、建立群众性的强大的党、扩大队伍(纠正划分阶级中“左”的错误)与帮助落后(少数土改不彻底的落后屯子深入斗争)等任务。——第 381 页。

379 关于合江平分土地运动的领导,东北局在《关于平分土地运动的基本总结》(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八日)中曾经予以肯定。这个文件在分析平分土地运动中各地发生的“左”倾偏向以后指出:“有些地区则掌握政策较稳,如合江省即是这样一个例子。”——第 382 页。

380 砍挖运动,即砍大树挖底产运动,一九四七年七月至同年十一月在东北解放区进行。挖底产,指追查没收地主隐藏的家底财产。砍大树,指地主的威风经过政治上的斗争和挖底产后被打下去,犹如大树被砍倒。——第 386 页。

381 本文论述加强领导的,是第四节《关于城市工作的组织问题》、第五节《城市工作部的任务》和第六节《加强各级党委对城市工作的领导》,本书没有选录。——第 388 页。

382 谢文东,黑龙江省勃利县人,原是黑龙江省依兰县三区区长兼自卫团长,一九三四年三月在日本帝国主义强行向东北移民、低价收购土地而触及地主阶级利益时,参加了农民反日起义。起义武装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八军后,任军长。一九三八年叛变,充当日伪特务,捕杀抗日军民。日本投降后,重新拉起队伍,一九四五年十一月被三江人民自治军收编。同年十二月中旬叛变,被国民党政府先后委以第十五集团军上将总司令等职,在合江一带与人民为敌。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二十日被我军生俘,同年十二月三日被枪决。——第 393 页。

383 李华堂,原为东北军李杜部的团长,“九一八”事变后参加了对日作战。曾参加东北抗日联军,任第九军军长。一九三八年二月被俘后叛变,充当日伪特务,捕杀抗日军民。日本投降后重新拉起队伍,并于一九四五年底被三江人民自治军收编。不久叛变,被国民党先后委任为东北挺进军第一集团军总司令等职,与人民为敌。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被我军击伤生俘,旋即死去。——第 393 页。

384 “老兵老枪,新兵新枪”,指日本投降后从关内到东北的原八路

军、新四军老部队仍用原有的老枪,而从日军缴获的新枪则发给日本投降后在东北新建的部队。这些部队在短期内大批建立,不少土匪头目乘机进入,他们又暗中接受国民党的委任和收编。后来在国民党军队进攻东北解放区时,这些人控制的部队纷纷叛变。——第 393 页。

385 见毛泽东《组织起来》(《毛泽东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885 页)。——第 400 页。

386 列宁的原话是“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见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181 页)。——第 410 页。

387 见斯大林《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448—449 页)。——第 411 页。

388 见毛泽东《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毛泽东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966 页)。——第 415 页。

389 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 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83 页)。——第 420 页。

390 见斯大林《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460 页)。——第 421、422 页。

391 “搬石头”、“跳圈子”,东北解放区平分土地运动中的“左”倾错误做法,即把开展这一运动以前在基层主持土地改革工作的干部当作阻碍运动的“石头”搬掉,把他们执行的党的政策当作束缚运动的“圈子”而要求跳出。——第 423 页。

392 这次东北局高干会,指中共中央东北局于一九四八年十月六日至十九日召开的高级干部会议。——第 424 页。

393 这段话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对于列宁的合作社计划的概述。见该书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289 页。——第 427 页。

394 汪清合作社,指吉林省汪清县于一九四六年十月至一九四七年初陆续建立的各区合作社和村屯合作社。——第 438 页。

395 劳金,即长工。——第 441 页。

396 见斯大林《在粮食战线上》(《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页)。——第445页。

397 二中全会决议,即《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决议》(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三日)。——第445页。

398 套子,即牲口连同所拉的车或犁(耙)。一副或两副套子,即一匹或两匹牲口所拉的车或犁(耙)。——第451页。

399 见毛泽东《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966页)。——第452页。

400 经济统制,这里指伪满于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日颁布《物价物资统制法》所实行的经济统制。按此法令,生活必需品和其他物产的销售价格、加工定货费等均由伪满政权规定,所有工商业者必须归并于“组合”中受其统制。——第456页。

401 康德,伪满洲国的年号,以公元一九三四年为元年。——第456页。

402 这个文件最初是在中共中央东北局召开的东北高级干部会议上提出的,即本书的《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第458页。

403 安东,旧市名,当时为辽东省省会。现属辽宁省,一九六五年改名丹东市。——第458页。

404 七七决议,指中共中央东北局一九四六年七月七日关于形势和任务的决议。决议根据中共中央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方针强调,必须在干部中扫除侥幸取得和平的想法,确立从事长期艰苦奋斗的决心,把创造根据地(主要内容是发动农民群众)置于工作的第一位。决议全文见《陈云文选(一九二六至一九四九年)》,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29—235页。——第460页。

405 “纠偏必须防右”的方针是在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日新华社社论《在结束土地改革的地方纠左必须防右》中提出的。——第461页。

406 东北行政委员会,东北解放区的最高行政机关,一九四六年八月成立。一九四九年八月,东北人民政府成立,东北行政委员会同时撤

销。——第462页。

407 本溪县三仁石灰窑的故事,指本溪县地方政府侵犯这一石灰窑的事件。一九四九年四月,本溪县贸易局要求与本溪县新洞村三仁石灰窑公司合作,遭到谢绝。当地公安分驻所即令该公司停工,并宣布一切不准动。同时,本溪县营兴华窑业公司在该地开工,利用三仁石灰窑一部分工人及其宿舍进行生产。一九四九年七月,东北行政委员会派人并令辽东省政府共同查处了这一违法事件。——第462页。

408 另件,略。当时在贯彻公私兼顾方针方面的不正常现象,参见本书注(414)所引中共辽东省委的决定。——第462页。

409 关于调整劳资关系决定草案,指中共辽东省委一九四九年七月十二日《关于调整城市劳资关系的决定草案》。张闻天主持起草的这个文件列举了劳资关系中六种不正常的现象,并作出了调整劳资关系的十项规定,首先要求“在干部中进行反复的教育,去克服工人运动中片面强调工人利益的‘左’倾思想的残余,指出这种思想是同中央‘发展生产、劳资两利’的方针不相容的,既不利于发展生产,也不利于工人本身的利益,也不利于工会工作的开展。这是小资产阶级急性病的一种表现,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第462页。

410 研究室,指中共辽东省委研究室。——第464页。

411 中共辽东省委后来于一九四九年八月二日作了《关于贯彻“公私兼顾”方针的若干决定》。张闻天主持起草并经中共中央东北局批准的这个文件列举了贯彻“公私兼顾”方针时存在的八种不正常的现象,并作出了在继续加强国营经济及合作经济的领导力量的总方针下促进私人资本主义正当发展的八项决定:

“(一)在干部中解释私人资本的正当发展:第一,可以使国营经济集中力量于主要工业部门的发展;第二,可以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第三,可以解决人民生活中一些日常工业用品的需要;第四,可以增加工人的就业及壮大工人阶级的队伍,对国家与人民都是有利的,在今天还有进步的作用。因此,对私资的正当发展,应该采取积极扶持的态度。

(二)凡私人资本的正常活动,有国家法律的保障,任何人不得借口干涉和侵犯。私人资本的违法活动,投机倒把,由国家司法机关及税务机关依法处理,其他地方机关只有检举告发之权,无处理之权。一切违法干涉私人

资本正常活动的行为,应受到法律的制裁。

(三)公私企业,应集中力量于主要生产部门,不要分散人力物力,样样都搞,样样想搞,样样搞不好。这样就可加强公营企业,又可腾出一定的经济地盘给私人资本,吸收私人资本投入生产事业。

(四)公营企业与私营企业间在提高生产率、减低成本上的和平竞争,是应该允许的与必要的。但利用国家资本的力量采取赔本倾销政策,企图达到垄断独占之目的,是没有必要的,也是不适当的。

(五)凡过去因东北战争的紧急需要而租用私人的工厂,一有可能即应清理租金,物归原主,厂方机器有损失者,应给以应有的补偿。一切廉价与强迫租借私人工厂的行为,应予制止。相反,现在地方政府手中的一些小厂,自己不能经营或无经营之必要者,可廉价出租给私人资本经营。

(六)在公私合营企业中,应使私人股东有职、有权、有利润。公私合营的企业,应做出公私合作、公私两利的具体榜样,使私资体验到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对私资的好处。凡违反此原则的公私合营的企业,应改组之。

(七)各地党委与政府,应经常了解私资发展的情况,而给以具体的指导与帮助。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事业,应尽可能给以发展的有利条件。发展私资的计划,应同私人资本家面商,取得其真正的同意而决定之。该计划决定后即应成为地方经济计划中的一个有机部分,地方党政应同样保证其完成。

(八)凡公私双方发生争议时,市工商局(科)有调解仲裁之权,不服时可交法院判决之。”——第 464 页。

412 万隆亚非会议,一九五五年四月十八日至二十四日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参加会议的有二十九个亚非国家。会议发表的《亚非会议最后公报》提出了关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的十项原则,其基本精神是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相一致的。——第 474 页。

413 《记录》草稿,指庐山会议上印发的供讨论的《关于形势和任务——一九五九年七月二日至×日庐山会议的议定记录(修正草案)》。——第 480 页。

414 三个“并举”,“两条腿走路”,是对于当时经济建设方针的概括说法。一九五八年五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中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基本点,其中包括“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在集中领导、全面规划、

分工协作的条件下,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公报提出,这三个“并举”,以及“重工业和轻工业同时并举的方针”,“在工业战线上以钢为纲、全面跃进的方针”,“土法生产和洋法生产同时并举的方针”,“工业方面的集中领导必须同在工业方面大搞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方针”,是一整套“用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而不是一条腿或者一条半腿走路的方针”。——第481页。

415 八大二次会议,指一九五八年五月五日至二十三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向会议所做的工作报告估计,一九五八年我国的钢产量将超过七百一十万吨。——第484页。

416 大洋炉,指大型的近代炼钢设备。一九五八年大炼钢铁运动中遍地开花地搞“小土炉”炼钢,而将上述设备称为“大洋炉”。——第484页。

417 限额,指基本建设投资限额,是我国为便于对基本建设项目分级管理而对其投资额大小所规定的标准。建设项目中,凡投资等于或大于限额者,为限额以上的项目,一般为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其设计任务书由中央审批;小于限额者,为限额以下的项目,其设计任务书由地方分级审批。——第485页。

418 “六保户”,指当时在原材料供应和制造能力的安排上优先保证其需要的六大产品,即轧钢机、电站设备、矿山设备、洗煤炼焦设备、排灌机械、机车货车。当时还强调,这六大产品的生产必须是主机、副机和配件全面地进行安排,确保成套地供应。——第485页。

419 “一平二调”,一九五八年轻率发动的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错误做法,即: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无偿地抽调生产大队、生产队和社员个人的财产和劳动力。——第487页。

420 郑州会议,指一九五九年二月十七日至三月五日在河南郑州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第487页。

421 “观潮派”,是在一九五八年轻率发动的“大跃进”运动中出现的,一种贬称,被错误地加在对运动表示不同意见或提出正确批评的人头上,指斥他们对“大跃进”运动潮流袖手旁观。——第489页。

422 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运动中,曾把反对高指标、浮夸风、坚持实事求是的人,以及所谓具有资产阶级学术观点的人,都作为“右倾保守思想”的反面人物,作为“资产阶级白旗”加以批判、斗争甚至处分。当时曾肯定这种错误的作法为“拔白旗”,也叫“拔白旗,插红旗”。——第 491 页。

423 “算帐派”,又称“秋后算帐派”,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运动中出现的一种贬称,被错误地加在不相信虚报浮夸,表示要计算秋季实际收成之后才能信服的人头上。——第 494 页。

424 见毛泽东《介绍一个合作社》(《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人民出版社 1965 年版,第 522 页)。——第 494 页。

425 “八字宪法”,即农业“八字宪法”,指土(深耕、改良土壤、土壤普查和土地规划)、肥(合理施肥)、水(发展水利和合理用水)、种(推广良种)、密(合理密植)、保(植物保护、防止病虫害)、管(田间管理)、工(工具改革)八项措施。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运动中,这八项措施被作为农业增产的根本大计提出并称为“八字宪法”。——第 496 页。

426 马雅可夫斯基(Маяковский, В В., 一八九三——一九三) ,苏联诗人。他于一九二二年写了著名讽刺诗《开会迷》。——第 499 页。

427 指列宁在《论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内外形势》中所说:“我们应该重复马克思的话:在革命时期不但不会少作蠢事,有时还会多。我们必须冷静地和大胆地来看这些蠢事,我们革命者必须学会这一点。”(《列宁全集》第 33 卷,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195 页)列宁所指的,是恩格斯《流亡者文献》中的一段文字:“在任何一次革命中,就象其他任何时候一样,难免会做出许多蠢事;当人们最后平静下来,以致能够重新进行批评的时候,他们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做了许多最好不做的事,而没有做许多应该做的事,因此事情搞糟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8 卷,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586 页)——第 502 页。

428 庐山会议期间,彭德怀于一九五九年七月十四日写信给毛泽东,这封信印发时被加上“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的标题。——第 504 页。

429 北戴河会议,指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七日至三十日在北戴河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第 505 页。

430 列宁这一论述见《日记摘录》(1923 年 1 月 2 日)。他在说了“我们

可以而且应当利用我们的政权把城市工人真正培养成在农村无产阶级中传播共产主义思想的人”之后,立即强调:“决不能把这一句话了解为似乎我们应当马上把纯粹狭义的共产主义思想带到农村去。在我们农村中还没有实行共产主义的物质基础之前,对于共产主义,这样作可以说是有害的,可以说是危险的。”紧接着又说:“不能这样作。应当从建立城乡的联系开始,决不能过早地抱定向农村灌输共产主义的目的。这个目的现在是达不到的,是不合时宜的,现在提出来不但无益,反而有害。”(《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20页。)——第507页。

431 见列宁《从莫斯科—喀山铁路的第一次星期六义务劳动到五一节全俄星期六义务劳动》(《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04页)。——第508页。

432 评工计分,当时集体所有制农业企业评定其成员的劳动量和计算劳动报酬的一种方法。即按照各个成员向集体提供的劳动量,评定其应得的工分,年终结算时按该集体经济单位的每一工分值和各个成员的工分总额,分给劳动报酬。——第508页。

433 三包一奖,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实行的一种基本的生产责任制度,即包工、包产、包成本和超产奖励制度。一般是由农业社确定所属各生产队的产量作为包产指标,计算完成包产任务所需的劳动工分数和生产费、管理费,作为包工指标和包成本指标,将三包指标落实到生产队。年终结算时,对超产的生产队给以奖励。农村人民公社化以后,有些生产大队对生产队也实行这一制度。——第508页。

434 引自郭大力、王亚南译本,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引者略去了第一句“社会已有的生产力”后括号内的一句话:“(那就是他自己的劳动当作现实的社会劳动所具有的社会生产力)”。这段引文另见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90页。——第514页。

435 斯大林宪法,指苏联第八次非常苏维埃代表大会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五日通过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宪法。——第516页。

436 关于国内主要矛盾何时发生变化,一九八一年六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重新肯定了一九五六年九月中共“八大”的论断,即当时国内主要矛盾已不再是工人阶级

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 516 页。

437 湖北教科书,指《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讲义》,湖北省“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讲义”编写小组编,湖北人民出版社 1960 年版。——第 518 页。

438 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是党中央当时的政策。一九八四年五月十五日,赵紫阳在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代表国务院提出要:“在国营企业中逐步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企业的生产指挥、经营管理由国家委托厂长(经理)全权负责。”——第 527 页。

439 单项奖售,即国家在收购某些重要经济作物时,向出售者供应一定数量的粮食或棉布、化肥等工业品的奖励办法。其目的是保证国家收购任务的完成,促进农副业生产的发展。——第 555 页。

440 综合换购,即国家对完成交售计划以后的农副产品实行以工业品换购的办法。例如,一九六二年外贸部门曾对一百三十七种三类小商品的计划外收购部分,以价值相当于收购金额百分之三十的各种工业品交给地方进行综合换购。——第 555 页。

441 为了加强对物资的管理,做好物资供需的平衡,保证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和市场稳定,国家按各种物资对国计民生的重要程度,分三类管理,即由国家统一分配的物资、中央各主管部门分配的物资和地方管理的物资。根据商品对国计民生的重要程度,国家对商品也分一、二、三类管理。这里和后文所说的一类物资和二类物资,都是就农产品而言的。一类物资,当时指粮食、棉花、食油。国家对这类物资采取统购统销的政策。二类物资,当时指烤烟、麻类、甘蔗、茶叶、猪、牛、羊、鸡蛋、蔬菜、桐油、毛竹以及重要中药材、重要木材等。国家对这类物资采取通过合同进行派购的政策。——第 555 页。

442 见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378 页)。——第 580 页。

443 见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66 页)。——第 580 页。

444 见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选集》

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46页)。——第580页。

445 见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261页)。——第580页。

446 见列宁《在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一次代表会上的演说》(《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71页)。——第585页。

447 见列宁《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41页)。——第586页。

448 见毛泽东《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854页)。——第586页。

449 见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980页)。——第587页。

450 见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32页)。——第596页。

451 见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045页)。——第599页。

452 “众人为一人,一人为众人”,通译作“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见列宁《从莫斯科—喀山铁路的第一次星期六义务劳动到五一节全俄星期六义务劳动》(《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04页)。——第612页。